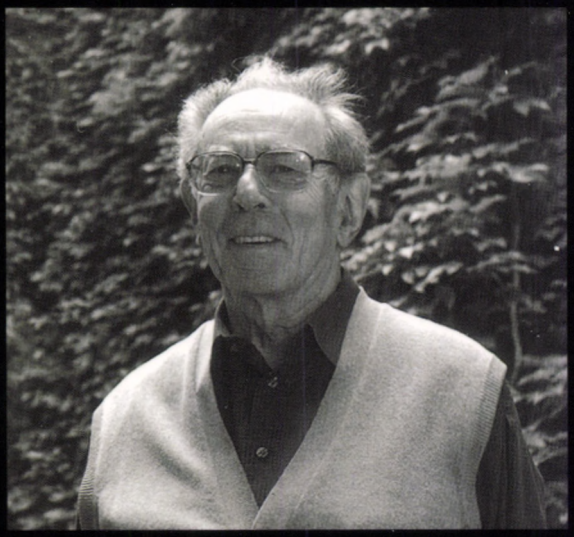
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著 | 刁琳琳 譯

思想的力量

學術探索之旅的另類自傳



作者

雅諾什·科爾奈（1928– ），匈牙利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榮休終身研究員，哈佛大學Allie S. Freed經濟學榮休教授，以及中歐大學傑出研究教授。他出版了多部經典著作，包括《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1956）、《反均衡論》（1971）、《短缺經濟學》（1980）、《通向自由經濟之路》（1990），以及總結其畢生研究成果的著作《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92）

封面圖片：*Shaman and Youth*, clay figures, Mexico, ca. 1500 B.C.,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作者照片：András Mayer, Mindentudás Egyeteme

思想的力量

學術探索之旅的另類自傳

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著

刁琳琳 譯

中文大學出版社

《思想的力量：學術探索之旅的另類自傳》
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著
刁琳琳 譯

中文版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395-8

本書根據The MIT Press 2006年出版之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翻譯而成。

Copyright © 2006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in Chinese)
By János Kornai
Translated by Diao Linlin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95-8

This translation of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opyright © 2006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獻給我的母親穆約

目 錄

自 序 xiii
致 謝 xxi

1 我的家庭和青年時代：1928–1944 年 1
我的父親 1
我的家庭 6
皇家德國學校 10
探索學術之路 12
1944 年：父親的命運 15
1944 年：我的逃亡之路 17

2 我如何成為共產主義者：1945–1947 年 29
入黨的各個階段 29
1944 年給我留下的戰爭創傷 32
學術思想發生轉變並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政治觀念 36
具備人格魅力的領導人 44
歸屬共產主義團體 46
機遇與個人能力 48

3 在共產主義報社工作：1947–1955 年 51
一帆風順的仕途 51
我的動機 54
報社的生活 58
我對經濟問題的理解 61
思想的空白 65
道德的計算方法 67

4 覺醒：1953–1955年 69
「新路線」 69
與前囚犯的談話 72
幫助我理清思路的討論和書籍 74
第一次「反抗」 78
為伊姆雷·納吉的文章寫書評 79
《自由的人民》報社裏的集體叛逆 81
結束報社生活 83

5 開始從事研究工作：1955–1956年10月23日 87
《過度集中》
我的學術背景 87
思想衝擊 90
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徹底決裂 97
開始踏上研究之路 102
畢業論文的主要觀點 107
論文發表初期得到認可 114
《過度集中》的政治背景 117

6 匈牙利革命及其結果：1956年10月23日–1959年 123
伊姆雷·納吉的新政府計劃 123
新報紙*Magyar Szabadság* 128
混亂的日子，混亂的年代 132
《過度集中》的影響在不斷延續 133
被經濟研究所開除 138
面臨被捕入獄的威脅 142
友誼和團結 151

7 我的大學：1957–1959年 155
自學成才 155
蘭格–哈耶克的論戰 158

繼續研究輕工業 160
脫離關係 162
走進死胡同 165
影響終生的決定 167

8 數理模型的經濟學應用：1957–1968年 171
《雙層計劃》
初識陶馬什·利普塔克 171
對利潤分成的數理探討 174
對紡織業的規劃 178
雙層計劃 181
中央計劃的理想模型 183
國民經濟規劃的初始原則 187
計算 190
我值得付出這些努力嗎？ 193
與數學家合作 200

9 西方之行：1963年後 203
出國前 203
英國劍橋 204
在倫敦經濟學院 207
間諜和告密者對我的相同看法 209
對出國訪學和國外發表作品的總體評價 217
未能得逞的「莫須有罪名」 221

10 與主流經濟學思想唱反調：1967–1970年 227
《反均衡論》
《反均衡論》的前身 227
是什麼激發我寫出《反均衡論》 229
某些發人深省的相似之處 232
我們能夠指望普適理論什麼，不能指望什麼 234

理性的決策者 238
非價格信號 241
均衡與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 242
從政治角度解讀一般均衡理論 245
科學改革還是科學革命 246
《反均衡論》出版初期人們對它的認可以及其長遠影響 247
我值得為《反均衡論》付出這麼多心血嗎？ 251
我對《反均衡論》的結語評論 253

11 研究所、大學和科學院：1967年後 257
最高經濟領導人 257
似乎什麼都不曾發生過 259
信任與容忍 260
流產的學院改革 266
在層層禁令下執掌教鞭 270
我如何成為院士？ 273
院士的特權 277

12 尋路之旅和準備工作：1971–1976年 281
《急進增長與和諧增長》
《非價格控制》
經濟增長：急進增長還是和諧增長 282
劍橋大學的邀請 283
從肩部到腰部打滿了石膏—凱恩斯和赫希曼 285
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 287
繼續在斯坦福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遊歷 290
自主控制 293
吱嘎作響的適應機制 299
建造新家 301
加爾各答毛澤東主義者眼中的市場經濟改革 303

13 終於完成了短缺經濟的研究「拼圖」：1971–1980年 307
《短缺經濟學》
鼓舞人心的工作環境 308
本書想要傳遞的信息 311
自我審查 314
出版社的審稿人 317
第一印象 319
與「非均衡」流派的學術之爭 320
與正統俄羅斯經濟學家的學術之爭 323
幫助侵蝕社會主義體制 324
再版的政治和道德抉擇 328

14 取得突破：1979年後 333
《軟預算約束》
這個概念的意義和重要性 333
提出「軟預算約束」的時代背景 335
實踐證實 340
為這一現象建立數理模型 341
第一篇總結性文章背後發生的故事 343
從這件事中汲取的幾點教訓 346

15 溫和冷靜的批判：1968–1989年 355
《匈牙利的改革過程：遠見、希望和現實》
喜憂參半的希望 355
從幼稚的改革者轉變成苛刻的分析家 358
「不要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364
效率和社會主義道德 368
產權的重要性 371
蘭格模式和匈牙利改革的現實情況 373
題外話：匈牙利的另外一個現實情況 374
用現在的眼光回顧過去 376

16 哈佛：1984–2002年 379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 379
哈佛大學如何聘任教授 384
遷往波士頓坎布里奇市 390
教學的樂趣和煩惱 394
多元化與寬容 397
苛刻的道德要求 399

17 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年後 403
什麼將我與匈牙利牢牢地聯繫在一起？ 403
坎布里奇與布達佩斯的生活對比 407
世界文化的中心 411
朋友 412
與歐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經濟學家在一起 419
中國之行 421
感覺就像回到了家裏 425

18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綜合性研究：1988–1993年 431
《社會主義體制》
我如何寫出《社會主義體制》 431
總結我的用意 435
實證分析及價值觀 438
一般性模型 440
太早還是太晚？ 443
來自東西方的認同 445
右派和左派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拒絕 446
一段古怪的小插曲 448

19 轉折點：1989–1992年 451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
預言的界限 451

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公園和布達佩斯蓋勒特丘陵上作出的決定 453
我如何完成《通向自由經濟之路》 456
發行初期的反響 459
模仿時代的終結 461
為了私有部門的健康發展 464
人們對公共基金應盡的責任 467
為了實現穩定而實施的外科手術 469
關於平衡 472

20 遊走在科學與政治的邊緣：1990年後 477
《主路與輔路》
《掙扎與希望》
《轉軌中的福利、選擇和一致性》
對於匈牙利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 478
醫療體系改革 484
他們徵求過你的意見嗎？他們注意到你的意見了嗎？ 488
實際效果 493
制訂貨幣政策 496
對其它國家經濟轉軌的評論 498

21 繼續我的學術之旅：1990年後 503
《從社會主義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意味什麼和不意味什麼》
《誠實與信任》
解讀體制變遷 503
期望與失望，樂觀與悲觀 506
匈牙利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 513
一段美好的小插曲：我的七十歲生日 515
哈佛大學：與教學工作說再見 518
回家 524
「您現在在研究什麼？」 527

注 釋 529
年代表 541
術語表 549
人名彙總 569
書 目 591

自序

當我完成這本自傳的大半部分後，我仍然不確定寫這本書的目的究竟何在。是什麼促使我回顧過去的生活？我想把這些經歷講述給誰聽？

由於我比較內向，所以從不輕易談論自己的生活。在匈牙利從一黨制轉而為民主政治的那段激動人心的日子裏，一位記者曾極力遊說我接受傳記體式的採訪，最後我同意了他的請求，接受了一個長時間的採訪。他在勸說我時曾經說：「以後可能就不會有人對它感興趣了。」那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我希望現在動手寫這本自傳，還不算太晚。

多年來，我的妻子一直敦促我寫下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但這個計劃卻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年中我才開始著手準備。其後的兩年，這本自傳幾乎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甚至影響我其它的研究工作。

我的妻子在這件事上的執著，是激勵我完成此書的主要動力。如果別人問我這本書最希望取悅的讀者是誰，或者這本書希望滿足誰的心願、贏得誰的認同，這個人毫無疑問就是蘇莎。

此外，我希望這本自傳還會引起其他人的興趣，例如我的子女、孫子、孫女、家庭的其他成員、朋友、過去和現在的同事、我的學生及閱讀我的專著和文章的讀者，這些人為數可不算少。那些和我有私交、或者通過過去的作品認識我的人，現在對我已經有所了解。我希望他們能將這些認識，與我在自傳中自我描繪出的形象，結合起來。而且他們還可以把幾百篇有關評論我的作品的文章，與我的自我評價作比較。在這本自傳裏，我描述了自己在創作每部作品時的想法，以及如今對它們的評價。我很少公開回應他人

的評論，當我與意見相左的人不期而遇時，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會與他們一辯高下。我希望本書能按照年代，順序地全面「評論」我的研究工作。

儘管我的自傳基本上順著事件發生的年代，但它絕不是一本記錄「流水帳」的日記。書中每個章節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這個主題可能是某件事件、某部作品、或者是我曾經居住的某個地方。每章的標題都清楚標示其涵蓋的時段，這些時段按照章節的先後，順序結合在一起，但在主題需要的情況下，它們或許也會相互重疊。

也許有些讀者沒有讀過我過去的作品，只對我所生活的時代抱有濃厚的興趣。本書沒有承擔歷史學家的任務，也沒有嘗試客觀全面地描述，或者解讀某些重大歷史事件。如果人們希望了解匈牙利及其它前共產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和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情況，那麼相關的文獻資料，早已汗牛充棟。我只是那些時代的其中一位親身參與者，並非什麼重要人物。我想描述的，只是我本人的經歷和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各個時期對我個人生活的影響。

對於那些對東歐感興趣的讀者而言，我的自傳也許能作為其它文獻的輔助材料，為他們了解東歐國家、共產主義體系的興衰，以及東歐知識分子面對的兩難處境等問題，提供詳盡的材料。曾經親身經歷那個時代的人，他們所撰寫的報告、日記以及自傳，都是嗣後的學者進行研究時，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料。作為歷史的親歷者，我希望我的自傳，也能夠成為這種原始資料。事實上，我還希望我早前的學術文章，能夠保持最大的客觀性，成為歷史的見證。這本自傳從主觀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豐富了我的學術作品的內容。現在我正努力把原來一些遺漏的內容，補充進《短缺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體制》內，因為這些材料在當時看來，涉及個人生活太多，或者由於某些原因，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這本自傳的體裁，允許我對倫理、政治和科學等問題，闡明自己的觀點。由於當時的題材受到嚴格限制，根本不容許我把個人的觀點，加進自己的學術作品裏。

對於這本自傳的名稱，我斟酌了很長時間。起初我傾向於把它命名為《理解……》。首先我希望理解自己。在書中我盡量解釋在某時我為何有某種想法，哪些因素影響了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以及後來我的想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此外，我還希望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與我意見相同或者相左的人，以及那些堅定地支持我，或者對我嗤之以鼻的人的想法。

「理解」意味著在精神上，持贊同或者至少持默許的態度，但這與我對這本自傳的認識，相去甚遠。和先前撰寫學術作品時一樣，我無法在這本自傳中，澄清別人對自己的誤解，也不會對他人橫加評論。我只希望理解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一切，但有時隱藏在事件背後的動機、論證中的漏洞、推動人們的力量，以及衝突中公開或者沒有公開的原因，的確是很難發掘出來的。剖析自己的過去不是件輕鬆的任務，而分析他人的過去，更是難上加難。

最後，我選擇了另外一個書名《思想的力量》。我認為這幾個文字，最能夠精闢地概括這本自傳的主題。我這一生中，從來不曾為名利奔波，窮盡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有時，我能夠對某些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產生一定影響，但這絕不是我身處高位發號施令，或者通過收買，誘使他人與我合作的結果。如果說我的確對人們或者事件，曾經產生影響，那麼這都是通過我的語言或者文字，表達出來的思想所發揮的作用。

一位朋友讀過自傳的手稿後，對此提出異議：「你這種相信論證、信念或者思想具有力量的想法太天真了。推動歷史事件發展的真正動力是利益。」作為社會變革的專業觀察者和分析家，我絕不會糾纏於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只會嘗試為觀察到的現象，找出各種原因，並且根據它們的重要性，採取相應的研究方法。然而，真正掌握權力和財富的人，是那些實幹家，以及有能力面對各種選擇，作出最終決定的人。他們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價值觀、原則和思想，毫無疑問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數百萬甚至數以億計無錢無權的普通民眾，他們的思想和信念，顯然也影響了歷史發展的進程。如果我不是對於思想就是力量的觀點深信不疑，那麼我一生

的辛苦工作，便會喪失全部意義。

當然，思想的力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事實上這也正是這本自傳的主題之一：在何時我的思想發生動搖？為何發生動搖？導致我開始重新審視它們；其他人的觀點對我產生怎樣的影響？我自己的思路、分析結果和建議，與其他人的思路、分析結果和建議，發生了哪些衝突？我的思想，不斷受到強大的力量的考驗。姑且不論我的思想是否通過了這些考驗，本書在每章中都涉及這類問題。

我在本書的副標題中，把這本自傳稱為「另類」自傳，因為它在兩方面，表現出與絕大多數自傳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我在描述個人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時，經常會暫時中斷主線，轉而闡述我對其中某個具體情節的看法。這本自傳的重點，絕不是講故事，我採取這種做法，是為了更好地分析這些情節，以及它們所發生的環境。這些評論與社會學、政治哲學、道德規範、研究和創新的進程、科學社會學或者其它主題的某些方面，息息相關，可以被看作獨立的微型隨筆。因此，這本書便成為回憶錄與穿插其中的許多隨筆，結合在一起的產物。而且從本質上來說，這些隨筆相互間並無關聯，所以我將其稱為「另類」自傳。

其次，絕大多數自傳，都是為了表現作者的私人生活。儘管我是從個人和主觀的角度，描述我的生活，但這本書從根本上來說，是一本學術性自傳，所以這便允許我在這本書中，把我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與我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服務密切聯繫的友誼和人際關係，全部包括在內。

我在全書中多次提到我的家人和家庭生活。儘管這些曾給我帶來無盡的快樂和煩惱，但是與之相關的內容，卻沒有在本書中佔據大量篇幅，我也沒有濃墨重彩地把家庭中發生的重大事件記錄下來。也許這些沒有用文字詳細描述的私人生活，都能在書中附帶的照片裏，展現出其「冰山一角」。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幾乎沒有提及個人私事，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這也是我把這本書稱作「另類」自傳的原因之一。

現在請允許我簡單地談談本書的體裁和風格。在過去的五十年

裏，我所習慣的文體一直是分析報告，即力求以清晰明瞭、簡單易懂的論證方式，把我對某個主題的理解，充分展現出來。但我卻不可能突然間變成文學家，所以請不要指望我，能夠繪聲繪色地描寫事情發生的場景，記錄談話時的具體情景，栩栩如生地描述朋友的長相，或者生動地記敘某些緊張的場面，以令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刻意還是隨性而為，文學作家都可以為書中的問題，留下開放式結尾，或者拒絕對某些思想進行分析，而這是科學研究者的禁忌。即使在寫自己的自傳時，我仍然是個學者。我會努力避免在風格、結構和表達方式上，出現模棱兩可的情況。

過去我在寫書時，眼前經常會出現清晰的受眾群體的畫面，即本書針對哪些讀者群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必需在書中解釋哪些問題，或者我認為讀者已經了解哪些事實。而這次的情況有所不同，我相信這本書的讀者將包括經濟學家、其他專業人士、經歷或沒經歷那個年代的人、匈牙利或其他東歐國家的讀者，以及居住在東西方的人們。我盡力讓所有人，都能理解我想傳達的信息。我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會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我是否應該把自己的目標，設定為竭力提高本書的精確度，並且致力描繪各個理論背後的原始假設？這種方法需要提供詳細的定義，並對讀者的經濟學涵養，提出一定要求。它可能帶來的問題，是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難以理解書中的內容。那麼我是否應該因此選擇更簡單的表達方式，因而承擔過於簡單化的風險？不過既然我不是在寫學術論文，那麼我寧願承擔後者帶來的風險。對於那些沒有曾經閱讀我的學術作品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介紹了我在許多專著和文章中的觀點；而對那些已經閱讀這些作品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許會使他們想起某些作品。在這裏我要預先向那些認為我在書中，某些部分過分囉嗦的讀者，真誠地道歉。

毫無疑問，我自己的回憶，是這部書最重要的來源，但我並不認為它的創作過程，只是檢測了自己的記憶力：這書不僅取材於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是以其它出版作品為依據，盡可能仔細地核對了相關事實。

我的手頭掌握著充足的創作資源，正如我在上文提到，我查核了許多自己的創作，當中包括自認為非常重要的文章和專著*。一般說來，當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後，便不會再去翻閱它們。然而，現在我卻開始一本接一本地重新閱讀這些早期的作品，以及當時及之後人們對它們的評論。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由於我曾經是一名研究員，因此我保留了很多筆記，並且建立了包含各種資料的檔案庫。這些資料都按照順序，用便於查找的方法，完好地保存下來，而每個目錄下都有數百份文件。此外，我還保留了大量別人寫給我的信件，以及我寫給他人的信件的複印件。為了寫作這本自傳，我一頭鑽進了這個浩瀚的資料海洋。

各種公共檔案室的研究資料，也有效地補充了我自己收集的材料。我和同事都在那裏，找到許多有趣的信息。最令人興奮的是，我們可以研究匈牙利前情報機關的文件。最近匈牙利頒布法令，允許公民查找與本人有關的此類材料。當我看到告密者的報告、警方為政治審判準備所作的調查記錄，及國家安全和情報官員的筆記時，不禁感到非常鬱悶，甚至毛骨悚然。我在本書中引用了許多政治警察，以及特務機關對我進行調查時所使用的材料。

我認為自己應該預先向讀者說明，本書的內容不僅來源於自己的回憶，而同時亦是建基於其它資料的研究結果上，這一點非常重要。不過我不希望令更多讀者喪失閱讀本書的信心，它的重點，不是乾巴巴地描述檔案研究的結果，而是著重對我自己的回憶的記述。在書中我描述了漫長，而且充滿危險的學術探索之旅，其中不乏各種或輕鬆或陰鬱的小插曲。同時，我亦回憶了許多愉悅或者痛苦的經歷。我希望當讀者讀到最後一頁時，能夠更加深刻地了解我的生活、工作，及我所生活的年代。

---

* 您可以從目錄上輕而易舉地找到這些精選作品的名稱。我在某些章節詳細討論某一部或多部專著及文章時，通常會在該章的副標題裏列出它們的名稱。

奧西里斯出版社(Osiris Publishing House)在2005年4月出版了我的匈牙利語版自傳。以這本書作為基礎，翻譯成英語版本，並進行了少量修改。

這本書首次出版後出現的一些小錯誤和不精確的地方，在本書中已經得到修正。我根據讀者的建議，進一步闡明了某些意義含糊的段落。此外，我為這本自傳的英語版本，增加了術語表和年代表，希望藉此方便非匈牙利語讀者閱讀本書。

從匈牙利語手稿完成，到英語版本校對完畢，期間相隔了一年多的時間。當然生活並沒有就此停止，但除了某些特殊情況以外，本書並沒有涵蓋在這段時間裏發生的事情。

為了方便閱讀本書，我有必要為讀者製訂一些實用的參考。本書末尾附有參考書目，上面列出了書中提到的所有作品，但是它不能被視為，涵蓋書中所有主題的最全面的參考書目。對於多次再版的作品來說，我會就我所知，列出最新的版本，並且在方括號中注明第一版的年代。

本書的正文，主要使用了兩種注釋：腳注和尾注。我選擇這種多少有些與眾不同的注釋方法，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由於這本自傳的體裁既不是小說，也不是學術作品，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所以使用這種解決方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鑒於這本書目前使用了這種另類的體裁和風格，部分腳注中包含的信息，事實上可以插進正文，但由於這些內容，都略微偏離正文的主脈絡，所以才把它們放在腳注中。這些腳注包括例示、數據、小插曲，以及某些軼事和笑話。我希望那些有興趣讀完正文的讀者，也不要忽略腳注。

尾注主要是被研究員稱為評論性注釋的內容，正如我在上文解釋的那樣，這本自傳中使用的材料來源非常豐富。如果某些信息是來源於檔案室的資料，那麼，尾注便會依據學術界慣用的格式，注明它的出處。此外，書中還大量引用了已經出版的作品。如果正文中，只是簡要地提及這些文獻，那麼讀者會在參考書目中，找到完整的書目信息。不過如果正文中只是間接提到這些參考書目，或者

直接引用原文，那麼我便會在尾注中說明相關情況。*

我猜想大多數讀者，都不希望花費太多精力，查證各種信息的來源。我在尾注中加入這些信息，正是為了幫助他們理解全文，但是即使讀者不查閱尾注，也可以順利地理解本書的要點。然而，那些希望追蹤研究某一個或多個問題的讀者（包括研究課題與本書內容有關的人），亦可以在尾注中，找到所有有用的信息。

中文版謝辭

我首先要感謝肖夢女士，沒有她的不懈努力，本書不可能翻譯成中文並出版。肖夢女士非常與眾不同，她聰慧又有魄力，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組織者；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無私並且永遠支持你的朋友。我還要由衷地感謝我的得意門生許成鋼教授，他是一位極為優秀、極富創造力的學者；他仔細閱讀了本書的中文譯稿，並幫助解決了其中的翻譯難題。我還要感謝吳敬璉教授和青木昌彥教授對本書出版的大力支持。此外，我要感謝本書的譯者刁琳琳、本書的編輯謝偉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本書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雅諾什·科爾奈

2009年2月12日於布達佩斯

* 由於注釋自身不能再進行注解，因此腳注的參考書目直接在腳注中注明了。

致謝

我深深地感謝，所有幫助我完成這本自傳的人。我的全職助理卡塔琳·薩博，非常盡責地承擔了與本書有關的資料的組織和整理工作，其後她又負責了後續其它版本的相關工作。此外，我也很幸運地得到四名年輕研究助理的高效及耐心的幫助。他們是歷史學家雅諾什·莫爾納及經濟學家加博爾·伊萬、諾埃米·彼得和拉斯洛·托特。他們勤勤懇懇地幫助我收集數據和文件，確定資料來源，核實信息的準確性，彙編術語表和索引，並且校對手稿。

我希望感謝所有參與本書出版工作的人員為此的支持。他們對全部手稿或部分手稿的初始版本，提出中肯的意見、收集檔案材料、尋找相關書籍或文章、澄清某些專業問題，或者以其它方式作出支持。請允許我在此列出，那些給予我特殊幫助的人們的名字：費朗西斯·巴托爾、托馬斯·鮑爾、卡塔·喬科夫斯基、卡倫·埃格爾斯頓、赫迪·埃爾德什、彼得·埃舍、伊曹·福澤考什、盧卡·加博爾、傑瑞·格林、雅諾什·久爾雅克、馬頓·考林蒂、彼得·肯德、雅諾什·凱奈迪、埃尼科·克爾涅伊、伊娃·Sz·科瓦奇、瑪麗亞·考林蒂、茲德涅克·庫德爾納、米哈伊·洛基、黑爾加·萊納特－鄭、帕爾·勒切伊、伊洛納·盧卡奇、拉斯洛·毛伊泰尼、彼得·米哈伊、安德拉什·納吉、朱迪特·內傑希、加博爾·帕耶考斯、茱莉安娜·帕爾蒂、理查德·匡特、M·雅諾什·賴納、山多爾·雷韋斯、帕爾·雷茲、傑德勒·羅蘭、亨利·羅索夫斯基、伊娃·紹爾尼奧伊、阿格奈什·舍恩爾、安德拉什·希蒙諾維茲、羅伯特·M·索洛、蘇珊·蘇萊曼、雅諾什·塞格、邁赫達斯·瓦哈比、拉斯洛·沃爾高及索菲亞·韋布爾。此外我還要感謝那些沒有提及名字，但是幫助我答疑解惑或者提供信息的人。

匈牙利國家科學研究基金(OTKA T 046976)資助了此項研究，匈牙利科學院的經濟研究所幫助管理了OTKA提供的資金。和過去十五年一樣，我一直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工作。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它為我提供了激發靈感的研究環境和非常實際的幫助。

本書由布萊恩·麥克萊恩翻譯。我非常感謝他對此付出的辛勤勞動及耐心。和前幾次合作一樣，他非常樂意地承擔了本書在反復修訂的過程中涉及到的翻譯工作。

我希望向傑弗里·E·愛潑斯坦，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他慷慨地捐款，並支持了英文版自傳的翻譯工作，和整個出版過程中涉及的其它研究工作。

感謝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承擔了本書的出版工作。感謝組稿編輯伊莉莎白·默里的鼓勵，她滿足了我的各種請求，幫助我順利完成本書。此外，我還要感謝製作編輯馬修·阿巴特，靈活高效地支持了我的研究。而且非常幸運地，艾麗斯·福爾克擔任了本書的文稿編輯。她成功地把高標準、準確和共鳴等最寶貴的編輯特點，帶入本書中。

雅諾什·科爾奈

2006年5月於布達佩斯

1 我的家庭和青年時代：1928–1944年

我不是馬塞爾．普魯斯特[*]，也不是彼得．艾什泰哈齊[†]，所以完全沒打算用優美的文學語言，細說我的孩童時代或家庭環境。和其他人一樣，對於家裏做蛋糕時的撲鼻香氣和父母的音容笑貌，我仍然記憶猶新，但是卻沒有文學天賦，將這些回憶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因此，我仍然會用自己熟悉的體裁來描述和分析這個世界，並打算在此基礎上給自己增加一個任務，即在77歲高齡時試著了解及分析自我。我是如何成為過去和現在的我？為何會如此這般？所以我談到自己的孩童、青年時代和家庭生活時，將主要關注能夠幫助自己完成這兩個任務的生活內容——了解自我及自己身處的年代。

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帕爾．科恩豪澤博士，出生於1880年。1945年我主動將姓氏改作「科爾奈」之前，一直使用他的姓氏——科恩豪澤。

我的祖父叫卡羅伊．科恩豪澤，是個鎖匠。全家住在特倫瓊鎮

---

[*] 譯者注：《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

[†] 譯者注：匈牙利著名作家。

(Trencsén)，那裏曾經是匈牙利的領土，但現在已經屬於斯洛伐克。讓我父親引以為傲的特倫瓊橋(Trencsén Bridge)，部分就是由祖父的工場建造的。當我長大後和其他人談到這些事情時，他們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們沒有想到十九世紀猶太人居然可以在鎮裏從事鎖匠生意，而不是開間小酒館或者店舖。

父親還很小時，父母就去世了，一直由哥哥資助他接受教育。但是，具體來說，他完全是憑自己的努力，才在著名的天主教學校Piarist Gymnasium完成中學學業，然後進入大學學習法律，最終成為律師。在我自學成才的過程中，毫無疑問父親的榜樣給予我很大鼓勵。和生活在高地(Uplands)的許多人一樣，父親掌握匈牙利語、德語和斯洛伐克語三種母語。我猜想父親一定天賦異秉，而且非常刻苦，因為他非常年輕時就事業有成。由於父親精通德語及對法律頗感興趣，所以在匈牙利的德國公司，都樂意聘請他處理法律事務。德國公司聘請他的次數越來越多，他最後正式成為德國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的法律顧問。這的確是具有無上榮耀的銜頭，因為他並不是得到德國正式任命的僱員。這個銜頭意味著公使館會將他推薦給駐匈牙利的德國公司，幫助它們處理與商業合同或民事訴訟有關的法律事務。父親從來沒有接過離婚案、刑事案或與匈牙利公司有關的案件，他專門負責為駐匈牙利的德國公司，解決商業上的法律糾紛。

我家所住的公寓，和父親的辦公室都在布達佩斯的Akadémia街上。這條街道在布達佩斯相當出名，它的一端座落在匈牙利科學院的總部，另一端則是議會的所在地。現在那幢公寓已經成為首相辦公室。不久前我還到過那裏，當我步入曾是父親書房的房間，發現我的一位經濟學家朋友在那裏工作時，那種感覺非常奇怪。當時父親的辦公室裏，擺滿了匈牙利語和德語版的法律書籍。除此之外，他和母親都不會收藏其它種類的書籍。最早將文學作品帶回家的是姐姐，隨後是我。我無法像其他知識分子的孩子那樣，宣稱自己第一次學會熱愛和尊重文學，是由於受到父母的薰陶。

母親和姐姐告訴我，父親年輕時曾經閱讀大量書籍，而且經常去聽歌劇。他最喜歡的音樂家是瓦格納。但是當我進入少年期時，

他的這些興趣和愛好，卻沒有留下半點痕跡。父親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事業中。

讓我們重新回到德國公使館的問題上。父親去世多年後，母親提到父親曾被任命為公使館法律顧問，他取代了米克洛什·卡爾多博士。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耳熟，後來我才發現偉大的經濟學家兼英國財政大臣顧問尼古拉斯·卡爾多男爵，是這位匈牙利律師的兒子。我到劍橋大學卡爾多的家裏作客時，在聊天中談到彼此的父親。這個話題讓卡爾多重新回憶起那些陳舊的家族怨恨和嫉妒之情，而當時他已經是一位古稀老人。五十年前卡爾多家族的成員，一定因為年輕的科恩豪澤博士，接替老卡爾多的職位而不止一次地詛咒過他。

哥哥班迪和姐姐麗莉幼年時，一直受到父親無微不至的關愛。麗莉常常回憶起和父親一起散步、遊戲，以及他們之間談話的情景，而且每次她的情緒都非常激動。母親生下我和哥哥托米後，父親不再有耐心或者精力來陪伴子女。我甚至不記得有沒有曾經和父親親密無間地在一起，度過一個小時或者進行一次有意義的談話。在這本自傳中，我不止一次地回到這個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導師——我最早在家裏觀察到這個事實。和其他男孩或青年男子一樣，我過去始終將父親看作許多方面的楷模，而且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他並沒有扮演老師或導師的角色。儘管父親是一位聰明睿智而且知識淵博的人，但他從來沒有與我交流過他的觀點、知識或經驗。

我出生於1928年1月21日，當時父親47歲。顯然年紀漸長，是他對我和哥哥關心不足的原因之一，但導致他對子女態度轉變的主要原因，卻是他的工作處境和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希特勒上臺時我還不滿五歲，他在政壇的崛起，並沒有馬上改變德國公使館與匈牙利本地人建立的關係網，也沒有給其它許多領域帶來突然的轉變，但在其後的幾年裏，納粹政權逐漸演變成極權統治，並且滲透進社會體系的每個細胞。我並不清楚父親在什麼時候失去了「德國公使館法律顧問」的銜頭。起初，這種變化帶來的唯一結果，是公使館不再將他推薦給德國公司，與他有業務往來的德國公司，即使並

沒有馬上與他斷絕往來，卻也漸漸地開始離父親而去。然而有些在匈牙利工作的德國商人，始終忠誠地與父親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直到他去世。

隨著客戶數量不斷減少，家裏的收入自然也與日俱減。父親從來沒有和我們談過任何關於金錢的事情，但是後來我卻非常肯定，家裏是依靠積蓄生活，而不是依靠父親日常的工作收入。我們這些年幼的孩子，對於家庭困難的經濟狀況，當然沒有任何概念。我們仍然住在市中心寬敞昂貴的公寓裏，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每年夏天，全家都到布達市Rózsadomb區一棟優雅的別墅裏度假。布達市位於布達佩斯市裏多瑙河的西岸，那裏丘陵蜿蜒起伏，景色非常優美。小時候家裏特意為我們聘請了德國家庭女教師，還有許多傭人和一個園丁，照顧全家的生活起居。為了彌補在工作方面損失的收入，父親開始兑現部分人壽保單，或者變賣家裏的珠寶和藝術品。*

---

* 不久前，我拿到父親記錄的家庭財務情況，其中包括一份詳細的人壽保險記錄。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給母親準備好充足的生活費用，然而儘管他每次都很謹慎，但是他的家庭財務計劃，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由於一戰結束後，匈牙利的通貨膨脹情況急劇惡化，所以父親在一戰前購買的保險，幾乎一文不值。後來他汲取了教訓，於三十年代初在一家德國保險公司，購買了高額保險，那是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這些保單的保額隨通貨膨脹浮動，並與「金元價格」掛鈎。這次他認為這份保險，一定能夠百分之百地為我們提供保障。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到了四十年代，共產主義政權對這家被授予特權的柏林公司，實行了國有化改造。最諷刺的是，政府將一金元的價值定為一福林（匈牙利的貨幣單位），因此根據保單的保值原則，母親只能拿到少得可憐的年金。我們從這份記錄中，可以觸目驚心地看到歷史如何無情地玩弄了父親的謹慎和愛心，使之全部成為泡影。

父親仔細地為所有遺產繼承人安排保單的使用事宜，我發現自己的性格中，也有謹小慎微的特點：我經常像他那樣，把自己的觀點反復灌輸到同事或家人的頭腦裏。有些人滿懷感激地服從我的安排，有些人只是一笑置之，而有些人卻感到很不耐煩，或者直接拒絕我的意見。我與父親的這種相似之處究竟來自哪裏？難道我從小就表現出這些習慣（雖然我對此沒有半點印象），而且沿襲了這種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方式是否是遺傳基因的一部分？

父親感覺到自己正被逐漸排擠出他所擅長的專業領域，這對他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他在學術方面依然精力充沛，而且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律師這個職業，對他來說意義重大。而更嚴峻的問題，是當時的歷史潮流，毀滅性地改變了他的職業地位和經濟狀況，給他帶來許多棘手問題，使他身心疲憊。希特勒政權日漸展現出其殘忍無情的一面。我們不斷聽到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消息。德國佔領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並且吞併了奧地利（我有一位叔叔居住在維也納）。匈牙利其後通過第一部反猶太人法，第二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

父親一直嚴格遵守的其中一項原則，就是不參加任何政黨或政治活動。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失敗，給他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回憶。這個曇花一現的共產主義政權誕生後，白色恐怖就如影隨形，即使其後它被瘋狂鎮壓，但白色恐怖依然陰魂不散。不過他絕不是當時所謂的保守派。我從來沒有聽過他直接地評論左翼人士。他訂閱的《晨報》是支持自由主義的報紙，而且他買的其它報紙，也都是在宣揚進步思想。我可以從他零星的評論中，判斷出他的思想是非常開明進步的（這裏使用了歐洲國家對「開明人士」的定義）。儘管他希望遠離政治，但歷史的進程卻開始介入他的家庭生活，——起初只是遠處隆隆的雷聲，後來卻是當頭雷擊。

父親從來不否認他的猶太人血統，但是同樣也從來沒有賣弄過這種身份。他的社交圈子裏包括許多猶太人，但也有許多非猶太的朋友。他雖然信奉上帝，卻並不那麼虔誠。他不參加任何猶太人集會，或者猶太教的宗教儀式，然而每次他的慈善捐款，都是贈予猶太教會的孤兒院。也許他還記得自己的孤兒生活。他絲毫不願用皈依基督教，來為自己的同化打上清晰的印記。

父親最引以為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曾經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他被任命為陸軍上尉，並且獲得高級勳章。他始終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稱作匈牙利人。哥哥班迪服完兵役後，以下士軍銜退伍。父親為他們兩人訂做了新軍裝，並且拍照留念。在這張照片上，父親和哥哥分別穿著上尉和下士的軍裝，目光堅定地凝視著前

方。大概一兩年後，匈牙利憲兵隊將父親押上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火車時，哥哥正穿著便裝，在匈牙利軍隊的指揮下在Don Bend服勞役。哥哥最終在那裏因為惡劣的天氣或者疾病而死亡。

我的家庭

即使在家庭收入不斷減少的艱難時期，父親對我們仍然很慷慨。我十多歲時，對攝影非常著迷，他立即為我買了當時所能買到的最高檔的相機。我需要沖洗膠卷和放大底片的設備時，他也同樣馬上給我買回來。我開始喜歡讀書後，他經常給我很多錢買書。不過家裏的核心人物和家庭溫暖的源泉，卻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穆約——我們都這麼叫她(她的婚前姓氏是阿蘭卡．沙茨)。

小時候，家裏先後聘請了許多溫柔體貼的家庭女教師來照顧我們。在我的記憶中，她們都很疼愛我們，我最迷戀的是最後一任家庭教師——美麗窈窕的莉斯爾。雖然每天照顧我們的任務，都由德國女家庭教師來承擔，但是母親仍然無微不至、溫柔體貼地為我們照料了很多事情。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卻是天生聰慧。母親的五官非常精緻，長相甜美，舉手投足之間，都帶著一種渾然天成的自然和優雅氣質。弗洛伊德在著作中，指出成年人的自信和抱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幼年時，從母親那裏得到的關愛，而我的母親的確給予了我們無盡的關愛。母親經常樂呵呵地講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她先後懷過四個孩子，而我是讓她吃苦最多的一個。當她在懷孕期間，不斷受到疼痛和噁心的折磨時，醫生一再開導她：「親愛的女士，你會發現這個孩子，會給你帶來最多的快樂。」從我還不懂事的時候起，她就給我講了很多遍這個故事。她絲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在四個孩子中，最疼愛的是我。即使我取得的成功微不足道，她也會感到無比的快樂，而且從來不吝惜對我的褒獎和鼓勵。在我的記憶中，她從來沒有對我作出批評，也從不檢查我的家庭作業。我還在上小學時，每當我遇到挫折而叫苦連天，或者在學習中遇到困難時，她只是鼓勵我，而從來沒有提出具體幫助的建議。母親總

是說：「你一定會克服困難的。我不會為你擔心，我相信你能處理好這件事。」我無法想像除了母親的鼓勵和無條件的信任以外，還有什麼力量，能更加有力地激勵我不斷前行。

我們的家很少使用體罰。我哥哥托米十多歲時，開始和我家聘請的女傭摔跤（托米較我大三歲）。他的行為顯然不是現在所謂的「性騷擾」，但是卻超出了父母所能接受的範圍。那天晚上，父親到我們的房間裏，動腳踢了——不是托米——而是床的一側。這一舉動和寥寥幾句責備，足以表達他心中極其憤怒的情緒。這是我在整個兒童時期，所見過父親的最嚴厲的「懲罰」。直到1944年，當我開始體會人性的殘酷時，才真正經歷或者親眼看到，許多刻意折磨他人肉體的醜惡行徑，才真正聽到人們憤怒的呼喊聲，以及某些人侮辱他人時不堪入耳的語言。我對高聲叫嚷和大嗓門說話都極其反感，更不用說侮辱他人肉體、打罵或者折磨他人等行徑。

大哥班迪生於1914年。他的生活起初一直快樂而安定。大學快畢業時，他的一個朋友準備移民到英格蘭。班迪想和他一同前往，但卻遭到父親的反對。我不知道父親拒絕他的理由是什麼，但後來聽姐姐說，父親認為我們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就是最適合我們生活的地方。他還堅稱長子應該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哥哥不是個叛逆的孩子，因此尊重了父親的願望。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他在俄國的陣地上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由於我和他年齡差距很大，因此深入的交往並不多，但在我的記憶裏，他一直很疼愛我，宅心仁厚，而且非常幽默。每次我一想到他年紀輕輕就葬身異國他鄉時，心裏總會隱隱作痛。

姐姐麗莉生於1919年，較我年長九歲。我與她之間的感情最深厚，學術的交流也最頻繁。我們經常一起頌讀詩篇。她向我推薦了弗里傑什·考林蒂的故事。考林蒂是二十世紀最受歡迎的匈牙利作家，以諷刺性作品見長。她也是第一個為我演奏德彪西和舒曼鋼琴曲的人。像我這樣一個害羞內向的少年，瘦得像耙子一樣，卻有一個漂亮聰明的姐姐。而且姐姐非常看重我，經常與我談論人生中的重大問題，走到哪裏都會帶著我，這無疑給了我極大的自信。我們

一直保持著親密無間的關係，直到她去世。這種關係不僅建立在血緣的親情上，而且也建立在我們共同擁有的學術價值觀上。雖然麗莉後來久臥病榻而且飽受痛苦，但是我們仍然經常熱烈地討論政治問題，或者分享彼此讀過的好書。*

我和另外一個哥哥托米的關係，與我和姐姐的關係截然不同。托米出生於1925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就讀於同一所學校，而且由同一位家庭女教師照顧。我們經常一起玩耍。和所有兄弟一樣，我們之間也會爆發小小的爭鬥，有些是善意的，有些則不那麼友善。自從托米開始對女孩子感興趣後，我們之間朝夕相處的親密關係，幾乎便完全消失。我們不再一同外出，不再擁有共同的朋友圈子，甚至沒有再認真地交談過一次。我們長大成人後，這種兄弟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見面時，只停留在聊天，或者相互取笑等膚淺的層次。這足以證明儘管我們的大腦細胞裏，擁有相同的遺傳物質，擁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但是這仍然不足以將我們兄弟倆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我和托米各自對生活的取向及性格上的差異，不僅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兄弟關係，而且更導致我們形成截然不同的性格，因而日後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

雖然父母和我們這四個孩子不會一同參加活動，甚至不會每天見面，但是科恩豪澤家裏的每個成員，都發自內心地深愛著對方。

---

* 麗莉（翁多爾．加爾多尼夫人）是名會計，退休前擔任公司裏的審計主管。她的性格堅強果斷，而且遵守嚴格的生活準則。她很少談及自己的生活，但是別人遇到困難時，她總是表現出豐富的同情心。每次我看到這位臥床不起的老婦人，與我女兒朱迪特以及瑞典孫子、孫女若非和安娜，親密融洽地在一起時，總是非常感動。他們都非常喜歡麗莉。麗莉於2002年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 哥哥托米（陶馬什．科爾奈）畢業於應用藝術學院。他最早的志向是成為一名平面設計師。但是他被強制服完勞役後，就馬上轉職從事廣告業，此後再也沒有離開這個行業。他在匈牙利唯一的國有廣告公司裏擔任經理，後來調到國家儲蓄銀行（OTP）工作。最讓他引以為榮的，是他的創意為匈牙利彩票業的首批廣告，奠定了基礎。他創作出來的廣告詞語，很快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語。托米於1996年去世。

父親和母親的婚姻非常美滿，不過對每個孩子而言，他們的生活卻各自各精彩，與父母以及任何一個兄弟姐妹的生活都有所不同。

自從父親的辦公室搬到我們住的公寓後，假如到了晚上父親還沒有回家，母親就會精心打扮，風姿綽約地和客戶一起在接待室裏等待父親。這是她發出的一種信號，表示雖然白天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但是現在卻已經是到了下班的時間。父親別無選擇，只好放下手頭的工作，和母親一起外出參加社交活動。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外出吃飯，不會帶著我們。基本上我對家庭晚餐沒有什麼概念，任何家庭成員只要感到飢餓，或者有空吃飯時，就可以獨自一個人吃午餐或晚餐。全家人坐下來一起用餐的情況極其罕有，只有夏天度假時，我們全家才會在花園或者度假別墅裏一起吃飯。

讓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情況上——父母、哥哥和姐姐從來不干涉我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我在學些什麼、學了多長時間、我空閑時經常和誰在一起、我在讀什麼書、或者我打算去看什麼戲劇。偶爾我們會一起去看露天演出（特別是在夏季），或者欣賞每年8月20日，為紀念匈牙利國建立者斯蒂芬國王而舉辦的焰火晚會，但這種全家集體出動的活動少之又少。

到了十三、四歲時，我下決心要定期欣賞音樂會，後來還萌發了學習鋼琴的念頭。父親給我找到一位鋼琴老師——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師，他是弗里傑什·山多爾。山多爾當時只是一位失業的指揮家，但是後來卻成為偉大的音樂老師，並且建立了管弦樂團。我一直跟從他學習鋼琴，直到1944年德國佔領匈牙利後，鋼琴課才被迫中止。中學課程完成了一半時，我又決定利用課外時間學習英語。父母給我支付鋼琴和英語等所需的課程費用，但是我並沒有遵從他們的建議，課程的選擇全都是由我自己決定。

很難評估這種家庭教育方式對我產生的影響。一方面，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任我自行其事，但亦因此讓我陷入無盡的孤獨感和被拋棄感；另一方面，我由衷地意識到，或者說我感覺到，我必須按照自己的想法，獨立地計劃自己的生活。無論遇到的事情或大或小，這種感覺都縈繞在我的心頭。此外，由於家裏的所有成員在待人接

物時，都盡量為他人著想，避免打擾他人或給他人增添麻煩，所以這種家庭環境沒有使我培養起自私的性格。我們會在需要的時候，竭盡全力地互相幫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組成了有共同利益的家庭「公社」。現在我將自己看作一個有自知之明的個人主義者，我相信對個人自主的尊重，是道德律令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我深信我對自己的生活以及事業的成敗，都負有重要的責任。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幫助他人，但我絕不是熱衷於「公社」生活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拒絕一切驅使我歸屬於某個團體的建議或主張。毫無疑問，只有當我走過很多彎路、閱讀了大量哲學著作，並且窮盡一生仔細地觀察生活後，才能在現在這樣清晰地描述自己的人生觀和生活原則，但是兒童和青年時代的經歷，以及家庭生活的方式，卻早已將它們的種子深深地植入我的心底。

皇家德國學校

我上小學時起初就讀於布達佩斯市的皇家德國學校。由於父母和其後照顧我的女家庭教師的德語水平都很高，所以我是在雙語的環境下逐漸長大的。除了匈牙利語、文學和歷史以外，所有用德語教授的課程對我來說都沒有半點困難。1933年我還未滿上學年齡時，校方就同意我入學——納粹恰好在那一年開始執掌政權。

有時人們會問我，你的父母身為猶太人，為什麼會把孩子送進德國學校。我在前文已經說得很明白，父親與德國人的關係非常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德國文化的薰陶中成長的，而且同時學習了匈牙利和德國法律。他的客戶都是德國人，德語成為他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主要語言。

父親當時一定已經知道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都是充滿敵意的反猶太分子，但是像德國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許多人一樣，他認為這個政權並不會長久。作為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德國的人文精神怎麼能容忍這種政權。他沒有料到德國人踏上的這條仇恨之路，最後終結在毒氣室裏。

父母將我送進皇家德國學校，主要是由於仰慕它的優秀教學質量，同時也是為了拓展我的語言知識。它不僅獲得德國外交官和德國商人的青睞，同時也很受生活在匈牙利的其他外國人的歡迎。我的同學裏既有奧地利人、德國人、美國人和土耳其人，也有匈牙利人。這所學校培養出許多著名的人物，例如身兼記者和政治家兩種身份，並且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米克洛什·吉邁什、著名演員伊萬·道爾沃什、奧林匹克的游泳冠軍伊娃·塞凱伊、小說家和短篇故事作家弗倫茨·考林蒂，和非常受匈牙利人尊敬的德國學者埃勒迪·豪拉斯。

我們學校的老師都很有耐心、經驗豐富而且博學廣識。在那裏學習的八年裏，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句反猶太的言論，也沒有聽過任何讚揚希特勒及其政權的話。當柏林傳來命令，要求所有猶太學生必須離開學校時，教猶太教教義的老師婉轉地通知這些學生的家長：從1941年秋天開始，他們的孩子必須到其它學校上學。即使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學校仍然對還有一年便要畢業的小學生們網開一面，允許他們以就讀私立學校的名義繼續完成學業，並參加畢業考試。當時似乎開明的德國教師，試圖逃避國內令人無法忍受的生活環境，都選擇往國外工作，例如在匈牙利的德國學校裏教學。我們的學校就像是納粹主義和匈牙利學校體系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和平之島（當時人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希特勒主義的思想，已經在匈牙利教育體系中蔓延開來）。

當我回憶起德國學校的老師時，總會心懷感激和尊敬。他們幫助我培養起全面的學習習慣和有條不紊的思考方式，並且傳授給我大量知識。時至今日，我仍然得益於他們送給我的這些禮物。不過這些老師中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偉大人物，我沒有遇到具有超凡個人魅力的指導者，即憑藉其性格特點和教學方式，成為真正的學術楷模及道德楷模的老師。

在皇家德國學校學習期間，我所獲得的最重要的東西，是陪伴我終生的真誠友誼。我從一年級開始就認識的同學彼得·肯德，後來成為記者、學者和政治科學家。在1956年革命失敗後，大批流亡

海外的匈牙利人中，他成為其中的一名學術領袖。我們一起度過八年的學校時光，其後一起參加青年運動，並從事新聞工作。我們曾經共同參加許多鬥爭。儘管後來彼得移居巴黎，但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裏，我們之間即使遠隔千山萬水，仍然一直維繫著這份珍貴的友誼，而且這份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歷久彌醇。極少人能像我這樣擁有相知七十年的好朋友，我為此感到非常驕傲。

探索學術之路

在某種程度上德國學校已經相當國際化。它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而且學校實行男女同校制，這在當時而言非常罕見。離開德國學校後，我進入到一個全新而且保守的環境，一座位於布達區的Werböczy高級男子中學，我的同學大多數都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

當時的戰爭局勢非常緊張，德國學校的老師禁止我們談論政治和戰爭。而在Werböczy中學裏，有一位校長卻高聲讚揚德國發動戰爭的行為，而且一再預測德國會在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爭中大獲全勝。他主要教授我們三門功課：拉丁語、匈牙利文學和歷史。他在很多同學面前宣稱，不會讓任何一個猶太學生在他教授的三門功課中，取得高分，他也的確兑現了這個諾言。我有兩位猶太同學，在所有學課上表現都非常出色，但是赫格居什先生只允許他們在自己教授的兩門課上，取得應有的成績，而在另一門功課上卻將我們的分數全部降低，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對猶太人的公開歧視。

我第二次感受到對猶太人的公開歧視，不是來自個別教師的偏見，而是國家頒布了涉及到所有猶太人的國家法令。匈牙利參加戰爭的公開標誌之一，就是所有中學生必須參加一個被稱為「萊凡特團」(Levente)的團體，接受初級軍事訓練。我還在德國學校時，所有男孩子都一起參加了萊凡特訓練。其後當我剛剛進入匈牙利學校時，政府恰好頒布命令，對非猶太學生和猶太學生實行不同的軍事訓練。我不能說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非常殘暴，但政府區分「猶太人

萊凡特團」的做法，以及它所代表的排斥和種族隔離，仍然讓我感到侮辱。

當我進入這家匈牙利學校時，大多數同學都已經一起相處了四年，男孩們友善地接納了我。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去聽音樂會或看戲劇，和其他同學討論曾經閱讀的書籍。不過我並沒有和其中任何人建立起密切的友誼，而是仍然和德國學校裏結識的朋友們廝混在一起。先前那個德國學校的環境，與現在的匈牙利學校相似，我仍然沒有遇到一位偉大的老師。我現在還可以清晰地回憶起很多老師開的玩笑和他們的怪癖，但是卻沒有一位成為在學術方面不斷激勵我的導師。

除了一些真實的知識以外，我在學校學到的歷史、哲學和人文精神，都對我沒有任何觸動。我開始自學和培養自己的品位和觀點。由於渴望了解更多學術知識，所以我讀書的速度快得驚人。由於我不斷購買新書，所以我的藏書迅速豐富起來。*

我在附近的圖書館辦理了會員卡，從那裏借了很多書籍拿回家看。我發現選擇書籍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安托爾·塞爾布寫的關於匈牙利歷史和世界文學的著作，為我提供了很大幫助。雖然校長將這些書都稱為「垃圾」，而且在某程度上禁止我們閱讀他的書籍（塞爾布是猶太人），但是我認為這些書籍對我的指導彌足寶貴。此外，我還讀了米哈伊·鮑比契寫的歐洲史，以此作為塞爾布著作的輔助讀物。我嘗試閱讀所有這些具指導性的重要著作。現在回憶起來，我花在這些書籍上的時間，實在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我通常拂曉時就起床，花一兩個小時完成學校的功課。放學後我整個下午和晚上

---

* 在受到迫害的歲月裏，我家的朋友幫我們悉心保存了這些書籍。我們從藏身的地窖裏出來後，我就馬上把所有書都搬回家，再次回到書的海洋中。他們躲過了從1944年聖誕節到1945年2月中旬蘇軍對布達佩斯的圍攻、空襲及掠奪。但僅僅幾周後，1945年初蘇聯戰士突然命令我們搬離當時的住所，幾乎所有的藏書都因此丟失。唯一躲過浩劫的是我最鍾愛的書——托馬斯·曼的《托尼奧·克勒格爾》。

的時間，都用來和朋友見面談天或讀書。我可能這一周還在讀《戰爭與和平》，下周卻開始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我還曾經閱讀巴爾扎克、福樓拜、匈牙利經典作家卡爾曼．米克薩特和日格蒙德．莫里茲、傑出詩人雅諾什．奧洛尼和阿蒂拉．尤若夫的作品，以及才華橫溢的匈牙利詩人阿帕德．托特和德熱．科斯托拉尼譯成其它語言版本的作品。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書單，寫滿所有我喜歡的書籍。

我還會仔細閱讀許多報紙周末附刊上介紹學術和藝術的文章，以此來決定閱讀哪些書籍。毫無疑問這些文章幫助我了解最新的學術動態，並且最終引導我接觸到奧爾特加．y．加塞特、赫伊津哈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作品。此外，我還高興地發現了許多全面介紹某些學術領域或學術思想的書籍，譬如威爾．杜蘭特的哲學史。在十四到十六歲時，我雖然閱讀了很多書籍，但是能理解的內容卻不到一半。沒有人幫助我培養起明確的世界觀——無論父母、哥哥、姐姐還是宗教課老師，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對所有新觀點都不抗拒。當我發現世界面臨的挑戰，有許多揀選的解決方案時，不僅眼花繚亂，甚至無所適從。可能由於我前一天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所以決定皈依基督教，第二天我翻閱阿納托爾．法蘭西的作品，並且被其諷刺的世界觀所深深吸引，而伏爾泰的《老實人》讓我進一步認定這種觀念。

在那些日子裏，我仍然不確定自己長大後想從事什麼工作。我的外甥帕爾．哲爾非還在上幼兒園時，就決定長大後當救護車護理人員，而且最終實現了他的夢想。我對將來從事的職業並沒有什麼想法，也許當時我已經在培養某些日後幫助我從事研究性工作的性格特點。我喜歡將一切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而且極希望做好手頭的每一件事情。當我對攝影著迷時，會將全部精力集中在這件事情上，而收藏書籍時也希望自己的藏書，能夠包羅天下所有名著。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便已經非常討厭做事雜亂無章和半途而廢。

不過這些性格的特點和努力，並沒有影響我的學術興趣的方向。如果從我十四到十六歲的生活推斷後來的學術發展過程，那麼我可以看到一個書呆子氣十足的知識分子，在埋頭寫文學評論或探

索美學問題。那時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十二到十五年後，我會轉而關心亟待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名經濟學家。

當時我仍然認為自己汲取的知識愈豐富，對於內心世界的了解便愈深刻。如果借用電腦術語來說，每天我的世界觀都被另外一種觀點所覆蓋。事實上我始終保持著開放的思考方式，並且敞開心扉，等待一個真正而且強烈的學術推動力，它最終於1945年出現在我面前——不過我們還是不要那麼快地跳到這一段歷史。目前我們只介紹了我在中學裏最後幾年的生活，1944年戰爭帶來的重創還離我很遠。

1944年：父親的命運

1944年3月19日和其它周日沒有什麼區別，我正準備和朋友一起去看早上的音樂會，但音樂會卻被取消了——德軍開始侵佔匈牙利。

大約一兩周後，父親收到徵兵通知，通知內容與強徵猶太人服勞役的文件相似。文件說四十八小時後，他必須帶著毛毯、軍用飯盒和足夠兩天吃的乾糧等宿營裝備，到指定的地點集合。由於普通勞工的年齡限制是60歲，而我父親當時已經達至63歲高齡，因此沒有被編入普通勞工的行列。

父母被不祥的預感所籠罩，心裏都非常痛苦。他們與許多朋友通電話時，得知其他許多著名的猶太學者和商人，與父親一樣被徵召服役。我們這些孩子當然沒有參與父母焦灼不安的討論，但是後來我可以從母親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出他們當時商量的對策。

母親主張兩人一同自殺，但被父親拒絕了，因為他們不能在這種危險的時刻放棄其他家庭成員。母親問父親難道不打算出去避避風聲。當時父親的朋友，包括許多德國人在內，都準備不惜任何代價為他提供避難所，但是父親立即提出兩項理由否定了這個提議。其一，他認為這麼做的風險太大。他擔心一旦政府找到自己，就會血腥地報復他和藏匿他的家庭。其二，徵募他的通知是政府簽發的國家命令，根本不容逃避。父親的反應讓我認識到他的世界觀裏的一個基本原則。他是一位律師，但不僅僅是一位普通律師，而是自

始至終尊重法律並且對法律充滿熱情的人。他一定遇到或讀過很多道德和法律衝突的案例。我相信他也一定曾經反復地思考暴君強制實行的法律是什麼樣的法律，或者說形同虛設的議會通過的踐踏人民基本權力的法律，會造成怎樣可怕的後果。然而當他在自己的生活中，面臨這種兩難的抉擇時，這個過分看重誠實和廉潔，而且具有強烈是非感的人，採用了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國家命令就是國家命令，所有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

後來人們發現德軍在佔領匈牙利的前幾個星期裏，就將布達佩斯的一兩百名猶太精英人士關押起來。起初他們在匈牙利警察的監管下，被關在Rökk Szilárd街的希伯來語神學院裏，生活條件相對來說還算可以容忍。[1]幾星期後，他們的家人獲准探望他們。因為當時兩個哥哥都被徵往服勞役，所以只有母親、姐姐和我一起去探望父親。大哥班迪在俄國前線服役；二哥托米則在南斯拉夫的博爾服役。看守的警察安排我們和父親在神學院的院子裏見面。父親的語氣非常鎮定，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心情愉悅。大家都沒有說什麼動情的話，父親給母親提了很多實際的建議，而她到那時還一直忙於招待朋友和親戚或照顧子女。從前家裏的開銷和主要事務都由父親處理，父親被扣押後，這些事務突然間全部落在母親的肩上，所以父親嘗試教她處理各種相關事宜。後來他還給母親寫了封信，具體地指導她如何處理我們所住的公寓，並且告訴她把自己法律事務方面的文件存放在哪裏。*除了家庭成員之間常見的問候以外，無論在哪一次探望中，還是在後來的信件裏，父親都沒有說過任何生離死別的話。

其後我們再也沒有得到任何關於父親的消息，而且再也沒有見過他。

父親還被關在神學院時，也曾努力嘗試解救自己。他的一些忠心耿耿的德國客戶，組成了一個小型代表團，拜訪德國駐匈牙利大

---

* 難道我是從父親那裏繼承到這種一絲不苟地保存文件和筆記的動力，還是因為受到他這種示範作用的影響？

使艾德蒙德·費森邁耶。這個臭名昭著的「暴君」，是德軍佔領匈牙利期間派駐匈牙利的地方長官。代表團請求德國官員對匈牙利政府施壓，要求政府釋放父親回家。他們稱帕爾·科恩豪澤博士是一名律師，在過去數十年裏充分代表了駐匈牙利德國公司的利益，因此功不可沒。後來其中一位代表團成員，為母親講述了他們請願後發生的事情。費森邁耶勃然大怒，威脅這些請願者如果不馬上從自己的辦公室消失，就將他們與科恩豪澤一起關押起來。

其後關於父親的遭遇，就只能通過道聽途說得知。顯然所有被扣押的猶太人，都被移送到Horthy-liget（即現在的Szigetszentmiklós）的一個營地，那裏的生活條件更加艱苦。他們在Horthy-liget繼續被幽禁了一段時間，[2]直到一列火車把他們和被驅逐出境的人送到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這種生活被突然地劃上句號。

對於死於二戰大屠殺的六百萬人來說，他們的生命都是一場悲劇，每個人離開人世前都有自己特別的人生故事。然而父親的命運仍然顯得與眾不同。首先，德國的恐怖統治和匈牙利當局積極合作，聯手奪去了父親的生命。儘管他從少年時起就被德國文化深深吸引，利用自己的法律專長，努力推動了德國工商業的蓬勃發展，並且以誠信和守法為原則，兢兢業業地為推動德國–匈牙利的兩國關係而努力工作，但是這仍然不能幫助他保住自己的生命。當然他從來沒有支持希特勒，也沒有與納粹當局勾結，但他的被殺害並不是因為他冷眼旁觀，沒有與納粹政權合作，而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我在前文已經提及，父親的悲劇與其他人不同，另外一個原因在於他是法律的忠實僕人，因此不願反抗國家的權威。他像一隻毫無防備的羔羊任人宰割，最終淪為政府無恥冷酷地濫用正義、法律以及國家權力的犧牲品。

1944年：我的逃亡之路

如果父親還在家裏，那麼他一定會告訴我應該做什麼。我不知

道誰的意見會更強勢——父親的還是我的。我在前文提及，父親曾經成功地阻止哥哥班迪在關鍵時刻移居國外。而我一向習慣了獨立處理生活中各種相對不太重要的事情。

由於父親已經離我們而去，而母親不能、也不願影響我的決定，因此我十六歲時開始為自己作主。從這層意義上來說，這顯然比選擇讀什麼樣的書，或者決定學習哪種語言等問題更加重要。1944年我作出了人生中生死攸關的重大決定。

猶太人將被驅逐出境的傳聞開始廣泛流傳。當時我們還不清楚被驅逐的人，將被送進毒氣室殺害。我們以為自己會被送到班迪和托米服役的勞工集中營。那時我們剛剛了解到他們的近況，他們的生活條件很艱苦，飽受飢餓和寒冷之苦，甚至有時受到非人的對待，但我們始終心懷希望，認為他們一定會從殘酷的戰爭中生還。

我們還聽說在兵工廠工作的猶太人不會被驅逐出境（雖然這種說法後來被證實是謠言）。因此我和兩個朋友自告奮勇地到Bécsi街附近的Nagybátony-Újlakr的磚廠當勞工*。我很快從一個沒有從事任何體力勞動，而且身體虛弱、在體育方面向來非常笨拙的中學生，轉變成勞動者，而且是一名需要承擔非常大的勞動強度的勞動者。經驗豐富的熟練工人，把還滴著水珠的沉重的磚塊，從沒有一刻停止的壓磚機上提起來，放進軌道上來來往往的小貨車裏。我們這些新勞工必須把貨車推到工棚裏，然後把磚塊整齊地摞起來。

有一段時間，我們被迫佩戴著黃色星形的記號，在白天前往工廠幹活，直至晚上才回家休息。後來政府頒布了宵禁令，我們的作息時間因此受到限制。由於勞動結束後已經太晚，以致不能

---

* 我本能地，或者說迫於環境的壓力，開始認識到當人們在生活中面對多種選擇時必須做出決定，儘管我當時還不能完全理解這個原則。我逐漸養成厭惡隨波逐流或向命運低頭的態度。與此相反，我會試著用自己的雙手掌控命運的方向。後來我刻意地堅持這種行為方式，並將它作為生活的基本原則之一。當然有決心做出選擇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我在磚廠工作的決定很快就被證明完全沒有必要。

回家，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好勉強在工廠的工棚裏找個床鋪湊合了事。*

這種從未經歷過的生活方式，並沒有給我留下太多苦澀的記憶。與此相反，這有些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年輕人經常組織的夏令營。人們一邊享受露營的樂趣，一邊做些農作或建築等體力活動，我們雖然是在恐懼的驅使下到磚廠工作，但這仍然是出於「自願」，所以我們興高采烈地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工作，並且努力適應艱苦的工作條件。當我們發現磚廠的熟練工人和我們共事，從來沒有對我們惡言相向時，讓我們大大地鬆了口氣。沒有一個人評論我們衣服上刺眼的黃星標誌，我們也沒有聽到一句侮辱猶太人的言論。當我們笨手笨腳地幹不好活時，他們會手執手地教我們，或者簡單地責備我們幾句，就像對待其他製造出「垃圾」的新手一樣。一位老工人邀請我們去他家裏吃飯喝酒，使我有機會親眼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況。雖然狹窄的房間裏整潔乾淨，但是與我和朋友富足的生活條件相比，卻是貧窮得令人難以置信。雖然我在家裏時和傭人的關係也非常融洽，經常和他們談天說地，還到他們家裏作客，拜訪他們的家人，但是這只是僱員與僱主的家人之間建立起的家長式溫情關係，與我在磚廠的體驗有著天壤之別。我在磚廠工作時，第一次真切地接觸到「勞動階級」。我突然一腳踏進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告別了不食人間煙火、富裕安逸的生活，在技術落後的工廠裏接受懲罰性的體力勞動，而過去的幸福生活都如雲煙般消散殆盡。我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群體裏，工友們艱辛的生活條件和自然流露的人文精神，讓我由衷地尊敬他們。

Nagybátony-Újlakr 磚廠後來成為猶太人被大規模驅逐出境的過渡點。許多人被放逐後再回到祖國，說起自己當年的經歷時，都會提及這間磚廠。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回憶時說，當時磚廠的工

---

* 我住在磚廠時，母親和姐姐被迫搬離Akadémia街上的公寓。猶太人必須住在有「大衛之星」標記的屋子裏。母親和姐姐被父母的老朋友收留下來，住在Pozsonyi街上的一間「猶太人之家」裏。

人曾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執行驅逐政策的公務員、憲兵和警察與磚廠工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來人們發現部分工人在幫助逃亡者的過程中，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我沒有找到可以證明這種說法的可靠證詞。

到了1944年夏天，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受到的壓迫或多或少減輕了一些。各省的猶太人已經被驅逐出境，據說布達佩斯的猶太人不會面臨同樣的命運。與此同時，我找到一位仁慈的醫生伊斯特萬·薩博。他冒著極大的風險給我開了一張假證明，稱我不適合粗重的體力勞動，因此我獲准離開磚廠。

秋天的腳步越來越近，我也隨之進入新學期。我應該完成最後一學年的學業，然後參加畢業考試。我決定摘下身上的黃星標記再去上學。同學們的行為給予我很大安慰。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有從他們口中，聽到任何反猶太言論，但我同樣也沒有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半點同情——許多非猶太朋友和其他學校的朋友，都對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這樣的感覺卻是非常糟糕。他們不到我家作客，也不給我通電話。戰爭結束後，我遇到其中一些中學同學，我指責他們當時的沉默，但他們以一種完全不理解的異樣眼光看著我，似乎根本不明白他們當時忽視了什麼。他們過去也曾善意地為我著想，並且希望了解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沒有學校、養育我們的家庭和教會，我們如何表達共鳴、同情和團結等情感。

我無所事事地度過整個夏天和初秋的時光。當我們和一個憲兵中尉達成奇特的協議後，便從猶太人「星屋」裏搬出來，改而遷往姐姐的公寓。姐姐和憲兵中尉商定的結果，是中尉一家可以長期租住我家。如果我們不幸喪生，而他和他的家人能在戰爭中幸免於難，那麼我們出租給他們的公寓和公寓裏的所有財產，都歸他們所有。不過如果我們能從動蕩不安的局勢中死裏逃生，那麼我們就會搬回老房子，而他們便得另找居所。形勢的發展選擇了後一種情況，但是1944年夏天，我們根本無法預測命運將把我們帶向何處。當母親仍在廚房忙碌時，我們三個人——姐姐麗莉、善良溫柔而且懷有六個月身孕的中尉妻子和我，會相互說一些十六歲少年所鍾愛的笑

話，然後開懷大笑，彷彿我們什麼都沒有失去似的。

10月15日，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發布了臭名昭著的公告，聲稱將與蘇聯軍隊達成停火協議。街道上很快出現一群匈牙利納粹分子，即箭十字黨的成員。這種恐怖局勢在佩斯持續了大約十個星期，從零星發生的殺人事件，升級到大規模殺戮。又過了一個月，才將德國人和匈牙利箭十字黨黨員從布達清除殆盡。

箭十字黨篡奪政權後沒幾天就發布了動員令，強徵所有猶太人前往服勞役，甚至不在18至60歲服役年齡限制內的少年和老人，也未能幸免。我自然也在動員令的徵募範圍內，被編進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輕人和老年人組成的勞工連。新來的勞工被集中在一起，分配進各個勞工連，然後浩浩蕩蕩的勞工大軍就從那裏出發。第一天晚上，我們駐紮在費里海吉(Ferihegy)機場裏尚未完工的一座新機樓裏，所有人都用背包做枕頭。破曉時分我們準備出發時，才發現離我幾英尺遠的一位老人躺在那裏，再也沒有起來。他根本抵受不了這種混亂的場面和長途行軍。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接接觸死亡。

我們到達距布達佩斯20公里的小鎮Vecsés後，被安排住在馬廄，一百多人緊靠著躺在稻草地上。這時一點兒也找不到早前晚上在磚廠過夜時的快樂露營氣氛。艱苦的生活條件，讓勞工連裏的老人苦不堪言。他們晚上起來時，經常在黑暗中踩到其他人而絆到。每天早晨，習慣了溫暖浴室的人們，必須忍受以冰冷的涼水洗漱的痛苦。我們的食物少得可憐，所以我們在田地裏挖壕溝時，便會到處尋找胡蘿蔔來填填肚子。因為勞工連裏的人聚在一起的時間非常少，根本不足以建立任何同志或朋友式的親密關係，所以彼此間非常冷漠，我找不到任何人能聽我訴苦。

不過在艱辛的勞役生活中，我也遇過溫暖的關懷。有一天負責看管我們的哨兵，命令我們在一個家庭的花園裏挖壕溝，我們不得不把那裏弄得亂七八糟。花園的主人並沒有因為我們的破壞活動而遷怒於我們。與此相反，一個漂亮的金髮小女孩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這些飢腸轆轆的勞工送來一桶豆子湯。這個小女孩名叫瑪爾塔，多年後我意外地再次與她相逢，當時她是辦公室裏的打字

員，我是一名記者。我們談到曾經經歷的戰爭歲月時，才發現原來她的父母就是曾守護我們的天使，而我恰巧地是他們無私幫助過的勞工中的一人。這件事的確不算什麼大事——只不過是一桶豆子湯，但自此只要有人片面地下結論，稱猶太人受到迫害時，所有匈牙利人都冷漠地袖手旁觀，我必定會引用這件事情和其它類似的事例來反駁他們。

到了1944年11月2日，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聽到蘇聯軍隊隆隆的大炮聲。勞工連接到命令，要求我們立即撤離Vecsés，趕往布達佩斯。於是全連在萬靈節（匈牙利人將它稱作「亡靈日」）那天開拔——當時我們全連共有幾十名青年和一百至一百五十名老年人。勞工營的看守衛一直押著我們急行，趕到布達佩斯的地界附近。在行軍途中，看守衛和在Vecsés時一樣，執行嚴格的紀律，但他們並沒有折磨我們，或者制定一些殘忍的規定來尋開心，因為這種行為，可能立刻導致勞工崩潰或死亡。他們規定的行軍速度很快，但我們還能夠忍受。

到達布達佩斯後，我們穿過Üllöi街的軍事建築。帶著臂章，穿著綠色襯衣的箭十字黨民兵，在那裏從勞工營看守衛手中將我們接管過來。不久他們喊出了第一個新命令：「跑步前進！」。對於我們這些青年人來說，從Vecsés到布達佩斯長途行軍幾十里後，還能勉強支撐跑步前進，但許多老年人卻開始跟不上隊伍。只要有人掉隊，箭十字黨的年輕士兵們就用步槍槍托，狠狠地給他們來一下。從Üllöi街一直到米克洛什·霍爾蒂橋（即現在的裴多菲橋）的路上，他們不停地驅趕或痛打落在隊伍後面的勞工。我親眼看到自己前面和後面的人，遭到他們無情的毒打，至少有五個或更多的老人，就在我眼前被他們打中頭部。我們到達米克洛什·霍爾橋時，有兩位勞工衝出隊伍，一頭投進多瑙河。箭十字黨的士兵開槍向他們射擊，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被擊中，還是僥幸地成功逃脫。

我們到達Albertfalva安營紮寨時，身心已經極度疲憊。那天確實是「亡靈日」。即使對於健康的人來說，從Vecsés到Albertfalva的二十公里路程也不算短。第二天一早，我認為我必須想辦法逃跑。

幸運的是，一個絕妙的機會降臨到我頭上。英勇無畏的瑞典外交家拉烏爾·瓦倫貝里，當時正在想盡各種方法，在布達佩斯範圍內開展營救猶太人的行動。有些猶太人拿到瑞典護照，但這種護照與真正的瑞典公民所持的護照並不完全相同。這些文件上注有德文單詞「Schutzpass」，意即「保護護照」，它可以證明護照持有人為瑞典公民。而有些猶太人持有的護照上則注有「Schutzbrief」（指安全通行證），這種文件的法律效力略差。它表明持證者受瑞典駐布達佩斯使館的保護，即使是箭十字黨政府也要尊重「保護護照」，而根據國際法，後一種證件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或效力。

我口袋裏便裝著第二種護照——雖然它看起來讓人興奮，卻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這是艾爾諾·瓦爾曼幫我辦的。他是我們家的朋友，也是姐姐麗莉的仰慕者。一天清早，箭十字黨的一位指揮官，命令所有持有瑞典護照的勞工排成一行。我必須馬上作出決定，如果我站進瑞典人的行列而被他們發現，由於我並沒有真正的瑞典護照，那麼我一定會被當場槍斃。但我仍然打算冒險嘗試，大膽地冒充自己是瑞典人。

幸運的是檢查證件的年輕人，並沒有注意到「Schutzpass」和「Schutzbrief」的顯著區別，把我編進瑞典人組成的團班裏。我們被送上一輛開往佩斯的卡車，其他人則留在原來的編制中，當時有謠言說他們將會繼續西行。多年後我偶然遇到一名幸存者，才知道他們的遭遇。他們到了奧地利的邊境後，只有少部分人活下來，其他人都死於毒打、飢餓和高速的急行。

從Albertfalva出發的瑞典人，和其他被集中起來的瑞典人，都被送到佩斯一個寬敞的工會總部裏。儘管我們仍然睡在地上，但是由於不再有人虐待我們，因此心情大為輕鬆。看管我們的都是一些應徵入伍的友善年輕士兵。從匈牙利猶太人中挑選出來的「瑞典」軍官，負責維持我們的秩序，他們都曾經擔任預備軍官。但是無論生活條件怎樣改觀，我都不相信箭十字黨會讓我們這樣一直舒舒服服地過下去。後來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正確的。這群瑞典人在佩斯短暫停留後，也被驅趕著向西行軍。

要想從瑞典人手下逃走並不難。看守我們的軍官裏有一位是我家的朋友，因此當我偷偷溜出門時，他授意看守的人員把臉扭了過去，只當什麼也沒看到。

我再次獲得了自由，我可以在沒有哨兵看管的情況下，走在佩斯的大街上。但是我的自由到底有多少呢？儘管我身上沒有佩戴黃星標記，但是我也沒有偽造的證件。只要箭十字黨的黨員、警察、士兵，或者與他們勾結的平民對我有所懷疑，我便會馬上被送回監獄，並且受到嚴刑拷打。我必須躲藏起來。

起初我躲在親愛的盧伊佐那裏，她曾經為我家打掃衛生。她的丈夫是一所公寓大樓的看門人，而我就躲在那幢大樓的一個房間裏。由於他們白天出外工作時不想把我獨自留在公寓裏，於是請求那裏的一兩家住戶把我藏起來。我可能在某位電車司機的家裏住一天，第二天就被妓女收留。他們都知道自己可能承擔巨大的風險——鋪天蓋地的政府布告都在告誡人們：窩藏猶太人或者逃兵的行為，將受到「毀滅」性的懲罰。然而這些好心人依然收留了我，因此他們的行為，也進一步證明了因為箭十字黨的殘暴，便對所有匈牙利人妄加判斷的做法，是多麼武斷而且不公正，因為那些出於關懷而自願無私地幫助了我們的匈牙利人，自己也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我每天都必須找一個新的棲身之地，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幸運再一次降臨到我的頭上，幫我拿到瓦倫貝里「安全通行證」的朋友，再次利用他在耶穌會裏的關係。耶穌會的神父同意將一部分猶太人藏匿起來，當中包括我和我的姐夫。這個朋友還利用他在教會中可靠的關係，將我的母親和姐姐藏在Sacré Coeur女修道院裏。我在前往新的藏身地前，特意探望了她們，誰知道我是不是還有機會見到她們呢？我既沒有佩戴星形標記，也沒有攜帶任何可以證明身份的文件，只拿著一束花便急匆匆地趕往女修道院。母親和姐姐看到我時滿心歡喜，然後我們便互道了永別。

耶穌會的修道院熱情地迎接了我們（這間修道院即勞伊克學院的前身，現在是經濟學專業學生學習和休息的地方）。修道院的院長[3]

雅各布·賴勒收容了很多避難者*。由於我是其中唯一的年輕人，所以找不到真正能與我交談的人。我和姐夫保持著適度的親戚關係，但無論在感情還是學術方面，我們的關係都並非親密無間。我發現自己又一次像個異類一樣，孤獨地生活在一個團體中。

有一位神父曾多次邀請我與他探討宗教信仰、上帝、基督教和猶太教教義及其哲學體系（不幸的是我忘記了它的名稱）。我們在其他人眼裏看來，一定組成一幅非常奇怪的畫面——一位耶穌會神父和一個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少年，漫步在花園裏，熱烈地討論一些深奧的話題，而花園外則是大炮駛過發出的隆隆聲。

當時蘇聯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布達佩斯，城市外圍的地區已經展開激烈的巷戰。我們一直認為耶穌修道院的影響力，會對箭十字黨有所威懾，但有一天早上，從神父那裏傳來消息，說箭十字黨已經開始搜查修道院。我衝到樓梯間，看到兩個全副武裝的人在外面大喊大叫。我不知道他們是正規軍還是箭十字黨民兵。姐夫和我逃到屋頂上，躺在清掃煙囪的工人用來通煙囪的木條上。我不知道是箭十字黨對修道院的突然搜查恐怖，還是蘇聯對整個城市的狂轟濫炸更恐怖。炸彈從天上落下來發出的呼嘯聲，伴隨著震耳的炮火聲，讓人心驚肉跳。此外，讓我感到焦慮不安的，還有我可能從狹窄的木條上掉下去。在這種令人發狂的情況下，當我從屋頂上的槍炮中迸發出閃光時，城市的地平線上展露出一種地獄般詭異的美麗。而讓這一幕顯得更加怪誕的，是一個年輕的猶太銀行職員和一個書呆子般的男生，緊緊地貼在耶穌會修道院屋頂的木板上。

我們躲過這場突擊搜查，但是耶穌會的神父希望我們搬到地下室裏去。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應該在那裏住了兩個星期，雖然

---

* 雅各布·賴勒是1944年匈牙利教區的耶穌會大主教。目前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表明教會當初到底收留了多少人。有人估計在一百人左右，有人估計約為一百五十人。1992年以色列的亞德瓦謝姆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向賴勒神父授予「國際正義使者」的稱號。獲得這種榮譽稱號的人，都曾在二戰大屠殺中，竭盡全力地拯救遭到迫害的猶太人。

空間狹窄，但是生活條件卻是體面得多。由於我們的飲食一直由修道院供給，所以飲食條件一定較當時大多數布達佩斯市民優勝。蘇聯圍攻布達佩斯前，很多市民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裏修建防空洞時，都在合適的地方開啟一道門戶，與其它防空洞連接起來。一天早上，通向隔壁防空洞的門戶突然被打開，一隊德軍士兵走進來，他們想要做什麼？他們想把我們趕出去嗎？不。這些都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因為他們正在潰逃。這些士兵精疲力竭，而且心力交瘁，拖著沉重的腳步，從一個地下室挪到另一個地下室。

戰敗的德軍士兵「拜訪」我們一兩天後，蘇軍就進駐布達佩斯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我看到的一切。我們藏身的地下室裏，有一條通向上面的樓梯。當時我們正焦燥不安地在地下室裏，度日如年，突然間三個人出現在樓梯的頂端。其中一位是穿著耶穌會服裝的修道院院長雷利，站在他身邊的是一位穿著哥薩克制服、站得筆直的蘇聯軍官。從前我只有在小歌劇裏看過這種制服，他的彈藥帶交叉著掛在他胸前。和他們在一起的，是和我們一起藏身在修道院的另一名猶太人。他在Subcarpathia*的一個猶太教堂唱詩班裏擔任領唱，精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現在正為神父和蘇聯軍官充當翻譯。他向我們轉述了蘇軍軍官幾句友善的問候，然後我們遭受到的迫害、東躲西藏的日子，以及蘇軍對布達佩斯的圍攻便全部結束了。

事情繼續以奇怪的方式發展下去，幾個蘇軍士兵從樓上走下來，一邊喊著「Davay chasi!」一邊走到我們這些深受迫害、被迫在耶穌會修道院藏匿數周之久，而且剛剛才重獲自由的人身邊，拿走我們的手錶。我並不是非常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或者這到底有什麼含意，但我乾脆痛快地把自己的手錶遞給他們。

我們又在修道院等待了一兩天，才再三向修道院致謝，然後便與神父和其他難友們互道再見，各奔東西。

我從一條林蔭小道抄往近道，很快便發現自己站在Dohány街上的猶太教堂前。那裏可怕的景象讓我目瞪口呆，冰冷赤裸的屍體堆

---

* 這個地區在1944年時還是匈牙利的領土，現在屬於烏克蘭。

在街道的一旁。曾經生活在猶太教會堂周圍猶太人區的猶太人，其屍體堆得像房屋一樣高。

我一路趕回Pozsonyi街上姐姐的公寓。我推門進去，母親和姐姐就在房間裏。我們三個人經歷了蘇聯對布達佩斯的圍攻後，終於幸免於難。

我生命中的一章劃上了休止符，那時我只有幾天便滿十七歲。雖然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我並沒有成年，但是1944年的經歷，意味著從此以後我不再是孩子或未成年，而要完全承擔起對自己的責任。

2 我如何成為共產主義者：1945–1947年

1975年我在瑞典工作時，有一回必須前往紐約參加學術會議，這意味著我必須到美國駐斯德哥爾摩使館申請簽證。當時的美國法律規定，申請者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你這一生中是否曾經加入共產黨？接收我的申請表的使館官員，看到我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曾經參加」，便好心地向我說：「他們當時一定是強迫你參加的……」。而我回答說：「與此相反，我是自願加入共產黨的，因為當時那就是我的信仰。」

從我的共產主義信仰開始萌芽到破滅，距今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是當我記敘這些事情，同時評價我的生活時，探討我為何加入共產黨，或者怎樣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問題，仍然有其必要。

入黨的各個階段

我回答美國使館簽證官的提問顯然過於簡單。入黨時需要向黨組織交正式的書面申請。儘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並且是已經完成某些步驟後的結果，但它僅僅是標誌著，從黨外人士發展到被共產黨完全接納的整個皈依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過程通常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根據每個人的個性和所處的環境的不同，也有所變化。此外，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的皈依過程，與共產黨仍

然為權力而鬥爭(無論它們是合法或非法組織)的國家裏的皈依過程，也不一樣*。匈牙利的箭十字黨政權垮臺後，國內馬上建立了包括匈牙利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共產黨員在這個政府中擔任了要職(在本章涵蓋的時期結束後，共產黨成功地建立了一黨專政制)。

我們有必要區分被共產黨完全接納的五個階段，這也是入黨所特有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是成為**黨外同情人士**。這些人被共產黨的理念所吸引，並且願意支持某些特定的運動。他們在選舉中也會投票予共產黨。他們同情共產黨，但是並不願意像黨員那樣，承諾願為共產主義獻身(或者說還不能接受這種承諾)。

第二個階段是成為**黨員**。顯然在成為「黨員」前，並沒有其它合適的詞語來描述其身份。這些人也許充滿熱情，也許沉默寡言，通常很難在黨組織中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已經從真誠地同情共產黨，轉而接受黨員必須履行的責任和遵守的紀律。但對於抱著投機思想入黨的人來說，共產主義的觀念也許與他們的想法格格不入。

第三個階段是成為**忠誠積極的共產黨員**。這些黨員定期參加支部會議，而且從事黨務工作，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

第四個階段是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必須接受培訓成為馬列主義者，但是這本身並不是這個階段的全部內容。想想人們經常引用斯大林在列寧葬禮上的演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很特殊類型的人士，我們是用特殊材料所做成的。」[1]確實，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真正的布爾什維克與非共產主義者的差別，不僅表現在學術上，而且還體現在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特點上，他們必須表現得像個黨員。所有個人、家庭、朋友或同志的利益，都必須為黨的利益讓步。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須不折不扣地遵守黨的所有命令，並且嚴守紀律，即使他們本人對此持反對意見。在黨有需要的時候，他

---

* 匈牙利共產黨多次更改過名稱。匈牙利共產黨(1944–1948)最早更名為匈牙利工人黨(1948–1956)，後來又改作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956–1989)。本書用「共產黨」代表以上所有名稱不同的共產黨。

們必須做好犧牲自己的準備。

第三個階段和第四個階段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具有強烈信念的黨員，都希望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人類的理想，也是極其辯證的理想。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會受到內心疑慮的痛苦折磨，即他們是否受到充分的馬克思主義培訓，是否具備足夠的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們的自我批判意識愈強烈，他們的同志便會認為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愈具有權威性，更加可信，也更加真實。

第五個階段是成為一名**共產黨鬥士**，即**職業的黨務工作者**。這個範疇包括那些全職從事黨務活動的人，而不是抽出部分時間為黨工作的黨員。他們可能是黨委書記或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可能是工廠負責人或國家安全局（即ÁVH，Államvédelmi Hatóság）的官員。問題的關鍵在於黨選派他或她擔任這些職位的同時，也可能隨時將他們撤職。無論他們從事何種工作，都是接受了黨的任命，並且必須以黨的利益為重。

當然，這五個階段只是個人發展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一個抽象模型，它們不一定會嚴格遵守這些階段的次序，許多階段可能會完全或者部分地重合。

有些人入黨時只完成第一個或前列的幾個步驟，而我則經歷了完整的入黨程序。我雖然在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其他人一定會有與我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經歷，我的入黨經歷非常具有代表性。

1945年春天，我還在基斯貢哈拉鎮的改革教會高級中學上學，準備參加畢業考試。我的一個朋友邀請我到那裏居住幾個月，原因是那裏更容易找到食物。1945年考試結束後，我回到布達佩斯，並且開始參加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Magyar Demokratikus Ifjúsági Szövetség，即MADISZ）第五分區的活動。它是一個受共產主義者控制的組織。1945年的前六個月到八個月，把我從遠離共產主義的陌路人，轉變成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第一個階段）。

那年夏天，我參加了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而且表現得愈來愈

積極。我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感愈來愈強烈，我開始產生入黨的念頭。

秋天快要結束時，我參加了匈牙利共產黨，而且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布達佩斯總部擔任職務。因此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完全重合了：我參加共產黨時，早已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激進分子。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種情況預示著我後來必定會進入第五個階段——成為職業的共產黨鬥士。

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布達佩斯總部內工作，期間可以說是我萌發成為共產黨員念頭的時期。後來我得到升職，被調到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全國總部。這次升遷標誌著我的共產主義運動生涯達致頂峰。當我發展到這個階段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周圍的同事和朋友也都這樣認為。毫無疑問，我已經到達第四個或第五個階段。

多種因素促使我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下去：我將按照皈依共產主義的次序來描述這個過程，而不會遵守嚴格的時間發展次序，以便更好地區別這五個階段，並幫助我進行深入的分析。

1944年給我留下的戰爭創傷

我認為把猶太人與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聯繫起來的做法，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錯誤觀點。所謂「猶太人的血液裏流淌著共產主義」的說法，不過是盲目、愚蠢和無知的想法。儘管馬克思是猶太人，但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都不是猶太人。1919年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貝洛·庫恩和1945年之後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馬加什·拉科西是猶太人，而德國的瓦爾特·烏布利希，波蘭的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和中國的毛澤東與猶太血統沒有半點關係。與此對應的是，我們還可以列出許多並沒有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猶太政治家名單，他們成為社會民主、自由主義或保守黨派及其它政治活動的領袖，這足以有力地反擊這種荒謬的種族論。

與此同時，1944年戰爭的創傷，推動了匈牙利的許多青年及老年猶太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

匈牙利猶太人遭到的迫害遠遠早於1944年，霍爾蒂政權（1920–1944）便直接表現出對猶太人的歧視：它的反猶太法把反猶太主義確定為政府的官方政策；它與希特勒沆瀣一氣，從而在其幫助下重新修訂了匈牙利邊界；它直接參加二戰，並與希特勒結成聯盟。這些都使許多猶太人感到他們必須支持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是最強烈地反對霍爾蒂政權的政黨，而且在霍爾蒂執政期間，共產黨一直被視為非法組織而遭受到殘酷的迫害。

匈牙利解放幾周至幾個月後，國內出現了很多關於匈牙利抵抗運動的說法。共產主義者宣稱共產黨員最積極地參與了這場鬥爭，並且最具有自我犧牲精神。事實上，匈牙利武裝抵抗力量始終非常弱小，規模有限，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我沒有仔細研究過在有限的武裝抵抗力量中，共產主義者與非共產主義者的精確比例是多少。我在向共產黨靠攏的過程中，的確曾經遇到拿起武器與法西斯主義堅決鬥爭的共產黨員。我非常尊敬他們，對他們充滿仰慕之情，並且深深地痛恨自己在戰爭中，只是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沒有作出努力抗爭。我不認為自己可以拿少不更事來理直氣壯地為自己開脫。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第五分區裏，有很多人比我更年輕，例如被所有人視為英雄的成員霍莫克（即費倫茨·瓦爾瑙伊）和加比·帕普。

共產黨並憑藉其抵抗霍爾蒂政權和組織武裝力量等行動，贏得猶太青年的尊敬和同情。另一股推動他們接受共產黨的力量，則來源於他們對未來的擔憂。過去的悲劇是否會重演？我並不想考慮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我也不願討論匈牙利民主的命運或匈牙利與民主西方的關係。我努力想讓讀者了解的，是我這個十七歲少年和其他曾經經歷相似戰爭創傷的青年人，大腦裏在想些什麼。即使不考慮共產黨承諾將在未來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蘇聯體系所體現出來的特點，共產黨憑藉其政治勢力、在政府中的地位及其實力，便可以為我們提供最可靠的保障，防止法西斯主義東山再起——這個理由看起來足以吸引人們對它的支持。

這種論證方式，而不是所謂基因方面的親緣關係，有力地提高

了共產黨對猶太人的吸引力。

在那個年代及後來的日子裏，我們沒有辦法將個人對共產黨的判斷與對蘇聯的看法嚴格地區分。狂熱地追隨蘇聯的人會同情匈牙利共產黨，而那些對蘇聯人反感，甚至仇恨的人，自然也很厭惡匈牙利共產主義者。

1945年1月至2月期間，蘇聯軍隊趕走了德國軍隊及匈牙利箭十字黨的黨羽，我真正感到我們獲得了解放。我認為蘇聯戰士是拯救了我們生命的救星，而且我真誠地感謝他們為了我們而付出的慘痛代價。這種感激之情，使得我不願承認許多蘇聯紅軍戰士像流氓惡棍一樣無法無天的事實，而他們的指揮官也容忍甚至默許了這種行為。我在前一章中回憶到的怪誕的竊行(即蘇聯紅軍搶走我們的手錶)，是一件讓我覺得甚至有些好笑的事件。然而，當我看到家裏多次被洗劫一空時，便再也笑不出來了。有一群俄羅斯士兵揮著槍衝進我家，把我們趕到防空洞裏，搶走我們所有財物後便揚長而去。甚至有位「常客」多次光顧我家(我們都叫他「Bunker Idi」——這在俄語裏指「到地下室去」——因為他每次揮舞著槍，把我們趕到地下室時，都會這樣大喊大叫)。

一個好朋友絕望地告訴我，蘇聯紅軍強姦了他的母親。

我經常被蘇聯士兵帶去「manlinki robot」(即做些簡單活兒)，例如在布達佩斯挖炮兵掩體，或者住在外省時被抓去趕馬，幸運的是我總能找到回家的路。那時我們聽說很多平民被帶走，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其後便與戰爭犯一起被帶回蘇聯。

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在心理學中被稱作「認知失調減少」。多年來我一直將這些可怕的經歷，埋藏在潛意識裏，因為一旦它們浮現出來，便會削弱我對蘇聯的信心。或者說我自己努力為這些不可寬恕及不可接受的行為，找到托辭和藉口。與此同時，我對蘇聯的信心不斷增強，以至最終演化成為盲目、而且無條件的信仰。

在分析其它促進我發生這些變化的因素前，我想多講述一些我的猶太屬性。自從我向共產黨靠攏開始，我對於猶太人身份的認同感，便幾乎完全消失，至少在我大腦的意識層面裏如是。有一次有

位老同學告訴我，他準備移民到以色列。這種念頭絲毫沒有打動我[*]。我從來沒有因為猶太人遭到迫害而產生報復的念頭。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裏有多少是猶太人，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雖然他們被打上猶太人的標籤，卻並沒有因此讓我對他們產生親切感。而在另一方面，我也從來沒有想過這種特殊的身份，會導致他們遭到匈牙利社會裏，許多長期以來深受反猶太思想毒害的人的排斥。

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姓氏聽起來德國味十足，而且它可以清楚地暗示出我的猶太背景。我必須將它改成聽起來更像匈牙利人的姓氏，比如科爾奈。這個過程的發生非常自然，事實上沒有人暗示我必須這麼做，我自覺自願地做出更改姓氏的決定，這也是我為了抵制被歧視的痛苦經歷，而努力被匈牙利社會「同化」所作的努力之一。

當然匈牙利法律和公共生活的變化，也促使我逐漸削弱自己對猶太身份的認同感。你不再需要在正式表格上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人們也不再用排斥的口吻談論「基督教義課」。法律體系中沒有出現明確公開的種族歧視或宗教歧視等反猶太內容，也不再實行種族隔離或劃分猶太人居住區等措施。個人及非正式的歧視活動日漸減少或者被強令禁止[†]。在那兩年裏，匈牙利社會在種族歧視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迅速轉變，自由主義氣氛日漸濃厚。

當**公開**的反猶太主義再次顯露端倪，人們開始重新聽到、看到或者從報紙上閱讀到相關事件時，我開始擔心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我會在後文中相應的章節裏，詳細講述這些內容。

---

[*] 當然我原本可以移民到其它許多國家，而不僅是以色列。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的日子裏，我都多次面臨著留在匈牙利還是移居海外的抉擇。我會在後面的章節裏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 那些搬進猶太人的公寓或佔有他們財物的人，並不願看到猶太幸存者回來。1945年前徹頭徹尾的反猶分子，在1945年後仍然存有對猶太人的仇恨。早些年甚至還有反猶太人的計劃，但它們通常都被遮掩起來而秘而不宣，至少我本人再也沒有經歷這類事件。

我在前文曾經提及我作為猶太人所經歷的戰爭創傷，也是促使我向共產黨靠攏的一個原因，後來我又說到當我日漸融入這個組織時，猶太人的身份在我心裏就慢慢消逝（或者說暫時進入冬眠）*。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矛盾，兩種心理過程嚴絲合縫地嚙合在一起。我周圍的共產主義氣氛愈濃厚，我愈發感到猶太的身份對我沒有什麼重要影響。

那些遭受羞辱、污蔑和歧視的記憶，迫使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猶太人，參加了這個並不以種族或宗教劃分三六九等，而且對我們一視同仁的團體。從我開始接觸共產黨起，它就在我的思想裏灌輸了形形色色的偏見，但這卻不是種族主義。我的黨員同事和朋友，從來沒有詢問我的宗教信仰，以至我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宗教信仰。他們熱心地接受我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在經歷了可怕的歧視所帶來的創傷後，這種被接納的感覺，讓我感到欣慰，所以它頗具吸引力。

學術思想發生轉變並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政治觀念

我力圖在上文說明的，不僅是觀念發展的嚴密邏輯次序，而且是**感情鏈**發展的因果關係，與它並行的是**學術思想**的發展次序。當我分析自己皈依共產主義的過程時，發現這種心理過程，與我的猶太身份或1944年受到的重創，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一個新觀念與舊觀念發生衝突之後，迅速並且完全取而代之的例子。我在描述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時，竭力避免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接受共產主義觀念，是刺激我的思想發生轉變的主要因素。顯然我個人的發展

---

* 我的情況並非是個特例，幾十年後，我遇到了一些父母是猶太人的「幹部子女」，他們當時幾乎與我同時加入共產黨。這些「幹部子女」告訴我說，雖然納粹的法令讓他們的父母充分地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背景，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成為匈牙利共產主義者後，就不再具有這種特殊的身份。人們提到他們的猶太背景時，他們總會感到尷尬，這並不是因為這種身份讓他們感到恥辱，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道路，並不適合那種簡單的模式，即猶豫不決的知識分子被共產主義的政治傳單和演講說服，認為共產黨是最適合他們的組織。

我描述1944年之前的生活時，提到我的世界觀是開放而且靈活的。我貪婪地閱讀了大量書籍，而且很容易受到有說服力的觀點影響，而一旦另外一個強勢的觀念出現時，便會迅速把先前的想法趕離大腦。

到了1945年初，我閱讀的時間減少了很多，因為我必須在幾周內完成一年的課程。但我仍然堅持讀報，因此我對時事新聞瞭如指掌。戰爭局勢以及出現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把我的吸引力引向蘇聯。當時我對於後來幾十年裏致力研究的課題，即共產主義體系的運作原理及過程，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我意識到蘇聯軍隊具有強大的力量，而且我親眼看到，它把可怕的德國軍隊風捲殘雲般趕出我的祖國。毫無疑問，蘇聯在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個與我生活的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我開始相信這個新世界會戰勝舊世界。但與此同時，我也看到蘇聯士兵——那些給我們帶來解放的士兵——粗暴地對待匈牙利平民，而且犯下不可原諒的罪行（我在前文已經敘述這段經歷）。

我嘗試在自己的大腦裏，調和這兩個因素之間存在的矛盾，那即是我對未來的信仰和目前的親身經歷。那是我生平中第一次感到了寫作的必要。我寫了一篇非常長的論文《白雪下的種子》——如今看來不過是篇隨筆而已。不幸的是原稿已經丟失，但是我仍然能夠準確地回憶它的內容。我用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歷史學理論「文化周期」來解讀周圍的世界。在斯賓格勒看來，人類並沒有始終向前發展，而是經歷著周期性變化。文化產生、繁榮、衰落，最後毀滅。正像斯賓格勒的開創性著作《西方的沒落》在書名中暗示的那樣，這位德國歷史學家認為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驗證了這個模式。新的文化不斷產生，活力十足而且充滿了原始、無拘無束的力量，然後它轉化成文明，但內部的力量卻不斷減弱而日漸衰落。他宣稱西方文化周期就處於這個階段。

我的論文闡述的觀點是：蘇聯正在開創新的文化周期。它仍然

處於粗暴、不守秩序、活力十足、而且未開化的階段。儘管不幸的是，其表現出來的野蠻性會造成破壞和苦難，但這恰好反映出這種文化年輕和新鮮的特質。

論文的第二部分仿效安德烈·奧迪(1877–1919)的詩歌：我全文引用了這篇優美的詩作，並且，我的論文以它的題目命名。自從經歷了1944年給生活帶來的劇變後，這首詩中的許多詩句，深深地打動了我：「儘管被折磨得體無完膚……鮮血、呻吟和火焰重新塑造了我……」。這首詩的另外一句，還與斯賓格勒的觀點不謀而合：「讓我們揚起臉迎接新人類的新世界。」[2]

這篇論文中很多地方的論證方法，都有些牽強，而且我對於奧迪作品的認同，也顯得有些浮誇。1915年時奧迪一定感覺到他和其他志同道合者，可以為了新世界而挽救舊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詩名《白雪下的種子》所蘊含的寓意。但是當新秩序不可避免地開始於野蠻和殘暴時，我這個不成熟的年輕人，又能從勢不可擋的新秩序中，挽救哪些舊的價值觀呢？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散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都是唯一一篇包含了我的原創思想的文章。需要提醒你的是，這篇文章裏也包含了很多少年知識分子的矯揉造作。它的邏輯推理含糊不清，論點也沒有事實依據，但是它卻具有自己的獨創性。現在當我開始分析共產主義信仰，如何能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裏，壓制我的獨立思考能力時，這個事實仍然讓我感到膽戰心驚。

1946年初，我已經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布達佩斯總部工作。我把這篇幾個月前寫成的文章，交給布達佩斯總部的副總書記卡羅伊·琴代什。多年後，琴代什成為國內臭名昭著的副檢察長，但是當時他根本就不可怕。與此相反，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安靜和善解人意的人。他讀了我的文章後，還把它拿給哲爾非學院的幾個朋友看。哲爾非學院是左翼年青知識分子的活動中心，用琴代什的話來說，這些年青的學者較他博學得多。他的評價，讓我意識到這篇文章，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說從來沒有看到一部作品裏，表達過如此遠大的志向。此外，讓他高興的是，雖然我的論證

過程很奇怪，但是我卻公開贊成建立新秩序。不過他最後得出結論，說我的想法非常混亂，所以他建議我說：「你應該更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

事實上，早在他給我提出這個建議前，我便開始懷著鋼鐵般的意志，研究這些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也許我閱讀的第一本蘇聯作家的作品，就是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它最早出版時，只是蘇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黨史通用課本中的其中一章。我發現即使現在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也認為斯大林以一種誇張、笨拙，甚至有些扭曲的方式，過於簡化並且壓縮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不過我無意在本書中，全面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或者分析斯大林的作品。我希望記錄下來的，是當我第一次閱讀這本封面印著穿元帥服的斯大林像的白皮小冊子時，它對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由於斯大林當時兼具了大國領袖、世界大戰中大獲全勝的指揮官及哲學家等多重身份，所以這激起我對他的無限仰慕。我的腦袋裏裝滿了哲學思想、世界觀和思想流派的各種碎片，雜亂無章地混在一起，然而，這本小冊子卻像作戰般精確，每句話似乎都無懈可擊。的確，書中的所有內容似乎都可以被理解。此外，這種分析特點，也適用於許多重大問題。不少著名哲學家，努力把這些問題分割成各個組成部分，或者提出極為複雜迂迴的論證方式，這樣反而導致問題更加混亂（這是我當時的想法）。斯大林卻用一句簡單明瞭的話，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了這些問題。即使老練的評論家，也可能找不出這種簡單的論證方式的漏洞，而我更是被其深深地折服：這些論述對我來說顯淺易懂、條理分明而且十分連貫。

不過遺憾的是，受過良好訓練的老師，從來沒有在批判性哲學思想研討會上，把這本書作為研究對象。他們本來可以輕鬆地告訴那些容易上當的學生，這本書的淺薄性表現在哪裏，作者在哪些論證過程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說法，以及他的論證方式或者分類方法，為何缺乏說服力。我沒有與任何人討論過這本書，所以也沒有機會了解其他人對它的質疑。

我在十三、十四歲時，便嘗試自己挑選必讀的書籍，並鑒別哪些是最優秀或者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安托爾·塞爾布和米哈伊·鮑比契為我提供了專業的幫助）。現在我用相同的方法，精選出需要學習的政治書籍。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最優秀以及最重要的，當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我必須首先全面了解他們的學術思想。由於這四位偉人創作的作品，幾乎可以裝滿一間圖書館，所以我必須從中選擇最重要的作品。各種各樣的「精選集」，顯然成為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起點。我開始迅速消化它們的內容。大約一兩年後，我更認為自己是精通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讀完了這些經典作家的所有重要作品，並且對於哪些作品探討了哪些問題，瞭如指掌。

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任務，是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時我和彼得·肯德一起工作，他是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報紙《匈牙利青年報》（*Magyar Ifjúság*）的編輯，在聯盟的布達佩斯總部裏辦公。我和他在同一間辦公室裏，主要負責與教育和學校有關的事務，我們下班後也經常見面。起初，我們半認真半開玩笑地決定共同創作一本關於「民主軍團」的小說。我們希望仿效P·霍華德的風格，並且在情節安排上，用當地人成功抗擊邪惡殖民者的結果，來彰顯其民主的意義（P·霍華德是深受民眾歡迎的匈牙利作家耶諾·賴特的筆名。他創作了許多極其有趣的故事，來描述一個匈牙利人在法國外籍軍團裏服役的經歷）。我們在笑聲中寫了幾頁小說，然後便意識到，我們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我們的時間。因此我們決定放棄寫軍旅小說，而改為一同學習《資本論》。

我們閱讀了德文版的《資本論》，而且認真地做了筆記。我們兩個人都寫下了摘要，但是我們幾乎是一面對比彼此對原文的理解，一面逐行閱讀這本書。語言對我們來說，不會造成任何障礙，但是著作本身卻是晦澀難懂。我們兩人從前都沒有學過經濟學，如果當時我們已經熟悉李嘉圖和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那麼便能夠更加輕鬆地理解馬克思從他們那裏借用的理論，以及與他們的分歧所在。由於之前我們沒有在這方面作任何準備，所以在學習這本

書時，感到異常吃力。

時至今日，我還保留著當時手寫的筆記。我花費了好幾周的時間，只和彼得一起閱讀了第一卷(我自學了第二卷和第三卷)。我們懷著堅定的信念逐頁讀下去，一絲不苟地斟酌每句話，並寫下筆記。我和彼得就像虔誠的教徒閱讀聖經一樣，帶著恭敬而謙卑的心情學習這本著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對每一個文字都不敢掉以輕心。

我在前文中，沒有批判性地分析斯大林的作品，因此在這裏，我也不會對馬克思的著作妄加評論，很多其他學者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評論馬克思主義，但是在這裏，我只想描述**當時**《資本論》怎樣深刻地影響我。

它讓我著迷。雖然這本著作的思路非常抽象，而且像大多數德國著作一樣複雜難懂，但馬克思的論證卻清晰明瞭，邏輯性極強，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只要你接受他的前提、概念框架和論證方法，那麼整個論證過程就順理成章，而且無懈可擊。當他通過剪刀一樣鋒利的邏輯思維，從基本概念中推理出第一個結論時，這個結論相應地成為推理其它結論的起點，以此類推。用卡羅伊·琴代什的話來說，馬克思的思維似乎從來沒有陷入混亂的狀態，而是極度清醒(很久以後，我閱讀了大量書籍，反復思考這些問題後，才認識到馬克思在論證中使用的前提，並不正確，而且他看起來嚴絲合縫的論證過程，其實並不可靠。)。我在十四歲到十六歲期間，曾狂熱地從上百種不同風格的書籍中尋求啟蒙，現在這個青年，發現他所尋找的東西，就在這本幾千頁的《資本論》裏，它像陽光一樣熠熠生輝。

我被《資本論》的邏輯性和透徹性深深打動，不過我尊敬和熱愛它的另外一個理由，則是作者創作這本書時，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不是超脫地置身事外。當他談論到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以及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時，字裏行間都噴射出憤怒的火焰。

然而，馬克思並沒有把邏輯分析屈服於感情。他沒有把資本主義的痼疾，歸結於資本家的罪惡。數十年後我開始批判社會主義

時，不斷努力向人們解釋，引發短缺和強制增長等各種失調現象的根源，在於**制度**而不是在於人民的錯誤。毫無疑問，我是在閱讀《資本論》時學到了這種分析方法，而且直到今天，它還在影響我的思考方式。

我是在學習《資本論》期間，立志成為經濟學家，從前這種念頭，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因為那時我更關注的是文學、歷史和哲學。當彼得和我共同學習的過程接近尾聲時，我對於自己將來從事的職業，不再有任何懷疑和猶豫。唯一不確定的，是我該如何把理想的藍圖變成現實。

馬克思的著作裏充滿了學術傲慢的情緒。他非常尊敬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因此當他與這兩位經濟學家存在分歧時，他會非常客氣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然而，一旦提到與他同時代的人，以及持反對觀點的學者，他便會像對待蠢才和惡人一樣，無情地奚落他們，例如「他甚至不知道……」或者「他居然沒有注意到……」，這種情緒在馬克思的其它作品裏，一直延續下去。而且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裏，同樣充斥著類似的傲慢和驕傲情緒，同時他也無法容忍學術上的反對聲音。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當時我被這種特點深深地打動了，而不是理智地厭惡它。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對待反對者！

捷爾吉·盧卡奇（即喬治·盧卡奇）是另一個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思維方式的人，雖然他並不像馬克思那樣強勢。我在閱讀《資本論》的時候，偶然遇到他關於文化方面的著作。[3]盧卡奇提出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理論，就像一座橋樑，把我在1944年之前閱讀大量書籍中了解到的觀點，與剛剛汲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有效地協調連接起來。如果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基督教會怎樣？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狂熱地支持沙皇統治會出現什麼結果？如果巴爾扎克是反動分子，或者托馬斯·曼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又會怎樣？沒問題，喬治·盧卡奇的答案，讓我們恢復了信心和勇氣。你根本不需要關注這些作者個人的哲學觀點或政治立場。最關鍵的問題，是他們都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以及真實地描繪現實生活的作

家。盧卡奇成功地給我注射了預防針，使我免受到這些作家的哲學或政治觀點的負面影響，同時保留了我從孩童時起，就對他們產生的敬仰之情。

在我眼中盧卡奇是個絕對的權威。托馬斯·曼對他表現出來的尊敬，也呼應了這種看法。[4]托馬斯·曼的著作是連接新舊思想框架的另一座橋樑，它們帶給我最令人陶醉的閱讀享受，而且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如果曼認為某人非常偉大，那麼某人一定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因此我絕不能原諒盧卡奇的做法——他從來沒有表達過反對蘇聯的意見。他當時正身在蘇聯，而且親眼看到真正的蘇聯體制。他知道這個國家盛行公審，也知道政府殘酷地迫害無辜的受害者，並對他們採取恐怖行動。隨後他回到匈牙利，他怎麼能夠抑制心中的衝動，而沒有向人們暗示這個體制並非完美無缺？當然，我理解他當時心中充滿恐懼，但是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憑藉他的威望來掩蓋這些罪行。那些像我一樣幼稚、容易受騙，而且缺乏經驗的年青知識分子，盲目地相信虛構出來的蘇聯美好生活，其原因之一，就是連捷爾吉·盧卡奇也沒有對此表示任何質疑。

當我積累的馬列主義知識愈來愈豐富後，我便愈發相信我掌握了了解世界的鑰匙。無論出現什麼問題，我所掌握的知識，都能幫助我順利地解決它們。生活中沒有什麼現象，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協調體制來解釋，也沒有什麼現象，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反駁。這種信仰還滋生出，比傲慢的辯論風格更危險的學術驕傲。但是對於我這個努力追尋秩序和透徹性的青年來說，這是馬列主義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早在青少年時期，一些研究匈牙利農村的作家所描寫的農民貧困生活，以及類似的文學作品，就激發了我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同情心。1944年的親身經歷，進一步加強我從閱讀中間接獲得的這種感情。儘管在磚廠只工作了短短幾周，但是我仍然親眼看到了磚廠

---

* 我第一次閱讀盧卡奇的作品時，就聽說過托馬斯·曼曾滿懷敬意地談到捷爾吉·盧卡奇。然而很久以後，我才讀到曼的原話。

工人的生活狀況。我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很快便從中找到了感情的共鳴。它的政治經濟理論，解釋了工人和農民被剝削的過程。然而，這些新學到的知識，並沒有鼓勵我積極地與這些我開始了解，並且熱愛的窮苦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聯繫。與此相反，它鼓勵我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全心地投入到社會改造的運動中，因為它聲稱馬克思主義能夠徹底地消除貧困。

具備人格魅力的領導人

除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外，另外一個吸引我向黨組織靠攏的原因，就是某些共產黨領導人，在演講中表現出來的雄辯口才，以及他們的個人魅力。

我在很久以後，才與尤若夫·雷沃伊本人有所接觸，但在此之前，我已經聽過幾次他在集會上的發言，和在各種場合下的演講。他的著作及發表在黨報上的頭版文章，與他的演講一樣振奮人心。對我而言，他就代表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最高水平。

雷沃伊是個極富煽動性的演講者，他的演講和文章中的邏輯推理，都淺顯易懂，這一點對我影響最大。我感到他不僅能夠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而且還能夠透過辯論，使對方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觀點。此外，他總能夠有條理地用清晰的脈絡，來組織演講或文章。他是一個出色的辯論者，經常用對方的觀點來攻擊對方，從而使對方一敗塗地。他能夠用豐富及精挑細選的語言，精確無誤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如今當我聽到某些政治家語無倫次、乾癟無趣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使用的語言貧乏且不合文法時，儘管我非常同情他的主張，但是仍然暗暗地希望他們能夠繼承雷沃伊在演講方面的才能。

現在我認識到尤若夫·雷沃伊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都欺騙了我們，並且用惡毒而且應該受到譴責的觀念，荼毒了我們的心靈。但是這個天賦異稟的演說家和作家，在他的演講和文章中，用嚴謹的邏輯推理，四處傳揚他所狂熱追捧的信仰和信念，從而成功地影響

了我們中的許多人。

埃爾溫·霍沃什是另外一個具有人格魅力，而且對我的成長產生影響的人。當然他的才華和公眾地位，並不能與雷沃伊同日而語。我在這裏提到他，是因為當時我和他曾經一起共事。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布達佩斯總部擔任高級工作人員時，他是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總書記。他直接指導我在政治運動中的工作，而我亦參加了他組織的黨內研討會。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後，已升至中校的霍沃什，在警察局中專門負責為報復性審判作準備的工作。他也許早就和國家安全局（ÁVH）有過聯繫——事實上他們的確有過。在1956年後，他成為殘忍的鎮壓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但是讓我們不要那麼快就跳到那段經歷。現在我所描述的，是年輕時的埃爾溫·霍沃什。當我在Rózsa街上的民主青年聯盟總部時，便已經多次聽過他的名字。

他不像雷沃伊那樣曾經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似乎也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從他身上感受到的，是他心中熊熊燃燒的信念之火。他不擅言談，他的說話也經常不合文法，但是他的話語中總是閃爍著火花。他對真理具有十足的信心，因此根本不能想像其他人的看法會與他不同。在卡達爾執政時期（1956–1988），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者中，非常缺乏這種對黨絕對忠誠的熱忱的人。而我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即使在現在的議會制民主國家中，許多傑出的政治家也缺少這種特質。

埃爾溫·霍沃什硬生生地把許多觀點塞進我們的頭腦中，例如我們需要成為「特殊材料」做成的人（這是斯大林描述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特點）。我第一次從他那裏聽說可以用一個標準，而且只有這一個標準，把共產主義者和偽共產主義者或其他人區分，那標準就是必須無條件地將自己奉獻給蘇聯。我需要重複一遍：是奉獻給蘇聯，而不是奉獻給馬克思主義，或者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階級差別社會的事業。共產主義者就是那些無條件地忠於蘇聯的人。這個觀點，也直接導致埃爾溫·霍沃什積極地投身於卡達爾政權下的審判活動，以報復反抗蘇聯統治的運動。

正是埃爾溫·霍沃什把「職業革命家」的名稱，深深地烙記在我的腦海中。我們這些為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服務的全職工作人員（我們的地位相當於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官員），不是某個活動的工作人員，或者某個組織的僱員，而是職業革命家。雖然我們當中也存在著其他職業政治家，但是我們與他們不同，因為我們，也只有我們，是革命者。我們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反法西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英雄人物、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及領導殖民地獨立鬥爭的領導者一樣，都是革命者。「職業革命家」的稱呼為原本平淡無奇的群眾運動組織工作，賦予了尊嚴和高貴。它在我們心中激起的，不僅是自豪感，還有一種特別的優越感和自我滿足感。我們的工作，較那些非職業革命家，或者普通黨員的工作，更加高尚和更具有價值。如果將黨比喻作站在時代的峰頭浪尖的先驅，那麼我們就是先驅中的先驅。

歸屬共產主義團體

讓我們回到幾年前的1945年春天。那時我雖然正在Kiskunhalas鎮學習，不過卻經常回到布達佩斯的家裏居住幾天。1945年5月1日，當我在回家的路上經過Andrássy街上時，突然驚訝地發現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遊行隊伍，從我的身邊席捲而過（當時我並不知道會有遊行隊伍經過那條街）。除了在新聞影片中看到的納粹閱兵儀式以外，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街道上看到的遊行隊伍。興高采烈的人們扛著紅旗、匈牙利三色旗和其它旗幟，整齊有序地向前移動。我感到自己內心也產生了一種加入遊行、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的渴望。

在上文中，我簡要地列舉傳記性事件時，曾經提及我在1945年參加了青年運動。現在為了表明當時我歸屬於某個團體的必然性，我不得不重新提及這件事情。1945年夏天，一位青年朋友建議我去聖伊斯特萬大道12號看看。這幢房子曾經是箭十字黨的活動地點，現在卻成為了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辦公室，而且那裏經常會組織

一些有趣的活動，於是我去了那裏看看。當時有人正在發表演講，我覺得演講的內容很有意思，而且那裏的人們都很友善親切。後來我多次到那裏參加活動。許多人爭先恐後地向工作人員了解這個組織的情況，這裏的環境讓我感到非常快樂。幾星期後，我成為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工作人員——這就成為我的政治運動生涯的起點。

我參加青年聯盟組織的遠足活動、下午的舞會及青年人聚會，愈來愈頻密。到了秋天，我們走上街頭，為第一屆議會選舉張貼海報。說實話，無論在那之前還是在之後，我都沒有像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第五分區時，那樣感受到如此強烈的集體歸屬感。

後來，我對加入黨組織（即共產黨）這個大集體的念頭，愈來愈強烈，遠遠壓過了融入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這個小團體的想法。那時我已經達到入黨的第四個階段，即不僅要成為積極忠誠的黨員，而且更要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經驗豐富的黨員，在這個發展階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有意無意間，總是竭力模仿他們。我周圍有許多資深的老黨員。單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全國總部工作時的頂頭上司，是安德拉什·赫格居斯，他的職業生涯後來達到了令人暈眩的高峰。赫格居斯先後擔任艾爾諾·格羅（黨內二號人物）的秘書、農業部長及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總理。赫格居斯在執政期間，在1955簽署了《華沙條約》，然後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後，簽署了請求蘇聯派兵支援的信件。後來他與斯大林主義徹底破裂，成為極具學術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和科學領袖，贏得廣泛的尊敬和顯赫的地位。當我認識他時，根本看不出他將來可能成為如此出色的風雲人物。他並不像埃爾溫·霍沃什那樣具有領袖魅力，但是我仍然從他身上很多方面，找到共產主義者的原型，這不是因為當時他的許多傾向與我相似（不管怎麼樣，當時他許多想法確實與我相似）。赫格居斯從來不像霍沃什那樣，心中燃燒著信念的火焰。他更加客觀而且公正，但他同樣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的無情和絕對可靠性。他在工作方面非常勤勉，而且永不懈怠。霍沃什通過他的語言和教誨，

深刻地影響了我；而赫格居斯則用他的行動，為我樹立了榜樣，我認為這就是我應該努力仿效的典範。

機遇與個人能力

很久以後，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制訂長期目標，以及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專門制訂計劃或策略。在本章講述的這個時期裏，我的大腦裏還沒有產生半點制訂這種計劃的念頭。我在本章開篇處概述了入黨的五個階段，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希望通過全部五個階段。當我從遠離共產黨的群眾，轉變成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時，我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就我當時的年齡而言，我閱讀了大量書籍，而且並不缺乏推理技巧，但是與我的學術才幹結合在一起的，卻是我的天真、膚淺和缺乏責任感。似乎我正在閉著眼睛，爬上一個陡峭的梯子。匈牙利的暢銷商業周刊*HVG*（即《世界經濟學周刊》，*Heti Világgazdaság*），最後一頁的固定欄目是對學者的簡短專訪。受訪者經常在這個專訪中流露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近年來每當我在這個專訪中，看到某些人聲稱自己當初加入共產黨時是礙於形勢，為了自己在事業更上一層樓時，心裏總是非常反感。雖然過去的一些想法和決定，干擾了我的是非判斷能力，但是我可以堅定地承認，我入黨的動機，決不是這種一心追求名利地位的玩世不恭心理。

有時候，機遇的確會使生活走向另一個方向。如果當初那位朋友，沒有向我介紹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第五分區——如果與此相反，他向我推薦的是布達佩斯的社會民主青年俱樂部，而我恰好又認為那裏的俱樂部成員熱情友善，讓我非常享受那裏的經歷——那麼誰知道我是否還會加入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呢。

第五區辦公室交給我的第一項任務，是整理會員記錄。這些資料亂七八糟地散落在房間裏。我已經多次表明我天生擅長保存記錄，以及對信息的整理、分類和管理，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展示這種才能，而且十分成功。這很快引起人事幹部（相當於現代商業中的

人力資源部經理）的注意，他們馬上把更重要的宣傳任務委托給我。這意味著我將會組織各種教育活動和會議，而在我手中，這些工作也進展得非常順利（井井有條）。

此時機遇再次降臨到我的身上：後來成為哲學家和匈牙利科學院院士的尤若夫·盧卡奇，他當時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的布達佩斯總部裏負責的工作，與我的相似。他希望從這份工作中脱身，然後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大學的科研工作中。當他尋找繼任者的時候，有人向他推薦了我，於是我們便見了面。我記得我們在街上蹓躂了幾個小時，盧卡奇滔滔不絕地描述這份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的腦袋裏，塞滿所有我可能接觸到的人的名字，以及我必須到處宣傳的知識，我的腦袋因而嗡嗡作響。所有這些名字和工作內容，對我來說都非常陌生。這讓我感到有些慌張，但是我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我與盧卡奇談話前，甚至沒有想到我會成為組織群眾運動、並且領取工資的全職工作人員。當機遇來臨時，這項工作看起來變得非常有趣，於是我接受了盧卡奇的邀請。從上級機關的工作流程來看，我是被組織的「人事工作」體系選中的。顯然盧卡奇已經考察了各分區的幹部，也聽取了人事幹部或分區黨委書記的意見，最終才選擇了我。而從我自身來看，我認為這是一件隨機事件。有些經濟社會學家的理論，對行為進行分析後，認為它不是遵循某個策略的結果，而是抓住機遇，並且在局勢允許的情況下，繼續前進的結果。這個模式，非常準確地描述了當時我的事業發展階段的特點。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我在1945年秋天接受了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布達佩斯總部的任命，並成為它的全職工作人員。「全職」意味著我的工作檔案存放在那裏，而且我每天從清晨到深夜，都要忙於有關青年運動的工作。我在那裏領取工資，但工資的價值卻由於通貨膨脹而不斷貶值。雖然我的薪水微薄，但是至少我不必再依靠母親養活我（雖然我仍然與母親和姐姐一同居住）。對於我每天全心投入的事業，她們也許有不同看法，但是她們卻從來沒有向我談及。她們完全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是我應該自己決定過什麼樣的生活。只

有當她們不叫我的名字，而稱我為「MADISZ」時，才在無意間表露出她們對我的嘲弄。*

我在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期間，迅速得到提拔，原因之一就是我屬於共產黨急需、而當時又極其缺乏的幹部人才。

一方面，過去的中產階級生活，使我身上帶有一些優秀的品質，例如我讀過很多書，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而且語言知識豐富。此外，我還表現出具備組織能力和人際交往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共產黨可以完全信任我的絕對忠誠。顯然我沒有半點欺騙黨組織的想法，比起飽經風霜的老黨員，我作為具有中產階級背景的新成員，愈發渴望融入集體，得到組織的認可，並且遵循共產主義的行為規範。在這個曾經被視為非法黨派的政黨中，它的老黨員不時會與組織發生衝突，而像我和我的同齡人具有這樣熱情的新成員，卻會絕對服從黨的命令，所以更加可靠，而且更容易被改造。

雖然當時關於我的報告，沒有這樣強調這些品質，但是人事幹部仍然本能地在我身上發現了它們，所以他們不斷晉升我的職位，推動我在事業發展的階梯上，一步步向上攀登。

---

* 在那個歲月裏，穆約經常靠變賣家裏的珠寶來維持生計。她多次嘗試做些生意，但都以失敗告終。她聽從女婿的建議，以最低價購買了布達佩斯市最高檔的咖啡館（這個咖啡館叫「紐約咖啡館」，一直是作家和藝術家聚會的著名場所）。她努力讓這個咖啡館的生意重新興隆起來，卻沒有成功，很快就被迫將它轉手，並且因此損失了一大筆金錢。母親還開咖啡館時，最喜歡邀請我進去喝一杯漂浮著厚厚的奶油泡沫的熱咖啡，再吃一塊蛋糕。咖啡店的大廳裏繪著匈牙利著名畫家卡羅里·羅茲的壁畫，並且裝飾有著名的螺旋柱。穆約會陪著我坐在寬敞的大廳裏，欣慰地看著我這個飢腸轆轆的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成員，把咖啡和點心一掃而光。

3 在共產主義報社工作：1947–1955年

1947年初夏，我收到共產黨的中央日報《自由的人民》（*Szabad Nép*）編輯的留言，稱他們希望邀請我到報社工作。當時彼得·肯德已經在那兒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向報社主編米克洛什·瓦沙爾海伊推薦了我。他們的邀請讓我感到萬分榮幸和激動，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份工作。

1947年6月，我開始在《自由的人民》工作，八年後的1955年夏天，我受到紀律處分，被報社開除。在報社工作的前六年裏，我堅定不移地信奉共產主義，並且無條件地全心投入到我的工作中。而在1953至1954年期間，支撐我的世界觀的基石，開始出現第一條裂縫。我將在後文中詳細描述夢想逐漸幻滅的過程，本章將主要講述我在報社的前六年工作。

一帆風順的仕途

報社安排我在米克洛什·吉邁什負責的國內政策部工作。當時誰會想到這個沉默寡言、執著地忠誠於共產主義的人，後來會成為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並且在絞刑架上壯烈犧牲？我剛剛進入報社時，所在的部門召開了一次全體會議。當時有位同志在工作中出現了失誤，部門必須對他進行嚴厲的批評，但是吉邁什卻不忍心這麼

做，而請求米克洛什·瓦沙爾海伊用他特有的輕鬆快活的語氣，批評這位同志（如果需要的話，瓦沙爾海伊也可以使用非常刻薄的語言）。

幾天後，我接到了報社分配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報社裏買了一輛新車，準備磨合它的引擎，但卻不要讓它空車駕駛出外。當時恰好是聖彼得和聖保羅節前夕，而且因為當年國內獲得大豐收，所以報社的編輯奧茨扎卡爾·貝特勒，讓我寫一篇關於嗖嗖揮動的鐮刀的報道。我從前從未寫過新聞報道，也不曾見識收割糧食的場面，於是我們開著那輛新車出發，到處走走看看，其後我寫了生平的第一篇報道，第二天它就刊登在《自由的人民》上。

自此以後，我的各種作品便不斷在報紙上發表，例如新聞報道、採訪和簡訊等。大約六個月後，我寫了第一篇社論，它刊登在1947年12月的報紙上，文章下方還有我的姓名首字母。這篇社論分析了前幾個月的投資情況。

儘管我並沒有接受過經濟學知識的培訓，但是必須要承認，我對經濟問題非常感興趣，而且希望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報社裏也有專門負責經濟報道的工作人員，他們都集中在國內政策部。

大約兩年後，我被提升為報社經濟部的負責人，同時彼得·肯德也被提升為外交政策部的負責人。那年我們都是21歲，黨齡也有三四年了。當報社的編輯馬頓·霍瓦特、奧茨扎卡爾·貝特勒、米克洛什·瓦沙爾海伊和蓋佐·洛松茨基，向總編輯尤若夫·雷沃伊建議提升我和肯德時，他憤怒地回答說：「你們究竟在想什麼？打算把報社變成幼兒園嗎？」不過，最終他還是同意了他們的建議。

儘管雷沃伊對我的提升並不滿意，但是當馬克思的《資本論》被譯成了匈牙利語後，而他發現我是少數讀過德文原版的人時，便把評論這部譯著的任務交給我。

1949年我被送往黨校，黨內的高級幹部都在那裏接受馬列主義的深入培訓。由於我是《自由的人民》的常駐代表，於是能夠參加共產黨最高經濟機構——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各種會議。該委員會的主席是艾爾諾·格羅，黨委書記則是伊斯特萬·弗里斯。經濟委員會負責討論所有重要經濟問題，並以提案的形式，交由政治局投票

決定。有機會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會議，是莫大的榮譽。同時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認同，兩次獲得政府獎勵。

1952年，報社委派我全程報導黨和政府代表團，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正式訪問。報社選派我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得心應手地把有關的報道，由德語演講翻譯成匈牙利語。而另一個更重要的考慮，則是出於對我的完全信任。任何與馬加什·拉科西和艾爾諾·格羅同乘一輛火車的人，都必須完全可靠。

這促使我開始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那個時期，我為什麼能夠脫穎而出？當時我從來沒有與任何一位上級談論這個問題，不過現在我會努力尋找答案。我暫時不想從我自身找原因，而是留在後面才詳細討論。我希望在這一節裏，說出上級的用人標準，並且用現在我對社會主義的普遍理解，來解釋我的個案。

在共產主義制度裏，官員的任命、升遷和免職，主要取決於兩個標準：一個是對黨的忠誠，另一個是個人的能力。顯然，其它許多因素也是上級權衡時的參考標準，但是以這兩個標準的影響力最大。上級在挑選職位的人選時，需要根據職位的要求，考慮候選人是否具備最低限度的忠誠，但是當候選人缺乏某些必要的才能時，卻可以透過更加忠於黨的忠誠來彌補其不足。反之亦然，出眾的才華，也可以彌補政治覺悟的欠缺。當然，如果候選人在兩方面都非常突出，那麼他獲得快速升遷的機會便越大。

經濟學家閱讀這本書時，會發現如果把決策者的雙重標準，繪製成一個無差異曲線，共產主義體系下的官員選拔情況，便會一目了然，而曲線的兩個變量，就是對黨的忠誠度和個人能力。平行的無差異曲線愈高，便愈可能獲得更高的職位。因此部長的無差異曲線，顯然要高於下屬各部門領導的曲線，而總編的無差異曲線，則高於實習記者的曲線，以此類推。各個國家與各個時期的無差異曲線，均有所差別。在先前的革命時期，選拔人才時更加看重的是忠誠，而到了技術專家官員執政時期，能力相對更受重視。無差異曲線還隨著領域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例如大學學術領域的無差異曲線，與政治領域的無差異曲線，就存在顯著的區別。所有範疇裏的

無差異曲線的共性，都體現在選擇標準的雙重性上。

無論在雷沃伊發表所謂「幼兒園」的評論之前，還是之後，我在忠誠和個人能力兩方面的評價無疑都很高。就能力而言，我幸運地把中產階級的博學（其中包括家庭環境為我培養出來的語言能力）和積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結合起來。我能夠迅速組織起語言，用匈牙利語精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且人們很快發現我與同事的相處，也非常融洽。我有能力引導受訪者，無拘無束地發表他的看法，我並且能夠邀請高層人士接受訪談。後來我負責報社的國內政策部時，也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

此外，我在具備這些能力的同時，也虔誠地忠實於黨。那些了解我的上級，認識到儘管我有著「上層資產階級」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但是我卻不折不扣地完全認同共產主義理念。報社考慮把我提升為責任編輯時，有一位編輯曾經與我共事，他就是後來擔任《文學新聞》（*Irodalmi Újság*）主編的捷爾吉·內梅什。他較我年長十五歲，有著出色的記者工作經驗，風度翩翩，文采斐然，而且還具有經濟學學位。為什麼報社會挑選了我而不是他呢？且不論當時同事私下給我透露的小道信息，僅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我也相信這是因為他們更加信任我。在報社領導的眼裏，年輕和經驗不足是巨大的優勢，而絕非缺點。由於我年輕和缺乏生活經驗，因此更容易被愚弄。我絕不會對黨產生任何懷疑，而是堅定不移地把自己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

我的動機

我在上文講述了領導對我的看法，現在我想寫一份「內部」報告，來記錄我當時的經歷，我會盡可能避免把自己現在的看法摻雜進去。這一節主要關注的，是我當時的想法和感覺。

當時，我所有的言論和觀點，都是發自內心，並源於我的**信念和信仰**。我毫無保留地信奉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我相信黨的每句話，甚至每個詞語，都正確無誤。我對黨有充分的信心，而且對於這種觀點深信不疑，即黨代表著真理、純潔的道德，及其為人類服務的信

念。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對斯大林或拉科西的尊敬和敬仰，會被定性為「個人崇拜」。而且由於我認為，他們的著作和演講中的邏輯推理和論證過程，令人心悅誠服，所以這進一步增強了我對他們的信心。

把統治共產主義體系的官僚機構，捆綁在一起的力量之一是**恐懼**。可以說在那些年裏，我從來沒有在某個時刻感受到這種恐懼。我確定那些被捕或被審訊的人，一定是有罪的。後來當我逐漸認識到真相，和朋友討論拉西科執政時期的恐怖氣氛時，許多人根本不相信，我當時居然絲毫沒有察覺到恐怖統治的跡象。儘管這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事實的確是如此。導致我如此麻木的，並不是因為我對政治漠不關心，或者只是埋首忙於自己的事情，我的盲目和自我封閉，使我對殘酷的現實一無所知，這一點讓我深深地感到自責。

我只曾到過一次位於Andrássy街60號的國家安全局（ÁVH）總部。我並不負責和國家安全局聯繫的工作，但是那次，我必須向那裏的一名官員，了解一樁生產犯罪案的審判情況。我根本不知道那裏會使用嚴刑逼供，或者強迫清白的人承認莫須有的罪名。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也會被抓到那裏。

我在黨校學習時，聽說當時的外交部長拉斯洛·勞伊克及其同黨，被捕入獄。學校簡要地向我們通報了政府對他們的指控——陰謀顛覆匈牙利政府。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公告，也沒有懷疑這些指控可能並不真實。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有如遭到電擊一般。我認識的許多人，在那一年或後來幾年裏，陸續被政府逮捕，並且遭到誣告。我很確定自己不會遇到任何危險，儘管後來事實證明，能夠保護我的只是好運而已。那時我原本可能像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在沒有任何確鑿理由的情況下，被逮捕起來。最近我有機會查閱某些國家安全局的絕密文件*，才知道《自由的人民》的一名告密者，確實以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指控了我。[1]

---

* 不幸的是，據說1956年以前的國家安全局的大多數檔案，已經被銷毀——或者說，至少我無法再查閱更多相關文件。就我所知，應該還有其它指控我有罪的報告。

當我了解當時許多駭人聽聞的真相後，再回顧那段歲月時，我經常感覺自己當時就像個夢遊者。我充滿自信地爬上離地面幾層樓高的窗臺，卻絲毫不擔心自己可能會掉下去*。

許多共產黨幹部都被**權力欲驅使**。讀者可以感受到我寫作這本自傳時，秉承了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我嚴格地進行了自我反省，認為自己從來不曾產生攫取權力的念頭。這種欲望與我的性格格格不入，而且在後來的年月裏，也沒有改變。我從來沒有對上司獻媚，也沒有指望通過「拍馬屁」來獲得提攜。

不過，當時我和報社的同事，毫無疑問存在著《自由的人民》工作人員所特有的傲慢情緒。我感到我們就是「黨的聲音」——我們的語言比其他記者，更有價值，也更重要。我在與同事、熟人或陌生人談話時，總是保持著謙遜的態度和語氣，盡量不流露傲慢的情緒，但是這種外在行為，卻隱藏著深刻的思想根源。憑藉著我們的馬列主義知識，及我們對《自由的人民》的定位，我們相信自己不可能犯錯，因此才會有如此深刻的傲慢情緒。†

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享受的**特權**對我有何激勵作用，不過我們的確在物質方面，較普通百姓享受到更高的待遇。

我21歲時（這在當時來說，算是很年輕的獨立年齡）從家裏搬出來後，自己住在報社分配給我的「福利房」裏。那是一套小型公寓房間，我從政府遺棄的財產委員會的倉庫裏，挑選了沒有品味的傢具。1952年我與《自由的人民》的記者泰雷茲·洛基結婚後，準備迎

---

* 我在閱讀特蘭西瓦尼亞學者艾爾諾·加爾的自傳前，一直認為用「夢遊者」來比喻這種奇怪的盲目、閉塞的狀態，是我自己發明的獨特術語。加爾也使用了同樣的比喻，如：「放棄所有個人的獨立方法，堅持完全不加鑒別的立場……當時我的思想和行為框架，可以被比喻成某種『意識形態的夢遊症』。」

† 自那以後，我經常遇到這種「神童現象」——一種自信的學術傲慢，例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匈牙利政界中的青年才俊，和體系巨變後到東歐國家工作的西方年輕顧問中，這種現象屢見不鮮。當我回顧自己的青年時代時，我認為在這種「神童現象」裏，缺乏生活經驗無疑使得年輕人過分自信，而且極易受到極端學術的影響。

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報社分給我們一套更大的福利房——在環境優美的Rózsadomb區的一套三居室。我們用自己的積蓄，簡單地裝修了房間，然後添置了一些廉價傢具——它們大多是大批量生產的傢具，質量低劣，而且看起來非常笨重。

《自由的人民》記者的工資，高於其他報社的記者，但是差距卻不大。我在報社裏被提升為部門負責人後，才有資格進入總部機關幹部，享受到度假勝地度假的福利。我在報社工作的九年裏，一共四次出國，每次都要停留一段時間，但是幾乎所有時間都花在工作上。其中三次是往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次是往維也納（那時我剛到報社沒多久）。到維也納出差時，我有一次特別難忘的經歷。那次我幾乎沒有抽出時間遊山玩水，我從差旅費用裏擠出一部分金錢，一面受著良心的譴責，一面給母親買了幾雙精美的長絲襪。我記得當時是在一間帕瑪氏商店裏，購買這些絲襪，一位穿著綠色制服，而且非常和氣的女士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受到內心強烈的譴責，感覺共產主義記者，不應該到這種地方花錢。儘管如此，我還是節省餘下了一部分差旅費用，並把它全都上交給辦公室。毫無疑問，到了卡達爾執政後期，那些挖空心思貪污差旅費用以中飽私囊的人，一定會嘲笑我這種幼稚的清教徒主義。

《自由的人民》報社、出版公司和印刷廠，有一間職工食堂。儘管那裏供應的伙食並不豐富，但是在其他人面臨嚴重糧食短缺的時期，我們食堂的供應，還算正常和充足。我們額外享受的另外一項福利，是到Kútvölgyi醫院看病。當時人們開玩笑，說我們能享受到所謂的「3K」特權，即到凱克須峰（Kékestetö）度假，到Kútvölgyi醫院看病，及享用由黨組織支付相關費用的Kerepesi街墓地。

由於當時政府決策者，和教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老師，廣泛宣傳「按勞分配」的原則，所以我認為自己有資格享受這些物質福利，而從來沒有感覺自己獲得過多額外的特權。我的童年生活衣食無憂，因此和那時的生活比起來（或者與西方記者的生活相比），我在《自由的人民》的生活算是相當清苦。在盛行「大鍋飯」的社會裏，這些福利被稱為特權，僅僅因為我們的生活水平，略

高於普通民眾而已。

與其說我在生活中處處享受特權，不如說我的生活像苦行僧一樣。我們偶爾會去聽歌劇和音樂會和戲或者拜訪朋友，但是大多數時間裏，都是一心撲在艱苦的工作上。

在報社的辦公室以外，我幾乎沒有自己真正的生活。1952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加博爾誕生時，我正在值夜班。毋庸置疑，我認為妻子生孩子，並不是可以不上夜班的藉口。我不停地給醫院打電話，但是直至第二天清晨，才趕往醫院看望加比(加博爾的暱稱)。無論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還是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時，我的同齡朋友和同事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放棄「職業黨務工作者」的工作，開始像普通大學生那樣生活？我從未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我早已毫不猶豫地準備好自己的答案。沒有什麼比堅守黨分配給我的陣地更重要。其他許多黨務工作者，也沒有大學學歷，但是照樣能夠出色地完成他們的工作。

幾十年後我在美國大學執教，每當我回顧過去的歲月時，總會羨慕地看著我的學生。我們曾經在節奏快速的工作裏疲於奔命，丟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而他們卻可以趁著青春年少，無憂無慮地學習，為未來作充分的準備，並且享受生活的樂趣。

我在《社會主義體制》一書中，探討了影響權力的凝聚力和幹部的動機的因素，這些因素，同樣適用於描述我自己的思想狀況和動機。信念與信仰、權力欲、恐懼和特權，對於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效力。就我而言，我的主要動機是其中的第一個因素：信念與信仰。我並不是想說我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平庸，但是認為我在這方面特立獨行，或者與眾不同的想法，同樣也是錯誤的，其他許多人也受到這些因素的激勵。

報社的生活

在這個章節所描述的年代裏，匈牙利經歷了劃時代的變革。我進入報社工作時，匈牙利還是由聯合政府執掌政權，其它黨派都有

自己的報紙。但是共產黨擊敗了與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在當時佔領匈牙利的蘇聯的鼓動和積極幫助下，共產黨完全壟斷了國家權力，建立起極權統治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的人民》也不再是真正的競爭對手。從政治角度來說，它成為了唯一的「官方」報紙，即共產黨宣傳的主要喉舌和工具。匈牙利國內的所有黨政機關，都訂閱了《自由的人民》，而且它是所有黨員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必讀報紙。

我在前文一再強調，這本書並不是為了勾勒匈牙利政治和社會歷史的輪廓。它不過是描述了個人生活的經歷而已，所以我甚至不會分析《自由的人民》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後幾頁的主旨，更狹窄，也更有限——我嘗試把所有內容壓縮在一幅靜止的圖畫上，描述報社生活的特點和一些事件——特別是與我本人的生活有密切聯繫的一些事件。

在這裏，我強調《自由的人民》傳達了黨的聲音，但它卻絕不是空洞無物的陳詞濫調。總編辦公桌上的電話，經常在早上響起，馬加什·拉科西在電話裏，要麼批評當天報紙上的內容，要麼發布新的指示。同樣格羅或雷沃伊也可能打來電話。有時貝特勒參加了黨內會議後，會根據筆記，向所有責任編輯，傳達黨內領導人給報社的任務。我定期接受共產黨中央經濟政策部門負責人伊斯特萬·弗里斯的指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有兩位上司：報社總編和共產黨經濟政策部門的負責人。其它專業部門的負責人，也同樣受到雙重控制。

儘管我們受到嚴格的控制，但是也並非事無巨細都需由上級決定。上至總編，下至部門負責人，都有充分的決策權。當時這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完全可以決定新聞選材的範圍，或者選登哪些下屬的報道，如今回想起來，那種自由的程度，的確令我感到萬分驚訝。

《自由的人民》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每天上班和下班的時間，都取決於當天的工作任務。在需要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整個周末也要忙於工作。這種工作紀律和犧牲精神，都是不言而喻的——領導不需要強迫任何人工作。我不記得有否任何人因為

懶惰而被批評，也不記得同事之間有否任何恩怨或者在背後互相誹謗（也許我當時對此渾然不知）。我們像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同志一樣，組成了戰鬥工作小組。

在報社裏，我結識了一些相知一輩子的朋友。我與彼得·肯德在《自由的人民》共事期間，友誼愈發深厚。有段時間，我和1956年革命的領導人帕爾·勒切伊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我們很快成為密友。他在我的政治思想和學術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將在下一章詳細講述這些。此外，我們還與杜奇——即蓋佐·福尼·尼伊·奧古斯塔·毛伊拉特太太——建立起終身的深厚友誼。儘管事實上她是個纖瘦苗條的女性，但所有人都叫她「杜奇」，意即「胖嬸」的意思。杜奇出色地為《自由的人民》建立起龐大的檔案，並且負責管理。她的公寓雖然狹小，卻塞滿了各種書籍，算得上名副其實的「朝聖之地」。我們一起在報社共事時，經常和其他同事到她的家裏聊天暢談，甚至在1956年革命失敗後仍然如此。*

回顧過去，我發現自己那時一直渴望與下屬建立起較「上下級」更親密的關係，建立起更加友愛的人際關係。

在那間辦公室裏，人們之間的關係顯然取決於個性。我們從奧茨扎卡爾·貝特勒身上，感受到的是共產黨戰士冷酷無情的嚴肅。與他的聰明才智相伴的，是源於高傲的諷刺和冷淡。與此相對的，是瓦薩荷伊表現出的智慧、輕鬆、及善意的諷刺等氣質。與米克洛

* 1956年革命失敗後，杜奇的書架上多了兩張照片：一張是米克洛什·吉邁什的照片；另一張是捷爾吉·沙爾科奇的照片。當時自認為有教養的「城市派」和自認為是「人民代表」而且多半來自農村的另一派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分歧，甚至是無法填平的隔閡。杜奇用自己的努力在這兩個派別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她的朋友包括《自由的人民》的工作人員，後來還包括伊姆雷·納吉的追隨者，即在城市裏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此外，她還結交了聚集眾多「人民作家」的 *Válasz* 雜誌社的編輯和員工。長期以來，她一直是該雜誌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編輯捷爾吉·沙爾科奇及其妻子瑪爾塔的密友。瑪爾塔後來不僅成為 *Válasz* 雜誌的編輯和贊助人，而且更成為它的凝聚力的來源。杜奇於1988年去世。

什談話，是學術上的享受，因為他明辨是非、風度翩翩，而且分析能力出眾。

我對經濟問題的理解

我從來沒有學過專業的經濟學，或者從經濟學老師那裏，學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表面的運作原理。我所學到的經濟體系運行的第一課，來自於在《自由的人民》報社工作時的親身體驗。

我後來出版的專著，把這種經濟體系稱為「經典社會主義體系」。我在新聞工作中，對它的運作過程，積累了廣泛而豐富的經驗。我在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會議時，有機會近距離仔細觀察經濟管理的極端集中，了解其意思是什麼。例如，在市場經濟中，下一年的生產計劃，取決於上百萬個獨立市場參與者的目標。而在匈牙利，這一切都取決於艾爾諾·格羅，共產黨賦予他管理經濟運行的絕對控制權。黨中央和相關政府機構，為他的決策提供建議，有時可能提供多種備選的建議，但他的決定就是會議的最終決定。我發現他冷酷、精明、機敏，但卻不善於表達感情。沒有任何經歷證明他是受過良好訓練的經濟學家，但是他記憶力非凡。當人們就經濟政策進行爭論時，他可以準確地引用所有相關數據、信息，以及人們提出的各種主張。這種能力給國家最高領導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而且有力地增強了人們對這位經濟學最高權威的敬仰之情。就我當時所掌握的知識而言，我無法確定艾爾諾·格羅的決策裏，包含了多少專業知識的含量。他的個性及他的語言中所散發出來的自信和認真，深深地打動了我。

我經常有機會與部長、副部長和高級政府官員交談。這些坦誠的專業討論，往往真實地展現了經濟的運行狀態。我還經常到工廠採訪，向廠長、廠黨委書記、工頭和普通工人了解情況。此外，同事根據現場採訪所寫下的詳細新聞報道，進一步補充了我自己通過直接觀察得到的結果。儘管有些受訪者的真誠程度值得懷疑，但是我的確觀察到許多值得注意的現象。

我為這本自傳作準備時，重讀了自己當時寫下的文章，它們讓我回憶起當時最困擾我的難題。為了區別它們起見，我在括號裏，引用了我當時探討這些問題時寫下的主要文章的題目或節選。這些引用的部分，表明我當時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但是我的分析結論完全錯誤，提出的解決方法，也完全不著邊際。例如我已經意識到集中制體系，只有在有紀律保障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效果。顯然人們輕視了計劃的紀律性、工作的紀律性和工資的紀律性。我就這一問題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仍然在錯誤的方向上，徒勞地尋求解決方法。我還不理解績效與激勵之間的關係，而是認為只要清楚解釋紀律的重要性、鞭策人們遵守上級指示，或者要求人們懲罰不遵守紀律的人，以達到罰一儆百的目的，這些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工人實行計件工資制時，不斷降低生產標準，或者虛報工資總額，而且發現工廠負責人，幾乎在暗中縱容這種行為。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自己的文章裏，猛烈抨擊了這種違反工資紀律的行為，並且譴責那些默許這種違紀行為的廠長和黨員。(「我們需要重點強調，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工資紀律和勞動紀律。」我補充說：「如果能夠抵制不合理的漲工資和不必要的加班……那麼開展工作競賽，才能真正有助於完成工作計劃。」)[2]我沒有意識到我們面對的，是公有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官僚們沒有通過所有者(即僱主)和僱員之間的衝突和協商制訂工資水平，而是通過強制性頒布工資定額，來限制工人提出的漲工資要求。

工廠裏顯然存在著浪費和效率低下等各種生產問題。(我有一篇社論的題目就是「經濟效率——勞動競賽的關鍵任務」)。[3]為了尋找相應的解決方法，我在很多文章裏，解釋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並且希望企業的負責人，不要只是致力於提高產量，而是在減低成本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然而經濟和道德激勵，似乎都在刺激他們不斷提高產量。

我當時認為這種問題的根源，在於企業負責人不稱職——他們在組織生產時表現糟糕，責任心不強，而且工人警告他們注意這些問題時，也置若罔聞。有時政府各部委和地區黨組織的中層經濟管

理者，也成為我批評的對象。我曾經指責某些幹部，為了博得群眾的歡心，而不敢表現出足夠強硬，用當時最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漂浮在群眾的船上」(「忍受紀律的缺失，只會使敵人受益。難道堅持執行嚴格的勞動紀律，並且充分利用工作時間，是不被群眾認同的任務嗎？只有在思想落後的工人眼中，這種富有戰鬥精神的領導人，才不受歡迎。」)。[4]換句話說，雖然我找不到其它合理的解釋，但是我非常鄙視這種實際起到破壞行為的解釋。那些不稱職的負責人解釋自己的行為時，不僅漏洞百出，而且缺乏道德，因為他們的解釋，在花哨的經濟術語的掩蓋下，支持了對貌似「破壞者」的企業負責人的無情鎮壓。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是源於體制本身的制度性問題。與此相反，即使在發現這麼多問題和錯誤以後，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制度較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所有困難都是暫時性的。我贊同艾爾諾·格羅從斯大林那裏汲取的觀點，即這些都是發展時期必須經歷的陣痛。隨著制度的發展，我們一定會順利地解決這些問題！公有制的生產率**必然**高於私有制的生產率；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也**必然**高於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效率。我在規範性方法和實證性方法，及社會主義體系必須滿足的要求和現實情況之間，左右為難，我的思想完全處於混亂狀態。

我特別關注工人的這種期望——社會主義企業裏的工人會勤勤懇懇地工作，因為「工廠是他們的」，而資本主義工廠的工人則遭到剝削而敵視工作。這種新的工作關係，促使人們積極地開展勞動競賽、主動要求提高產量，要求並且像斯達漢諾夫那樣，使自己的工作量遠遠超出平均水平。這也成為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主要依據。當時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狂熱地關注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我在一篇社論中寫道：「我們一定要超越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勝利，所以我們必須廣泛引進新技術和新設備，努力通過更加活潑的勞動競賽和斯達漢諾夫運動，進一步提高生產率。」)[5]

由於工作節奏太快，所以我經常從清晨到深夜，都在辦公室裏

忙碌。我已經不再分享到其他人的日常生活。我不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種種不如意，而且幾乎遇不到任何與我工作無關的人。我就像一個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生產上，而不是消費上。儘管我幾乎沒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意識到消費的存在，但是我察覺到供應方面出現了問題，而且人們因此產生不滿情緒。只是這類信號受到壓制，因此我沒有注意和傾聽這些輕微而且遙遠的報怨。我周圍當然有很多人深刻地感受到嚴重的短缺情況，但是他們都克制了自己的情緒，而沒有告訴我真實的狀況。

那時我經常探望母親和姐姐麗莉，她們最多只是偶爾奇怪地暗示我供給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我對此卻充耳不聞。後來我一再追問麗莉，為什麼她們從來沒有公開或真誠地談論這些事情。麗莉說他們害怕這樣做，這並不是因為她們認為我會為此和他們對立，而是因為不希望用這些來煩擾我，因為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如此深信不疑。我根本不可能相信他們的話，那麼又何必為我增添煩惱呢？儘管我們深愛著對方，但是一堵無形的牆，逐漸在我們中間高高地豎立起來。

總的說來，我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觀察上的結論，但是和所有人一樣，我以某些公理為基礎，在自己的頭腦中，整理這些材料，並且利用因果關係，把它們組織起來。這些公理並不是單純的學術理論，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它們由**梅塔—理性因素**組成：信仰、偏見、渴望、欲望和道德判斷。這些梅塔–理性因素，就像忠實的門衛一樣，決定開門放予哪些觀點或印象進來，或者把哪些觀點或印象拒諸門外。當時我內心的這些門戶，並沒有正常工作。我排斥所有可能動搖我的信仰的經歷和觀點。「**認知失調**」理論中所描述的防衛機制，開始產生作用。我壓制了那些與內心深處的信仰格格不入的信息，這樣才能說服自己，相信先前的世界觀正確無誤，從而維持自己內心的寧靜。

如果這些**公理**在梅塔–理性因素的部分作用下發生改變，那麼過去積累的**相同**經驗，將會突然以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新的因果關係鏈隨之出現，並開始支配過去的經驗，我也曾經歷這種重組的

過程。我將在其後幾章中，詳細解釋這段經歷。這個過程就像把鐵屑撒在一張紙上，並在紙下放上一塊磁鐵。鐵屑可以自己擺成某種圖案——但是一旦我們移動磁鐵，鐵屑組成的圖案也隨之發生變化。

我們以另外一個比喻解釋這個現象，荷蘭藝術家M·C·埃舍爾在他的著名作品裏，描繪了從左向右在天空中飛行的黑色野鴨。不過如果從其它角度觀察這副作品，你便會突然發現它們看起來是白色野鴨，而不是黑色野鴨，而且它們在從右向左飛行，而不是從左向右。

很多年以後，我才可以用新的眼光，來理解我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時積累的這些經驗。

思想的空白

我在青少年時期閱讀的大量書籍，在那些年頭幾乎沒有任何用武之地。我可能在某些文章裏，偶爾引用一兩位匈牙利歷史人物的名言，或者被廣為傳誦的經典詩歌，此外再也找不到參考其它任何書籍的痕跡。也許曾受良好教育為我帶來的優勢之一，就是報社將幾位作家分配到我所負責的部門。伊斯特萬·奧克尼和弗倫茨·考林蒂雖然不在報社工作，但是也定期向報社投稿。我與他們的關係非常融洽，我在他們眼裏不只是上級或者是一名共產黨官員，而是能夠與之愉快地談些高雅話題的朋友。他們偶爾會提到對生活條件的不滿。奧克尼比考林蒂更易激動，甚至大喊大叫。但是我認為與我這個經濟記者相比，他們從作家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並不能更早或者更加清晰地比我發現問題。那時他們的觀點，因為我的政治盲目而逐漸被忽略。

我手頭上的書籍，很少不是當代匈牙利作家或蘇聯作家的作品。除了瘋狂地在報社工作以外，我幾乎沒有讀書的時間。另一方面，我比以前更加全面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著作。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因此可以在文章裏，引用其他人想不起的著作，來支持自

己的觀點。

如今回顧那段歲月，我才驚訝地發現我所掌握的經濟學常識少得可憐。我在評論《資本論》的文章中，對當時關於「資產階級」的理論提出異議，但是我的論據，幾乎全部建基於間接的來源：我沒有讀過自己所批判的書籍。其他人也是如此。沒有人教我懂得學術誠實這樣的基本要求，那即是說在批判某個觀點前，必須根據第一手資料來研究分析。我原本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得出這個結論，但是最終仍然沒有做到這點。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說明當時學術水平有多低。我對《資本論》的評論和在黨校的突出表現，吸引了陶馬什·納吉的注意。政府委托他籌組興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大學，他邀請我在政治經濟系執教，但是我謝絕了這份邀請。這並不是因為我對此毫無準備，而是因為我希望全心投入《自由的人民》的工作。

當我在半個世紀後，重讀自己的文章時，如果暫且不談它的內容，讓我感到震撼的，不僅是其中的錯誤和漏洞，還有表現出來的平庸學術水平。

這些文章的文筆非常流暢，幾乎找不到大多數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的通病——辭不達意，但是文章中卻充斥了大量對於社會成就，過於簡單化的讚揚，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個年代裏，無論我發現什麼社會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使用祈使語氣，鼓動人民竭盡全力糾正錯誤。

我的文章有著各種清晰的結構，而且非常注重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這似乎已經成為我的思考方式。然而它們的論證過程都非常無趣，即使在最終結論完全錯誤的情況下，也可能用清晰複雜的方式，對其進行論證，但是我卻沒有在這些文章裏，找到這樣的例子。

無論這些文章是社論，還是時事報道，它們經常都會引用數據，而且有些甚至似乎滿篇都是數據。我肯定自己沒有為了達到某些目的或者目標，而隨意篡改原始數據，但是我記得當時自己沒有經常核實這些數據的來源，或者把準備使用的數據和其它來源的數據，進行比對。人們經常隨心所欲地在自己的文章裏引用數據，有時匈牙利的數據也被進行調整，以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同類數

據，因此這些數據不具備可比性等基本要求。我甚至將總體數據與部分數據，或者遞增變量與狀態變量進行比較。我無法用「沒有人教過我」，或者「沒有人曾經警告我，不正確處理數據所帶來潛在的危險」這樣的藉口為自己開脫，但是如果我當初沒有過分沉迷於自己的願望，而不惜一切代價支持國家的官方宣傳，那麼我原本可以自己發現這些規則。

我寫了大量文章，而且寫作的速度非常快，但最後都流於膚淺。我不需要花五十年的時間，才發現自己的失敗。當幾年後，我離開新聞業，轉而從事學術研究，並且能夠靜下心來花費數周，甚至數月的時間研究一個課題時，我回憶起自己早前的寫作風格，便會戰慄。我開始厭惡新聞業，因為它以草率、匆忙，並且拼湊的方式收集信息後，便把它散播出去。現在我認識到，過份絕對的一概而論，也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當然也有一些記者兢兢業業地對待自己的工作，他們仔細核實自己發布的消息，並且保持了較高的學術水平，但是我越來越討厭這個行業，甚至不願對自己承認，我在這一行裏摸爬滾打了那麼多年。

我按照時間次序瀏覽了自己寫作的文章，但是幾乎沒有感覺自己取得任何進步。與此相反，它們似乎越來越無趣，而且越來越單調。1953年時我25歲，這是多麼精彩的年齡啊！大多數學者都在這段時間裏，完成大部分大學學業，並寫出某些開拓性作品，而我只是整天忙於寫作單調乏味的社論，「吐出」空洞無物的文章，或者幫助那些無法清楚表達自己想法的同事、各部委的政府官員或企業負責人，把他們的想法整理成文章。我的精神狀態，甚至比十七歲創作《白雪下的種子》時，還要荒蕪灰暗。

道德的計算方法

我不想利用這本書，在公眾面前進行自我批評。我的目的，在於描述發生在我的生活中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發展的**前因後果**。如果讀者願意，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評論這些事情。我也

會基於自己的道德，在內心作出評判。我真誠地向所有曾經被我的文章傷害的人道歉，但是行動始終比真誠的話語重要。

許多人把道德的計算看作成加法：即是有些事情是正號，有些事情是負號。把這些事情加在一起，便會達到平衡——如果結果是正數，便會讓人們感到更加欣慰。

事實上，這種加法建立在補償和贖罪的基礎上。有些人認為：「我違反了道德規範，但是可以透過做善事，來努力抵銷罪孽。」這就是我的朋友米克洛什·吉邁什的想法，他的想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匈牙利革命失敗後，他仍然秘密地堅持鬥爭，直到被捕為止。在需要的情況下，他甚至可以選擇死亡，然而，他卻希望為自己在早期政治活動中犯下的罪孽贖罪。*

我尊敬那些在行動上遵循補償和懺悔原則，而不是僅僅流於言表的人。但是我自己卻不認同這種方法，我並不相信人們在一生中的某個階段造成的破壞，可以被其它階段的功績所抵銷。罪孽是無法彌補的，人們作出形式上的補償時，這些罪孽的犧牲者也許已經不在人世，或者這些犧牲者無法從善行中受益。即使他們還活著，即使他們或他們的後輩從這些善行中受益，他們以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能因此得到彌補。

我不僅認識到自己成年後，在第一個人生階段中，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而且我還堅定地踏上了新的道路。我肯定在過去幾十年裏，我取得了很多成就，而且許多夥伴亦從中受益，但是我做這些好事，並不是為了「贖罪」。我會分別計算這些道德範疇的分數，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時的表現，始終保留在這本帳目的另外一個名目下。

---

* 當然，吉邁什是否心懷贖罪和補償的念頭還有待考證。

4 覺醒：1953–1955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結束了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個歷史階段，但同時開啟了另外一個全新的階段。我周圍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的世界觀、觀念和行為模式，也隨之被徹底顛覆了。

「新路線」

蘇聯政治形勢的逆轉，以及領導層更迭對匈牙利的影響，在幾個月後呈現了出來。1953年6月，由匈牙利黨政領導人組成的代表團，被召喚到莫斯科。蘇聯嚴厲地譴責了匈牙利國內非常糟糕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過去馬加什·拉科西，曾因為被稱作「匈牙利國內最擁護斯大林同志的優秀黨員」而歡欣鼓舞，而且他渴望成為執行斯大林命令最得力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領袖，現在卻因為這種熱情，遭到蘇聯共產黨新任領導人的嚴厲斥責。雖然蘇聯剝奪了他獨攬大權的地位，但是允許他保留共產黨總書記的職位和權力。與此同時，伊姆雷·納吉被任命為總理。納吉在1945年的臨時政府中，出任首任農業部長，並指導推行了土地革命。農民都把他視為重新分配土地的大救星而非常擁戴他。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是一位老黨

員，曾經與拉科西和格羅一起流亡在莫斯科。他強烈反對以拉科西為首的黨內多數派，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納吉僥倖逃過了像拉斯洛·勞伊克和雅諾什·卡達爾那樣，分別被處決和監禁的命運，但是他決不是拉科西的親信，也沒有參與政府內部的任何派系。他儀表出眾，語言精準，而最重要的是他同情人民，願意主動接近人民。這使得他在共產黨的領導人中，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匈牙利共產黨沒有對蘇聯的指示提出異議，於是它在六月召開了中央領導會議，通過這項重要決議，隨之成立伊姆雷·納吉政府。納吉在議會發表了就職演講和施政綱領。「六月決議」、「伊姆雷·納吉的演講」、「政府工作計劃」和「新路線」等當時的流行術語，逐漸變成同義詞——它們都指代匈牙利共產黨的後斯大林時代發展計劃。我將盡可能使用當時流行的術語，來簡要總結這個計劃的內容。

- 1953年以前的政策，出現了嚴重錯誤。問題的根源不在於黨的思想，而是使用了錯誤的執行方式和手段。這些錯誤必須得到糾正，但卻不能觸動社會主義體系的基礎。
- 黨的經濟政策也出現了嚴重錯誤。政府對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關注太少。
- 黨不切實際地提高五年計劃的目標，無節制地迫使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加快步伐。與此同時，黨在財產關係方面的立場沒有改變，即是全民所有制仍然佔據主導地位。
- 農業政策出現了扭曲。將集體農場制引進農村的目標是正確的，但廣大農民必須是自覺自願地參加集體農場（即遵守集體農場制的「自願原則」）。
- 黨的某些活動嚴重違反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這種說法是一種黨的宣傳用語，指的是廣為泛濫的公審、拷打、集體逮捕、勞改所，以及其它殘酷鎮壓活動的術語），今後不得再出現類似行為。
- 黨脫離了廣大群眾，因此必須組建包括全體匈牙利人民在內支持黨的領導的人民陣線。

「新路線」計劃中，已經包括了許多後來被稱作「**改革共產主義**」的思想元素。在這個計劃頒布後的幾個月裏，共產黨進一步擴充了它的內容，但是改革共產主義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始終沒有出現。一個是**市場社會主義**，即部分或全面清除中央官僚計劃體系，並用市場協調取而代之（後文將深入討論這個話題）；另一個是「**民主主義**」。我特意給它加上引號，因為這個含意被扭曲的詞語，表達出人們在那個年代裏前後矛盾的意願。從一方面來說，人民在公共事務中有了更多發言權，即他們擁有了「工作場所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和「黨內民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共產黨仍然獨攬大權。後來在共產主義理念的發展史中，人們特別強調了民主主義，例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便提出了建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的口號。

現在讓我嘗試回憶我在1953年至1954年間的思想狀態。

和其他許多共產黨員一樣，我感到斯大林去世，是黨的事業的巨大損失，我沒有預料到緊接著的，會是歷史的轉折點。我認為斯大林的繼任者，一定會像他們在斯大林葬禮的演講中一般，鄭重地承諾堅持斯大林的路線方針。

即使在閱讀黨中央領導會議通過的「六月決議」和伊姆雷·納吉的演講稿時，我也沒有馬上意識到，匈牙利將會發生巨變。我認為「六月計劃」的基調非常溫和友善，但是如果說它搬走了壓在我心上的一塊重石，或者激發了我的高漲熱情，那麼這也全然不符合實際情況。在「六月決議」形成之前，我沒有受到任何殘酷的壓迫，而且我也沒有感覺到當時匈牙利的局勢，因為這個決議而有所緩和。即使黨已經作了決定，那麼我便要以冷靜、並且恪守紀律的方式，認真關注這些決定。黨的路線發生根本性變化，並沒有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僅以蘇聯共產黨為例，它的發展史上，就出現不少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時期。這就是我對這個決議的全部理解。拉科西的個人專政，讓位給另外兩位黨內高層領導人的事實，在我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這些都進一步表明當時我在政治上多麼幼稚和不成熟。

在「新路線」時期，我寫的第一篇文章，與以前的文章，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不同，在於我的文章不再那麼熱情洋溢，而是更加克制、更加客觀。

與前囚犯的談話

許多令我困擾的經歷，終於促使我從幻想中清醒過來。

1954年夏末，我在巴拉頓湖邊的度假村度假時，遇到了剛剛結束多年監獄生活的山多爾·豪勞斯特。早在霍爾蒂執政時期，他就是一名共產黨員。從1945年開始，他擔任了另外一份共產主義報紙《自由報》(*Szabadság*)的主編。我們有時也會一起聚聚，我不僅與他保持著親密的朋友關係，而且一直非常尊敬他。他的女婿是因為1956年大革命，而不幸遇難的烈士蓋佐·洛松茨基。我剛到《自由的人民》報社工作時，洛松茨基是報社的領導之一。我們的交往並不深，但是在人們眼裏，洛松茨基一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黨員。1950年豪勞斯特被捕，洛松茨基也繼而於1951年被捕。後來人們才知道當初拉科西和他的黨羽，曾經想讓他們兩人陪同作為主犯的雅諾什·卡達爾，一起參加公審。政府對勞伊克進行了第一次公審後，並沒有按照計劃進行第二次公審，但豪勞斯特和洛松茨基，卻一直被關在監獄裏，直到政府提出「新路線」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在見到豪勞斯特時，我對他們的這些經歷一無所知。當時我非常平靜地接受了他們被捕的消息，我認為如果黨決定逮捕這些老黨員，那麼它一定仔細核查了他們是否有罪。我從來沒有想過被捕的人，可能是清白無辜，而且我堅定不移地相信黨對他們的判決是公正的。

幾年過去，現在我與山多爾面對面地坐在巴拉頓湖度假村的草地上，聽他平靜地講述著他曾經遭受到的可恥暴行。審訊者努力想讓他承認莫須有的罪名，而且一旦發現簡單的勸說不能奏效，便開始殘忍地折磨他。

政府進行政治審訊時，通常會安排一位國家安全局的官員，專

門負責一名嫌疑犯。負責審訊山多爾的官員是M. M ，他恰好是我從1945年開始便非常了解的一個人，當時我們都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布達佩斯總部的第五分區*。M. M 沒有親自動手拷打年邁的山多爾·豪勞斯特，但是卻命令他的手下在什麼時候，以何種力度來對山多爾施刑。1945年我初識M. M 時，他和我一樣充滿革命激情，而且積極地投身於民主青年聯盟的工作。自那次以後，我再也沒有遇到他，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他絕不是精神病學中所謂的虐待狂。他拷打山多爾·豪勞斯特，不是因為他享受這種殘忍而且野蠻的過程，而是因為這是他日常工作程序的組成部分。他們必須從所有被視為黨的敵人那裏，榨出真相，即使這意味著涉及酷刑和拷打。這裏所說的真相，顯然是指審訊者的上級，已經告訴他們的所謂間諜活動或破壞活動，而這也正是政府懷疑及指控嫌犯們的依據——除了某些完全憑空捏造出來的指控以外，政府的大多數指控，通常是事實與謊言的混合物。審訊官會反復審訊這些嫌疑犯，直到他/她承認這些不實的指控為止。

當這場鬧劇裏飽受折磨的人，親口為我講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時，我不由得感到頭皮發麻。我深知鬧劇裏的另一位主角——那位嚴刑拷打英雄人物的官員——本質並非邪惡。他懷著崇高的嚮往開始踏上生活的征程，所以這場悲劇更加讓人震撼。我感到這些真相，對我觸動最深的，是它讓我意識到這場悲劇，並不是由參與者的個性所造成的，而是源於社會制度本身的致命性缺陷。

與山多爾·豪勞斯特的談話，侵蝕了我心中支撐共產主義信仰的道德基礎。共產黨編造了豪勞斯特有罪的謊言，並且欺騙了我，而我居然曾經對此深信不疑。如果對豪勞斯特的審判全部建立在謊言之上，那麼其他人的境遇應該與此相似。我們生活在謊言之中，而我竟愚蠢地相信了所有謊言，沒有提出任何懷疑。此外，不管情願與否，我自己也曾親手傳播了部分謊言。

---

* 這裏和其它地方出現的M. M. 和N. N. 等不是當事人姓名的縮寫。我將在後文披露他們的真實姓名。

與山多爾·豪勞斯特一樣，我也是一個依靠文字生活的人。儘管我的工作內容有所改變，但時至今日，仍然以寫作為職業。對我和他而言，我們寫下的東西是否真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從我和他推心置腹地談過這次話後，誠實與欺騙、真實與虛假，這些概念便不停地在我的腦袋裏嗡嗡作響。

直至二十世紀，還有人遭到蓄意迫害，無論這種行為出於何種目的，都讓我無法接受。我認為即使對罪犯施暴，已是無法接受的行為，更何況是對無辜的人痛下毒手。這就是一個自認為領導人類進步的政黨的行徑嗎？

自從1947年開始，我便一直負責報道匈牙利的經濟狀況、計劃和生產問題。正如我在上一章曾經講述的那樣，當時我已經注意到一些負面的經濟事件。不過隨後發生的過程，並不像讀者們期待的那樣——對這些經濟問題的分析，讓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計劃經濟或匈牙利的經濟政策，自身偏離了正確的路線。當我的道德基礎轟然倒塌時，過去的世界觀也隨之動搖。我感到在此之前的所有信仰和想法，統統需要進行修訂。既然我的道德基礎並不穩固，那麼我便無法不經過仔細核查，輕易接受那些建立在令人無法接受，而且沒有事實依據的道德基礎之上的思想框架。

我不能說當時大腦中的許多觀念，突然間分崩離析。我必須逐層檢查我的思想結構，並且再三斟酌其中的每一個組成元素。這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從那天起，我用問號代替了共產主義教義中，所有主張和命令結尾處的感嘆號。在此之前，我始終不加質疑地全盤接受這些教義。

幫助我理清思路的討論和書籍

幸運的是我找到了能夠幫助我理清思路的人。帕爾·勒切伊是第一個與我討論「六月決議」和伊姆雷·納吉政策的人。對帕爾來說，主動挑起這種話題，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因為如果用共產主義守則的標準來衡量，他的觀點是完全「反黨的」，不過他完全相信

憑著我們之間的交情，我絕不會做任何背叛他的事情，而且他堅信他的觀點，會對我的思想產生影響。

我們就許多重大的基本政治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秘密討論。帕爾曾經在《自由的人民》擔任農業新聞部的領導，因此非常了解農業新聞部，這個曾經由伊姆雷·納吉掌管的領域中所發生的事情，例如政府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使用暴力鎮壓農民及殘酷迫害富農（kulak）。

勒切伊注意到國內許多人，遭到監禁和拘留，並且將他獲得的相關數據告訴了我，其規模之龐大，讓我感到不寒而慄。我記起一個驚人的數字，那就是斯大林去世時，匈牙利的政治犯已經超過四萬人，而當時國內的總人口還不到一千萬。這個人數中，包括已經被宣判有罪的人、羈押待審的人，及暫時被拘留的人。*這些數字像山多爾·豪勞斯特的親身經歷一樣，強烈地衝擊了我，使我變得更加激進。此時，我不僅認識到不斷提高五年計劃目標的行為，嚴重脫離現實，而且反而會降低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對許多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感觸。那時我仍然認為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計劃中的失誤，而不是制度問題，但是大規模的政治壓迫行為，已經把矛頭指向其它根本性的制度缺陷。

---

* 1953年6月，馬加什·拉科西在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演講時，引用了以下數字：當時被監禁及被拘留的匈牙利人約為45000人（鮑拉特，1999，第42頁）。當時他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屬於高度機密，我猜想這個數字一定是從匈牙利共產黨總部泄露出來的，然後傳到勒切伊的耳朵裏。我沒有找到當時國內所有犯人的**精確**數字。另外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窺視到部分內情的數據，來源於1953年11月內務部副部長拉斯洛·皮羅什和總檢查長卡爾曼·曹科向黨中央領導層彙報的情況（賴納，1999，第24–25頁。當時這些數據沒有被泄露）：所謂的「特赦行動」幾乎涉及到748000人。政府根據相關文件，對所有符合特赦條件的人進行了相應的處理，如將他們從監獄或收容所裏釋放出來，允許他們從政府指定的居住地點遷回原籍，或者終止對他們的刑事訴訟或政治調查。這七十五萬人在匈牙利總人口中佔的比例達到了8%。這個數字的確觸目驚心。

我與勒切伊之間進行的這些重要的討論，促使我開始認真地思考很多問題，為我後來接受米克洛什·吉邁什的學術指引，作好了充足的準備。吉邁什和我談話時，曾經提及1953年6月柏林起義的消息，和消息剛剛傳到匈牙利時的情況，當時我們就這個話題簡單地交談了幾句。在獲悉柏林爆發起義的前幾個小時裏，我根本沒有留意到這條新聞的特別之處，而吉邁什卻注意到了。這件事過去幾個月後，他向我詳細解釋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自從1921年蘇聯的喀琅施塔得起義失敗後，便再也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自發組織起來反對社會主義政權，而這正是柏林人民在努力嘗試的事情。儘管這場起義很快被蘇聯的坦克鎮壓下去，但是吉邁什告訴我，必須留意工人已經開始攻擊工人自己的政權（我不想為吉邁什的話語，強加某種預言意味，但是他預測到從柏林**開始**的運動，總有一天會繼續下去）。

我永遠忘不了米克洛什向我轉述他與雷沃伊之間的談話內容。當時他們正在討論在蘇聯及後來東歐國家的歷史上，為什麼「人民」往往不能與共產主義，站在同一條戰線。雖然如此，共產黨仍然通過強制手段，建立並維持了它的政權，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不惜「mit barbarischen Mitteln」（雷沃伊在這裏使用了一句德語，意思是「使用野蠻的手段」）。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簡潔的話語，它精練地反映出共產主義的救世主精神，和不受約束的馬基雅弗利主義。我感到自己必須與這種教義中的兩個元素一刀兩斷：為了救贖人民而把一種體制強加在他們身上；在救世主似的事業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例如恐嚇、集體監禁和酷刑等。

作為《自由的人民》駐日內瓦的記者，吉邁什經常要在那裏停留很長時間。那裏富裕的生活條件、充足的物質供應、寧靜的生活及資本主義，較諸社會主義體現出來的經濟更具優越性，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他。他繪聲繪色地給我描述了這些經歷。

我在上一章中曾經說，梅格理性的大門可以讓某些思想進入，也可以把某些思想拒諸門外。我結束了多年的學術封閉狀態後，重新開始閱讀大量書籍，事實上準確地來說，我開始閱讀批評斯大林

政策的學術作品。

那時我的思想中，有一半或者說有四分之三，還堅持著共產主義思想。對我當時的思想狀態影響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懷疑共產主義、而且直言不諱地反對它的人——換句話說，不是那些攻擊共產黨的非共產主義者。使我的思想波動最大的，是黨內人士對共產主義的強烈批評。我拜讀了伊薩克·多伊徹研究斯大林的德語著作後，突然開始用另一種眼光審視斯大林的性格和品質。當時我還閱讀了一本從全新的社會主義觀點出發，分析蘇聯共產黨黨史，但是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德文書籍，可惜現在我已經想不起它的作者或書名。

許多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也深深地激勵了我，例如愛德華·卡德爾寫的小冊子[1]。當時斯大林與鐵托的政見不合，並在盛怒下，把南斯拉夫共產黨，從它們的共產黨團體中，驅逐出去，迫使南斯拉夫領導人，走上一條同斯大林決裂的道路（這個團體中的共產黨，都是該國的執政黨）。這些南斯拉夫作家的專著，都出版於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之後，自然眾口一詞地強烈批判了斯大林主義。我第一次從他們的書中了解到這樣的觀點：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與官僚集權制，密不可分，而實現了地方分權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模式，更加健康，效率更高。他們沒有參考奧斯卡·蘭格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研究結果，[2]以及由此於三十年代在西方引發的學術論戰，而是傾向於將集體所有制，與自己獨特的市場協調方式，結合起來，然後用馬克思主義術語對其進行闡述。在南斯拉夫採用的經濟發展方法中，地方分權包括兩個過程：改變建立在計劃指令之上的集權式經濟管理，和引進「自我管理」。後者承諾為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機構和工廠裏的工人管理委員會，提供更多自主權。過去南斯拉夫，幾乎完全照搬了蘇聯的管理方法。南斯拉夫作家抨擊這種管理方法的理由，恰好與我親身感受到的中央集權帶來的消極後果，不謀而合。看起來當時南斯拉夫的意識形態創出新成果——「自我管理」——為追求工作場所民主的匈牙利「新路線」，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模本。

許多曾經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人，都是分階段逐漸與其決裂。第一個階段是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下，殘忍的恐怖統治，但保留了所有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例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壟斷政權)。他們認為斯大林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並且偏離了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現在共產主義必須重新回到這條道路上。在隨後的階段裏，曾經追隨共產主義的信徒，認識到在蘇聯和其它共產主義國家裏，實際建立起來的制度，不僅代表了斯大林的觀點，而且亦代表列寧的觀點，甚至包括馬克思的某些基本觀點。我經歷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幻滅的全部過程，在本章所描述的那幾個月裏，雖然我已經開始深入探索某些問題(如中央集權和市場)，但是我仍然處於第一個階段，即反斯大林主義階段。

第一次「反抗」

在我的思想和世界觀中逐漸發生的變化，開始體現在我的行動中。過去我一直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地服從黨的命令，原因並不是我害怕共產黨。而自從心中的信念開始動搖後，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嚴格地遵守紀律。

過去黨中央主要通過伊斯特萬·弗里斯，向我傳達黨需要《自由的人民》向外發布的經濟政策措施，不過當時黨中央已經免除了他的職務。艾爾諾·格羅本人偶爾會直接告訴我，他對經濟報道有哪些要求。在1953年至1954年的冬季，他便對報社的工作，作出了具體指示。那年冬天，發生了很多嚴重的電力供應中斷事故。在那幾周裏，供電局經常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中斷對工廠和居民住宅區的電力供應。《自由的人民》對此沉默了很長時間，但是到了後來，事態的發展顯然需要報紙發表一些言論。我多次在電話上向格羅彙報了這些事情，他希望報紙用「客觀情況」，作為這個問題的主要或唯一原因。在我看來，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當時我進退維谷的境地：我需要遠離謊言，而且誠實地說出真相。我第一次反對了格羅的意見，而不久前我還對他滿懷敬仰之情。我鄭重地告訴他，我

不會在報道裏，否認電力供應出現短缺的原因，是相關部門錯誤地估算了發電量與日益增長的電力需求之間的比例。此外，負責電力的官員，在沒有事先警告或通知的情況下，便大面積切斷電力供應，而沒有設計合理的電力管理系統，也是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之一。最終這些簡單、而且顯而易見的事實，全部刊登在我寫的頭條新聞裏。[3]

後來我聽說艾爾諾·格羅，以共產主義旅政治委員的身份，參加西班牙內戰，他的無情殘忍，讓很多人都對他心存畏懼。他曾下令處決了幾十名忠實於左派激進勢力的反佛朗哥戰士。如果我事先知道這些情況，一定會有所顧忌，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認識到恐怖統治的可怕之處。但是我與艾爾諾·格羅爭論電力短缺問題時，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值得害怕的事情，也不明白如何用經濟原理，解釋電力短缺問題。雖然如今回顧那段歷史，我認為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第一次「反抗」上級，就是因為嚴重的短缺問題，但是很久以後，我才開始深入地思考短缺這個課題。坦白地說，當時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在真理和謊言之間作出抉擇。

為伊姆雷·納吉的文章寫書評

最初，我是從摯友帕爾·勒切伊的解釋中，認識到共產黨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禮貌性地引用的「黨內團結」，不過是華麗的辭藻而已，其它來源的相關信息，進一步證實了這個想法。事實上，黨內的兩大派別間，一直展開著激烈的鬥爭，那即是馬加什·拉科西和伊姆雷·納吉各自的追隨者。當然所有這類政治鬥爭，也包含著個人因素。經典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在口頭上贊成集體領導制，實際上它是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獨裁統治，同時最高領導人的親信，組成一個小圈子共同參與決策過程。這個圈子裏的成員，互相維護彼此的意見，同時進行勞動分工。然而這個體系中，必然有一個最高領導人，而且所有權力，最終集中在他的手裏。當時黨內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誰是匈牙利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拉科西還是納吉？

不過在匈牙利進行的這場政治鬥爭，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它也是兩種路線和兩個政治計劃之間的鬥爭。馬加什·拉科西希望堅持斯大林主義路線，最多只作少量調整，而伊姆雷·納吉則希望他的六月計劃，得以執行，那即是推動「新路線」所特有的改革共產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兩派的勢力似乎旗鼓相當，而且最重要的是，雙方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敦促者和支持者。

《自由的人民》的部分負責人，一心想堅定積極地支持伊姆雷·納吉的政治路線。如果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這些人是拉約什·費赫爾，山多爾·費克特、米克洛什·吉邁什、彼得·肯德、我、帕爾·勒切伊、蒂博爾·梅勞伊和山多爾·諾沃馬茨基。有誰會想到1956年發生的事件，將迫使這樣一群相互關愛，而且經常聚會的人們，踏上迥然不同的道路？吉邁什壯烈犧牲；費克特、勒切伊和諾沃馬茨基，在卡達爾監獄裏度過了漫長的牢獄生活；肯德和梅勞伊在巴黎，成為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領袖。鑒於我的命運是整本書的主題，我不想在這裏用寥寥數語，概括它的全部內容。最出人意料的，是拉約什·費赫爾的命運發展。他曾經是最堅定地支持伊姆雷·納吉的人，但他很快在1956年11月4日，加入雅諾什·卡達爾的陣營，而且在有生之年裏，一直在卡達爾政權中擔任政治局委員。

讓我們回到1954年夏天我的活動上，我堅定地積極支持「新路線」政策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寫的文章，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與經濟有關，而在這個時期，我多次超越這個範疇，在文章中深入探討其它問題。

1954年10月6日，我在《自由的人民》上，發表了對伊姆雷·納吉新近出版的兩卷著作的長評，其中節選了他在過去十年裏，發表的演講和文章的內容。[4]這篇書評主要是關注納吉的主張，與斯大林主義政治宣傳中，代表性觀點的差異。請允許我從他的文章中，節選出一些能突出反映這種特點的段落：「共產主義者必須停止隨意擺布農民的行為……與傲慢和脫離群眾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對黨內嚴肅的、有意義的，而且持續性的工作的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無物的誇誇其談。……如今有一種『訓練』(我找不到更準確的詞語

來描述這種現象）已經四處泛濫：過分強調表面現象、大肆宣揚、浮誇、有節奏，並且無休止地鼓掌、起立鼓掌表示歡迎，或者提前讓人民學會冠冕堂皇的客套話，來應付領導和媒體，這些無疑都扼殺了人民的積極性。[5]

納吉對農業的看法，與尼古拉·布哈林曾經在蘇聯共產黨內提出的觀點，非常相似。布哈林認為「誇大資本主義的危險」和「黨內大部分成員甚至領導機構厭惡、敵視乃至害怕發展中小農場的生產力」等，都是錯誤的行為。[6]

這些精選的演講和文章片斷，全面準確地展示了伊姆雷·納吉的形象。他是一個不願走出馬列主義學術領域的共產主義政治家，但是願意採用一種，在農民看來比拉科西更加溫和、更加可能實現，而且更加容易接受的形式，來實現共產主義的理念。我的書評，就是力圖生動形象地，向讀者呈現這樣一幅畫面。

其後沒過多久，匈牙利共產黨於1954年10月初召開了中央領導會議，認可了伊姆雷·納吉派的地位。當時我們這些報社的領導幹部，獲得了大量內部消息。我們深知這場勝利，最多反映黨內的權力分配，達到平衡狀態而已，而不能藉此判定伊姆雷·納吉及其支持者，將長期執掌政府。我們認為報社力挺「新路線」的做法，此時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

後來我兩次就這個問題，發表頭版文章。讓我們來看看第一篇文章的標題：「遵照中央領導的指引，在六月道路上闊步前進」。[7]這清楚地反映我在政治上，已經取得一定進步。我希望像伊姆雷·納吉那樣，努力推動黨內的變革，從而繼續完善社會主義體制，為此我不遺餘力地宣傳納吉的觀點。而在黨內鬥爭的問題上，我立場鮮明地站在納吉的陣營裏，同時在自己的文章裏，清楚地闡述這種觀點。

《自由的人民》報社裏的集體叛逆

這時帕爾·勒切伊提議我們，不要僅僅滿足於用文章支持「新路

線」。每篇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都要經過總編奧茨扎卡爾·貝特勒，或副總編伊姆雷·科莫爾的審查，而他們都是拉科西的支持者。在他們的監管下，我們不可能在文章中，尖銳地表明支持「新路線」的立場。勒切伊提議召開一個不同尋常的黨員大會，我們可以在這個會議上，更加公開大膽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可以預見得到的是，鑒於《自由的人民》在黨的宣傳工作中，佔據著主導地位，那麼它的首席記者的評論，必然會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廣泛傳播開來。

勒切伊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起者，而我擔任了其中的組織者。我們事先安排每個人演講的主題，這次會議持續了兩天。[8]拉約什·費赫爾認為《自由的人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坦誠地討論匈牙利面臨的問題。他公開批評艾爾諾·格羅最近演講的內容。勒切伊主要針對「法制」(即反對殘酷的鎮壓活動)，發表了令人激動的演講，希望以此鼓勵政治道德的復興。山多爾·諾沃馬茨基對前幾年黨內出現的違法活動，提出質問：「我們還要等多久，這些違反法律的人，才能對他們的可恥行為做出解釋？」蒂博爾·梅勞伊主要關注真相與謊言的問題，呼籲掀起一場「清洗風暴」[9](這場風暴在兩年後如約而至)。肯德批評了格羅和弗里斯，而我批評了當時《自由的人民》的黨組織領導米哈伊·法爾卡斯。我大聲疾呼：「需要對《自由的人民》的錯誤承擔主要責任的，是報社的黨組織負責人。」報社成員爭先恐後地要求發言*。他們尖銳地評判了黨的領導層，和編輯部裏的斯大林主義者，並要求政府始終如一地貫徹執行六月計劃，防止斯大林主義復辟。[10]

---

* 我在這裏列出了在會議上也發表了批評或反抗言論，但在正文中沒有提及的其他與會者，他們是：伊斯特萬·奧爾馬希、埃米爾·鮑拉日、蒂博爾·高萊、艾爾諾·貢多針、雅諾什·杰奈什夫人、伊洛納·亞索伊、蘇莎·科羅克瑙伊、伊麗莎白·科瓦奇、安德烈·克韋希、加博爾·莫恰爾、山多爾·納吉、瑪麗亞·帕斯托爾、拉約什·西爾瓦希、卡爾曼·陶卡奇、加博爾·陶爾多什和尤若夫·韋特。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批判似乎沒有深入達至問題的本質。我們譴責了那些應當對國內局勢負責的政治人物，及他們的錯誤政策和錯誤決定，但是沒有譴責把這些人推到頂峰，賦予他們無上的權力，並且引導他們作出錯誤決策的體制。不過與會者的道德勇氣，博得了我們的尊敬。所有人都尖銳徹底地批評了仍然在政治局和政府出任重要職位的共產黨領導人（這些人很快便再次掌握絕對權力）。我們很清楚這種自發組織的活動會激怒他們，我們並會為此招致瘋狂的報復。

即使到了今天，在這次大會上發言的記者們，用行動制訂的道德標準，仍然非常值得尊敬，因為他們譴責了謊言和空洞的廢話，要求所有記者都堅守誠實的職業道德，並且忠於事實。

結束報社生活

《自由的人民》的記者開始叛逆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這次會議記錄的各種副本，被複製後廣為流傳（在複印機出現前，這是個非常繁重的工作，更不用提互聯網時代）。我們顯然開創了這種活動的先例，其他許多重要機構，在我們的影響下，也召開了類似的會議。

不久以後，共產黨的權力結構進行調整。拉科西及其支持者，再次站在權力的巔峰上。

1954年11月24日，《自由的人民》的社長，首先因為這次會議被召喚到政治局，遭到嚴厲批評。[11]其後政治局在各種會議上，又多次提到報社的「造反派」會議。到了12月1日，在大會上發言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評。[12]米哈伊·法爾卡斯稱這次會議「對黨的領導人的批評，讓他們難以忍受……而且提出一整套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次在《自由的人民》召開的會議，開創了一個先例：電臺、《自由青年報》的辦公室、Szikra出版社及布達佩斯和德布魯森各大院校……以及作家們都召開了類似會議。[13]馬加什·拉科西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上，進行總結發言時，明確表達了他的不耐煩：「你們《自由的人民》的同志，究竟想做什麼？……首先要

堅決地加強對新聞界和電臺的管理，在必要的情況下，必須採取組織措施。……我們必須要求所有報社，馬上停止對黨過去的政策和活動的批判，並且終止所有無節制的公開批判。」[14]

黨中央派兩名政治委員，進駐報社整頓紀律，然後許多黨組織的負責人，先後到報社來為記者做思想工作。他們希望這些黨員，在報紙上發表公開聲明，撤銷自己先前的言論，但終究沒有如願。這些叛逆者竟然如此死硬頑固，這使得拉科西的手下暴跳如雷。

在這種環境下，我希望不再承擔管理經濟新聞部的責任。幸運的是，當時「編委會秘書」的職位恰好出現空缺，於是我接手了這份工作。秘書是負責報紙出版的技術和管理任務，從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級別較高的職位，而實際上，秘書也不需要自己動筆寫作文章，或者安排同事寫作新聞稿。

與此同時，黨中央辦公廳也開始準備採取所謂的「組織措施」。儘管在黨內的政治更迭未完成前，它沒有作出實質性的決定，但是早在1954年12月，辦公廳便開始著手擬定那些需要被清除的人的名單。[15]1955年3月，黨中央領導層再次召開會議，會上通過了一項與幾個月前剛剛制訂的決議背道而馳的新決議。[16]伊姆雷·納吉被區分為「右傾分子」，而且被開除黨籍。儘管黨中央空洞地宣布1953年的六月決議仍然有效，但是事實上，它卻逐步撤銷了決議的內容，最終回到過去的政治路線上。當時拉科西的聲譽，已經一落千丈，無法獲得絕對多數的支持，但是在與納吉派的角力中，他顯然更勝一籌。

1954年12月，肯德成為第一個被報社開除的叛逆者。我們召開批判大會時，他擔任報社的黨委副書記，負責報社內的各種黨務問題。同時其他兩名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安德烈·克韋希和拉約什·西爾瓦希也被開除，儘管我們不知道黨組織把怒火發泄在他們身上，是因為他們發表的調查報告不合上級心意，還是因為他們在批判大會上的尖銳發言。

4月28日，政治局在馬加什·拉科西的提議下作出決定[17]：《自

由的人民》立即開除所有叛逆者頭目，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在內*。在這裏我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他們以一種「後斯大林主義」的方式，把我們趕出報社。在不久前，這種冒犯黨組織的行為（甚至是情節較輕的冒犯行為），還可能導致被開除的人員，被拘留或者監禁，或者發配到建築工地上幹體力勞動。而這次政府為我們這批「造反者」，安排了新的工作。拉約什·費赫爾擔任一個國營農場的場長，其他人仍然在新聞界工作，他們被分配到知名度較低的報社裏，而且職務也相應降低，我是唯一一個被分配到學術領域的人。

黨組織對我們的工作調動作出最後安排之前，要讓我們先經歷了一個非常屈辱的程序。他們明確告訴我們，我們的新工作取決於「進行自我批評」時的表現。按照慣例，這是被放逐到莫斯科的老共產黨員，返回匈牙利之前必須通過的審查程序。他們必須毫不猶豫，而且不加懷疑地遵照黨的指令行事。對我而言，這是一個使人蒙羞的程序，因為我不得不違心地說些謊言。我不僅是一個犧牲者，而且還要受到道德挫敗感的折磨。如今回顧過去半個世紀裏，自己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我勉強可以安慰自己說，如果當初那幾句謊話，是從事研究工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幸好它們是值得的。但是難道我真的可以對這種兩難的道德抉擇，進行成本–績效分析嗎？

「六月政府計劃」的夭折、伊姆雷·納吉的個人失敗，及我們遭到的報復，完全在意料之中。我們事先已經清楚考慮公開支持「新路線」面臨的潛在風險。正如我剛才曾說的那樣，我們的下場原本可能更糟糕，政府可能採取更加瘋狂的報復手段。當時距斯大林逝世僅僅兩年。沒有人可以預見到，當時還保留著多少斯大林時代遺留下

* 政治局決定開除的人員有：拉約什·費赫爾、雅諾什·科爾奈、泰雷茲·洛基、加博爾·萊納特、蒂博爾·梅勞伊、山多爾·諾沃馬茨基和伊姆雷·保特科。泰里（泰雷茲的昵稱）並沒有在大會上發言，他們把她趕出報社，只因為她是我的妻子。帕爾·勒切伊當時在一所黨校——列寧學會——學習，因此從程序上來說，暫不能解除他在報社的職位。

來的殘忍和野蠻，或者說有多少已經逐漸減弱，甚至消失。儘管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都沒有感到意外，但是我仍然對他們的做法，極其反感。

簡而言之，黨的紀律決議讓我感到噁心。在那幾個月裏，我的思想一直處於幻滅、痛苦和恐懼的狀態中。早前那些盲目的信仰，已經消失得一乾二淨，而且永遠不會在我的思想中復活。我睜大雙眼觀察著周遭發生的一切，讓我反胃的謊言、無恥的誹謗、捏造的證據、威脅、勒索、對反對者進行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用告密者的資料整理出來或真或假的報告，然後利用它故弄玄虛，這些都成為共產主義派系鬥爭中的「常規」武器。如果一個政黨的最高機構——中央領導層——像「牆頭草」一樣隨風搖擺不定，忽而採納某些新政策，忽而完全推翻它，並且極力譴責它，那麼這是怎樣的一個政黨？我希望盡可能地遠離這種玷污。我認為黨員們必須為了真理，堅定地與邪惡的化身展開鬥爭，但是我永遠不想再被牽扯進去。

1953至1955年間，我經歷了政治理念從幻滅到蘇醒的全部過程，同時我也完全喪失了自信。既然我可以這樣被無情地欺騙，那麼我還有什麼能力，繼續培養自己的政治判斷力？如果我能被他們牽著鼻子走了這麼多年而渾然不知，那麼我敏銳的感覺和批判精神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起初，我只是本能地感覺到自己再也不能毫無保留，或者不加質疑地相信任何人，但漸漸地，我把它確定為自己的人生準則。我對任何學術或政治聲明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這是真的嗎？支持某個建議或計劃的論據是否可靠？這些聲明背後是否隱藏著險惡的居心？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我一直自覺自願地嚴守黨的鋼鐵紀律，而現在我決定永遠不再做黨的鬥士。

我在《自由的人民》工作八年後，離開了報社。我只有在1965年10月的一個晚上曾經回去一次（我將在後文講述這段經歷），自此以後，再也沒有踏進報社的辦公樓裏。幾年後那裏辦過一些右翼報紙，而2005年底報社所在的大樓更被徹底拆毀。

5 開始從事研究工作：1955–1956年10月23日

《過度集中》

1955年6月，我開始在匈牙利科學院的經濟研究所工作，從此踏入學術研究領域，為我的生活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

在當時風雲變幻的歷史背景下，我剛剛開始在新的領域裏摸索時，便參與了許多重大事件。政治領域裏日益濃厚的緊張氣氛和權力結構的劇變，已經全然公開，而且隱藏在表面之下的衝突，更為激烈。這些問題都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達到了頂點。

我的學術背景

匈牙利自五十年代初開始，逐漸引進蘇聯式的科研和學術評級體系。在它的學位教育體系中，每個與科研領域相對應的學科（如醫學或經濟學）的初級學位，都是「備選資格」。人們習慣把這個級別，等同美國或西歐國家的博士學位，因為這兩種體系下的學生，拿到這些學位的年齡，大體相近，而且都需要寫出和專著一樣厚的畢業論文，才能夠通過答辯的要求。*

---

* 除了學習內容以外（數學或物理等專業的內容當然大體相似），這兩個學位體系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完成學位論文前學校對學生的學習要求。美國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時，至少要用兩年的時間學習多門課程，在此期間，還要不時參加各種考試，並與許多教授交流，因此他們往往能夠通過這種高強度的學

1953年8月，我申請了備選學位，當年12月，我聽說學校批准了我的申請。西方國家的學生申請博士學位時，應該已經獲得碩士學位。與此相似，匈牙利對備選學位的基本要求，是申請者必須已經獲得大學學位，但是我並不符合這項要求。我曾經在1945年進入布達佩斯大學的人類及社會科學學院學習，當時我主修哲學和歷史。有一段時期，學校允許學生曠課。學生們可以平時不上課，到學期末，才到學校來拿取有教授簽字的成績單，他們還可以延遲參加考試。在布達佩斯大學進修的兩年裏，我也是這類學生當中的一員。由於在報社工作，已經消耗了我的全部精力，所以我放棄通過正常途徑完成大學學業的念頭。我申請備選學位時，經濟研究所放鬆了對我的學位要求。我沒有找人幫我疏通關係，但我猜測那些審查申請表的人，可能考慮到我曾經在報社裏擔任重要職務，才網開一面。1956年，我最終在沒有拿到第一學位的情況下，獲得了寫備選學位論文的資格。

學校安排陶馬什·納吉教授，指導我的備選學位論文。他在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級別，僅次於校長，不過就學術聲譽和實際權威而言，沒有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曾經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匈牙利語，並且擔任政治經濟系的系主任。他是個博學的經濟學家，他的學術成就，不僅限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由於他思路清晰，而且能夠精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聆聽他的演講或他對於相關學術論戰的總結，的確是巨大的學術享受。他不算是創作型學者，而且也沒有留下什麼影響力深遠的重要著作。不過我和其他許多經濟學家一樣，每次回想起他對我的支持和鼓勵，總會心懷感激。

習，高標準地為學位論文做好充分的準備。而在匈牙利，只要「渴望」獲得「備選資格」學位的學生已經掌握大學課程的內容，那麼他們就不用再學習其它課程。按照規定，這些申請者通過幾門資格考試後，就可以寫學位論文，並參加公開答辯。

此外，我需要指出這兩個體系的另外一個不同之處。西方國家的博士學位，通常由大學頒發，而在蘇聯體系下，「備選資格」學位和其它更高的學位，則由匈牙利科學院或其它附屬機構頒發（如匈牙利科研資格評定委員會）。

陶馬什·納吉允許我自由選擇感興趣的研究課題。我對計劃和經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非常感興趣，但是，當時我仍然無法準確地描述自己希望研究什麼，或採用哪些研究方法。

我不費吹灰之力，便迅速通過了寫學位論文之前必須參加的資格考試。我屬於當時所謂的「函授生」，即在堅持全職工作的同時，抽出時間業餘學習的學生。那些可以全心投入學習和論文寫作的學生，被稱作「正式生」。還有一部分學生，在研究機構或大學工作，因此，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與「備選學位」的學習過程，結合起來。大約在1952年至1953年期間，我曾經希望轉而作學術研究，所以兩次請求上級把我調離《自由的人民》。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的請求：「黨需要你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於是我順從地接受了上級的命令。

那麼，當時是什麼原因促使我產生轉換工作的想法呢？當時還沒有什麼政治動機，促使我遠離政治決策的「女巫廚房」，是我產生轉換工作的想法最主要的原因，我開始厭惡報社裏單調的日常工作。新聞業的膚淺性和草率性越來越讓我反感。我並不十分清楚研究工作，究竟包含哪些內容，但是我對它充滿了渴望。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我多次主動要求報導科學理事會的組建和其它重大學術活動，儘管這些都不屬於我的工作範圍。我完全沒有料到科學和學術工作背後，也隱藏著政治鬥爭。我參加這些學術活動的唯一原因，就是學術世界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提出的調動請求被拒絕一兩年後，鎮壓《自由的人民》報社叛逆活動的風暴，仍然餘波未平。有一天米克洛什·吉邁什對我說：「你不適合搞政治，如果從事科研也許能更好些，研究工作更適合你。」時至今日，他說這番話時的情境還歷歷在目。當時我們剛剛參加了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會議，在等候電梯的時候，他對我提出了這些建議。

我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調動工作或轉換工作，但是當黨的高層領導，把我和其他同志從報社中一一開除時，轉換工作的機會於是出現了，而且我牢牢地抓住了它。當時經濟研究所成立的時間還

不長，它的所長伊斯特萬·弗里斯，與我相識多年。早年他在黨中央負責經濟政策部的工作時，經常直接向我傳達黨對經濟報道的要求。由於這個關係，我請求組織把自己安排到他的學院裏。

我剛剛調到經濟研究所時，級別大幅降低。我不僅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擔任重要領導職務，而且更成為學院裏級別最低的工作人員之一——助理。我的工資只有原來的百分之四十*。我在報社工作時，獨享一個寬敞舒適的辦公室，而現在卻只能和另兩位同事，擠在一間辦公室裏。

和我在同一間辦公室裏的同事——彼得·埃爾德什和羅伯特·霍赫——很聰明，但是卻喜歡打聽小道消息。他們對我非常友善，而且熱情地接納了我。我和他們在一間辦公室時，幾乎無法專心工作，因為在那段不同尋常而且動蕩的歲月裏，他們對工作的熱情，遠遠遜於聊天。

思想衝擊

除了和我在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以外，我和學院裏的其他同事，也進行了許多有趣而且發人深省的討論。

1956年初，經濟研究所搬到了納多爾街7號，一座由著名匈牙利建築師米哈伊·波拉克設計的優雅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中（現在它是匈牙利科學院的辦公樓）。陶馬什·納吉是政治經濟系的主任，因此我的行政關係，也落在了這個學系之內。政治經濟系的辦公室都在二樓，其中包括安托爾·馬里亞什的辦公室。馬里亞什非常年輕時，就憑藉著與蒂博爾·利斯卡[1]合寫的關於外貿效率的文章，一舉成名，他後來還擔任了經濟政策系的系主任。貝洛·琴代什的辦公室在我隔壁，再隔幾個房間則是弗倫茨·瓦吉的辦公室。那時他們

---

* 為了彌補工資收入上的損失，我寫了很多書評和文章來賺些稿費。在許多編輯的幫助下我發表了這些文章——但只能以匿名的方式發表它們或者使用筆名。

兩人都是以農業經濟學研究者的身份，剛剛開始研究生涯。後來貝洛成為國家計劃辦公室的副主任，費倫茨成為經濟研究所農業系的系主任。安德拉什·納吉當時也是我們的同事，在進入經濟研究所前，他曾經從事很多不同的職業。他曾經在青年組織裏擔任重要領導，還教授過政治經濟學。勞伊克被處決後，他被貶為一名建築工人，直到匈牙利進入全新的政治時期後，才得以重返學術領域。此外還有羅伯特·霍赫、山多爾·奧維舒茲、弗倫茨·莫爾納、安德拉什·布羅迪——這是我可以列舉出來的許多系裏的著名學者。對於那些了解匈牙利在後來幾十年裏發展過程的人來說，他們的名字可謂耳熟能詳。

我們經常把學院裏的一段走廊稱作「Gyepsor」(即農村裏的貧民窟)*，準確地來說，它是指在那裏工作的一群青年研究員。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團體的人員的組成非常複雜。有些人出身於農民家庭，他們與匈牙利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其他人從出生到死亡，都不曾離開城市。有些人從前從事學術研究，而另一些人卻是經歷了工作上的巨變後才轉換工作，成為研究員。然而，我們仍然在很多方面頗為相似。我們都對斯大林–拉克西式的共產主義體制，失望透頂，希望看到一個更加人性化、同時效率更高的社會主義。我們都對過去冰冷、空洞的經濟研究模式，感到深惡痛絕，因而希望研究**現實情況**。從西方現代學術研究的觀點來看，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儘管我們沒有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的經濟學知識，但是我們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真誠地談論了各自

* 在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將村莊裏最貧窮的農民居住的區域稱為「Gyepsor」。如彼得·維勒斯在自己的著作《在Gyepsor的早餐》中寫道：「Gyepsor位於村莊的邊緣。在Gyepsor之外是無盡的鹽鹼地，上面堆滿鵝糞、豬糞和牛糞，而不是長滿植物。住在Gyepsor的農戶，將鋪在那裏的動物糞便曬乾後，就可以把它們收集起來當燃料。(維勒斯，1997[1939]，第32頁)」我從捷爾吉·彼得里(1998，pp. 200–201)的文章裏，引用了維勒斯的這段文字。彼得里詳細描述了納多爾街上的「Gyepsor」以及他們的群體生活，同時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非常有教育意義(pp. 198–205)。

不同的經歷，或者對政治問題展開辯論，並從中獲得不少靈感。我們一起度過了很多快樂的時光，經常互相開些玩笑——這裏較我以前的任何一個工作環境，都更加友好和熱情。

然而，對於我的經濟學思想構建過程，影響最大的兩股力量，卻與經濟研究所的同事沒有半點關係。

在我到經濟研究所工作前，便見過中央統計辦公室的主任捷爾吉·彼得，但在這個時期，我是通過彼得·肯德，才與他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觸。開始時我們三個人經常一起見面，後來則是我和捷爾吉·彼得秘密地定期開展討論。他也經常到我家裏，但大多數時候，還是我到他那間漂亮、優雅的公寓裏拜訪他。他的妻子——著名兒童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埃米·彼得(即皮克勒)——給我們準備了咖啡，簡單地聊幾句後，便會離開房間，讓我倆可以暢所欲言。

捷爾吉·彼得較我年長二十五歲，是一位資深的老黨員，在黨內頗有名氣。他在霍爾蒂執政期間，被捕入獄的時間長達十年。較他坐牢時間更長的黨員，只有馬加什·拉科西，和另外一位著名的黨內領導人佐爾坦。安德拉什·赫格居斯活靈活現地把他描述為「布爾什維克貴族」。[2]其後有一段時間，赫格居斯在中央統計辦公室工作時，還擔任了彼得的副手。由於彼得個性鮮明、風度翩翩、慷慨大方，而且善於諷刺，因此與大多數死氣沉沉、沒有什麼特點的共產黨官僚，形成巨大的對比。

彼得和我交談一兩次後，感覺到我值得信任，便主動談起他的經濟學觀點。他認為市場——而且只有市場——才是可以有效調節供求關係的機制。為了讓市場正常運作，必須解除對價格的管制。

供應、需求、自由價格、市場和效率——這些是西方國家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在微觀經濟學的第一課中便接觸到的概念。捷爾吉·彼得為我們灌輸的這些觀念，在另一種政治背景下(如在西方學術界)極其普通，但是對我而言，卻幾乎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捷爾吉·彼得坐牢時，曾經得到福爾考什·黑勒[3]編的一本教科書。黑勒是布達佩斯著名的經濟學專業教師，彼得曾經拿到數學專業的學位，他通過黑勒的書，自學了「資產階級」(即非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雖然後來他沒有繼續深入鑽研這個課題，但是青年時代的這段學術經歷，對他的後半生卻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從黑勒的書上學到的理論，在他個人的觀察中，一一得到證實。他定期到日內瓦參加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會議，而且經常給我講述瑞士的真實生活狀況——那是一個穩定、統一、富足，而且商品供應豐富的國家，與匈牙利貧窮和物資短缺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我的所有好朋友中，捷爾吉·彼得是繼米克洛什·吉邁什後，第二個被瑞士的生活情況所震撼的人）。他看到蘇黎世精緻的班霍夫大街上，擺滿琳琅滿目的商品，其品種豐富得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而且那裏的售貨員彬彬有禮。他認為這是證明市場有效性最確鑿的證據。

現在看來捷爾吉·彼得並沒有想到「改朝換代」。他確信他可以在抵制高度集中的指令經濟，並用市場協調作用取而代之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起初他只是在私人談話中提出這個觀點。後來在1954年和1956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概述自己的改革觀點，並為其辯護。[4]他在寫作初稿的過程中，曾與一兩個關係密切的同事，及中央統計辦公室之外的幾個朋友，談論這些問題，其中也包括我在內。當時我嘗試提出自己的觀點，並且動筆寫了其中幾段（特別是在第二篇文章的最後版本中），希望能夠對他有所幫助。我猜測其他人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和作出幫助，但文章的基本觀點，顯然是由彼得首先提出的。*

捷爾吉·彼得在談話和文章中，都表達出他對市場經濟的極度尊敬，這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的支柱之一，是市場經濟將導致無政府狀態。而經濟發展需要通過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解放人性，並且建立秩序。捷爾吉·彼

* 捷爾吉·彼得的觀點與奧斯卡·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驚人地相似，但是我相信與卡德爾（我在上一章提過這位理論家）和其他南斯拉夫作家一樣，彼得當時並不了解蘭格的著作。這位自學成材的學者，通過自己的努力，發現了與蘭格理論相似的概念。

得的觀點(以及他推薦的福爾考什·黑勒課本),使我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的優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我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

除了在學術上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以外,我還和捷爾吉·彼得建立起真誠的友誼。*

彼得的批判性言論和異端經濟學觀點,使他成為保守勢力的眼中釘。1969年,政府以完全站不住腳的藉口,對他展開了政治調查。他被軟禁在房間裏,但不是在家裏,而是在醫院裏。後來一把利刃插在他的心臟上,他就此離我們而去。他也許是因為無法再忍受這種羞辱而自殺,但我們也不能排除謀殺的可能性。†

讓我們再回到1955至1956年期間。我與最親密的朋友彼得·肯德進行了很多深刻的對話,這對於重建我的經濟思想,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我們曾一起逐字逐句地仔細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且為它作注解,從而共同邁入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領域裏。如今,我們以共同離開這個領域的方式,為這個故事劃上句號(我們非常隱秘地跨越這個學術領域的邊界,而沒有讓其他人察覺)。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了多次討論,最後決定用文字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肯德首先動筆寫了一篇名為《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論文,記述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後得到的結果。[5]其後我寫了《論〈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這兩篇文章,成為我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的框架。

我最早用匈牙利語寫這本自傳時,便已經獲得彼得的這篇文

---

* 捷爾吉·彼得經常非常熱情地幫助我,譬如從1956年起,他就經常從西方國家給我帶回來許多經濟學著作,還幫我和移居國外的朋友互相傳達口信。我在其它文章裏,更加詳細地介紹了捷爾吉·彼得(1994c)。

† 在1994年召開的紀念偉大改革派經濟學家的會議上,律師山多爾·尼里披露了當時政府對捷爾吉·彼得死因進行刑事調查的過程。他指出調查者檢查死亡地點時,犯了許多嚴重的專業錯誤,如屍體被隨意移動,許多重要的細節都沒有被記錄下來等等。因此,如今我們根本無法確認他的真正死因(尼里,1944,第45–47頁)。

章。早年他流亡國外時，一直將這些文章帶在身邊，後來他交給了我。那時我一直以為我的《論〈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已經丟失，但就在這本自傳的匈牙利版出版後，而英語版還未面世的期間，這篇文章的副本意外地出現在我面前。*

重新閱讀五十年前所寫的這些文章，讓我心潮澎湃。單是它們的長度，便已經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兩人充滿激情地投入到寫作中，我們用嚴謹精緻的框架結構，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們精心準備這些文章，就像是給最有名望的出版商投稿一樣，儘管只有少數人傳閱了我們的文章。

就觀點的成熟性而言，彼得在批判馬克思主義方面，顯然領先我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提出質疑時，我還在努力為它們辯護，並且多次與彼得爭論它們的正確性。現在我已經無法確切地回憶起當時我的思考方式，怎樣發生了徹底的轉變，但毫無疑問，我一定較彼得多花費了好幾個月，才改變了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

我們還尖銳地批評了馬克思主義在其它方面使用的許多定理和方法論。彼得簡要地談論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看法；而我的文章中，有一半也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希望把所有無法在備選學位論文中表達出來的觀點，全都傾訴在這篇不能公開發表的論文裏§。我的首要目標，是為自己和最親密的學術夥伴，闡明正在創作

---

* 帕爾·勒切伊將我這篇文章的副本，收錄在他保存的文件中。1955年我將這個副本送給他，2006年1月他把它還給了我。

† 彼得的文章打印出來有七十二頁，而我的文章更長。

‡ 後面的腳注提到了1956年末和1957年初我與山多爾·費克特就這些問題展開的討論。當時距這篇文章完成已經有六到八個月，而且我已經徹頭徹尾地厭惡馬克思的價值理論。

§ 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有一些我後來才逐步提出的觀點在當時這篇論文中已經初具雛形。例如，這篇文章裏有幾頁專門討論了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的問題，當時我將其稱作「躍進」。十五年後，我出版了一本探討這個問題的英語專著時，也使用了同樣的詞語來描述這種現象。

中的畢業論文的理論背景。

後來事實證明這兩篇非法傳播的文章，並沒有僅僅在少數忠實的朋友手中傳閱。政治警察的檔案室裏，也留下了它們的記錄。1958年山多爾·費克特被捕後，在審訊中親手寫下的供認狀，當中詳細報告了我和其他十個人的情況。其中第二點專門提到我與肯德的這兩篇文章，稱它們「顛覆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原理」。[6]費克特給文章的這個特點加上引號，然後繼續寫道：「我第一次從吉邁什那裏聽到這篇文章，吉邁什高度讚揚了它。後來在1956年底，科爾奈給我看了這篇文章。」*

雖然當時我們已經相當抗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對與之對立的理論，幾乎一無所知。這個過程絕不是拒絕一個理論，然後接受另外一個那麼簡單。我們像巴倫·明希豪森一樣，揪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從馬克思主義的泥淖中拖了出來。讀者可以從這兩篇文章中，察覺到我們在批判馬克思主義觀點時，仍然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詞彙（如價值與使用價值等）。我們努力通過交談和文章，來說明我們為何放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以及我們希望從真正科學的經濟理論中得到什麼。

在1955年這篇文章的結尾處，我寫下了這段文字：「短跑運動員衝刺前往往會把胸挺起來，因為這樣可以幫助他跨越贏得勝利所需要的最後一英寸。然而，對於長跑運動員來說，他們就完全沒有必要這樣挺著胸往前跑——因為這只會讓他沒有必要地浪費氣力。」這真是精彩而形象的比喻——遺憾的是，後來我完全忘掉了它，所以也沒有在出版的英語專著裏用到它。

* 費克特在供認狀的第五點裏，稱他曾經給我看他研究「匈牙利」的文章。他在供詞裏這樣說道：「有一次科爾奈參加在我家舉行的聚會時，表示他不贊同這篇文章中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歷史唯物主義像宇宙科學的組成部分一樣，屬於普遍真理（如開普勒的天文學理論）。他比以前更加強烈地宣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從一開始就並不完善。」（我引用了他的原話）五十年的歲月轉瞬即逝，如今當我讀到研究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談話竟然成為警察眼中的罪行時，心中湧起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會在下一章再次談到山多爾·費克特的供詞。

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徹底決裂

我已經多次強調與彼得·肯德的口頭及書面對話，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們幾乎同時構建起新的經濟和政治觀點。但是在後文裏，我必須回到第一人稱單數的敘述角度。現在我很難回想起，我在1955年至1956年間的生活情況，當時我剛剛踏入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同時正在經歷一場持續數年的情感和學術重建過程。如果我連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都很難說清楚，那麼顯然更不能描述其他人在這方面的變化，即使對肯德這樣與我親密無間的摯友，也是如此。

批判馬克思主義教義的文章，今天已經不計其數。其中一小部分（雖然其數目仍然非常龐大），利用科學的客觀性和深刻的分析，剖析了馬克思主義*。我對它們沒有太多可以補充的內容，我也不打算在下文用簡單的幾句話，來反駁馬克思主義。比起批判馬克思主義，我把重點放在描述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破滅的過程，希望這種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能夠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那麼就我個人而言，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事實，背後隱藏著怎樣的邏輯主線呢？

我在第四章敘述了我的思想變化，最早產生於目的層次，而不是理性層次。當我認識到自己被謊言和暴行包圍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隨之動搖，我的世界觀的道德基礎全盤崩潰。

如果我們借用地質學概念，把道德基礎比作最深的地層，那麼在理性範圍內覆蓋在它上面的地層，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標榜自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明確地與不科學的社會主義觀念劃清界限，並且斥責後者幼稚可笑，認為它只是烏托邦式不切實際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學說中，宣稱自己代

---

* 例如當時我閱讀了偉大的匈牙利經濟學家歐根·馮·龐巴維克寫於1896年的著作《龐巴維克的馬克思批判》（1975[1949]）。它令人信服地分析出《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間的自相矛盾之處。

表了研究社會和理解其知識體系的科學方法。

我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的原因，就在於我確信馬克思主義，恰巧在這方面缺乏紮實的基礎。我逐漸意識到，當我開始闡明這些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時，我的出發點就像一個搖搖欲墜的高臺一樣，並不可靠。迄今為止，哲學家們在探討「科學的」這個術語時，仍然沒有就很多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例如什麼樣的表述，才可以被稱作「科學的」表述，或者怎樣證實一個表述的真實性。此外，這也不是我這本學術自傳力圖解決的問題。我想做的，只是努力展現我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

在1955年前，我一直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術大廈的密閉性，及其透明的邏輯結構，可以充分證明它不僅不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具備較強的邏輯性，而且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當我的心中充斥著幻滅和懷疑的情緒，並且開始修正自己的理論信仰時，我決定選擇另外一種研究方法，並且日益堅定了這種信念，即是把理論與現實互相比較。被欺騙的痛苦經歷，進一步突出了這個方法的重要性。「價值理論」如何與真實的物價產生聯繫？怎樣用「貧窮化」理論，來解釋生活水平的歷史發展趨勢？「資本主義危機理論」是怎樣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商業周期變化？如果將「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與實際的社會分層和社會衝突進行比較，會得到怎樣的結論？在進行比較的過程中，我發現使用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僅表明馬克思主義在解決以上問題時，絕非「靈丹妙藥」，而且它更根本沒有切合現實。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是，馬克思本人和他後來的信徒，都不認為自己的首要學術責任，是使用學術研究的基本標準，來衡量自己的理論，即實踐檢驗理論。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唯一犯下這種錯誤的社會科學流派，但是在1955年至1956年間，我一直在努力呼籲馬克思主義滿足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即是把理論與現實世界進行比較。

當然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用事實檢驗社會科學理論的任務，的確要比實驗科學困難得多。後者可以更加輕鬆地用精確的統計數據證實理論假設。不過雖然用實證研究證明社會現象的工作，受到很

多限制，但是這個領域裏的研究者，必須竭盡全力地檢查他們的論斷是否符合實踐，即憑著自己的良心，盡可能用當前最有效的方法比較理論與實際情況。一旦他們發現自己的理論，從根本上背離了現實，那麼便必須著手修正理論，或者在不可能進行任何修正的情況下，徹底地拋棄它。

我們不妨接著用前面的地質學理論，來打比方解釋這種現象：大量錯誤的理論命題，沉積在錯誤的科學理論和方法論構成的地層上。由於提出這些理論的人，沒有自行或者請求他人完成用實踐檢驗理論的工作，因此其它錯誤的理論，才會一層層沉積在最下面的地層上。作為一種早已過時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原則像滅絕已久的物種發生石化一樣，反而經歷大浪淘沙的歷史過程而殘存下來。即使馬克思的仰慕者，被迫承認某些馬克思主義教條是謬論，他們仍然指責這位大師的學生們，沒有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才導致那些仍然被他們視為真理的教義庸俗化。事實上，馬克思引導他們（以及我們）逐漸習慣了一套糟糕的思考規則系統。

讓我們繼續用地質學比喻來解釋這種現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的信徒，把「**價值理論**」看作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而這正是我將要簡要談到的第二層地層。

我在開始研究經濟學後，才逐漸了解為什麼社會主義的資源分配體系，往往不盡如人意。在這種經濟體系裏，人們幾乎無法解釋價格的功能。馬克思顯然沒有事先說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必

---

* 我感到使用這種地質學比喻將我置於一種尷尬的處境。我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使用了馬克思主義者最熱衷的慣用表述，即將「更深層」的本質與表面現象進行比較。不過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哲學家，在描述人類的思想和思維等問題時，也會用離表層較遠或較近的地層來進行比喻，以說明自己的觀點。想到這一點會讓我略感安慰。我進行深入觀察後得到的結論之一，是我認為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的許多觀點，仍然具有可操作性和啟迪性（我會在後文反復提到這個結論）。因此，雖然馬克思主義者經常使用這種地質學比喻，但是我絕不會因噎廢食而放棄這種形象生動的講解方式。

須實現哪些功能，但是至少應該在他的著作裏，闡明資本主義制度下價格所發揮的作用。僅僅提出這些問題，就足以讓我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未能為它們提供答案。他的著作經常提到「競爭」定價的概念，但是如何實現「競爭」定價？《資本論》的第一卷廣為流傳，它的主要論點（即勞動是價值的唯一創造者），就是典型的無法被驗證或被駁斥的命題——換句話說，它是非科學的。此外，我們也沒有辦法通過嚴謹的演繹方法，從第一卷的主要命題，推論出第三卷的思想體系。在第三卷中，剩餘價值按照一定比例，從資本「轉化」成平均利潤。這裏提出了一些可以被驗證或被反駁的命題，但是卻嚴重背離了現實。由此推斷出來的利潤產生理論，根本無法解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哪些因素可以產生利潤。簡而言之，我斷定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並不適用於現實情況。

其它馬克思主義經濟命題，層層沉積在上文曾經討論的這些地層上。僅以其中的一個命題為例：「**工人階級貧困化**」。與前面的命題不同，馬克思並沒有通過演繹推理得出這個結論。只要人們接受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平均利潤理論、生產價格理論及《資本論》中所有其它輔助理論，那麼無論體力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下降、停滯、相對上升（將其與其它群體比較）或絕對上升（考慮到生活水平的長期變化趨勢），他們都會贊同馬克思的觀點。而從實證的角度來說，歷史已經尖銳地反駁了馬克思主義，把貧困化視為長期發展趨勢的觀點。統計數據明確無誤地證實了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人民的物質消費水平，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裏顯著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迅速水漲船高。

許多曾經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並不能立刻在學術上與它劃清界限。他們絕望地採取了後衛戰鬥的防禦措施——他們就像馬上要全面崩潰的軍隊，不斷向後撤退，先是一條街接一條街，然後是一棟房子接一棟房子地逐漸放棄自己的陣地。他們總是執著地堅守一個理論命題、一種研究方法，或者一種認知方式，直到不得不放手才肯作罷。而我在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觀點時，使用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大約在1955年底，我終於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我首先

對自己宣布，我不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會排斥這個理論的任何研究方法或觀點（我還會在本書的後幾章裏，詳細解釋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觀點），但是我不再接納所謂的「主義」，即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術大廈。當時我向密友描述自己的學術狀況時，會說自己「一筆勾銷」了馬克思主義*。我不會再因為忠誠地信仰某種思想流派，就對它全盤接受。自從「一筆勾銷」馬克思主義後，如果我認為某些馬克思主義命題或思考方式具有合理性，我必須先克服自己的學術懷疑和學術不確定心理，才能說服自己接受它們，但我卻不會一棒子便打死它們。鑒於我從前的經歷，這種行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事實證明這種做法，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認為對我個人而言，這種徹底決裂的策略，具有重大的意義。我沒有把太多時間，花在比較馬克思主義教義和與其對立的觀點上，因為我已經提前把前者徹底清除出我的思想體系。我認為這種策略，幫助我比大多數同時代人，更早地邁出前進的步伐。他們雖然幾乎和我同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卻花了更長時間（甚至是幾十年），才把自己從思想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布達佩斯知識分子中的許多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嘗試「復興馬克思主義」。他們逐一檢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每個組成部分，希望由此確定需要摒棄和需要保留的內容。與此相反，我早早便跨越了這個單調辛苦的工作階段，它就像剎車一樣，及時制止我的思想向錯誤的方向發展。†

---

* 我雖然**徹底地**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決裂了，但有段時間我仍然相信可以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我將在後文講述我如何逐漸擺脫「幼稚改革者」的思考方式。

† 著名哲學家米哈伊·沃伊道這樣描述了他所經歷的這個過程（波戈尼，2003，第14頁）：「我記得七十年代中期，自己曾對信奉『盧卡奇主義』的朋友說：『我相信自己再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這不僅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做了所有骯髒殘忍的勾當，而且因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為我們身邊發生的一切，提供合理的解釋。」

開始踏上研究之路

我開始從事研究工作時，並沒有在年齡上表現出劣勢。我準備畢業論文時是27歲——和美國即將畢業的博士生年齡相仿。

美國的在讀博士生開始寫論文時，便已經清楚地了解導師做研究的方式。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擁有為老師作助理的經驗。在開始寫論文前夕，他們會正式向學校申請，安排導師指導他們的論文。導師會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悉心傳授給學生，然後當這些學生任教時，再用同樣的方式培養下一代博士生。這個過程就像技藝精湛的手工藝人，和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助手，共同為新學徒傳授手藝一樣。我沒有這種從導師那裏學習研究技巧的機會，我的導師陶馬什·納吉不僅是一般理論系的系主任，而且也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對我的文章提出了很多實用的意見。他具有出色的戰術意識，而且非常精確地預見到人們在當時的政治束縛下，可能在學術方面取得多大的進展。但是由於他自己不是從事研究工作，因此並不了解做學問的竅門，自然也無法給我傳授什麼研究方法。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都沒有找到論文的題目。當時學校給我正式分配的工作任務，是做彼得·埃爾德什的研究助手。我陪他一起出差，而且我們交談了很多次。正如在他後期的著作中，反映出來的那樣，埃爾德什真正感興趣的是抽象理論，而在實證研究方面，卻沒有多少經驗。他努力向負責經濟的領導人，遊說自己關於管理和計劃的觀點。但是由於他經常尖銳，甚至傲慢地打斷對方的談話，所以這種做法以及他的遊說方式，都很難有助他與其他人作坦誠的交流。他是一個詼諧機智的人，天生具有強烈的諷刺感。如果他把某個人視為諷刺的目標，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他對斯大林政治體制的許多方面，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麻木狀態，都很不滿，總是滿腹牢騷。他認為我這個剛剛被《自由的人民》解僱的叛逆者，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威脅，所以對我非常坦誠，不過這種坦誠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儘管他總是在批判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終究保持了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仰

和極端忠誠。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發現我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觀點的學術道路上，已經走了多遠。每當他激動地在我面前批判馬克思主義時，我只是含糊其辭地應付過去。事實證明，這對於發展我們之間和睦的關係，有百利而無一害。

幾個月後，我請求學院允許我獨立工作，無論埃爾德什還是陶馬什·納吉，都沒有對此提出異議。我決定把自己的的研究範圍，限制在輕工業這個狹窄的領域裏，並且仔細觀察它的經濟管理運作過程。中央計劃體系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我所以選擇輕工業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重工業的相關數據很難得到。由於重工業與軍事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因此很多信息都屬於絕密材料。此外，我對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也很感興趣，而這種關係在輕工業中，更容易研究——輕工業產品的購買者都是普通百姓。

我開始研究工作時，並沒有事先提出任何明確的假設，但我的研究課題，受到一個基本的否定假設的影響：官方教科書和黨的宣傳中，反復強調的假設並不成立，即計劃辦公室制訂計劃後，經濟體系的真實運作過程，可以完全遵循這些計劃。

我沒有提前作任何實驗檢驗，但是仍然不加思索地選定了研究的方法，它的核心是採用提問的方式，全面了解經濟管理和計劃過程的參與者的想法。我本能地感到他們——也只有他們——真正地了解廠長腦袋裏在想些什麼，以及他們在做些什麼。無論高層、中層還是低層工作人員，都是我的採訪對象。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是與受訪者進行一對一的談話，然而，我也會組織一些集體討論。在許多行業裏，我經常需要和相同的受訪群體舉行多次討論，因為必須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問卷中的所有問題，作充分的觀點交流，這實在是十分倉促。

受訪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樂於回答我的問題。他們早已經準備大膽地批判現有條件。即使當時我也經常納悶地詢問他們，為什麼這麼願意配合我的調查工作。也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人都喜歡抱怨，特別是匈牙利人。不過我猜測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促使他們這麼做，那就是他們感覺到，我對他們的談話內容，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我並不是機械地按照事先設計的問卷調查表，依次了解他們對各個問題的看法。他們發現我聽他們說話時，會不自覺地睜大眼睛，顯示我渴望獲得所有重要的信息。我和他們一起抱怨官僚機構的愚蠢，一起憤怒地反對浪費和忽視消費者需求的現象，以及心胸狹窄的上司。我與受訪者建立起真誠的互相關懷的關係。幾年後，我被經濟研究所開除，希望在輕工業裏找份工作時，他們中不只一個人，在面對個人危險的情況下，仍然對我伸出援手。

不過讓我們還是回到1955年至1957年間，我採用的研究方法上。我是從哪裏學到這種利用個人採訪，獲得實證研究材料的方法呢？我認為這要歸功於我在新聞界工作的經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是第一個把「分析報道」這種體裁，引進《自由的人民》的新聞工作者——這種報告佔據整整一版報紙，而不是像普通報道那樣，只佔幾厘米寬的欄目。我們兩三個記者，經常一連幾天待在工廠裏與人們交談，了解他們對工作的意見。我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記者，採訪工廠廠長時，與他們的關係，自然與以研究員身份採訪他們時的關係不同，但是我已經從記者的工作經歷中，掌握到一些技巧，而且我可以敏銳地感覺到這種方法適用的範圍。

匈牙利歷來有研究農村的傳統，這方面的大量文獻，也賦予我很多靈感。我發現可以通過閱讀這種文獻，獲得非常精彩的學術體驗*，而且我感到只要認真傾聽人民的聲音，便可以發掘出實踐知識的巨大寶藏。

當然我的實證研究材料，並不是全部來源於自己的採訪。我還

---

* 在這一時期，我閱讀了佐爾坦·薩博的*A tardi helyzet*（《Tard的故事》，1986〔1936〕）和伊姆雷·科瓦奇的*A nema forradalom*（《靜悄悄的革命》，1989〔1937〕）。除了從他們的記錄中了解到更多農民生活以外，我還發現這兩位作家和描述社會學家（即「sociographer」）使用的方法，對我很有啟發：採訪人們、使用調查問卷收集數據、簡要概括數據以輔助第一手經歷。這兩位作家和描述社會學家，都屬於「人民作家」這個頗具影響力的學術團體。事實上，我剛剛開始鑽研這兩部著作時，對現代社會學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一無所知。

努力地研究了規章制度、查找相關數據，並且分析各企業和各行業的統計表，然後用這些研究結果，來補足我從被採訪者那裏獲得的材料。很早以前，我便意識到命令和執行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處於不同地位的人(例如領導和普通人)，描述同一種現象的特點時，其結果往往有天壤之別。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從事研究，並且能夠發現一些真理，的確讓我感到萬分激動。*

沒有人曾經教我如何使用現代方法和分析定量數據。當時我對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技巧，一無所知。而現在這些方法，不僅是博士畢業論文中必須使用的方法，而且它們在碩士論文中的運用，也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我為那時的無知而感到羞愧，但同時我也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我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透過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許多重要的關聯性。五十年後的今天，我還想冒險提出一個更具顛覆性的觀點。我在後文中，會多次提到由於缺少經濟學方法論的相關培訓，我不得不在研究中，努力克服諸多不利條件，但是我仍然想高聲宣布，這種無知，也為我帶來某些優勢，儘管作為一個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充滿熱情的大學教授，從我嘴裏說出這樣的話，聽起來批判的意味更加強烈。我敢於提出創新的方法，並且勇於嘗試，**正是因為**我不必亦步亦趨地追隨導師的步伐。而且正因為我不理解經濟學研究的現代技巧，我才不至於在許多形式上的研究工作和技巧性研究工作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我不用擔心回歸曲線是否符合我的假設，也不了解著名雜誌社和出版社的匿名審稿人在方法論方面的苛刻要求(我可以完全忽略這些要求)。除了迫切地想了解匈牙利奇怪的生產體系如何運轉以外，我沒有受到任何因素的干擾。

歷史學家捷爾吉·彼得里，把弗里斯掌管的學院中普遍使用的學術方法，以及我在論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描述為「幼稚的經驗主

* 時至今日，這種方法仍然存在有效性。例如，如果過去研究者不是零星地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更加普遍地使用相似的方法，從深入的採訪中收集實證材料，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東歐國家、蘇聯解體後形成的各個國家或者中國的後社會主義轉軌過程。

義。」[7]「幼稚」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它們的特點。我的工作就像沒有經驗的畫家，或者依靠本能創作的藝術家一樣幼稚。它非常原始，但沒有受到任何污染。我還沒有學會如何利用經濟學領域中的現代研究方法，進一步對研究結果「精雕細琢」，因此它沒有經過任何加工。然而也正是這些原因，它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新鮮、與眾不同，而且格外真實。

把我的研究定義為「經驗主義」，實際上只說對了一半。在此之前，我還在一篇文章中，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描述為「空中樓閣」。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忽略「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區別，拒絕接受「價值總和等同於價格總和」這種由知覺得到的印象和它同樣空洞無物的理論，或者學術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認為應該從經驗中學習知識等等，無疑都是具有革命性的舉動。

我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描繪現實，並且簡單記錄實證材料的層面上。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比任何研究農村的作家，都要走得更遠。我嘗試把自己的體驗與嚴謹的學術體系結合在一起，以展現這些現象中的規律性。我試著進行因果分析，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經得起推敲的理論——感謝上帝沒有讓我總結出什麼結論，因為我當時掌握的知識，還不足以全面分析其中涉及到的所有經濟關係。但是敏感的讀者，也許已經明白到我的研究目標：從對個體的觀察中獲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結論。

我的工作方法，還反映出我努力理清思路的決心。我不是那種整天埋頭於各種筆記材料的人。我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花很長時間進行「工作性散步」。我經常一邊在樹林裏或者街道上漫步，一邊認真考慮如何處理我收集到的材料，和準備動筆寫作的文章。我經常在口袋裏準備一枝筆和一本便箋簿，這樣便可以隨時停下來，記錄大腦中靈光一現的思想火花。*

---

* 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在「工作散步」時引起了一位路人的懷疑，他不但一路跟蹤我，而且試圖和我搭訕，要求我告訴他我在紙上記些什麼。他怒氣沖沖地猜測說：「你是不是在幫偷車賊記車牌號碼？」

那時我已經習慣在家裏，或者其它地方構思準備寫作的文章，而不是在辦公室裏，這樣我就可以心無旁騖地專心工作，而不會受到任何外界的打擾。雖然大多數同事，每天都往學院上班，但我多半時間裏都是在家裏埋頭寫作。也就是從這段時期開始，我逐漸培養起一套激勵自己努力工作的「儀式」：工作時要正兒八經地泡咖啡，喝咖啡，還要有音樂相伴；伏案工作很長時間後，要略微休息一下，站起來走幾步等等，很多學者的工作「儀式」都與此頗為相似。兒子加博爾當時只有三四歲，我經常送他往學校，然後在回家的路上，正好可以用來「工作散步」。他很快就適應了我的工作方式，後來我的第二個兒子安德拉什，也知道爸爸在家工作時，絕不能受到打擾。毫無疑問，盡可能地抽出時間和孩子相處，以及盡可能抽出時間做研究，這兩種目標經常會發生衝突。*在我的記憶中，這種衝突並不嚴重，不過孩子們和泰里的回憶，可能與此有些出入。

我在研究工作中，獲得莫大的快樂。和受訪者談話的過程，讓我著迷。我懷著愉悅的心情整理自己的筆記，同時，寫作也給我帶來莫大的享受。當我感覺到自己被什麼絆倒，但緊接著就有所發現時，那簡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終於為自己找到了最合適的位置。

畢業論文的主要觀點

我以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備選學位論文的初稿。我在一些同事的建議下，對它稍稍作了修改，1956年夏天，我把它交給導師時，基本上沒有什麼改動，其後便於1956年9月，交由經濟學與

---

*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從來沒有忘記在孩子睡覺前陪他們一起讀書的幸福時光。當他們稍微長大一些後，我們經常一起看《維尼熊的故事》、《艾麗絲漫遊仙境記》和弗里杰什·考林蒂寫的許多快樂的故事。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這些早期的閱讀經歷，以及我們一起嘻笑打鬧的生活，為他們的幽默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即使他們成人後，也明顯地表現出這種特質。

法律出版社出版。這篇論文的題目是《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後文中將簡稱為《過度集中》)。

接近五十年後,當我再次打開這本書,逐字逐句地閱讀下去時,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喜悅。雖然有些段落,反映了我當時在政治上仍不成熟,但是除此以外,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書中的其它觀點完全正確。作為作者,我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會在後文告訴讀者,這種情況並不適用於我的所有作品)。

我在前言中,明確說明了自己的研究課題:「當然,大學裏有許多課本和收集的資料,描繪了我們國家的經濟管理、計劃和我們的定價體系及工資體系等。然而,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共同的嚴重缺陷:它們沒有告訴我們本國經濟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而只是描述了如果它們能夠按照作者希望的那樣運轉,會是何種情況……如何清晰,並且有條理地描述我國經濟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它的確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任何相關經濟論述。」[8]

這本書首先描述了計劃指令體系。人們也許認為計劃經濟的首要目的,是允許人們有能力考慮幾年後的情況,但事實並非如此。對於企業而言,就連年度計劃也沒有受到過多重視,這主要因為計劃與激勵沒有掛上鈎,(《過度集中》尖銳地指出了存在嚴重不足的領域——激勵機制,這成為幾十年後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工廠營運時可能遇到材料及半成品供應延遲,或者需要臨時安排加班等問題。這些因素和國家經濟計劃中,某些反復出現的變化,導致生產過程中,始終存在不確定性,因而破壞了工廠年度目標的可靠性。最直接影響生產的計劃是月度計劃,然而為工廠制訂月度計劃的不是工廠本身,而是上級機關,即管理整個行業的政府機關。因此我們經常提到的「企業自主性」,根本不存在。不過企業同樣無法

---

* 我並不是唯一欣賞這本書的人。三十五年後,最早出版它的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它匈牙利語版本,並為第二版寫了全新的序。牛津大學出版社同樣在三十年後再次出版它的英語版。

圓滿地完成月度計劃的目標，希望嚴格按照計劃要求完成任務的企業，必然要受到不斷變化的運營條件的阻擾，所以很難完成任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企業不必嚴格遵守月度計劃，那麼這些計劃，也就沒有什麼權威性可言。「這種衝突的本質在於在當前的環境下，我們無法通過調整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無論人們可以自由調整計劃，還是受到制約），因為這個痼疾深深地紮根於我們使用的計劃方法中。」[9]（這些言論激怒了指令經濟體系的衛道之士。我現在依然清晰地記得，在一場辯論中有人勃然大怒道：「對你來說這種方法也不好，那種方法也不好……你到底想要什麼？」）

事實證明最重要的指標是「生產價值」。企業的所有成員，很快發現不僅他們可以通過「正當而且合理」的方法提高生產價值，而且可以玩些小聰明：例如，企業可以調整產品組合，提高材料密集型產品的比例，因為這種產品的價格通常較高。（《過度集中》又一次提出了一個即使現在的激勵理論研究者與實踐者，也感到非常頭疼的問題。無論把何種定量指標與獎金或者處罰聯繫起來，這個指標的價值都會被扭曲。無論設計激勵機制的人採取何種策略，那些受激勵機制管轄的人，很快便會找到與之針鋒相對的對策。）

這本書還詳細討論了其它計劃目標。我用六十四頁的篇幅，逐條展示指令體制的不協調性及其消極的副作用。

我用整整一章探討了物質刺激、工資、獎金和道德激勵等各種獎勵措施的積極和消極作用，同時研究了行政控制和行政處罰（如紀律處分、法院起訴、有期徒刑等）所扮演的角色。「體系對物質激勵的依賴程度愈低（或者說它對人們積極性的依賴程度愈低），它被迫使用強制手段的可能性便愈高。」[10]體系缺乏協調性時，便會誘使管理者違反那些不可能嚴格遵守的規定，而一旦這種行為被發現，管理者又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四十年後，我在總結社會主義制度的專著裏，得出的一個主要結論，是社會主義體系的局部改革或者「放寬」某些限制的行為，會損害其生存能力，世界上並不存在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我重讀自己的第一本專著時，發現其中早已出現這個結論的雛形。

《過度集中》認為「新路線」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上級機關越來越少使用行政方法（即各種懲罰措施和其它形式的強制手段）來加強紀律管理。「但是政府在引進這種『緩解』措施的同時，還不存在一種更有效、更全面的物質激勵機制，來取代先前的措施。人們仍然在採用過去的經濟體系，而且沒有作出任何調整。這種體系必須依靠某種『潤滑油』，才能正常運轉，而只有政府廣泛地採取行政措施，才能提供這種「潤滑油」。一旦缺少『潤滑油』，這個體制中各個齒輪的工作，就不能令人滿意。這種模棱兩可、而且搭配不合理的情況，是導致那個時期爆發出許多棘手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11]

指令和激勵機制共同作用時，表現出很多**規律性**，以下是《過度集中》中強調指出的部分規律性：

1. 管理者的注意力轉移到數量上。因為生產量的上升，可以滿足公眾利益，所以這種做法的確具有一定價值。但同時這種做法也存在著破壞性，因為管理者對數量的關注，日益超出正常範圍，甚至有悖於常理。
2. 對工作任務的重要性，進行了錯誤排序。例如，降低成本和技術發展等工作，被不合理地置於次要地位，因為無論現行的指令體系，還是激勵機制，都沒有鼓勵人們努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3. 盲目迷戀「百分之百」。在人們認真執行計劃的情況下，一旦計劃的完成率低於百分之百，就是違反指令的表現。這種盲目的認識，產生了奇怪而且通常極其消極的影響，管理層會不惜一切代價，強迫企業員工提高生產量，以達到「百分之百」的目標。
4. 「計劃框架下的投機行為」。我用這個短語來描述某些管理者的活動：他們只是按照法律和指令的字面意義，實現生產/消費水平目標，以確保自己得到豐厚的獎金，並得到認可。與此同時，他們忽略了如何實現經濟體系的最大利益。
5. 在放鬆計劃與收縮計劃的主張之間，存在激烈的鬥爭。我在《過度集中》中描述並且分析這個問題，在其後的匈牙利辯論中，被稱作「計劃討價還價」。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將其稱作「棘輪

效應」。*如果企業為了追求更豐厚的獎金或者認可，而大幅超額完成計劃，那麼今後的計劃任務，便會根據超出的業績，來抬升它的產量要求。譬如今年企業完成了計劃的105%或者110%，那麼這些已經實現的生產額，便成為下一年計劃的起點。這促使企業隱瞞自己的生產能力，而不是100%的完成任務，或者超額完成102%的計劃任務。此外，在編制計劃的討價還價過程中，管理者會故意低報本企業的生產能力，同時誇大工作中的困難，以爭取「更寬鬆」的計劃。

6. 生產活動表現出周期性的不穩定。匈牙利的生產體系以奇怪的方式律動，它的工作「衝刺期」和懈怠期交替發生。生產的波動性與生產計劃的時間節奏之間，顯然存在著聯繫。當計劃表中的業務年度接近尾聲，而企業完成計劃和獲得獎金的希望似乎岌岌可危時，企業必然會倉促地加快進度，以求完成任務。†

7. 「今天」和「明天」之間存在衝突。這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特別在涉及到今天的消費和明天的投資及儲蓄等問題時，《過度集中》從另外一個角度展現了這種衝突的內容。它主要關注了人們怎樣在集中注意力和管理能力完成短期計劃的同時，忽略了可以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的長期任務（如技術發展、引進新產品及對工作機構進行現代改造等）。

《過度集中》把這些規律稱為「不以人們的意願為轉移的趨勢。具有啟蒙性的觀點，只能削弱它們的作用，而不能完全根除它們。為了消除這些趨勢，我們的計劃和激勵機制以及經濟管理方法，應該為自己制定全面深遠的發展目標。」

我們把這種方法，與先前追隨斯大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文獻

---

* 棘輪指可以向前轉動但無法後退的齒輪，我們可以用它來形象地比喻「計劃討價還價」的一個特點：一旦下級單位達到上級機關規定的某個生產水平後，就必須維持這個生產能力，不允許出現任何生產力下滑的現象。

† 安德拉什·布羅迪（1956）是第一個分析生產律動及其原因的學者。我認為他的結論和研究方法，不僅令人信服，而且非常具有指導意義。

提出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法則」來比較一下。這些文章的作者希望國民經濟能有計劃地按比例發展。當時這個規範性要求，被稱作「法則」——一個本應該專門用於實證科學的術語。科學只能把真實存在的事物稱為法則。《過度集中》中描述的規律或者「必要的趨勢」，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因而有力地反駁了世界上存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法則」這樣的命題。

《過度集中》還抽出一章討論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短缺。它後來成為我的其它文章的主要研究課題。由於我在這項研究中的目標是分析生產，所以物質短缺成為調查的核心問題。我已經敏銳地察覺到短缺帶來的後果：生產效率下降，而且消費者受制於生產者。《過度集中》展現了短缺與集中之間的密切聯繫，並且描述了短缺如何加劇集中，而集中又如何誘發短缺。*

我早已經敏銳地意識到，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中會存在長期短缺。《過度集中》中描述了它的部分原因（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假如要進行深入的因果分析，還需要完成更多研究工作。

接下來的一章，繼續歸納概括了我的結論。企業通常受到來自兩個方向的影響。他們與其它企業形成橫向關係，而與上級機關形成縱向關係。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縱向關係居於主導地位，而橫向關係相對較少。《過度集中》是第一本用這種方法，對企業受到的影響進行分類的專著，自此以後，這種研究方法便廣為流傳。

最後一章，在開篇處先簡明扼要地總結了全書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機制。它擁有自己的內在邏輯，和許多特有的規律和發展趨勢。」[13]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機制非常和諧。恰恰相反，它表現出深刻的不協調性。它力求用指令來調節所有事情——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它努力把

---

* 《過度集中》只在一處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提到了短缺問題。馬克思極其罕見地間接提到了社會主義體制管理經濟的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一個簡短附錄中，建議應該永久性地保持相對生產過剩，以避免生產中出現波動（即讓存貨量與生產量一同增長）（1992[1885]，第544–545頁）。

所有東西集中起來——而這也是無法企及的目標。

這種觀點清晰地闡明了後來被我稱作「制度範式」的概念。僅僅了解細節還不足以掌握整體框架：所有部件組合起來的整體發揮的作用，遠遠大於單個部件的作用累加起來的效果。那麼同樣的道理，改變一兩個細節，也不足以影響其整體。換句話說，人們無法用改變局部細節，來取代全面變革所產生的效果。

最後一章力求說明過度集中的根源，但這個工作只進行了一半。我仍然不清楚它在政治結構和財產關係制度中的根基究竟有多深。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部分討論了人們對自發性的害怕——這幾段完全嚇倒了那些堅持正統馬列主義的讀者。*

最後，《過度集中》描繪了當前猶豫不決的改革實驗，遭遇挫敗的過程，並且對阻擋改革進程的保守力量提出警告。這本書自始至終詳細羅列了實證性材料，並進行實證分析，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改革建議。它只在最後幾行宣稱「摧毀過度集中化的工作……終將勝利」[14]，以此鼓勵廣大讀者。

如今，我花了幾個星期，重讀了當年我在《自由的人民》所寫的文章和《過度集中》，後者在風格上的明顯改變，讓我感到震撼。我發現自己終於拋棄了早期那種用狂熱的讚揚，和高聲勸誡鼓勵人們提高生產力的風格，而以事實說話的客觀文風取而代之。在兩百多頁厚的《過度集中》中，大部分篇章都在彙報**事實**。

這本書要傳達的信息，不僅蘊藏在書中的字裏行間，而且還體現在文字以外。它使用了「中立」的技術術語，而對馬克思主義常用的「政治經濟」術語則敬而遠之。當時改革派經濟學家，在經濟體制辯論中提出的主要觀點，不是我們必須給予市場更多空間，而是「允許價值理論更加自由地發揮作用」。多年以後，蘇聯的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和他的數學經濟學家同事，仍然在使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談論線性規則創造的所謂影子價格。

---

* 遺憾的是英語版《過度集中》裏刪除了這一部分。我將在下一章講述自己決定刪減這一部分的時代背景。

人們在表達思想時使用的語言，往往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沒有在《過度集中》，或者隨後發表的作品裏，公開批判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熟悉馬克思主義語言的讀者，很快便發現，我**刻意而且謹慎**地避免使用此類語言（在前面描述我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章節，以及未能出版的《過度集中》的補充文章中，清楚地體現出這種「刻意而且謹慎的」態度）。我希望讓讀者意識到，放棄馬克思主義概念體系，也可以對經濟問題提出有意義的觀點。而且事實上，只有放棄這個概念體系，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的概念體系裏，隱藏著學術陷阱。某些匈牙利經濟學家，在寫作學術文章時，借鑒了我設計的研究方法，但是長期使用馬克思主義概念體系的做法，不僅阻礙了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解放，而且還阻礙了匈牙利學者，在其它大多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研究工作。

論文發表初期得到認可

這篇畢業論文的第一批讀者——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同事和密友們——對它的反應非常熱烈。我從來沒有預料到，他們會如此歡迎這篇文章。由於我剛剛開始從事研究工作，沒有太多自信，因此，這種讚許給我注入了新的力量。

學院裏的許多老師和同事，討論這篇論文時，也對它大加讚揚。這個消息很快在學院和布達佩斯傳播開來，人們稱這篇論文是一道「上等政治佳餚」，與其它普通論文有著天壤之別。

匈牙利規定備選學位論文的答辯，必須是公共辯論。有權力授予高等學位的匈牙利科研資格評定委員，會指定辯論的反方及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在辯論結束後，決定申請人是否可以獲得學位。

大多數備選學位答辯，通常有二十到三十人到場聆聽辯論，例如學位申請人的朋友和家人，以及少數對論文題目感興趣的人，而當1956年9月24日學校舉行《過度集中》的答辯時，聽眾席上也黑鴉鴉地坐滿了人。[15]也許我的記憶有些渲染事實，但我想至少有兩百

或者更多的聽眾，參加了這場答辯。

捷爾吉·彼得主持了這次答辯。讓我們先來聽聽他的評論：「我曾經研究物理學，我們知道物理學中，真正的科學研究始於伽利略。在那之前的所有物理學研究都是推測，即只是通過思考解決問題。伽利略是第一位把尺子、時鐘和砝碼引進物理研究，並且測量物體的學者，這是真正的科學研究史的起點。我所以想到以上這些東西，是因為這篇論文（即《過度集中》）嚴格遵守了客觀的紀律。它誠實地記錄研究對象的情況，沒有受到任何內心情感的影響。這樣的就是這樣的，那樣的就是那樣的。他把研究對象放在顯微鏡下，認真地解剖了它們，然後記錄下他親眼看到的東西。」[16]當然，把我的論文與伽利略的卓越成就進行類比，實在過於誇大了我的成績（而且彼得對伽利略研究工具的描述，與科學史的記錄完全不一致）。不過這個類比，卻生動地解釋了彼得為何在比較了《過度集中》和普通經濟學研究結果後，把它視為社會主義世界的轉折點，因為它推翻了真空世界裏的推測和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客觀地觀察現實生活、測量實際現象，以及精確地描述事實。

這場答辯的反方之一，是輕工業部的黨委書記米克洛什·奧伊陶伊。他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贊同這篇論文的觀點，並且不吝惜褒獎之詞（後來在卡達爾執政期間，奧伊陶伊擔任了國家計劃辦公室副主任的重要職位。當《過度集中》遭到粗暴的攻擊時，我多次請求他公開發表對這篇文章的評論，但是他都迴避了我的請求）。

答辯的另一名反方，是瑪利亞·奧古斯丁諾維奇。她也給予這篇論文相當高的評價，[17]但她認為這篇論文的不足之處，在於文中沒有作出充分的理論分析，也沒有使用抽象概括的方法。當到我回答她的問題時，我激動地提出了自己的反駁論點。我並不懷疑抽象或者「純理論」在解釋複雜的現實關係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古斯蒂（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人們都這麼稱呼奧古斯丁諾維奇）卻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對我提出這種要求。當時我極希望終止那些簡單模仿馬克思主義思考方式，而且空洞無物的抽象方法。

聽眾們也提出很多有趣的評論，當時最引人注目，而且後來多次被評論文章援引的，是彼得·曼迪的觀點。[18]我從前便已經認識他，他曾經在黨中央工作一段時間，後來在伊斯特萬·弗里斯的學系裏工作。他提出的反對意見是，論文的研究不夠深入，沒有得出最終結論。他認為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從具體的經濟體制中，尋找這些問題的根源。曼迪說：「如果這個體系是不完善的，那麼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逐項剔除錯誤，而是從根本上改變整個體系。」

我不知道曼迪對這個體系了解多少，我所能說的，是如果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那麼我與他的看法完全一致。《過度集中》在因果分析的關鍵時刻戛然而止。它正確無誤地確定了許多癥結的根本原因：指令經濟、極端集中和排斥市場的協調作用，但是它卻沒有就此深入下去。它沒有認識到政治壓迫、意識形態的壟斷，及完全消除私有財產的國有制，在根本上導致經濟運行不暢。也許當時曼迪已經理解了這些觀點，而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在這些問題上得出較成熟的看法。我仍然相信可以通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經濟，正如我在後來所寫的文章裏，剖析自己在1956年的思想狀態時說的那樣，我依然是個「**幼稚的改革派**」。

由於我極度相信存在體制調整的可能性，所以1956年春季，我同意指導學院成立的一個工作組，為黨和政府總結改革建議。組織上允許許多同事和學院以外的同志，在我的指導下開展這項工作。幫助我的同事有安德拉什·納吉、彼得·鮑德和阿蘭卡·雷代伊。1956年8月，我們完成了一本一百二十頁長的報告，用冷靜謹慎的措詞，建議在匈牙利推行「市場社會主義」，並且提供大量具體翔實的細節。[19]這份報告謙恭地稱自己的建議，僅僅定位於輕工業發展，但是它的適用範圍卻遠遠不止於此。它可以被看作成最終於1968年得以推行的「新經濟機制」的第一份粗略草案。為這份改革提案提供學術靈感的，是喬治·彼得的文章和我寫的《過度集中》。

這份改革提案，在贊同其基本觀點的人群中，引發了廣泛而且客觀的辯論。學院內外的很多專家學者，都參與了這些辯論。獨立小農黨的前經濟政策負責人伊斯特萬·沃爾高，認真地研讀了我的

論文和學院的改革提案後，詳細地進行了點評。1957年時沃爾高應卡達爾政府邀請，擔任經濟改革委員會的負責人。我的論文導師和上司陶馬什·納吉，也仔細閱讀了這兩篇文章，他後來被黨組織任命為1968年改革的準備委員會書記。許多受到我的畢業論文和夏季改革提案影響的人，後來都參加了沃爾高於1957年組建的委員會和六十年代納吉領導的委員會。我確信自己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這些觀點，對他們產生了強烈而且持久的影響。即使當我本人逐漸擺脫「幼稚改革派」的觀念，而且開始懷疑人們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應該停留在對社會主義進行局部改革的階段止步不前時，我對他們以及其他人的影響，仍然在持續發揮作用，甚至不斷加強。

我原來的工作單位——《自由的人民》報社——邀請我寫一篇文章，總結論文和改革提案中的主要觀點。這篇文章刊登在10月14日的報紙上，[20]恰好與黨組織重新接納伊姆雷·納吉的新聞，出現在同一期上。這個巧合對我來說，可以算是意外收到的「禮物」。

我剛到經濟研究所工作時被降級為助理。現在我的上司伊斯特萬·弗里斯，公開並且特別強調了我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現，把我提升為研究員，提高我的工資水平，並且為我頒發獎金。從我被《自由的人民》解僱到現在，僅僅過去了一年半，但是我的事業再次蒸蒸日上。

《過度集中》的政治背景

如果我的所有經歷，發生在美國坎布里奇市馬薩諸塞大道上的哈佛大學或者麻省理工學院，那麼你也許會說科爾奈不過是轉換了工作而已。他原本是一名記者，現在從事學術研究，而且成績驕人。

但是這是在東歐的布達佩斯，我不是在靜謐的大學城圖書館裏讀書的畢業生，卻可以全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以解決導師推薦並限定的研究課題。我已經在本章開篇處，大費周章地描述了我如何開始自己的研究事業，現在是我描述當時政治背景的時候了。

我剛到經濟研究所上班時，拉科西及其追隨者仍然在執掌政府。他們堅信自己已經再次牢牢地鞏固了政權。但八個月後，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受到蘇共二十大的強烈衝擊。尼基塔·赫魯曉夫發表了控訴斯大林罪狀的著名演講。匈牙利的政治環境突然間再次恢復了活力。學術界的激進派——裴多菲俱樂部——發動了連續不斷的辯論攻勢，更加嚴厲地評判和指控了政府。這在知識界裏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很快使它陷入混亂之中，社會上開始出現要求政府回歸「新路線」的呼聲。最初，人們還只是戰戰兢兢地提出這個要求，但漸漸地持這種觀點的勢力，開始不斷壯大。人們強烈呼籲政府解除拉科西的職務，讓伊姆雷·納吉重回黨組織，並恢復其政治領導地位。

當我的文章出現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政治環境中，它在國內的影響自然被誇大了。我從來沒有產生這樣的錯覺，即大多數到場聽我的論文答辯的人，純粹是被其特殊的學術價值所吸引。許多人到這裏的原因，只是因為當時盛傳這是一部強烈批判現實條件的作品。我的論文答辯舉行於1956年9月24日，距「56'革命」只有一個月的時間。當時天空中陰霾蔽日，蒂博爾·梅勞伊在《自由的人民》「叛逆派」會議上極力呼籲的「清洗風暴」，正在步步逼近。

這些政治條件，解釋了為何各大日報競相報道我的論文答辯過程。在正常情況下，日報通常不會報道國內外博士論文，或者備選學位論文的答辯情況。他們所以選擇報道我的答辯，是因為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學術集會的範圍——它是一件政治事件。

任何作家受到這樣特殊的禮遇時，自己的虛榮心都會得到極大滿足，我也不例外，但同時我也感到非常尷尬。為了更加清楚地描述我的反應，我必須回到當時的環境，來談論那個時候自己如何看待從事學術研究與參與社會和公眾生活的關係。

當我聽說組織可能安排我到匈牙利科學院下屬的學院工作時，心中就已經暗自決定，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今後的科研工作中。即使我在記者的崗位上工作時，也從來沒有把記者當作真正的職業。我認為在1945年到1955年間，自己從事的，一直都是政治職

業，而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青年運動中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黨報的記者，倒是次要問題。現在我希望堅決、並且永遠地與這種政治職業劃清界限。學術吸引我的原因，不僅在於我對它產生了興趣，而且在於我希望它能夠充分發揮我的才能，至少可以滿足我逃避政治的消極願望。

我在第三章的結尾處寫道，政治讓我的夢想徹底破滅，它欺騙了我，而且我對它極其反感。此外，我需要補充另外一個問題。在此之前的十年，是一個漫長的考驗期，而我最終沒有通過它的考驗。欺騙的元素通常由兩方構成：騙子和允許自己被騙的人。我記得我曾經和兒子安德拉什(當時他十幾歲)，談論五十年代早期自己的經歷，他問我說：「爸爸，你是個聰明人，當時怎麼會那麼愚蠢？」

我在前幾章裏，努力還原了這個過程的面貌，並且詳細解釋了背後深藏的原因。我的確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很多解釋和藉口，但是安德拉什的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不管這樣做是否會過於簡化問題)。

任何努力成為成功政治家的人，都必須具備某些特質。僅僅擁有出眾的智商，是遠遠不夠的——其它很多職業，同樣需要高智商。除此之外，政治家必須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堅定的**信心**，並且有能力把這種信心，傳遞給其他人。在一段時期內，我成功地成為了這種信徒，但在1955年，我決定永遠不再扮演這種角色。我希望自由地懷疑任何事物，而這與取得政治成功的目標，顯然格格不入。

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受到權力欲所驅動。我在政治領域裏工作時，這種欲望卻非常微弱。我親眼看到醉心於權力的人們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我最終決定，不再努力追求政治上的成功。我會拒絕一切與政治有關的職位，即使它們只表現出一點點權力的誘惑，便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政治家至少要表現出一定的無情冷酷和寡廉鮮恥，才能有所成就。他們需要厚顏無恥地忍受別人的侮辱，從政治利益角度出發，

精心思考後才再作出回應，而絕不能魯莽行事。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為政治理念以及黨和政治運動服務的重要性，遠遠高於家庭歡樂、友誼、藝術或者享受自然。我的身上，從來沒有表現出太多政治家氣質。事實上，如果讓我來描述自己，我會說自己的所有性格特點，都與上述列出的政客素質恰好相反，而且我堅決不允許自己具備任何與政客相似的心智特徵。

此外，我也不想把政客和研究者的角色結合在一起。我擔心無法用同樣的方法，來追求兩種職業的成功(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正確的)。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不只在於身兼二職必然導致這兩種角色爭相佔用我的時間和精力，迫使我永遠生活在與自己鬥爭的境地中。此外，這兩種角色還會對我的心態和思想造成影響。沒有人能夠在早晨扮演激情四射、而且有明確傾向的政客，到了下午就變成客觀公正、而且不偏不倚的另外一個人。我不能在雙數日子裏，無條件地相信自己正直廉潔，而在單數日子裏，又懷疑自己的分析結果。

我最終決定選擇學術，我不想說自己從那時起，便百分之百地遵守了這個決定，誰能自始至終從未背離自己的決定或原則呢？然而我可以說，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除了極其個別的情況以外，我基本上忠於了自己的選擇。

當然這裏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這兩種職業的分界線究竟在哪裏？我從來沒有想過在科學世界裏，選擇一個完全與政治無關的領域，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儘管我本來可以這麼做。有些經濟學課題的特點，是講求純粹的方法論和研究技巧，而且受到學術界的高度尊敬，但是我對它們沒有什麼興趣。我最希望做的，是理解並且研究身邊的事物。我極度希望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癥結所在。我從來沒有想過從新聞業轉向科研工作，意味著就此終結我對國家或者人類的責任。我希望從事「有社會責任感」的科研工作。

那麼讓我們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對我自己而言，「政治」和「科學」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裏？雖然我堅持自己的決定(即選擇科學而不是政治)，但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我並不清楚兩者的分界線在哪

裏。我很快發現劃分這兩個範疇的，並不是像地圖上的那樣清晰的分界線，而是廣闊的「無人帶」。每次被夾在政治問題和科學問題之間必須作出決定時，我都會嘗試慢慢地向它們的交界處挪動，以尋找「無人帶」的界限。也許在這個過程中會犯下錯誤，但是我必須這麼做，因為我需要確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底線，而哪些是必須摒棄的行為（現在我仍然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當時在這個問題上，可供我參考的標準少之又少。任何希望對科學和學術有所貢獻的人，都需要發表他/她的研究發現。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在西方國家裏，學術研究和出版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我也不曾想過，我能夠憑藉自己的學術作品，贏得大學教授的職位。但是研讀科學發展史，讓我明白保留在抽屜裏的學術著作，可能讓少數後來看到它的學者咋舌稱嘆，但是它卻不會產生任何實際影響力。既然我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而且合法出版受到政治限制的國家裏工作，那麼我必須現實地考慮這些情況。我將在後文中，重新談到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合法出版與非法出版），但是我必須事先說明，當時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

我曾經寫下一篇很長的文章，評述彼得·肯德的作品，同時描述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米克洛什·吉邁什閱讀了這篇文章後，對它大加讚賞，主動提出把它複印後非法發行。我謝絕了這個提議，因為我不希望因此導致我的畢業論文，無法正常出版。對我來說，寫那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一個——整理並闡明我的觀點。我需要在寫論文的時候理清思路，這樣便能夠對每個觀點進行權衡，然後找出那些我已經理解得相當透徹，並且可以發表的觀點，以及那些我雖然理解，但是無法發表的觀點。這意味著我必須把某些希望表達出來的觀點深藏在心裏，這種在政治高壓下保持沉默的感受，極其痛苦。也許通過非法途徑發行的學術作品，可以擁有數十或者數百名讀者，但其他人卻被剝奪了了解書中激進觀點的權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合法出版的書籍，可以擁有成千上萬國內外讀者，並且由此產生持久的影響力。

裴多菲俱樂部的會議，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政治氣氛上，都

讓我感到非常興奮。除了一次特殊情況以外，我幾乎參加了它的所有會議。然而我只在會議上發言一次。當時由於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於是在某場經濟辯論中提出自己的質疑。雖然我已經就他們爭論的問題寫了很多篇文章，但是我原本仍然沒有打算在這場辯論中發表演講。作為聽眾，這些會議的氣氛，像磁鐵一樣，牢牢地吸引了我，但是如果我的身份轉變為**演講者**，那麼我感到這個環境，並不是非常適當。這些會議把學術界的專家辯論和政治集會中的專家辯論，怪異地結合在一起。演講者不僅需要進行客觀的論證，而且還必須運用能夠抓住群眾心理的工具。我感覺到裴多菲俱樂部的辯論，產生了重要而且可喜的變化。但是我冷靜地評估了自己的能力後，認為這不是我所適合的風格。我喜歡大學裏的課後提問–回答時間。這更適合一名學者的角色——你只要在學術方面作好充足的準備，並且表現得機敏靈活，便可以勝任這種角色。而在涉及到許多政治問題的集會上，發言時則需要善於激發群眾的熱情，或者改變他們對辯論中另外一方的憤怒之情——我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天份。

這不是一項非此即彼的選擇題。有些人認為我的決定過於絕對化，不過其他人卻能夠理解我的苦心，並且理智地接收了這個決定。無論人們對此的反應如何，我已經決定完全獻身於科學世界和學術研究，而絕不會把我的精力，分散到其它事物上。

6 匈牙利革命及其結果：1956年10月23日–1959年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它的爆發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我記得我的兩位朋友——米克洛什·吉邁什和彼得·肯德——便曾經評論當時社會上表現出來的各種徵兆。他們認為政治的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加劇，而且人民的不滿情緒，將以某種形式在秋季爆發（我認為他們之間，並沒有曾經溝通，而是通過各自的觀察，提出這些觀點）。直至9月和10月，局勢的變化顯然在不斷加快步伐。但是所有人——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在內——都不能預料到「大爆炸」發生的時間，以及它的整個過程。

伊姆雷·納吉的新政府計劃

1956年10月23日下午的早段，當我正在與費倫茨·多納特談話時，有人通知我們兩人，到佐爾坦·沃什的辦公室參加討論。多納特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老黨員，伊姆雷·納吉掌管農業部時，他擔任該部的黨委書記，後來在馬加什·拉科西的秘書處工作，但是在為公審雅諾什·卡達爾的工作做準備時，被政府逮捕，而且判了幾年有期徒刑。1954年他被釋放後，在伊斯特萬·弗里斯的經濟研究所裏，擔任副所長。他被視為當時受到排擠的「右翼」領袖。我很久前便非常尊重他，他也對我禮遇有加。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我們

更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佐爾坦·沃什也是一名老黨員，我們常常在他的辦公室裏舉行討論。他曾經在塞蓋德·奇洛格監獄裏，與馬加什·拉科西一起度過十五年的牢獄歲月。1945年他擔任布達佩斯市長時，憑藉自己傳奇般的行為而聲名大噪。在他充滿波折的人生經歷中，他的政治生涯隨著拉科西的情緒起伏而幾起幾落。他曾經主管高級經濟理事會和國家計劃辦公室的工作（他在計劃辦公室工作時，我認識了他）。1956年他出任國家合作理事會的會長。

現在沃什屬於伊姆雷·納吉派。有一次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裏討論時，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沃什接到報告說，遊行的人群聚集在拜姆街，正在向理工大學前進。多納特預言伊姆雷·納吉必將出任新總理，所以我們必須為他準備在議會上發表施政綱領的演講稿。首先我們需要就初稿的撰稿人選，達成一致意見。有人（我想應該是陶馬什·納吉）建議由我來寫初稿中的經濟部分，而貝洛·奇科什–納吉也主動請纓，希望承擔這個任務，但是多納特最終選擇了我。早前擔任工業部黨委書記的伊姆雷·考爾曹格，把他自己所寫的改革建議概要供我參考。和捷爾吉·彼得關係密切的同事茱莉亞·佐洛說，如果我需要統計數據，她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而且建議我們把工作地點轉移到中央統計辦公室。捷爾吉·彼得當時身在國外，這樣我們除了可以使用他的辦公室外，還可以自由指揮秘書處的所有工作人員。於是，我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1]

那天下午，還沒有人知道1956年10月23日將意味著什麼，但是和其他參加會議的人員一樣，我感覺到我們正在經歷不尋常、而且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將全心投入科學，而拒絕從政的決心，便被拋在一旁。

我們在會議上，就施政綱領的內容爭論了很長時間。我深夜回到家裏時，朋友給我通電話，告訴我事態的發展情況，其中包括在廣播電臺發生的事件——ÁVH（國家安全局）在那裏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射擊。第二天早上，我趕到中央統計辦公室，坐在捷爾吉·彼得的桌子上，開始起草施政綱領。

不幸的是，這份初稿的原件已經不在了。1956年11月4日後，我把這份草稿藏在姐姐麗莉那裏，因為我擔心警察在搜查我家的時候找到它。當時這份稿件還完好無缺，但是不久後，我讓米克洛什·吉邁什在麗莉和母親那裏躲了幾天。他離開我母親住所的第二天，就被捕入獄。當時姐姐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也會搜查她家，因此她燒掉了我藏在她那裏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我在十月起草的政府施政綱領。現在我只能憑藉記憶，再次寫下它的內容。

我在寫作時，只要清楚自己想表達的內容，文思便往往有如泉湧，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但我不知道自己寫這篇經濟綱領時，重複寫了多少次，只記得自己從頭開始了一遍又一遍。兩三天後，這份草案具備雛形。我的任務是概述**經濟**計劃的內容，以及執行這些計劃所需要的社會和政治措施，但卻無權提出任何與政黨/政治、法律或者外交有關的計劃。

我在前文已經提及，10月23日我們在佐爾坦·沃什的辦公室裏，討論草案中應該包含哪些經濟政策，但是我在寫作時，卻沒有受到任何約束，我可以在文章中，只寫下那些我認為正確的內容。伊姆雷·納吉和他身邊的同事，便會仔細審閱我的草案，然後確定保留或者調整哪些內容。

如果當初這個草案被接納了，那麼總理便會在準備工作完成後，宣布摧毀計劃經濟體系，並且建立市場經濟（而非指令經濟）的政府目標。為了順應這種變化，他還允許工人在企業管理的決策過程中擁有發言權，由此把「工作場所民主」制度化（我為這份草案工作了兩三天後，許多工廠先後成立工人委員會的消息，紛至沓來。這讓我進一步堅信自己的觀點，即是施政綱領中，一定要包含允許工人進行自我管理的內容）。

這份草案鼓勵私人手工業者和商人重操舊業，但是並沒有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制改革的問題。與此相反，它強調了必須要保護國家財產。

在農業方面，被迫組建的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可以根據其成員的意願自行解散，並且恢復農民的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政府

承諾對決定繼續運作的合作社提供支持。

這份草案建議，全方位地建立更加廣泛的外貿關係，但是並沒有要求匈牙利脫離COMECON（經濟互助委員會），*或者全面實行貿易自由化。

草案還提到微觀經濟中的緊張局勢。雖然它強調不能損害現在已經實現的生活水平，但是它卻無法保證它繼續取得快速發展。†

我撰寫的草案直接延續了1953年「新路線」的精神，只不過其時代背景，變成了三年後的具體經濟環境。此外，這份草案在建立「市場社會主義」和「工作場所民主」方面，超越了當年的運動。1953年6月的決議，完全沒有體現這些內容。顯然我在過去的十到十二個月裏所做的研究，和我們的改革提案（它受到專家的高度評價），促使我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因而使我在改革草案中，極力推崇這些觀點。

讓我們回到1954年。如果伊姆雷·納吉當時在1954年10月（即奪取黨的中央領導地位，並贏得暫時性勝利的幾周後）向議會發表正式演講，那麼我起草的草案，可能便會成為施政綱領的完美出發點。這的確是為伊姆雷·納吉「量身定做」的草案，它與他激進的改革共產主義思想框架，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

但是毫無疑問，自1954年10月後，歷史並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1956年10月23日發生的事情，遠遠超出類似政治活動的框架。在革命開始的前幾天，人們還可以想像如何保留一黨制，並對執政黨進行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但是很快人們便發現事態的變化，正在不斷加快步伐。執政黨與1945年的聯盟政黨組建了臨時聯合政府。

---

* 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是協調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組織。西方國家通常將其稱作COMECON。

† 10月23日的準備會議上，曾經對這一點展開激烈的辯論。有些人希望盡可能地為伊姆雷·納吉制訂出受人民歡迎的施政綱領，而其他人認為施政綱領中只能做出現實可行的承諾。當時出現的兩難抉擇，似乎在今天仍然不斷困擾著政客們，並且導致他們內部出現分裂。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認為應該做出符合實際情況而且負責任的承諾。

在短短幾天內，便有二十多個政黨先後宣布重新成立，當時的政治局勢迅速向多黨制發展。到了革命開始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時，我發現自己的草案與實際政治局勢沒有任何聯繫，而且為多黨聯合政府起草經濟計劃，成為讓我措手不及的任務。

我不可能用反事實條件，來假想如果當時的局勢足夠穩定，伊姆雷·納吉可以把這份草案公之於眾，那麼他的聯合政府，會制訂出什麼樣的經濟計劃。1956年11月3日（即蘇聯插手匈牙利革命的前一天），蓋佐·洛松茨基舉行了新聞發布會，並且在回答一個問題時說：「政府內部一致同意擁護過去十二年裏取得的成就。它不會放棄土地改革，不會放棄工廠的國有化進程，也不會放棄社會福利改革……政府決定——而且是全體一致地決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允許資本主義復辟。」[2]在洛松茨基召開新聞發布會前那關鍵的幾天裏，政府的經濟計劃讓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承認我對匈牙利的政治前景充滿懷疑。我並不排除匈牙利激進地超越社會主義改革的界線，並建立西方經濟體系的可能性。

革命中出現的很多事情，讓我感到憂心忡忡，例如革命的氣氛越來越狂熱，我聽到的消息已經顯露出極端主義的苗頭。這並不意味著從政治和世界觀的角度來說，我對社會局勢的發展方向懷有敵意。與此相反，我高興地看到匈牙利似乎正在向真正的民主政治挺進。但是我不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或信息，來制訂適合政治新氣象的經濟計劃。我知道雖然費倫茨·多納特、佐爾坦·沃什或者陶馬什·納吉認為我是個知識淵博的經濟學家，但事實上，我對於從一黨制到多黨制，以及從社會主義制度到真正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過程，所知甚少。*

---

* 三十三年後的情況已經截然不同。我已經掌握了大量專業知識，並且能夠在此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提出成熟及深思熟慮的觀點。1989年我寫《充滿激情的小冊子》（後來我以這篇用匈牙利語寫的文章為基礎，寫出了《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時，我認為自己已經有能力清楚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即我認為經濟計劃中應該包括哪些任務，並且讓執行這些任務的人充分了解我的想法（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經過幾天的痛苦掙扎後，我作出了最終決定——停止制訂經濟計劃的工作。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多納特，他完全理解我的想法。我通過他的秘書，把已經寫下的部分轉交給他。我猜想這個副本現在應該已經丟失了。

放棄這個任務讓我感到非常痛苦——無論在學術上還是政治上，都是一種失敗。歷史的風暴在我的身邊肆虐，而我由於知識儲備太少，而且學識淺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只能空坐在無法繼續完成、唯有半途而廢的文章前，悵然若失。

新報紙*Magyar Szabadság*

我百無聊賴地在書桌前空坐了幾天，偶爾口述一些文件，讓彼得辦公室裏和氣而且能幹的秘書記錄下來。幾天後，我打算出去看看布達佩斯城裏的情況。10月29日早上，我走到彼得·肯德家(他的家和我的家很接近)，邀他一起去帕爾·勒切伊家中。我現在仍然清晰地記得勒切伊穿著粉紅色睡衣為我們開門時的滑稽場面。他迅速換了衣服後，我們三人便開始向Nagykörut街和Rákóczi街的交叉路口走去，很多日報編輯部的辦公室都在那裏。

我曾經閱讀肯德在自傳中對當天情況的描述*：「與我們能想起來的**情況**完全吻合。我唯一能補充的，是我自己當時的感受和想法。」

我們先到了紐約宮，革命前《匈牙利民族報》的報社，就在這棟辦公樓裏。我們在那裏遇到久洛·歐拜紹夫斯基，在過去幾天裏，他一直在為新創辦的報紙《真理報》擔任編輯(卡達爾執政時，歐拜紹夫斯基被判處了死刑，後來由於群眾的強烈抗議，才改為死緩)。他充滿激情地告訴我們，他的報紙力求成為那些勇敢地拿起武器、不懼犧牲的人的代言人，他還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行列。帕爾和彼

* 肯德接受口述歷史檔案採訪時發表了自己的自傳(口述歷史檔案採訪第84號採訪，1987年9月5日至20日，第358，359，372頁)。山多爾·里夫斯在介紹米克洛什·吉邁什生平的書籍中，詳細描述了《匈牙利自由》報的創建過程(1999，第317–322頁)。

得一直在和歐拜紹夫斯基興致勃勃地談話，而我始終保持沉默。我也非常欣賞革命者的勇敢，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動，而且我感到他們的武裝行為，使局勢的發展進入一個轉折點。但他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我不認識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是為了高尚的事業而戰鬥嗎？那些握緊來福槍便兩眼冒光的人，是年輕的冒險家嗎？誰把槍枝交到他們手裏？槍枝開火時，我會因此感到滿心歡喜嗎？除了流血以外，便沒有其它取得民主進步的方法嗎？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我感覺無論從道德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做叛逆派的代言人，都不是正確的選擇和傾向。我不是在對暴力行為品頭論足：我對革命的勝利充滿熱情，但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和促使時局發生這些變化的力量，卻讓我感到困惑，而且我也很難適應這種環境。

我們熱情地和歐拜紹夫斯基及其團隊交談後，便離開他們，繼而前往《自由的人民》報社的辦公樓，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到過那裏了。在前往《自由的人民》報社的路上，我們三個人達成一致意見——不參加任何報社，而要共同開辦一份新報紙。

當時這座辦公樓，已經被多個起義團體組成的新興政治力量佔據了，它們的領導人是伊斯特萬·杜達斯（杜拉斯在卡達爾政權的瘋狂反撲中，被判處了死刑，並且被立即處死）。勒切伊與他們進行談判後回來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創辦新報紙，杜達斯和他的手下絕不會妨礙我們。

此時，米克洛什·吉邁什前來和我們會合，並且同意為我們撰寫創刊號的社論「Magyar Szabadság」（匈牙利自由），這也成為新報紙的名字。[3]與此同時，勒切伊和肯德也馬上開始撰寫文章，勒切伊負責報道國內政策，肯德負責報道外交政策。我的任務顯然是撰寫一些文章，討論經濟形勢，以及它對匈牙利提出的挑戰。

就在不久前，我還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努力起草政府的經濟計劃。現在我打算重新開始這個任務，但是這次放棄起草的速度更快。然而，我不想被困難嚇退，所以承擔了在《自由的人民》工作的最後幾周內負責的工作：整理所有即將發表的文章，並對它們進行技

術編輯。我想我在幫助整個報社順利運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那天晚些時候，我們為新報紙找到了其他工作人員：加博爾·萊納特、伊麗茨·科瓦奇和拉斯洛·霍瓦特等。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都是我從前的同事。我們召集起一個記者團隊，過去在《自由的人民》工作的經歷，讓他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而現在領導他們的是學術帶頭人，和過去勇敢參加《自由的人民》叛逆活動的人。共同的經歷和某些共同的觀念（民主、獨立和自由），把我們緊緊地綁在一起。我們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充滿信心，但是我們也清楚它與拉科西獨裁統治下的共產主義體系，截然不同。

由於我的政治觀點並不清晰，所以我患上了嚴重的寫作阻塞症。聚集在這裏的人聰明睿智，而且目的單純，他們唯一確定的，是自己不想要什麼。除了必須被抹去的歷史以外，他們沒有機會全面討論他們希望達到哪些目的。他們希望選擇誰做長期合作的戰略盟友？他們不願和哪些政治勢力結盟？他們認為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可行性方法有哪些？而必須被排除的方法又有哪些？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我經歷了許多艱難的抉擇過程，如今我更加有能力客觀地評估自己的能力和缺點。當我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堅實自信的學術基礎和道德基礎上時，事實證明這種判斷，往往非常可靠。此外假如想作出理智的判斷，另外一個需要滿足的條件，是我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各種利害關係，並且反復檢查我面對抉擇時產生的第一反應或者即興產生的反應是否合理。然而在充滿戲劇性化發展的10月29日，在曾經是《自由的人民》辦公室的地方，現實情況沒有滿足以上任何一個可以幫助我作出合理判斷的條件。我過去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已經全盤崩潰，而我剛剛開始建立的新世界觀，在我的大腦裏只搭建起一部分框架。我如何能根據這些尚未完全成形的前提，從日常的政治活動中，總結出結論呢？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會依靠政治本能指導他們，而我的本能是沉默。

我在前面幾章中，曾把自己比喻為「**夢遊者**」。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爬上了陽臺欄杆，或者站在屋頂邊緣等危險的地方，而且還無所畏懼地大步向前走。現在我覺醒了，過去兩年（特別是10月

23日）的經歷全面喚醒了我，但是同樣摧毀了我的自信。

多年以後，我曾與米克洛什·吉邁什的同事阿利斯·哈爾達談到那天下午的情況。我們把米克洛什的想法和行為，與我的經歷作出比較。請允許我在這裏，引用她在自己的書裏記述當時談話內容的記錄（我用幼體字表示阿利斯的話，用粗體字表示我的話）。

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我能為匈牙利人民提出什麼建議。然後我突然醒悟了——這項工作並不適合我……

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所有人都在社會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你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幾乎沒有人可以比擬。

問題不是這麼簡單，你可以想像到我在這幾十年裏，已經千百次思考這個問題，而且經常把自己的行為與米克洛什的自我犧牲行為，進行對照，顯然他感覺自己有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判決斷。

……我認為你在良心上受到的折磨，也推動了你的行動。

我一再地受到良心的折磨，我怎麼會無動於衷呢？但是不幸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我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我來打個比方，我開車撞了一個人，而附近又沒有醫生，但我卻不懂及時動手術搶救他。我不可能因為撞了人這個事實，便變成一個外科醫生。[4]

我沒有繼續留在《匈牙利自由》報工作，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有時到經濟研究所上班，有時在城市裏四處游走，有時與朋友見見面。曾經是「叛逆派同黨」的拉約什·費赫爾召開了一個會議，為新報紙*Népszabadság*（《人民自由報》）招募工作人員。當時這張報紙正處於籌備的過程中，他向我發出邀請，但我拒絕了他。伊斯特萬·弗里斯給我家裏通電話，竭力勸說我到電臺裏去，以清醒冷靜的口吻向人們發表講話。我也謝絕了他的提議。我嘗試理解身邊發生的所有事情，每當有好消息傳來時，我都會欣喜若狂，但同時又擔心事態的發展，會轉向錯誤的方向。這種情緒一直持續到11月4日——那天，蘇聯的坦克出現在布達佩斯。

混亂的日子，混亂的年代

我將在本章中，暫時放棄使用年代順序，來描述個人生活中許多重大事件的方式。與大多數匈牙利人一樣，革命結束後的兩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動蕩的時期。如果我是一名導演，那麼我一定會用一系列快速閃回的電影鏡頭，來展示自己的那段生活，例如：我滿心焦慮地等待Gyorskocsi街監獄的審訊*；我坐在桌子前，勤勤懇懇地研讀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並認真地記下筆記；我焦急地在醫院的走廊上踱來踱去，等待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降生，然後護士告訴我好消息：它是個健康的男孩！†；我在經濟研究所裏

---

* 我和其他收到傳票的人，在布達佩斯第二區Gyorskocsi街31號的內務部辦公樓接受了審訊。這個專門負責政治調查的政府機關的正式名稱為「內務部國家警察總部政治問詢部調查司」。

內務部佔據的這個龐大街區位於Gyorskocsi街後部和Fö街前部的交界處，調查司的辦公樓在這個區域的後部。那裏的官員有權在調查期間拘留任何人員，並對其進行政治審訊。我的許多朋友也在被拘留者的行列，我將在本章詳細講述他們的情況。政府將伊姆雷·納吉從羅馬尼亞帶回來後，將他和其他涉案人員一起關在這裏。

軍事法庭和軍事檢舉辦公室在Fö街的前部上。其中的一個房間被專門用來秘密審訊納吉。這種條件非常便於政府實施迫害。政府無需開車帶著被指控者穿過整個布達佩斯市去參加聽證會。調查機關和審判機關都在同一個街區。此外，這種安排還便於保密。伊姆雷·納吉、帕爾·毛萊泰爾和米克洛什·吉邁什就是在Fö街70號被判處死刑。

這個街區的側面有一個廣場，廣場上還有一個綠樹成蔭的公園。現在這個廣場已經被命名為伊姆雷·納吉廣場。

在我們心目中，「Gyorskocsi街」就等同於政治警察審訊犯人的地方。

† 1957年安德拉什降生時的情況與1952年加博爾降生時的情況截然不同。1952年時，他瘋狂的父親還認為一旦他在妻子生孩子的時候，因為這件個人事務離開崗位，而且找人代替他上班，那麼整個世界和報社都會停止運轉，或者說至少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道德罪行。這次安德拉什降生時，他的表現還算像個正常的父親。

與朋友竊竊私語：黨中央派來一個委員會，正在審查全體工作人員，隨後一定會展開清洗運動。這些鏡頭中有快樂的瞬間，如拿到英語版《過度集中》的校樣時，我欣喜若狂；也描繪了許多可怕的消息，如最親密的朋友被捕入獄。此外還有我認真地向紡織廠廠長了解情況的情景等等——這一系列電影鏡頭或恐怖或欣慰、或快樂或痛苦、或啟發或畸形。

我不是電影導演，我不能用這種方法，讓讀者了解在那個受壓迫的時代裏，我痛苦的思想和情感起伏。如果想讓我的自傳完成它應該完成的任務，那麼我必須給它加入分析過程。我必須把整個過程一一分割，然後再對它們進行剖析。本章和下一章敘述了我的生活的種種方面面，許多同時發生的事件，都在我心裏激起各種複雜的情緒——激動、恐慌或充滿鬥爭的欲望。但是我無法活靈活現地把它們再現在讀者面前，因為這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過度集中》的影響在不斷延續

我在革命爆發前夕，把《過度集中》的手稿交給KJK（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即經濟和法律出版社，但在11月初，我卻到他們的辦公室，請求暫時拿回手稿。誰知道在那種局勢下會發生什麼事情？我認為最好還是由自己來保管它。

11月4日局勢稍微平靜一些後，我再次來到出版社。匈牙利版《過度集中》的序言，最早寫於1957年1月，它記錄了我在1956年10月把手稿交給出版社，其中寫道：

> 直到現在這本書才得以出版，並面向大眾。當然我再次仔細地閱讀了本書，但是我認為現在並不適合對它作出修改。我懷著獻身於科學研究的崇高目標，精心準備了這篇論文，而證明其科學性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它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在過去幾個月裏，匈牙利經歷的許多事情，可能將會對今後幾十年造成重大的影響。許多人認為有必要在短短幾個月裏，改變自

> 己在許多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而且有些人的立場已經改變了甚至不止一次。然而，我認為在10月22日得到證實的真理，在10月24日或1957年1月仍然是真理，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是否的確是真理。自從我確認自己真實地記錄下1955年至1956年的情況後（至於這個觀點正確與否，則交由評論家來判斷），我便再也沒有改寫這篇文章。[5]

這些傲慢的言論激怒了某些人，所以他們後來猛烈地抨擊了這本書，但是讓我們不要這麼快地跳到這一部分，目前我們敘述的歷史，仍然停留在1957年。當時匈牙利的政權落在雅諾什·卡達爾和費倫茨·明尼希手中。他們集中所有力量，鎮壓殘存的叛逆勢力，安撫舉行罷工的工人，同時開始推動瘋狂的報復運動，所以當時他們根本無暇顧及書籍出版工作。對我來說，幸運的是KJK的社長蒂博爾·凱賴斯泰尼，和手稿的編輯瑪吉特·希克洛什，決意冒險把這本書送到印刷廠。幾天以後，《過度集中》出現在書店裏，而且很快搶購一空。

在幾個月前（即1956年底），《經濟評論》（*Közgazdasági Szemle*）雜誌社的蘇莎·埃塞，精彩地報道了我的論文答辯情況[6]，很多人因此注意到這本書。其後媒體上又出現兩篇評論，高度讚揚這場論文答辯，其中一篇的作者是捷爾吉·彼得。他特意把這篇文章，發表在重新組織起來的拉克西派掌握的周報上，而且全文從頭到尾，毫無保留地讚揚了《過度集中》。[7]

但是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對《過度集中》的褒獎之詞，日漸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從1957年春天開始出現的一系列攻擊。經濟雜誌、經濟周報、《自由的人民》和大學裏油印的教材上，都赫然出現批評它的文章，並且把《過度集中》描述為「修正主義」的典型代表*。人們譴責它否定了計劃經濟的基本原則，並且試圖釋放市場的自發力量。用蓋佐·里普的話來說，「經濟學中出現的修正派觀點……往

---

* 「修正主義」是常用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它指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妄圖修正一兩條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人。這種描述並不適合我，因為我根本無意修正馬克思主義。我已經與它徹底決裂。

往與反革命的意識形態準備工作，密切相連，前者為後者提供了經濟學依據。」[8]安德烈·莫爾納評論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經濟學並非與反革命活動沒有聯繫。……我們學到的教訓是，即使對修正主義的苗頭也不能姑息」，他還繼續批判說，我的書是露骨地表現出這種苗頭的典範。[9]埃米爾·古亞什[10]在黨校教材中寫道：「科爾奈的論文，完美地滿足了為反革命活動進行學術準備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的需要。」*

1957年9月，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出席了學院院長伊斯特萬·弗里斯在共產黨重組後建立的政治學院上發表的演講。演講的後半部分，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攻擊「修正主義」經濟學家。他對捷爾吉·彼得的攻擊只是點到即止，但對於陶馬什·納吉和彼得·埃爾德什則大肆抨擊。最後一個輪到的是我，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在聽眾席上，如坐針氈而且惶恐不安的感受。當我聽到一年前還盛讚我的作品，發給我獎金，並為我提升職位的伊斯特萬·弗里斯，居然如此猛烈地攻擊同一本書時，使我感到十分震驚。他說應該把我的作品中傳達的信息，解讀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排斥。如果書中表達的是科爾奈本人的真實想法，那麼可以認定科爾奈，不僅持反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且更在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當我閱讀這些攻擊我的文章時，我的心中都百感交集。我在認真研究他們的觀點後，得出一個結論：事實上這些攻擊者是完全正確的。《過度集中》的意義，不僅在於簡單地指出一兩個問題，或者批判經濟管理中一個狹窄的領域。這本書指出了作為一種社會體系，指令經濟體系完全不能有效運轉。《過度集中》確實融入了質疑社會主義體系根基的學術潮流，因此為10月23日革命的意識形態準備工作，作出一定貢獻。它的作者，也確實與

* 尤若夫·雷沃伊也在1957年撰文猛烈抨擊了為反革命活動進行意識形態準備的行為，以及某些人在學術戰鬥中表現出來的懶散。這位《自由的人民》前主編在文章中也批評了我幾句。即使在卡達爾領導共產黨的年代裏，他的文章聽起來也過於刺耳，因此一直沒有獲准發表（PIL 793. f. 2/116. ö. e., p.14）。

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了，我完全接受這些指責。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內容。故事的另一半與辯論和抗辯過程中包含的事實和真理無關，而是牽扯到我遭受學術攻擊時的時代背景。這不是辯論者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進行的學術決鬥，即雅諾什·科爾奈提出這樣的觀點，而蓋佐·里普、安德烈·莫爾納、埃米爾·古亞什和伊斯特萬·弗里斯則提出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他們可以自由地攻擊我，但是我卻不能公開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或者展示我的所有論據。這一切發生在1957年，當時我的許多摯友都被捕入獄，另外一些摯友也被工作單位開除。所有曾經對革命表示認同的人，都遭到了迫害。在這種情況下，被劃分為「修正主義者」，或者背上「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罪名，等同於可怕的政治威脅。確實，安德烈·莫爾納已曾經警告讀者，「即使對修正主義的苗頭也絕不能姑息」。

我將會在後文中，再次談及這些威脅的具體表現形式，因為首先我要繼續描述《過度集中》的命運。當國內對它的攻擊此起彼伏時，《過度集中》大事記中的另外一個重要事件發生了。安德拉什·納吉簡要地概括了《過度集中》的內容後，鼓勵青年經濟學家伊斯特萬·扎多爾叛逃到英國時，把它帶在身邊，並交給了英國的一名經濟學家。扎多爾接受了這個任務，最後這個摘要輾轉流傳到現代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哈佛教授約翰·希克斯手中（他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與此同時，匈牙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德·亞索伊（即安托爾·亞索伊）閱讀了這本書後，也請求希克斯注意我的作品。*隨後希克斯建議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不久後出版社便

---

* 扎多爾後來自殺身亡，我永遠不可能有機會與他討論關於這本書發生的諸多故事。多年後亞索伊教授曾與我通信，但我仍然想不起扎多爾和亞索伊教授的舉動同時發生還是存在某種聯繫。我深深地感謝這三位學者對我的幫助——希克斯、亞索伊和扎多爾，沒有他們就沒有英文版《過度集中》。請允許我援引1990年亞索伊教授來信中的其中一段：「你不必向我表示感謝，無論你是否覺得這份感謝來得太晚。1957年我推薦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你的作品，是因為我認為它非常新穎獨到，非常值得出版。我在這件事上起到的作

給我提供了一份出版合同。

我自然不想錯過這塊「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但是按照規定，出版學術作品時，必須得到學院院長伊斯特萬·弗里斯的批准。弗里斯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事實上是多面性）。他曾經把我的文章捧到天上，然而又因為同樣的文章，把我踩在腳下，但是這次他卻同意出版《過度集中》的英文版本，我馬上開始找人翻譯這本書。幸運的是，我在德國學校上學時的同班同學瑪莉亞·克納普的哥哥，是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他接受了翻譯的任務，而且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謹慎和負責態度，完成了這項工作。我在寫到這一段文章時，剛剛瀏覽了我們之間的大量通信，我們在信件裏澄清了所有術語的含意，和所有可能引起歧義的表達方法。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任務，我要認真傾聽這位謙恭地忠實於原文的翻譯的意見。此外，我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在西方出版這本遭到匈牙利出版界的謾罵攻擊，並且被劃分為危險的反革命作品的學術專著。

1959年英語版《過度集中》[11]在西方國家出版後，很快便引起整個西方的關注。《金融時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衛報》[12]等三家英國主要報紙，紛紛發表了讚揚它的文章。權威的經濟學期刊，也認真地評論了它，而且讚美之聲不絕於耳。《美國經濟評論》寫道：「毫無疑問，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文風公正坦率、洞察力敏銳，而且分析詳盡可信。」[13]倫敦的《經濟學》雜誌評論說：「科爾奈先生讓我們所有人都欠了他一個大人情，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邏輯嚴密而且連貫的畫面〔；〕……他的著作是迄今為止獨一無二的作品，共產主義世界裏，從來沒有曾經出現這種學術著作。」[14]

多年後，我見到了亞歷克·諾夫、約瑟夫·伯林納、大衛·格拉尼克、尼古拉斯·施普爾伯和其他曾經評論《過度集中》的作家本人。他們告訴我，這卷書當初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他們一直在猜測，誰會敢於在鐵幕後完成這樣一部的作品。

用，是我閱讀了匈牙利語版本的原著，並發現它的價值，而且希克斯認為我的意見值得信任。」（我已經將這封信收藏在我自己收集的資料檔案裏）。

被經濟研究所開除

我的一生中，有許多重大的決定性事件，都與布達佩斯的納多爾街聯繫在一起。世界大戰爆發前，父親的律師事務所便在這條街上。我在前文曾經提及經濟研究所也搬遷到了那裏*。1956年11月底，我在納多爾街和默勒格街的交叉路口，遇到一位年輕女士。她是改組後的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五區的黨委書記。我度假時，曾經和她住在同一家招待所裏，因此彼此非常了解。我們簡單聊了幾句，主要是談及過去幾天裏發生的事情和政治環境。在這次談話中，我告訴她我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過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說這番話時，並不自信，我請求她以黨委書記的身份，注意這個事實。

我為什麼要對這個友善，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士說出這番話呢？因為這麼做完全是出於憤怒和蔑視。我希望把自己與那些迅速改變立場，對革命不予理睬的人劃清界限。我在經濟研究所的一些同事面前，也表明自己與馬克思主義劃清了界限。當時學院的黨支派剛剛開始進行重組——重組意味著所有黨員的身份自動中止，那些希望重新加入共產黨的人，必須再次提出申請。起初，這項工作由彼得·埃爾德什和羅伯特·霍克負責——以前他們和我在同一間辦公室裏共事。我宣布自己不會加入共產黨，而我對地區黨委書記發表的言論，也迅速傳到了學院裏。這些都被永久地記入我的幹部檔案裏：雅諾什·科爾奈曾經宣稱，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伊斯特萬·沃爾高、埃德·泰斯或耶諾·拉茨也拒絕馬克思主義，這不算是什麼特別的罪行，因為他們自始至終都被看作「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然而，我卻不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起初人們只是把我視為「異教徒」，但後來他們發現我成了「叛黨者」。我曾經掌握了真理，然後又

---

* 後來國家計劃辦公室的辦公樓也設在納多爾街上。我經常在那裏研究我們的數理計劃模型，而且在那裏與蘇莎·達尼埃爾相識相知。她在計劃辦公室工作，後來成為我的第二任妻子。

背叛了它。人們可以接受自始至終不加入共產黨的態度，共產主義者甚至可以認為無黨派人士的沉默，是一種善意的姿態，但是那些脫離黨，而且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叛黨者和叛國者。

經濟研究所的大多數同事們，經過或長或短的猶豫期後，都決定加入重組後的共產黨。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我這裏來，向我解釋他們為什麼這麼做。這是一種怪誕的情況，他們似乎在請求我批准他們這麼做，或者在精神上赦免他們。

安德拉什·納吉和我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甚至對入黨的建議敬而遠之。如今已經到了2004年，我不想再根據是否在卡達爾執政時期入黨，來對人們妄加評論。我知道黨內有許多正直善良的成員，黨外也有許多虛偽惡毒的人。在這本自傳裏，我所描述的只是1956年至1957年間，匈牙利和一間聚集了大量知識分子的學院的情況。在10月23日以前，研究所裏除了個別人以外，都是黨員。大革命爆發時，幾乎研究所裏的每個人，都表達了對於政治變革運動的同情，而且沒有人曾經發表反對革命的言論。但是當蘇聯坦克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碾得粉碎後，許多人偷偷地溜回了黨組織，這在我眼裏看來具有某些特殊的意味。時至今日，這種迅速改變立場的行為，仍然讓我對人們的決心和堅持原則的能力，持有懷疑的態度，而且始終無法逾越這道心理障礙。

也許當時我的評判標準過於嚴厲苛刻。顯然許多人仍然虔誠地信仰社會主義，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真誠地相信自己加入新共產黨後，能夠比脫離黨組織時，發揮更加積極的影響力。我也承認相當多的黨員，持之以恒地以黨員身份，積極投入改革和國家的發展事業中，但是當時我並不能接受這個觀點。

共產黨復辟幾周後，我接到了耶諾·福克從黨中央打來的電話(耶諾後來成為匈牙利總理)。他擔任冶金和機械部部長時，我們曾經見面。當時黨希望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而福克又曾經聽說我的學術作品，因此極力邀請我與他們合作，不過我婉言謝絕了他的要求。

伊斯特萬·沃爾高也聯繫了我，儘管他掌握豐富的經濟學知

識，而且在學術界久負盛名，但是在拉科西執政期間，他一直在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局勢，而且沒有得到政府的重用。現在卡達爾–明尼希政府邀請他組織一個專家委員會，來草擬詳細的改革提案。在大革命爆發前的幾個月裏，我曾經與沃爾高談了很多次話（這些我在上文已經提及），他仔細研究了我的《過度集中》和1956年夏天在我的領導下完成的改革提案。他嘗試說服我加入這項剛剛開展的工作，但也被我拒絕了。

為什麼我要拒絕他們的邀請呢？當時我還沒有在理論層面上，認識到人們不可能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體系，但我也不能說服自己，支持與社會主義相對的另一種體系。我從來不接受馬基雅弗利式的原則——「越糟即越佳」。我認為只要中央集權官僚體制有所緩解，這便等同於國家獲得了「淨收益」。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我並不反對改革。我拒絕與政府合作的原因，完全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我極度厭惡蘇聯對匈牙利內政事務的干涉，雅諾什·卡達爾及其夥伴的行為也讓我感到憤怒和不齒。他們起初站在支持革命的陣營裏，繼而又背叛了革命。我認為政府把伊姆雷·納吉和他的夥伴強行驅逐出境，是非常醜陋的違背諾言的表現。我在前文曾經說，即使在革命**取得勝利**的日子裏，我的內心仍然充滿了疑惑和迷茫，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但我的政治本能，沒有驅動我積極參與革命。而當革命遭遇失敗，局勢急轉直下時，我本能地意識到，自己應該對這些邀請說「不」。

1957年底，黨中央派出一個委員會，專責調查經濟研究所在「反革命活動」之前、期間，以及之後的情況。*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是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校長拉斯洛·哈伊（順帶提一句，哈伊曾經宣稱：「只要我是這間學校的校長，科爾奈便不可能在這裏教

---

* 1958年*Közgazdasági Szemle*（《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報道了黨中央對經濟研究所進行黨內調查的情況—它的作者在署名處沒有使用自己的姓名，而是縮寫I.K.。

學」）。委員會的黨委書記，是曾經用最刻薄的文章攻擊我的安德烈·莫爾納。一場激烈的鬥爭，在幕後悄悄展開了。*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研究所是滋生修正主義的溫床，因此應該被解散。伊斯特萬·弗里斯和學院黨組織（特別是埃爾德什和霍克），認為為了使學院保存下來，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於是安德拉什·納吉和我便被拿來餵了這些餓狼。†

伊斯特萬·弗里斯知道，親自向我們傳達這個決定，必然會非常尷尬，所以委托陶馬什·納吉代替他完成了這個任務。事實上，這個決定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我們必須開始自己找工作，安德拉什精通外貿知識，因此選擇外貿為職業發展方向，而我則希望在輕工業裏謀取一個職位。

---

* 1958年春天，經濟研究所的黨組織露骨地暗示那些曾經積極參加1956年10月革命活動的教職員工，應該在六月召開的員工大會上，開展真誠的自我批評（其中包括安德拉什·納吉和我）。這些教職員工應該與「反革命活動」及伊姆雷·納吉劃清界限，同時宣布自己忠於卡達爾領導下的新領導層，並且堅決擁護馬列主義。

這次會議於1958年6月23日召開，而就在幾天前政府剛剛公布了對伊姆雷·納吉的判決結果。許多同事一再強調自己已經放棄了以前所持的觀點，並且譴責了自己的行為。而我和安德拉什雖然受到多次警告，卻仍然拒絕加入他們的行列。我們商量好如果有些善意的同事堅持要求我們發言，那麼我們就承認自己在與政治無關的經濟學研究方面犯了「錯誤」。我在發言時，泛泛地談論了中央計劃和經濟領導的重要性，並且承認自己沒有在研究工作中重視這些方面。但是我沒有在政治問題上進行自我批評，沒有譴責十月革命或伊姆雷·納吉，也沒有說自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忠於馬克思主義。安德拉什與我的做法差不多。顯然這種行為最終導致他們作出開除我們的決定（有些留在學院的同事，認為我們的做法「冥頑不靈」）。

† 陶馬什·納吉在口述歷史檔案的自傳性採訪中，回憶了當時黨組織調查經濟研究所的情況：「那時候研究所被稱作『膿瘡』，許多人都被研究所攆走了。我認為值得讚揚的是弗里斯用了不少關係，希望幫助這些被研究所拋棄的人，找到一份還算說得過去的工作……但是他的確沒有態度強硬地為他們辯護過。」（口述歷史檔案 1986，採訪 No. 26, 第133頁）

如今回顧那段歲月，我對於曾經不遺餘力地幫助我找工作的輕工業同事們，充滿了感激之情，他們是捷爾吉·希克、米克洛什·希曼、山多爾·菲勒普和捷爾吉·席勒。他們不僅讓我擁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幫助我找到了可以暗中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職位。我起初在輕工業部計劃局工作，後來調到了紡織業研究所。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經濟研究所也為我提供了不少實際幫助。過去我聽說很多工作單位，對被解僱員工的態度，都非常惡劣，竭力阻撓他們找到新工作。我不知道伊斯特萬·弗里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給誰打了哪些電話，但是我知道他再次展現了樂善好施的一面。雖然他已經做好了犧牲我們的準備（這不是他提出來的主意，而是哈伊和莫爾納的命令），但是他仍然希望幫助我們繼續從事經濟研究。

1958年9月15日，我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經濟研究所。雖然從行政關係上來看，我先後在上面提到的兩個研究所裏工作，但事實上，我的時間完全由自己支配。我在輕工業部的辦公室裏，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它的對面就是可怕的Fö街–Gyorskocsi街監獄的所在地，我的許多朋友還關在那裏，偶爾會被政治警察拖出來接受審訊），而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家裏。我和朋友、同事討論研究課題時，最常到的地方是Gresham咖啡館或Gerbeaud蛋糕店，而不是辦公室。

即使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也沒有感到自己有什麼理由自怨自艾。儘管我失去了在匈牙利科學院下屬的經濟研究所工作的顯赫身份，但是我仍然堅持自己的人生原則，而且在我的身後還有一道強而有力的安全網——朋友和同事對我的支持和關懷。

面臨被捕入獄的威脅

1956年12月6日，我在母親的公寓裏，見到了阿利斯·哈爾達——米克洛什·吉邁什勇敢的夥伴。兩天前，米克洛什曾經在母親的公寓裏，躲過一個晚上，後來又在其他地方躲了一晚。現在哈爾達告訴我，米克洛什已經被政府逮捕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監獄

的陰影，正在逐漸向我逼近。自那以後，我就像驚弓之鳥一樣，每天晚上無論聽到任何響動，都會被驚醒，然後迅速衝到廚房裏，向街上張望，看看是否有警車開過來把我抓走。我在前文提及在拉科西執政期間，我從來不懼怕被逮捕，因為那時我是個「夢遊者」，經常魯莽地爬上陽臺的欄杆，卻絲毫不擔心自己有掉下去的危險。但現在我對這個體系的了解，已經很深刻，所以才會如此害怕遭到逮捕。

儘管我生活在隨時可能被捕入獄的恐懼中，但是我仍然沒有離開匈牙利。在革命失敗後的幾周裏，匈牙利的共產主義鐵幕，多多少少升高了一些，因此非法跨越邊界面對的風險，也相應減少了許多。在這個時期，大約有二十萬至二十五萬人，逃離了匈牙利，其中包括很多我的摯友，例如與我關係最密切的彼得·肯德。我們無法預知，今後是否還有機會再次重逢。將來我有機會出國旅行見他，還是他有機會重返家鄉呢？妻子和我最終決定留在匈牙利。我會在後文的章節裏，詳細談到「去還是留」這個兩難問題。

本章的標題已經明確告訴讀者，它所跨越的時間終止於1959年。這一年是我個人生活中的一道分水嶺，與匈牙利的歷史沒有什麼關係。對我來說，1959年以後不斷受到警察騷擾的生活結束了，那些令人情緒低落，而且無休止的政治審訊，也不會再來折磨我。

我曾經與《自由的人民》的叛逆派之一——山多爾·費克特，就這個問題深入談論了幾次：如果我們被捕，而且審判者要求我們供認罪行，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他毫無畏懼地說，他決不會屈服於政府的淫威之下。我不太相信他能做到這一點（事實證明我的懷疑是

* 我曾經在費科特的公寓裏與他談過這類話題。最近披露的警方記錄，表明當時那間公寓已經裝置了竊聽器（ABTL 0–10986/1, 第187–196頁，山多爾·費科特公寓的竊聽記錄。日期：1958年7月4日）。我曾於1958年7月4日拜訪他。和往常一樣，我們討論了各種話題——有些話題比較高層次（如喬達諾·布魯諾和其他異教徒的殉難精神及中國的未來）；有些話題則沒那麼高層次（如幫助科爾奈家打掃衛生的女工非常健忘或政府最近發布了關於房屋租賃的

正確的，我們將在後文，繼續談論這個問題）。我曾經和那些在拉科西和加博爾·彼得的行刑室裏飽受折磨的人談話，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早已抱有自己的看法。此外，我閱讀了大量文獻資料，內裏詳細記載了蘇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秘密警察，如何引誘受審人說出實情。毫無疑問，我已經得出結論：沒有人能夠抵擋酷刑的折磨，而什麼時候向政府投降，則完全取決於受折磨的犯人的體力和意志力。如果審訊者準備一直使用酷刑折磨受審人，並且使用各種殘酷的手段，那麼只要受審人的痛苦達到一定程度，他便會答應審訊者的任何要求。*我自己便飽受慢性肩膀脫臼的折磨，而且每次肩膀脫臼時都痛不欲生。我有一個令自己非常痛苦的習慣——我經常會想像一些可能發生的可怕事情。所以我不禁反復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有意讓我的肩膀脫臼，然後告訴我除非服從他們的命令，否則不會把它們復位，那麼我該怎麼做？

我決定克制自己的政治舉動，以免政治警察有機會對我施以酷刑。共產主義體制在蘇聯坦克的陰影下復辟了，誰能預料新的壓迫政權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換句話說，卡達爾的政治警察，會從蘇聯肅反委員會、NKVD（內務人民委員會），或者拉科西的國家安全局那裏，學到哪些審訊方法？我害怕受到他們的折磨，我更害怕自己

命令）。我們還討論了人們應該擁有怎樣強大的道德力量，才能抵擋政治迫害，但是負責監聽並解讀這些談話的警察，完全錯誤地理解了我們的觀點。當我在四十六年後閱讀這些滿是圈圈點點和問號的段落時，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感情。我非常希望對警察的粗魯和無知及警察在報告中對我們觀點的瘋狂曲解，一笑置之，但即使在事隔多年後，政府對自由思想的專制統治及可鄙的侵犯私人談話的行為，仍然讓我感到驚駭。

* 喬治·奧威爾（1966[1949]，第196–202頁）用他的酷刑機器和定量刻度，生動地詮釋了這個觀點。只要將酷刑機器上的控制杠移動一個刻度，犯人的痛苦就會迅速增加。對不同的犯人施刑時，應該將機器調在不同的刻度上，如對承認誣告罪名或背叛愛人的犯人施刑時，要將刻度分別調在50和70上。就在費克特被捕前不久，我還將這本書借給他看（ÁBTL V-145-288/文件2，第326頁。日期：1958年12月18日。山多爾·費克特親筆寫的供詞，第6點）。

忍受不了他們的折磨，屆時我不僅會背叛自己，而且更會背叛其他人。我決定盡量不做觸犯法律的事情，正是為了避免自己做出背叛的行為，從而使自己蒙受恥辱。我痛苦、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脆弱行為，這是促使我作出這種決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在這裏，我需談談經常與我談天的夥伴——山多爾·費克特。他勇敢地參加了許多非法活動，因此被捕入獄。雖然他沒有受到肉體上的折磨，但是審訊他的秘密警察，卻用絞刑架威脅了他。在極度驚恐之下，他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還說出他所知道的朋友和同志們的事情*（我曾經提及他關於我的供詞，後文還會詳細講述這件事情）。

因此，我決定不做任何觸犯法律的事情，但是要準確地找到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使在法制健全的國家裏，這條界限也不明確，更不要說在共產主義獨裁統治下的匈牙利了。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條文往往給法律解讀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刑事調查或法院可以利用這種特點，來自行決定哪些行為，將被界定為非法行為，或者何時將其界定為非法行為。我努力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合法的範圍內，這種做法雖然降低了被捕或被政府定罪的機率，但是卻仍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

* 在這裏，我想引用捷爾吉·利特萬在1981年的一個圓桌討論會上的講話。當時他這樣描述山多爾·費克特的行為：「他們（審訊者）給他看了吉邁什在絞刑架上晃動的照片——他自己非常秘密地透露了這件事。他們試著用這類東西來影響他。他後來終於意識到拒絕供認罪狀，會讓他的處境更糟糕。他的確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警察，不過事實上沒有人因為他的供詞而銀鐺入獄，雖然這根本不是他的功勞，而是因為當時警察已經在逐步停止這類調查。」這次圓桌會議由若爾特·喬洛格、久洛·科扎克和米克洛什·薩博主持。關於它的報道保存在口述歷史檔案裏（口述歷史檔案 1981。800號採訪，第953頁）。

† 1957年時布達佩斯流行這樣一個笑話：兩個人在談論剛剛被政府判定有罪的朋友。「我能理解A被判了八年，但是不能理解B為什麼被判了四年，他什麼都沒有做啊！」「哦，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審判的時候，經常會免費送你兩年。」

此外，我也沒有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決定。有時我非常粗心大意，行事草率，有時我刻意越過法律的界限，使到政府有機會「合法地」責問我。但後來發生的事情，表明我在遵守自己的決定，並拒絕參加非法活動時，反而會被推上刑事審判的審判席，這實在令人費解。

當時政治警察多次審訊我，過了一段時間後，這幾乎成了我每天的例行公事。但事實上，我完全無法適應這種夢魘般的經歷。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每次審訊前，我都會接到一張傳票，這多多少少給我一些機會做好受審的準備。*這些傳票從來不會明確說明審訊的內容，而我會集中全部精力在大腦裏，想像審訊中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況，演練我與審訊者之間可能發生的對話，然後猜測他們可能問到什麼問題，而我又該如何回答。有時我的一些朋友或者熟人，會在我收到傳票之前受審，這就會為我的準備工作，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猜測他們的審訊計劃中，可能包括哪些問題。這種準備工作，可以算得上是「學術」任務。事實上，它相當於審訊者和被審者之間的智力決鬥，不過這種鬥爭卻非常艱鉅。我不止一次驚訝地發現，審訊者早已準確地掌握了我想向他隱瞞的內容。他會先聽我半真半假地回答完他的問題，然後指出哪些是他已經知道的情況。

但是真正的困難，並不是審訊者和被審者之間的智力或信息較量。真正讓人們左右為難的，是**道德**上的較量。我們這些尚未被捕的人，試圖在受審前商量審訊者問到各種問題時如何應對，那些後來被捕的人，也應該同樣遵守這些「約定」(有時這些努力並不能奏效，因為某些被捕或未被捕的人，可能違反約定)。當人們不確定受審者的供詞，是否會損害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時，這種情況便會可怕地讓人難以忍受。如果警方認為你是證人，而你拒絕回答任何問

---

* 有一次我患重病臥床休息時，一位警官親自登門坐在我的床邊審訊我。我仍然清晰地記得他結束審訊離開時，我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然後我家的家政女工馬格迪端著一杯咖啡出現在臥室門口。

題，那麼你必然會遭到拘留的命運。如果你不希望被當作嫌疑犯關在牢房裏，那麼你必須回答他們的問題。可是你並沒有提前和其他人商量這些問題，你該說些什麼呢？事實上，我們沒有就被審時應該遵守哪些「道德準則」達成一致意見。

我努力為自己制訂出道德規範和準則，我不打算做一個始終保持沉默的頑冥不靈的證人。我會向審訊者交待那些他們早已掌握的情況，或者泄露一些我認為不會對在押的朋友造成任何實際傷害的事實。我不確定在這場審訊者和被審者之間展開的貓鼠遊戲中，我是否能夠自始至終嚴格遵守自己強加給自己的道德規定，但是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違反這些規定。我很清楚這些準則，不是英雄主義的崇高體現，我也無意像政治英雄那樣，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慷慨激昂地發表譴責專政制度的演講。我為自己設定了更加實際的標準，即遵守禮義廉恥的基本要求，並且盡我所能地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

讓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事例。我將以審訊官審訊我時所關注的問題為線索，來把這些事情串連起來，而不是遵照審訊的時間次序。

政府指控帕爾·勒切伊的其中一項罪名，是他在10月29日創辦了《匈牙利自由》報（這個例子也可以說明我在上文談及的一些情況。我沒有親自為這份報紙撰稿，而且我在報社只工作了一個晚上便離開了，但是這些並沒有阻止警察不厭其煩地在這件事上反復審訊我）。

在調查和審訊的過程中，我作為該案的證人，自然也被傳召了。我和其他幾個受審的人，決定在勒切伊的案子上，對警察和勒切伊的辯護律師統一口徑（雖然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徒勞的）。[15]勒切伊被釋放後，我們多次在談話裏提到這些審訊。當我慶祝七十五歲生日時，邀請了許多親密的朋友參加一個小型生日宴會，勒切伊在這次聚會上說了幾句，他寬容的話語讓我大為感動，而且讓我的內疚之情減輕不少。他回憶說我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訊問時，聲音非常緊張，而且面露恐懼之色，我的所有想法都清楚地流露在臉上：「哦，天啊，但願我不要給帕里帶來任何傷害。」他還說我離開證人

席時，向他瞥了一眼，眼神中飽含著鼓勵和關愛，這使到孤零零地坐在被告席上的他，受到極大鼓舞。

十一月上旬，米克洛什·吉邁什把我和其他幾名曾經當過記者的同事，叫到他在Corvina出版社的辦公室裏，建議通過編輯發行非法的油印報紙或者雜誌來與政府繼續鬥爭，但我並沒有同意加入他們的團隊。除了前文提到的個人原因以外，我對這種主張也不認同，因為我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從事這些活動沒有任何意義。革命已經被殘暴的軍隊強行鎮壓了，共產主義成功地復辟，這些小報能招募到誰來繼續參加革命呢？它們又怎樣去動員讀者反對政府呢？我認為這種行為的風險，與它可以產生的政治影響，根本不成比例。

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確定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如果對這種行為進行「風險–績效」分析，那麼無疑我是正確的（除非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措施）。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像米克洛什這樣不畏任何艱難險阻的英雄，為匈牙利民族創造了巨大的道德價值。報紙《10月23日》的問世，充分說明了共產主義政權，無法完全消滅革命精神。

1957年4月16日，我被傳召到Gyorskocsi街。他們開始問我，當時誰參加了在Corvina出版社舉行的會議。[16]我支吾其詞，謊稱自己記不清楚當時的情況。於是審訊我的官員，開始給我讀一名早已在押的與會者P. P.在4月10日寫下的供詞。他詳細地描述了會議的內容及過程，[17]我被自己聽到的一切徹底擊垮了。我發現除了承認P. P.供認的與會者名單屬實以外，什麼也做不了。

審訊官還要求我證實米克洛什·吉邁什在Corvina出版社召開的會議中建議創辦非法報紙。我從審訊報告中節選了以下這段記錄：

問：吉邁什在談話中提出了什麼要求？

答：我記不清楚了，因為當時我們討論了很多時事問題。

問：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吉邁什明確地建議創辦一份非法報紙。我來給你讀一下P. P.證詞裏的相關內容。吉邁什說他想創辦一份油印的非法報紙，而且希望竭力做到定期發

行。我們希望你能證實這一點。

答：我不記得了，而且關於這份報紙，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我已經聲明自己不願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除此以外，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18]

我認為在對米克洛什的審判中，我的審訊供詞處於非常次要的地位。與吉邁什的「罪狀清單」相比，參加11月Corvina出版社會議的人員名單，並不重要。如果說的確有重要的罪狀，那麼也應該是創辦報紙。吉邁什本人後來迫於巨大的審訊壓力，承認了這條罪狀。*

這次審訊對我的震動很大，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這樣可怕的事情：被捕者（在這個例子中是P. P.）提供了對被捕的同事和過去共同戰鬥、但現在仍未被逮捕的戰友極為不利的證供。四十七年後，當我為了撰寫這本自傳而查閱資料時，我閱讀了大量與P. P. 有關的文件。顯然他被捕後，很快在自己的供詞裏，披露了許多人士的資料。[19]

在Corvina出版社召開的會議上，我第二次拒絕參加政治活動，但我並沒有因此而逃脫被傳召到Gyorskocsi街接受審問的命運。

山多爾·費克特案在我看來是一件特殊事件，它充分解釋了我為何在拒絕參加非法陰謀活動中，採取了前後不一致的態度。

在1956年與1957年的歲末年初之際，費克特以「匈牙利人」為筆名，發表文章評價了革命的成因、過程及成功和失敗之處。[20]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好朋友，傳閱了這篇文章。後來他在警察局的供詞中，準確無誤地引述了我在一次機密的談話中，對這篇文章的評論：我認為他的論文「太馬克思主義」了（我曾經在上一章提及這件事）。

讓我們回到「匈牙利人」的文章上。儘管我對其內容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仍有保留意見，但是我願意通過非法途徑，幫助費克特

---

* 山多爾·里夫斯在自己的著作（1999）裏，描寫了米克洛什·吉邁什在被捕和審訊期間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威脅。吉邁什後來被判處了死刑。

把這篇文章在西方國家發表。我把費克特介紹給一位年輕的希臘裔塞浦路斯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約爾斯·瓦西利烏。*約爾斯是一個魅力十足，而且聰明伶俐的年輕人。他當時在伊斯特萬·弗里斯的指導下攻讀備選學位，他因此來到了經濟研究所，並且與安德拉什·納吉和我結下深厚的友誼，他經常到我家裏作客。約爾斯可以合法地離開匈牙利而前往法國和英國，並且同意把費克特的論文帶給住在巴黎的傳奇人物——歷史學家和政治記者費倫茨·費伊特†及彼得·肯德。我沒有要求費伊特做什麼，但是我很清楚會發生什麼。警察局保存的約爾斯供詞，表明費克特和他的團隊，認為如果約爾斯向費倫茨推薦費克特的作品時，可以引用我的名字，那麼這將對他們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巴黎人便會確信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挑釁而來到西方。費克特的文章出現在法國主要的學術論壇上，並且引起了不小的轟動。[21]約爾斯已經和我商量好，用一種秘密的信息，來確認他是否成功地將這篇文章送到指定的學者手中。

約爾斯因此受到了警方的騷擾。[22]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卻因為這件事被開除出黨。其後他很快便永久性地離開匈牙利。

三十年後的1988年，約爾斯·瓦西利烏成為塞浦路斯共和國的總統。‡

還是讓我們回到1958年至1959年間，在Gyorskocsi街上發生的

---

* 安德拉什·B·海蓋迪什於1991年採訪了約爾斯，並用匈牙利語出版了採訪內容。他的名字翻譯成匈牙利語後，是Georgios Vassiliou（喬治斯·瓦西利烏）。作為這個希臘男孩的匈牙利朋友，我們通常都叫他「約爾斯」。這本自傳中談到他時，都會使用這個名字。

† 費倫茨·費伊特移居海外前，是《論據》雜誌的編輯。詩人阿蒂拉·約瑟夫也在這家雜誌社工作。當時費伊特已經成為東歐問題的權威專家，在法國享有很高的聲譽。我寫作這本自傳時，他正在與匈牙利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九十五歲生日。

‡ 1990年匈牙利共和國的總統阿帕德·根齊在日本出席一個招待會時，坐在他旁邊的一位賓客，操著流利但是口音非常奇怪的匈牙利語說：「我也是一位匈牙利人總統」，這就是約爾斯。他當時已經擔任塞浦路斯總統。

事情。警察發現我始終與彼得·肯德保持聯繫，而且知道了「匈牙利人」的文章被偷偷帶到國外的事情。[23]費克特和瓦西利烏對此供認不諱後，這個事實已經無可辯駁，所以這清楚地證明我「忽略了及時向政府彙報的責任」。

在幫助這篇署名為「匈牙利人」的文章傳播到國外的過程中，我毫無疑問違反了自己制訂的準則——絕不參與政治活動及非法活動。我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當初沒有堅持原則，也許我困在了友情織成的網中，而無法對他們說「不」。我為自己制訂了這條禁令後，拒絕了許多密友邀請我參加政治活動的請求。山多爾·費克特也是我的朋友，雖然我們的關係不像和肯德、勒切伊或吉邁什那樣親密無間。當他們提出把這篇文章送到國外時，肯德遠在巴黎，勒切伊和吉邁什則身陷囹圄。也許我擔心再次拒絕幫助費克特，會失去一份友情——他是曾經和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中，唯一還在我身邊的人。

但不管怎麼樣，這份友誼還是逝去了！

友誼和團結

在當時的環境下，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援助那些受卡達爾政權壓迫的人。我清楚地記得許多從拉科西的監獄中釋放出來的人，憤怒地指責過去的朋友，拋棄了他們及其家人。

山多爾·諾沃馬茨基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好朋友，他當年也參加了《自由的人民》的叛逆活動。在大革命爆發前，他在《文學新聞》上發表了一篇備受爭議的文章。這篇文章引用斯大林的話，討論了共產黨的傲慢：「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24]當局終究不能原諒他的冷嘲熱諷。諾沃馬茨基被警察帶走時，我根本不明白政府到底是什麼理由逮捕他，我希望和我倆都認識的朋友拉約什·費赫爾談談。我們為《自由的人民》的叛逆派黨員大會做準備時，我曾經在諾沃馬茨基的公寓裏見過費赫爾幾次。費赫爾過去一直是伊姆雷·納吉的親密戰友，現在卻成為卡達爾集團的核心成

員。我幼稚地希望請求他介入這件事件，以幫助山多爾釋放出獄。他的辦公室就在議會大樓裏，我透過自己在報社工作時積累下的人脈，聯繫到費赫爾的秘書，而且預先告訴她，我希望見她上司的原因。拉約什·費赫通過秘書回應我，說他不會接見我，他說根本不想插手諾沃馬茨基的案件。

我和幾個朋友定期為被捕者的家人募捐，[25]我認為這種做法，沒有超越我為自己設定的界限。它完全出於人道主義的博愛精神，而非政治行為。當朋友的家人在貧困中掙扎時，我絕不能忍受自己袖手旁觀。而且有時受到我們幫助的不僅是「朋友的家人」，受助人本身也是我們的朋友，如吉齊·勒切伊或伊娃·諾沃馬茨基。但是除此以外，我們認為通過募捐幫助他們，是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所以雖然我們和有些囚犯的妻兒素不相識，但是我們仍然應該向他們伸出援手。

事實再次證明，我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政治仍然干預了「人道主義」活動。警察調查梅瑞–伊斯特萬–費克特案件時，認為我們的捐款行為是「政治陰謀」的組成部分。我猜測警察局的局長，一定由此聯想到過去那場奇怪的「群眾運動」——「紅色援助」。這個非法的共產主義組織，專門幫助在霍爾蒂政權下遭到囚禁的同志的家人。孤立的黨員往往能透過這個運動，接觸到更多同情革命的人。當局一定認為我們的捐款行為，只是在用相似的手法，掩蓋有組織的非法活動。他們無法想像這種行為背後的動力，只是出於人性和對羈押者的同情，沒有摻雜任何政治目的。

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不過我還有一個很可笑的故事要訴說。雖然身邊的朋友和同事紛紛遭到逮捕，但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幽默感不會隨之泯滅，因此決定於1957年底在彼得·豪納克家裏，舉辦一個除夕晚會。大約有十至二十人參加了這個晚會，我和彼得是這場「表演」的主要籌辦者。大多數人都表演了精心準備的節目，而且晚會裏的許多精彩表演，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山多爾·費克特和捷爾吉·利特萬，把襯衣從褲子裏拉出來，把皮帶束在襯衣外面，再戴起平頂帽，看起來活脫脫就是兩個俄羅斯農民。這幕

戲的場景設在西伯利亞，利特萬所飾演的人物，已經在那裏流亡了很久。而剛到那裏的費克特，講述他在布達佩斯發生的各種事情：一位激情萬丈的革命者，剛剛加入共產黨，另一位則剛剛被監禁等等。這幕小話劇當時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後來事實證明，許多不幸的事情都被它說中了。

這場慶祝活動延續到了Gyorskocsi街上，[26]我們在新年晚會上，以幽默的方式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舉動，引起了當局的重視，並且被定性為陰謀活動。他們認為我們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反動組織，打著新年晚會的幌子來考驗並吸納成員，同時製造出反革命氣氛。

與此同時，我清楚地看到，並不是所有友情都能抵受艱苦歲月的考驗——有些人的品性在當時便能清楚看到，而有些人的面目，則要在幾年後警察局和告密者的報告被公之於眾時，才暴露出來。不過與此同時，我也發現透過歲月考驗的友情，往往歷久彌堅。我可以坦誠，並且毫無保留地與摯友交談，而且在最困難的時期安心地依靠他們，擁有這樣的朋友對我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現在我要在這裏提及的，是我的第一任妻子——泰里。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而泰里始終站在我的身旁，不離不棄，而且無論在何時，我都可以從她那裏得到諒解、建議和幫助。

同樣在這段艱難的歲月裏，我與彼得·豪納克和考蒂·豪納克、吉齊·勒切伊、杜奇·福尼、伊娃·喬托、久里·利特萬和伊娃·利特萬、安德拉什·納吉和阿吉·洛松茨基的關係，日益親密起來。我們被千絲萬縷的聯繫，緊緊捆在一起，從交流對最新政治新聞的看法，到進行持久的熱烈的理論辯論；從相互開玩笑，到共同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這些真正的友誼，貫穿了我們的一生。

後來我在美國居住了很長時間，我注意到美國人使用「朋友」這個詞語時，非常隨意。他們所說的朋友，可能是在聚會上一同享受快樂時光的人，也可能只是在大學委員會上，曾經見面一兩次的人。在我所生活的年代裏，人們不會輕率地使用這個詞語，因為它的含意重若千斤。如果沒有朋友，那麼人們將無法承受獨裁統治給生活帶來的重壓。

7 我的大學：1957–1959年

高爾基用《我的大學》這個書名，描述生活（而不是大學老師）教他學會許多東西的時期。在這裏我想借用這個書名，來講述自己其中的一個人生階段。我在1955年之前，學到了許多實用的經驗，以及令人冷靜，並且使人覺醒的教訓，它們可以被稱作「預備培訓」。1955年以後，我雖然成為了一名專業的科研人員，但仍然堅持自學不輟，只不過這時的學習，更加有條理，而且更加講究方法。

自學成才

革命失敗後，我雖然決定不離開匈牙利，但是同時也下決心，要融入西方的經濟學研究陣營。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時，在我心中激起的怒火，是推動我有意「崇洋媚外」的主要動力。

雖然我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閱讀德語著作，但是我的第二外語－英語，卻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因此，1957年我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把它撿拾起來。雖然我的英語口語非常糟糕，但是我卻能夠輕鬆地閱讀英語版的經濟學著作。

如果把我閱讀這些學術著作的方式，描述為不加選擇地貪婪「吞食書本」，那麼這種說法，顯然具有一定誤導性（這是我在青少年時期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事實上，我有步驟，而且有系統地閱讀了

大量經濟學著作。也許有些人為我提供了實用的建議，也許我的運氣不錯，但事實是我的確幸運地閱讀了許多基礎性著作，我從保羅·薩繆爾森最著名的教材（德語版）入手。[1]為了進行「期間檢驗」，我還非常仔細地研讀了西德經濟學家埃里奇·施奈德編寫的三卷非常優秀的教材。

讀完這兩套教材後，我對概論性教材的學習暫時告一段落。從那以後，我開始閱讀各種專著和大量的論文及學術雜誌。我現在仍然保存著當時讀書時記下的許多筆記，我在這裏僅列出其中的部分作者，以便讀者了解我當時的閱讀情況（作者的名字按字母次序排列，而非閱讀的次序）：肯尼思·阿羅[2]、薩繆爾·卡林和赫伯特·斯卡夫、肯尼思·博爾丁、瓦爾特·歐肯、拉格納·弗里希、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3]、約翰·希克斯[4]、米哈爾·卡萊斯基、阿瑟·庇古、薩繆爾森[5]、亨利希·馮·斯塔克爾貝格*和簡·丁伯根。[6]我根據自己後來在國外從事研究的經驗，列出了被公認為學術泰斗的名字。†與此同時，我還讀了許多後來我認為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作品。我原本可以把閱讀這些作品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節省下來，以學習其它更重要的著作。但不幸的是，當時我身邊並沒有了解學術動態的老師，來指導我如何選擇書籍。

我戰戰兢兢地投入到閱讀和學習中，我不僅瀏覽著作的文本內容，而且還記錄下它們的要點（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記憶），並且嘗試用書中的理論解決問題。只要我讀到值得做筆記的著作，我便會認真地思考可以根據書中的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作出哪些推論。我們是否能夠直接應用這些理論，來理解匈牙利的企

---

* 歐肯和馮·斯塔克爾貝格都是對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德國經濟學家。1957年我找到了他們的德語著作，這意味著比起那些用英語著書立傳的作家來說，我可以更加輕鬆地吸收歐肯和馮·斯塔克爾貝格的觀點。

† 捷爾吉·彼得和作曲家安德拉什·米哈伊到西方國家旅行時，經常會幫我買這些書籍（米哈伊後來成為布達佩斯歌劇團的團長）。其他書都可以在布達佩斯的大學圖書館和研究院的圖書館裏找到。

業、行業，或者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情況？這是一個讓我終生受益的學術研究方法，因為它不僅幫助我深入理解這些著作的學術研究成果，而且還讓我掌握了它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這些著作，都沒有使用空洞，而且教條式的思辯方法，而是通過嚴密的邏輯論證得出結論——雖然有時它們的論證過程非常艱深，但是我通常都能理解。這些作家不會直接援引權威的論斷來代替論證（所有西方的學生，都知道必須在學術研究中，使用真正的論證過程。而這對我來說，卻是讓我耳目一新的方法。它使我的研究思維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此之前，我所接觸到的各式各樣的學術作品裏，都塞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語錄）。

我感到有興趣的課題，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和它的衍生學科，特別是社會福利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理論（後來我逐漸了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理論）。我從大腦裏完全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偏見，並開始接受「主流」經濟學的思想。這種接受不等於不加批判地一頭投進「××主義」——這是我在過去十至十二年裏研習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我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著作，對經濟現象的解釋非常有說服力。我在學習薩繆爾森的著作時，便已經非常熟悉「新古典主義」的內裏涵意，但是直至我的自學階段行將結束時，我也沒有把自己看作成新古典主義的追隨者。促使我有所保留的，並不是因為我對這種經典思想產生懷疑或者提出反論據，而是因為過去理想幻滅的經歷，在我的心中滋生出逆反心理，而且我已經決定在學術研究上，保持中立態度。

沒有人驅使我努力學習經濟學，也沒有人為此給我頒發學位證書，以幫助我開拓未來的事業。有時我早上剛剛接受過警察的審訊，下午便坐在書堆前潛心鑽研。也許周一傳來可怕的消息，讓我感到不安，到了周二和周三，我便一如既往地完成自己制訂的學習計劃。那時（以及後來我需要解決棘手的重大問題時）我已經把學習和工作，當作成治療精神創傷的良方。

請允許我暫時跳到十幾年以後的情況。我在美國大學正式授課後，我的同事和學生，從來沒有想過我在哪裏學到經濟學知識。這

個問題的答案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我不僅沒有曾經接受任何專業的經濟學培訓，而且從來也沒有在布達佩斯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學習。如果我當初在那所大學裏學習經濟學，那麼我也許永遠都不可能了解現代西方經濟學（我曾經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有機會到那裏學習，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非常盛行，而且共產黨獨攬政治大權）。

蘭格—哈耶克的論戰

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裏，回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經濟學家，就社會主義制度展開的論戰。我對它進行研究，結果它強烈地刺激了我的學術思維。我讀到的第一篇英語版經濟學課本，就是偉大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分析社會主義的經典論文。蘭格寫作此文時，正居住在美國。後來我閱讀了許多大力推動這場論戰的主要學術著作，其中包括由F·A·哈耶克[7]編輯，並猛烈抨擊計劃體制的文集，以及阿巴·勒納的著作《控制經濟學》。在選擇閱讀書目的問題上，艾布拉姆·伯格森精彩的文獻綜覽，使我受益良多。我在拜讀這些學術泰斗的大作時，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有機會見到蘭格、勒納，或者莫里斯·多布本人，或者我在哈佛的辦公室，會緊鄰伯格森的辦公室（後來我們在坎布里奇的住所，距離也不遠）。

捷爾吉·彼得的評論和文章，以及講述南斯拉夫經濟體系的文章，讓我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應該完全透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我自己撰寫的專著，也直接反對「過度集中」的做法。現在我發現早在二十年前，芝加哥、倫敦、英國的坎布里奇和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等地的經濟學家，便已經在非常高的理論水平上，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戰：即是當所有工廠都是國有企業時，這樣的經濟體系，在非中央集權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遠。蘭格針對那些把收益率當作唯一經濟目標的公有企業，建立了它們的生產活動理論模

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不僅沒有放開物價，而且還委托制訂中央計劃的政府機構，根據極其簡單的規則制定價格，即某種產品供小於求時便提高價格，而供大於求時則降低價格。中央計劃機關只需觀察供求關係，並且對價格進行相應的調整，便可以算是完成任務。蘭格運用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對市場和價格的傳統假設，證實了市場將向平衡的狀態靠攏。我在蘭格的文章裏，第一次了解了試錯法。[8]市場經過反復的努力和失敗，終究會實現「均衡價格」。一般均衡理論的創始人，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其中一位巨人——法裔瑞士人里昂·瓦爾拉斯，而蘭格的文章，在字裏行間，都閃爍著瓦爾拉斯經濟思想的光輝。

蘭格的文章，以適當的形式，在適當的時間，出現在學術界。它恰好契合了西方國家中，許多左翼經濟學家的學術需求和意識形態需求。他們對某些形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表現出政治同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堅持反對馬克思主義強烈抵制市場的觀點，並且出於自己的理論信仰，從實踐的角度出發，堅決支持市場。他們刻意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定距離，而與瓦爾拉斯和新古典主義理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也是他們為何會熱情地歡迎蘭格的綜合性理論。出於相似的原因，我認為蘭格的觀點，也非常適合自己。它的經濟學觀點，令人心悅誠服，而且它的論證方法，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許用「藝術美感」，能更加準確地描述這種論證的特點），那即是他的理論大廈，呈現出簡潔明瞭，而且非常和諧的氣勢。

但是與此同時，我認為哈耶克的批判思想，也發人深省。他從實際情況，而非理論角度出發，得出了自己的主要觀點。中央計劃機關如何能夠同時追蹤上百萬種產品的供求關係？他的觀點與我熟悉的事實，不謀而合：知識集中化具有不足之處。哈耶克一針見血地指出，市場不僅是一個平衡機制，社會知識處於非中央集中狀態，只有分權的市場和私有制，才能保證人們直接享受到激勵，從而使他們掌握的知識發揮作用至極限。哈耶克的著作，直接把我的

* 起初蘭格提出「成本最小化」的觀點，但在後來的文章裏就對它進行了修正。

注意力，引向知識、激勵和財產的密切聯繫上。當時我仍然不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構，但是至少我開始更加有系統地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我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觀點，並在很多發表的文章中，闡述了它的內容。它為我否定蘭格的建議奠定了基礎，但這些並非來源於1957年學到的東西。我對蘭格理論提出的反駁論，都建立在政治結構和財產關係，以及市場協調之間的不可分割性上。但在1957年時，我還沒有明確地找到這些關係。面對這場論戰，我左右為難，無法作出判斷。蘭格和勒納的推理過程，似乎精巧，而且連貫，但是哈耶克的批判觀點，亦同樣引人注目。

這場論戰的風格，對我的影響不亞於其內容對我的影響。當時匈牙利也在展開一場論戰，而且它的主題與此息息相關。喬治·彼得和我努力宣傳的觀點，與西方的蘭格和勒納的觀點非常相似，但其他學者對我們卻不屑一顧，甚至出言威脅我們。西方的學者們，用文明的語言討論學術問題，用論證過程回應論證過程，而不是用憤怒和誹謗互相攻擊。漸漸地我發現這種論戰方式，並不是始於安德烈·莫爾納，或者蓋佐·里普。侮辱敵人，蔑視持不同觀點的人，並且在他們面前擺出傲慢的姿態——馬克思正是這種辯論傳統的始作俑者。列寧繼承並延續了這種傳統，斯大林最終把它推向頂峰。斯大林不僅公開侮辱對手，而且還把他們一一處決。

繼續研究輕工業

我在潛心學習經濟學知識的同時，也希望繼續研究《過度集中》中的課題，並且使其向兩個研究方向延伸。首先，我希望把它延伸到先前一直沒有精力研究的課題，例如價格、投資，及稅收和信貸體系。其次，我希望追溯經濟管理方法的發展過程，從而了解其中發生的各種變化。我們在革命前提出的建議，及沃爾高委員會（我在第五章曾提及這個委員會）努力推動的建議，是否產生了實際效果？這兩個研究課題，都指向相似的研究方向——即使政

府不完全廢除指令經濟，至少也要遏制它的作用，同時拓寬市場體制的適用範圍。

我繼續投入進緊張的研究工作中。我開始重新聯繫在輕工業工作的朋友，並且結識了不少新朋友。這次我採用了更加有系統的研究方法，並且使用預先設計的調查問卷。此外，我力求把自己從西方經濟學著作中學習得到的知識，應用到實踐中。譬如我了解了公司成本函數的概念後，便將其運用到下一個工廠的採訪中，嘗試確定該紡織廠真正的成本函數。與此同時，我提醒自己注意這是一個多級垂直生產，以及同時生產多種產品的典型例子。我接觸到替代和替代的邊際率等概念後，便努力想弄明白，匈牙利如何對可以相互替代的進口材料和國內材料，進行定價。如果匈牙利採取的措施缺乏理性（即是它沒有遵守西方經濟學著作中的規範性模型），那麼應該怎樣調整定價程序。

把學習和研究聯繫起來，是一種健康而有效的方法。對於有能力把書本中的理論模型，與現實情況進行比較的學生來說，這種方法具有重大的教導意義。它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生記憶經濟學理論，更重要的是，它訓練人們學會如何檢驗理論的實用性。雖然我學到的這些理論，不算重大的理論命題，只是包羅萬象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中，極小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至少幫助我，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缺憾之處——沒有反復運用實踐檢驗理論。

我除了運用實踐檢驗理論外，並且在大腦和筆記中，把剛剛學到的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同時，還嘗試寫下很多不同篇幅的文章，來把這些理論整理出來，其結果就是我在技術和商業領域中發行量較小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許多因素促使我發表這些

---

[*] 我還寫過其它主題的文章，而沒有局限於我所研究的經濟學問題。我經常滿懷感激地想起《生活與科學》（*Élet és Tudomány*）、《觀察者》（*Figyelö*）、《經濟評論》（*Közgazdasági Szemle*）和《統計學評論》（*Statisztikai Szemle*）的編輯。他們非常清楚執政者並不願意看到我的文章變成鉛字，但是仍然義無反顧地刊登了這些文章——其中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我賺些外快養家糊口。有時他們被迫以匿名的形式發表我的文章或者使用我的姓氏的縮寫（有時甚至使用假名）。

文章：首先他們都是練筆之作。我是一個瘋狂的「書寫迷」，如果長時間不寫作，會讓我感到難以忍受。此外我極度希望理清自己的思路，這也驅動著我筆耕不輟。無論現在還是過去，無論我在研究什麼課題，我都需要把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各種觀點，記錄下來，從而方便自己理清它們的次序——這種寫作的結果可能是一篇文章，可能是寫給別人的信（雖然這封信可能永遠都不會寄出去），也可能是寫給自己看的筆記。對我而言，我需要透過寫作來理清思路。

激勵我不斷寫作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希望與其他人一同分享這些信息。一旦我透過努力而終於理解某個理論或問題時，我便會急不及待地希望其他人也來閱讀這些理論，並且真正地理解它們。

這些文章的篇幅並不長，沒有對經濟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任何貢獻，也沒有幫助我取得更高的學術成就。但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它們的確幫助我的專業素養迅速成長起來。如今回顧這段歲月，我認為它們的作用，相當於運動員的訓練過程。

脫離關係

為了使這本自傳的結構更加清晰，我不得不把許多交織在一起的事情，拆分開來單獨描述。上一章我專門講述了席捲了我和身邊許多人的政治風暴。而本章到目前為止，則敘述了平靜的學術活動——我像牛津、普林斯頓和基爾大學的所有年青學者一樣，專心讀書、與同事交談、做筆記或寫作文章。但是請允許我重申這一點：在那個年代裏，我的處境與這些學校的學者相比，可謂天壤之別。我所閱讀的經濟學著作、警方的審訊、我的寫作及惡劣的政治事件等，都對我的思想、情感及精神的自由馳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政府就「匈牙利人」的文章，對山多爾·費克特展開的政治調查還未平息時，曾經在經濟研究所共事的一個同事來找我。他是一名積極的共產黨員，對黨懷有無比的忠誠。他一直對我非常友善，我們的關係向來也非常融洽，所以他非常了解我的觀點和朋友圈子。

我們閑聊了幾句後，他給我帶來一道消息：「同志們認為你最好可以用某種形式，和彼得·肯德劃清界限。他現在在巴黎攻擊我們的國家，而且援引了你的文章。」當時人們經常使用「同志們」這種沒有明確所指的模糊稱謂。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都沒有詢問他，到底誰指派他來給我傳達這個信息。而且由於我在寫這本自傳時，他已經與世長辭，所以我再也沒有機會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我懷疑背後的操縱者，是伊斯特萬·弗里斯。政府的審訊者也許已經向他了解他對我的看法，並且告訴了他「匈牙利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約爾斯·瓦西利烏在他的指導下攻讀學位，所以這件事情，必然讓他大為光火。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他曾經閱讀我在《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我將會在後文詳細講述這件事件）。不過這些都是我的猜測而已，這個消息的來源，也可能是黨中央或警察局。儘管這位過去的同事，用非常友善的語氣，向我傳達了這個信息，但是我強烈地感覺到，其幕後指使者所對我赤裸裸的威脅。

彼得·肯德在法國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談論匈牙利計劃經濟的文章，風趣而且睿智，並在文中多次引用《過度集中》的內容。[9] 顯然他認為按照學術出版物的慣例，引用他人文章時，必須準確地指明所引用觀點和信息的具體來源。此外，由於我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與他進行學術對話，他深深地影響了我的觀點，所以他可以認為自己局部地參與了《過度集中》的創作。他也許認為基本上所有作者，都會因為自己的作品被其他人引用而高興。我的確非常高興——但除了1957年彼得·肯德引用《過度集中》的那次。他的做法令我的處境非常尷尬，因為費克特和瓦西利烏當時，正在Gyorskocsi街接受審訊。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科爾奈–肯德組合在「匈牙利人」文章發表事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審訊官審問我時，給我看了他們的審訊記錄（我在前文曾經提及，肯德–科爾奈組合是警局記錄上，對我的公開指控之一）。

我決定聽從「同志們」的「建議」。當時我正在寫一篇文章，講述自己有關對輕工業的研究結果。它探索了「定量觀」和「經濟效率觀」影響管理者行為的程度和範圍。[10] 我用極其牽強的方式，在文章裏

表明了與彼得·肯德劃清界限的態度。這段文字抗議了他曲解我的作品，把社會主義必將失敗的觀點，強加在《過度集中》上，同時他又進行了自我批判，認為這本書的語言表達有缺陷，才導致他得出這些結論。

向政治壓力屈服，是一種令人感到壓抑，而且屈辱的感覺，當我對彼得做出這些事情時，感覺尤其羞愧。我可以自我安慰地說，他現在居住在巴黎，十分安全，所以這些言論，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傷害，我受到的壓力，因此也會相應減輕。頭腦冷靜的經濟學家，通常把這種行為稱作「帕累托有效解決方法」。*我可以為自己辯解說，這是一種生存策略，但是我感到「脫離關係」的舉動，違反了自己的友情準則。

彼得移居海外後，我們在1964年第一次重逢。當我們談到這件事情時，彼得只在一個問題上責備了我：你為什麼沒有在文字中，向我傳達一種信息，表明「我被迫寫下這些文字，但這顯然不是我的本意」？我承認這是自己的疏忽，而且我們協議再也不會提起這件事。

儘管在彼得旅居國外的幾十年裏，我們在世界各地曾經多次見面，例如在巴黎、威尼斯、比利時、荷蘭、英國、瑞士和德國，從八十年代末以後，我們還可以經常在布達佩斯見面，但是我們始終遵守了1964年的約定，再也沒有提到這個敏感的話題。我猜測彼得對這件事情，一定是百感交集，但是他的幽默感和諷刺感，卻在各種情緒中佔了上風。五年後他出版了自己的文集，並收錄了刊登在法國雜誌上的那篇文章。他送給我一本書，在內頁的題辭部分寫道[11]：「我可以與敵人勇敢地鬥爭，但是上帝拯救了我，沒有讓我與朋友兵戎相見！作者署名。」

---

* 「帕累托有效解決方法」的一種變形被稱作「帕累托改進」，即某個行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改善了個人或集體的處境。如果某個經濟狀態無法進一步實現「帕累托改進」，那麼便可以認為它處於「帕累托有效解決方法」狀態下（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福雷多·帕累托在自己的著作裏，首次提出這些概念）。

走進死胡同

不久前，我翻閱自己研究輕工業企業時所發表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吸引了我的注意：「是否應該修正利潤分成〔體系〕？」[12]在這個看似乏味的題目下，隱藏的是一個時至今日，仍然令人感到激動的課題。1957年匈牙利制訂了一個工業計劃，準備為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工人發放獎勵，以提高利潤。乍看這個主張，似乎大有可為。國有企業正在從「數量最大化」的激勵基礎，轉向「利潤最大化」的激勵基礎——後者是市場經濟中，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典型激勵措施。雖然從理論上來看，這個計劃非常完美，但事實上國企內部的利益分配，非常「不公平」。例如有些企業因為自己無法掌控的外部經濟條件發生變化，而只獲得微薄的利潤，例如國外對出口產品的需求減少；例如有些企業由於受到上級機關的干預，所以未能實現豐厚的利潤；例如上級強迫他們生產利潤率低的產品；還有一些企業認為自己的利潤；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是因為缺少先進的技術設備——而這顯然不是他們的過錯。所有責任都落在那些代表企業進行投資，和技術發展的決策者身上。企業要求「調整」他們得到的利潤份額。由於企業無法控制繁多的外部條件，所以政府應該補償這些外部原因為它們所造成的所有損失。利潤不再取決於外部的供求關係，或售出價格和成本的差額，而是成為政府應該以企業內在優點，作為唯一評判標準，給他們發放公平的獎勵（至於它們在盈利方面的表現「出色」，還是「糟糕」，則無關重要）。

1958年我寫這篇文章時，被我稱作「軟預算約束」綜合症的問題，已經出現接近二十年。企業努力讓上級機關補償它們「無能為力」應對的虧損。事實上，只有在沒有外部力量幫助企業擺脫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無論這些問題是由企業內部原因引發，還是由糟糕的外部環境引發），真正的利潤激勵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也許不「公平」，但是它卻迫使經濟參與者克服困難，努力適應不利條件，即使在困難時期，也要堅持進行技術和商業創新，以創造更多利潤。與此相反，因為某些不利的條件而為企業提供補貼，只能讓他

們消極無為，哭著嚷著要求國家伸出援手，而不是自己努力掙扎，擺脫困境。*

這篇文章的出現，表明如果我能在更加自由的環境裏從事研究工作，那麼我便本可以早早提出那些很久以後才問世的經濟學理論。不幸的是，這只是如果而已。我從1957年開始研究輕工業，並提出許多主要問題，事實證明其中的一個問題，非常難以回答。自1956年後，匈牙利的經濟體制是否發生了變化？政府是否會履行諾言，不再退回到過去的官僚式過度中央集權體制？事實上，在分權的問題上，已經出現為數不多，但是極其寶貴的變化（利潤分成是其中之一），但是許多已經切實存在的變化，卻又發生了逆轉。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公開談論這些研究成果，或者亦不能將其整理後，出版發行。我認為如果這些寫成的文章，只能扔在抽屜裏，那麼這種寫作，並沒有任何意義。當我無法描述或者發表從這些研究中得出的影響深遠的結論和豐富的事實證據時，我只能屈服於這項研究受到的政治約束。我感覺自己困在一個死胡同裏，找不到出口。如今當我提筆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時，我自然很想明瞭當時我對環境的評估是否正確。當初我是否應該終止對這個研究課題的進一步探索，寫出《過度集中》的續篇？換句話說，這種努力是否沒有價值？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當時**我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開始認識到只對研究主題進行少許修正，是遠遠不足夠的。我必須選擇新的研究方法：**把數學方法應用在經濟研究上**——這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本章標題中提到的時間段，終止於1959年。當然，我沒有在一夜之間，從一個研究課題，轉向另一個課題。但是到了1959年底，我已經徹底而且不可挽回地放棄了對1956年後輕工業經濟管理方法的研究。我為了這項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儘管我投入了如此多的精

* 這篇文章發表於1958年，文中提到的這些想法預示了一種研究思路，後來這種思路在經濟學關於道德風險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力和時間，但是它們只是為我的專業發展，積累了一些訓練經驗，這是我唯一的收穫。除此以外，這些工作基本上都被浪費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當幾十年後，我為了寫這本自傳，而再次翻閱與它們有關的文章時，心裏仍然是沉甸甸的。

影響終生的決定

「這絕不是偶然的，同志們！」這是那個年代裏人們談話前，最常使用的開場白。精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聲稱馬克思的著作，從來沒有宣揚極端的宿命論觀點，也不相信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日常生活裏，黨委書記、記者、歷史老師和計劃辦公室的負責人，都喜歡暗示沒有其它**可供選擇的方法**。人們唯一能作出的選擇，是由歷史前進的動力所決定的。而這些決定，恰好與他們發布的指令，不謀而合，譬如除了集體農業以外，沒有其它更適合農業發展的方法。國家制訂的經濟計劃，是唯一正確的「版本」，雖然從表面上來說，所有部門都有權力接受或拒絕它，但實際上，他們只能簽字同意這些計劃。國家裏只能有一個政黨，而且它也是唯一能夠當選的政黨。

到了五十年代後半期，我從多種方式了解到的觀點，都與上述觀點截然不同，儘管它們的表現形式各有不同。我意識到我們的確**有**選擇的餘地。

當時我閱讀了偉大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內梅特寫的許多劇本，當我看到劇本中的人物，面對重大抉擇作出不同的決定，並因此得到不同的結局時，心中感到無比的震撼。在他的劇本中，十五世紀最重要的捷克宗教改革者揚·胡斯，毫不猶豫地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最終被燒死；伽利略在處境最艱難的時刻，作出讓步，自此再也無法找到心靈的寧靜；十七世紀的匈牙利印刷工兼神學家米克洛什·米斯托特福盧希·基什，收回自己的言論後，因為這種沒有原則的讓步，被視為道德有缺陷的人；伊斯特萬·塞切尼起初並不熱衷於1848年的革命，但後來由於無法接受革命的失敗，自殺身亡；

山多爾·裴多菲參加戰爭時，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周圍人對他的期望，但最後因為不願放棄自己的信念，壯烈犧牲。從總體上來說，拉斯洛·內梅特的劇本，並沒有引導人們認識什麼是正確的選擇，而是展示了面對偉大的悲劇性抉擇時，人們可以選擇多種解決方法，並且描述了抉擇的痛苦。

我在那個時期，接觸到了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我閱讀的第一本存在主義哲學書籍，是薩特的短篇作品。隨後，我又研讀了其他人的著作。我對這種哲學思想的理解，是如果世界上不存在上帝，那麼人們便可以自由或被迫作出選擇（也許這正是我希望從中找到的觀點）。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沒有選擇的絕望境地，人們也不能逃避作出決策的責任。共產黨曾經把「黨會做出決定」的觀點，反復灌輸到我的腦袋中，因此當我明白自己有作出選擇的責任，而且不能一味怨天尤人時，便對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當時理性選擇模型，已經成為我從經濟學家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時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框架。我將會在後文的章節裏，詳細批判這個理論。但是現在我希望強調的，是這個模型的其中一個主要優點：它的基本結構表明任何事情都**存在**多種選擇。我們利用這個模型進行實證性分析時，必須追溯那些過去我們可能擁有，但是被否定了的備選選項，儘管這不一定與現實情況吻合。我們利用這個模型進行規範性分析時，必須確定備選項中的哪些約束因素與我們自身無關。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在有限的選項中，自由作出選擇。

讓我簡單總結大約在1959年我所作出的選擇。有些人可以戲劇性地突然轉換工作，開始從事一個全新的職業，但是這個過程卻花了我五年的時間。從1954年到1959年，我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我謹慎地推敲各種可能性，而這個過程中，又不斷閃現出新的念頭，兩者相互影響，最終為我的基本人生規劃，勾勒出大致輪廓。每當外部世界的壓力導致選擇的潛在空間縮小時，便總會出現新的選擇。然而如今回顧那段歲月，我認為到了1959年，我的許多基本決定已經成形。我希望在這裏強調其中五個決定。

1. 我會與共產黨徹底決裂。
2. 我不會移民海外。
3. 我將獻身於學術研究，而不會從事與政治有關的職業。我不會毫無節制，也不會英勇無畏地從事反對共產主義體系的偉大非法鬥爭。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為匈牙利的復興作出貢獻。
4. 我會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
5. 我會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知識。我希望自己的學習和研究，能夠融入西方的經濟學研究。

我在前文已經分別提及這些決定，但是在這裏，我還是把它們整理在一起，以全面回顧我作出的決定。沒有一個決定是理所當然的，也沒有一個決定是預先注定的。我可以從身邊的人（即親戚和朋友們）中，找出無數例子，來證明每個人在其中一兩方面，作出的決定都與我不同，有些人甚至在這五個方面的決定，都與我全然相反。

到了1959年，這幾個決定已經不再是模糊鬆散的人生目標，而是有意識，且經過深思熟慮的人生策略。我把這些原則，告訴了身邊最親近的親人和朋友。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度過了悠悠四十五載。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我可以宣稱這五條原則，貫穿了我的後半生。我不能說自己在所有情況下，都堅守了這些原則，而沒有任何例外的情況，因為人始終是脆弱的。但是毫無疑問，我已經盡我所能地遵循自己制訂的人生策略。如果我違反了某條原則，那麼過後一定會非常自責。我極其重視堅持原則及忠於自我的人生道德準則。

8 數理模型的經濟學應用：1957–1968年

《雙層計劃》

隨著學習的日漸深入，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數學在現代經濟學中扮演著的重要角色。如果沒有掌握數學的語言，我根本無法明白很多經濟學著作。假如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夠達到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標準，那麼便必須學習如何把數學方法，應用到經濟學研究中——這是學習任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需要我不斷進取，以改變我的研究方法。

初識陶馬什．利普塔克

由於我一向都很關注邏輯的清晰性，所以這大大降低了學習的困難。我在學校讀書時，數學和物理的成績便很突出。我開始複習從前學到的數學知識，並且不斷增加課程的難度。我不僅在家中自學，而且還參加了各種課程。我主要學習了當時的經濟學家最常有的數學方法——微積分和線性代數。

此外，我從研究者的角度出發，非常樂意地使用數學方法。我在上一章提及我曾經研究1957年後，輕工業經濟管理方法的轉變過程。作為這項實證性研究的一部分，我開始對企業利潤扮演的角色，產生興趣。西方學者認為公司決策者的動力，必然和公司的利潤最大化聯繫在一起，這一點不需要任何證明或解釋。自1957年開

始，匈牙利開始嘗試為企業管理者，甚至輕工業的全體工人，提供利潤激勵。各種獎金都與利潤掛鈎，不過，掛鈎的方式卻非常奇怪。利潤的分配取決於企業的收益率(例如產品的銷售比例)，是否超過某個具體的水平。用數學術語來說,政府不是在鼓勵管理者努力實現絕對總量(即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實現商數的最大化(即利潤和銷售額之間的比率)。儘管許多人認為這兩種獎勵方式殊途同歸，但是我卻認為它們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經濟效應。

我開始用數學形式闡述這兩種最大化的標準及與它們有關的規劃任務。我拙劣地拼湊出一個模型，但是對它並不滿意。我和經濟研究所的同事安德拉什·布羅迪談起這件事時，他主動把匈牙利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數學家引薦給我。布羅迪在應用數理方法研究經濟學方面的水平，遠遠高於我。布羅迪與數學研究所的所長——斐聲國際的數學家阿爾弗雷德·雷尼私交甚篤，他們曾經一起從事研究工作。有一次他聽見雷尼提起自己的一位學生，對經濟學研究非常感興趣，他就是陶馬什·利普塔克。

於是我認識了陶馬什，自此建立起深厚的工作關係和友誼。很快我們發現彼此的政治觀點也不謀而合。請不要忘了這是在1957年，知識分子們不可能與任何持政治異見的人士，保持親密的朋友關係。

他是一個骨瘦如柴的年輕人(後來也始終沒有胖起來)，面孔俊秀，聲音溫和，說話時總是生氣勃勃。人們常常在幾秒鐘內，就被他的氣質征服了。他的外表對他的工作來說，不算什麼優勢，但是女性都對他青睞有加。

利普塔克在數學上表現出非凡的才能，我毫不誇張地形容，他是一個天才。他不僅可以準確無誤地運用自己豐富知識，而且還可以出人意料地在需要的時刻，想起從前曾經閱讀的某些數學定理或方法，他是一個極具創造才能的思想家。

我從利普塔克那裏學到了大量數學知識。在我們認識後的幾年裏，他一直擔任我的數學私人教師。除了有系統地給我講解數學知識以外，他還會在適當時候設計一些專題教程。他向我推薦了許多閱讀材料，並且手執手地指導我理解其中的內容。除了教我學習數

學以外，他還無私地為我提供了許多幫助。我從他那裏，學到不少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從來不會掩飾建立數學模型時所需要的抽象假設基礎，以及模型中使用的簡化現實的方法。與此相反，他用最真誠的學術精神，為我詳細展示了這些方法和過程。

數學研究需要絕對的精確，就利普塔克而言，他已經把這種令人敬仰，並且在科學研究中，被證明是非常必要的目標，發揮到了極致。這也許是他後來出現的精神問題最早表現出來的症狀之一。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裏，還沒有計算機。陶馬什的每篇文章，都是他親手用漂亮的字體，準確地寫下來的。即使在一個寫滿方程式的文本中發現一個小錯誤，他也會馬上把它重寫一遍，而不是在原文上進行修改，他的手稿必須完美無缺！

我從來沒有達到他那種絕對精確的標準，但是在他的帶動下，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有了長足的發展。即使到了今天，我只要發現講義中某些地方不夠精確時，眼前馬上便會浮現出一個苛求數學精確性的唐吉訶德的形象——如果把我換成陶馬什，他一定會把講義丟進廢紙簍裏，然後重新寫過。

我不希望把利普塔克描繪成一個完美無缺的人。這個聰慧，而且非常和善的人，有時也讓人難以忍受。我為自己訂定的一條規則，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必須準時赴約。如果對方遲到，我便會煩躁不安，甚至發怒。*我通常都會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到達指定地點，如果不能及時趕到，便會感到十分羞愧，或者至少盡量縮短讓對方等待的時間。在這方面，陶馬什恰好與我相反，他幾乎從來沒有準時赴約，也從來沒有在規定的期限內，完成工作。他經常遲到、錯過

* 我還是實習記者時，有一次艾爾諾·格羅——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沙皇」——叫我在某個時間去辦公室見他。我按時到達以後，等了一會兒，但是格羅仍然沒有召見我。我用有些惱火的口吻告訴秘書，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分鐘了，所以現在我必須要離開。人們幾乎無法理解我如此大膽的舉動。然而我遵守約定時間的觀念，似乎給格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這種另類的做法，沒有作出任何評論。

會議，或者忘記做他答應的事情，他會找一些幼稚的藉口，或者絕口不提他的疏忽。我們的性格差異，導致我們之間，多次發生摩擦。

對利潤分成的數理探討

讓我們回到1957年那個促使我找到利普塔克的經濟學問題上。我很快發現如果在研究中，堅持對準確性的要求，而不是採取化繁為簡的方法，直到複雜的現實情況，不再阻礙研究工作的進展，那麼我便很難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種特定的非線性規則任務，我們全力投入了這項工作。這篇論文的所有章節，都反復寫了很多遍，而且寫作每一章時，都需要經過冥思苦想的漫長煎熬。此外，我還要和陶馬什多次進行長達幾小時的討論。最終我們完成了一篇我倆都非常滿意的、約250頁長的文章。

其後我們的工作突然被迫中斷——陶馬什被捕了，因為他自願參加了我在上一章裏詳細敘述的一件政治事件。山多爾·費克特以「匈牙利人」署名發表的文章(即在我的幫助下，在西方發表的那篇文章)，曾經以油印件的形式，在匈牙利的學術界中發行，而幫助他複印論文的正是陶馬什。當時我們都為這件事情，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彼此卻互不相識。後來，我們遠離政治領域，開始在學術前線努力奮鬥時，才發現雙方都曾經參與這件政治事件。陶馬什的被捕對我們來說，完全在意料之中。

在被指控的罪犯名單中，陶馬什排在較後的位置。他在審訊前，大約持續被拘留了一年，其後便被關進監獄。我曾經把我們共同研究的課題中，許多必須解決的數學難題，寫下來交給他的妻子曼伊，看看是否能夠轉交給他，讓他在牢房裏思考這些問題。雖然我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本身，並不是迫在眉睫，但是它們卻可以分散陶馬什的注意力，或許能夠幫助他度過殘酷的監獄生活。*但是可憐

---

* 這個主意並不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有些1956年被捕入獄的罪犯，在監獄裏學會了多門外語，後來從事翻譯工作，或者成為作家，寫出不少文學作品。

的陶馬什，並沒有思考數學或經濟學問題，而是試圖自殺。這是憂鬱症的可怕標誌，而且後來最終壓垮了他。幸運的是，他在監獄裏自殺時，被人們從死亡邊緣上拉了回來。

我被經濟研究所解僱時，陶馬什還在監獄裏。我請求輕工業部，幫助我出版我們所寫的、和書本一樣厚的手稿。輕工業部同意承擔印刷成本，但是堅持認為身陷囹圄的陶馬什·利普塔克的名字，不能出現在書上。我徵求了阿爾費雷德·雷尼的意見，因為他不僅是陶馬什的上級，而且更是像父親一般疼愛他的朋友。我們商量後，認為應該在扉頁寫上「與匈牙利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合作」的字樣，而不是陶馬什的名字。最後這本書於1959年正式出版，它的裝幀設計，非常簡單，而且使用了複印版的形式。[1]

這本書的參考書目，不僅列出了對匈牙利輕工業進行實證性研究的作品，而且還包括幾部當時我正在研讀的西方經濟學著作。例如，第五章引用了埃里希·施奈德和簡·丁伯根的作品。如今看來，這種做法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在1957年的匈牙利，人們很少會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名字，寫在推薦書目的清單裏。

陶馬什出獄後，我們決定在西方國家，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們用英語寫了一篇篇幅適中、適合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談到西方發表學術文章的要求，陶馬什是這方面的內行。當時我剛剛開始了解西方數學雜誌和經濟學雜誌的風格和格式要求，而陶馬什閱讀這些雜誌，已經有好幾年的經驗。我們合著的這篇文章的內容，是我們兩人共同進行學術研究的成果，但是它得以能夠具備數

---

* （鮑龍）尤若夫·豪特沃尼將這篇文章的匈牙利語版原文翻譯成英語後，它的題目是《對社會主義公司利潤共分成制度的某些經濟效應的數學調查》。豪特沃尼早期的生活足以寫成一本厚厚的小說，而不是用這個簡短的腳注就可以介紹清楚的。他出生在聲名顯赫而且極其富有的豪特沃尼家庭。他的叔叔是發掘了偉大詩人安德烈·奧迪和阿蒂拉·尤若夫的拉約什·豪特沃尼。拉約什慷慨地資助了這兩位文學巨匠和其他作家。他充滿熱情地投入到發展匈牙利文學的運動中，並且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作用。

學準確性，以及適合西方學術要求的結構和風格，則要全部歸功於陶馬什。

在當時及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任何科研或學術作品，在沒有獲得政府批准的情況下，都不能送到西方國家發表。這個過程的正常程序，是研究者（通常是研究機構或者大學裏的工作人員）把自己的文章交給上級檢查，然後轉呈上級的上級。如果文章存在政治問題，那麼它還會被送往黨中央。*然後由它的某個級別最終決定是否允許這部作品在西方國家出版。

利普塔克和我決定不申請這類批准，我們直接把文章放進信封裏寄了出去。當時那些透過非法途徑，把「匈牙利人」（即山多爾·費克特）的文章，送到國外發表，並因此受到指控的人，仍然關在監獄裏，我和利普塔克也被牽扯到這件事裏。即使我們郵寄的作品，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這種行為也觸犯了法律，但是我們仍然認為**不能**遵守正式的審查程序。對我而言，這次舉動開創了一個先例，就是自此我在國外發表任何作品時，都沿襲了這種做法。我不會請求獲得上級的批准，而是直接把稿件，寄到雜誌社或出版社。在這一

尤若夫·豪特沃尼曾經在劍橋主修物理學，而且他的英語口語和書面表達能力與英語為母語的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在英國加入了共產黨。二戰結束後，他在國家責任感的驅使下，回到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匈牙利，卻被扣上「英國間諜」的大帽子投入監獄。人們認為除了這個理由外，還有什麼能引誘這個充滿激情的年輕共產主義者，離開英國舒適的學術生活和富有尊貴的家庭而回到祖國呢？1954年他刑滿釋放，但是1956年再次被捕。他第二次獲釋後，一度以翻譯為職業養家糊口，但他接的翻譯工作不僅要能賺錢，而且必須是他感興趣而且認為具有一定價值的工作。我多次請他幫我翻譯自己的作品。豪特沃尼後來重新回歸研究生活，成為匈牙利計算機技術研究的重要學術力量之一，並且在這個領域中蜚聲國際。

* 2004至2005年間，我曾經將一本包含敏感政治言論的書交給中國的出版程序審查。第一家決定出版這部書的出版社發現這個問題後，將它送呈黨的宣傳部門審查，但沒有通過審查。第二家出版社承擔了這個工作，但是提出的申請再次被審查機關拒絕。

點上，我的做法，與大多數匈牙利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同行，大相徑庭，他們後來經常抱怨，上級不批准他們在國外發表作品。而我仿效了奧匈帝國作家哈謝克創造出來的文學人物「好兵帥克」的做法。帥克曾經說：不要去問，因為如果你問了，答案一定是「不行」。

我們把文章寄到數理經濟學的核心雜誌《計量經濟學》，很多年後，我聽說雜誌社的法國編輯埃德蒙·馬林沃拿到文章後，連一個字，甚至一個句號都沒有修改，便立即同意採用它，*這篇文章最終刊登在1962年1月的《計量經濟學》上。[2]

這篇文章分析了匈牙利獨有的企業激勵機制，因此可以說它探討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文章特別強調，我們研究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即使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巨大的學術挑戰：

- 沒有預先確定激勵機制。它以各個企業為基礎，單獨制訂激勵機制，而不是使用從產權關係，或者體制條件中自然產生，或者自發產生的激勵機制。事實上，這種方法開創了後來人們經常使用的一種研究思路——以討論激勵機制的文獻資料為主體，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 同樣沒有預先確定價格。政府實行中央價格控制，而不是由市場定價。這篇文章一方面分析了企業激勵與價格的關係體系，同時從另一方面，分析了企業激勵與產品數量和產品構成之間的關係體系。哪些激勵方式導致生產能力過剩或者生產能力不足？它們推動了產出的範圍向哪個方向發展？

我過去經常聽到東歐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沒有在西方雜誌上發表文章，是因為雜誌社的編輯對東歐經濟體系不感興趣。而我在《計量經濟學》，以及其它雜誌社和出版社發表文章的經歷，與他們的說

---

* 很久以後，當我逐漸熟悉西方雜誌的編輯和審稿程序時（即大多數來稿都會遭到拒絕，剩下被選中的稿件也要寄給作者進行反復修改），我才充分意識到立即採用來稿並且不做任何修改，代表對稿件的高度欣賞。

法恰恰相反。這些作品能夠吸引編輯的興趣，**正是因為**文章的作者，正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跨越了一個世界的距離，向編輯們報告那裏發生的情況——只不過在文章中，使用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特有用語而已，即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語言。

對紡織業的規劃

陶馬什·利普塔克和我已經完成了理論分析的工作，而我在研究這個課題時，嘗試在另外一個研究方向上，有所突破。我希望把數學方法應用於經濟計劃中。我的目標不再是取得理論成果，而是根據反映真實經濟狀態的定量數據，進行計算，從而為真正的決策過程做好準備工作。換句話說，我在研究**應用**經濟學。

我一頭投進書山文海中，開始苦讀各種文獻資料。我必須學習、並且消化內容上相互延續，或者重疊的微觀經濟學知識、決策理論、運籌學和成本–績效分析，從而探索如何把它們應用在集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線性規劃理論**為這種計算提供了數學依據，於是我學習了它的概念體系、線性規劃模型的結構，以及思考的技巧，以便於把實際選擇的問題轉化成數學語言。

當時對我的工作產生重大影響的書籍，是羅伯特·多爾夫曼、保羅·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的《線性規劃和活動分析》。這本書和T·C·庫普曼斯的《關於經濟科學現狀的三篇論文》，一起有效地幫助我理解了如何使用線性規劃來反映我所熟悉的微觀經濟關係。過了一段時間，我已經可以熟練地運用兩種思維進行思考：理論微觀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和用數學計算為決策做準備的思考方式。*

我建立的第一個線性規劃模式，主是要為了解決下列的這個問題。棉紡織業的計劃者，在技術改革的問題上，面臨多種選擇。他

---

* 這四位學者在我剛剛開始從事研究工作的時代裏，被公認為最傑出的學術人物，後來我有幸見到他們本人，並且和他們成為好朋友，這真是讓我感到萬分激動。

們可以保留現有技術條件，以相對較低的成本，進行少量技術改革；也可以花費大量金錢，進行投資，或者購買昂貴的進口設備，以迅速提高生產率。這個線性規則模型的計算結果，不會提供唯一而且簡單的答案，而是運用數學形式，向人們展示最具性價比的選擇，如何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利率、匯率及未來的出口和進口價格。

這個創新性的方法，激發了輕工業的計劃者、技術人員、外貿工作者及計算機專家的積極性，使他們也加入到這項工作中。當時電子計算機在匈牙利還屬於新鮮事物。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發展，也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僅僅看到第一台計算機，便已經讓我們興奮地不停顫抖，雖然它仍然在使用真空管，而且佔據了整整一個房間。匈牙利科學院的計算中心，負責操作這台龐然大物。它的運行能力與現代的筆記本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一個由數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工作小組，激情高漲，花了幾星期用這台計算機，計算了一個包含二十四個方程式的模型。*（現在比它大上百倍的模型，在幾秒內便可以計算完畢）。我們知道自己同時開創了兩條前景輝煌的道路：線性規劃和如何將電子計算機應用於匈牙利的經濟實踐中。這讓我們的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快樂。

當時使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學的匈牙利學者，劃分為兩個派別。他們在進行有意義的合作的同時，對抗行為也不斷升級。一個派別使用線性規劃進行計算，而另一個派別，則使用俄裔美籍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設計的投入–產出分析法。安德拉什·布羅迪和後來瑪利亞·奧古斯丁諾維奇，開創了把投入–產出法，應用到匈牙利經濟體系中的先河，而且這種方法，體現許多優勢。這些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很早便已經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因此當我剛剛開始摸索線性規則的使用方法時，他們已經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的著作，瞭如指掌。中央統計辦公室也投入大量資源，根據數據調查，編整出許多投入–產出表，它們為計算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實證背景。而我們建立的線性規劃模型中的參數，主要來源於專家的估計

* 準確地來說，線性規劃中使用的是不等式，即計算的是決策的上限和下限。

值。換句話說，這些參數來源於我們對代表現實情況的真實數據的直覺。

無論在私下裏的談話，還是後來的正式會議上，我們都激烈地爭論這兩種方法的優劣。我堅持使用規劃方法，主要是出於理論方面的考慮。我認為投入–產出分析的後面，潛藏著宿命論的哲學思想。一旦給定最終使用向量（計劃者的確努力以此方式提出問題），與此相符合的產量和所有投入–產出組合，也由此確定。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線性規劃，暗示著可能存在其它選擇。我已經詳細講述這種觀點，對我建立新的世界觀，是如何具有重大的意義。

安德拉什·布羅迪熟練而且精巧地展示了如何使用列昂捷夫的模式，來描述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中提出的「再生產圖式」。[3]馬克思在這卷書中，主要談論了**平均**生產成本和**平均**利潤，而且他所強調的重點與投入–產出分析的觀點，與我不謀而合。因為在設計這種分析方法時，它的每個係數，就代表著社會平均水平。隨後我意識到馬克思在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作「**再生產分析**」的理論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直到現在我也堅持這種看法）。這種理論，被當時的西方經濟學家，稱作「動態模型」。然而，由於投入–產出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和諧共存，所以這不僅沒有對我產生吸引力，反而讓我對它心存疑慮。我敏銳地發現它缺少了某些元素：人們在技術及決策方面的選擇。我贊同與線性規劃同源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請參考我提及的多爾夫曼、薩繆爾森和索洛的著作）。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邊際」概念（例如邊際成本、邊際替代率、邊際收入和邊際生產等），無法用投入–產出分析法進行計算，而線性規劃，則可以自動計算出這些指標。*

---

* 我們探討了從「邊際」衍生出來的每個概念。讓我舉一個經過簡化的例子：如果我們將產量提高一個單位，那麼成本會相應增加多少？這就是「邊際成本」的含意。讓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如果目前投入的資源提高一個單位，那麼它的回報會增加多少？這就是「邊際報酬」的含意。

雖然驟眼看起來，當時出現的，不過是兩種針鋒相對的「空洞」的數學框架，即兩種沒有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影響的數學方法，但是人們展開爭辯的理論層次，卻為這場論戰抹上一層特殊的色彩。儘管人們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是有些問題，仍然生硬地闖進這場辯論的學術背景，即我們能否使用現代的數學思考技巧，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生機，還是應該徹底放棄它（我個人堅定地支持後一種觀點）。

雙層計劃

把線性規劃應用在棉紡織業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學術界都對其給予不吝褒獎之詞。其它行業也緊隨其後，開展了相似的計算工作。於是我暗自思忖這些行業數據，是否能夠聯繫在一起。我的學術興趣，早已切實地轉移到匈牙利整體經濟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怎樣把線性規劃，應用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中呢？

如果按照行業模型的要求，用單個模型詳細描述整個國民經濟，那麼後者需要的方程式系統，要比前者大二十倍，甚至五十倍。當時原始的計算水平，首先排除了建立這種模型的可能性。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我們可以把一個龐大的經濟模型，拆分成許多組成部分，把這些局部的計算結果，系統並且和諧地組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對巨大問題的解決。當時學術期刊上，已經有文章討論所謂的線性規劃分解運算法則，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尋找正確的操作程序。

我仔細研究了國家計劃辦公室的工作流程：首先它制訂了全國的經濟目標，然後將它們拆分為各行業的經濟目標。計劃辦公室把這些目標，發給各行業相對應的部委，他們研究討論了這些計劃後，開始與中央計劃機關討價還價，以修訂行業目標。這個過程反復進行，直至雙方就國家計劃和行業計劃，達成一致意見。

最後，薩繆爾森的理論著作，為我提供了第三個靈感。[4]雖然某

個產品可以有若干交易價格，但是只要市場達到均衡的最佳狀態，便會出現「**價格均等化**」，即每一種產品只有一個價格。

這些觀點，幫助我提出了雙層計劃算法的基本思想，我開始勾勒這個模型的雛形。中央把具體的定量計劃（例如投入的配額和產出目標），分配到各個行業，各個行業自行制定可以滿足中央要求的最佳計劃——這與我們目前所做的行業線性規劃工作，如出一轍——然後把資源和目標的影子價格，反饋給中央。*它們反饋的，實際上是經濟效率報告。中央根據價格均等化原則，再次進行定量分配，把邊際收益較低的行業的資源，調配到邊際收益較高的行業。生產需求也按照這種方式，進行再分配。各個行業重新根據本部門的具體情況，進行計算後，把結果彙報給中央，如此循環往復，直到敲定最理想的分配方案。

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但是我無法準確地表述它的內容，而只能借用一個類比來說明：如果薩繆爾森可以證明他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那麼上文概述的再分配規則，也應該能夠實現均衡狀態和最佳解決方法。但是這個類比，不足以支撐整個理論命題，它必須得到**證明**，而這遠遠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陶馬什可以完成我覺得力不從心的工作，1963年時，他想出一個極其新穎的辦法，即用博弈論的模型，來表述這個問題。這個想法，較博弈論在經濟學的全面興盛，早了很多年。在這個模型中，一方參與者是中央，另一方是所有行業。從這一模型我們嚴格證明了上文描述的流程收斂於最優解。

我們最終完成了「雙層計劃」的研究課題。[5]我提出這個模型的基本**經濟學**觀點和計算法則，並且進行了詳細的闡述。陶馬什·利普塔克使我的描述更加準確精緻。此外，他還利用一些小竅門（例如利用博弈理論的形式，再次描述該課題），使棘手的問題，得以

---

* 產品的實際價格由市場決定。影子價格是人們通過模擬計算得到的結果，它主要是為了滿足某些分析的需要，例如投資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它的計算方法種類繁多。線性規劃的計算過程可以自動生成一系列影子價格。

運用數學方法而順利解決，而且我們的假設，完全通過了證據的檢驗。

我們再次向《計量經濟學》投了稿，而且同樣獲得高度認同：雜誌社沒有作任何改動，便立即接受了它，並把它發表在1965年的雜誌上。[6]這篇文章幾乎一經問世，就讓它的作者享譽整個數理經濟學界。它被引用了數百次之多，而且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許多大學都將其收入教學大綱中。1971年阿羅從《計量經濟學》雜誌歷年發表的文章中，選擇了二十二篇最重要，而且最有影響力的理論文章，並將其彙編成冊，[7]其中就包括我們的《雙層計劃》。

這篇文章把我的兩個目標，連接在一起。我希望從部門層次的規劃模型，轉向國家層次的規劃模型，同時建立適當的運算法則，把各部門的模型組合在一起。我會馬上講述這種做法的目的和執行情況，不過在此之前，我必須首先簡單說明自己的另外一個目的：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進行**理論**檢驗。

中央計劃的理想模型

雙層計劃可以看作是中央計劃的理想化模型，它展現了中央計劃者和部門計劃者共同努力，制訂出滿足下列要求的計劃的過程：

- 行業計劃將準確地融入中央計劃的範疇，中央計劃和行業計劃之間完全協調一致。
- 這些計劃具有可行性，國家和行業根據資源限制，量身制訂自己的計劃。
- 這些計劃是所有可行的計劃中最出色的計劃，它能夠最充分地實現中央制訂的目標。
- 這些計劃不是中央強加給部門的計劃，它不需要中央掌握所有信息，而是主要依靠分散的信息積累（在我們的模型中，它是指行業層次的信息積累）。

西方數學經濟學家對雙層計劃的理論模型，非常感興趣，其原因就在於它簡潔、而且旗幟鮮明地反對了我在前一章提到的蘭格模

型。儘管蘭格沒有使用數學模型展示他的觀點，但是後來人們將其轉化成數學語言——偉大的法國經濟學家埃德蒙·馬蘭沃，對其進行了理論構建。[8]他的模型和我們的模型同樣包括上層和下層——他的模型的上層和下層分別是指中央和企業。但是蘭格–馬林沃模型*的經濟信息流，與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的經濟信息流，恰好相反。在蘭格–馬林沃模型中，中央政府負責制訂價格，所有企業必須適應這些價格，而且需要把產出和投入的數量，彙報給中央政府。中央根據這些報告，確定哪些企業出現供過於求，或者供小於求的情況，然後調整該企業的價格，並確定價格調整方向。這樣，它便描述了理想化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我們的模型中，信息流的方向與之完全相反。從上向下流動的不是價格信息，而是數量信息，即資源配額和生產目標。各行業把資源使用的經濟效率情況，以及產出任務的完成情況，寫成報告，並上交給中央政府，這樣便描述了理想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

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這兩種模型，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的特點是「完美的計劃」，它與瓦爾拉斯模型（即一般均衡理論）中「完美的市場」，形成鮮明的對比。前者證實了在理論上存在完全集中的經濟體系完美運轉的可能性，而後者則證明在理論上完全分權的經濟體系可以完美運轉的可能性。

請允許我補充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在這裏描述的，不是自己剛剛寫完文章時心裏的想法，而是在2004年和2005年對它們進行反思後的結果。我不打算在這裏，用相對的方法，來衡量兩位與外界隔絕的東歐研究者的成就。我想證明的是，我們的文章，是否傳遞出具有持續有效性的理論信息。

我認為我們的文章做到了這一點。數學模型最突出的優勢，在於它能夠闡明它所代表的推論，在何種**條件下**成立。懂得如何正確

---

* 我和利普塔克建立雙層計劃模型時，還沒有接觸過馬林沃的模型。馬林沃看到我們的稿件後，積極熱情地幫助我們發表了這篇文章（當時他是《計量經濟學》的編輯）。此後，他也利用了各種機會幫助我進行學術研究。

解讀數理經濟學理論著作的人，就有能力更加清晰地思考這些假設。

人們應在滿足以下條件的情況下，使用雙層計劃的計算法則：

1. 模型中涉及的中央計劃者，有清晰明確的目標（它的目標函數裏，明確說明了這些目標）。社會主義經濟的實際情況，則與此大不相同。中央領導層缺乏連貫的執政原則，經常出人意料地修改政策，或者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提出新政策。它們經常是邁出了前進的步伐，但又再退回來，而且優柔寡斷，經常受到內部衝突的困擾。它的經濟政策，無法連貫一致地協調自己制訂的各種目標。中央沒有能力根據這些目標的相對重要性，給予相應的重視，而且也無意著手處理這些工作。
2. 模型中涉及到的行業，沒有自己的特定目標。它們的目標，必須服從中央的目標。而事實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各個層次的參與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而且希望追求更大利益。
3. 在這個模型中，只有當計劃切實地考慮了反映實際條件的各種上層和下層約束，它才能獲得認可。而在現實生活中，儘管中央和各行業，意識到不切合實際（通常是要求過高）的計劃，會遭遇各種現實條件的制約，但是仍然採納了它們。
4. 無論是向上流動的信息，還是向下流動的信息，模型中涉及到的所有信息，都必須準確無誤。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實際情況，是所有信息都不可靠。此外，經濟參與者會為了擴大自身利益而撒謊。只要不準確的數據，有利於自身的處境，它們便會隨意扭曲向上彙報或向下發布的數據。
5. 這個模型強調嚴格的紀律，中央必須準時發布數據，各行業也應按照同樣的節奏，準時反饋數據。事實上，推遲發

布數據和反饋數據，以及數據不可靠等現象，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非常普遍——因為完成這些工作的是人，而不是機器。

6. 這個模型中的計劃機構，非常耐心，因為中央和各行業之間，需要反復調整計劃，才能制訂出最佳解決方案。而在真正的社會主義體系中，人們制訂計劃時，往往受到時間限制的壓力。即使人們有反復調整目標數據的願望，也沒有時間把它付諸實施。

因此我們必須遵循以下論證方法：

首先，理解理論模型中的命題，即中央計劃可以完美地運作，如果……

其次，全面徹底地考慮這些「如果」的內容，並且把理論推論與現實情況進行比較。

第三，確定這些條件沒有得到滿足，事實我們不可能滿足所有條件。

第四，也是最後一條根據先前的觀察結果得出結論。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不可能完美地運作。

這個理論模型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種方法，幫助人們嚴格地遵守這種思路。從這個角度來看，時至今日，雙層計劃的模型，仍然是一種有效，而且有用的學術工具。

在這裏，我有必要補充一些個人看法。讀者閱讀後文數章時，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逐漸開始批判新古典主義的思考方法，以及它的理論核心——瓦爾拉斯均衡理論。幫助我不斷加強攻勢，批判主流經濟思想的因素之一，就是我在上文詳細談及的論證方法，即檢驗模型假設的正確性，並且把它們與實踐進行比對。但是在設計雙層計劃模型時，我還不具備這種批判的理性態度——那時，我完全認同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它的學術領袖，可以認為我們與他們的觀點，完全協調一致，所以這種學術上的惺惺相惜，也提升了他們對我的文章，以及對我本人的興趣。

國民經濟規劃的初始原則

我們寫作關於雙層計劃的文章時，陶馬什主要感興趣的，是它的理論研究部分。作為一個數學家，用公式闡述問題所帶來的挑戰，深深地吸引了他。而這個課題最吸引我的，則是如何把理論分析，應用到實踐中。

我們必須澄清國家計劃辦公室，和各部委編制的官方計劃，與研究者利用數學模型制訂的計劃之間的關係。主流經濟理論暗示研究者應該建立「福利函數」，來表達社會的共同利益，它可以看作是模型的目標函數。如果一個計劃，不僅最大化社會成員享受到的福利，並且遵守了客觀條件的制約，那麼它便可以被稱作最佳計劃。開明的經濟學研究者，會小心翼翼地建立、並解讀福利函數。他們先確定福利的定義，然後以此為基礎，解讀福利函數，同時兼顧福利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如文化、戰略和地理方面的考慮）。此外，他們不僅要考慮到眼前的社會福利、還要為造福下一代做好準備。一旦建立起這樣一個福利函數，數學計劃者便可以進行計算，然後提交根據計算結果制訂的計劃。他們可以宣稱**這個計劃**，是政治決策者可以接受的最佳計劃，而不是制訂計劃的工作人員使用傳統方法制訂的計劃。*

我希望採取一種與主流背道而馳的方法來研究這個課題，而我在草擬研究的初始原則時，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認識到自己必須在研究中，採取一些策略。我不希望計劃者，認為那些用模型和計算機完成計劃工作的人，將取代他們，因而把他們視為對手。我希望不使用數學模型的計劃者（即傳統的計劃者），和使用數學模型的計劃者之間，建立起和平友善的合作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長期擔任國家計劃

---

* 在我們的爭論中出現了這樣的觀點：數學計劃者應該向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者了解他們的偏好，然後將其體現在模型的目標函數中。如果這麼做的話，這個模型反映的將是政客的意願，而非人民的願望。

辦公室主任的伊斯特萬·海泰尼，尤其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並且自始至終支持我們。*

此外，我在理論方面，也針對主流經濟學思想，提出強烈的異議。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都無法接受這樣的觀點，即人們可以建立一個單一，但是包羅萬象的福利函數。換句話說，我認為我們不可能明確地確定整個社會的利益可能是什麼。社會並不是一個同質的單位，團體和個人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都相去甚遠，例如什麼是利益、什麼是福利、他們希望如何在當前和下一代人中，分配成本和利益等等。利益衝突將在政治領域裏得到解決，因為後者負責制訂預算、進行經濟立法和制訂經濟計劃等工作。而數學經濟學家，卻沒有權力作出這些決策。我在發表的文章中，也表明了這種反對意見。†

在六十年代，我從理論的角度出發，質疑建立福利函數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完全沒有注意到，當時已經出現了許多開創性工作。這些文章中，出現的意義最深遠，而且內容最豐富的觀點，是肯尼思·阿羅在他的著作《不可能理論》[9]中提出的主張。阿羅的觀點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們

---

* 讀者也許會產生疑問：既然你曾經拒絕加入共產黨組建的「革命委員會」，那麼為什麼要和國家計劃辦公室合作。我會在第十五章講述1968年改革時，詳細回答這個問題。

† 丁伯根教授也加入了這場論戰。他贊同艾布拉姆·伯格森和拉格納·弗里希的觀點，即人們有可能建立「福利函數」，而且這個目標是值得努力的。丁伯根在接受諾貝爾獎時發表的獲獎感言中，提到我們之間的論戰，這讓我備感榮幸。他建議「東方和西方明確說明各自的社會福利函數，這樣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兩者的終級目標是否相去甚遠。」(1981[1969]，第21頁)。丁伯根的建議，表明他深深地期望東西方能和平共處，並進行合作，但這個真誠願望也清楚地反映出他幼稚的政治思想。

‡ 阿瑪蒂亞·森(1997[1982])在拓展社會選擇理論的研究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二十年後我非常幸運地與阿瑪蒂亞·森在哈佛大學共事，而且成為朋友。我們經常一起討論社會選擇的問題。

可以根據阿羅的理論，嚴謹地證明以下觀點：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能夠把截然相反的個人偏好，融入共同的福利函數的民主決策過程中。* 在閱讀了這些文獻後，我進一步確定，自己拒絕主流經濟學觀點的做法，是正確的(主流經濟學思想，認為人們能夠制訂出一個定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最佳標準」，來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

此外，我還考慮了政治現實和意識形態對研究的影響。儘管我沒有就此發表文章，但是我已經仔細地考慮了這個問題。無論喜歡與否，我都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在匈牙利這樣的共產主義政權中，基礎決策都是由黨的最高領導層作出的，國家計劃辦公室的計劃者，以及政府各部委，需要適應這些決策。如果上級給他們制訂的基本目標，在他們看來是脫離現實，那麼他們也許會出於責任感，謹慎地提出一兩句意見，但是最終都必須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

雖然我被使用傳統方法的計劃者重重包圍，但是我仍然決定使用數學工具進行計算，並編制計劃。我希望在進行這項研究的同時，與決策者保持一定距離。我們沒有與他們爭論，應該使用何種福利函數，而是使用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我們以「官方」計劃為特定的對象，規定它的定量數據是我們所建立的模型中的制約因素。然後我們把其中的一個指標，確定為目標函數。這個指標的增長，必須要不容置疑地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例如在我們的模型中，可兌換貨幣經常帳戶餘額的增長，便符合這個要求。我們根據數理模型編制的計劃，不僅涵蓋了傳統方法，制訂的計劃的全部內容，並且可以有效地幫助匈牙利減少債務，這簡直就**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儘管政府的計劃者，對數學模型制訂出來的計劃，不屑一顧，但是他們卻有權力編制國民經濟計劃。鑒於這種現實情況，我們嘗試以他們編制的計劃為參照，進一步改善國家的經濟條件。無論人們對政治條件和未來的發展前景有怎樣的看法，所有人都會同

* 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經濟學理論家們就在解讀福利函數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論戰，並且檢驗了艾布拉姆·伯格森和保羅·薩繆爾森使用的方法。不過，對不同的理論架構進行比較，不屬於這本自傳討論的範圍。

意這樣的觀點：國家的債務減少，等同獲得淨收入。*

在那數年裏，蘇聯也出現了利用數學方法，制訂計劃的觀點。列昂尼德·V·康托羅維奇便在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亞，領導了一個學者團隊研究計劃的數學模型。康托羅維奇曾經發現，並且詳細闡明了線性規劃的數學基礎。蘇聯流派的論調，與我在布達佩斯提出的建議，有天壤之別。他們聲稱可以提供「最佳計劃」，而對我來說，這就像一種虛偽的承諾，很可能會使人們產生誤解和虛幻的想法。

由於這種觀點在匈牙利也有很多追隨者，所以我不斷地與他們展開爭論。我始終停留在一個更加謹慎的承諾上：在一切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計算方法，提出建議，從而切實地改善國家正在編制的官方計劃。

我從來沒有草率地把線性規劃應用到經濟的運行計劃中，即用線性規劃支持詳細的年度經濟計劃。對我來說，協調日常的生產與消費，顯然是市場的任務，而不是數理模型的任務。我只希望對國民經濟的中長期計劃，有所貢獻。我們在制訂行業計劃的研究項目中，便已經解決如何在各種投資選項中，作出選擇的任務。現在我希望在制訂國民經濟計劃的工作中，繼續沿著這個研究方向前進。

計算

現在有必要簡單地說明我們的觀點在實踐中的應用情況。

到了1962年和1963年，1956年後對革命瘋狂反撲的勢力，已經有所減弱。許多關押在監獄裏的朋友，因為政府特赦而獲釋出獄，而且很多跡象顯示，我也將擺脫被放逐到輕工業部的命運。我對紡織部進行研究時，曾經與負責操作匈牙利第一台計算機的人們（即匈

* 我們在滿足官方計劃的各種目標的同時，還在計算過程中使用了多種目標函數，如最大化個人消費，同時。這些函數轉化成計劃的變體，從而增加了人們的選擇。我們再次嘗試努力克服這種教條的主張：只可能存在一個計劃，只有一條路可以走，此外人們別無選擇。

牙利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工作人員）合作，他們邀請我到他們那裏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此外，我還與國家計劃辦公室的經濟計劃研究所有工作聯繫，他們同意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把建立數學模型以制訂計劃的方法，應用到實踐當中。*為全國經濟計劃建立數學模型的工作，就此正式啟動。許多同事積極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中，辦公室的一些領導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我們開始根據科爾奈–利普塔克的論文中描述的結構，建立一個模型網絡，即由一個中央模型和十八個行業模型組成的網絡（行業模型都是第一次進行實驗性計算）。為了建立各行業的數學模型，我從眾多中央和各行業的學院及政府部門中，招募了很多經濟學家。

---

* 經濟計劃研究所的所長希望我正式調到他那裏工作，但是卻遭到國家計劃辦公室人事部門的否定而只能作罷。我根據現在可以查閱的警局資料，大致推斷出這個建議被否定之前發生的事情。國家計劃辦公室的人事部門，向我過去所在工作單位的人事部門，調查我的情況。我在輕工業部工作過的兩個單位，不想妨礙我的發展，因此作出了非常中立的評價。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評價不好也不壞——他們強調了我在專業研究上出類拔萃的表現，但也沒有隱瞞我參與1956年革命的歷史及其革命失敗後的活動。他們明確指出我是因為政治問題而被開除的。這些信息使得國家計劃辦公室在吸納我的問題上，不再那麼熱心。此外，他們聯繫了內務部以了解我的情況。內務部III / III司（即國內情報司）和III / II司（即國外情報司）總警監級別的官員們就這件事交換了意見。他們讀閱了我的檔案後確認「上文提到的人因為參與反革命活動而出現在我們的記錄中」（ÁBTL V-145-288-a, pp. 502–505。上級指示III / III司對我進行調查的命令，可以追溯到1962年12月27日）。顯然由於內務部不同意國家計劃辦公室接收我，後者才改變了想法，拒絕我到他們的研究所工作。科爾奈在匈牙利科學院的庇護下回到原工作崗位，情有可原，但是要讓他進入國家計劃辦公室工作，那就完全超出了可以接受的範圍。這件事清楚地體現了當時貫穿我的生活的兩條平行主線。可以看得到的一條主線，是我在致力於研究用來編制計劃的數學模型，而另一條看不見的主線，則是人事部門和政治警察構成的密密麻麻的網絡，為我的生活蒙上陰影，並且影響了我的生活。

與此同時，我組建起一個由少數幾個人組成的核心小組。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每天都在利用計算機進行運算，其他人則負責提出建議，或者解決具體問題。在這個項目的鼎盛時期，我們手下有一個150至200人組成的「小型軍隊」，積極地投入到彙編數學模型、收集數據和計算等工作中。許多曾經參與「雙層計劃」的人，加入這個團隊時，都是剛剛踏入研究領域，後來卻成為聲名顯赫的經濟政策決策者、高層管理人員或經濟學家（如：古斯塔夫·巴格、帕爾·拜奈代克、安娜·雅諾什、安德拉什·納吉、費倫茨·勞巴爾、朱迪特·里姆勒、捷爾吉·西蒙、尤若夫·西瓦克、馬頓·陶爾多什等），這是一個聚集了頂級研究精英的團隊。

研究的資金來源，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奔波於多個政府部門之間，希望他們為建立行業模型的工作，提供財政支持。我們為這項研究涉及到的人員和機構（即支持這個項目的主要官員，和對它表現出興趣的人）準備了一系列小冊子。有些小冊子詳細說明了模型的構建過程，以及使用的計算方法，或者從理論的角度，解釋建立模型的原理；有些小冊子則彙報了已經取得的研究發現。我親自撰寫了其中大部分的小冊子。在這個項目期間，我寫了多達2000頁的材料，並把它們油印後，分發給匈牙利的經濟學家。

在我的指導下，這項工作的第一階段在1963年開始，而且持續了五年時間。*我們完成了大多數行業模型的計算工作，並且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成績。我們在中央模型的計算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難。由於於當時計算機的計算能力，比較落後，所以科爾奈–利普塔克計算法則的進展，極其緩慢，而且計算量也太過龐大。換句話說，這個模型雖然非常精緻，但是卻缺乏效率。我們最終不得不忍痛，以更加粗糙，以及準確度要求不高的模型，取代了它。

與此同時，我們對整個國民經濟，建立起另外一個規模較小的

---

* 1968年我們公布了最後一份關於經濟計劃的油印版報告，其中彙報了計算的最終結果。自從第一個實驗性建模項目結束後，我就沒有再直接參與這項工作。其他經濟學家和以前的一些同事，接手繼續進行了這個項目。

集合式經濟計劃模型，並用它完成了許多計算工作。我們認為由於大型雙層計劃的計算工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所以至少應該先用一個小型模型，向計劃者證明線性規劃的確可以產生作用。*

隨著時間的流逝，數據收集和計算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障礙，人們最初的熱情漸漸減弱。過去那個充滿激情的團隊，不斷有人員流失，而且逐漸變得懈怠。有些人認為自己不應該在項目陷入困境時，驟然離去，而是應該堅持下去，直到得出一些結論。但是我們的計算，並沒有獲得什麼有重要意義，或者決定性的最終結果。我們不能說，而且也沒有說，我們最終制訂出一個被科學的數學模型證實，並且建立在計算機計算結果之上的國民經濟計劃。

這個結果使人們的心情非常複雜，成功與失敗的情緒糾結在一起，難以言表。這個項目的研究團隊，從來沒有聚集在一起，評估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經驗。有些人把這個龐大的項目取得的部分成果，寫進在自己發表的論文中。我本人也發表了許多類似的論文，《結構決策的數理計劃》一書中，記錄了許多我觀察到的東西，和通過研究得到的結論。而且，它的第二版也詳細地敘述了編制國民經濟計劃模型的相關計算工作，以及從中獲得的部分經濟教訓。†

我值得付出這些努力嗎？

現在我該怎樣評估，這個耗費了我和同事大量精力和時間的龐

---

* 蘇莎·達尼埃爾（她當時的名字是蘇莎·烏伊洛，後來成為我的第二任妻子）和我共同建立了一個模型，並聯合發表論文敘述了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在那個時候，我們之間逐漸產生了真摯的感情。雖然我在從事數學建模的工作期間，沒有獲得其它什麼回報，但是和蘇莎的相識相知，足以讓我覺得自己沒有白費努力。

† 1972年，擴充了的《結構決策的數學計劃》第二版以匈牙利語出版，1975年它的英語版問世。如果將這些補充的內容也看作國民經濟計劃研究的一部分，那麼這項研究任務便佔據了我近十年的時間。

大事業？請允許我逐一把我最初對它的期望，以及實際情況，進行對比。這個分析主要涉及國民經濟計劃的建模過程，但是也談到其它利用數學方法制訂計劃的研究項目。

我對這個研究項目的其中一個期望，與自己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有關。我在前一章的末尾，描述了五十年代末自己的感受——我從《過度集中》中，開始起步的實證研究，陷入了死胡同。

如果我繼續深入研究《過度集中》裏的研究課題，同時研究結果強烈批判了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那麼我便根本不可能發表這些研究成果。不過數學模型的出現，似乎解決了這種尷尬的處境。政治委員、黨內領導，以及所有監督研究機構、出版社和雜誌的人員，都不理解數學語言。他們只要看到學術作品中有幾個公式，便會顫抖著把它扔到一旁。因此數學語言本身，便可以保護這項研究，躲過政客和polgazdosok苛刻的眼光（Polgazdosok指密切地觀察政治經濟情況，幫助政客了解經濟形勢，並且提出建議的人）。以數學形式為載體的研究，給人們留下政治中立的印象——在某種程度上，公式、等式和幾何數字，的確與對黨的忠誠沒有任何內在聯繫。因此相對來說，這個研究領域較外面的世界，安靜很多。

不出我的所料，從此沒有人從政治角度出發，反對我用數學方法研究的項目。可以說儘管政治委員們，在密切地注意我的一舉一動，但是顯然我在選擇課題上的做法，更勝一籌。時至今日，我仍然為自己這方面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得意。

此外，我認為在研究中應用數學方法，能夠大大推動我自學的進度，並且促使我掌握更多現代經濟學的知識。現在看來，我也圓滿地實現了預定目標。

我希望自己不僅在研究的過程中，加強自身學習，而且還有能力教導他人。在這個問題上，現實情況遠遠超出了我的所有預期。當時學校不允許我授課，所以從表面上來看，我不能教授學生，但是在指導這個龐大的研究團隊時，我實際上仍然可以擔任教師的角色（這個團隊的規模，遠遠超出了我們之前的設想）。當然，這不是正式的師生關係，因為許多同事與我年紀相約，甚至較我年長，而

且我不是上級正式任命指導他們的領導，但是他們所有人，都自發地承認我將在這個項目的框架內，指導他們開展工作。我相信自己把很多觀點傳授給了他們，而且他們和我一樣，發現經濟規劃可以成功地幫助他們探索並理解現代微觀經濟學。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把數學方法應用到經濟學計算和研究中，不僅是摸索「方法論」的嘗試，它還發展成為真正的學術運動。在這次相當特別的運動中，我們「雙層計劃者」建立了自己的派系，而且其他團體也迅速崛起，如「投入–產出論者」、計量經濟學家和運籌學研究者，他們的身份經常會相互重疊。我們的共通之處，在於我們都遠離了五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搭建的死胡同。換句話說，我們決心使研究盡可能地精確。我們希望學習現代經濟學（即西方經濟學），接受它們的研究成果，並為此組織了不少學術會議。此外，我們中的部分人聚集起來，創辦了匈牙利經濟學會的數理經濟學部。*

我已經強調了很多次，我極度希望融入西方經濟學研究裏。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事情的發展，也遠遠超出了我的期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感到自己在逐漸融入一股強勁的西方思想潮流。此時法國、荷蘭、許多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其它發達國家，先後成立了研究國民經濟計劃的研究所，而且他們都使用了數理模型。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與當地的經濟學家聯手，為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國家，建立了計劃模型。印度還組建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並且受到數理經濟學家的深刻影響。

---

* 當時我對計量經濟學會的規章制度已經瞭如指掌，因此我建議取消常任主席制，而改為每年選舉新的主席。這項建議其後被採納了，但只在我們的數理經濟學部裏得到推行。包括我在內的前幾任主席都只有一年的任期，但是這種輪換制和選舉程序，卻激怒了上級領導——匈牙利經濟學會的主席。經濟學會的主席可以說是屬於終身職位。只要政治領導允許，他/她可以一直擔任主席職務。幾年後，數理經濟學部被迫遵循經濟學會的做法，而取消了輪換制和主席選舉制。

匈牙利的計劃建模工作，引起西方同仁的強烈興趣。這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對蘭格–馬林沃模型和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進行比較的問題。在匈牙利國家計劃辦公室的幫助下，實踐者還把法國、荷蘭和印度等國家計劃機構倡導的計算模型結構，以及數據收集和模型應用情況，與匈牙利的情況，一一進行比較。我們的工作在國外贏得了極高聲譽，被視為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成就。

當我把自己的期望與實際取得的成就進行對比時，一定會有人問我們推行的方法，是否成功地被政府採納，並幫助國家制訂了計劃。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那麼肯定，一方面，國家計劃辦公室和各部委採納了早期的投入–產出計算法和線性規劃法。他們要求各政府部門和小團隊使用這些方法，定期向制訂計劃的機構彙報計算結果。按道理來說，後者應該仔細研究這些結果。但是我無法確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採用了這些結果。*另一方面，我從計劃編制機構的內部觀察它們時，它們的工作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使用傳統計劃編制方法的官僚機構，仍然不能接受數理計劃的概念，而且數理計劃並沒有真正融入國民經濟的計劃編制過程。國家計劃辦公室和各部委的許多高層官員，都非常同情我們的工作。由於我們在工作中，使用了數理方法和電子計算機，所以它使人們感覺到使用這種方法制訂出來的計劃，具有科學性和現代性。那麼究竟是什麼問題導致它遭到排擠呢？

所有問題都與我在雙層計劃理論模型中討論的六個問題，息息相關（我在前文已經提及）。這個理論模型，不僅在許多根本問題上，與實際情況存在很大出入，而且把它應用在現實生活中時，也

---

* 六十年代末，我的工作方向發生轉變，在之後的十年裏，我很少直接參與編制國家計劃的工作。接手這個課題的人拓寬了使用這個方法的領域，而這也許超出了我所建議的適用範圍。此外，個人計算機在普及和計算能力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也加強了數學規劃所發揮的作用。由於1989年社會主義制度解體時，中央計劃機構隨之解散，所以，現在我們無法精確地評估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採用了這些計算結果。

會與真實社會主義計劃的實際編制過程，格格不入。如果人們希望在數理模型的基礎上制訂經濟計劃，那麼必須解決以下問題；

1. 政府必須開誠布公地說明經濟政策的目的，一旦其目的和目標發生變化，便應該隨之開始制訂新的計劃。但是政客們對此做好準備了嗎？政客通常傾向於模棱兩可的態度。他們不在乎自己宣布的目標之間，是否存在衝突。他們習慣籠統地闡述自己的想法，而不會用數字形式，描述各個政策目標的相對重要性，然後據此排列解決這些問題的先後次序。換句話說，他們不會提供規劃模型中的目標函數和需要的所有定量信息。他們本能地迴避這種做法，是因為這些數字，會成為將來人們對他們進行問責的依據。
2. 我們收集用於編制國家經濟計劃的材料，並展示臨時性的研究結果時，發現人們和各個機構，對它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如果我們的計算結果，恰好支持他們的想法，那麼他們便會熱烈地歡迎這個結果。一旦計算結果與他們的想法不符，他們便會不自覺地向後退縮，還會理直氣壯地稱，這個模型過於簡化現實情況，忽略了這個，忽略了那個，而且建立在不可靠的數據上（他們提出數據不可靠的理由時，同樣理直氣壯）等等。
3. 我們通常很難讓經濟政策的制訂者，和經濟計劃的編制者，明白他們必須把目標與制約條件區分。前者指政治制訂的目標方向，後者指限制他們的決策過程的因素。我在第一點中曾經提及，負責處理經濟事務的政客們，不願意闡明為什麼經濟增長較控制通貨膨脹更重要，反之亦然。他們更傾向於為兩者設定各自的目標，這種做法不會為模型的數理結構造成麻煩，因為從數理的角度來看，這些宏觀目標，也可能成為模型的制約條件。但是我們並不確定，他們這些代表經濟政策目標，而且隨心所欲的主觀制約，是否相互契合，或者是否能夠同時實現；我們也不確定，這些主觀制約，是不是沒有與反映外部條件的客觀制

約，發生衝突，例如自然資源、生產能力、勞動力供應或進口限制。

4. 我們不能充分信任輸入計算機的計算用數據，這些數據都是由計劃者提供的。他們不願告訴我們，他們自己進行估算時使用了哪些數據，而是把這些數據，草率地寫在紙上，一旦有機會便把它們藏起來。因為所有計劃者，都可以把這些數字當作武器，來爭取稀少的資源，或者抵制上級為他們制訂的過高目標。
5. (與第6點並列) 如果我們擁有二十一世紀的電腦，也許便能夠跟上制訂計劃的工作節奏。但當時我們沒有能力做到這些，因為等待至計算結果出來時，一切都為時已晚。與使用嚴格複雜的公式體系進行計算相較，觀察數據，並且依靠有經驗的眼光，推斷計劃的平衡情況，顯然更容易做到這些事情。

這些困難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根源：社會主義計劃的編制過程，就像一個廚房，在廚房裏忙活的廚師們，不允許陌生人看到他們玩弄的小把戲。他們經不起公開信息和保持透明等的要求。而數理模型強迫他們遵守紀律，要求他們加入必須加進去的內容，並且刪除必須被刪掉的內容。這些變化對於他們來說，根本無法接受。

現在我對這個問題進行反思時，發現我們回到了前文提及的哈耶克論證方法裏去。人們不可能把所有知識和信息，都收集到一個中心和少數輔助性的分中心裏。知識必然是分散的，掌握信息的人，必須有能力利用它們實現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利用其中的大部分知識)，這些知識才能被充分、而且高效地投入使用。分散的信息，必須與自由企業和私有制結合起來。我們不必動用所有信息，但必須以分散的方式，盡可能使用最多的信息。

這些觀察結果，把我們從一個狹窄的問題(即數理計劃，為何不能嵌入社會主義中央計劃體系的正常運作程序中)，引向另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下，為什麼中央計劃體系缺乏效率，而且不能與時俱進？

雖然我在制訂經濟計劃的機構中工作了很多年，但是這些經歷，仍然沒有幫助我認同中央計劃的觀點，反而促使我對它們愈加敬而遠之。1956年我已經對官僚中央集權制，極度厭惡。其後我從「下層」企業，和直接管理企業的低級政府部門的層次出發，研究了這個問題。到了1963年至1968年，我了解到這個官僚體系中，逐級向上的運作情況。我更加堅信無論社會主義計劃，使用的技巧如何現代化，都無法滿足社會主義者對它的期望。

在我即將結束把自己的期望值與現實成就進行對比的工作時，我希望在這裏補充幾句，談談人們對計劃所作出承諾的信心問題。社會主義吸引很多人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它有能力制訂具有前瞻性和目標明確的計劃。讓學者調節經濟活動，而不是自發盲目的市場力量調節，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主意。而國民經濟計劃的成功，也證實了人們的確可以對人類理性抱有信心。我們甚至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膽嘗試。

我在這本自傳中，描述了我與共產主義理念，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決裂的不同階段。我全盤否定了它的政治觀點，而且逐漸遠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張。但是我仍然相信中央計劃，在分配投資資源，和確定各行業的長期發展目標等方面，發揮了卓越有效，而且先進的作用，特別是在它使用最先進的方法（即數理模型和計算機）時。隨著這個希望的破滅，我的情緒也低落到了極點。

然而，在對計劃經濟體制感到失望的同時，我也意識到與計劃者長期相處的生活，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種經歷，有些像人類學者為了研究目標人群，而與後者在一起共同生活幾個月。我所以把自己的研究稱作「**可靠的**」研究，是因為我逐漸從內裏認清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從這個角度來看，編制國民經濟計劃這個重大的課題，對我來說，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現在已經到了2004年和2005年年間，在這裏請允許我暫時中斷對個人經歷的描述，改而對計劃的發展前景，略作講述。我認為共產主義體系的失敗，必然導致人們對計劃心懷疑慮，這令人感到非

常遺憾。無論匈牙利的國家計劃辦公室，還是前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其它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計劃機構，先後都被解散。計劃者的級別被降低，計劃機構在前蘇聯集團以外的國家，也完全喪失了影響力。你不需要成為共產主義者，也無需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但仍然可以發現為國民經濟制訂計劃的工作存在可行性。這個項目需要進行的計算，超出了一兩個財政年度的計算工作，而且它力圖遵循連貫一致的原則，來調查國家可以選擇哪些方式取得經濟發展。這種計劃編制工作，不一定要產生指導經濟參與者的文件。它只需對各種發展途徑進行計算，得出一定結論，供政客和決策者參考，並且作為他們討論的背景情況便足夠——這與拉格納·弗里希、簡·丁伯根和六十年代法國計劃者推薦的指導性計劃（它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不是**命令性**計劃的設想，完全一致。也許有一天，當人們對共產主義體系下，舊式計劃體系的可怕回憶完全消失時，關於計劃的學說便會捲土重來。到那個時候，我們過去從事數理計劃研究時，積累起來的經驗，或許可以再次派上用場。

與數學家合作

現在讓我們回到我的個人經歷上。1965年發表論文後，我和陶馬什·利普塔克，屢次嘗試繼續合作進行研究，但不幸的是，始終沒有如願。陶馬什日益嚴重的精神問題，逐步摧毀了他從事科研的能力。自從發表《雙層計劃》的論文後，他再也沒有和我或者其他合作者，研究真正有意義的課題，也沒有獨立開展研究工作。他還在匈牙利居住時，我和其他朋友曾經嘗試給他提供一些工作（或者至少幫他找些可以維持生計的掛名閑職）。後來他移居了英格蘭。起初，那裏的人們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與自己的名氣相匹配的重要研究工作，但後來發現這個曾經聰明睿智的學者，已經無法從事任何創造性的活動，於是便只能聽之任之。他一直依靠英國的國家福利維持生活，1998年陶馬什訪問布達佩斯時，因為遭遇意外事故而與世長辭。

我開始研究數理建模的課題，毫無疑問，這個研究需要由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合作完成。陶馬什和我從各自擅長的學科中，汲取了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事實證明，這些方法有效地彌補了彼此的不足之處。數學家所接受的專業訓練，旨在培養其優越的抽象能力，而經濟學家接受的專業訓練，則旨在培養其不斷回歸現實世界的能力。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一個人能同時擁有最優越的抽象能力和最優越的現實感，不過這種願望，基本上不可能變成現實。

我和陶馬什·利普塔克的合作結束後，又與其他數學家，或者曾經接受數學知識培訓的經濟學家，共同研究了許多課題，並且合著了多篇論文，其中包括彼得·韋利施、巴林特·德默爾基、貝洛·馬爾托什、約根·韋布爾和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在每項研究和每篇論文中，他們都適當地補充了我的觀點和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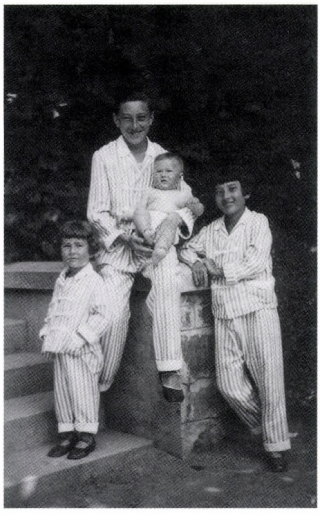
隨著我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成果的了解日益深入，我逐漸認識到，雖然這種數學家與經濟學家合作的模式，具有明顯的益處，但是它幾乎從來沒有出現在西方研究中。有遠大抱負的經濟學家，必須學習必要的數理技巧，以便為自己的研究，提供先進的數理方法。就西方學術界的合著作品而言，它們的作者，都是擁有豐富數理知識和方法的經濟學家，幾乎不存在「數學家+經濟學家」的學術組合。

這種「自力更生」型的研究，顯然具有多種優勢。然而，我不想掩飾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由於我沒有接受正規的大學培訓，所以經常在使用複雜的數學方法時，缺乏足夠的信心，這使我感到很痛苦。不過那些「自己動手」解決數學問題的經濟學家，也不一定完美無缺。他們必須把研究的範圍，局限在自己掌握的數學知識內，而他們的數學知識，在專業數學家的角度看來，往往非常有限。許多原本研究數學，後來轉而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例如約翰·馮·諾伊曼和約翰·F·納什，詳盡地闡述了數理經濟學的技術局限性。即使對某些精通數學知識的經濟學家來說，他們也不可避免地面對著這個棘手問題：某些數學蘊涵對經濟學家來說，實在難以理解，而在真

正的數學家那裏，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而已。

現在人們就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開展了許多討論。我們極有必要探討在未來廣闊的經濟學研究範疇中，是否真的不會再出現科爾奈–利普塔克式的經濟學家–數學家合作模式。

1



2

3

4

5

6

1. 我坐在哥哥班迪的腿上，站在我們旁邊的是姐姐麗莉和哥哥托米(1929年)。
2. 我和父母、哥哥、姐姐在一起(1930年)。
3. 皇家德國學校一年級的全體同學。我坐在前面第一排的最右邊，旁邊是好朋友彼得·肯德。彼得後面一排正對著他的是伊娃·塞凱伊。她後來成為奧運會的游泳冠軍(1933年)。
4. 少年時期的照片。
5. 布達佩斯第五區Akadémia街第18號。我家所住的公寓和父親在三樓(如果按歐洲的習慣應該算是二樓)的辦公室。現在這棟樓已經用來作首相辦公室。
6. 我和哥哥班迪、托米(1943年)。

7

8

7. 我在《自由的人民》的第一任上司米克洛什·吉邁什。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壯烈犧牲(照片攝於1950年前後)。
8. 心中充滿堅定的信念(照片攝於1948年前後)。
9. 冬假時在高堯峰的森林裏(1949年)。
10. 在維也納舉行一次會議(1950年)的報道。

9

10

11. 我的兒子加比和安德斯(1964年)。
12. 我的第一任妻子泰里和我們的兒子加比、安德斯(1966年)。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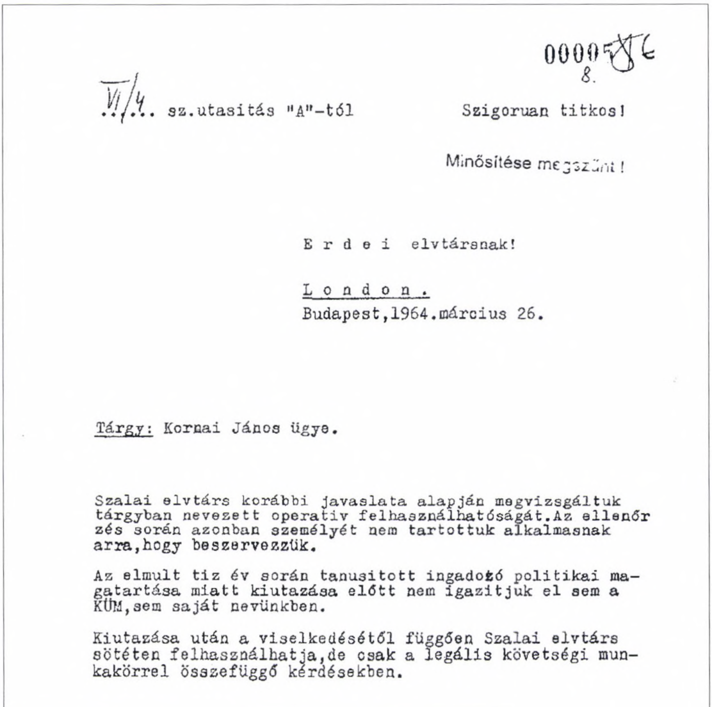
15

13. 我和陶馬什·利普塔克完成《雙層計劃》三十年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合影（1992年）。

14. 經濟研究所裏的「科爾奈集團」聚集在一起慶祝研究所成立五十年。從左至右：米哈伊·洛基、蘇莎·卡皮塔尼、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瑪莉亞·拉茨科和朱迪特·薩博。

15. 與安德拉什·布羅迪在一起（2004年）。

16



0000586
8.

VI/4. sz.utasitás "A"-tól

Szigoruan titkos!

Minősítése megszűnt!

E r d e i elvtársnak!

L o n d o n .

Budapest,1964.március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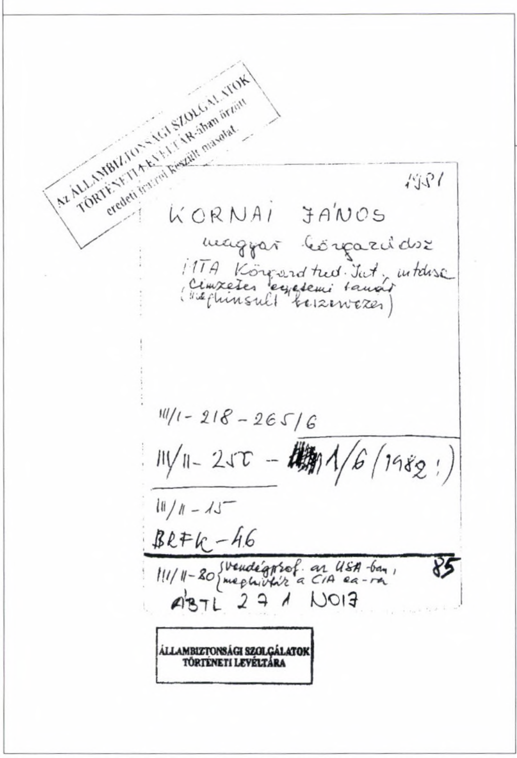
Tárgy: Kornai János ügye.

Szalai elvtárs korábbi javaslata alapján megvizsgáltuk tárgyban nevezett operativ felhasználhatóságát.Az ellenőrzés során azonban személyét nem tartottuk alkalmasnak arra,hogy beszervezzük.

Az elmult tiz év során tanusitott ingadozó politikai magatartása miatt kiutazása előtt nem igazitjuk el sem a KÜM,sem saját nevünkben.

Kiutazása után a viselkedésétől függően Szalai elvtárs sötéten felhasználhatja,de csak a legális követségi munkakörrel összefüggő kérdésekben.

17



18

16–17. 情報機關於1964年作出決定：我們發現「科爾奈不適合被招募為」線人。這張1985年的索引卡片上將這個決定描述為「失敗的招募行動」。

18. 英國劍橋的卡萊爾學院。1963年國際經濟學會的圓桌會議在這裏召開。這裏是我首次在國際學術論壇上發表演講的地方。

19

19. 我與自己的第一位導師—法國經濟學家埃德蒙·馬林沃合影。他曾經是《計量經濟學》的編輯，也是2001年劍橋大學學術會議的籌辦者。在我左邊的是法國駐布達佩斯使館的前文化參贊弗朗索瓦·阿萊爾。

20. 1965年我第一次在威尼斯舉辦的會議上，見到西方國家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從左至右依次：阿爾弗雷德·扎烏伯曼(倫敦經濟學院)、我、大衛·格拉尼克(威斯康辛大學)、約翰·邁克爾·蒙蒂亞斯(耶魯大學)和漢斯·勞伯赫(慕尼黑大學)。

20

21

22

23

21. 站在中間的，是我們那個年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肯尼思·阿羅。正是他邀請我於1968年前往斯坦福大學訪學。坐在下方最右邊的，是他的妻子塞爾瑪。另外一對夫妻是我在斯坦福大學認識的好朋友阿蘭·曼恩和傑姬·曼恩。坐在中間的，是我的妻子蘇莎。這張照片攝於2002年。當時我們剛剛結束加利福尼亞的訪問即將離開美國。

22. 我做完第一次肩部手術後坐在書桌前。當時醫生從我的肩部到腰部打滿了石膏(1972年)。

23. 在斯坦福著名的噴泉前。

24

25

29

24. 和加比、朱迪特和安德斯在蒂哈尼(Tihany)(1972年)。

25. 與母親穆約的合影(1964年)。

26

27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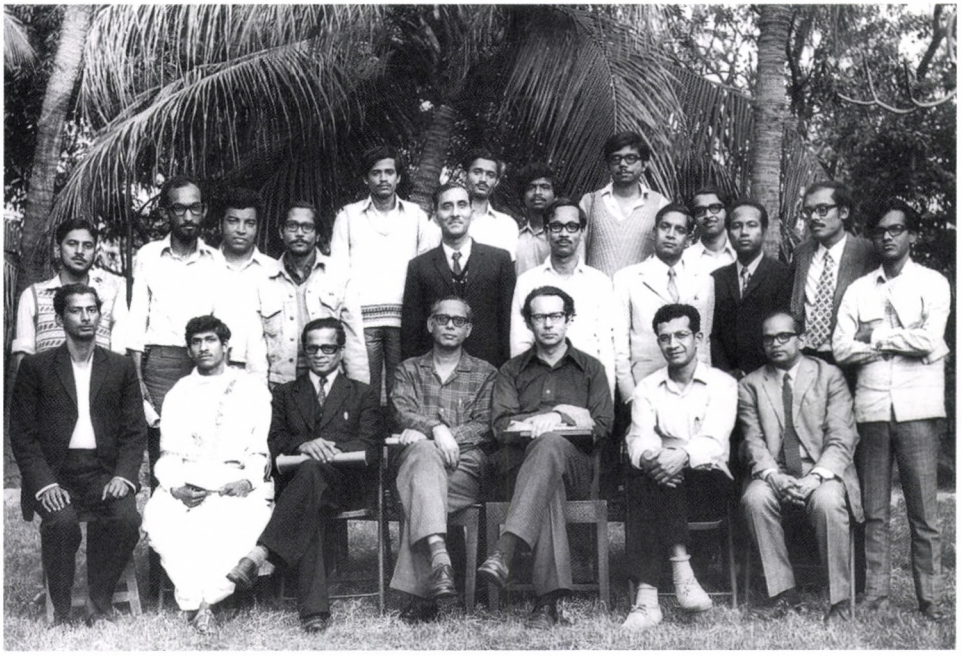
26-27. 母親穆約與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三個子女慶祝她的八十歲生日：托米、我和麗莉。我的姿勢有些奇怪，因為我剛剛做完第二次肩部手術還沒有拆石膏(1972年)。另一張照片是穆約和她的孫子、孫女以及曾孫、曾孫女慶祝八十歲生日。

28. 與蘇莎的合影(1972年)。

29. 與朱迪特在新澤西的海灘上(1972年)。

30

31



32

33

30. 在日內瓦參加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聯合國的貿易組織)舉辦的會議(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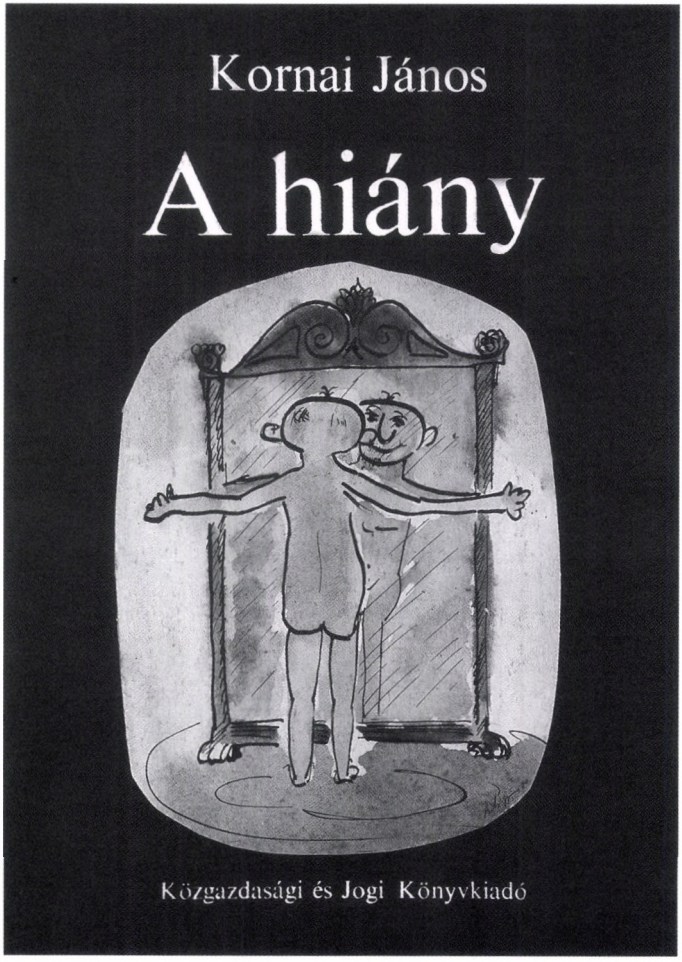
31. 在印度加爾各答市的大學進行系列講演時與學生的合影(1975年)。

32. 這是我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Lindingö時從窗口看出去的景色。我在那裏完成了《短缺經濟學》(1976–1977年)。

33. 這是1978年我參加計量經濟學學會年會時的情景。幾分鐘後我將發表主席演講。導師加林·庫普曼斯正在將我介紹給全體與會者。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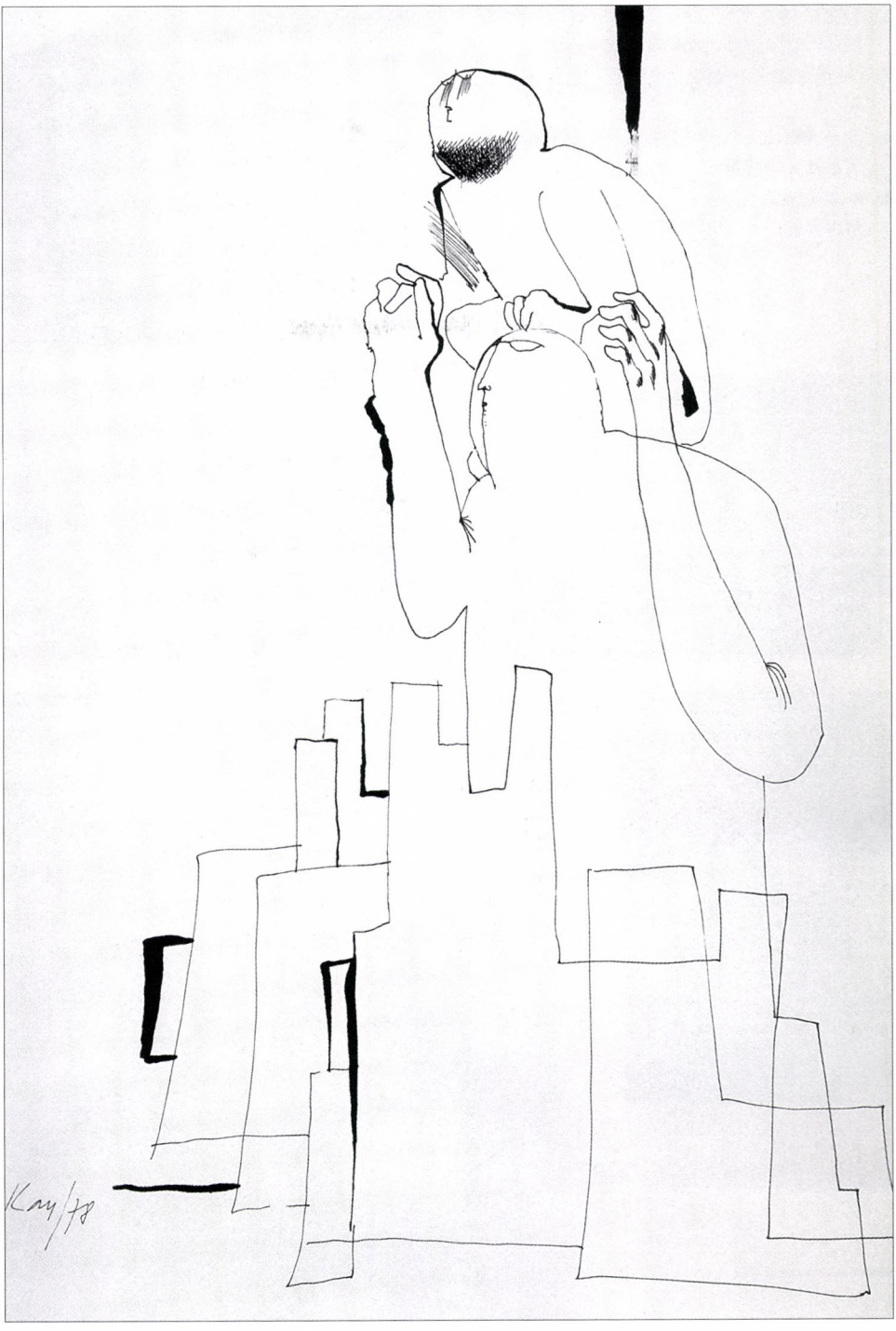
35



34. 巴黎索邦大學的校長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1978年）。

35. 匈牙利出版社出版《短缺經濟學》時，技術部門為這本書設計的非常有趣的封面「皇帝的新衣」（1980年）。

36. 著名藝術家雅諾什·卡斯從《短缺經濟學》中找到靈感，創作了一系列漫畫。這幅畫被命名為「父愛主義」。



37. 這是哈佛大學的立陶爾中心。從1984年開始我的辦公室就一直在這裏。

38–39. 我在課堂上講課，學生在下面忙著記筆記。

40. 我坐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裏，身後的牆上貼著巴托克的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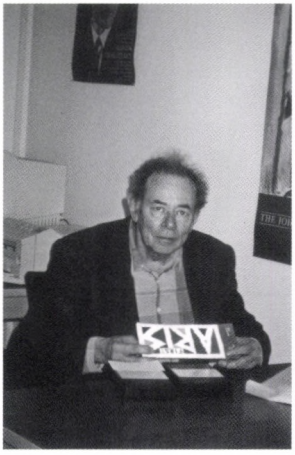
41. 哈佛大學歷史悠久而且精美的建築之一——哈佛大廳。自1990年開始我就在這裏授課。

37

38

39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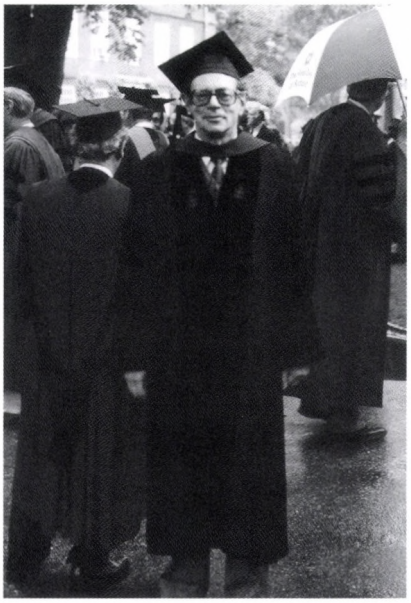


41

42. 這些是我教過的最優秀的中國學生。從左至右依次是：許成鋼(倫敦經濟學院)、王一江(明尼蘇達大學)、錢穎一(伯克利加州大學)和李稻葵(香港科技大學)。他們結束哈佛大學的學業後，我與他們分別見過面，2005年1月我們參加在香港舉辦的IEA會議時終於齊聚一堂。

42

43



44

43. 參加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

44. 坐在我左邊的是我的學生翁笙和。她後來與我合著過學術作品。坐在我右邊的是我的學生約翰·麥克黑爾和他的妻子麗莎。我和約翰合作發表過論文並共同舉辦過研討會。這張照片攝於我在坎布里奇的住所(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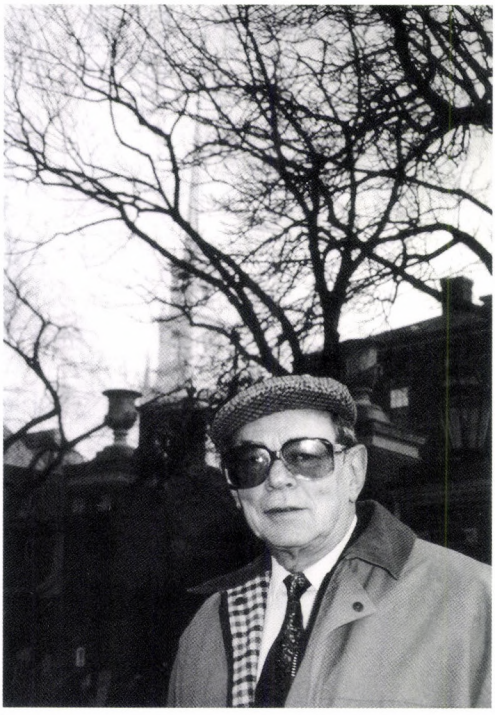
45. 錢穎一陪同我和蘇莎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迹(1999年)。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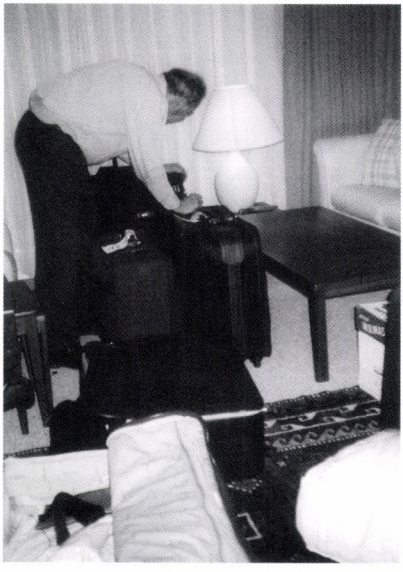
46. 照片的背景是哈佛的標誌性鐵塔（1996年）。

47–49. 上一張照片是剛剛回到家裏正在拆開行囊，下面兩張照片是收拾行李準備出發。

46



47



48

49

50–54. 1985年在中國舉辦的「巴山輪大會」。

50. 大會中的一次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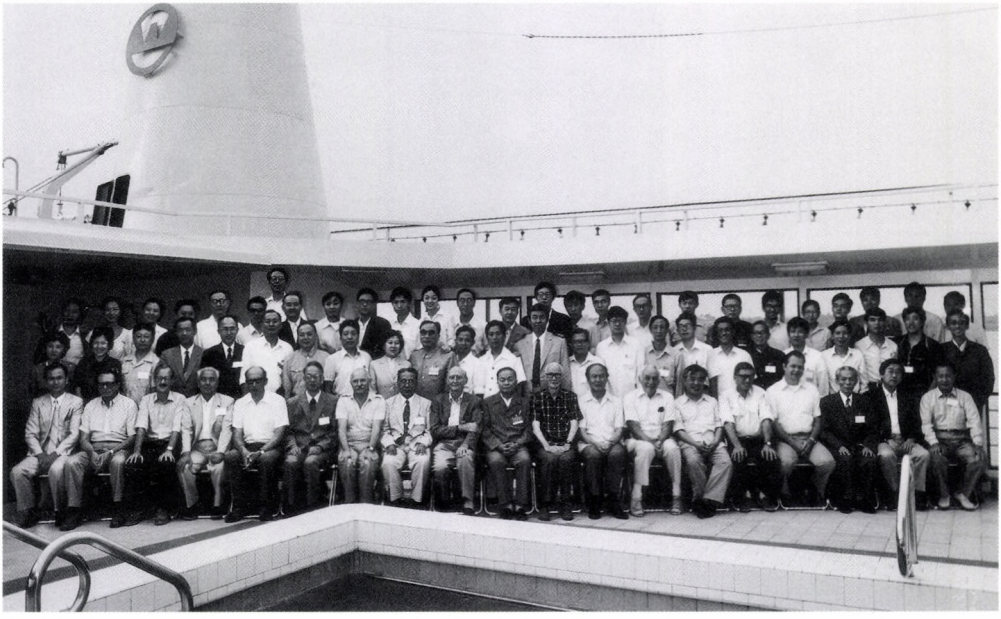
51. 與中國總理趙紫陽握手。他是中國改革的設計師之一（後來他因為同情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運動的學生而被軟禁起來直至逝世）。站在中間的是會議的主要籌辦者之一林重庚。

52. 全體與會者在甲板上的合影。坐在前排的是中方的主要籌辦者，以及受邀參加大會的七位外國經濟學家。

50

51

52



53

53. 忙裏偷閑：廚師在向我們展示如何把著名的北京烤鴨的肉切下來。

54

54. 乘坐摩托艇遊覽三峽。現在中國在這裏修建了長江三峽大壩和水庫，所以當初我參觀過的景點都已經被水淹沒了。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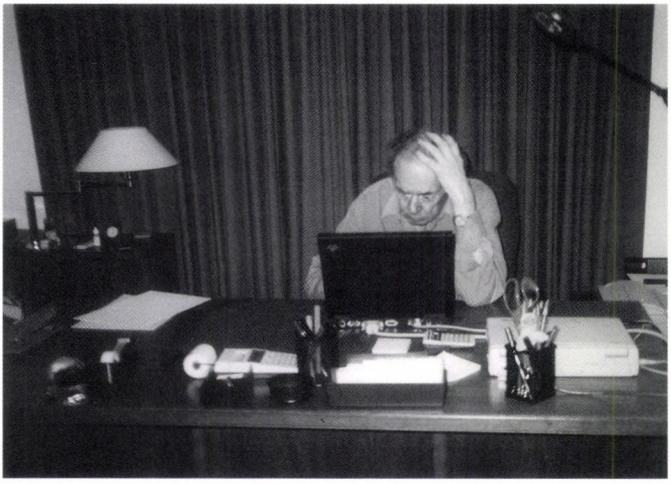
55. 我在與探望我的彼得·肯德和帕爾·勒切伊討論我在病榻上完成的《充滿激情的小冊子》(1989年)。

56. 在劍橋大學的住所裏努力工作(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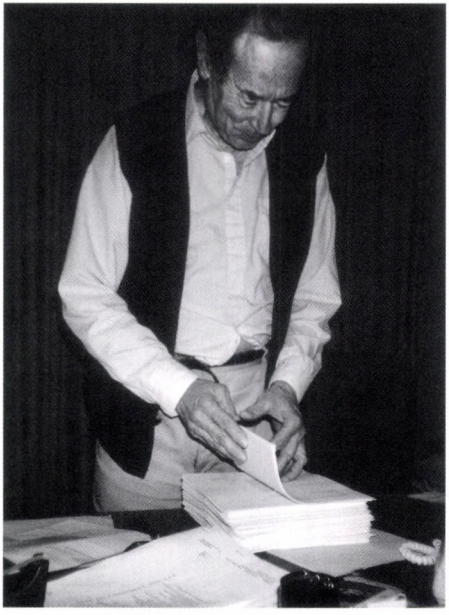
57. 收到英語版《社會主義體制》的校樣(1991年)。

58. 收到出版社贈送的《社會主義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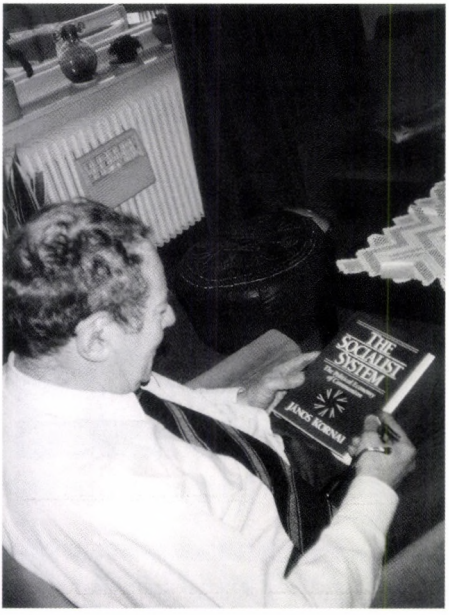
56



57



58



59

59–63. 讀者對作家的最大獎勵——給那些對我的書感興趣的讀者簽名。

59. 為越南河內的大學生簽名（2002年）。

60. 在哈佛辦公室裏為俄羅斯經濟學家葉連娜·卡盧諾娃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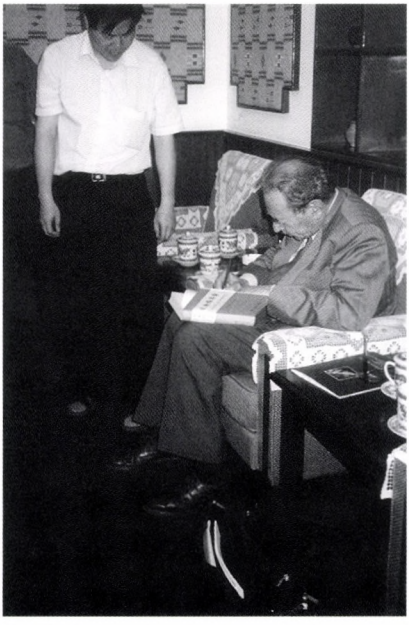
61. 在中國上海為讀者簽名（1999年）。

62. 為香港學生簽名（2005年）。

63. 為臺灣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簽名（1994年）。

60

61



62

63

64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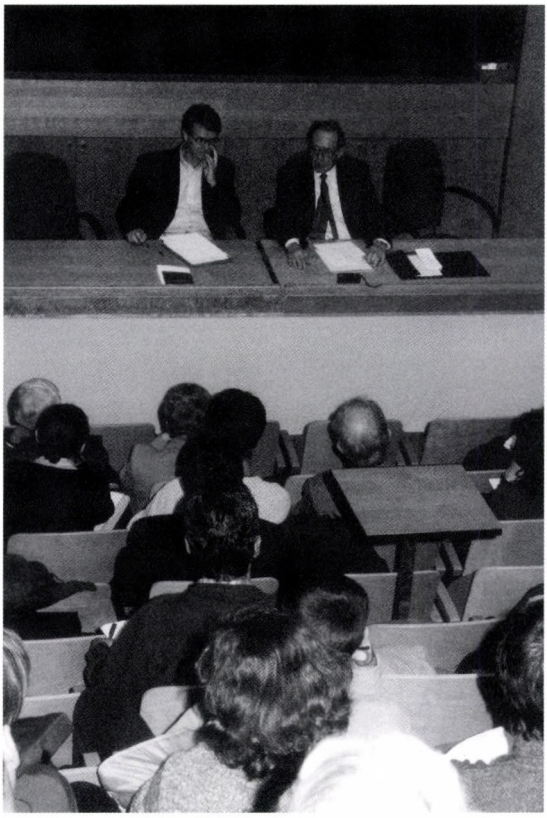
64. 在布拉迪斯拉瓦和編輯伊萬·米克洛什在一起，當時他們即將發行我的作品的斯洛伐克語版。幾年後，米克洛什成為斯洛伐克的副總理和財政部長（1998年）。

65.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演講後與學生交談（1999年）。

66

66. 在莫斯科新大學發表講演。大學的創辦者兼客座教授——以色列經濟學家古爾·奧法——在向聽眾介紹我(2003年)。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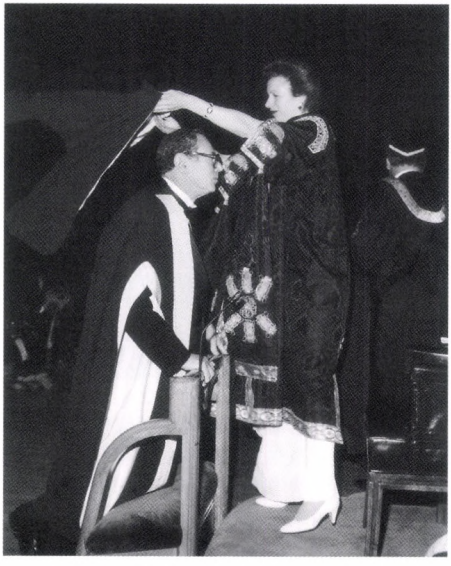
68

67. 在巴黎發布我的法語版學術作品。坐在我旁邊的是這套叢書的編輯之一伯納德·沙旺斯(2001年)。

68. 攝影是我的愛好之一，近年來我又迷上攝像。我正在拍攝阿克薩清真寺的哭牆(1995年)。

69

70



71

72

69. 德布魯森市的拉約什·科蘇特科技大學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2001年)。

70. 擔任倫敦大學校長的安妮公主將後垂布罩在我的頭上。這是榮譽博士的象徵(1990年)。

71.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接受塞德曼獎(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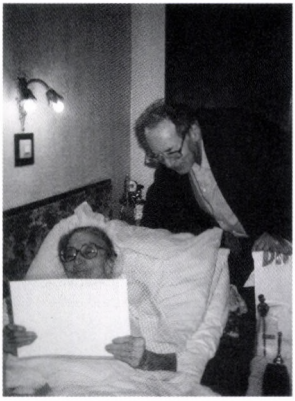
72. 我正在試穿正式的晚禮服。斯德哥爾摩經濟研究所即將為我頒發榮譽博士學位(2001年)。

73. 姐姐麗莉卧病在床，我正在給她看我收到的獎勵證書（2000年）。

74. 這是我和蘇莎的合影中我最鍾愛的一張。當時我正準備接受法國的榮譽軍團勳章（1997年）。

75. 在都靈接受榮譽博士學位（1994年）。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76. 與加比和他的妻子婷德在一起（1990年）。

77. 和朱迪特在住所的露臺上合影（1984年）。

78. 和安德斯在波士頓的海濱大道上（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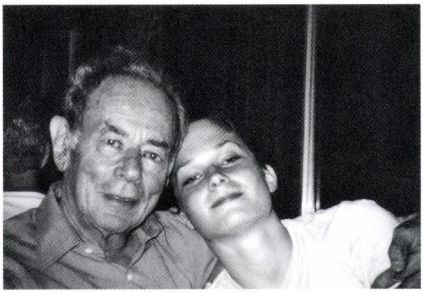
79. 教瑞典外孫和外孫女若非和安娜學游泳（1990年）。

80. 科爾奈家族一起到匈牙利科學院在Balatonvilagos的度假村度假。

81

82

83



81. 我的四個孫子孫女尤爾奇、若非、安娜和托米，他們穿著印有「哈佛大學」字樣的T恤衫(1994年)。

82. 夏天即將結束時數臉上的雀斑已經成為我們家的傳統。我們還會按照時間序列統計它們的數量並進行比較，然後用圖表顯示統計結果(1999年)。在照片上安娜正在把臉湊過來，讓我數她臉上的雀斑。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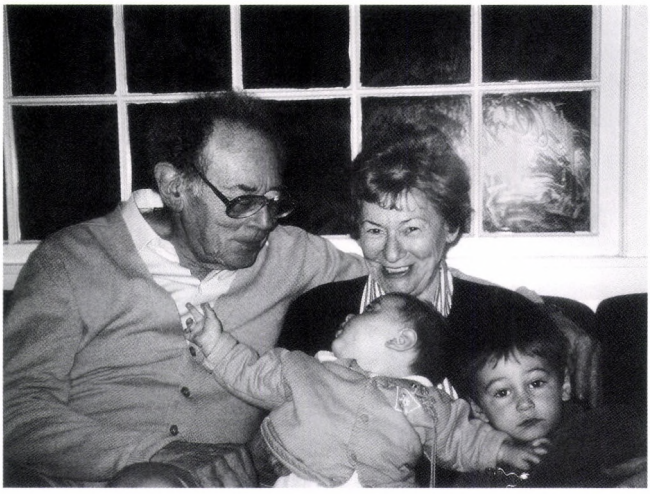
83. 和若非的合影(2000年)。

84. 和尤爾奇、托米、蘇莎和加比一起到布達山遠足(2000年)。

85. 我和孫子托米在巴拉頓湖邊專心致志地讀書(1994年)。

85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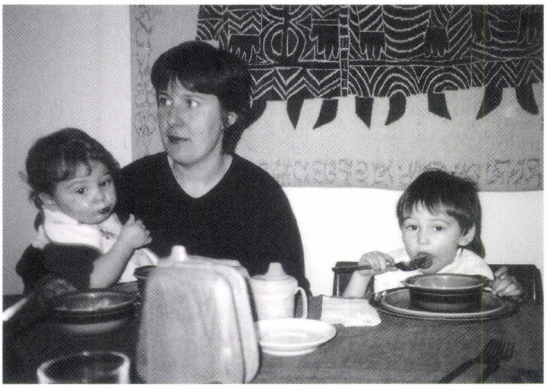


86–87. 在美國長大的兩個小孫子(丹尼和諾里)以及他們的母親阿吉與我們在一起。

88. 年紀最大的美國外孫米什卡非常熱衷於蘇莎做的「帕拉欽塔」(即脆餅)(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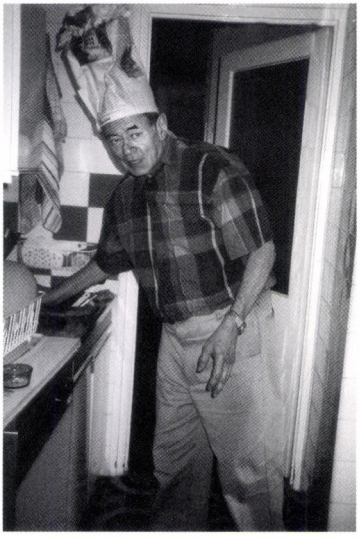
89. 特別時刻—我在和孫子、孫女用自己研製的食譜做「Jancsi的燉菜」。

87



88

89



90

90–93. 與匈牙利朋友在一起。

90. 從左至右依次是：安德拉什·納吉、漢娜·B·肯德、阿格尼絲·洛松奇和彼得·肯德（2003年）。

91. 彼得·肯德和捷爾吉·利特萬（1996年）。

92. 與勒切伊一家共進晚餐。他們是帕里·勒切伊、考蒂·豪納克和彼得·豪納克（1992年）。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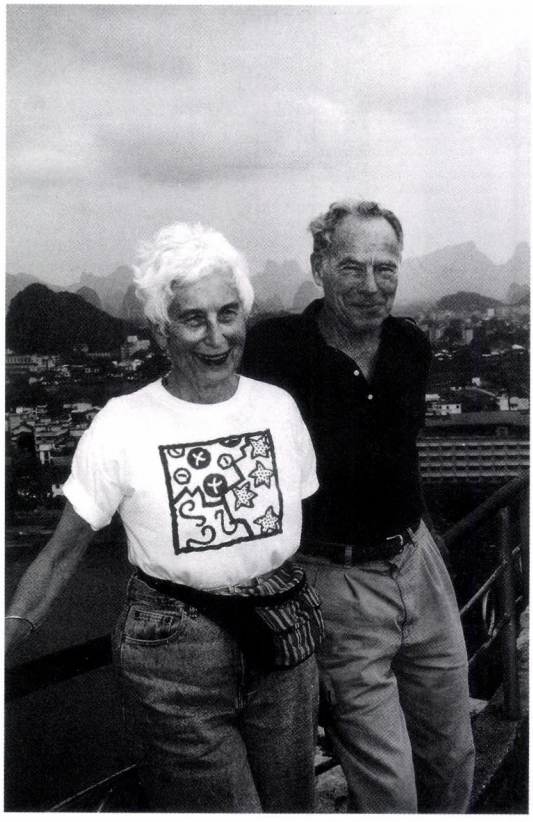
92

93

93. 和朋友在布達山散步：捷爾吉·利特萬、伊娃·利特萬和蘇莎。站在我旁邊的是蘇莎的姐姐馬瑞（2003年）。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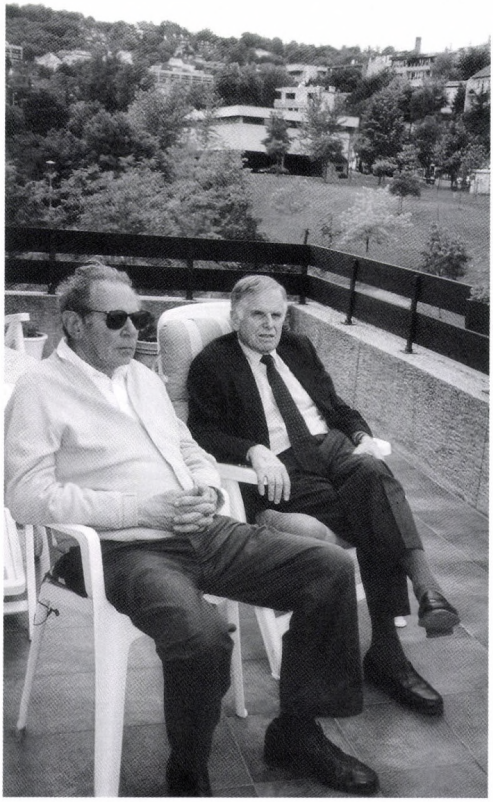
95



96

97

98



99

100

94–100. 和國外的朋友在一起。

94. 羅伯特 · 索洛和博比 · 索洛。

95. 米咪 · 伯林和格里 · 伯林。

96. 海倫 · 萊文和赫伯特 · 萊文。

97. 我的越南朋友兼翻譯阿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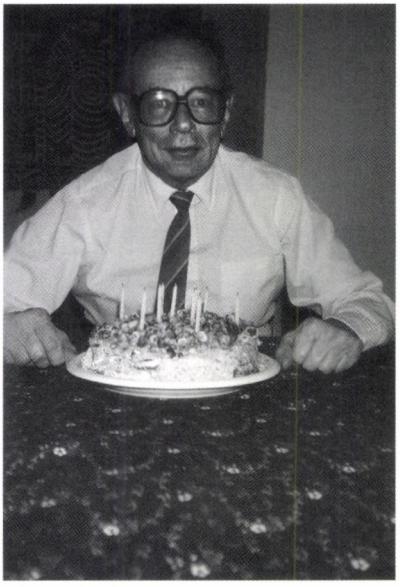
98. 弗朗西斯 · 巴托爾和我在公寓的露臺上。

99. 蒂博爾 · 西托夫斯基和伊麗莎白 · 西托夫斯基。

100. 蘇莎與加林 · 庫普曼斯和特魯斯 · 庫普曼斯夫婦。

101

103



102

101. 為了慶祝我的七十歲生日，朋友給我送上紀念文集作為生日禮物。這張照片中，站在我旁邊的是經濟研究所所長耶諾·科爾塔伊和文集的編輯之一雅諾什·加奇。

102. 我們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慶祝我的七十五歲生日。站在我左邊的是學院的院長伊姆雷·孔多爾。站在我右邊的是我的助手卡蒂·薩博。後面蓄著

鬍子的人是布萊恩·麥克萊恩。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負責將我的所有作品譯成英語(2003年)。

103. 在家裏慶祝生日。放在我面前的是我最喜歡的杏仁蛋白霜蛋糕。照片記錄的是即將吹蠟燭的時刻(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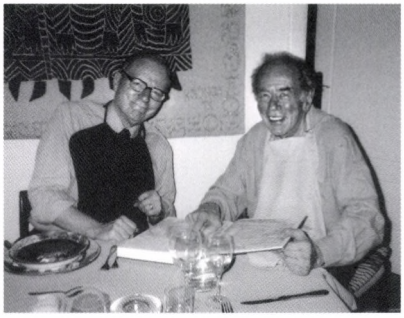
104. 我和美國朋友戴爾·約根松在家裏喝漁夫濃湯。這個時候戴上圍裙是個不錯的主意。

105–107. 我們即將離開美國(2002年)。

105. 我上完最後一堂課後準備拿著公文包離開教室。

106. 和蘇莎在布魯克林大橋前留影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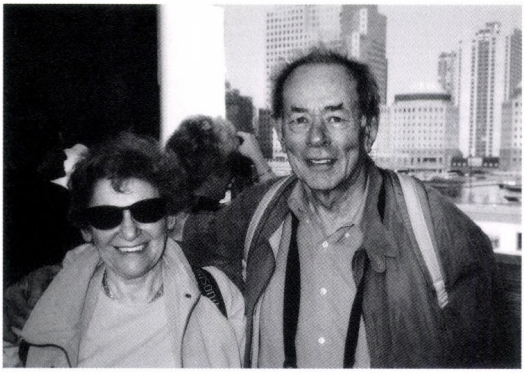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7. 告別波士頓港。

108–109. 哈佛大學舉辦的送別晚宴。

108. 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和他的妻子。

109. 站在照片後部的是傑弗里·威廉森和傑弗里·薩克斯。照片前面靠近讀者的是薩克斯的妻子索尼亞·埃利希和埃里克·馬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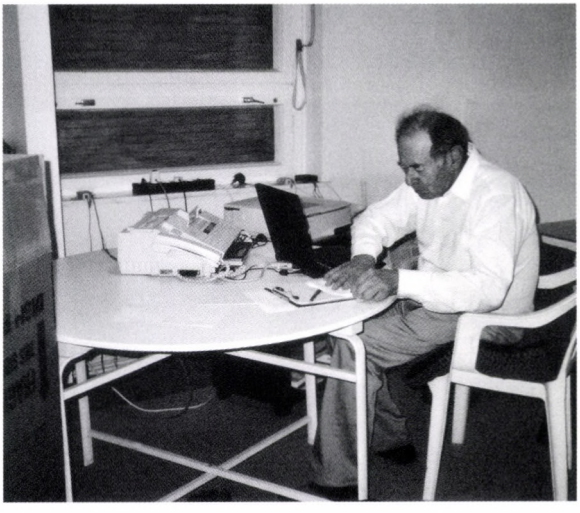
110

111

110–111. 這張照片攝於我們在坎布里奇的住所前面。當時我們正把家裏的傢具裝進集裝箱裏準備托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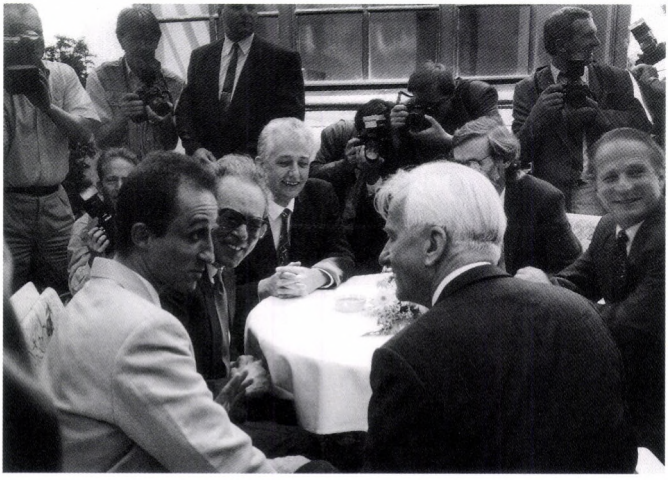
112. 我們在布達佩斯的老屋空蕩蕩的。我坐在一個用花園專用的桌椅拼湊起來的臨時書桌上工作，身旁堆滿了紙箱。每次蘇莎看到這種情景都會叫我「堅定的小錫兵」。

112



113

114



115

113–114. 1993年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的開幕儀式。我和匈牙利總統阿帕德·根齊、維克托·卡拉迪教授，以及德國聯邦共和國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露出側面的那一位）在一起。

115. 我與匈牙利科學院院長多莫科什·科沙里和作家彼得·艾什泰哈齊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開幕式的間隙交談。

116

116. 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著名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像前留影紀念。

117.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靠近Úri街的一座辦公樓。自2003年以後，我開始在這棟樓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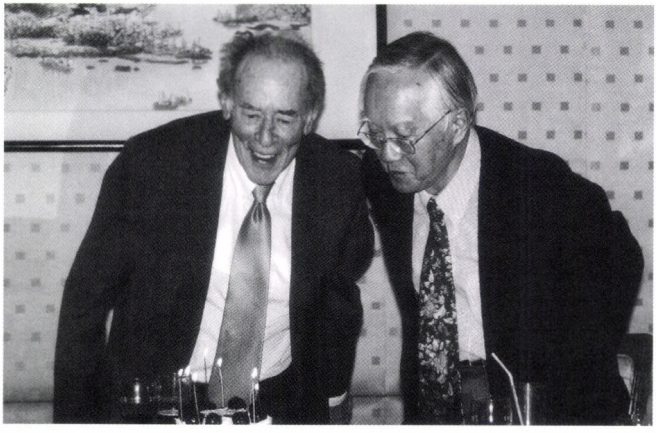
118.「誠實與信任」國際研究團體成員發表了兩部論文集。照片中是論文集的三名編輯。從左至右：蘇珊·羅斯·阿克曼(耶魯大學)、我、波·羅特施泰因(哥德堡大學)和克倫·庫克(斯坦福大學)。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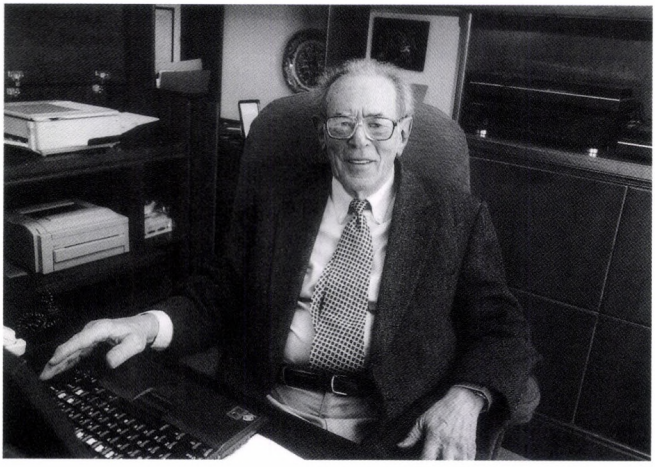
117

119

120



121



119. 在北京發表講演。我在哈佛大學教過的學生——香港科技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李稻葵教授在向聽眾介紹我。

120. 中國改革的學術領軍人物吳敬璉與我已經相交二十餘年。我們的生日相隔不遠，因此北京會議的主辦方於2005年1月為我倆舉辦了生日晚宴。

121. 坐在布達佩斯新居的辦公桌前。

感謝以下朋友為我提供了部分照片：

第20張：喬治·格羅斯曼

第30張：L·比安科（日內瓦）

第34張：Orop工作室（巴黎）

第46和117張：伊娃·基焦希-施密特

第70張：羅德·菲利浦斯（田納西州孟菲斯市）

第74張：朱迪特·米勒（布達佩斯）

第114和115張：捷爾吉·納吉夫人（布達佩斯）

9 西方之行：1963年後

長久以來，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夢想和願望，終於在1963年的夏天，變成了現實。英國劍橋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向我發出邀請，而我的出國申請，也得到了組織的批准。事實上，在此之前發生了一連串事情，我的首次西方之旅，經過了頗為曲折的過程後，才得以成行

出國前

1959年，我在英國出版《過度集中》時，《衛報》整版刊登了埃利·德文斯教授為它所寫的書評。德文斯教授是全球著名學府倫敦經濟學院（LSE）經濟系的主任。早在1958年，他就邀請我到倫敦經濟學院發表演講，並且舉辦一個研討會，而我只要完成這些工作，其它時間便可以自由運用。

這是西方研究機構，首次向我發出邀請。我頓時像通了電一樣興奮起來。我立刻向上級遞交了護照申請，但有關部門拖延了很長時間後，最終還是拒絕了我的申請。其後我再次提出申請，但是仍然被拒絕了。

1962年我終於獲准出國，這標誌著當時的壓迫統治，有所減弱——但我只能前往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而不能到西方國家。輕工業

部的朋友，幫助我爭取了前往東德、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學術會議和發表演講的機會，這是我首次在國外學術界亮相。

同樣在1962年，我收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函。它將於1963年舉辦國際經濟學會（IEA）圓桌會議，會議的主題是「長期經濟增長和計劃的活動分析」（當時應用數理規劃和類似數學技巧分析經濟學問題的方法，被稱作「活動分析」）。這次大會的主要籌辦人之一，是《計量經濟學》的編輯埃德蒙·馬林沃，我在上一章提及他曾經閱讀我和陶馬什·利普塔克聯合發表的文章。他們原本還希望邀請利普塔克，但是利普塔克鑒於自己有「犯罪」記錄，甚至沒有嘗試申請護照。我用國際經濟學會的邀請函，而不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邀請函，再次申請了簽證，最終成功地拿到護照。

英國劍橋

從1958年到1963年，經過五年的漫長的等待，政府進一步放寬了出國的限制。讓我感到格外高興的是，我的朋友安德拉什·納吉也受到了邀請。我們曾經一同被經濟研究所開除，現在我們卻可以一同前往英國。

1963年7月，我們乘坐飛機抵達倫敦，第二天便前往劍橋。這次會議在卡萊爾學院召開，我感到對於渴求知識的青年人來說，劍橋大學簡直就是他們的天堂。我們漫步在卡萊爾學院寧靜和諧的建築群中，隨後訪問了國王學院、三一學院及其它學院。此外，我們有幸欣賞了英國著名的矩形庭院草坪。自那以後，我到了很多地方，但是我始終認為英國劍橋，以及它多不勝數的優雅建築和公園，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在這裏，布達佩斯緊張忙碌的工作，都離我遠去，我可以盡情享受這裏的寧靜和安逸。

國際經濟學會（IEA）圓桌會議，是學術界的頂級學術會議，它舉辦的目的，是要匯聚各個領域中最傑出的專家，探討相關領域的課題。曾經參加圓桌會議，並且發言的學者有莫里斯·阿萊、蘇哈穆瓦·查克拉瓦蒂、羅伯特·多爾夫曼、特倫斯·戈爾曼、弗蘭克·

哈恩、列昂尼德·赫維茨、加林·庫普曼斯、萊昂內爾·麥肯齊、羅伊·拉德納和理查德·斯通(阿萊、庫普曼斯、斯通和赫維茨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獎)。當時我已經非常熟悉西方的經濟學著作，因此可以認出大多數與會學者的名字。能夠見到他們本人，對我來說，的確是一件難得的幸事。不過後來我才發現，那些從前沒有聽到的學者中，也有不少人在學術界享有盛譽。

這次會議的演講和討論水平都非常高——較我熟悉的布達佩斯的學術水平，高出很多。儘管所有人都很友善，但是我仍然如坐針氈似的參加了所有會議，因為我感到自己與其他與會者的學術聲望，實在相差太遠。*

當時我還不敢用英語發表演講，所以在翻譯的幫助下，用德語完成了發言。有時庫普曼斯或赫維茨，也會幫忙翻譯我的演講。在登上演講臺之前，我感到緊張極了(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每次發言前，都會感到緊張恐懼。儘管怯場讓我感覺非常不舒服，可是我仍然非常享受用語言表達自己想法的過程)。[1]

這次大會的發言，涉及許多有趣及發人深省的主題(後來大會組委會，把會議上的所有論文整理成冊後，便正式出版)[2]。我第一次聽到人們對埃德蒙·馬林沃計劃模型的詳細介紹(我曾在前數章提及這個模型)。這次大會把他的模型，與我們的雙層計劃模型，進行了比較。

我們參加這次會議時，是住在大學生的宿舍裏，房間裏配備了精美的傢具，讓我大開眼界。特別是把它們與匈牙利擠得滿滿當當的宿舍比較後，我的感觸便更加深刻。有一天早晨，加林·庫普曼斯和列昂尼德·赫維茨，敲了我的房門來探訪我。他們對我的研究和匈牙利局勢，提出了很多問題。這是我第一次與庫普曼斯本人談話，但是他儼然把我當作了朋友，後來他更一直不遺餘力地幫助我開展研究工作。他不是一個熱情、詼諧或者親切的人，但是他開

* 我在寫這本自傳時，愉快地想到自己擔任了國際經濟學會的主席職務。正是國際經濟學會於1963年組織了這次劍橋會議。

通、坦誠、嚴肅，而且善良。他的個性不是體現在情緒化的語言上，而是體現在他的思考方式上。他不會自顧自地誇誇其談，而是非常重視對方的談話內容。他會注意聆聽對方的談話，並且保持謙遜的態度。他和我第一次談話時，也是如此。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次談話無異於一次口頭測驗。我不可能再找到這麼優秀的老師，同時我們亦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在這次談話中，一方是來自西方世界的兩位學者：生於荷蘭，並且師承簡·丁伯根開始學習經濟學的庫普曼斯；和生於波蘭，並且曾經擔任奧斯卡·蘭格助手的赫維茨。他們都在美國生活了多年，這也許是他們第一次遇到生活在鐵幕之下的人。雖然我的英語嗑嗑巴巴，但畢竟是說和他們相同的語言。這次見面對他們來說，也一定充滿了樂趣。

那天晚上，我的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爾多，在家裏為參加會議的代表們，舉辦了招待晚宴（我曾經在第一章介紹卡爾多）。瓊·羅賓遜穿著印度紗麗，出席了這次宴會。羅伯遜是二十世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開創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學者之一，我曾經拜讀她的大作。*現在這一個傳奇人物，再一次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這次大會結束後，我前往倫敦，訪問了倫敦經濟學院。邀請我參加大會的德文斯教授，介紹我與學院的院長西德尼·凱恩爵士認

---

* 瓊·羅伯遜經常到處活動，不斷掀起學術和政治風暴。她晚年時狂熱地支持毛澤東主義。1977年，蒂博爾·西多夫斯基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蘇莎和我這幾個匈牙利人，到卡爾多家裏參加聚會。我們正在用匈牙利語交談時，瓊·羅伯遜突然出現了——她經常這樣造訪卡爾多家。我們沒有馬上改變交談的語言，瓊·羅伯遜靜靜地忍受了一會兒，然後用命令的語氣對我說：「科爾奈跟我來」。她把我拉出那個匈牙利人圈子，然後把我帶到她家中，開始談論中國的情況（她的家就在附近）。她滔滔不絕地發表了長篇大論，希望讓我相信他們已經找到通向共產主義的真正道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國家的官員「自願為人民服務」（我逐字逐句地援引了瓊·羅伯遜的原話），而不是像蘇聯那樣唯利是圖。她不接受任何反對她的觀點，也聽不進我描述的在東歐國家生活的親身體驗。

識。當時，西德尼爵士只穿著襯衣，沒穿外套，襯衣的前擺鬆鬆垮垮地搭在外面。這種情況在我的身上，也經常發生。如果我曾經注意或者有人提醒我，我會馬上整理衣服，但是我會由此想到西德尼爵士，所以也不會感到特別窘迫。

我和德文斯教授及西德尼爵士，約定如果沒有意外的話，第二年我便會再次前往倫敦經濟學院，並在那裏執教。

在倫敦經濟學院

第二年，我申請前往倫敦經濟學院訪學的計劃，得到實現。1964年4月，我坐火車抵達倫敦，激動之餘，我把公文包丟在維多利亞火車站，而且直到兩三個小時後才醒覺。我匆匆忙忙地趕回火車站，發現公文包原封不動地留在原地。這個小插曲，愈發堅定了我對英國人的信心。*

第二天，我到達倫敦經濟學院後，馬上開設了講授經濟計劃和相關數學方法的課程。在我的印象裏，當時有十至十五個研究生，專心致志地聽了這堂課，雖然存在語言交流的障礙，但是他們仍然理解我的英語，以及我想傳達的信息。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下課後，還到我的辦公室裏，和我討論他們在聽課過程中產生的疑問。其中邁克爾·埃爾曼對這門課的內容，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的觀點非常新穎獨到，在學生中顯得尤其突出。他後來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教授，我們一直保持著非常融洽的學術關係。

西方的青年研究者，開始從事教學工作時，通常不會遇到什麼特別的困難，因為他們讀書時，便已經親身經歷了大學的教學方式。但是我卻從來沒有在匈牙利，或其它國家接受經濟學專業的正規教育，所以現在我突然轉換工作，出任倫敦知名學府的老師，這的確是一件艱難的任務，我必須開創自己的教學方法。

---

* 自那之後，我經常丟東西，但幸運的是，這是我的個性使然，而不是標誌著我在日漸衰老。

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參加了許多有趣的學術活動。我多次到本校老師或訪問學者的課堂上聽課，其中的一位老師，就是A·W·菲利普斯。他首先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線的概念，並用自己的名字為它命名（菲利普斯曲線是微觀經濟學中，經常引用的理論架構）。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克萊因和羅伯特·索洛，都曾經到倫敦經濟學院講課，而且聽課的人擠滿了整個報告廳。那幾個月讓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世界的經濟學授課方法。

雖然我在學院學到很多知識，但是坦白地說，我感到非常孤獨。我的年紀太大了，已經無法融入年輕的學生中，而且也沒有和學院裏的老師，建立起真正的友誼。也許這是因為老師之間的聯繫，原本便很鬆散。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唯一結交的真正朋友，是蘇聯問題專家阿爾弗雷德·扎烏伯曼，他是來自波蘭的移民。此外，我到英格蘭訪學時，認識了蜚聲世界的蘇聯歷史及經濟專家亞歷克·諾夫，並且與他建立起終生不渝的友誼。他是一個和善、熱心，而且充滿幽默感的人。後來我們還多次見面，並且就許多問題展開辯論。他對「現行的社會主義」（即在蘇聯和東歐流行的政治體系），沒有多少信心，但是堅信「可行的社會主義」必勝。他所描述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更加完善、更加理想的社會主義形式，也是長期以來，大多數東歐人一直嚮往，但最終發現不可能實現的體系。

當時還有一位匈牙利人，在倫敦經濟學院執教——伊姆雷·拉卡托斯。他表現出出類拔萃的學術天賦，而且已經在倫敦大學引起很大的關注。後來拉卡托斯蜚聲國際，成為科學哲學方面的權威人士，他的作品被不斷引用。我曾經在布達佩斯，與他有一面之交。儘管拉卡托斯卓爾不群的學術能力，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但是他卻因為糟糕的政治歷史而聲名狼藉。他也許察覺到我了解他的過去，也許覺得與我志趣不相投，我們雖然在同一所學校執教，但是只曾見面一兩次，而且每次談話的時間，也不過幾分鐘而已，除此以外，他沒有表現出任何希望與我結交的跡象。幸運的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伊姆雷·拉卡托斯對我的疏離的態度，不過是個例外。

其後我曾經無數次出國訪問，每次都成為旅居海外的匈牙利同

行熱切關注的對象。無論在工作還是日常生活方面，他們都給予我無私的幫助。僅僅是來自匈牙利這個事實，便足以促使他們團結起來，向我抻出援手。貝洛·鮑洛紹、托馬斯·鮑洛格、威廉姆·費爾納、雅諾什·豪爾紹尼、尼古拉斯·卡爾多、理查德·匡特、蒂博爾·西多夫斯基和托馬斯·維托里斯等朋友真誠的關懷，總讓我的心裏暖烘烘的。

英國之行，讓我在學術層面上，更加了解倫敦經濟學院，但對我來說，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我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自己能訪問倫敦。我年幼時最喜歡的一本書，就是《你好，這裏是倫敦！》。[3]我對那裏所有著名的街道、廣場、歷史建築和紀念碑的名字，都瞭如指掌，現在倫敦城終於真實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由於多年以來，我一直生活在短缺的經濟中，因此與捷爾吉·彼得和米克洛什·吉邁什一樣，倫敦富足寧靜的生活，以及充足的物質供應，讓我目瞪口呆。1963年短暫的劍橋之旅，讓我看到了英國人生活的縮影，而現在我已在倫敦生活了好幾個月。當然我早在出國前，便已經從學術資料中，了解到英國與匈牙利在生活上的差異，但是從文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回事，從別人口中聽到的情況是一回事，親眼看到的景象則是另外一回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從那時開始，真正學會如何使用「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後來成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標誌）。我通常會從理論和統計學這兩個角度，對兩種體系進行比較，但是激發我提出這些觀點以證實它們的，卻是我本人對這兩種體系的親身經驗。

間諜和告密者對我的相同看法

上文描述的這些事情過去四十年後，我終於有機會查閱許多保密文件，這時我才發現在英倫之行前後，政治警察對我展開了許多調查工作，而我當時完全不知情。

經濟學家陶馬什·巴奇考伊，充當了政治警察的內線。他在一份手寫的報告中，描述了我的情況：「一個月前我和雅諾什·科爾奈

談過，他聲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他不接受工人階級處於絕對貧窮狀態的觀點，也不接受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觀點。……他不認同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領導作用的觀點。」

我閱讀了很多告密者對我的生活狀態所寫的報告後，發現這些文件，都使用了標準格式，即負責調查我的警官，會對告密者的報告，提出評論意見，然後指示密探下一步該怎樣採取行動。請允許我在這裏，引用一段這名警司對報告的評論：

文件：科爾奈妄圖在秋季前往英國訪學。

評價：這份報告很有價值，因為它說明科爾奈，並沒有放棄先前的修正主義立場。如果這個情況屬實，那麼允許他到英國，將對我們非常不利，因為[帝國主義敵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對科爾奈施加影響，甚至可能收買他。

命令：與科爾奈談談，再次回到他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

陶馬什·巴奇考伊的報告，裝滿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他的同事、朋友和親戚中，包括很多經濟學家、文學家和電影工作者，巴奇考伊一一告發了他們，並寫了大量報告。此外，他還從自己與父親及妹妹的談話內容中，搜集信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巴奇考伊不算我的朋友，但是在很多年裏，我們的關係相當不錯。

現在讓我來補充一些自己的猜測：為什麼警察局有這麼多告發我的材料，而我仍然能夠前往英國訪學？在1962至1963年政府大赦之前，政治警察在最黑暗、壓迫最深重的卡達爾政權下，大行其道，肆無忌憚。譬如對我個人而言，我申請護照時便屢次遭到拒絕。但是1963年後，共產主義政權的壓迫機器略微放寬限制，而且

---

* 埃麗卡·洛齊克(2005)在自己的文章裏，揭發了陶馬什·巴奇考伊告密的行徑。自1956年11月29日至1961年8月16日，他從事這個勾當的時間長達五年之久。埃麗卡的文章詳細地描繪了巴奇考伊收集信息的範圍，並且列出被他告發的人的名單。這篇文章發表後，巴奇考伊馬上公開承認它的內容屬實。我會在後文再談到這件事情，並且解釋為何我只單獨透露陶馬什·巴奇考伊的名字，而絕口不提其他告密者的名字。

政府當局開始試向西方示好，政府逐漸把文化和外交政策，放在比秘密警察更重要的位置上。不過雖然我得到政府的批准，順利出國，但是我們馬上可以在下文看到，秘密警察繼續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我在倫敦遇到了從前在報社裏共事的記者R.R.。我到倫敦訪學時，我們的友誼已經維持了十七年。當時他在一家匈牙利共產主義報紙裏，擔任駐倫敦的記者，我們在很多政治問題上的見解，截然相反，不過我認為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友誼。過去我經常找他，定期向他募集捐款，來幫助1956年入獄者的親友，直到這些人道主義活動被警察發現後才作罷。

我們在倫敦經常促膝長談，他駕車帶我出外兜風，還陪伴我購買非洲的雕刻藝術品——他熱衷於收藏藝術品，所以非常清楚可以在哪裏，以相當便宜的價錢，買到精美的藝術品。

最近，我收到了警察局和情報部門保存的關於我的材料的副本。讓我大吃一驚，而且感到萬分沮喪的是，R.R.竟然也曾向他的秘密警察上司，詳細彙報我的政治觀點及我們的談話內容。[5]這些報告寫於1965年，當時秘密警察到倫敦收集關於我的情報時，發現他們長駐倫敦的密探與我私交甚篤，因此向他發出命令，要求他寫一份完整的報告，彙報我的情況。他馬上不折不扣地執行了這個指令，在報告裏詳細回憶了我們在倫敦討論的話題。

R.R.不僅向秘密警察彙報我的情況，而且還告發了其他人。他有自己正式的代號。不過R.R.在報告中，只是準確地彙報我的觀點，既沒有（從卡達爾政權的角度出發）添油加醋，也沒有誇大我反對政府的立場。他只是向上級客觀地彙報了我與親密朋友之間的談話內容。

現在請允許我引用報告中的一段原文：科爾奈「認為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希望不再涉足政治。……他請求我幫助帕爾·勒切伊的妻子。……他不贊同黨的經濟政策。……他認為這些政策，缺乏科學性和可信性。」

難道當時我與R.R談話時，不應該坦誠相待嗎？除了朋友以

外，誰是值得我信任的人？或者說我過於幼稚，執拗地相信友誼的力量，能夠戰勝對黨的忠誠？儘管我和R.R持不同的政見，但是我一直認為我們是朋友。不過他在給上司的報告中寫道：「在1953至1954年之前，我們曾經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但自那以後，我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朋友關係也就此終結。」

我全面仔細地查閱了相關文件，因此非常清楚R.R.是誰，同樣對於其他告密者、叛徒和情報機關密探的姓名，也一清二楚。我在後文提到他們時，用隨意選擇的兩個字母，代表了他們的名字（這些不是他們真實姓名的首字母）。讀者必然想知道，既然我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為什麼還要刻意隱瞞。

在我寫這本自傳時，匈牙利的法律規定，公民有權了解當初誰背叛了他們，或者誰告發了他們*，但是卻不得把他們的個人資料，公之於眾。

共產主義體系崩潰後，整個東歐開始高調討論，如何處置前情報機關留下來的檔案材料。許多人支持德國激進的做法，即是把前Stasi（Staatssicherheitsdienst，即國家安全部）的檔案記錄，全部公開。這種方法在匈牙利也有不少支持者，但是遭到負責此事的政治官員的強烈反對。此外，許多人在公共辯論中，也從法律、安全和道德等方面出發，提出了反對意見。政黨在政治方面的考慮，或許也對此產生了一定影響。雖然這種做法，不會觸及某些政客，但他們擔心如果本黨黨員，曾扮演間諜和告密者的角色，將會影響本黨的聲譽。社會上一再爆發是否應該修改法律，並公布密探、告密者、間諜和情報網絡中其他成員姓名的爭論。2005年二月初，這本自傳行將完稿時，關於告密者、他們的上司、遭到他們迫害的人和被他們監視的人的記錄，是否應該或者是否能夠公布的爭論，再次升溫。我把這本書的手稿交給出版社時，這場論戰仍然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

* 這項法律是否能夠得到執行則是另外一回事——人們通常不可能知道自己希望了解的信息。

我曾經捫心自問：如果法律不再有這方面的限制，我是否會公布他們的名字。我不想用法律條款當幌子，來迴避這個問題。我希望直接面對自己在道德和情感上的兩難抉擇。

由於本書中的許多內容，都涉及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不得不一再考慮，如何妥善地處理這種情況。這些故事各不相同，有些告密者（或者以各種方式幫助朋友及熟人從事情報工作的人）與我只存在鬆散、不密切的聯繫。然而，這不意味著我與他們素不相識，其他告密者中，包括我的五至十位密友。我常常想起十五年前或更多年前，我們曾熱烈地討論工作、公眾生活、家庭和孩子。這些昔日的朋友怎麼能背叛我？他們怎麼會參與這種醜陋的勾當，而且可能對其他朋友，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

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多年的生活經歷，在我腦海中深深地植入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合法訴訟程序，即人們有權享受公正誠實的法律程序。所有嫌疑犯，或者被指控有罪的人，都有權為自己辯護。如果他們認為對他們的懷疑，或者指控，沒有任何事實依據，那麼便應該給予他們機會，反駁這些指控。如果存在減輕罪行的可能性，也應該允許這些嫌犯，利用這些法律規定，維護自己的權益。無論被懷疑或被指控有罪的人，是否認罪伏法，懷疑或指控他們的人，都應該提出自己的證據，而且如果他們了解任何可以加重或減輕罪行的情況，也有義務出示這些證據。法院必須聽取證人的證詞，而且法院對案件作出裁決後，被告仍然有權利提出上訴從這種意義來說，在卡達爾政權結束三、四十年後的今天，誰還能實行這種合法訴訟程序呢？許多被猜測是叛徒的人，早已經不在人世。

但這些因素，卻不是促使我最終決定隱瞞告密者姓名的最重要原因。我沒有權利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也許情報機關，使用了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可怕手段，強迫他們從事這些騙人的勾當。

我並不是在未經調查的情況下，便隨便洗脫他們的罪名，也不是在宣稱告密者也是受害者，他們只是在可怕的壓迫體制下，被迫扮演了這種角色。儘管政治體制是第一個要被指責的對象，但是這

與我的信念——即所有個體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無牴觸。有些人敢於拒絕秘密警察的要求；有些人甚至不是秘密警察考慮的對象，因為他們很清楚對方不值得信任。但是我同樣不想對所有告密者，一概而論。我不想沒有經過事先調查，便譴責告密者的罪行，因為我沒有資格審判原告與被告的證詞。

我不能妄加判決，即使連報復的念頭，也不曾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如果我公開這些告密者的名字，那麼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我沒有懲罰R.R.和其他告密者的權力，也沒有間接傷害他們的家人的權力。

在這本自傳的初稿裏，我沒有使用陶馬什·巴奇考伊的真名，而是用兩個字母來代替。但是在本書的修改過程中，媒體上出現了暴露他的身份的文章，其中提到我也是被他告發的人之一。巴奇考伊承認這個指控屬實，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沒有理由再隱瞞他的身份。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揭發告密者的文章越來越多。我不想在這裏，從法律或道德的角度，評價這種做法，我只想聲明自己不想參與這種揭發運動。我已經再三斟酌上文提到的那些原則，所以即使在當時的發展形勢下，我仍然希望堅持這些原則。不過對於那些已經被揭發，而且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的人來說，我相信寫下他們的姓名，也並不違反我的原則。

描述了這段小插曲後，讓我們回到秘密警察的報告和分析這條主線的層面上。

我翻閱那個年代的文件時，再次看到兩個平行發展的故事。其中一個故事，直接牽扯到我，例如我申請出國，但遭到拒絕，其後又獲得了批准；我出國訪學結束後，最終回到布達佩斯；每次我都擔心下一次申請出國時，政府不批准等諸如此類的事情。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隱秘的故事，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也逐漸展開。搜集情報的密探，不斷向機關彙報我的情況，而且對我的言論進行評估。借用奧威爾的術語來說，他們在分析我的「思想犯罪」情況。

當政治秘密警察，以及國內的告密者和情報機關組成的網絡（他們在同一個部門裏密切合作），決定不再妨礙我出國訪學時，他們開始考慮招募我的可能性。我第一次訪問英國後，當時駐守在倫敦的密探X·X，便向上級提出上述的建議。X·X是匈牙利駐倫敦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我清楚記得X·X是一個彬彬有禮，而且友善和氣的人。當時我太天真，從來沒有懷疑他會是匈牙利情報機關安插在倫敦的一名密探。[6]記憶所及，他曾經帶我去一家織品商店，那裏可以以非常優惠的折扣價，購買到精美的英國粗花呢絨。*

X·X的建議受到上級的重視，他們仔細審查了我本人的情況和思想主張。1964年3月26日的檔案，記錄了這個決定：「根據X·X同志之前的建議，我們評估了吸納雅諾什·科爾奈的可操作性。然而，評估結果顯示，他並不適宜於加入我們的組織。鑒於在過去十年裏，他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搖擺性，我們不會在他出國前，以外交部或我們自己的名義，向他下達指令。……他出國後，X·X同志可以根據他的表現，隱秘地利用他，但是只能限於他在使館工作的法律範圍內。」[7]

在這裏有必要說明「下達指令」和「隱秘」等詞語的含意，它們都是匈牙利情報機關特有的術語。

當情報機關認為，可以利用某些到西方旅行的人，收集政治情報，而這些人又忠於黨的政權時，前者便會在他們出國前，給他們「下達指令」。情報機關可能在出國者的辦公室裏，向他們下達指令，也可能把他們召集到外交部或警察局，給他們指示具體任務。情報機關會向他們交代在國外應該怎麼做、與誰聯繫、與誰保持一定距離，以及需要打探哪些消息。當局明確表明自己希望出國者，

---

* 由於X·X對我非常友好，因此1963年我從英國回來後，曾在布達佩斯給他寫信，稱我將於1964年再次前往倫敦，所以希望抽出一些時間學習英語，請他幫我推薦比較好的語言課程。當我在密探X·X的檔案裏，看到這封友好的私人信件時，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將這封信附在報告中交給了上級。

詳細報告自己在海外的經歷。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出國者，被正式招募進情報機關，而只是與他們建立起某種聯繫，而且這種聯繫不斷加強的可能性，並不確定。政治警察和情報機關，只會冒險與那些他們認為忠於黨的人，建立這種鬆散的聯繫。如果這些人到了國外後，泄露自己曾接受這類指示，那麼匈牙利警方一定會感到非常尷尬。就我而言，顯然我的言論和告密者的報告，讓秘密警察意識到，不僅不能把我吸納進他們的隊伍，甚至不能給我「下達指令」，因為我完全不值得信任。我拋棄了共產黨的根本原則，所以情報機關根本不敢冒險招募我。

為了解釋情報機關的其它術語，讓我們先來引用雅諾什·凱奈迪彙編的術語表：「『隱秘』情報指告密者和密探，從談話中收集到的有價值的數據或信息，而談話的另一方，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她正在與敵方交談，而且正在把重要的信息透露給敵方。他/她完全不了解敵方的『隱秘』目的。告密者和密探精心設計，並準備了談話內容。」[8]從這個角度來看，X·X陪我到攝政街上的織品店購物，並和我東拉西扯時，他是在有意從我這裏，獲取對他的上司來說非常重要的信息。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雖然我絲毫沒有懷疑他是密探，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從我這裏，打探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現在讓我們來看那個時期的另外一份文件。後來我不斷收到各種邀請，並且再次申請出國時，我的一份申請表，被送到政治警察那裏。情報人員在報告中，使用的措辭清楚地表明，監視我的人對我的活動相當了解。無論他是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還是情報機關以外的專家，報告中體現出來的專業性，都說明曾經有經濟學同行，評估了我的作品。他/她認為科爾奈「的確開創性地把電子計算機，引入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即數理規劃)，但他的工作，幾乎完全建立在西方學術資源的基礎上。他引進國內的，都是西方的著名理論和研究方法，所以他在國內的研究，不足以吸引西方學術界熱切地邀請他訪學或參加會議。科爾奈沒有給西方學術界帶來任何新的理論。」[9]

對出國訪學和國外發表作品的總體評價

在監視我的經濟學家向秘密警察提交的評估報告中，有一條信息是確鑿無疑的，即西方學術界不斷向我發出邀請。他/她認為西方學術界，不需要從我這裏了解電子計算機在研究中發揮的巨大功效，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他們的電子計算機技術，遠比我們這架龐大的蘇聯製造烏拉爾計算機，先進十至二十年。而且我是從西方學術著作中，學到如何把線性規劃，運用在經濟學研究中，而不是他們向我學習了這種方法，這方面的評論也是客觀的。然而，我似乎能夠給西方的聽眾帶來一些新鮮的內容，因為他們希望看到我本人，並且聆聽我的演講。

我不斷收到國外學術活動的邀請函，這不僅使我成為秘密警察關注的焦點，而且也使我成為經濟學家討論的熱點話題。在布達佩斯生活的人，經常會聽到大家在背後對我的議論，所以我知道有些人認為，這些邀請代表科爾奈很「精明」。他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並且努力認識那些可以邀請他出國的重要人物。

我並不畏懼這些冷嘲熱諷，特別是在1963年和1964年，我出國訪學後，收到了一系列邀請。越來越多西方國家希望我前往講學，所以我出國的次數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規律。我不希望對所有研究者出國訪問的背景，一**概而論**，因為我不曾研究其他學者接受此類出國邀請的情況，我只希望記錄下自己的經歷。

每次西方學術界向我發出邀請時，都是基於對我的文章的欣賞。正如我在前言講述的那樣，1963年劍橋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邀請我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在《計量經濟學》上發表的兩篇文章，給大會的法國籌辦者馬林沃教授，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倫敦經濟學院邀請我，是因為它的系主任德文斯，非常欣賞牛津大學出版的我的專著。1966年，計量經濟學會在羅馬召開的大會邀請我前往，是因為計劃研究部的負責人庫普曼斯，在劍橋認識我後，認為我對這個學科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後我又應邀參加了在威尼斯舉辦的研討會，並在那裏結識了很多來自東西方的經濟學家。主辦方邀請我

的原因，是我的《過度集中》深深地吸引了他們。*

雖然我還可以繼續描述這類會議每次邀請我的原因，但我卻認為現在根本沒在這種必要。我曾經前往很多地方，但是從來沒有請求任何人幫我安排這些活動。我經常建議年輕的同事，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雜誌上發表論文，因為這些發表的論文，最終都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而且能夠吸引學術界注意他們的作品。有些人聽從了我的建議，但有些人則對此不以為然。

現在人們經常討論**人際網**對於政治、商業、文化、學術研究和科研的重要性。有些人把「建立人際網」作為生活的首要策略。他們認為建立各種各樣有用的人脈，本身就代表著成功。我不想在這裏，開始討論正確的人生策略，或者對他們的利己目標和道德觀念，評頭論足。然而對我來說，我從來不認為拉關係，是根本性的成就。它只不過是我的研究、教學及學術活動的副產品而已。我與其他人建立人際關係的方式，主要建立在他們對我的論文、書籍和演講的反應。有些人際關係，停留在學術同行的關係，或者師生關係上；有些人際關係，則進一步發展，成為真誠的友誼。我的「關係網」不斷擴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網絡，內裏包括了成千上萬個層次，而不是區區數百個層次。初級的人際關係衍生出第二級人際關係。不久以後，我認識的朋友和我的名氣，便通過自生作用，產生出越來越多人際關係。我希望在這裏強調的，是初級人際關係的起源。就我而言，我的關係網，源於自己重要的學術成就。

讓我們重新回到國外旅行的問題上，以便與本章的題目互相呼

---

* 起初西方經濟學家聽說過兩個科爾奈。對於蘇聯和東歐問題專家、蘇聯政策研究專家和比較經濟學家來說，我是《過度集中》的作者。而對於數理經濟學家來說，我是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的創始人之一。在那個年代裏，除了個別學者以外，蘇聯政策研究專家通常不會閱讀《計量經濟學》，而理論經濟學家很少能與時俱進地了解共產主義經濟體系研究的最新著作。這兩個陣營輪流給我發來邀請。人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將這兩類截然不同的學術作品，在人們心中留下的不同的「科爾奈」形象融合在一起。

應。我曾經向讀者保證，不會列出一串長長的旅行目的地的清單，或者洋洋灑灑地寫些游記，讓讀者感到厭煩（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文學天賦，我從國外回來後，很少能向家人或朋友，繪聲繪色地描述當地如畫的風景，或者旅行中的趣聞逸事）。與此相反，我希望評論所有旅行的共同特點，並且向讀者講述，我在出國旅行和國外學術活動中亮相時，為自己制訂的規定——其中還包括在國外發表文章或專著時，自己需要遵守的規定（發表文章往往與出國訪學，密不可分）。

自從1963年至1964年間，我首次有機會前往西方訪學後，上級很少再拒絕我的出國申請。西方國家的讀者和年輕人，也許不會意識到在那個年代裏，僅僅擁有有效護照，並不一定能保證匈牙利人順利出國。每次出國時，都需要拿到「窗口」，即允許出境的公章。而要想獲得這些「窗口」，必須提出具體的申請，並且拿到本單位上級、人事部門和黨委書記的簽字，才能通過。即使簽字者非常了解你的情況，不會故意刁難，但你也必須低聲下氣，才能完成這個過程。雖然我每次都可以拿到上級的批准，但是我仍然擔心某一天，自己可能被他們拒絕。*

社會主義體系的轉變，終止了這種讓人感覺卑躬屈膝的程序，而且所有人，最後都有權利出入國境。此時社會的變革，才真正地讓人們感到身心解放。

在制度變遷前，匈牙利人經上級批准出國後，必須給上級寫份報告，彙報自己的情況。起初我到西方國家，參加了學術活動後，都會兢兢業業地完成這些報告，雖然這些報告，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作品。但是我在匈牙利的學術研究領域聲名鵲起後，便不再寫這種報告。我的上級曾經提醒我一兩次，但後來也對我聽之任

* 1970年，我應邀前往保加利亞參加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組織的一個國際會議。我至今還記得當時我沒有及時拿到上級批准我出境的文件時，心中惴惴不安，而且萬分沮喪的感覺。我是在最後一刻才拿到護照上的公章，當時距離我出發的時間只有幾小時而已。

之。我拒絕寫報告，並不是為了防止情報機關從中收集情報，而是因為我不願意做這些讓我感覺受到侮辱的瑣事。

只有當主辦一方承擔所有費用時，我才會接受國外學術活動的邀請。*當時無論我在哪個機構任職，它們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受國家資助的，不過促使我遵守這個原則的動力，並不是因為我希望履行一個公民的職責，為國家節省開支。我認為研究機構裏，用於學者出國訪學的專項資金，非常有限，所以這必然導致學者們，為了得到這個特權而明爭暗鬥。許多人都希望爭取到出國的機會，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下定決心，絕不能被扯進這趟渾水裏。

我盡量避免不表現出兩面性，即在匈牙利(以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表現出一副面孔，而在西方世界裏，則表現出另外一副面孔。遵守這個原則並不容易，因為比起匈牙利那種到處充斥著威脅、告發、告密者、審查和指控，而令人感到壓抑的氛圍，西方國家輕鬆的環境，更能激勵我暢所欲言。我完全是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才制訂出這條原則。當我在西方國家發表演講時，我知道匈牙利的秘密警察，很有可能就坐在下面的聽眾席上(這種猜測，後來得到了證實。最近我查閱當年情報機關的保密文件時，便發現一份密探彙報我在1985年在紐約發表演講的報告。我將會在下一章裏，詳細講述這件事情)。但是除了自我保護的原因以外，前後不一致的表現，也會讓我的良心感到不安。無論我在發表演講，還是在寫作中字斟句酌時，冷靜的自我保護和表現出兩面性之間的界限，都在不斷變得模糊。如果我已經適應了在匈牙利使用一種說話和寫作的方式，而在國外使用另外一種方式，那麼這種做法，最終會讓我

* 這也有例外，如我不是以私人身份出國，而是被匈牙利官方機構派遣出國時，則不在此列。如蘇聯科學院和匈牙利科學院達成協議：雙方將派自己的代表訪問對方國家，而且資助所有費用。有些希望見到我本人的蘇聯同行，不能直接向我發出邀請，而是必須先說服蘇聯科學院，由他們建議匈牙利科學院派遣我訪問蘇聯。

走向何方？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我在私人場合（特別是與密友們在一起時）裏，通常會盡量放鬆自己的身心，而在公眾場合，則完全相反。不過，我不允許自己在東歐公開發表的演講或文章中傳達的信息，與在西歐或美國表達的觀點有任何出入。

為了避免自己表現出兩面性，我還刻意把所有學術作品，都用匈牙利語和英語（或其它西方語言）兩個對應的版本出版。我沒有一部主要作品，是專門針對鐵幕下的東歐國家或西方世界。

我在上文客觀，而且不加修飾地，簡要總結了自己的決定。這是1964年至1989年間，最困擾我的問題之一。社會制度的變遷，終於搬走了一直壓在我心頭的一塊巨石。

未能得逞的「莫須有罪名」

本章將講述另外一個關於情報機關活動的故事。我在寫作這一段時，手頭便有一封耶魯大學的美國經濟學教授約翰·邁克爾·蒙蒂亞斯，在1964年10月14日給我寫的信件的複印件。當時他計劃來匈牙利訪學，請求我對他的工作提出建議，他還提到他已經開始學習匈牙利語。

這封信背後還有一個小故事。起初我是從蒙蒂亞斯的學術論文中，了解到他的研究課題，後來1963年，他到布達佩斯參加一個數理經濟學的會議時，我們見了面。在這次會議上，蒙蒂亞斯引起了所有與會者的關注，因為他主動提出承擔翻譯工作，把列昂尼德·康托洛維奇的俄語演講，翻譯成英語。隨後，他還為康托洛維奇的演講引發的學術辯論，擔任了翻譯。顯然他不僅是個傑出的經濟學家，而且更具有過人的語言天賦。1965年，我們在威尼斯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再次碰面。應邀參加此次會議的，都是專門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東西方經濟學家。

讓我們回到蒙蒂亞斯給我寫的這封信上。我不是在自己收藏的信件裏找到這封信，而是在情報機關的檔案室裏找到。[10]一位美國

教授寫給我的私人信件，寄到布達佩斯被拆開複印後，重新封好，再通過匈牙利郵局，投遞到我的手中。所有人都懷疑這種事情是否經常發生，但是當我拿到確鑿的第一手證據時，心中依然湧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當時我知道的只是「蒙蒂亞斯案」的冰山一角，如今我可以根據警局的記錄，重新還原當時的整個故事。

蒙蒂亞斯是研究蘇聯問題的美國專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大多數同事，只掌握蘇聯地區使用的一種語言，而他卻可以熟練地運用該地區的多種語言，至於達到閱讀水平的語言種類就更多了。儘管在那個年代裏，大多數蘇聯政策研究專家，都具備了經濟學家的必要素養，而且掌握了豐富的蘇聯或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但是他們並不擅長用數學語言形式，表達現代經濟學理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蒙蒂亞斯屬於經濟學研究的新生代。他可以熟練地運用這種現代化工具（他曾經與本書中多次提到的著名數理經濟學家庫普曼斯，共同執筆發表文章）。[11]

我非常樂於幫助蒙蒂亞斯準備他的布達佩斯之行。我對他的論文選題提出建議，並且主動把他介紹給匈牙利的學術同行們。我們多次通信溝通，蒙蒂亞斯在提交的正式申請中，描述了自己的科研項目，以及在匈牙利的社會關係，其中就提到我的名字。[12]

從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在按照規章制度和國際科研會議的慣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蒙蒂亞斯和他的匈牙利同行，正在積極地籌備這次學術訪問，但是在幕後，秘密警察也在繼續緊鑼密鼓地開展情報工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機關，最早發出了警告的信號：我們有理由相信蒙蒂亞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探。*當時負責反間

---

* 最近公之與眾的文件顯示各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報機關，曾經進行了極其密切的合作。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蒙蒂亞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住所，並在他的上衣兜裏，找到一張寫有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的紙條。他們將這個發現報告給匈牙利國家安全局（IH 1656.2/2-2358，第3頁，日期：1964年5月8日；IH 34-4-797/1965，第4頁，日期：1965年4月23日）。

諜活動的官員，一定認為他們會抓到一條大魚！

隨著蒙蒂亞斯來訪的日期一天天臨近，越來越多人被牽扯到這個案件中。他們逐一調查了出現在蒙蒂亞斯申請表上的匈牙利學者姓名，然後搜集他們的「材料」。現在公開的材料還涉及其他人，我努力從這些檔案中，找到了反映當時情報機關對我採取行動的文件。

我把1956年至1959年間，散落在各個部門中關於我的文件，以及1963年至1964年間，關於我的英倫之行的文件整理出來。當時秘密警察的Z·Z大隊長，寫了一份總結報告，逐一評估了這些對我不利的材料。[13]

我在研究情報機關的書面材料時，發現他們從1963年開始，便監聽我的電話，並留下了文字記錄。他們把所有與我曾有聯繫的人，整理成一份清單，不過，並沒有從中找到任何感興趣的東西。這份名單中，包括我在布達佩斯的朋友、親戚和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同事。其中還出現了埃利·德文斯，和加林·庫普曼斯等外國經濟學家的名字。我在這裏引用了一段他們監聽時抄下來的電話內容：「Helga? Olga？把錢給科爾奈。」警察監聽抄寫時，在這句話使用了一個匈牙利俚語，而匈牙利男人享受了情婦的服務後，給她付錢時，才會用到這個俚語。這實在太可疑了，一個女人給科爾奈付錢……事實上，她是一個我認識了很久的叫Elga的朋友。暑假時，我曾經借給她一筆錢，當時我們正在討論她怎麼還我的錢。許多人都會覺得，在這個黑色幽默式的故事裏，政治警察們真是蠢得無以復加。[14]

Z·Z隊長的上級在他的報告上手寫了一段評語，建議他不要吸納我作「臥底」。[15]我向專家諮詢這個詞語的具體含意，他們告訴我，情報機關必須找到一個用他們的行話來說，可靠聽話，而且能夠獲得被監視者信任的密探。一旦找到這種密探，他便會被派去做「臥底」，為情報機關搜集有用的情報。

讓我們回到當時我們這些普通人了解到的情況。負責文化關係的匈牙利政府部門，接收了蒙蒂亞斯的申請表，並且發給他護照，因此蒙蒂亞斯得以如約而至。他見到很多匈牙利經濟學家，並且與

他們談論了許多學術問題。他還開始學習匈牙利語，我推薦朋友考蒂·豪納克做他的匈牙利語老師，考蒂欣然同意了這個請求。其後蒙蒂亞斯在語言方面突飛猛進。他像其他外國訪問學者一樣，過著正常的生活：閑暇時和妻子去聽聽歌劇，有時和匈牙利同事一起吃飯。有時我們這些本地人，也會宴請他們一起喝酒或吃飯。

情報機關的文件，清楚顯示蒙蒂亞斯一直處於情報機關的監視之中。他們監聽他的電話，而且跟蹤他。我閱讀了監視者的報告：這些厚厚的報告中，根本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東西。我不得不重復我剛才曾說的話：如果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些調查背後潛藏的罪惡勢力有多可怕，那麼他們一定會肆意嘲笑這份無聊的報告。我沒有閱讀太多與間諜有關的文學作品，也許他們這個行當裏，存在一些規則或傳統，即不能用真名來指代被監視者，即使在內部報告中，也是如此。譬如，我住在Pusztaszeri（普斯陶塞里街），因此情報機關在關於我的報告中，不會指名道姓地說「科爾奈和洛基（我的妻子）」，而是將我們稱作「Puszta先生和夫人」。豪納克一家曾經住在Garas（高勞什街），因此在情報機關筆下成為「Garas先生和夫人」。[16]顯然情報機關在它的絕密內部報告中，也不會提到蒙蒂亞斯的真名，而是把他稱作「Zimelio」（在大街上跟蹤他的人，向上級彙報情況時，把他稱作「master」，以便有所區別）。

這項計劃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情報機關指控蒙蒂亞斯濫用自己的訪問學者身份，搜集關於匈牙利經濟和經互會（即經濟互助委員會）的秘密情報。與蒙蒂亞斯曾經接觸的匈牙利經濟學家，全部因此受到牽連，並接受了政治調查。

我也不例外。最近我反復閱讀了這些報告，發現沒有一名證人，對蒙蒂亞斯提出指控，也沒有一名證人，證實蒙蒂亞斯，確實曾經收集秘密情報。[17]

不久以後，蒙蒂亞斯便被驅逐出境（事實上，政府立案後，立刻便把他驅逐出境）。政府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解釋了驅逐蒙蒂亞斯的原因。[18]他們指控他收集秘密情報，並且從事間諜活動，但是卻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詞或其它證據來支持這些指控。他們甚至不打

算舉辦一個「壯觀的」間諜案公審。

這件事件有很多方面都值得關注。它清楚地闡明了我在這本書中反復討論（並且將繼續深入討論）的一個問題：學術界並不是一個享有特權，或者受到保護的領域。極權政府的觸角，早已深入到它的內部，監視它、並恐嚇它。

雖然卡達爾時代，延續了拉科西的極權統治，但是社會體系中，也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革。如果這件事件，發生在過去AVH（國家安全局）橫行霸道的年代裏，那麼涉及到的所有人（即美國教授和他的匈牙利朋友），都會被逮捕，並且受到嚴刑拷打，直到他們伏法認罪，並且在法庭上承認自己一直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事間諜工作，才肯罷休。雖然在1965年，情報機關的審訊，仍然讓匈牙利證人們感到壓抑和緊張不安，但是我們畢竟有機會反駁那些不實的指控。*

「蒙蒂亞斯案」發生時，匈牙利政壇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政治趨勢。「溫和派」（或者說「改革派」）主張與西方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特別是在文化和科學方面；而「強硬派」（或者說「反改革派」）則竭力抓住每一個機會，破壞東西方關係。對於後者而言，發現一個美國間諜，恰好可以用來為他們的觀點造勢。不過，強硬派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這次事件，還有兩個後續的故事值得記錄下來。

其一是雖然發生了這件事件，但是我與約翰·邁克爾·蒙蒂亞斯教授之間的關係，仍然繼續發展。1970年我在耶魯大學訪學了六個月，邁克爾和我在那裏再次見面，並且開懷暢談。我們沒有談及他

---

* 我在前幾章提過自1956年後，我決意成為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一員。我清醒地意識到這種行為中可能蘊藏著巨大的風險。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在那段歲月裏，僅僅「擁有西方關係」這一條，就足以引起情報機關的懷疑，而且合法的學術交流，也被子虛烏有的刑事訴訟定性為「間諜活動」。這些惡夢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直至共產主義體系土崩瓦解，才算真正擺脫了這些夢魘。當然現在**回顧往事**，我們知道自此以後斯大林主義沒有再復辟，但是當時沒有人能準確地預見到復辟的企圖一定會失敗。

被驅逐出匈牙利的事情，他認為最好不要提起這件事，因為他很清楚我還要返回匈牙利。後來我每次到耶魯大學時，都會與他見面，我甚至在他領導的研究所裏發表了演講。1976年，他出版了一本關於比較體系理論的著作，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評論，高度讚揚它的學術價值[19]。我這麼做，不僅是因為我的確認為它很精彩，而且亦希望藉此聲明：我認為蒙蒂亞斯是一名純粹的學者。蒙蒂亞斯是創辦《比較經濟學》雜誌的編輯之一，這本雜誌後來成為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方面的權威性雜誌。它經常刊登東方集團國家中經濟學家的文章，我自己便在那裏發表了多篇文章。

蒙蒂亞斯原本計劃在七十年代時，再次訪問匈牙利，但是政府當局卻不允許他入境。[20]直至1989年，舊體制解體前夕，匈牙利政府才從「不受歡迎者」的名單中，把他的名字刪去。[21]

不幸的是，他在匈牙利的驚險遭遇，大大削弱了他對於研究蘇聯問題的熱情。這對於學術界來說，的確是巨大的損失。他逐漸轉向藝術史的研究工作，他對十七世紀荷蘭油畫的研究成果，被藝術歷史學家們公認為該領域中的經典之作。[22]

我不得不以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來結束這個故事：邁克剛剛於2005年與世長辭。

另一個後續的故事，則與我在布達佩斯的親身經歷有關。1998年，我第一次請求查看關於「蒙蒂亞斯案」的文件。雖然政府批准了我的申請，但是對我提出很多限制要求。當時我不能複印這些文件，而且我閱讀這些文件時，必須有一位檔案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場。也許他的上級讓他監視我的舉動，以免我偷偷帶走某些文件。他並不令人討厭，我看完材料後，他便開始和我聊天，常常說些「哦，是的。我們從來沒有成功地抓到那個人」之類的話。我無法援引他的原話，因為我沒有錄下當時的談話內容，以便一字不差地複述。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完全把自己等同於負責這件案子的反間諜人員。讓人感到諷刺的是，他使用了第一人稱複數形式，而且語調中帶著一些遺憾。過去那個可怕的時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延續了下來。

10 與主流經濟學思想唱反調：1967–1970年

《反均衡論》

當我把一半精力投入到數理計劃的計算工作中時，剩下的一半精力則被新的研究項目完全佔據：批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特別是一般均衡理論。我在《反均衡論》中，描述了這項研究的後果。

《反均衡論》的前身

1967年，我完成了篇幅較短的《反均衡論》手稿[1]，它的副標題為「關於經濟體制理論和研究者任務的短論」。*我還把這篇《短論》(後文將用《短論》代表這本書)，翻譯成英語。[2]

---

* 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時，已經養成一種「避世」的習慣，使我能全神貫注地投入到某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中。我不會在家裏或研究所的辦公室等舒服的地方工作，而是收拾行囊躲到度假勝地或旅館等家人、同事或其他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埋頭苦幹。我經常專注地工作一周甚至兩周，直到手腕因為不停敲擊打字機(後來是電腦鍵盤)而酸痛無比時，才被迫放棄工作。在此期間，除了服務生或打掃房間的女工以外，我幾乎不和任何人交談。這種習慣幾乎已經成為一種癖好：如果我在寫作某些重要的文章或專著的時候，工作環境沒有滿足這些條件，那麼我就會感覺欠缺了什麼東西。我最早在西歐佛克寫出《反均衡論》的初稿，之後在維斯葛拉德反復修改文稿，最後在我最喜歡的地方——匈牙利科學院在馬特勞哈扎的度假村完成了它的終稿。

當時肯尼思·J·阿羅邀請我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院裏訪學幾個月。1972年，阿羅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被學術界，公認為數理經濟理論方面的領軍人物。我把這篇《短論》帶同在身邊，一邊到斯坦福大學裏訪學，一邊繼續豐富它的內容。我感到這種處境多少有些尷尬，因為這本書批判的，恰巧是被阿羅和法裔美國經濟學家德布魯賦於現代形式的理論。我無法鼓足勇氣告訴阿羅，我的抽屜裏放著怎樣的一部手稿。後來阿羅從幾位看過手稿的同事那裏聽說了它。在他的請求下，我給他看了這份手稿。阿羅仔仔細細地閱讀了全文(阿羅能夠以讓人瞠目結舌的速度，迅速抓住學術作品的主要觀點，並且提出學術見解。他的語速很快，因此旁人很難聽懂他的話。此外，阿羅的觀點跳躍性非常強，普通人根本無法跟得上他的步伐)。在當時的學術環境裏，所有人都毫不猶豫地接受他的理論，我的觀點也沒有冒犯他，他還熱情地歡迎其他人挑戰他的學術作品。我們多次從頭到尾仔細地討論了手稿的內容。他非常欣賞我在準確理解阿羅–德布魯理論的基礎上所進行批判的方法，即我首先客觀詳細地闡述了阿羅–德布魯理論的內容，然後提出批判意見。他對文章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他曾經微笑地評論說：「它會在一般均衡理論的墓地上，建起一座宏偉的石碑。」

我回到布達佩斯後，最終完成了《短論》的修訂工作。不幸的是，它的篇幅已經大幅「膨脹」。當它的匈牙利語版本最終定稿，並且被翻譯成英語時，加林·庫普斯曼又邀請我訪問耶魯的一所研究機構——考爾斯委員會。在美國的數理經濟學界，這是一所享有盛譽的機構。譬如，德布魯就是在這裏完成了他的經典著作《價值理論》(這本書正是《反均衡論》試圖「肢解」的目標)。作為現代數理均衡理論的大師之一，庫普斯曼本人也開明地接受了我的批判。他邀請我在他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發言，並且為修訂後內容更加豐富的

當我回想起那些地方和那裏友善的服務人員時，心中總是充滿感激，因為他們為我全心地投入工作，提供了一個寧靜的樂園。

《反均衡論》，提出了改進意見。*他和另一位傑出的考爾斯委員會資深成員——詹姆斯·托賓，委托他們的兩位學生，仔細校對了《反均衡論》的英文版。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兩位偉大經濟學家——阿羅和庫普斯曼——的慷慨風度，和他們在科學研究方面表現出來的不凡氣度。他們允許我隨意使用各種設施和資源，希望以此幫助我提出最有效和最精確的觀點，來批判他們建立的學說。†

1971年，我的書以匈牙利語和英語兩個版本同時面世。後來，它還被翻譯成其它多種語言。

是什麼激發我寫出《反均衡論》?

自從我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以指令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且潛心研究現代經濟學，我便一直在思考許多根本性的問題。

哪種價格體系能夠更有效地指導決策者？我們能否放手，由供求關係自行確定價格？是不是根本不存在國家干涉價格的必要，或者說，至少不要在某些關鍵時刻，干涉價格？

我們能否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內部**，建立起市場經濟？市場經

---

* 我在翻閱為了寫作《反均衡論》收集的文件時，發現一份庫普斯曼親手為我打印的二十一頁長的備忘錄，這不禁讓我動容。這份備忘錄上，每頁都寫滿了他觀察到的結果。像他這樣偉大而且工作繁忙的學者，很少會花費這麼多精力幫助一位年輕學者開展研究工作。

† 另外一個可以表現庫普斯曼偉大之處的事例，與諾貝爾獎有關。庫普斯曼憑藉著他建立的線性規劃與蘇聯數理經濟學家列昂尼德·康托洛維奇，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庫普斯曼認為喬治·旦茲格也應該與他們分享這個獎項，因為正是旦茲格設計的計算法則，使得線性規劃得以投入實際應用。他感到自己應該接受諾貝爾獎的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因此他將自己領到的一半獎金，與三分之一的獎金的差額，捐贈給了一個國際研究機構。

濟是否能與共產主義體系的國家所有制，和政治結構相匹配？或者說，它的政治範疇與經濟範疇之間的聯繫，過於緊密，而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

當這兩種「偉大」的體系進行比較時，資本主義的效率為什麼較社會主義更勝一籌？這是不是因為它能夠更有效地調整價格，從而提供激勵措施，並創造市場均衡和高效的投入產出組合？我們是否可以找出其它更重要的理由，來解釋資本主義輝煌的經濟成就？

當時我所掌握的知識，已經遠遠超越我從書籍中學得的理論知識。我在倫敦住了幾個月，而且訪問了其它許多西方城市。「市場供應」這個詞語，總能讓我想到倫敦牛津街上的塞爾弗里齊百貨公司，或者蘇黎世班霍夫大街上的商店。到底是什麼力量，在激勵賣家維持著如此豐富的存貨？每次我在這些地方旅行時，總會看到新產品（例如我上次剛剛看到的便攜式計算器，這次就看到第一台個人計算機）。什麼力量在激勵生產商不斷開發出新產品？

人們對理論信念的執著，就像墜入愛河一般。我曾經盲目、而且狂熱地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當放棄它時，它給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傷。其後我對新古典主義理論，產生了一絲好感。這就像「情人眼裏出西施」一樣，只要愛情在延續，人們通常會寬容地對愛人的錯誤，視而不見……但是這種好感，遠遠不如當初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那樣強烈，而且投入。我很快便睜開了雙眼，而且發現新古典主義理論，無法為折磨我的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我為此感到非常苦惱，後來甚至是狂怒——更糟糕的是，我感到它提供的答案，是完全錯誤的。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樣，我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原因之一，是它沒有把理論與現實情況進行比較。現在新古典主義理論，也讓我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感覺，雖然比起馬克思主義，它在這方面的問題，表現得沒有那麼尖銳，或者那麼令人厭惡。新古典主義的研究者，提出了很多不完整的理論，並且堅持不懈地努力用實踐去驗證它。作為分析經濟計量的科學，計量經濟學促進了許多高級計量方法的發展，而且西方大學都開設了課程，專門教授這些研究技巧。

我是在研究新古典主義的整體理論，而不是它的局部理論時，發現它也無法通過實踐的檢驗。在它全面描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系的理論中，尤其缺少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可比較性。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我把所謂的一般均衡理論，放了在批判性研究的主要目標上。

被經濟學家稱作「新古典主義」的理論，由許多局部理論組成。任何一本西方流行的教科書，都全面概括了「新古典主義理論」包含的理論分支、它的主要觀點、它力圖回答的問題，以及為了證實這些問題的答案而使用的方法。當時新古典主義理論，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理論。*它的理論核心，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法國裔瑞士經濟學家里昂·瓦爾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論。這個理論模型，把整個世界簡化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而且這個體系，還包括希望最大程度發揮金錢功效的家庭。一般均衡理論表明確實存在可以平衡公司和家庭供求關係的價格，因此只要滿足某些條件，便可以出現高效率的均衡狀態。均衡、和諧在既定條件下有可能實現的最佳狀態——這就是這個理論為社會描述的形象。

在眾多新古典主義模型中，瓦爾拉斯模型試圖獨立地涵蓋全部經濟活動——但它不是像宏觀經濟學那樣，把這些活動壓縮後，用精簡的方式描繪它們，而是將其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經濟參與者會與參與者之間的經濟流動，同時出現。這個模型把市場經濟，描述成一個體系。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新古典主義理論解讀經濟現象的答案讓我感到困擾，那麼我批判它的矛頭，必然會指向一般均衡理論。

---

* 人們一直沒有就「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概念及什麼是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理論」達成一致意見。由於人們對此的解釋，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變化，使得這個問題日益複雜，所以對許多人來說，現在這些術語包含的內容與幾十年前的情況，大相徑庭，而闡明這些差異，則需要全面客觀地研究經濟學思想史。在寫這本自傳時，我認為自己完全可以置身於這場論戰之外，而只是借用這些術語，讓人們對這個理論範疇裏包含的流派，有一個大致的印象。

瓦爾拉斯本人使用數學形式，表達了這個理論，後來阿羅、德布魯、庫普曼斯、萊昂內爾·麥肯奇和其他經濟學家，創造出更加完善的數學方法，從而幫助他證明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推理非常嚴謹，我甚至可以說它具備了簡潔和清晰之美。它迷惑了所有全面了解它的人，我也不例外。在我清醒過來，並提出自己的批判意見之前，它的諸多優點，都深深地吸引著我。

我反對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原因，是在這個理論的鼓動下興起的各種研究以及主流經濟學的全面科學計劃，都沒有回答這個重大的問題，即它們沒有幫助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沒有指明如何改善整個世界。我已經在本書的序和前言中，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也許使用的措辭，略有不同）。

某些發人深省的相似之處

我們可以把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與第八章講述的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進行比較。它們描繪了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體系：前者描繪了完美的分散經濟體系，而後者則描繪了完美的集權經濟體系。前者的價格承載著彼此間相互獨立，但處於相同等級的分散個體間的信息，後者的價格則說明了中央為所有隸屬於它，並且嚴格遵守中央命令的個體制訂的定量目標。

現在我們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推論：只要遵循某些規則，這兩種體系都可以達到均衡狀態。的確，在某些既定的最優標準和其它條件下，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都可以實現最優狀態。我們可以用數學方法，闡述並且證明這個觀點。

這個相似之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說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分散經濟體系中，還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權經濟體系中，對我們來說都無關緊要？難道說這種讓人困惑的相似之處所產生的原因，是這兩個模型都忽略了真實資本主義和真實社會主義的現行經濟體系（即現行市場經濟和現行指令經濟）的根本要素，所以無法解釋這兩種制度之間的差別？

我在前文指出這兩種模型中的某些假定，忽略了這些基本的現實要素。儘管我們在第八章講述數理計劃的研究過程時，已經提到這些內容，但是現在請允許我，簡明扼要地重述它的要點。

這兩種概括性模型，都假定決策者掌握準確的信息。但事實上，這兩個世界裏的信息，都被完全扭曲了，無論這是自然產生的，還是人為的結果。不過它們的相似之處，至到這裏也就結束了，繼而發生的，是兩者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建立在自由企業和私有制上，信息和激勵之間存在著一定聯繫。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掌握的知識或者從別人那裏購買的知識中獲利，而後者必須確保所提供的信息，完全真實準確。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不管次級個體願不願意，他們都必須把分散的信息，全部提供給中央，就像集體農場把糧食上交給政府一樣。那些擁有信息的人(即最早發現或收集信息的人)，不能以買賣信息為業，也無法購買更多信息，或者把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交易，所有信息都必須彙報給中央。分散的信息與分散的激勵結合起來，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而這種組合，恰好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欠缺的。

瓦爾拉斯模型和雙層計劃模型的創造者和支持者，都假定全部流程可以順利地進行，不會發生任何摩擦——即表現出完美的適應性。事實上，這兩個體系在適應的過程中，都會發出吱吱嘎嘎的摩擦聲，只不過嚴重的程度，有所區別而已。在多種原因的作用下，社會主義制度較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僵硬苛刻。分散經濟體系可以在最底層作出決定。在集權經濟體系中，人們發現任何阻礙經濟發展的跡象時，都要逐級上報給有能力作出決定的決策層。決策層找出解決方法後，再逐級向下傳達到執行層，由它們來消除經濟體系中的摩擦，期間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此外，社會主義制度中，還存在另外一個因素：對經濟體系造成過大壓力的計劃目標，妨礙了各級經濟參與者儲備可用物資，儘管適當地儲備物資，可以保證參與者面對需求時，迅速作出調整。

這兩個模型的失敗原因，還與另外一個問題息息相關。如果我們使用新古典主義理論對「理性」的定義，那麼這兩個模型裏，都

假定決策者，自始至終堅持了極其理性的決策方式。他們的偏好，始終保持不變，而且他們在現有的各種選擇中，作出決定後，往往秉承一貫性的原則。我察覺到這個假設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請允許我簡單講解其中的一個。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假定制訂中央計劃的機構，嚴格遵循了理性要求，而且在決策過程中，保持完美的延續性。我曾經無數次拜訪布達佩斯的中央計劃辦公室，而且經常聽到中央向制訂計劃的工作人員，下達了許多指示。這些上級指示理性嗎？它們具有延續性嗎？完全沒有，它們代表了嚴重脫離現實的願望。計劃機構承受著來自各種政治勢力，以及貿易遊說團體和各個地區遊說團體的壓力。權力關係的變化，也會引發經濟發展優先權的變化。當權力關係迅速發生轉變時，便會顛覆之前所有的政策偏好（我會在後文談到個人決策的理性和延續性）。

這兩個一般性體系模型，在靜止狀態下，也表現出相似性，但是它們在動態狀態下，則表現出一個本質區別。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競爭，促使生產商不斷進行技術改革。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主義缺乏競爭的自發性動力：在中央計劃者的官僚體制下，人們斷斷續續，而且不情願地在官僚機構的命令下，研發新產品。*

我們能夠指望普適理論什麼，不能指望什麼

我在上文解釋了自己逐漸對這兩種模型反感的原因。雖然兩者都有讓我不滿意的地方，但是我對它們的看法，卻不盡相同。讓我們首先來講解雙層計劃模型，我不想更加詳細地在理論層面上解釋

* 這兩個模型還抽象地描述了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的另外一個重要差別。我在批判一般均衡理論的研究中，堅決抵制了共產主義體系的壓迫性政治結構和官方意識形態，但是當時我還沒有掌握民主與經濟分權以及獨裁與經濟集權之間的複雜聯繫，所以我的文章和思想體系中，都缺乏這方面的論證過程。

它的內容。第八章和上述幾節中，已經詳細講解了這方面的內容。雙層計劃模型可以被看作成一種「完美的中央計劃」，如果完美計劃模型是可行的（至少在抽象理論的層面上），那麼膚淺的或有偏見的讀者，也許會認為它在為社會主義體系歌功頌德，雖然這種情況與我的意願相違背。

這種想法，沒有阻止我繼續批判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

現在我發現在科學哲學的範疇內，我對一般均衡理論的批判，在理論起點中便存在著嚴重的錯誤。*最根本的問題，應該是闡明這個抽象的理論模型，能夠為我們解決什麼問題。

人們可以因為模型中的各種錯誤，而指責它的創造者，但是絕不能指責他們，從現實情況中，抽象概括出概念的方法，因為這正是建立模型的本質之所在。批判一個模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看，這個模型以這個假定為前提，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假定根本不成立。」

一個理論模型可以用於完成多種任務。讓我們關切地談談其中兩個相互關聯的任務。

理論模型幫助人們澄清理論成立的具體條件。建立模型的學者，在創建學術理論的過程中，首先從可預見的結論入手，而不是它的前提，然後以「結論——前提」的逆向次序，展開研究工作。為了得出這個結論，需要事先假設哪些條件？建模者希望盡可能節儉地建立起模型，所以要證明這個觀點，需要哪些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一旦研究者確定這條論證過程的主線，它就可以成為反駁，甚至至少懷疑其它觀點的起點。

例如，阿羅–德布魯理論稱，會達到均衡及（根據某些準則的）最優狀態，當且僅當流入該經濟的信息準確無損。這並不意味著阿

* 1973年，弗蘭克·哈恩用一篇長篇書評，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反均衡論》中的這個錯誤。這篇評論借用了莎士比亞作品的題目《我們不滿的冬天》——以此表達我與他的不滿。

羅或德布魯不了解這些信息中隱藏著大量不確定及不準確的內容。[*] 正確解讀了這個模型的人，會意識到這個論證中隱含著一個警告：如果信息不確定或被扭曲，那麼市場機制必然不能把經濟帶到最優狀態。只有在信息準確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市場最優化（我們在這裏，使用了語法上虛擬語氣的條件式）。

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法，逐一檢驗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的每個假設，那麼這個模型，最終會變成一個長長的警告清單，而不是對市場的辯護。如果這些抽象的觀點不成立，那麼這個理論的最終結論，也將被證明是無效的。換句話說，市場將不再是理想的機制。[†]

與這個特點緊密相連的，是「純粹」的、概括性非常強，以及非常抽象的模型的另外一個功能：人們可以把它作為比較的度量或標準。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運行的市場經濟，與瓦爾拉斯的理想市場經濟，相去甚遠，但是後者可以有效地測量現實情況，距離理想狀態究竟**有多遠**：例如，人們可以據此準確地衡量出實際信息，與瓦爾拉斯模型要求的絕對精確的信息，相比究竟差了多少。同樣，人們可以衡量不斷出現摩擦的現實情況，與瓦爾拉斯模型中理想的無磨擦狀態之間的差別。我必須補充的是，我在《短缺經濟學》中充分運用瓦爾拉斯模型，進行這種比較。

正如我在第八章指出的，科爾奈–利普塔克模型，也可以用來進行這種比較工作。我們可以把「完美計劃」的純粹模型，與那些完全不純粹、與理想狀態相去甚遠的現實計劃，進行比對。

---

[*] 阿羅是最早發表文章集中討論信息不確定造成的影響及市場失靈等問題的學者之一。例如他開創性地提出一個理論，證明了在**純粹**的市場機制下，醫療保健體系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

[†] 我們在第八章解釋科爾奈-利普塔克雙層計劃模型時，簡要地使用這種論證方法，檢驗了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不過當時我沒有指出這個方法涉及到科學哲學中某些異常困難的問題。

我們遇到的棘手問題，不是純粹的模型展示出一個理想化而且極端的世界，而是許多人錯誤地解讀了它，並由此得出虛假的結論。

許多讀者閱讀理論著作時，習慣跳越作者講述自己思路的章節，而且很容易忘掉在模型的後面，支撐它的是各種嚴格的假設，所以往往會曲解在**特定模型框架內**才有效的命題：例如，有些人認為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在為那些放任自流，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國家干涉的市場喝彩。事實上，只要他們全面認真地研讀這個模型的理論學說，便會發現根本不能從這個理論，推導出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嚴厲批判這種誤解，甚至曲解理論的行為。

我們不能以脫離現實為理由，責備一個抽象的理論，但是我們應該警告那些把這個理論融入自身學術思想的人：這個理論中忽略了一些東西，而且它脫離了現實。人們應該對實踐型經濟學家，進行專業培訓，使他們時刻牢記，從純理論中推導實用性結論，並且談論理論的「經濟政策意義」時，必須慎之又慎。每個獨立的假設，都必須再三斟酌。雖然建立理論時，必須從現實情況中提取出抽象的觀點，但是這種做法，可能讓利用理論採取切實行動的人，舉步維艱。因為這個時候，已經無法再忽視現實條件的影響。

我在本章開篇處，就指出了《反均衡論》在科學理論中的本質性錯誤。我的本意不是攻擊理論的純粹性（即理論中所有假設的本質：抽象性和空想性），而是新古典學派，我批判的真正目標，是**主流的教學方法和研究計劃**。我們不能強迫純理論的創造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詳細闡述這些需要警告讀者注意的信息，但是我認為 所有解讀這個理論，並且把它傳授給學生的人，都應該為沒有補充解釋這些警告的內容而受到責備。他們是否正確地解釋了這個理論的內涵？他們為學生解釋了哪些內容？哪些方法是可以正確解讀這個理論，而他們沒有向學生展示？在理論家撰文描述這個理論，以及老師講解這個理論的過程中，他們集體性地忽略了哪些應該向讀者和學生提出的警告呢？如果《反均衡論》當初集中地批判了這些問題，那麼它應該會取得更加顯著的效

果。*雖然《反均衡論》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批判觀點，並且發人深省，但是由於貫穿全書的科學理論的缺陷，因此大大削弱了它的說服力。

理性的決策者

現在讓我回到《反均衡論》的一些主要觀點上。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它們有很強的說服力。

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不是唯一對決策者的行為理性提出假設的學說。整個新古典主義流派，在思考方式上，都鮮明地體現出這個特點。傳統經濟學家解釋「理性」的具體方法，顯然有別於其它專業及日常用語對「理性」的解釋。

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符合兩方面的要求：無自相矛盾及前後一致性。†

人們可以把它作為標準，來確定在現實生活中，決策者的行為

---

* 某些閱讀匈牙利版《反均衡論》的讀者認為，比起三十五年前我創作這本書時的時代背景，我對於主流教學和研究的批判觀點，更適用於現在的情況（如今與「理性預期」有關的理論，已經沒有太多影響力）。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由於《反均衡論》預先指明了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所以後來才得到讀者的認同。

† 請讓我來簡要地總結這個觀點，以便於不熟悉這個課題的讀者理解它的內容。如果決策者始終堅持自己的政策偏好，那麼我們可以認為他們是理性的。他們喜歡選項A更勝於選項B，反之亦然，或者他們對兩個選項都不作選擇。但是如果他們現在選擇A，那麼他們就不會選擇B作為備選選項。絕大多數新古典主義流派的學術著作，都假設決策者有「效用函數」。人們可以將決策者的行為，解讀為最大化或「最優化」這些效用。某些假設認為這兩種形式主義——偏好排序和效用函數最大化——是對等的。阿馬蒂亞·森（1977）巧妙地利用貌似拙劣的模仿手法，嘲弄了這種對等的觀點。他認為「理性傻瓜」也完全適合這個模型對理性決策者描繪的形象。即使他們的想法非常瘋狂，但只要他們堅持這種做法，就可以被稱作「理性」的決策者。

缺少一致性：即他們的哪些決策和哪些決策方向，偏離了理想化的決策情況，以及他們偏離的程度和頻率。令人遺憾的是，《反均衡論》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這種方法的價值。

不幸的是，許多新古典經濟模型，都沒有以微妙的方式應用具有一致性的理性決策者的概念。與此相反，人們假定嚴格的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和最優化，或多或少接近決策者的典型行為。這種觀點的擁護者，宣稱他們掌握了用來解釋人類行為的**普適**性模型。他們可以用它描述任何事物——不僅僅限於經濟決策，而且從離婚問題、家庭規模直到議會投票等，包羅萬象，無所不能。《反均衡論》卻駁斥了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方法。我剛才泛泛地分析了學術界中解讀和講解新古典主義模型時存在的錯誤傾向，而這些分析與最優化理論、效用函數和偏好排序，都有著特別的聯繫。經濟學家已經習慣把這種方法，看作「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模型，並且用它的術語思考。然而，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反均衡論》用了兩章，花了很長篇幅，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但是在這裏，我只想挑出其中的一個主題。這本書探索了復現性決定與非復現性決定，以及可比較性決定與非可比性決定之間的重要區別。

每天我都可以選擇配餐時喝哪種酒，雖然我要根據菜單和自己的偏好，作出具體選擇，但是人們仍然可以從我的消費行為中，觀察到特定的模式，即是我對各種酒的好惡相對具有的長久性。選擇哪種酒是重複出現的決定，而在各方面都是可比的：今天的與昨天的決策問題進行對比。

讓我們把它與另外一個兩難的決策過程，進行對比。1956年至1957年間，匈牙利開放了邊境，人們可以在沒有任何風險的情況下，爬過邊界線，逃出鐵幕下的世界。由於政府曾經關閉過邊界，所以人們都在猜測，它馬上便會再次關閉邊界（事實證明這種假設是正確的）。人們應該留下還是逃走？這是一個不會重複的決策。許多人後來都選擇了「叛逃」，但是「叛逃」的環境不同，面對的風險不同，而且在國外受到的對待也不同。後來我也遇到了「去還是留」的問題，

但它與人們在1956–1957年間所面臨的兩難抉擇，卻沒有任何可比性。

我希望對這個問題，再追加兩點評論。

新古典主義的偏好模型，適用於分析具有重現和可比性的決策問題。例如，它可以幫助人們衡量前後不一致的程度。但是理性選擇模型既不能解釋為不適用於分析非重複性或非可比性決策。

當然，重複出現的小決策對經濟學家來說，非常有用，譬如它們可以幫助經濟學家，根據定期觀察消費者行為得出的結果，估算需求函數，或者生成新的函數，來描述公司在經常性管理決定方面的行為。

但是生活中最重大的決定，通常是獨一無二的非重複性的。無論個人生活，還是人類發展史上，都曾經出現很多轉折點和不可逆轉的事件。對於那些力圖用現有的偏好排序，解釋人們如何作出重大決定的社會科學家來說，這的確是個悲哀。1967年至1970年間，我就這些問題，表述自己的觀點，並且提出這個區別時，我反省了自己的過去。我無法看透其他人的靈魂，也無從了解他們做決定時的心路歷程，我只能看到自己的內心活動。我知道在許多戲劇性的關鍵時刻，我在做決定時，根本沒有什麼預先設定的偏好，例如在1956年之後出現龐大的移民潮，但是我卻決定不移民海外；我決定不參加重組後的共產黨；在革命的重要關頭我作出決定等等。*價值觀（即偏好）與條件（或者選擇的可能性）之間，建立了交互效應。我們無法把「制約」與「偏好」分隔，也無法真正地提出嚴格遵守前後一致性的問題，因為每次人們作出重大決定的環境和面對的重大挑戰，與上次作出決定的環境和挑戰，都截然不同。

現在我仍然認為《反均衡論》中提出的分類方法，以及其它批判

---

* 我在第二章講述了我決定參加共產黨的過程。此前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特別的偏好，而是在許多動機的激勵下作出了這個決定。我作出這個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定後，它就在許多相對次要的連續性決策問題上，逐漸塑造出我的偏好。

性觀點，幫助了我向著正確的方向摸索前進。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無法準確地衡量《反均衡論》發表後，科學和學術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某些學術成就的發展方向，在《反均衡論》看來，是非常可喜的。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心理學家和理論經濟學家合作研究決策的過程，並且重新評估了「一致性決策者」的理想模型，他們已經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所謂「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展，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思想流派。它力求從全新的視覺出發，來模仿人類的行為，然後使用更接近現實情況的模型來描述它們。這個流派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阿莫斯·特韋爾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的研究結果。他們在自己的理論中，展示了人類的許多反常之處——換句話說，人們可以觀察到人們的行為，系統性地偏離了理性決策的標準模型。2002年卡尼曼獲得諾貝爾獎，清楚地表明經濟學界廣泛贊同他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特韋爾斯基沒有活到與卡尼曼分享這項殊榮的那一天）。*

然而其它學術發展趨勢，卻令人堪憂。人們開始把理性選擇模型，廣泛應用到社會學、政治科學、甚至歷史學中，即人們應用它來分析主要研究非重複性事件的學科，但遺憾的是，人們並沒有像上文暗示的那樣，巧妙地把這種理論應用到這些學科中。由於人們解讀它的方式，往往過於粗糙和簡單，因此許多年前我對這種趨勢提出的警告和批判，對現在的學術形勢依然有效。

非價格信號

我所批判的新古典主義理論，認為在經濟體系的單位之間只有一種信息——價格。這種為價格賦予唯一角色的論調，讓我感到非常不快。

---

* 雖然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的發現受到廣泛認同（例如學者們會在腳注裏解釋他們的理論），但是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仍然在繼續自己的工作方式，彷彿這個新理論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對企業間生產和消費的影響，微乎其微。與此相反，其它信息對它們產生的影響更加深刻，如計劃指標、存貨量上升或下降的跡象、正在排隊的顧客名單的長度，以及訂單的大小等等。如果人們在分析時，忽略了所有這些因素，那麼便無法解釋重建市場機制時，價格信號將表現出哪些特別的優勢。

此外，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價格也不是唯一的信息載體，而且非價格信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均衡論》在這個問題上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在其後的幾十年裏，人們對於信息的信號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而且可喜的發展。

均衡與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

「對範疇進行定義是一項極端困難的經濟學研究工作……而且經濟學中的概念，往往缺乏精確性」[3]。我在《反均衡論》中，引用了約翰·馮·諾伊曼的這段話。過去人們始終沒有找到「均衡」這個概念的準確定義(現在依然如此)。

一般來說，物理學和嚴密的科學，都把「均衡」看作實證性範疇。無論在拉丁語、英語，還是德語中，這個詞語都起源於天平的概念，而且天平兩邊的重量相等。即使碰一下秤盤，它也會很快回到平衡的狀態，而不會自動向一側傾斜。換句話說，它處於穩定的**靜態均衡狀態**。同樣，人們可以用相似的方法，討論**動態均衡**的概念。雖然經濟體系在不斷發展，但是它就像正在播放的電影一樣，從中選出的任何一個鏡頭，都描述出一個處於均衡狀態的體系。

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從實證的角度出發，使用了市場均衡的概念。在靜態均衡理論中，只要所有產品的供求關係相當，那麼市場便處於均衡狀態——這個定義足以滿足很多分析的需求。隨著經濟學知識的普及，「市場均衡」也逐漸成為經濟政策的制訂者，和經

濟記者的常用術語。

這個概念還融入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規範性方法。最理想的市場狀態，就是均衡狀態。需求超過供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因為這必然導致短缺，或者未售出的存貨不斷增加。

儘管我承認這種方法，的確具有闡明概念內涵的力量，並且因為其簡潔性，得到經濟學家和公眾的一致認同，但無論在寫《反均衡論》時，還是現在，我都認為這一概念有缺陷。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資本主義的情況。賣家通常希望以所有買家和賣家都接受的現價，賣出能夠超出正常銷量水平的商品。所有人都隨時準備賣出較過去更多的商品，因此特意留出相應的銷售能力和存貨，以應對這種情況。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供大於求。當供給不是完全等同於需求時，那麼實際的銷售量和購買量，便取決於供給和需求中數量較少的一方。如果我們使用物理學中「均衡」的概念來描述這種狀態，那麼這就是平衡狀態，而不是供給等於需求時的狀態。同時，這也是市場最終將會回歸的狀態，雖然它可能被商業周期所取代（經濟快速發展時，將吸收或大幅降低過剩的生產能力，並且把存貨降到異乎尋常的低水平）。人們完全不必為此感到擔憂，因為這種不對稱的情況，正是隱藏在資本主義背後的巨大力量，它驅動競爭，並且促使人們相互對抗。買方因此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賣家挑挑揀揀，而不是任由賣家挑選他們。最重要的是競爭和敵對，有力地推動了技術發展和新產品的問世。

當我生活在與之相反的生活條件中（即賣方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意挑選買方），我愈發深刻地感覺到這種不對稱性。這不是剎那間平衡狀態出現些許傾斜的情況。社會的需求始終處於過剩的狀態，特定的政治和經濟條件，頻繁地複製短缺狀態。在社會主義體系下，短缺經濟是真正的均衡狀態——它也不是供需相當的狀態。

在《反均衡論》中，我用人們不熟悉的兩個全新的名詞，描述了這兩種均衡狀態，它們分別是**壓制**和**抽吸**。就前者而言，賣方用產品來對買方施壓，而就後者而言，買方如饑似渴地盼望從賣方那裏

得到產品。我必須承認這兩個名字，並沒有被經濟學家或大眾所接受。我在後文所寫的文章中，也放棄了它們，轉而使用「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這兩個術語最終在經濟學家中流行起來。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從現實情況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妨礙人們接受我的觀點的主要問題，不是術語。我的根本觀點是，這兩種體系下存在著扭曲，而且不平衡的狀態（不是買方佔據上風，就是賣方佔據上風），但它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時至今日，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然而，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始終沒有說服同行們，贊同我的觀點。

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把「競爭均衡」的概念，引進經濟學研究。在這個狀態下，市場各個組成部分的供求數量，完全對等。我發現由於這個理論範疇，非常精確，所以可以用來當作比較的標準。只要把現實體系偏離瓦爾拉斯競爭均衡狀態的情況記錄下來，那麼描述現實體系的任務，便會輕鬆很多。但是把「競爭」這個術語放在這個概念中則並不恰當，因為如果資本主義真正實現瓦爾拉斯描繪的這種均衡狀態，那麼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只能代表損失。* 人們已經找不到什麼理由，來激勵自己努力奮鬥或進行創新。所有傑克都找到了自己的吉爾†。所有生產商或賣家的產品，都找到了買家。幸運的是，這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體系下正常而且持久的均衡狀態。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生產商和賣家必須面對激烈的競爭，並且不斷更新它們的產品組合。

現在我可以解釋《反均衡論》這個書名的雙重含義。一方面，它的目的是批判一般均衡理論；另一方面，它反駁了那些渴望實現平

---

* 我在前文提及，我在正式出版《反均衡論》之前發表了一個較短的《短論》。當時我將微弱的競爭均衡比喻成性冷淡的女人和陽萎的男人之間的關係。後來我似乎想到一個更得體、更能說明問題的比喻，因為《反均衡論》中沒有使用「短論」中的這個比喻。

† 譯者注：這句話來自英語諺語「傑克一定能找到吉爾」，「傑克」泛指男人，而「吉爾」泛指女人。意指「人皆有偶」。

靜，而且缺乏創新的競爭均衡狀態的人。

從政治角度解讀一般均衡理論

反對資本主義的激進分子，指責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是為資本主義體系辯護，或者為它歌功頌德。事實上這種一概而論的說法，並不正確。

一般均衡理論以及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核心都保持了中立的政治態度。無論它的公理，還是理論框架，都沒有任何政治「偏見」。它的追隨者和使用者包括各式各樣的人物，例如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反均衡論》中，特別強調這個觀點，並且駁斥了同時代的許多人，把新古典主義流派簡單地稱作「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或「資本主義的辯護者」的做法。

作為一個致力於進行體系比較，並且力圖改變主要社會秩序的研究者，我在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發現了兩個典型的錯誤。其一是這些理論中，出現了對市場過度理想化的苗頭，它沒有讓經濟學家充分地意識到國家干涉經濟活動，以及建立其它輔助性監管體制的必要性。另一個是它未能指出真實的市場具備的真正優勢，以及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力量，我們已經在上文討論了這些問題。當時人們在過於樂觀地描述市場的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又過於悲觀。

我試圖謹慎地描繪出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以及更廣泛的新古典主義思想，與激進的社會主義學術著作之間，存在的相似之處。

後者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我們多次提到的奧斯卡·蘭格的文章。他借鑒瓦爾拉斯理論的學術體系，建立起著名的社會主義理論。

近年來，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蘇聯的康托洛維奇流派。它們建議使用線性規劃計算出來的假定價格，代替真實市場中的價格來調節經濟。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西方經濟學家在康托洛維奇流派中，找到了血緣關係，因為雖然後者使用數學形式描述自己的平衡體系時，略微進行了修改，但究其根本，不過是瓦爾拉斯體系的

變體而已。

《反均衡論》還發現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平衡體系，與一般均衡理論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個發現，使得這本書的馬克思主義讀者，大為惱火。

不過，與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站在同一戰線的人，更傾向於歡迎《反均衡論》加入自己的陣營，而不是否定它。他們興高采烈地宣稱，我們擁有「共同的敵人」。他們沒有發現這本書，正有力地為資本主義辯護，而不是簡單地讚揚溫和的「競爭均衡」。它強調了資本主義的一個優點：技術發展和不斷創新，是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特徵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的推動力。*這一點，不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得到承認，而且更是熊彼特理論的核心。

科學改革還是科學革命

在我認真研究經濟學的過程中，意識到許多具有卓著成效的研究，都指示了在我看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它們開始逐漸填平瓦爾拉斯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但是，我認為這種變化的進展太慢。我希望看到一場科學革命，而不僅是對當前學術思想的改革。我並非妄自尊大，也從來沒有聲明我的書，引發了這樣一場革命。

我認為自己的書是個半成品，它只不過描述了我對革命的渴望而已。我在這本書裏，激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借用維爾納·海森堡的術語來說，我把一般均衡理論稱作「數理晶體」——一個無法進行矯正的封閉體系。[4]

---

* 《反均衡論》中的一張統計表，詳細地列出哪些國家在何時發明的哪些主要產品，徹底改革了生產和消費，並建立起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清楚地反映出自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立以來，它的發展史上幾乎沒有出現任何「具有革命性」的產品。大多數「革命性」產品都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這種比較本身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有力控訴。

如今回顧過去，我認為人們誤解了革命的方法。*

自1962年托馬斯·庫恩出版了關於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經典著作後，是否應該在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中掀起真正的革命，便成為辯論的焦點。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儘管社會科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轉折點，或者在頃刻間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許多盛及一時的子思想體系，不斷被湧現出來的新思想代替，但它自始至終保持了高度的連續性。改革與革命的要素，不斷糾纏在一起，難以分割。

我在寫《反均衡論》時，低估了主流經濟學家努力提高自身的意願和能力。本書中提到的，以及沒有提到的許多成就，證明了這個流派比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而且沒有經歷任何波瀾壯闊的革命，便實現了這個目標。

然而，我必須補充的是，當時我的急躁情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自那以後，這種情緒一直沒有平息下來。雖然主流經濟學流派，實現自我完善的能力顯而易見，但是在學術界已經對他們提出合理懷疑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固執、甚至頑固地堅守他們認為可靠，而且讓他們感到安慰的思想體系。

《反均衡論》出版初期人們對它的認可以及其長遠影響

《反均衡論》剛剛出版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肯尼思·阿羅和赫伯特·西蒙領取諾貝爾獎時，在獲獎感言中提到《反均衡論》中

* 我與馬克思主義決裂時，激進主義對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一筆勾銷」了從馬克思主義那裏汲取的學術資本後，全盤否定了它的整個思想體系。我一個接一個地反復思考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獨立原則和方法，直到能夠說服自己，相信它們的確有可用性後才會重新接受它們。不過，我與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思想「搏鬥」時，這種激進主義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我似乎在有選擇地使用這種方法）。借用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話來說，新古典主義經濟思想並不是正在走下坡路的科學計劃，它仍然是具有可行性的學術思想。

的某些觀點，並對它們表示贊同。[5]其它許多文章和書籍，也多次引用它的內容。在它出版的頭幾年，世界各地湧現出大量評論它的文章。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也經常組織對它的專題討論。這本書廣泛地批判了當時幾乎無處不在的主流經濟學思想。僅僅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足以在學術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而且讓許多人拍手稱快。

當時，強烈反對這本書的意見並不多。我原本預料自己的作品，會引起學術界的騷動，取得一些實質性的成果，並產生持久的影響力。但事情的發展，並沒有依照我的想像進行。雖然這本書剛剛出版時，出現了少量批評意見，後來卻沒有再出現什麼批判言論，但是人們積極引用它的浪潮過去後，便不再有人對它大加讚賞。對它的辯論，也漸漸偃旗息鼓。這本書剛剛出版時，人們對它的廣泛關注，正不斷消失。*

我已經向讀者說明了使用《反均衡論》的思考方法，可以在許多研究領域取得豐碩的成果，這讓我感覺非常欣慰。坦白地說，我不得不承認，許多學術作品在闡述對學術發展產生理論–歷史先驅作用的著作時，並沒有提到《反均衡論》，讓我感到非常不滿。†

我曾經期望《反均衡論》成為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術作品。為什麼它的影響力，沒有我預期的那樣廣泛或者深遠？我的許多作品，都

---

* 著名的法裔美國宏觀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受一本學術雜誌之托對我進行採訪時，我提到了《反均衡論》出版幾年後就可以說已經銷聲匿跡。他對此的反應是：「這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書。在我的家鄉法國，我們幾乎都讀過這本書。因為它已經成為常識的一部分，所以才很少被提起。其它學術思想也會遇到這種情況。也許這是成功的一種標誌。」(1999，第433頁)

† 一些主張全面批判新古典主義理論的著名經濟學家，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到我在1970年出版的《反均衡論》中論述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提到我的作品。他們為什麼沒有提到《反均衡論》？也許這些研究者沒有讀過《反均衡論》，而是依靠自己的研究工作獨立地取得這些成果。也許他們讀過這本書，但是在寫作和發表演講時忘記了它。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們記得這本書，但是認為自己沒有義務與讀者或聽眾分享這本書的內容。

達到了我的期望，甚至遠遠超出我的預期目標，為什麼這本書卻會讓我失望？

造成這種情況的問題之一，是它的風格（或者說「體裁」）。它使用了大量數學符號，但是並沒有運用它們進行數理分析。書裏充斥了太多學究式的定義，並且勞心費力地對它們進行解釋，卻沒有把它們融入分析的過程中。這本書運用很多新術語，來表達過去的概念範疇，但這種「新瓶裝舊酒」的方法，極少能實現理想的效果，反而令人大失所望，因為書中堆砌了過多的新概念，讓讀者反感。

《反均衡論》早期的版本——《短論》——相對來說，更加簡潔，而且只使用非數字語言，反而給讀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沒有正確理解當時的形勢，由於我曾經閱讀的許多學術作品，都使用了數理方法，所以我自以為可以把同樣的體裁，融入我的作品內。如果我當初堅持了《短論》的風格，可能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批判新古典主義理論時，使用的語氣非常禮貌文明，而不是像馬列主義那樣傲慢地指責他人。然而《反均衡論》的基調，仍然過於激進。大衛·萊布森和理查德·澤克豪澤，把阿莫斯·特韋爾斯基的文章推介給我，並且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莫斯·特韋爾斯基是偉大的以色列心理學家兼經濟學家，他與丹尼爾·卡尼曼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決策過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特韋爾斯基沒有像我在《反均衡論》那樣，犯下「不圓滑」的錯誤。他不會說出「全面否定這個理論，然後從頭開始！」這樣的話，而是先從目前使用的模型中找出它的優點。他會建議人們「讓我們從這些模型的優點入手，然後以它們為基礎，進行深入的研究」。當他希望說服同行們接受自己的革命性觀點時，這種方法顯然更加合乎情理。

除了《反均衡論》的風格（或者說其體裁）以外，我分析它失敗的原因（準確的說是部分失敗）時，發現了它在內容上存在更重要的問題。

從批判的本質來看，批判至多會削弱人們對被批判理論的尊敬，並且緩解對新理論的學術反抗，但它不會推翻已經被廣泛接受的應用理論。學術界中不可能存在真空狀態。只有當經濟學家建立

起更加切實可行的新理論時，新理論才會取代舊理論。*

《反均衡論》中沒有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它沒有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

讓我們來舉一個例子。這本書指出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模型描繪出一幅和諧的畫面——所有人都安靜，並且恰如其分地在均衡狀態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現在應該集中更多精力，為它的衝突建立模型。《反均衡論》舉例說明了國家官僚體系的分支機構，或者公司內部各部門之間的衝突，而且恰好在博弈理論復興前，提出了認真研究這些衝突的建議。

針對類似的問題，後來約翰·納什和他的同事，創建了新的理論方法，研究這些衝突，並用它們建立了新的理論架構，這大大地推動了關於衝突的研究。

人們對重大研究課題，簡要地提出**建議**，由此激勵其他人，開始研究這個項目，並取得豐碩的成果——學術界中，幾乎沒有這樣的先例。真正具有生產力的研究項目，始於刺激性的**建設性創造**。這類工作通常被稱為「創造性工作」。

匈牙利有句俗語：「如果沒有僕人，那就自己動手」。我嘗試（獨立或者和其他幾個同事一起）研究了《反均衡論》中推薦的幾個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的新的理論發現（我將在其後幾章裏，講述這些成果）。

這個問題切實地促使我開始反思自己畢生的科研成就。有一類

---

* 早在《反均衡論》出版並受到批判前，我就已經清楚地看到學術理論間的對抗形勢。人們對這部書手稿的討論，進一步吸引我注意到這個問題。我保留了與此有關的一封信的複件，這是1970年我在耶魯大學時寄給布達佩斯的同事的一封信。我在信裏詳細描述了就《反均衡論》的主題展開的五次演講，人們熱切地接受了書中的觀點。我首先向同事彙報了人們對這本書的溢美之詞，然後繼續寫道：「另外一派的觀點在讚美它的同時，摻雜了不滿的情緒。有一位同事諷刺地將這種行為稱作精神分裂症的表現：他們的良心告訴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不正確，但是他們仍然繼續我行我素。只有當人們將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放到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停止這種做法。」

研究者提出偉大的觀點——真正原創，而且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並且把畢生精力貢獻給它的研究工作。他們努力拓展這個觀點的內容，把它應用在實際研究中，大力宣傳這個觀點，並且建立相應的思想流派。有些研究者甚至成功地這樣發展了兩至三個重要觀點。理論發展史證明這種集中精力，專攻一個觀點的研究策略，往往能產生非常重要的結果。我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我的個人偏好，導致我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策略。層出不窮的新觀點，讓我嘆為觀止。不幸的是，我很少有耐心停留在一個固定的課題上，然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對它的研究、實際應用、宣傳或建立相關學術流派等工作上。這些工作剛剛開始起步時，我便已經興沖沖地奔向下一個令人激動的學術觀點。雖然不是我的每項研究工作都套用了這種模式，但是我可以舉出它的很多實例。《反均衡論》的內容，以及它出版後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說明了我在研究工作中努力向前衝的特點。儘管這本書經過多次編輯，但是它仍然以衝鋒的速度，從一個消化了一半的觀念，衝向另外一個消化了一半的觀點。

我值得為《反均衡論》付出這麼多心血嗎？

顯然寫作和出版《反均衡論》，給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帶來很多麻煩。新古典主義流派中，某些心胸狹隘的頑固分子，認為這本書中「離經叛道」的主張，完全不可饒恕。儘管現在我在這本書裏，發現許多不足之處，甚至是謬論，但是我仍然認為它的許多觀點，完全站得住腳。時至今日，我仍然在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新古典主義流派，而不會盲目地把它捧為金科玉律。如果現在讓我來描述自己的研究特點，我會說自己的一隻腳站在主流之內，而另一隻腳則站在主流之外。在某些問題上，我會追隨主流思想，而在其它問題上，我努力地逆流而上。這種「半進半出」的狀態，經常會引起衝突。那些思想不夠開通，無法接受這種怪癖行為的編輯和讀者，往往不會對我的文章，加以青睞。

我是如何鼓足勇氣寫了這本書呢？早在動筆之前，我便非常清

楚，必然會有許多人強烈批判這本書，而且它會引發激烈的反對意見。自從我對馬克思主義喪失信心後，我對所有事物都持懷疑態度，而且仔細斟酌後，再確定是否接受它們的傾向，愈發明顯，所以當時一定是這種思考習慣，促使我最終下決心寫了這本書。我曾經盲目，而且不加批判地崇拜馬克思主義，現在我不希望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在早前幾章提及，由於自己沒有曾經在名校接受教育，不得不通過自學來彌補經濟學知識方面的不足，所以必須在在研究工作中克服不少劣勢。不過，我認為自學也具有一定的優勢。我雖然學習了主流思想的發展史，但是無論在發表演講、參加研討會，還是準備考試時，都沒有把這種觀點深深地植入自己的腦袋中——我不會在夢中也本能地運用傳統的新古典主義思想解答問題。我不敢把自己與海頓相提並論，但是我認為自己的處境，與他有幾分相似。海頓曾經在許多年裏，遠離世界音樂界的中心(事實上，他當時居住在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齊宮)。當時他寫道：「我與世界的聯繫被完全切斷了，因此我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並且承擔相應的風險。埃斯特哈齊宮裏，沒有人分散我的注意力，或者在我心中植下懷疑的種子，這也是我始終保持原創精神的原因所在。」[6]

如果我從年輕時，便開始在美國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那麼我寫出《反均衡論》時，也許已經到了被評為正教授的年紀了。我的手稿一定會被著名學術雜誌拒絕，因為書中包含了大量尚未完全成形的信息，和批判權威理論教義的非正統觀點。請不要忘了大學評定教授的主要依據，是級別較低的教師，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少篇文章。我參加職稱評定時，一定會盡量避免惹惱那些可以對我的評級產生影響的同事。從這個角度來說，生活在遙遠的匈牙利，使我受益匪淺。雖然這個論調，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是這種生活狀態，的確使我更容易保持自己的學術獨立性。我沒有「低頭就範」，乖乖遵循西方年輕學者的正常學術生活模式——畢業，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後升級。

因此寫下這本書是否物有所值呢？我是否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後

悔？在這裏我可以以自己的行為為例，指出人類行為存在許多矛盾之處。有時我想：「如果我當初沒有寫這本書該多好」。但有時我的想法，卻與此全然不同，我不想從自己的的文章中，抹掉對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批判。不過如果我能借用奧威爾書中的小把戲，把1971年出版的《反均衡論》從歷史上刪除，用一部能夠反映我現在觀點和見解的書籍，取而代之，那麼效果一定會更好——如果能用修訂後更受人歡迎的作品，代替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蜘網塵封的作品，自然不算一件壞事。然而，正如偉大的匈牙利作家卡爾曼·米克薩特說的那樣：「一旦人們寫出自己的作品，即使用斧頭，也不能把它從自己的生活中砍掉。」*

但是總體說來，我並不後悔出版了《反均衡論》。最尖銳及最全面地批判了這本書的評論家弗蘭克·哈恩（我在前文引用了他的評論），總結了他自己的觀點：「我非常歡迎這本書的問世，而不是希望它從來沒有出現。毫無疑問，科爾奈非常誠實，而且是一位正直的學者，因此人們經常能夠從他的著作中，在那些非常糟糕的東西上，提取他希望表達的有益的觀點，而且其中有些東西，的確具有非比尋常的價值。」[7]我為這種成就感到驕傲。哈恩還寫道：「當時這本書大大地滿足了我的需要。」或許我從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以及其後的辯論過程中，學到的東西也非常有價值。無論是好是壞，這本書無疑是我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對《反均衡論》的結語評論

最後，我希望暫時拋開經濟學和科學理論的世界，對《反均衡論》提出我個人的意見。曾經閱讀回憶錄初稿的一位讀者，對這一章評論道：「為什麼要這麼仔細地探究失敗的原因呢？試著忘掉失敗吧！」另一個讀者評論說：「人們不喜歡看到不滿和抱怨。…是虛榮心引導你寫下了失敗的涵義。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

---

* 彼得·艾什泰哈齊提到安德拉什·涅爾蓋什的著作時，引用了這句話。

我承認如果把這本書過去給我帶來的麻煩丟在一邊，我的姿態會更加優雅。但是我不是那種可以輕易地對許多事情置之不理的人。我羨慕伊迪絲·比阿夫的生活態度，他曾經說：「不，我不會為任何事感到後悔」，但是我自己卻說不出這樣的話。我為自己曾做的某些事情，感到後悔，但對於某些事情，則義無反顧。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明確地評價自己曾做的許多事情，是對還是錯。我不斷反思自己過去陷入的兩難處境，當初我是否應該選擇另外一種解決方法？毫無疑問，失敗對我的影響，較成功深刻得多。

《反均衡論》不僅是我的出版作品清單上的一個書名，也是我的研究生涯中，最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事業。我承擔的這個重大，而且艱巨的任務，遠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我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仍然無法坦然接受它的失敗。

我不可能不在意失敗和成功，我相信大多數學者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只是極少數人敢於承認這一點而已，他們擔心公眾會誤解他們。假如學者們不會受到他人對其著作評頭論足的影響，而且讓人們感到，他們除了對科學進步和發現真理感興趣以外，便無欲無求，那麼這看起來會更理想。假如這是真實，那麼為什麼科學界與文學、藝術、體育、生產和商業等領域一樣，一面是光鮮亮麗，而且名目繁多的獎勵、榮譽、地位和認可，而另外一面則是從沉默到公開進行攻擊和羞辱等種種表示反對意見的方式？只有學術界裏極端的狂熱者和聖人，才會在面對鮮花的榮譽和謾罵攻擊時，都不為所動。大多數人都是免不了犯錯的普通人，他們會感到成功和失敗的強烈體驗，與創造新事物的驅動力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毫無疑問，從知識中得到的快樂，以及探索真理的欲望，是推動研究工作向前發展的主要力量。然而，某些從屬性的動機，卻進一步加大這種推動力。那些聽到別人評論自己的研究工作，但置若罔聞的人，通常都沒有全心投入研究工作（這裏不包括那些虛偽地裝作不在乎的人）。

和本書的其它章節一樣，我在本章也努力秉承著誠實的原則，進行自我反省。《反均衡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我首先分析

了自己，應該對這個事實承擔的責任。這種誠實的態度，為我提出以下這個問題奠定了道德基礎：「這本書沒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全部在我嗎？」我並不是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力求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某些學者拒絕接受激烈的批評意見，而且經常忘記一些應該緊記的東西，當我提出這個問題供大家談論時，事實上我不僅在為自己說話，而且也代表了很多學者的意見。我認為上文提到的這類學者，有責任緊記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新觀點（即原始、粗糙，但是具有開創性的觀點）剛剛問世時的情況。

我原本可以聽從那兩位讀者的建議，刪除本章和書中其它章節的某些段落。這也許可以馬上消除我在人們的心目中猶豫不定的形象。這樣塑造出來的形象，也許更接近「學者」的理想形象——但這絕不是我。

11 研究所、大學和科學院：1967年後

讓我們從純理論的世界，回到布達佩斯絕非純粹的社會環境。我寫《短論》(即《反均衡論》的初稿)時，任職於匈牙利科學院的計算中心，當時我多多少少還在參與數理計劃的工作。但是與此同時，我在1958年時把我開除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裏，也兼職一部分工作。1967年，經濟研究所的所長伊斯特萬·弗里斯給我通電話，表示讓我返回學院，擔任全職研究員，我其後接受了他的邀請。在及後的二十五年裏，經濟研究所成為我在匈牙利的主要工作地點。

最高經濟領導人

現在，請允許我多說一點關於伊特斯萬·弗里斯的情況。正是他把我召回經濟研究所裏。匈牙利科學院及其下屬研究所，有著極複雜，而且極森嚴的等級結構。弗里斯負責管理第四學部，它涵蓋了經濟、法律和其它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他在第四學部擔任經濟科學學術委員會的主席，因此主管經濟學研究。而且，他還是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很少人能夠一身兼三個等級的要職。從理論上來說，他既是我的上司，也是較我高兩級的監督者。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下，他所擔任的職務，都掌控著相當大的實權。

弗里斯的人格，明顯表現出前後不一致。許多相互衝突的價值

觀混合在一起，構建出他的處世觀，所以他的行為，也相應地也反映出各種模式、傳統和本能。首先，他是共產主義者，他少年時便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中產階級的背景，投身到非法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儘管這種行為，可能招致殘酷的迫害。他至死保持著對列寧主義忠貞不渝的信仰。過去在莫斯科流亡的經歷，給他的行為烙上了深深的印記——他始終和別人保持一定距離，而且不信任身邊的同事，但是他從不會擺官架子、玩弄權術和擴張個人影響力，以從中獲得快樂。他在德國和英國做了一些研究，而且在有生之年裏，始終保持著語氣平和、風度翩翩的紳士形象。作為學者和研究者，他沒有取得什麼研究成果，也沒有提出任何重要的原創性理論，但是作為一個組織者，他取得許多了卓越的功績。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他通常都會尊重下級的言論自由（當然這些必須限定在他的管轄範圍內，所以這種規定，本身也很怪誕）。他不像蘇聯和東歐國家裏與他處在相同位置的官員那樣，要求下屬必須嚴格遵循黨的路線。他非常積極地推動了實證研究，和對現實情況的觀察工作。

我與弗里斯之間的關係搖擺不定，充滿了矛盾。他較我年長二十五歲，因此我們的關係，自然而然地包含了父愛主義的元素。我們稱呼對方時，都使用親密的的第二人稱，不過他叫我「揚奇」，而我和其他人一樣，叫他「弗里斯同志」。

我想在這裏，談談早前幾章提到的一些事情。我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時，弗里斯負責向我傳達關於黨的經濟政策的消息和指示。我被報社開除後，他接收我到經濟研究所工作，但是把我的工資，降到最低水平。我在研究工作上再次嶄露頭角後，他不僅為我升職加薪，而且把我樹立為全院教職工學習的榜樣。1956年十月革命爆發後，他給我通電話，希望我在電臺發表支持共產黨的言論，但被我拒絕了。革命失敗後，他在黨內發表演講時，把我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叛徒」。他沒有主動提議把我從經濟研究所開除，但是別人提出這種意見時，他採取了不作為的態度。他像嚴守紀律的共產黨鬥士一樣，堅定地執行上級的決定，並開除了我的工職。但從另一

方面來說，他又幫助我找到新的工作，並且允許我在英國出版學術作品。

當時他邀請我重返經濟研究所，可是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呢？他以多種方式，表達了對我的作品的欣賞和尊敬。有一次我做完手術，在家休養時，他親自到家裏探望我，還詢問我是否有意願接替他擔任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我當然沒有這種意願）。

似乎什麼都不曾發生過

被經濟研究所開除，是我人生中的一場重大危機。我的返回是靜悄悄的，似乎什麼都不曾發生過。伊斯特萬·弗里斯沒有提及往事，我和其他同事亦然。

當時我的心裏翻騰著許多念頭和感想，五味雜陳，難以平靜。1968年，我們正在努力地為所謂「新經濟機制」做準備。我回到經濟研究所之前的幾年，曾經短暫地和雷若·涅爾什見面一次。當時他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負責改革工作。他與我擦肩而過時說：「你知道自己要恢復職務了吧？」我回答說：「我能從哪兒聽說這個消息？沒有人曾經告訴我。」許多曾經閱讀我在1956至1957年間出版的書的人、許多曾經參加1956年改革提案辯論的人，以及十年前曾經與我討論這個主題的人，現在都投入到改革的準備工作中。我相信自己影響了他們的思想，然而無論在口頭，還是書面上，都沒有人提及這些事情。弗里斯從來沒有談到這些事實：他按照當時黨的方針路線，全力支持了改革，而發起這場改革的人，正是幾年前，他以黨的名義公開抨擊的人。

不過當時如果有人深究我與經濟改革的關係，我一定會感到非常尷尬。我已經結束了人生的「幼稚改革者」階段，而且更加強烈地確定，政府準備推行的改革活動，不會走得太遠。

從本質上來說，我與現行體制的分歧，主要是基於不同的政治觀點。我想起1958年，黨中央派到研究所的政治委員們對我的指控。他們認為我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事實上這種觀點完全正確。

我的文章確實在逐漸腐蝕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而且我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支持了1956年的革命，並且發揮了一定作用。他們認為我不可靠的想法，也完全沒有錯。我的許多朋友身陷囹圄、被政府放逐，或者丟掉了工作。我曾經公開譴責馬克思主義，拒絕加入新組建的共產黨。我被經濟研究所開除，並不僅僅因為寫了那部讓當局不滿的書籍，而是因為我堅持反對共產黨。沒有什麼能保證，他們不會突然間再次收回還給我的一切。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共產黨只會給那些忠於共產主義的人「平反」。*

那些決定把我召回研究所的人，一定不願意放棄他們原來的看法。就我而言，我也不願意給人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我和那些起先開除我，然後又邀請我回到研究所的人，已經相互諒解。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接受的一個解決方法，就是不要對任何事情作出解釋。這是卡達爾執政時期，非常普遍的一種做法。

然而這種不分是非曲直、一味掩飾歷史的行為，仍然激怒了我。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在過去的政治鬥爭中暫時失敗的人，這是當時最不會讓我尷尬的解決方法。在政壇打拼的人，不應該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舔舐自己的傷口。但是作為研究者和獻身於科學事業的人，我親眼看到了1958年給研究自由帶來的沉重打擊，而且看到了弗里斯連最起碼談論這件事情的道德勇氣也沒有。

信任與容忍

現在讓我來談談從同事那裏感受到的信任。在這裏，我暫時不會談及那些1967年前認識的密友，即安德拉什·納吉（他和我同時被

* 我想起五十年代在匈牙利流行的一個笑話：科恩被開除黨籍後，有一天晚上夢到美國軍隊佔領了匈牙利，總統艾森豪威爾像1919年的米克洛什·霍爾蒂那樣，騎著白馬降臨布達佩斯。馬加什·拉科西跪著將城市的鑰匙交給艾森豪威爾，然後艾森豪威爾發號施令說：「拉科西！讓科恩重新入黨！」到了1967年，我已經不會像可憐的科恩那樣，產生這種滑稽的欲望。

學院開除，然後又於1973年，應邀重回經濟研究所）、朱迪特·里姆勒（我向學院推薦了她）*和馬頓·陶爾多什（自1956年開始，我與他建立起親密的友誼。他於七十年代末，到經濟研究所工作）。我希望在這裏講述我和研究所裏其他教職工之間的關係。

在我回到經濟研究所時，任何直接關係到政治問題的談話，都會產生令我壓抑的不信任感。我清楚地記起，有一次我接受審問時，發現一位親密的朋友，向審問他的人詳細描述了我評論他的文章時，表達出來的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我很難控制自己不產生這樣的想法：任何與我交談的人，都有可能這麼做。

我的同事也感覺到這種距離感和冷漠。我曾經與考蒂·法卡斯共事多年（後來她英年早逝），而且關係一直很融洽。她曾經善意地看著我，略帶責備地問我：「雅諾什，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不信任我們？」我們認真談論了這個話題，而且我嘗試向她解釋了究竟什麼原因，導致我產生這種態度。如今看來，我們在這次談話中，探討的具體內容，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對我的思想產生了影響。後來，在那些我認為不會辜負我的信任的同事面前，我開始略微放鬆一些。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緩慢，而且漸進的過程，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只是淺嘗輒止。

即使到了後來，每次我談到政治局勢的重要發展時，都要先考慮對方的身份，才能決定是否可以坦誠，並且無拘無束地盡情表達自己的看法，我保持了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我根據每個人的性格、文章、言論和行為，進行評估，然後根據評估結果，具體「分配」對他們的信任。我對某些評級較低的人，非常吝嗇自己的信任，反之對評級較高的人，則慷慨大方。詩人阿提拉·約瑟夫曾經說：

---

* 1959年，我被「放逐」到輕工業部時，有機會招募一個同事協助我工作，於是我讓在大學工作的朋友幫我推薦他們最優秀的學生，因此結識了朱迪特·里姆勒。她成為我的第一任研究助理，後來我自己也成為一位著名的研究者。我調動工作時，堅持要她與我一起調到新的工作單位。

「不要揮霍你的信任」[1]，我的確就是這麼做。

如果說我的確影響了身邊的同事，特別是年輕同事，那麼影響他們的，絕不是我的政治觀點，而是其它東西。他們看到了我的整個工作過程，從談話中了解我的專業標準，並且從我的文章中，認識到我的學術傾向。這些思想開通，而且沒有偏見的人，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這種影響。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跟越來越多同事輕鬆愉快地交談。幾年後，我還介紹了一兩名同志到研究所工作。當時研究所任命我擔任一個團隊的負責人，並且直接指導手下的一些年輕研究者，開展工作。雅諾什·加奇和瑪莉亞·拉茨科夫婦，是我曾經教授的大學生，我建議他們其中的一位，到經濟研究所裏工作——因為我沒有能力，同時為他們提供兩個職位。他們商量後，決定讓瑪莉亞到我這裏來工作。此外，我在大學裏曾經教授的另外一個學生——朱迪特·薩博——也加入了我們的團隊。陶馬什·利普塔克給我推薦了剛剛從數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米哈伊·洛基隨之也加入了我們。蘇莎·卡皮塔尼早前是中學的數學老師，後來成為電腦操作員，協助我的一名同事，開展研究工作。她也找了我，希望參加我們的團隊。蘇莎經過不斷地學習和培訓，最終也成為一名經濟研究者。以上提到的同事，都較我年輕。不過和我一同研究這個課題的同事裏，也有和我年紀相仿的人——貝洛·馬爾托什，但是他並不屬於我們這個團隊，他過去是一名數學家。

共同的研究任務，當然還有相似的學術研究方法，把科爾奈團隊的成員，緊緊捆在一起（我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我們相互同情，彼此關愛。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樣，我從來不會滿足於和身邊的人，保持純粹的工作關係。在《自由的人民》工作時是這樣，後來在經濟研究所和哈佛大學時，也是如此。這也許不是效率最高，或者最專業的組織工作的方法，它也許會阻礙我

---

* 當時經濟研究所被劃分為許多平行的團隊，每個團隊的負責人都是經驗比較豐富的研究者。本文中使用的「團隊」，指具有**機構組織**意義的團體。

在純粹的工作基礎上建立等級關係。但是我並不會為這種工作習慣和工作要求，感到後悔。對我來說，人際交往、友情和信任所帶來的溫暖，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科爾奈團隊的成員，通常會在十一時三十分准點，相約一起吃午餐，這已經成為一種傳統。事實上，是我主張把吃飯的時間，提早到十一時半，因為我習慣早些吃飯。我不喜歡把時間浪費在飯店裏等餐，而是希望自己是飯店的第一批顧客。其他研究團隊的許多同事，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午餐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大家在一起熱烈地談天，卻讓所有人都心情舒暢。

我不僅和研究團隊中的年輕人，建立起這種友誼和工作關係，揉合在一起的特殊感情。那幾年裏，很多到學院工作的人，也與我建立起這種特殊的關係，例如陶馬什·鮑爾、阿拉達·毛道拉斯、卡羅伊·阿提拉·紹什、伊萬·馬約爾、雅諾什·克勒、彼得·皮特、加博爾·凱爾泰希和彼得·米哈伊，這裏僅列出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姓名。他們離開了經濟研究所後，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驕人的成就，而且幾乎全部都成為各大院校的正教授。政治體制發生改變後，他們中有一部分人，還在政界擔任要職。我認識他們時，他們的思想體系正處於成形階段。我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多次促膝長談，但與其他人的談話，則沒這麼頻繁。他們中有幾個人，是我在大學授課時教導的學生。我除了仔細閱讀他們在研究所寫的論文，並給予中肯的評定以外(我至今仍保留著我當時所寫的評語)，還與他們談論研究和經濟改革，以及其它許多概括性的學術和道德問題。

無論是與團隊成員和非團隊成員開展的討論，還是閱讀他們的論文，都讓我大開眼界。我從中了解到更多匈牙利經濟的運行情況，經濟學家內部開展的辯論、整個國家的狀態，及其未來可以選擇的發展道路。這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環境，而身為其中的一員，讓我倍感興奮。我不太了解在這些互動中，他們從我這裏得到了什麼，但他們稱我的文章和與我的私交，對他們產生了極其強大的影響。我時常和他們見面，甚至定期和其中一些人見面，這已

經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過，可以理解的是，我們不會在談話裏，談到我對他們的影響。

社會學家可以專業地描繪出研究所裏的關係網絡，在標示出網絡的中心後，用箭頭連接發生關係的各個成員，並用數字標識，來反映成員之間的關係強度。這張圖可以清晰地表現出，這些成員如何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結成小團體。

在研究所裏幫助，或者阻礙人們建立聯繫的因素之一，是人們對於數理方法的看法。從這個角度來說，匈牙利的形勢，非常像幾十年前美國大學經濟系的情況：大多數研究者，反對使用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所裏，有些人面對數學的發展，幾乎患上了恐懼症，他們把數學看作成學術上的小把戲。與此相對應的是使用數理方法的人，以特殊的方式團結在一起，無論他們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或者無論他們是否同情卡達爾體系。

和所有規模非常大的機構一樣，研究所中也湧現出許多強勢的人物，他們通過吸引，或者排擠研究所裏的成員，來建立自己的派別。

這些派別吸引，或者排斥成員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世界觀或者政治態度。* 人們雖然不在研究所裏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但是所有人的立場卻一覽無遺。我認為比起西方學術界，政治認同感在匈牙利發揮了更加強大的約束力，把人們緊緊地綁在一起。

無論何時在研究所裏流行的政治觀點，都跨越了寬闊的政治譜系。我們中間，雖然沒有斯大林主義的死硬分子，但是卻有幾個堅守教條，而且保守的舊共產主義者。研究所裏的大部分人，屬於「改革共產主義者」。他們逐漸覺醒，並且極度希望改變現狀。他們希望為經濟注入一支「市場」的強心針（雖然對劑量大小的問題，仍然各持己見），希望獲得更多批判現實的機會，並且希望找到實現「民主化」的措施，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感到自己與卡達爾體系，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此外研究所裏，還有與共產黨徹底決裂，或者不再

* 根據不同標準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會部分地重疊在一起。任何一個成員都可能鬆散或者密切地同時與多個派別聯繫在一起。

靠近共產黨的人，他們強烈地抨擊了執政黨。

隨著人員流動，研究所裏的政治組成，始終處於不斷的變化中，而且許多人會改變自己的觀點，有時甚至會徹頭徹尾地拋棄原來的主張。這種立場的轉變，不斷影響著這些非正式的派別和團體的規模。無論何時，以政治信仰為依托聚集起來的非正式派別，永遠存在於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派別，不難發現立場相近的成員，往往更容易在政治問題上互相信任，而對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則會保留一定戒備之心。同樣，我與同事交往時，通常只會選擇那些對政見不一，保持開明的態度，而且在交往過程中，不會讓我感到壓抑的人。*

雖然研究所裏無形中被劃分為許多派別，但這些派別之間，卻從來沒有發生「塹壕戰」。1956年革命留下的創傷，使得年紀較大的工作人員以及中年人(其中包括我)的神經，時刻處於繃緊的狀態。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經常根據自己的世界觀，來反思自己在革命中的經歷。這幾代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共同點，是他們不會渴望用意識形態鬥爭，或者政治鬥爭來搞垮對方。我們中間存在著奇特的「神之休戰」現象，即我們不會傷害你，但希望你也不要挑釁我們。各派別之間相互包容，和平共存，從來沒有發生尖銳、公開的政治衝突。

我該如何描述這種形勢呢？我們都在堅持自己的原則，而不會對對方作出任何可恥的讓步。†那些熱衷於鬥爭的人，以個人身份在研究所的圍牆外，自顧自地戰鬥，或者以個人身份，在自己的學術

---

* 對我而言，這並不意味著在相對溫和的卡達爾政權後期，我仍然嚴格遵守著這個原則，即決不跨過其它派別的分界線。我的許多朋友顯然在政治信仰上與我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建立起真摯的友情。

† 我注意到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這種觀點。有些激進派認為在卡達爾時期，某些機構內部的「和平條約」是不可接受的妥協行為，使得卡達爾政權得以苟延殘喘下去。也許這些「條約」的確延長了卡達爾政權的生命，但是它們讓人們的生活更容易忍受。這個結論最終引出一個根本性問題：人們是否應該在改善個人生活之前，確定偉大的共有目標——就匈牙利來說，這個目標就是盡快推翻卡達爾政權。

作品裏，宣傳自己的觀點。但是在研究所的圍牆內，每個人都對其他人，保持著某種容忍，擔心「打翻了蘋果車」*而引來牆外的人，結果造成更大的傷害。因為牆外的那些人，早已準備實行更嚴酷的管控措施。也許因為我們意識到，彼此面對著共同的危險和共同的敵人，所以研究所裏，才會產生這種當時學術界中，極其罕見的寬容氣氛。相對來說，當時學院裏的權力關係，更加有利於公開支持卡達爾政權，以及歌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但幸運的是，他們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掀起政治論戰，或者「揭發」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浪潮。他們只是任由政治異見者，我行我素，而沒有打擾他們平靜的生活。†

如今回顧過去，經濟研究所在我的記憶中，宛如風雨交加的大海中的一座寧靜小島。研究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它要求我投入全部的精力，並且最大程度地集中注意力。為了我的研究事業，我需要寧靜。‡

流產的學院改革

那個時候我經常出國，有時是為了參加學術會議，或者發表演講，因此會在國外停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真正地在國外開始生活後，我才了解那裏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著名學術中心開展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方式。我希望把它們的某些優點，「移植」到經濟研究所

---

* 譯者注：英語俗語，意指「壞了大事」。

† 顯然促成這種形勢的關鍵因素，是學院的歷任院長——伊斯特萬·弗裏斯、雷熱·涅爾什和阿拉達·希波什——沒有發動過政治清洗運動。與此相反，當陶馬什·鮑爾遭到政治攻擊，上級部門要求開除他時，當時的院長涅爾什還堅決地維護了他。

‡ 當時我的私人生活正在經歷嚴峻的危機，所以工作單位裏安靜的氣氛對我幫助很大。我與泰雷茲·洛基的婚姻破裂了。我在耶魯大學訪學半年後，於1970年回到匈牙利，然後很快與我的第二任妻子蘇莎·達尼埃爾搬進新公寓，開始新的生活。

的日常工作中。1971年，我與兩位同事——亞當·施密特和雅諾什·科瓦奇——起草了改革建議。[2]儘管這個文件融合了我們三個人的觀點，但是最關鍵，以及最富有爭議的觀點，主要是由我提出的。

我建議研究所在工作人員升遷和發表作品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繫。研究所應重視學術發表工作，而且把更多精力放在海外發表上。與此同時，研究所還應該考慮研究發表者學術作品的出版社和雜誌社的學術聲譽。

西方學術界對這些問題，都有約定俗成的標準，*但它們在匈牙利，則是完全空白一片的一個領域。匈牙利的出版門檻並不高，某些內容豐富、質量頗高的文章，固然可以順利發表，但即使許多是學術意義不大的文章，也能夠相對輕鬆地出現在公共論壇上。只有極少數匈牙利人，可以在西方發表文章，而他們在權威雜誌上發表作品的機會，就更加稀少。

「市場社會主義」體系的雛形，認識到檢驗產品質量的真正方法，是看它是否能在西方出口市場上，具備競爭力。但這種出口檢驗的方法，從來沒有應用在研究者「生產」出來的產品上。缺乏嚴格的國際質量檢驗的問題，不僅體現在學術作品的發表過程中。人們可以一直在研究所裏，渾渾噩噩地混日子，極少數人甚至根本不發表文章。只要你進入了研究所，即使比你更有才華、更有創作能力的研究者在拼命砸門，希望取代你的位置，你仍然可以在那裏，無所事事地混一輩子。

研究所存在的另外一個弊病，是用西方學術界的標準來看，許多曾經發表論文的學者，也出現效率太低的問題。儘管他們不必像西方同行那樣，擠出時間從事教學工作，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但是他們出版的作品數量，與西方知名學府的同行發表的作品相比，不過是後者的零頭而已(這裏僅從定量的角度來進行比較)。

---

* 這個問題表現出來了另外一個極端：如果出版或發表學術作品的工作使得學者背上過於沉重的壓力，那麼這些標準甚至會被證明是有害的政策。我會在下一章詳細分析這個問題。

在海外的學術經歷，並不是影響我擬定以上改革建議的唯一因素。我也在嘗試把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學術抱負，傳遞給其他人，並且根據自我評判的標準，來判定其他人。我非常樂意在工作時，與同事閑聊幾句，以放鬆心情，但是我希望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能用於有建設性的研究工作上。每當我看到許多人，把大量的時間用在閑聊上時，總會不由自主地火冒三丈。我必須承認關起門來聊天或辯論，可以部分地抵消公共生活中缺少言論公開和言論自由對情緒造成的壓抑，它可以幫助人們理清自己的思路，刺激新觀點的產生，並且廣泛地傳揚知識。但這些具有前瞻性的談話，不可避免地與沒有意義的聊天，摻雜在一起，佔用了人們進行實際研究工作的寶貴時間。

研究所的管理層嘗試引進打卡制度，來記錄上下班時間，以嚴格執行工作紀律。這種畸形的管理措施，當然不會取得任何實質效果。推動人們積極從事研究工作的動力，來自於人們的內心。根據我在西方訪學的經驗，我認為許多研究者的動機，與外界的激勵，或者某些外部條件，密不可分(譬如進入研究所工作、保住自己的職位、升遷、工作單位裏正式或非正式的認可)。因此我們的改革方案建議大幅修改激勵措施、職稱評定和晉升等相關規定。

人們對這個方案的反應褒貶不一，儘管有些人低聲地表示贊同，但事實上，大多數同事並不喜歡它。有些人爭論說，西方雜誌社或出版社，僅僅因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便拒絕刊登他們的文章(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我可以舉出許多反例)。還有些人認為西方學術界，對東方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這種說法也不成立，一篇文章是否能夠發表，主要取決於它是否符合專業標準)。然而其他人(特別在私下裏)爭辯說，他們在批判體系的研究上，已經相當深入，只是苦於不能合法地發表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觀點。我將會在下一章，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即使在當時，我也不相信西方學術期刊的稿件遴選機制完美無瑕，而現在我嚴厲批判它們的編輯工作程序的傾向，日益嚴重。有時他們不合理地拋棄了許多開創性的作品(這種作品的觀點，通常比較另類)，結果阻礙許多重要的

研究成果進一步傳揚。此外，與此相反的錯誤，也經常發生。嚴重缺乏學術價值的作品，常常順利逃過編輯的篩選過程。即使它們沒有具備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或者缺乏新意，只要能夠滿足，並且順應主流學術世界的要求，並且採取主流學術思想的研究風格和方法，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雜誌上。儘管雜誌社在審稿方面，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作品，被國際著名期刊上採納的機率，仍然相當大，這兩者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如今回頭再看那段歷史，我仍然相信，鼓勵同事們在權威期刊上發表作品，是正確的做法。

人們在討論改革方案的過程中，還提出一種反對觀點。為什麼要把改革的重點，放在發表學術作品上？許多同事都對經濟政策的制訂，產生了影響力，而且以專家和顧問的身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公開發布的國家文件、黨的決議或立法文件中。與改革方案中，以學術作品論英雄的觀點比起來，評估這些學者發揮的作用，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甚至可能更為重要。我們針鋒相對地反駁了這種觀點：這些經濟政治活動，也非常值得讚賞，但是卻不足以彰顯出**科研工作**取得的進步。

我在上一節提到研究所裏，存在許多以政治態度和世界觀為劃分標準的派別。改革方案打亂了它們原本的面貌，使研究者們以另外一種方式組合起來。不少人贊同方案中提出的改革建議，因為他們已經成功地在知名雜誌上發表文章，或者與這個方案的改革精神，產生共鳴，希望今後透過不懈的努力，把自己的作品，展現在國際學術界的論壇上。*不過所有缺乏天賦、懶惰、胸無大志和無法接受西方學術規範的人，卻異口同聲地反對改革方案——他們不希望加入發表學術作品的激烈競爭中（發表文章，雖然不是衡量學術成

* 在我們提出改革方案之前，許多匈牙利經濟學家（包括不少在經濟研究所工作的同事）發表作品的清單，就已經長得讓人瞠目結舌，而且它的長度還在不斷增加。這場論戰結束幾年後，學術作品的發表情況，逐漸被納入專業評估和升遷的主要標準。

就的可靠標準，但是還算有效）。

經濟研究所最終放棄了這份改革方案。它沒有遵循改革方案的精神，調整自己的運作規範和程序，一切都和過去一樣。

另外一個需要提到的問題，是同事們如何為自己的人生，制訂學術發展策略。有些人認真地接受了西方學術標準的挑戰，他們堅持不懈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嘗試在國外發表作品，或者透過演講，讓西方經濟學家了解自己（事實上這些人非常少）。有時他們取得成功，有時卻不那麼順利。大多數同事都沒有加入這場競賽。社會制度變化後，我曾經和許多經濟研究所的同事，談論這個問題。他們那時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但是已經無法再彌補自己浪費了的大好光陰。

在層層禁令下執掌教鞭

我在第六章提及，1958年上級派遣了一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對經濟研究所進行調查。它的負責人拉斯洛·哈伊發誓說：「只要我是這所學校的校長，科爾奈就不可能在這裏教學。」他兌現了自己的諾言，而且他的繼任者，也遵守了這個決定。許多著名的海外大學，都曾邀請我到它們的學校裏工作，但是壟斷了匈牙利經濟學高等教育的學校——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Marx Károly Közgazdásagtudományi Egyetem，即MKKE）——在那幾十年裏，從來沒有向我伸出橄欖枝。我猜想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一定就這個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或者說至少肯定了這個決定：科爾奈可以從事研究工作，但是必須讓他遠離青年人。*

當時任職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校長的喬鮑·恰基，向我發出第

---

* 黨的領導人一定還記得大學生曾經在1956年10月的革命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努力將他們與那些可能對他們施加危險影響的學者隔離。政府允許很多在1956年後受到迫害的人到匈牙利科學院的下屬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被安排到大學教學。

一份職位邀請時，卡達爾體系正在迅速瓦解。下文是我在回信中寫下的部分內容：

我收到您的提議時，已經接受了哈佛大學的邀請。我非常感謝您對我的關注，但是我不得不說，這份邀請來得太晚。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知道如果貴校早些向我發出這份邀請，我的生活會走出怎樣的軌跡。可以說在我接受哈佛邀請之前的三十年裏，我無時無刻都在準備，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為貴校服務的工作中。……在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中，專門培養青年經濟學家的匈牙利學院，始終沒有邀請我前往執教，這讓我感到極其痛苦，也難以接受。MKKE既不願給予我教學的權利和相應的學術影響力，也沒有給我與青年人親密接觸的機會。這對我來說，是無可挽回的損失，是其它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3]

儘管我沒有正式接受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教師職位，但是仍然以其它方式，在那裏從事了教學工作。1968年，我被授予名義教授的銜頭。雖然這個銜頭，不能讓我像正教授那樣，對學校事務擁有一定的權力和影響力，但是我卻可以偶爾在學校裏，舉辦研討會或發表一系列演講。我連續三年牽頭組織了所謂的「特別研討會」。由於我沒有任何現成的範例可以借鑒，所以嘗試自己制訂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我每年都要緊張地籌備研討會中討論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多半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難題，我非常享受這項工作。時至今日，只要想起研討會的成員，我便會有許多快樂的回憶和溫暖的感覺湧上心頭。我希望自己開設的課程，像一劑學術「解毒藥」那樣，使學生盡量遠離官方教學大綱的毒害，因為這類教學大綱，往往機械刻板，而且死氣沉沉。我相信讓學生親耳聆聽具有實踐經驗的研究者的觀點，並且了解一些課本以外的非正統思想，對他們來說，有百益而無一害。我的目標並不在於傳授知識，而是要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許多參加了研討會的人，後來都成為優秀的經濟學家、教授和商業領袖。

我非常重視自己與勞伊克·拉斯洛學院之間的聯繫。勞伊克·拉斯洛學院成立於1970年，隸屬於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它的創始

人兼校長阿提拉·奇坎，把它打造成一個與匈牙利其它院校截然不同的學術場所。它向拉科西時代被解散的「人民大學」、匈牙利Eötvös Loránd大學的Eötvös學院、巴黎高等專科學校及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借鑒了許多優秀的運行模式，並且創新性地完善了這些模式。勞伊克學院的學生，都是從大學生中精挑細選出來的高材生。他們要在勞伊克學院裏，學習普通大學沒有開設的現代課程。這所學院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擺脫教條的束縛，並且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點從它邀請到學校發表演講的人員名單中，便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這份名單，包括了幾年前還被關在監獄裏的知名學者，以及「民主反對派」的領導人（這是七十年代興起的一個反對共產主義體制的組織）。

我曾經多次在勞伊克學院發表過演講，那裏的聽眾都專心致志地聆聽。由於他們都見聞廣博，所以如果我在學院發表演講時，正好又是在撰寫學術文章的期間，那麼我通常都會主動與他們分享，我在文章中提出的新觀點，藉此測試聽眾對它們的反應。

大多數西方的大學，都可以為申請博士學位的學生，提供相應的畢業培訓。我在第五章講述自己的教育背景時，已經解釋了採取蘇聯模式的國家，在這方面的程序是有所不同的。在匈牙利的教育體系中，「候選人」不能透過大學而獲得博士的同等學位——備選學位，而是要得到一個特殊的中央科研資格評定委員會（Tudományos Minösítö Bizottság，即TMB）的認可。委員會為候選人指定導師或「候選人負責人」，他們相當於西方國家的論文導師。此外，這兩種教育體制的另外一個重要差別，體現在畢業生是否可以自行選擇導師。在東方的國家，中央科研資格評定委員會根據許多標準（最重要的是政治標準），為申請學位的人指定導師。*

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執教時，擔任了許多畢業生的導師，但卻從來沒有在匈牙利指導學位申請者。1956年，我獲得了備選學位，

---

* 兩種教育體系在確定導師人選時，都要徵求導師本人的意見，即導師和「候選人負責人」必須同意承擔這個工作，指導學生申請學位。

根據當時的規定，我已經具有資格擔任「候選人負責人」，但是在其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中央科研資格評定委員會從來沒有邀請我承擔這種工作。如果用西方大學的術語來解釋這種情況，那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名畢業生，委托給我。

每當想到這些事情時，我便悲憤難平。在西方的大學裏，如果教授擔任了某位學生的博士論文導師，那麼他再提及此人時，便可以說「他/她是我的學生」。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必須承認我在匈牙利，找不到這樣的學生。不過某些經濟學家主動表示，他們受到了我的教誨，可以算是我的學生。這些說話，或多或少讓我感到一些安慰。

我如何成為院士？

匈牙利科學院一直仿效蘇聯的科學院模式所承擔著的多重職能。自從我在它下屬的研究所工作後，便算是科學院的正式工作人員。匈牙利科學院總共擁有上萬名的工作人員。

與此同時，匈牙利科學院還擔負著國家科學院的傳統職責，它宣稱自己是國內最優秀的學者組成的機構。但是如何衡量這些學者是最優秀的呢？它對院士資格的評定規則，與西方著名學府相仿：科學院的成員謹慎地對候選人進行前期評估後，便進行無記名投票，獲得贊同票超過投票人半數的候選人，便當選為新科院士。*但是我們有必要近一步觀察選舉程序的實際操作情況。我自身的經歷，可以作為範例，它清楚地展現這個過程。

只要仔細研究當時科學院的憲章，便會發現科學院院士，應該

---

* 科學院的院士分為兩個級別：通信院士(corresponding membership)和正式院士(full membership)。候選人必須克服重重障礙，才能獲得級別較低的通信院士資格，換句話說，必須有正式院士提名他參加評選，而且對他鼎力支持。不過一旦度過這個難關，接下來的步驟就非常簡單了。獲得通信院士資格的學者過一段時間後，便會自動轉成正式院士。

具備「最先進的世界觀」。*換句話說，它的成員，必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那些推薦我參加院士評選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標準。†我的「幹部檔案」中，清楚地記錄著我公開聲明自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且任何認真閱讀了我的作品的人，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七十年代初，科學院的院士首次提出我的院士資格問題時，我已經在國內，甚至海外，聲名顯赫。而且讓政府感到更尷尬的是，當時我已經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榮譽外籍院士，而且國際學術界，還以其它許多形式，表達了對我的認可。與此同時，卡達爾體系急於證明匈牙利的學術生活非常文明、高雅而且西方化。如果已經成為美國院士的匈牙利研究者，仍然沒有被匈牙利科學院接納，那麼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國際影響？所以如何解決我的院士資格，便成了刻不容緩的問題。

我將會在下文，詳細描述整個選舉過程，這樣便可以清楚解釋，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根據科學院的規定，選舉過程分為兩個階段。首先，負責相關學科的學部（例如我屬於負責經濟學、法律和其它社會科學的第四學部），通過無記名投票，確定提交院士大會討論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只要獲得簡單多數，便可以通過這一關。然後由全體院士參加的院士大會，對各部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再次進行無記名投票。院士大會的投票過程，只不過是走個過場，這些候選人，通常都會獲得壓倒多數的選票。因此真正的明爭暗鬥，發生在部門確定候選人名單的過程中。

---

* 匈牙利科學院院規第一款的第一段中，規定科學院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的基礎上」從事科研活動。

† 有些學者會主動申請參加院士資格評審。他們遊說學院的院士推薦他們當候選人，並且努力勸說其他院士為他投票。但是其他學者認為這種自我推銷的手法，並不可取。他們相信同事們會秉承職業道德來明辨是非。我就屬於後者。無論在這件事還是在其它榮譽上，我一向如此。七十年代那些推薦我參加院士評審的人，都是依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提出這些建議。

大多數院士都是黨員。眾所周知，各學部召開「正式」的候選人提名會議前，都要先召開黨員大會。這次會議決定了黨員應該給哪些候選人，投贊同票或否決哪些候選人。由於黨員人數在委員會中佔絕對優勢，所以最終是由黨員們決定，誰在院士評審中脫穎而出。

1973年，我第一次被提名參加院士評審，但卻以失敗告終。我沒有通過準備階段的評審，而且在第一階段便遭到了否決，即是在學部召開黨員大會，確定候選人名單的階段。我從現存檔案資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情況是，黨中央的相關部門，為政治局（黨的最高決策機關）準備了一份1973年科學院院士大會準備情況的報告。[4]其中詳細記述了黨員們支持，以及拒絕各候選人的原因。伊斯特萬·弗里斯支持對我的提名，但是絕大多數黨員（其中包括1956年後，從大學講壇上被趕下來的拉斯洛·哈伊）提出了反對意見。*政治局再三斟酌我的提名後，最終「沒有支持」它（即否決了它）。[5]

1975年，科學院再次把選舉院士的工作，寫進1976年全體院士大會的議程，各部門按部就班地開展了例行的準備工作。這次在本部門的黨員會議上，反對我的人，剛剛超過半數，但是已經足以讓黨員大會，再次拒絕我的提名。

與往常一樣，1975年10月，政府相關部門向黨中央彙報了1976年科學院院士大會的準備情況，其中專門談到我的問題。這份報告提到兩年前，政治局曾否決了我的提名，並且作出以下評論：「現在的形勢，從本質來說，沒有改變。」[6]這次政治局沒有馬上對院士的提名情況，作出決定，而是打算把這個問題，暫時擱

---

* 1975年科學院再次考慮讓我參加院士資格的評審時，黨中央相關部門的負責人米哈伊·科爾尼代斯回想起1972年我第一次參評時，他們聽到的對我的研究工作的評論。請允許我在這裏引用一段他在政治委員會上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他的名字時，我們聽到了針鋒相對的觀點。有些人稱他在專業上還有不足之處，沒有達到標準，或者閉門造車，脫離了實際。他們認為他在政治上極不可靠。」（MOL M-KS 288. f. 5/682. ö. e. 第3頁：會議紀要）

置在一旁。

在這之後，事情的發展，突然峰迴路轉。不久以後，科學院的經濟學與法律部(即第四學部)召開了全體成員大會，而且不僅包括黨員。我在前文已經解釋，根據科學院的規定，這次會議將確定學部向院士大會提交的候選人名單。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所有黨員院士，按照先前黨員大會上作出的決議投票(即每個人都給我投反對票)，那麼我絕不可能在無記名投票中，獲得絕大多數選票。但讓我意外的是，這次會議的投票結果顯示，大多數人都同意我的候選人資格。顯然那些在黨員大會上，沒有公開支持我的院士，在無記名投票的掩護下，違抗了黨的紀律，而且堅決地把贊同票投給了我。除了我以外，另外一名經濟學家(他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也獲得了當選必須滿足的多數票規定。

不過當時的形勢非常複雜：另外兩名受到黨中央支持的經濟學家，在無記名投票中，獲得的選票恰好是50%。根據科學院的規定，他們兩人都沒有獲得絕大多數選票，因此無法得到候選人提名。

負責科學院工作的共產黨官員認為，這個結果非常尷尬。政治傾向屬於可疑的科爾奈，獲得了多數選票，而兩名可靠的經濟學家，卻沒有當選。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非常嚴重，甚至無法透過科學院的正式會議，或者黨的中級管理層解決，而必須彙報給國家的最高政治機構——共產黨政治局。

1976年1月，政治局再次討論了科學院院士的提名問題，而且相關部門為此準備了新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的辯論過程中，提交報告的部門宣稱，他們廣泛調查了我的學術作品，不過這次他們得出的結論，對我卻非常有利。[7]最終雅諾什·卡達爾發表了以下看法(我逐字逐句地援引了會議紀要)：「就這些變化而言，我相信把科爾奈確定為候選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與政治素質的聯繫不大。我們不是在討論黨內職務的人選，或者入黨的問題，而是在討論科學院的問題。只要學術作品是積極向上的，那麼它們的作者，即使有些無足輕重的政治問題，也可以成為有創造力，而且對國家有用的科學院院士。所以他(科爾奈)沒有達到老黨員嚴格的意識形態標

準，不是拒絕接納他的理由。」[8]

這件事情就此塵埃落定，現在我的院士資格，可以透過學院的正常程序，順理成章地得到確認。

不過黨中央仍然認為，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實現平衡。科學院的規章制度，不得不屈服於黨的命令。兩位只獲得50%支持率的學者，也被列入院士大會的候選人討論名單。黨認為只要有三位可靠的學者與科爾奈一起成為新院士，便可以滿足他對平衡的需求。事實上，現實情況也是按照這個思路發展的：1976年，四名經濟學家，成為科學院新當選的通信院士。

這就是科學院如何利用至高無上的無記名投票制和公正的規章制度，在七十年代維持自己的自主權。和社會生活的其它領域一樣，對學術成就的認真評估和共產黨行使權力的欲望，在院士的評選過程中，混雜在一起。根據政治標準選拔人才的做法，給科學院的人員組成，打上了清晰的印記，時至今日，我仍然依稀可以感覺到它所造成的後果。

我的親身經歷，就像美國內閣，就某位教授是否能成為國家科學院，或者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而爭執不下，最後必須由總統一錘定音——這是一個多麼荒謬可笑的程序。

這個事件不僅說明科學院的自主性被大大削弱，而且反映出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卡達爾願意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某些典型的讓步。他和他的手下，並不畏懼偶爾作出讓步。允許我當選院士，便是最好的例證（也許一些桀驁不馴的黨員，正是抱著這種想法，在無記名投票的掩護下，公然違抗了黨的紀律）。與此同時，他們希望把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這種妥協，是在「獨立」機構內實現他們的政治願望時必須滿足的形式上的條件，那麼它換來的，應該是絕大多數人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

院士的特權

在共產主義體系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屬於特權人群。他們的

工資遠遠高於大部分人，並且享有許多特權。

院士在蘇聯的地位更高，他們的級別和聲望，都超出匈牙利院士在本國的情況。我當選院士後，不久便收到蘇聯科學院邀請我訪問莫斯科的信函。一些了解我的學術作品的蘇聯朋友，希望見到我本人，因此向蘇聯科學院推薦了我。我到達莫斯科時，沒有任何人員在機場等我，我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下榻的賓館，這個尋找的過程，的確非常困難。第二天，我房間裏的電話響起，蘇聯科學院的國際部透過電話，向我致以深深的歉意。我到達機場那天，他們本以為我不過是個「理科博士」，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我已經被評選為院士。他們請求我原諒他們沒有派車到機場接我，其後我在莫斯科訪學期間，他們為我配備了專車和司機。

院士銜頭在匈牙利也受到很大重視。幾年前，我還沒有當選為院士時，全家搬到了一個更寬敞的公寓裏，許多生活條件都很便利，但唯獨是沒有電話。現在手機已經成為許多年輕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很多互為競爭對手的電信公司，拼命誘使他們多撥電話，所以他們或許很難想像，在過去那個年代裏，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待安裝電話意味著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有時個人關係也許會發揮一些作用。1975年時，我已經調回經濟研究所，我請求所長雷熱·涅爾什幫我安裝一具電話，因為不久前，他還是大權在握的黨中央書記，任何從事經濟工作的人，都會重視他的話。他諮詢了電話安裝方面的專家和他在郵局裏的熟人，給我提了以下的建議：我直接跳越排在自己前列長長的隊伍安裝電話的時機還不成熟，我應該等待自己的級別再上升一個臺階，成為匈牙利科學院的院士後，才再提出申請。我聽從了他的建議，我成為院士後，雷熱·涅爾什又給他的熟人通了一個電話，沒過幾天，安裝電話的技師便出現在我家中。

這些特權使我陷入道德上的困境。我心中的情感非常複雜，我知道其他許多同樣應該享有這些特權的優秀研究者，或者知識分

子，並沒有享受到與我相同的福利條件，我因此忐忑不安。*我認為自己沒有以令人不齒的方式獲得這些物質利益。那些努力使我評為院士的同事，打從心眼裏欣賞我的學術成就。我相信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伴隨匈牙利科學院院士銜頭而來的各種特權。

* 我與西方同行交談時，經常發現他們極其嚴重地誤解了東歐國家的院士享受到的物質特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根據西方的標準，院士的生活水平一定非常高。但是這與實際情況出入非常大。即使在院士的工資有所提高後，他們的工資水平與西方學者相比，仍然微不足道。我寫文章時，經常住在專為學者和科學家提供的研究所，它們的設施水平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兩星或三星賓館。在相同的處境下，西方大學的教授完全有經濟能力自己支付更加奢侈的住宿條件。儘管他們享受不到公車到機場接機的特權，但是卻可以輕鬆召喚到出租車並且支付車錢。他們也不用為了避免等待很多年才輪到自家安裝家用電話的情況而被迫走後門。

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院士，與其它特權人士一樣：他們所享受到的物質特權，只是以研究者較低的平均生活水平為參照而已。對我而言，學術地位的提高讓我享受到的最大益處，是政府多多少少放寬了對出國的限制（儘管沒有完全消除這種限制）。

12 尋路之旅和準備工作：1971–1976年

《急進增長與和諧增長》

《非價格控制》

1971年，我出版了《反均衡論》，在那之後的六七年裏，閱讀學術書籍、辯論、我自己對許多課題的研究、旅行、作為家庭的消費者，以及修建自家房屋時直接觀察到的情況，為我帶來了無數次學術衝動。如今回顧那段日子，我認為正是它們，幫助我醞釀了1976年，開始動筆寫下全面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專著。我的很多親身體驗，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後半生。而且，在我後來發表和出版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如今我把《反均衡論》出版後的那段時期，看作一個準備期，為我多年後所寫的學術專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1年時，我甚至沒有想到，自己會寫下一本關於短缺經濟的專著。我寫這本自傳的目的，是要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以內省的方式，展示我的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創新性成果、我如何贏得人們的認同和理解、或者我為什麼會突然陷入死胡同。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會把許多學術事件和後來出版的作品，一一對應起來詳細解釋。

與本書其它章節不同，我不會按照邏輯次序安排本章的內容。把許多先後發生或平行進展的事情連接在一起的內聚力，是它們的最終結果——我於1980年完成的學術專著。在那幾年裏，匈牙利經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1968年人們豪情萬丈地開始進行改革，然而由於政治平衡一度向反對改革的勢力傾斜，所以這場社會變革運

動，到了七十年代初，便偃旗息鼓，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政府對學術和意識形態生活，採取了相似的做法——恢復許多過去的限制措施。當然，在生活環境直接對我產生衝擊的同時，其它動力，也為我的思想，帶來了永久性的影響。

經濟增長：急進增長還是和諧增長

1971年，荷蘭教授簡·丁伯根邀請我到鹿特丹大學發表De Vries演講。丁伯根與挪威的拉格納·弗里希，分享了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廣博的學識和超群的天賦，與簡單、謙虛和真誠等美德，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也許我在他身上發現的唯一缺點，就是他相信別人和他一樣理性、誠實而且無私——這種想法近似於幼稚。

和以往一樣，這樣一個代表了極高學術榮譽的邀請，讓我感到非常緊張。我覺得自己應該提出一個新的演講主題。當時我一直在研究制訂長期計劃的可能性，而且參與了許多關於經濟增長策略的辯論。因此我從增長理論的領域中，選擇了在荷蘭發表演講的題目。[1]

我用一個類比開始了自己的演講：「有一個人穿著衣料華麗的襯衫，打著漂亮的領帶，還穿著精緻的夾克，不過卻穿了一條舊褲子。雖然勉強還能看，但更糟糕的是，他還穿了一雙腳底滿是洞的襪子。這個人的衣著打扮，必然給人們留下很不協調的印象。」[2]一個國家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不均衡時，也會給人們留下同樣不協調的印象。我的演講尖銳地批判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這個理論力圖掩飾和扭轉已經出現的嚴峻問題：強制增長導致發展不均衡及發展不和諧。我在這次演講的題目中，使用了英語單字「rush」(急進增長)，這也許比「強制增長」更形象化。匈牙利工業正在不顧一切地向前突進，希望盡可能提高它的經濟增長率。這在重工業方面，表現尤其突出。而它為這種急進增長付出的代價，就是犧牲生活水平，建築、機械、設備和道路等國有資產的保養維護，以及醫療和

教育體系、環境保護和應對不時之需的儲備。

我後來拓寬了這個演講的內容，把它寫成專著，並把書名定為「急進增長與和諧增長」。這個演講反對了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阿爾伯特·赫希曼和保羅·斯特里恩的理論——他們明確支持不平衡發展。[3]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存在薄弱環節，或者遇到短缺和非均衡條件時，反而具備了特別優勢，因為這將促使懶散的國家，重建合理的經濟發展比例和均衡狀態。然而，我自己對社會主義經濟痛苦的親身經歷，證明這種非均衡導致的危害，遠遠大於其益處。*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弊病，並不在於它們會造成慣性，而是恰恰相反，它們導致宏觀經濟過度活躍——投資速度被迫不斷加快。我在書裏談到了扭曲的急進增長，與廣泛的短缺之間的聯繫，雖然當時我還沒有對這兩個現象，進行充分的因果分析。

在對急進增長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我還跟許多學者合作，使用動態模擬模型，分析自己積累的匈牙利經濟統計數據。當時我剛剛開始認識到，計算機模擬技術是一種靈活的研究方法，非常適用於經濟分析。有一種被我們稱為「計劃探測」的計算方法，啟發性地描繪了不和諧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危害——其中最顯著的危害，是導致國家忽視基礎設施。†

劍橋大學的邀請

1971年，我到日內瓦參加會議時，再次遇到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斯通。1963年，我第一次到英國時，便曾經與他有一面

---

* 我的書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語言。不久前我再次訪問中國時，在談話中重新提到了這本書中的分析內容。在過快和過熱的經濟發展中，伴隨它產生的往往是許多可怕的後果和社會損失，而且一面倒的「增長狂熱症」也表現得非常顯著。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強調和諧增長。

† 在這項研究中，我的合著者包括我的妻子蘇莎·達尼埃爾、安娜·喬納和貝洛·馬爾托什。

之緣。*他私下裏和我深談了一次，而且明確告訴我，他非常希望能邀請我，永久性地在劍橋大學任教。當時劍橋經濟學研究中兩個派別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不斷升級。一派是以弗蘭克·哈恩為首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派則是這種研究方法的反對者。他們的學術領袖是瓊·羅賓遜和我的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爾多（後來卡爾多被授予男爵爵位）。斯通試探了很多同事的意見，當時他了解到的情況是，這兩派都會很高興地看到我在劍橋大學執教，因為這有助於緩和當時緊張的氣氛。所以他主動邀請我擔任劍橋的教授，不僅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也代表了同事們的願望。

劍橋大學！它被視為經濟學家的精神堡壘。凱恩斯曾經在這裏從事研究工作和教學，也是我第一次親身體驗西方學術界的地方。它那擁有幾百年歷史的優美校園、遍地鮮花的公園，以及靜謐的河堤，都讓我沉醉！這是我第二次移居國外的機會，但是現在的形勢，顯然與1956年至1957年期間不確定的局勢和大規模的移民潮，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情況是十五年後，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向我拋出了橄欖枝，邀請我擔任終身教授。

我希望斯通給我幾天時間考慮這個建議，我並且徵詢了妻子的意見（她也參加了這次大會）。我再三斟酌後，真誠地感謝斯通給我這種殊榮，但最終還是婉言謝絕了。我會在本書的後半部分，詳細講述我為何在移民的問題上，左右為難。我在這裏提到這件事，只是為了向讀者交代它發生的時間而已。

---

* 斯通不是坐在象牙塔裏醉心於抽象理論的學者，與此相反，他對能夠直接指導實踐的研究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率領的團隊設計了獲得聯合國認可的經濟核算和統計體系，從而確保了國際經濟數據的統一性和可比性。幾年後斯通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外，他不僅全身投入學術工作，而且非常懂得享受日常生活的樂趣。他的衣著極其考究，而且熱愛美食和美酒。他擔任了許多社會職務，其中最讓他引以為傲的是出任國王學院「美酒委員會」的主席。學院授權這個委員會為學校的酒窖選擇需要購買的酒類。

從肩部到腰部打滿了石膏——凱恩斯和赫希曼

1972年，我的雙肩脫臼的次數，越來越頻繁，疼痛難忍。醫生經過診斷後，認為只有通過外科手術，才能使我從這種痛苦中解脫，所以1972年初，我做了兩次肩部手術。手術完成後的幾個星期，我的整個身體軀幹，都被裹在石膏裏，行動嚴重受到限制。*在這種狀況下，最適合讀書。我住在一個塞滿病人的十人病房裏，空間非常狹小，甚至連椅子都放不下。醫生允許我起床後，大多數時間我都是坐在走廊上讀書。待我的病情好轉一些後，我辦理了出院手續，在家休養。到醫院和家裏探望我的朋友，都驚訝地發現，我手裏拿著的不是娛樂性的犯罪小說，而是凱恩斯的基礎性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許多年前（即1957至1958年），我還在自學「大學課程」時，便學習了許多關於宏觀經濟學的知識，但後來它們都被湮沒在記憶的深處。我重讀凱恩斯的作品後，認識到匈牙利的短缺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凱恩斯描述的非均衡經濟的鏡像。凱恩斯認為失業，是凸現並且證明資本主義弊病的顯著現象。而我的分析結果顯示，短缺綜合症從相反的方向，發出了相似的信號。在凱恩斯描述的經濟情況中，買方與賣方的交易，受到需求的限制。生產者希望以既定的價格，生產出更多產品，但是需求卻不足夠。我力圖描述和解釋的經濟情況，恰好與上述經濟形勢，形成鏡像：買方和賣方之間的交易，受到供給的限制。消費者希望以既定的價格，購買更多東西，但是供應卻不足夠。

另外一部對我產生深刻影響的作品，是阿爾伯特·赫希曼所寫的非常精彩的小冊子《退出、呼聲和忠誠》。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簡單

---

* 當時我看起來非常怪誕。我回家時和我同乘電梯的孩子一看到我就大哭起來。我的一隻胳膊在肘關節處彎曲，水平地伸向前方。我的兒子加博爾天性幽默，他開玩笑說我的胳膊可以做一個完美的褲架，甚至在我的胳膊上搭了一條褲子看看效果如何。

的例子，來解釋他的基本觀點。一個飯店的常客，總是對飯店做出來的菜不滿意，那麼他該怎麼辦？他要麼向經理投訴（即**發出呼聲**），要麼選擇到另一家飯店就餐（即**退出**）。即使當他受到後一種可能性的引誘時，長期在這家心儀的飯店就餐，與它形成的關係（即**忠誠**），也可能阻止他離開這家飯店。

現實生活中，存在許多與此相似的情況。消費者對經常光顧的商店不滿，股民對某隻股票不滿，學生和家人對學校不滿。誰會聽取他們的抱怨，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呢？發出聲音是否會帶來風險？退出可能實現什麼目的？人們是否可以退出？赫希曼提出了這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引導我直接面對短缺經濟的弊病。如果大量菲亞特和雪鐵龍的客戶，開始抱怨汽車的質量不佳，那麼這必然會引起它們管理層的關注。假如這些客戶，一言不發地轉身便去購買豐田或大眾的汽車，那麼菲亞特和雪鐵龍公司便會更加恐慌。但是特拉貝特*和斯柯達†的工廠，會在乎用戶的投訴嗎？如果它們的用戶，需要經過很多年的排隊等待，才能買到汽車，那麼它們根本不用擔心客戶會「退出」。在長期處於短缺狀態的經濟體系中，人們無法有效地發出呼聲，也不能用退出來威脅廠家。即使你不喜歡短缺，也只能勉強將就。

赫希曼強調，呼聲和退出，都可以被視為信號，而且在幸運的情況下，往往能得到反饋。如果這個機制能正常運轉，那麼這些信號，便能夠促進經濟狀況不斷完善。而只有當兩種信號，都能自由而且有效地發揮作用時，經濟體系或子體系，才能高效運轉。

赫希曼的觀點，不僅適用於經濟範疇。他自己也提到了在斯大林主義下，共產黨員的危險處境。他們既不能對黨內的根本性問題，發表意見，也不能主動退黨，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招致殘酷的報復。這種扼殺反饋的做法，導致該黨的思想僵化，而且逐漸衰退。赫希曼的觀點，還可以用來論證人們在移民問題上的兩難處

---

* 譯者注：前東德的汽車品牌。

† 譯者注：捷克的汽車品牌。

境。人們應該留在國內表達自己的不滿，還是選擇退出（即用移居海外的方式，表示抗議）？

當時，我只是通過阿爾伯特·赫希曼的文章，了解了他。十年後，他邀請我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時，我們才第一次見到對方。赫希曼的原創性思維、遠離主流思潮的態度、令人眩目的博學，以及對於文獻資料的爛熟於心，讓我如醍醐灌頂般獲益良多。

我提前出院，是為了參加慶祝母親八十歲生日的家庭聚會，當時我的肩部以至腰部，依然打著石膏。穆約一直激動地盼望著這一天的來臨，而且有些擔心自己，是否能夠等到這一天。書中的照片，記錄了所有家庭成員，滿懷愛意地簇擁在她身邊的那一刻。幾個月後，她安靜地睡了，再也沒有醒過來。在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我們經常見面，而且每天都會通電話。當我一想到，再也無法聽到她興高采烈的聲音時，心中的痛苦，便無以言表。我還記得，她曾經用極其仰慕的口吻，談及給家人治病的醫學博士，而且把他們稱作「著名教授」。穆約認為「教授」的級別，較任何國家能夠給予個人的財富和地位，都高出很多。遺憾的是，她沒有親眼看到自己的兒子，成為教授，也不能到美國來看望我們！她原本可以坐在公寓旁邊自己最喜歡的咖啡館裏，一面小口喝著咖啡，一面驕傲地向她的老朋友描述這些經歷。

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

我手術康復後，和妻子在美國遊歷了整整一年。*遊歷的第一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我在那裏停留了一個學期†，而且饒有興趣地觀

---

* 我曾經在前文向讀者保證，決不會濃墨重彩地描述自己的旅行過程以免使他們厭煩，我一定會恪守自己的諾言。我在這裏和書中其它地方提到出國旅行時，都不會從遊客的角度來描述它們，而只是講述與其相關的學術事件和政治體驗。

† 回顧在普林斯頓的生活，我非常感謝同鄉理查德·匡特教授的真誠好客，以及溫暖友愛的幫助。匡特發表了許多家喻戶曉的微觀經濟學著作。

察了在那裏主修經濟學專業的各種年輕學生。許多來聽我講課的歐洲學生，都深入地思考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各種不足之處，他們非常歡迎以福利國家為方向、不斷完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主張，因此對計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作為在計劃經濟體系內部研究計劃經濟的學者，我對計劃產生的印象，對他們來說，尤為有趣。我非常高興有兩位與我私交不錯的學生，後來在事業上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在安德雷斯·帕潘德里奧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盧卡·卡采里在八十年代初，擔任了希臘計劃辦公室的主任，現在成為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中心的主任。另外一名學生卡邁勒·德爾維什，則成為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後來被召回土耳其，處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那段非常艱難的歲月裏，他臨危受命，出任土耳其的財政部長。現在他在聯合國最大的扶貧機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擔任署長。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宿怨，由來已久。各種原因都可能導致它們之間，突然爆發衝突。然而在超越國家的學術世界裏，希臘和土耳其學生，以及他們的妻子之間，卻可以建立起真誠的友誼，這讓我們感到非常安慰。

盧采里、德爾維什和其他許多持相同觀點的學生，非常贊同左派引進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改革的觀點，但是他們不希望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或者用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共產主義體系下，那些可怕的問題，對他們產生的威懾作用，足以阻止他們接納革命的方法。普林斯頓的學生中，還有一個自稱為「激進經濟學家」的派別。他們認真研讀了《資本論》——不過，也許不如我二十五年前刻苦學習《資本論》時理解得那麼全面。他們了解我的身份，以及我的生活背景，而且知道我的課堂上，經常討論**現行**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的問題。*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沒有一個人來聽我的課。不過有一次，他們邀請我們參加一個關於自我修養的課外聚

---

* 許多東歐學者以嘲笑的口吻使用「現行的」這個形容詞，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描述，所以會直接使用這個詞語而不加雙引號。社會主義仍然存在，我們討論的是它的現狀，而不是社會主義擁護者心目中的理想狀況。

會。看起來他們都是擁有真誠的信仰，而且幼稚善意的年輕人。

我所掌握的，不僅是對東歐生活的親身體驗。1968年，我到美國新左派運動的發源地加利福尼亞旅行時，逐漸了解新左派的觀點。我們經歷了1968年的巴黎學生暴動，並且在包括布達佩斯在內的許多歐洲城市，遇到各色「新左翼分子」。我反復與他們進行爭論，有時非常耐心，有時也會惱羞成怒。他們反對「電冰箱社會主義」的言論，讓我煩躁不安。因為，匈牙利的短缺經濟才略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也才剛有提高，消費者終於有機會買到過去很難買到的商品。我認為向擴大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邁進，並不等於背叛崇高的原則，而是常識的勝利——經濟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那時我讀到瑞典經濟學家阿薩爾·林德貝克新近出版的作品《局外人談新左派的政治經濟》。它簡練詼諧地，總結了新左派的觀點，和與之相對的自由主義觀點。

在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年輕「激進分子」之前，我便嘗試總結自己的觀點，而且試圖說服他們，但是沒有成功。他們強調，問題的關鍵，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缺陷，而是蘇聯和其它東歐國家，**沒有正確地應用**這種制度。人們需要做的，是以合理恰當的方式使用社會主義理論。這次在普林斯頓與激進分子的會談，以及在其它發達國家與新左派成員的多次接觸，證實了我在本書前幾章中，透過自我反省得出的推論：信仰的力量較理性思考的力量更強大。擁有深刻、強烈的信念的人，通常需要經歷極具震撼力的事件——即受到足以動搖其信仰基礎的巨大衝擊——才會徹底改變自己先前的觀點。

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學期間，我的三個孩子——加博爾、朱迪特和安德拉什，輪流陪伴我們在美國生活了六個月。作為老師，我了解了美國、希臘或土耳其學生，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而作為父母，我們清楚地看到三個匈牙利年輕人，第一次接觸美國生活時的情景。當然，所有孩子對事物的體驗，因為性格差異而有所不同，但仍然表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和其他遊客一樣，紐約的摩天大樓、

畫廊和普林斯頓大學美麗的校園，都讓他們嘆為觀止。在這裏，我只想從研究短缺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學者的角度出發，描述我認為他們最典型的反應。在剛到美國的前幾天裏，他們吃飯和喝飲料時，經常狼吞虎咽，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匈牙利的孩子，在國內享受不到的。在他們三個中間，有的難以抵擋冰激凌，或者一種被稱作「胡椒博士」的飲料的誘惑；有的貪婪地往肚子裏塞滿了玉米片；有的驚奇地發現美國有無數的電視頻道，永無休止地播放各種電視節目，所以他們粘在電視屏幕前，一步也不願離開；有的對搖滾樂和著名音樂家，感到好奇，而且他們還可以到很多人參加的現場音樂會，聽聽音樂。安德拉什和朱迪特在普林斯頓的一所高中，上了幾星期課；加博爾在耶魯大學的一個學院裏，度過了幾周。他們認為學校生活中，最有價值的體驗，是學校為學生提供了非常廣闊的選擇範圍，這一點遠遠超過匈牙利的教育制度。第一次零距離接觸美國生活方式，對三個孩子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以致他們回到匈牙利後，需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適應匈牙利的生活。在他們成年後，這一次經歷對他們積極的學術表現，其影響更加明顯。如今，他們和我們（即他們的父母），都認為第一次去美國生活的經歷，幫助他們解放了思想，並且幫助他們建立起崇尚自由的價值觀體系。

在即將結束對1972年普林斯頓大學生活的回憶時，我希望再補充一段小插曲。1974年，普林斯頓大學與劍橋大學，同時邀請我擔任該校的正教授。[4]雖然這兩所著名學府的環境，非常相似，普林斯頓的校園和牛津、劍橋一樣，擁有令人回味的美麗建築和精巧的花園，這對我的吸引力很大，但我仍然婉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繼續在斯坦福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遊歷

我們在斯坦福大學度過了1972–1973學年的下半學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個月，但它們使我的人生閱歷，更加豐富。我們不僅與肯尼思·阿羅、阿蘭·曼恩和傑姬·曼恩的關係，日益親密，而且與蒂博爾·西多夫斯基及其妻子伊麗莎白，也相處甚歡（1970年我們曾

經在耶魯大學見面）。在這段日子裏，我們從普通的學術關係，逐漸發展成溫暖深厚的友誼。

蒂博爾在匈牙利出生和長大。他的父親是公共生活和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經擔任外交部長，和匈牙利最大商業銀行的行長。他的父親思想非常保守，蒂博爾雖然尊重父母，但很快在世界觀方面，與他們產生很大的分歧。他是一名堅定不移地同情窮苦人民和弱勢群體的自由主義者，尤其關心那些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情況。他積極地支持和捍衛自由主義，希望改善這些群體的生活，和促進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

我和蒂博爾在斯坦福大學裏，進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那時，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蒂博爾高貴優雅，而且經常充滿活力。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的精髓，在他的身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有一次我們在聊天時，談到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雖然生活富裕，但是卻無法真正地享受生活，譬如他們不經常看戲劇或聽音樂會。他們喜歡「快餐」，而不是更加美味或健康的菜肴。幾年後，蒂博出版了《無趣經濟學》，以科學分析和統計數據為依據，精彩地描述了這些批判性的觀察結果。*

不幸的是，在1973年我們的談話中，沒有涉及到對市場運作的分析。我完成《短缺經濟學》的幾年後，才發現我們的觀點，有著重要的交匯點。我們兩人，都研究了買方和賣方之間**不對稱**的地位（這與常規研究方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常規的研究方法，傾向於認為交易雙方，就像彼此的鏡像一樣，完全對稱）。西多夫斯基在很早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區分了價格接受者與價格制訂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他們不同的行為，從而闡明了買方–賣方不對稱關係中的重要一面。1973年時，我完全沒有留意到，蒂博爾已經把這種區分，引進經濟學研究，而他自己也因為過於謙虛，沒有提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們在談話中，從來沒有涉及到這個領域。

---

* 這本書出版於1976年，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裏，人們在克服美國的消費扭曲問題上，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這個學年即將結束時，我和妻子到華盛頓旅行了一個月。很多年後，許多東歐人才相繼在這個城市的國際金融機構，擔任要職，但就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個早在1968年，便在世界銀行的研究部門工作的東歐經濟學家。這項工作，要求我與被共產主義國家斥為帝國主義機構的研究所，進行開放式合作。我為世界銀行所寫的兩篇文章，都被選用，而且我公開宣稱，自己是受世界銀行的委托而寫下了這兩篇文章。

水門事件爆發時，我們恰好在華盛頓。當時我已經相當了解美國的內政。很久以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便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這兩份報紙上的佚名評論，都以簡潔清晰的邏輯性見長，他們以可靠的信息為依托，從中表達出自由主義的觀點，讓我感到頗為親切。除此以外，報紙上的公開辯論和針鋒相對的觀點，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共電視臺播放的晚間新聞，同樣讓我肅然起敬(這些電視臺通常受到私人捐贈的資助)。譬如著名的電視新聞節目MacNeil/ Lehrer News Hour，經常把客觀的新聞報道與辯論，結合在一起。如果辯論的主題與國內政治有關，那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便會肩並肩地坐在一起，分別闡述自己的觀點。如果辯論的主題涉及印巴衝突，那麼兩國的駐美大使，便會出現在電視臺上。人們可以聽到來自各方的相互對立的觀點，而且他們會使用文明的方式，駁斥對方。主持辯論的人，不會表明自己的立場，而是把所有敏感的問題，悉數引導出來。我從他們對日常新聞的評論中，學會了言論自由及辯論文化的真正涵義。對我來說，這就是我接受到的所有民主教育。*

---

* 我從不看小報或沒有價值的電視節目，但是我全盤接受美國出版界和電視界的精髓以及新聞業的高標準。不過我很快發現美國媒體表現出來兩種極端的情況，而且它們交織在一起，難以分割。新聞自由允許新聞界報道很多高水平的演講，或者強烈批判現任政府，但是它也打開了文化垃圾的防洪閘。不幸的是，這兩類新聞如孿生兄弟一般共生共滅。新聞自由與市場經濟和貿易的自由密不可分。生產及銷售劣質文化產品，無疑提供了巨大的商機。

所以水門事件被披露時，我已經非常了解自由新聞的工作流程。但是即使在這個自由新聞的精神，已經深深地紮根於文明社會幾百年的國家裏，當不受人民歡迎的總統，隨意嘲弄權力和自由，而且被一份普通的日報抓住把柄時，這仍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華盛頓郵報》像獵犬一樣，沿著線索追蹤下去，進一步揭示了真相。而在匈牙利，官方評論員和消息閉塞的無黨派知識分子解讀這件事件時，聲稱尼克松是因為對待中國和蘇聯的僵化態度，有所放寬，才遭到極端反動分子的攻擊。與他們不同的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可以從美國內部觀察，了解事態發展的整個過程。攻擊尼克松的並不是反動分子。那些希望促請尼克松下臺的人，都是極度希望，從專制而且瘋狂追求權力的總統手中，挽救民主和人權。總統對任何人都心懷戒備，而且使用的手段，經常游走於法律的邊緣。人們攻擊總統，不僅是因為他在選舉前，採取了非法行動，而且也因為後來他試圖隱藏證據，並且教唆參與者和證人做偽證，來掩蓋他的罪行。我們目瞪口呆地坐在電視機前，對事態的發展，十分關注。那些議會的調查和證人的證詞，就像驚險小說中的內容一樣，非常刺激。

水門事件還未塵埃落定時，我們便已經離開了美國。回國後，我們聽到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尼克松終於自動辭職下臺。

自主控制

繼《反均衡論》出版後，我在七十年代初，開始與同事貝洛·馬爾托什、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和蘇莎·卡皮塔尼合作，為這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建立數理模型。*1973年，我與貝洛·馬爾托什，首次就這個主題，共同發表了文章——《經濟體系的自主控制》。1973

* 我在這部分刻意使用了第一人稱複數形式，因為我在這裏概述的，是從事這項研究的整個團隊的觀點。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在2003年發表的文章中，將這股研究潮流稱作「匈牙利控制理論流派」。

年，它被翻譯成英語後，發表在《計量經濟學》上。[5]

我們以人體神經系統作比喻，提出了經濟體系自主控制的觀點。就人體而言，中央神經系統負責處理較高級的控制工作，而呼吸、咀嚼和血液循環等較簡單的工作，則由心臟、肺、胃、腸和腎的自動完成，它們受到自動神經系統的控制（匈牙利語和某些語言，形象地把其稱為「植物神經系統」）。經濟體系中，也有類似的勞動分工。許多具有重複性，以及可以獨立完成的控制工作，都是由非常簡單的機制完成。

這篇文章，首先概括地說明了「自主控制」的內容，然後提出了一個例子，用數學形式詳細地把它解釋，即根據存貨水平發出的信號而進行控制。我們可以以超市的日常營運為例：人們不能等到需求或供應過剩時，才提高或降低產品價格，或者等到利潤率擴大或縮小後，才再更換存貨訂單。只要觀察存貨的變化情況，便可以實現這些目的。如果某種產品的存貨量下降，那麼超市便有必要增加它的定單。反之，如果它的存貨量上升，並超過正常水平，那麼便應該等到存貨量下降後，再補充存貨，以此類推。人們在商場中習慣的做法是，觀察存貨量的升降情況，這樣便可以順利地為顧客供貨，而不用依靠價格，發出信號。

我們研究了各種信號。另外一個重要的非價格信號，是訂單的存量或相關信息，即等待拿到貨物的隊伍排了多長。每條隊伍都有一個平均值，或者說「正常」長度。如果排隊等待某種產品，或者服務的隊伍，長度超出正常水平，那麼便需要增加它的供應量。如果等待的人過少，那麼便應當把生產這種產品所需的資源，部分調配到排隊等候的人數超出正常水平的產品那裏，以便生產出更多人們需要的產品。*

我們可以從這些觀察結果中，得出許多結論。

---

* 我在《短缺經濟學》裏，提出一種值得注意的非價格信息：「災難」信號。有時人們沒有及時作出決定，直到出現棘手的問題，並且災難性的後果接踵而至時，才採取行動。

許多作者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描述，讓人們感到似乎所有調控，都集中在中央。這是一種站不住腳的假設。也許一個體系可以高度集中，但是許多過程，仍然由上文描述的自主控制體制，以分散的方式進行控制。

然而這種自主分散體系，不能確保實現資源的有效分配。它無法推動技術發展，也不能適應人們對新產品的需求。對於能夠推動技術發展，並適應人們對新產品需要的控制功能來說，它的基本要素，是反映資源相對稀少程度的價格，以及與價格、成本和利潤息息相關的激勵措施。自主控制，只能協調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技術和現有的投入–產出，以及供求組合。你可以認為，它只提供了基本的生產協調。它以保守的方式，實現這種功能，只能重複或者再現過去的模式。換句話說，它是一種有限的經濟運行方式。

這項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生存能力」。* 我們的目的，在於探索為什麼儘管社會主義體系，扭曲了價格和激勵機制，但是仍然可以一天天繼續運轉下去（請允許我預先講述一些後文發生的事情，社會制度發生變遷後，普通百姓，甚至許多專家，都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崩潰，是因為它「無法運轉」。這種論調雖然聽起來很解氣，但是卻根本站不住腳。這個制度的基本程序，自始至終都在「運轉」。人們每天照常到單位上班，商店滿足了顧客的購物需求，學校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醫院不斷在救治病人等等。不過這個制度的運轉並不順暢。它的許多功能都失常、支持者失去信心和無法抵擋外界壓力等因素，不斷削弱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我們可以找到其它許多導致其崩潰的因素。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個制度滿足了「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僅僅分析中央計劃指令，或者專政統治的懲戒力，還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自主控制，成了解答的關鍵所在。

---

* 效率和最優性是體系生存的條件，但是這種結論不能倒推過來。缺乏效率和最優性的體系仍然可能生存下去。

儘管我們在這裏，集中注視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裏的自主控制，但是它的研究結果，絕不僅僅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範疇。**所有**經濟體系中，都存在自主控制：它幫助所有經濟體系，實現了絕大多數原始，而且基本的控制功能。

我們建立部分模型的出發點，是經濟體系的某些基本控制程序，在某種程度上，它與家用中央暖氣系統的調節機制相似。人們通過自動調溫器，設定理想的平均溫度。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溫度稱**為標準溫度**，當房間裏的實際溫度，高於標準溫度時，加熱的開關自動關閉，溫度開始下降；而實際溫度低於標準溫度時，加熱的開關再次打開，溫度開始上升。我們把這種操作過程，稱作根據標準進行控制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經濟過程，也是由類似的機制所控制(事實上，這種過程在社會的非經濟範疇中，也非常普遍)。我們沒有研究人們如何制訂標準——但是只要存在標準，根據標準進行控制的機制，便具備**可行性**。

現有許多經驗都足以證明社會中確實存在標準，而且社會使用各種手段，把偏離常規的個人或者機構，拉回到標準的運行軌道上，或者至少讓他們接近標準。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無法容忍那些不按常理「出牌」或行為出格的人。但是我們相信在其它體系裏，這種現象更加普遍，而且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們首先把這些研究成果寫成文章，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後來它的內容不斷被擴充，並於1981年，出版了專著《非價格控制》。[6] 因此我有必要對這項研究反思的結果(這個反思過程持續了近十年)，稍作總結。我們並非不滿足於刊登這些文章的期刊的學術聲譽，它們都是高級數的核心期刊，而且《非價格控制》被收錄進著名

---

* 現實中還存在另外一種自主控制機制。在這種機制中，人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變量的活動，被局限在體系容忍限度的上限和下限之間。波蘭裔法國研究者伊琳娜·格羅斯費爾德，對這種在容忍限度內運行的體制，建立了數理模型。這個機制不僅廣泛存在於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和社會行為管理方面，也屢見不鮮。

的出版社North-Holland出版，並且是享譽學術界的「綠色系列」*。[7] 然而，我必須說，從開始從事這項研究的第一天起，我對它的期望，便遠遠高於現在的情況。†

我猜測有許多原因，導致我對這本書的期望，沒有變成現實。其中之一，是從事政治–社會–經濟體系比較研究的經濟學家，對包含某些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內容的研究，更感興趣（至少是包含相關因素的研究）。市場與中央計劃，價格與指令，集權與分權——無論對於持哪種政治觀點的研究者來說，這些都是真正讓人激動的課題。對於蘇聯問題研究專家，或者專門研究東歐或者中國的學者來說，所有體系共有的現象，都不會讓他們過於興奮。‡這種解釋，尤其適用於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和外部反對共產主義體制的學者。他們希望看到彰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缺陷的模型（我在其它作品中曾經提出這類模型），而不是一個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何在明顯表現出功能紊亂的情況下，仍能渾渾噩噩地繼續存在的模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類經濟學家——理論家——的反應。我非常理解在經濟研究所那種微妙敏感的氛圍中，反對數理方法的理論經濟學家，會如何對待我們的研究。為什麼它在國內外信奉形式化理論分析的學者中，也反應平平？他們不可能沒有看到我們的文章，因為他們通常都會定期閱讀《計量經濟學》和「綠色叢書」。過去，我的某些作品，因為沒有使用數學形式，所以阻礙了西方學術界廣泛認同它們，但是這次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運用當時最新的形式主義——數學模型語言——闡明了所有觀點（我們使用的

---

* 這本書是該系列叢書中經濟分析類的第133本。

† 我談到自己對這項研究的期待及它的實際反響時，必須再次使用第一人稱單數形式，因為我不知道研究團隊中其他成員的想法，是否與我相同。

‡ 他們中的許多經濟學家，剛開始讀我們的文章時，就被其中使用的數理方法嚇退了。與此相反，有些經濟學家樂於研讀用數理模型寫作的文章。他們厭惡缺少數理模型的學術研究。我會馬上回來討論前者為什麼會對我們使用的特殊數理方法，如此反感。

形式，甚至比最先進的理論，更加精細）。

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在研究中使用的理論工具。我們的研究沒有使用「最佳標準」，我們沒有討論經濟體系參與者，是否建立了效用函數，也沒有討論他們是否有自己希望實現的目標。我們用一個更簡單初級的模型，預測了經濟參與者的行為（因此，在很多方面具備了普遍有效性）。決策者受到刺激時，會根據某些規則作出反應。我們在使用的數理工具中——微分和微分方程式，包含了這個簡單的公式（刺激→反應）。*我們沒有探索最佳解決方案，而是希望了解在現有的控制體制下，經濟體系是否能夠找到可持續的動態發展道路。如果可以，那麼這些道路，表現出哪些特點。我們的模型，力圖展現經濟體系，或者子體系中簡單的運動法則。事實上，它們與許多自然科學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相似。

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使用數理方法的理論經濟學家）認為，根本不存在沒有最優化的模型，這種觀點，深深地紮根於他們的腦袋中。有意義的微觀經濟學，要求研究者確定決策者的效用函數，而且強迫他們證明，某些宏觀規律與它的「微觀基礎」，完全匹配——即新古典主義條件，適用於主張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決策者。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這種要求不僅絲毫沒有放鬆，反而日益苛刻。過去在凱恩斯的激勵下，人們憑藉實證觀察的結果，便可以宣稱某種刺激（例如利率上調），引發了某些反應，但這種輕輕鬆鬆做研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研究者必須向人們展示他們觀察到的規律，是否吻合新古典主義的微觀理論基礎！我們提出的模式，反對了這種嚴格的學術紀律，而且與正統的決策理論，格格不入。

雖然我們的研究前景，一片黯淡，但是並非沒有希望。當一個有效性有限，而且適用範圍狹窄的理論，在學術界佔據壟斷地位時，它總有一天，會阻礙人們理解和認同其它理論的過程。我不是唯一認識到這點的人，人們可以把教條主義的微觀基礎，作為起

* 過去的經濟學研究，也使用微分和微分方程式，但它們主要用於建立宏觀經濟模型。我們在研究中使用這種數理方法，並建立了微觀經濟流程的模型。

點，來解釋許多問題，但是事實證明，在研究其它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時，這種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地過於苛刻（譬如沒有為自主控制的研究，留下多少空間），或者產生了誤導作用（如可能對政治領域和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產生誤導作用）。只要更多人認識到這一點，那麼經濟學研究，終將打碎束縛自己的鐐銬。

吱嘎作響的適應機制

1974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吱嘎作響的適應機制》[8]，並在其中預先展示了《短缺經濟學》中的許多觀點。它的題目非常具體，但是內裏的許多段落，略顯拙劣。它的論證方法仍不確定，而且理論框架只完成了一半。當經濟研究所的同事們對它展開辯論時，有些人察覺到這篇文章的內在價值，但是許多人，也不加掩飾，而且惡意地批評了它。其中最猛烈的抨擊，來自於我的同事彼得·埃爾德什。

我曾經在早前幾章多次提到彼得。1955年，我剛到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和他在同一間辦公室裏工作，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交談對象。有一段時間，研究所還安排我做他的助理。後來我們的關係卻日益疏遠，特別是在1957年，他第一個加入新組建的共產黨，而我卻抵受著壓力，堅持沒有入黨。不過，我們的關係一直都很融洽。

彼得的頭腦非常敏銳，他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培訓的同時，還精通西方經濟學著作，特別是凱恩斯的理論。他的思想非常開明，並且尖銳地評判現有政治和經濟條件，即使如此，他仍然無條件地擁護共產主義思想。這些特點，以怪異的方式在他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受到排擠，甚至曾經被開除出黨，但是他仍然至死堅守著對共產黨的忠誠。

如果彼得不喜歡某篇文章，那麼他便會不僅僅是提出批評，他會把它撕成碎片，而且在提出理性論證過程的同時，傲慢地嘲笑對方。他也許是從許多作家那裏，學到了這種風格（例如馬克思和列寧），而且他在這方面，早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順帶提一句，除

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外，我在其他人身上，也發現這種學術虐待狂的症狀。有些人似乎能從撕碎其他人的作品，並且從學術角度出發，侮辱其作者的行為中，享受到強烈的快感。即使在埃爾德什攻擊和針對其他人時，這種做法，也讓我非常反感。現在是時候談談我的《吱嗄作響的適應機制》和我自己了。

其實，我應該為它的批評而感到高興。這個半成品，本來便不應該送到出版社，晚些時候才出版更加成熟的《短缺經濟學，》顯然是更加理智的做法，但是我認為，沒有必要透過羞辱研究者的學術水平，來鞭策他/她全面修正自己的作品。*如果他們能和這些文章的作者，一同分析錯誤的原因，認同文章中的某些成就、優點和預言（如果它確實提出了某些預言），並且鼓勵研究者深入思考後，才重寫文章，那麼同樣可以實現這個目的。

研究者遭遇到這種殘忍的批評後，必須咬緊牙關，堅定立場，否則他便可能喪失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意志力。我很高興，自己擁有獻身於研究工作的信心和決心，因此在研究工作中，沒有迷失自己的方向。

除了《吱嗄作響的適應機制》外，我還在指導另外一個研究課題——我們過於野心勃勃，試圖以匈牙利的數據為基礎，建立龐大的宏觀模擬模型。這個項目，後來陷入了困境，結果半途夭折。我在這個課題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它的夭折讓我感到遺憾。許多年輕同事，特別是雅諾什·加奇和瑪莉亞·拉茨科，為此也付出了

---

* 也許有人會問我，為何始終不能對這段往事釋懷，或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一笑置之。我如果說自己忘記了這段經歷，那就是在欺騙讀者。不久前，我剛剛讀過杜威·德拉埃斯馬介紹講述記憶本質的著作。他認為人類記憶往往能非常清晰地記錄遭受羞辱的經歷，其精確性和詳細性遠遠超出對成功和快樂的記錄。似乎這些關於羞辱的記憶，在人們的記憶中佔據著「不同尋常的位置」——換句話說，它們不能像其它記憶一樣被壓縮起來。他們不僅保留著最初的衝擊力，而且它們的顏色、味道和尖銳性會清晰如初。即使人們日漸衰老，這些記憶仍然非常鮮明生動，雖然人們寧願它們變得模糊，而其它記憶卻能夠像它們那樣歷久彌新。

許多心血。

如果要我對自己做研究的「行為模式」，進行描述，那麼我在1971年至1976年間的學術活動，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許多西方學者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時，會相對輕鬆些，因為一旦他們察覺體系中存在問題，只要對現成的學術架構，進行補充和拓展，便可以把問題解決。而社會主義制度卻沒有任何現成可用的學術架構所以那些力求了解社會主義制度真實情況的人，必須在沒有任何標記的道路上，摸索前進，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陷入了困境。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調轉方向，探索另一條前進的道路。

我在尋找新的道路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失去信心。我經常同時開展幾個項目，而且每個項目，都有一名全職研究者專門負責。這種研究模式存在的問題，是戰線拉得過長。我認為就自己的研究結果而言，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我都問心無愧，但是回顧這段歷史時，投入和產出的比率，卻令人堪憂。我發表了很多文章，但是許多項目，在即將得出成熟，而且可發表的結論前，卻因為遇到困難而停滯不前。許多大型項目涉及到不少同事，但最終都被迫突然中止。這些同時進行的研究項目所取得的成果，大多收進了《短缺經濟學》中，但是有些卻無法挽回地丟失了。這就像一位雕刻家，用一塊較作品的尺寸巨大很多的大理石進行雕刻一樣，在作品完成前，太多有價值的材料和時間，都被浪費了。

我不僅發現了這些問題，而且事實上，我早已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卻沒有找到適當的補救措施。即使到現在，我還在反復提醒自己，不要再這樣浪費精力。

建造新家

我忙於工作的同時，還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另外一項「事業」中：蓋房子。1974年，我家和另外四個家庭，擁有的共管式公寓終於完工了。根據法律規定，這種房子屬於「自建房」，這意味著除了住戶自己以外，沒有其他建築承包商協調所有活動。所有住戶都要

自己找建築工人完成所有工程，而這些建築工人，要麼是政府正式批准的工匠，要麼是想撈些「灰色收入」的兼職者。此外，蓋房時需要的大多數建材和設備，都需要由住戶自行購買。

隨著工程艱難地不斷推進，我和妻子在不知不覺中，了解到其中的許多門道。我們發現自己要面對的現實情況，是我們幾乎不可能買到所有必需的建材。我們必須花費很長時間，尋找灰磚或浴室用的瓷磚，而且有時不得不痛苦地降低對建材質量的要求。*我們像其他消費者一樣，經歷了短缺經濟的所有「十字架苦路」，我在《短缺經濟學》裏，系統地描述了這些經歷。每次買建材時，我們都必須在尋找、等待、由於長期短缺而不得不購買替代品，和被迫放棄購買計劃之間，進行艱難的抉擇。除了建材短缺以外，我們還遇到勞工短缺的棘手問題。有經驗的工匠經常爽約，導致所有工程，全面停工。此外，當時的形勢，迫使我們意識到，短缺直接導致了腐敗。我們逐漸學會了要給每家工廠的倉庫管理人塞多少錢，才能買到市面上找不到的材料，或者應該給區議會的官員，送什麼牌子的白蘭地酒，才能拿到某些政府的許可。†

那些年頭，我經常到西方國家訪學。每次出國時，都會帶同一張購物清單。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清單上的東西，在西方更便宜，或者當地有什麼特產值得購買，而是因為國內根本買不到這些東西。在市場經濟運行正常的國家裏，它們的供應都相當充足。

我在莫斯科的經歷，可以清楚展示，東西方國家在買家–賣家關係方面的典型差異。西方國家的機場外面，總有大量出租車，排

---

* 我必須托岳母在索爾諾克(Szolnok)「走後門」，才能買到一個浴缸，而且她找到的這個浴缸，有一些小毛病。我們從100公里外的地方，把它搬回了布達佩斯。

† 雅諾什·肯尼迪發表了一本日記體作品，來記錄自己蓋房時經歷的類似事情。他風趣地借用了馬加什·拉科西時代的舊口號作為書名《國家是你們的，你要用自己的雙手建造它》。這本書後來被選入《匈牙利小冊子》叢書，並由巴黎的一個匈牙利移民團體出版發行。

著長長的隊伍等待旅客。旅客們跳進出租車後，告訴司機他們想去的地方，司機便會把他們直接送到目的地。而在莫斯科機場外，旅客只能翹首等待少得可憐的出租車。一旦有出租車出現，旅客們便會衝前把它包圍，詢問出租車去什麼地方。只有當旅客的目的地，恰好是出租車願意去的地方時，旅客才能上車。那麼究竟應該由誰來選擇目的地——乘客還是出租車司機？

所有人都經常遇到類似的經歷，無論我和研究者、清潔工、公司經理，還是司機談天時，他們都會提到短缺經濟讓他們惱火的事情，或者因此經歷的磨難。這些都沉澱在我的記憶深處，當我開始動筆撰寫關於短缺經濟的學術作品時，它便一一浮現在眼前。

加爾各答毛澤東主義者眼中的市場經濟改革

1975年，幾位印度經濟學家，發起了一個為期兩個月的學術和演講旅行。我和妻子也榮幸地受邀前往。我完全可以用整整一章，來描述這次旅行中的經歷，但是在這裏，我會很有節制地選取其中的一個片斷。

前往印度前，我研究了印度的經濟數據。它們清楚地顯示，這個擁有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的泱泱大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我曾經接觸到一些優秀的印度經濟學家：1963年，我訪問英國時，認識了後來擔任計劃辦公室主任的蘇哈穆瓦·查克拉瓦蒂；1968年，我在斯坦福大學，結交了T·N·施尼瓦桑（他的朋友通常都叫他TN）。他們在引領我遊歷印度前，便給我講述了許多有關印度的情況，但是任何透過語言或文字得到的印象，都無法與親身感受，相提並論。我看到那些窮苦家庭，舉家都擠在加爾各答人行道上的帳篷裏，艱難度日；看到婦女們，用排水管排出的髒水清洗罐子；看到垂死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大街上。這時，我的心靈便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專家們告訴我，加爾各答是印度最擁擠的城市，因此生活中的所有悲慘和不幸，都極度集中在這裏（加爾各答的官方名稱，已經從「Calcutta」改為「Kolkata」）。

當時印度共產黨分裂成兩個陣營。親蘇派贊同採用進展緩慢的蘇聯式改革，而激進的改革派(即堅持毛澤東主義思想的派別)，則希望與中國交好。後者還包括一些不拒絕使用恐怖手段的團體。加爾各答是印度毛澤東主義者的學術中心。

我在印度舉行了一系列演講，但是我對其中引起激烈辯論的一場演講，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在那次演講中，我談到了1968年匈牙利進行改革的經歷，以及隨之發生的變化和使它面對的兩難抉擇。在這場辯論中，許多發言者尖銳地，甚至憤怒地，反對了任何推動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觀點。他們寧可建立一個以小額定量和短缺為特色的配給系統——在這個系統裏，所有人憑配給票證領到的東西，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反對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但卻沒有狡辯地說，計劃經濟在組織機構方面具有優勢。他們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來承認計劃經濟中，存在重大缺陷。政府可以使用哪些宏觀經濟政策或微觀經濟激勵來改善供求關係，對他們來說都無關重要。無論在學術還是情感上，他們唯一關心的，是分配的公正性。在加爾各答那種悲慘的環境中，我可以理解有些人(甚至是大學教授)，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想法，但是我也理解他們，並不在意我贊同他們的觀點。和現在一樣，我始終認為，結束這些悲慘和不幸的最終解決方法，是改革生產力，而不是改變分配方式。把悲慘和不幸，平均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定量配給系統，也許會暫時緩解人們的不公平感，但對於問題的根本解決，卻無濟於事。

這場論戰的戰火，一直蔓延到一個教授邀請我們參加的家庭聚會上，但是聚會其後卻演變成了政治問題。當時，印度是為數不多的實行議會民主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人們可以合法地反對政府，執政黨可能會在選舉中失敗，人們可以自由地發表文章批判當權者，而且司法機關獨立於政府和執政黨。但是極端反對資本主義的激進分子，對此卻不屑一顧。如果幾百萬人民正在饑餓中掙扎，那麼即

---

* 我嘗試提出一個當時還不成熟的論證方法，後來我在一篇文章《效率和社會主義道德規範的原則》中，使用了這種論證方法(1986b[1980])。

使建立起這些形式上的、沒有實際內容的民主框架，又有什麼價值呢？如果專政意味著公平分配，以及消除饑餓，那麼他們寧可選擇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那怕因為專政而導致的大規模貧窮和饑荒。

多年後，事實證明在毛澤東執政時，有幾百萬中國人死於饑餓。社會主義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並沒有阻止死亡的鐘聲敲響。專政統治所做的，只是向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隱瞞這些可怕的事實，因此也阻礙了相應的救援工作。

我訪問印度時，中國「大躍進」運動的災難性的後果尚不為人知（儘管這原本可以成為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因此在這場辯論中，任何一方都沒有說服對手。

13 終於完成了短缺經濟的研究「拼圖」：1971–1980年

《短缺經濟學》

1976年初，我和妻子受阿薩爾·林德貝克的邀請，到斯德哥爾摩工作一段時間。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國際經濟研究所工作。我們剛剛到達斯德哥爾摩時，諸多事情都不順利。我們找不到合適的住所，住在旅館的生活，又非常不舒服。隨後，我還把厚厚的閱讀筆記，在地鐵上弄丟了，而這是我多年整理彙編資料的成果。斯堪的納維亞的秋天，經常陰霾籠罩。有一天早晨，天氣非常潮濕，而且刮著大風，我走在上班的路上，真的想立刻打包離開，直奔回家。

如果我當時這麼做了，那麼總有一天會後悔莫及。*研究所的秘書比吉塔·伊萊亞森，給予了我們很大幫助。他不辭辛勞，幫助我們找到一間稱心如意的公寓，我的筆記也完好無損地尋回。斯德哥爾摩理想的工作條件，把我的研究事業推向巔峰——我在那裏完成了《短缺經濟學》。

---

* 如果當時我們真的打道回府，那麼我們的女兒也許就不會嫁到瑞典，我們的兩個瑞典裔匈牙利外孫和外孫女——若非和安娜——也不會降臨人間。幸運的是，剛到斯德哥爾摩時低落的情緒，最終沒有壓垮我們。

鼓舞人心的工作環境

目前學術界針對學術研究的資助問題，開展了許多辯論。當研究資金由國家機構，或者超國家機構掌控並分配時，它們通常要求申請者提早上交研究計劃，說明研究目標，以及可以接受的得出研究結果的最終期限。越來越多的公共和私人基金會，也制訂了類似規定。

如果當時我在斯德哥爾摩的研究工作，也被強行綁上「普洛克路斯貳斯的床」*，那麼，我也許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在到達斯德哥爾摩前，還無法準確地構思出研究課題。在我的大腦內，只是一個像「修訂反均衡論」這樣寬泛的概念。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安靜地度過了幾周，並且完全安頓下來後，我才開始為自己理清研究思路。幸運的是，邀請我訪學的研究所，較上文提到的官僚機構，更加開明自由。他們同意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從事研究，而且沒有把我綁定在任何「研究項目」上。

我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都在我們居住的公寓裏。我偶爾會到研究所裏，處理一些事情，或者聽一些有趣的演講。他們起初邀請我們在研究所工作一年，但是約定的期限即將結束時，我還沒有完成工作，所以請求把工作時間延長三個月，他們絲毫沒有猶豫，便欣然同意了。

雖然我獨自在家工作，但幸運的是，周圍的學術環境，非常活躍有趣。†身旁很多的同事，都博學廣識，因此與他們的談話，經常

---

* 譯者注：源自希臘神話，指任何試圖讓所有人，都符合一個標準、一個思想或行為模式的作法。

† 我在前一章提過我對美國生活的觀察，讓我懂得了民主的概念。這種政治教育一直延續到了瑞典。我永遠不會忘記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在電視講話中，公開承認自己領導的社民黨執政四十五年後在大選中失敗時的情況。毫無疑問，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時刻，但是他完美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緒。他微笑著宣布自己在大選中失利，並且用最自然的態度，說他會將自己的職位交給當選者。我認識到當政府能夠允許自己以文明的方式解散和被取代時，我們更容易看到民主的存在。

妙趣橫生。我主動請纓，以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為主題，在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凡是來聽演講的學生和老師，都是我的實驗對象——我可以在演講中，提出一些原創的觀點，然後觀察他們，對這些觀點的反應。每次演講結束後，我都會被一大群聽眾包圍。他們會友善地向我提出一些建議，並且描述自己觀察到的現象。

後來我出版了《短缺經濟學》，很多人在前言中，讀到我是在瑞典完成了這本書，有些讀者因此開始擔心我在研究短缺經濟和社會主義體系時，會不會已經忘記了東歐國家的環境和日常生活。這種擔心完全是過慮的！我到斯德哥爾摩前，已經積累了大量對短缺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體驗和經歷。我在撰寫這本書時，唯一需要的是和平和寧靜——遠離匈牙利激烈的衝突、醜陋的明爭暗鬥、憤怒的情緒和繁雜的生活瑣事。

我在早前幾章中提及，我從寫作、辯論和個人體驗中得到的許多感悟，為這本書的寫作過程，鋪平了道路。事實上，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對短缺經濟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備選學位論文中，便特意抽出一章，討論了這個話題。在此後的二十年裏，我從不同的角度入手，反復探索了這個問題，但是在出版《短缺經濟學》前，這些年裏對短缺的研究成果，只是零零散散地堆積在我的大腦中。如今在瑞典寧靜的生活中，這些拼圖的碎片，完美地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

我開始真正動筆寫這本書後，進展的速度，快得令人眩暈。我經常在一周內，便完成一章。*它的大部分內容，已經在我腦中成形，我需要做的，只是把它們寫在紙上。而且，我不斷發現自己在

---

* 我每完成一章時，蘇莎都會馬上通讀全文，然後提出她的意見。早在寫《短缺經濟學》之前，我們就已經開始形成這個習慣，但是到了這本書結稿的時候，這種習慣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我無法想像沒有她的話，我該怎樣寫出新的作品。我每次結束一個章節時，妻子都會獎勵我一盒上好的瑞典巧克力奶酪（那時醫生還沒有強迫我觀察自己的膽固醇水平）。我不知道這是否也無形中加快了我的寫作速度？

寫作的過程中，澄清了許多問題，以及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的因素。

從前很多經濟學的著作，都提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短缺問題，譬如有些文章會用幾個段落，討論這個問題，或者有些著作，專門為此闢出一個章節。然而，《短缺經濟學》是第一部全面探討這個問題的專著。我在它的前言裏已經解釋，我花了不少心血，尋找可供引用的相關文獻。只要找到提出相關理論的先驅者，我都會按照出版的慣例，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他們的作品。同樣，我還在書中，列出許多為我提出建議，或者參與準備性研究的人，我對他們的幫助，表示了真誠的感謝。*我沒有宣稱書中出現的所有觀點，都是我的原創觀點。但是我可以說我的基本靈感，不是來源於其他人早早便提出的觀點。此外，我也不認為《短缺經濟學》，是某一部學術作品的延續。我間接地受到許多學術思想的強烈影響，例如馬克思、凱恩斯和赫希曼的著作。†但是我在前幾章，已經明確闡述他們對我的影響，並沒有局限在社會主義體系的長期短缺問題上。

這並不意味著1955年後，我從閱讀中獲取的大量理論知識、在匈牙利進行的實證研究、與他人開展的討論、聽過的演講、學術會議上的辯論，以及在國外長期生活的體驗，沒有對我產生深刻的影響。創作《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時，我是一個幼稚地睜大雙眼觀察現實生活的研究者，而《短缺經濟學》，則是曾經接受專業培訓的經濟學家的作品。我根據自己閱讀文獻資料的感悟，和在經濟學界、社會和政治領域的親身體驗，找到了更加適合自己的道路。

---

* 這本書包含兩個關於數理經濟學的附錄。合著者約根·韋布爾和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幫助我整理了這些附錄。

† 《資本論》激發了我的無窮靈感。馬克思認為失業既不是市場適應機制的隨機錯誤，也不是錯誤的經濟政策的後果，而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特點。馬克思嘗試鑒別和解釋這種體系特有的功能失調現象，因為它可以深刻地反映出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馬克思成為這種研究方法的先驅者之一。我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世界觀及政治計劃的徹底決裂，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

請允許我暫時回到我在本章開篇處提到的一些事情：我把幾公斤重的閱讀筆記，帶到了斯德哥爾摩。事實上，我在撰寫《短缺經濟學》時，幾乎沒有參考這些筆記，撰寫其它許多文章時，也是如此。毫無疑問，我已經牢牢地記著文獻中的各種觀點，而且能在適當的時候想起它們。事實上，在寫作的過程中查閱這些筆記，會打斷我的寫作節奏，並且干擾我的思路，這樣很可能把我的思路，引向其它方向，而不會堅持自己的主張。我只要在修改初稿時，再查找它們的來源，或者核實參考書目，便可以確保它們的準確性。

本書想要傳達的信息

我希望透過《短缺經濟學》，實現兩個目標。一方面，我希望描繪出社會主義體系運作的全景圖；另一方面，我力求系統地展示長期短缺經濟的現象、原因和效果。也許我最好不要使用二分法，而是聲明我的目標，是透過對短缺經濟的討論，描繪出更加廣闊或更加深刻的畫面，而不僅局限於對具體現象的因果分析。短缺經濟是體系的**組成部分**，我希望透過這個部分，來展示**整體**。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每天都要遇到與短缺有關的事例，所以他們會感覺到，這個問題與他們本人及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在書名中直接點明「短缺」，這本身就是一種挑釁，而且直擊問題的核心。《短缺經濟學》的目的，就是從**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普遍性結論，並且把它們上升到綜合性理論的高度。

如果我從描述消費領域的短缺現象，開始展開這本書的內容，那麼也許會更容易實現後一個目標，因為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曾經扮演消費者的角色。但是這明顯地違反了論證的邏輯次序，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源是生產。所以我在開篇處，先描述了企業的營運過程和購買投入材料的過程。（我在撰寫《短缺經濟學》時，剛剛親身經歷了為修建共管式公寓購買建材的過程。）

所有經濟體系，都會出現短缺。旅客無法按照自己預想的時間乘坐飛機，因為最後一張機票，被排在他前列的乘客搶去。人們在

電影院前，排起長長的人龍，購買大量的電影票。這種例子會零星地發生，而且轉瞬即逝，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如果一個經濟體系的所有領域，或者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短缺，例如在公司，家庭，生產、服務和勞動力的分配，以及投資等領域，那麼我們便可以把其稱為短缺經濟。它的短缺是長期的，而不是暫時性的。供應無法滿足人們需求，而且兩者之間的缺口，非常巨大——換句話說，**短缺**的情況非常嚴重。

簡而言之，短缺經濟在各個經濟領域中，都表現出非常普遍、相當嚴重和長期持續的短缺現象。市場不會暫時性地在供求平衡狀態上，上下波動。它會永遠偏離我們上一章中講述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長期短缺是這個體系的**正常狀態**，而不是非常事件。

短缺（我不會每次提到「短缺」時，都重複「非常普遍、相當嚴重和長期持續」等形容詞）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短缺，通常意味著，買家不得不購買不合他們心意的商品。這種被迫使用替代品的現象，逐漸侵蝕了消費者的滿意度。人們必須尋找很長時間，而且要花大量時間排隊，才能買到供給匱乏的商品。由於消費總量是固定的，因此在短缺經濟體系下，消費者所能享受到的福利，也就少於供應充足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消費者。

工廠只能時斷時續地拿到原材料、半成品和零件，而且無法完全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現象與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結合起來，不斷引發生產矛盾或妨礙生產，最終導致勞動力生產率降低。*

短缺經濟中的生產者，從來不擔心如何銷售產品，因為時刻都有迫不及待地希望拿到產品的買家。生產者無需為了競爭顧客，拼

---

* 社會體制發生改變後，社會經濟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拓展了產品的種類，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率，並且幫助人們擁有更加先進的技術。許多基於全面統計分析的研究，已經證明生產商為了爭取顧客而作出互相競爭的行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閱讀了卡爾林等人於2001年發表的論文，以及詹科夫和默雷爾在2002年發表的論文後發現後社會主義轉軌帶來的生產變化，支持了《短缺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結論。

個你死我活，所以短缺扼殺了促進技術發展的重要激勵措施，因而成為導致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停滯的一個根本原因。

到目前為止，我列出了短缺直接造成的各種經濟損失。實際上，它對人民享受到的整體福利，也產生了同樣重大的影響。*生產者或銷售者，佔據了優越的地位，導致人際關係極度惡化。社會主義制度，只能通過定量配給系統，或者行政配置，來分配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這成為官僚機構的重要武器，有力地幫助它加強對人民生活的統治。

也許有人認為，上一段的最後一個論斷，暗示著當局可能會刻意製造短缺經濟，但是這絕非事實。由於買家無法選擇或拒絕商品，因此賣家佔據了非常有利的優勢地位。然而，所有賣家，同時也扮演了買家的角色。當他們花費很大氣力，希望買到許多產品和服務時，他/她也處於弱勢地位，或者受到侮辱。官僚機構的許多成員，也會遭受短缺經濟對他們個人生活造成的不便(除非他們處於高度特權的地位)。沒有人希望如此，但這種現象，仍然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如果短缺經濟取決於少數人，那麼他們一定會被迫終止這一切，並且改變市場上買家和賣家之間的力量對抗。然而，任何人的自由意志，都不可能改變這種現象。無論經濟參與者喜歡與否，長期短缺經濟終究都會出現，並且不斷進行自我複製。

我們無法用單一的因素，來圓滿地解釋短缺出現，以及自我複製的過程。要想充分解釋這些問題，便需要掌握一個更加複雜的因果分析機制。這個因果鏈上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我在《短缺經濟學》中提到的「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及解釋它的理論，引發了強烈的

---

* 外國學生(以及匈牙利青年)完全不了解短缺會給人們帶來多麼難以忍受的痛苦。我在演講中解釋住房短缺時，經常會提到一對年輕夫婦的例子。他們已經辦完了離婚的法律手續，但是不得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由於住房不足，丈夫的前妻和現任妻子必須住在一起，而且共用廚房和浴室。每次我講到這個故事時，聽眾們都會哄堂大笑。這種壓抑屈辱的處境，在他們看來，卻非常有趣。

反響，它逐漸脫離《短缺經濟學》，發展成一個獨立的課題。因此我將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詳細講解這個概念。

這個因果鏈的最後一環，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制度體系。讓我來引用《短缺經濟學》中最後幾頁的「結語」部分：「明確的社會關係和制度條件，產生明確的行為方式、經濟規律和規範。國家決策不可能阻止它們產生作用。政策決策和國家計劃，沒有下令製造投資緊張、長期勞動力短缺和價格偏離等趨勢。只要維持這些現象的條件存在，任何政策決策和國家計劃，都不可能消除這些現象。」[1] 短缺經濟，是社會主義體系特有的本質屬性。改革也許能緩和這種矛盾，但永遠無法根除它。

這就是我希望在《短缺經濟學》中傳達的信息。

自我審查

《短缺經濟學》揭示了許多意義重大的真理，我確信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除了真理，別無他物。但是我也深知，這本書不可能包羅所有真理。

當時，我們生活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Lindingö，那是海灣上的一個小島。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自己一面和妻子在海邊的樹林裏散步，一面反復討論，應該在書中包括哪些內容及摒棄哪些內容。

這本書的起點，首先是面向廣大匈牙利讀者，因為我們離開瑞典後，仍然會回到匈牙利生活。*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在匈牙利合法地印刷和發行，那麼這本書，能夠探討哪些內容？它的分析，能夠深入到什麼程度呢？此外，在動筆時，我便考慮了這本書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可能面臨的命運。它能否在這些國家獲准出版？如果不能出版，它是否會被視為「圖謀不軌」的學術書籍？它的讀者會不會

---

* 我和妻子深入地討論過這些問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最終都能達成一致意見。然而我作為《短缺經濟學》的作者，對於書中的內容，完全負有個人責任，所以我認為必須用第一人稱單數，來描述我們在討論中得出的結論。

由此招致迫害？

我們到瑞典前，便觀看了安德拉什·科瓦奇於1968年拍攝的著名電影《牆》。它描述了一群劍客，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裏一面打鬥，一面擔心搖搖欲墜的牆倒塌時會把他們一起埋葬，但他們不知道牆的具體位置在哪裏，因此只敢在房間的中央活動。*看了電影的觀眾，都非常清楚科瓦奇，希望借這部影片表達什麼寓意。

我不僅意識到，自己被高牆包圍在中間，而且非常清楚它們在哪裏。雖然匈牙利的出版空間，較羅馬尼亞或阿爾巴尼亞寬廣很多，但是對合法出版物的內容，仍然有許多政治限制。

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我已經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這給我穿上了一層保護衣，而且或多或少幫助我把限制言論自由的高牆，向外挪動了一些，給我留出更多的空間。我希望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我不僅希望爬上限制我的高牆，然後翻越它們，我還力求在這本書裏實現一個目標，那就是幫助其他希望仿效我的人，拓展被高牆限制的空間，讓他們受到的約束，略有緩和。

雖然我處於這種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我至多可以認為，自己的活動空間，較其他人略略寬闊一些而已。如果我希望自己的書，可以合法出版，那麼我仍然不能把自己對研究課題的所有觀點，都寫進書裏。

我希望在《短缺經濟學》中，避免三件事情。首先。我不想明確地提到蘇聯、蘇聯集團國家與蘇聯的關係，或者它們之間的貿易–

---

* 我在這裏引用了一段電影劇本的劇情（安德拉什·科瓦奇，1968第37頁）。劇本中的演員動作說明用黑體字表示。本片的男主角本柯正在評論黑暗的屋子裏發生的事情。

兩名劍客開始在黑暗中摸索著尋找對方。

本柯：看到他們有多害怕那些牆了嗎？不過它們離我們還遠著呢。

他們在繼續搏鬥，盡量避免被對方刺中，但是始終在房間中央騰挪閃躲。

本柯：這個房間大多了，不過他們沒有充分利用它的空間，所以沒有充分發揮自己的水平，顯得比剛才更加笨拙。

經濟關係。其次，我不希望糾纏於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發揮的作用等問題。第三，我不希望討論國家所有制，讓步給私有制後，可能發生哪些變化。

這些顯然都不是次要問題，他們在理解社會主義體系方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我不願意半真半假地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我也不能允許自己，對此發表任何不實的言論。似乎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對這些問題**保持緘默**。

但是我希望為觀察力敏銳的讀者指出這些書中刻意迴避的問題。我在《短缺經濟學》的前言裏，強調了本書沒有涉及的內容——例如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明確指出，這本書只分析了國有企業，而沒有提及「第二經濟」和「非正規部門」。

我沒有在書中使用暗示，我認為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用一波又一波的分析和解釋，吸引讀者，使他們接受本書的邏輯。如果能夠實現這個目標，那麼讀者便可以利用自己的學術能力，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這本書共有二十二章。我經過漫長而且謹慎的思考後，才決定就此終結全書的內容。我的其中一個考慮，是希望讀者，能夠自己推斷出第二十三章的內容（雖然我沒有把它們寫在紙上）。這本書沒有強調普遍、嚴重和長期短缺經濟的根源，是來自共產主義體系，也沒有強調必須改變制度，才能一勞永逸地結束短缺現象。這本書沒有宣稱共產主義體系的基本特徵不能被改革措施所改變。不過，許多讀者顯然都讀懂了書中深藏的意義。*

在這裏，我只是如實描述了自己在寫《短缺經濟學》的過程中進行自我審查的情況。我將在本章的末尾處，重新探討自己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遇到的兩難抉擇。

---

* 不久前，一位對政治和經濟問題頗感興趣的物理學家，還向我描述了自己當年閱讀《短缺經濟學》時的感受。他說自己讀到書中宣稱必須改變社會體制時，感到非常震憾。即使在二十五年後，他還堅定地認為，書中明確提出了這個命題，直到我向他證明書裏的確沒有用這麼多篇幅表達這個觀點時，才算作罷。

出版社的審稿人

對共產主義體系的出版流程不太了解的西方人，經常想當然地以為共產主義國家，也有正式的審查機構。有些國家在剛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時期，設立了這些機構，但是政權穩定後，便不再需要它們。審查出版物或廣播內容的工作，按照職權委派給報紙編輯、出版社的主任和電視臺或電臺的負責人。雖然這些工作，通常由他們的下屬完成，但這並不能免除他們的責任。他/她必須向上級報告正在出版的書目及其內容(國有出版公司負責向文化教育部的出版公司，彙報情況)。不過說到底，所有國家機構的負責人，都對共產黨負責。如果黨內有人(在現實生活中，通常是黨的某些領導人，或者是黨中央指派的官員)對出版書籍的內容不滿，他們總可以找到阻止它們出版的方法。即使這些書已經出版，也會對相關人員，進行處罰。

在專政統治非常殘酷的年代裏，政府往往牢牢地把持著出版業。只要某些稿件批判政府的語氣過於強烈，或者表現出偏離主流導向的趨勢，即使這些問題並不嚴重，也會被編輯拒諸門外，以履行他們的審查責任。編輯對稿件的傾向不確定時，便會把該作品上交到黨中央，由它來裁決。假如編輯自作主張，出版了這種作品，並且引發政治風暴，那麼一定會遭到瘋狂的報復。

我完成《短缺經濟學》時，卡達爾政權正處於相對「溫和」的階段。現在讓我們來逐一回顧這本書所經歷的審查過程。

起初出版公司的主任，並沒有拒絕出版這本書。總編拉斯洛·費博對它充滿了熱情，而且竭盡全力推動它的出版工作。在西方學術作品的出版過程中，出版社往往在不和作者商量的情況下，自行選擇審稿人，以獲得公正的評論。出版社不會透露審稿人的姓名，以免他對作品給出負面評論時，讓作者感到不滿。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審稿人的姓名，往往赫然出現在出版物的扉頁上。他們必須公開承擔該書的學術責任，以及更棘手的政治責任。在某些情況下，作者也許會和總編私下裏商討審稿人的人選。在《短缺經

濟學》的出版過程中，我便和總編就審稿人問題，交換了不少意見。由於一個人身上，不可能具備評論這本書所需的所有特質，因此我們認為，應該找一個有學術聲望的審稿人，和一個具備政治影響力的審稿人。

我和總編討論了幾次後，認為我在經濟研究所的同事安德拉什·布羅迪，適合擔任這本書的學術審稿人。[2]由於他在國內外都享有很高聲譽，因此沒有人能質疑他的學術地位。我曾經與布羅迪是親密的朋友，但是後來關係卻有所疏遠。我知道他並不喜歡我早期發表的一兩部作品，不過布羅迪還是冒著政治風險，鼎力支持了這本書。他以一名真正的學者的慷慨大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短缺經濟學》中，我用亞當·斯密分析資本主義的方式，分析了社會主義。我由衷地感謝布羅迪對我的鼓勵和支持。

另外一位審稿人，是當時的財政部長拉喬斯·法盧韋紀[3]（後來他升任國家計劃辦公室的主任）。他是一名經濟專家，而不是黨員幹部，但是黨的高層領導，非常尊敬信任他的意見，他屬於忠誠的改革者。

在這裏，我是第一次披露關於法盧韋紀的審稿報告的故事，整個經過讓我有些尷尬。我的一個好朋友安德烈亞·戴阿克，是部長的一個親信。在政界有個約定俗成的習慣，許多高層政治家的材料（如演講稿等），雖然以他們的名字署名，但是卻通常是由他的下屬完成。部長指示安德烈亞·戴阿克起草對《短缺經濟學》的評論報告，但完成報告的不是安德烈亞，而是我！我無法說清楚，誰先提出這個主意——究竟是安德烈亞請求我這麼做，還是我主動提出幫助他。我當然比他更了解這本書，所以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更加輕鬆。我用溫和冷靜的語氣，評論了這本書，在指出它的優點（我沒有把它誇到天上去）的同時，對它的深遠影響，卻隻字不提。

這一切，都在極其隱密的情況下完成了。出版社和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份報告的真正作者是誰。不過事實上，這並不重要。安德烈亞把審稿報告的草稿交給他的上司時，她需要對這份報告負責。報告中有任何不妥善之處，法盧韋紀都會給她指出來。更重要的

是，法盧韋紀在審稿報告上簽字之前，顯然已經仔細閱讀這本書，因為一旦黨內對這本書有任何不滿，她都要為此承擔責任。

出版社當時有兩份審稿報告，都支持並表揚了這本書。同時，它也順利通過了匈牙利的「審查」程序。編輯和審稿人沒有對《短缺經濟學》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我準確地估計了可能限制我的牆的具體高度。在《短缺經濟學》的手稿交到出版社之前，我便已經把其中可能通不過審查程序的觀點，全部刪除了。

第一印象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1980年我和妻子在教堂大學對面Egyetem街上的書店裏，第一次看到《短缺經濟學》時欣喜若狂的情景。第一次印刷出來的書很快便售罄。一本文學周刊還特別發表了一篇名為「《短缺經濟學》出現短缺」的短文。[4]《短缺經濟學》在匈牙利，一共印刷了三次。

這本書的英語版，幾乎同步問世。我已經與North-Holland出版社的編輯，達成協議，即使匈牙利版《短缺經濟學》因為某些原因，沒有獲准出版，他們也會出版英語版《短缺經濟學》。他們給予我很多幫助，同時也非常理解我的處境。

後來《短缺經濟學》的法語版、波蘭語版及中文版先後面世。中文

---

* 我和出版社的設計室多次商量了《短缺經濟學》的封面設計。設計師微笑著給我提供了多個備選封面，其中一個非常簡單，封面只有一些簡單的字母（它被最終敲定為《短缺經濟學》的封面）。另外一個是一張彩色圖片：一個人裸體站在鏡子前——皇帝的新裝！一直到今天，這張圖片仍然掛在我的辦公室牆上。它也被收錄在本書的照片集之中。

我的妻子為偉大的繪畫藝術家雅諾什·卡斯舉辦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短缺經濟學》研討會。卡斯受這本書的啟發，創作了一系列精彩的作品。蘇莎將它們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時至今日，它們還掛在我們的家裏。卡斯後來不斷擴充這個系列的內容。我將它們作為插圖，收進我的匈牙利語和日語版論文集中。本書中也收錄了其中一張圖片。

版的印刷數目，達到十萬本，並且在次年榮獲非小說類的「年度暢銷書」榮譽。它還被譯成捷克斯洛伐克語，但是沒有正式地進行商業發售，只是在各學術研究機構間，進行傳閱。俄語版《短缺經濟學》，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傳，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行將結束時，才得以正式出版，而且它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銷售量高達七萬冊。

1978年，我在國際計量經濟學會大會上發表的主席演講中，總結了《短缺經濟學》的主要觀點，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它們的流傳。後來這篇演講稿發表在《計量經濟學》上。[5]

許多西方國家的核心雜誌上，出現了大量評論《短缺經濟學》的文章，而且幾乎都是讚美之詞。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出現它的書評，則取決於該國的執政路線，是否強硬。此外，經濟學家R·G·卡拉喬多夫[6]勇敢地用俄語寫了一篇書評，詳細分析了這本書的內容，並且高度讚揚了它。這篇評論的意義非常重大，他對英語版《短缺經濟學》的評論，使得當時還屬於地下出版物的俄語版《短缺經濟學》，加快了流通速度。

在《短缺經濟學》出版後的幾年裏，東西方經濟學家引用這本書的次數，高達幾百次。各大院校開始把它用於教學。此外，讓我非常高興的是，布達佩斯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勞伊克學院，每年都舉辦「短缺研討會」，來逐章研究這本書。

鑒於這本書激發了公眾的濃厚興趣，大學向我發來第一份發表大型演講的邀請(在這之前，我只曾舉辦一些參加人數不多的研討會)。每星期寬敞的演講廳裏，都擠滿了大學生和學校以外的聽眾。*

與「非均衡」流派的學術之爭

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短缺經濟學》從問世的第一

---

* 在第一次贏得廣泛認同的演講中，我在解釋強制適應、人們在短缺經濟中受到的羞辱和順從主義等問題時，引用了才華橫溢的歌手佐蘭·斯泰娃諾維蒂演唱的流行歌曲：「啤酒是溫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忍受。」

天起，便沿著鋪滿鮮花的道路，高奏凱歌，勝利前行。事實上，有些人對它擺出非常厭惡的面孔。有些人甚至感到這個課題，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匈牙利國內外，有很多人對它持有保留意見，或者公開批判它。本節將著重討論當時出現的兩種反對觀點（我將會在下一章，詳細講述支持匈牙利改革經濟管理體系的人士，與反對者對《短缺經濟學》的不同解讀，以及就此展開的辯論）。

在七十年代初，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和赫舍爾·I·格羅斯曼，為了研究供大於求或者供小於求的情況下處於非瓦爾拉斯均衡狀態的市場時，創建了一個模型。[7]他們將其稱作「非均衡模型」。這種方法顯然與我在《反均衡論》中首先提出來，並在《短缺經濟學》中，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存在許多相似之處。

後來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波特斯接受了巴羅–格羅斯曼模型的理論結構，並把它用於經濟計量計算。當時理查德·波特斯正致力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他根據自己對巴羅–格羅斯曼模型的研究，建立了一個學派：他和自己的同事及追隨者，為各種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立了一系列非均衡模型。[8]

五十年代末，理查德在布達佩斯攻讀計劃專業的碩士學位時，我曾經與他見面。自那以後，我們偶爾才會見面，而且通常都會用相似的方法，解釋經濟問題。然而，這次我們之間，卻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我反對巴羅和格羅斯曼，以及後來的波特斯及其追隨者，把消費市場描述為宏觀總量的方式。這種模型扭曲了市場的運行情況。根據它所展示的形象，市場的狀態時而表現出普遍供過於求的狀態，時而表現出普遍供小於求的狀態，而且可以在兩種非均衡狀態中，反復切換。假如我們以波蘭的經濟體系為例，就是波蘭人民承受著嚴重短缺帶來的巨大痛苦。這種經濟體系怎麼可能在短期內轉變成普遍供大於求的狀態？只有在建立這些模型的過程中，使用錯誤的假設和定義時，經濟計量計算的結果，才可能證實這種結論。

我在《短缺經濟學》中，特別指出不能用總量分析來圓滿地描述

短缺的特點。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短缺和剩餘經常相生共存。由於經濟體系的適應能力非常差，所以這兩者不會相互排斥：當沒有售出的存貨和沒有使用的服務能力，不斷累積造成過度浪費時，某些產品和服務，卻極度短缺。

此外，我們不能用常規的統計指標，來衡量短缺，而波特斯和他的同事，恰好是在這些指標的基礎上，進行計算。如果實際購買量，恰好等於需求量，那麼所觀察到的購買和銷售數據，便可以如實地反應出需求情況。但是如果買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商品，那麼誰知道，沒有得到滿足的真實需求，和原始需求到底有多大？當買家迫於短缺，不得不購買其它商品，來代替自己本來想買的商品，而且這種行為的次數日益上升時，人們從統計指標中得到的需求信息，也就越來越不可靠。強制性替代部分地，或者完全地吸引了過剩的需求。

我提出的另外一個反對意見，是波特斯的模型只描述了消費市場，而把它與投資市場，分割開來。然而這個問題的關鍵，恰巧在於投資領域中持續不斷的緊張局勢：負責調控經濟的人和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表現出永不滿足的「投資飢渴」。他們極度希望擴大投資，從而確保市場上的需求，總是超過可得到資源的供應量。

波特斯和他的同事與我辯論時，佔據著一個極度有利的地位。他們從可以找得到的統計數據中，收集必要的資料，然後根據這些資料，進行數理-統計計算。毫無疑問，這會給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除了求助於直覺和常識以外，便不能提出其它任何論據。我不能用波特斯的定量模型，來反對與此相似的科爾奈定量模型。*

如果人們的確需要測量短缺，那麼也需要建立新的測量方法。

---

* 人們在早期的研究中取得的某些成果，看起來非常有價值。在匈牙利，主要是我的同事和學生遵循《短缺經濟學》中所提出理論的精神，進行了實證研究。其它國家的一些研究者，也開始以這些理論為依托，從事調查工作。這方面最有趣的研究成果，是熱若爾·羅蘭於1987年和1990年發表的文章。

我們開始著手研究這樣的新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勞伊克學院院長阿提拉·奇坎設計的指標。他在同事的幫助下，根據匈牙利數據，得出量化研究的結果。在短缺經濟中，企業產出的存貨，往往會下降，因為買方會買光所有他們能買到的東西。與此相反，消費方則會表現出囤積的趨勢。公司擔心未來發生短缺，因此像倉鼠一樣，大量囤積原材料和半成品。產出囤積量與投入囤積量之間的比率，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指標。當這個比率上升時，它表示短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而當這個比率下降時，它表示短缺的情況，有所緩解。

人們開始觀察，並且系統性地收集其它短缺經濟的指標（如排隊等待購買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隊伍長度，和強制性替代的分布和頻率）。由於觀察的時間序列，必須具有足夠長度，才能從數據中得出結論，因此這種工作，需要堅持五至十年，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我剛剛確定這個研究方法後，短缺經濟便悄然而逝！感謝上帝，短缺經濟的時代，終於結束了。不過這種變化，意味著我和波特斯學派的爭論，永遠沒有定論。我仍然堅持自己的邏輯推理觀點，但是我沒有辦法反駁波特斯的結論，或者提出更加有說服力的計算結果。

在匈牙利進行學術爭辯時，經常會導致辯論雙方的個人關係，開始變得緊張。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在我和波特斯（即後來的理查德爵士）之間。我們的關係，跟進行學術爭論之前一樣，真誠融洽。

與正統俄羅斯經濟學家的學術之爭

另外一場辯論，發生在1981年在雅典舉行的國際經濟學會圓桌會議上。這次大會的主席，是著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勛爵。*我在這次大會上的演講中，著重闡述了剛剛出版的《短缺經濟

* 我在前文提過希克斯爵士。他曾經積極地支持我出版第一本英語作品。

學》中的主要觀點，並且強調短缺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所特有的痼疾。參加這場辯論的其中一位發言者，是當時蘇聯經濟學會的會長V·R·哈恰圖羅夫，他強烈反對了我的立場。哈恰圖羅夫沒有否認生活中可能存在短缺（僅僅是可能發生這些情況嗎？當時匈牙利的物資供應，較蘇聯充足得多。蘇聯的住房供應嚴重不足，而且商店裏的主食和日常用品，也極度匱乏）。他認為這些情況，源於計劃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只要提高計劃制訂工作的標準，這些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當時在場的，還有著名的數理經濟學家，和線性規劃理論的創始人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他曾於1975年與其他人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希克斯在他的總結發言中，肯定了我的演講，但是卻沒有作出評價。我與哈恰圖羅夫之間的學術之爭，與其他同時代的西方經濟學家一樣，他不希望在東西方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會議上，對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之間展開的論戰，公開表態。*

哈恰圖羅夫的論調和他的強烈語氣，進一步證實了我最初的想法——《短缺經濟學》傳達的信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

幫助侵蝕社會主義體制

我從版本、出版、評論和引用等各方面的具體事例，描述了人們在口頭和書面上歡迎《短缺經濟學》的情況。比起能看得見的影響，它的作用，更重要地體現在它對社會主義體制下知識分子思想的影響。

多年後，我第一次拜訪新到本國的醫生時，他像久未謀面的朋

---

* 我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見到吳敬璉教授，他後來成為中國改革的建築師之一。吳教授告訴我他認為我的理論非常有說服力。他希望我的觀點能夠為中國人民所了解，而且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自此我們多次見面。他努力推動了我的作品在中國出版發行的工作。

友一樣，熱情地接待了我。他曾經閱讀《短缺經濟學》，而且他說這本書，改變了他的世界觀（我引用了他的原話）。從那以後，他開始用不一樣的眼光，觀看社會主義經濟。不久以後，我在波蘭的克拉科夫訪學時，也從一位波蘭社會學家裏，聽到相似的評論。

除了私底下的談話，人們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感想。在這裏，我只談談俄羅斯經濟學家的觀點。*1998年，丹尼爾·耶金和約瑟夫·斯坦尼斯勞在描述體系變化的作品中，回憶了他們與當時擔任蘇聯總理的葉戈爾·蓋達爾的談話內容（當時蘇聯正處於重要的經濟轉型期），並且總結了蓋達爾的觀點：「在當前仍健在的經濟學家中，對共產主義體系下整整一代人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的經濟學家，非科爾奈莫屬。他一絲不苟地解剖了中央計劃體系，並且展示了其不合理性和自我破壞性。他還描述了它可能產生的變體——市場社會主義——的不足之處。」他們繼續引用了蓋達爾的原話說：「他是八十年代對我們所有人影響最深刻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對短缺經濟的分析，強烈地衝擊了所有人。他在努力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我們閱讀了他的所有著作。」[9]

《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的前記者大衛·E·霍夫曼，幾年前寫了一本《寡頭政治：新俄羅斯的財富和權力》。他在書中，回憶了一

* 2004年阿提拉·奇坎發表的文章，回顧了匈牙利對《短缺經濟學》的反響。我還想用另外一組數據描述這本書對匈牙利的衝擊。1989年，兩位匈牙利研究者捷爾吉·薩奇和伊斯特萬·雅諾什·托特在發表的《科學計量學》裏，詳細分析了匈牙利經濟文獻中學者們被引用的情況及被引用的頻率。他們以每五年為一個周期，列表總結了各個時期學者們被引用的排名情況（第1207頁）。在1963年到1972年的兩個周期裏，馬克思名列榜首。在1973年至1978年間，馬克思仍然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列寧和科爾奈。到了1978年至1982年，排名情況發生逆轉，我的引用情況排名第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3年到1987年。在這個周期裏，匈牙利經濟學家引用我的文章的次數，比引用馬克思著作的次數高出一倍。

群圍繞在蓋達爾和阿納托利·丘拜斯身旁的年輕蘇聯經濟學家。讓我來引用書中的一段話：「其後靈感的閃電不期而至。1980年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發表的專著，深刻地觸動了所有人。這部《短缺經濟學》，分上下兩卷，共有630頁。它較其它所有書，都更加透徹地洞察了蘇聯社會主義逐漸走下坡路的本質。」霍夫曼引用了這個團體中某些成員的話：「這本書最早從列寧格勒流入蘇聯，當時它還是偷偷走私進來的複印件，但很快便『成了《聖經》』。起初，我們對這個問題有很多想法，但這本書淨化了我們的思想。它推動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人們見面時，總會互相問道，『你讀了科爾奈的書嗎？』，然後馬上開始熱火朝天地討論其中的觀點。」[10]

如果有人問我，這一生中最讓我引以為傲的事情，那麼我的答案是：我的作品，贏得眾多學者的青睞，而且在經濟學家和其它專業的學者中，引起震動，引導他們從另外一個角度，觀看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成就讓我非常滿意。

柏林牆被推倒後，出現了許多理論，探究導致這個歷史事件的真正原因。在西方和鐵幕下的東方，許多政治勢力都聲稱自己對此作出了貢獻。有些政治團體指出，里根的強硬態度和美國的軍事壓力，是推倒柏林牆的主要力量；而其他人認為，戈爾巴喬夫的老謀深算，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認為安德烈·薩哈羅夫、瓦茨拉夫·哈維爾和亞當·米奇尼克等許多政治異見者的活動，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有些人則把「改革派共產主義者」的作用，排在第一位。在我看來，他們提出的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儘管1989年至1990年間的社會變化，快得驚人，但是在此之前，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衰退期。任何複雜廣泛的歷史進程，都會經歷相似的過程：許多因素共同作用，侵蝕了它的基礎。我認為用「單一因素」解釋這些問題的學術方式，非常值得懷疑，因為它們把複雜的歷史進程，簡化到了極致，而且通常掩蓋了許多政治意圖，和進行自我擴張的欲望。

還有一個因素，在制度變化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領導階層，在思想上不斷地發生著根本轉變—雖然這不是最重要，或者唯一的原因。當任何政權，缺少堅信本國政權具有合法性，以及生存能力的支持者時，都無法維持下去，甚至連獨裁統治，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制度結構的支柱之一，就是那些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認為所有問題，都是暫時性的，而且在救世主般使命感的驅使下，作出了自我犧牲。希特勒和他的黨羽，不是單純依賴獨裁統治和軍隊的命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南征北戰，他們堅持到最後一個信仰法西斯事業的人犧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肆意揮霍人們的信任和信仰的行為，因此為它挖掘了墳墓。同情社會主義的鏈條斷裂了，而它的核心集團(即幹部們)，喪失了自己的信念，開始尋求其它解決問題的方法。

思想侵蝕來自於人們的親身體驗，例如經濟災難、俄羅斯在阿富汗戰爭中的損失和公眾的苦難。這些文章，幫助有政治頭腦的知識分子，解讀自身的體驗，並且加速了制度衰落的過程。我可以列出許多這樣的作品：首先，我推薦當時名噪一時的著作——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喬治·奧威爾和阿瑟·凱斯特勒的著作，沉寂了幾十年後，再次引起讀者的興趣。《短缺經濟學》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它真實地描繪出，不斷發展中的共產主義體制。這三位作者，只是揭示了高壓統治的冷酷、詭詐、虛偽和殘暴等本質。而我的專著，則是在其它層次上，冷靜客觀地觸動了讀者的思想和感情。它逐漸摧毀了人們幼稚的想法：社會主義可以具備「人性面孔」，因此有能力完成它的使命。列寧先知先覺地預視如果社會主義的生產率超過資本主義，那麼社會主義便將取得最終勝利，而《短缺經濟學》的讀者認識到社會主義，不可能佔據這種終將勝利的優越地位。

我不知道，有多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直接或間接地閱讀了我的書，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閱讀了這本書後，完全不為所動。我從來沒有進行這種調查，但是就我所知，許多讀了這本書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所觸動，即使是那些僅僅因為這本書在幾個月裏風靡一時，或者因為知識分子們經常談論它，而開始對它產生

興趣的人也不例外。*我警告自己不要誇大《短缺經濟學》的影響，但是即使從實際、而且謙遜的角度來評估這本書，它的影響力，無疑也是非常廣泛的。

再版的政治和道德抉擇

我從斯德哥爾摩回到匈牙利後，在科學院位於馬特勞哈扎的招待所裏，遇到弗倫茨·多納特。我曾經在前幾章提及多納特，他是反對卡達爾政權的一位知識分子領袖。當時我正在撰寫《短缺經濟學》的最後一章。我們在同一張桌子上進餐，而且經常在樹林裏一面散步，一面充滿熱情地談論科學、學術、政治和經濟等各種問題。

有一次在散步時，多納特說他正在編輯紀念伊斯特萬·比博的文集。†誰都可以預見到這套叢書，不可能合法出版，所以只能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發行。許多知名學者，都為這部文集投了稿。他問我是否也願意為此寫一篇文章，我果斷而且明確地拒絕了他的約稿。由於多納特非常清楚我對合法出版和非法出版的基本立場，而

---

* 我讀過著名匈牙利作家弗倫茨·考林蒂的日記，其中描述了他的讀書心得。我們私交很好，這原本可以成為吸引他注意《短缺經濟學》的原因，但是考林蒂的日記表明顯然他從來沒有讀過這本書，而且沒有在他活動的圈子裏提到這本書。著名歷史學家加博爾·克洛尼曹伊在他的精彩自傳中，羅列了在他生活的年代（即在五十年代出生的匈牙利知識分子）裏，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著作，不過其中沒有我的作品。

† 雅諾什·肯尼迪最早提出這個主意，即出版一套紀念文集來慶祝比博的七十歲華誕。比博去世後，他們著手開展這項工作。弗倫茨·多納特擔任了編輯委員會的主席，後來捷爾吉·本斯、山多爾·喬裏、阿帕德·根齊、阿利斯·哈爾達、雅諾什·肯尼迪、雅諾什·基什、帕爾·雷茲、耶諾·胥奇和扎多爾·托爾道伊也加入這個委員會。他們曾將這套叢書送到Gondolat出版社，希望能合法出版，但是出版社向更高層的黨務機關徵求意見後，拒絕了他們。因此1981年它不得不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問世。1991年社會體制發生改變後，它終於能夠正式出版。帕爾·雷茲負責編輯了這套叢書，並為它寫了序。

且知道我當時正忙於寫作《短缺經濟學》，因此沒有強人所難，只是平靜地接受了我的決定。

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都沒有感覺到多納特因為這件事對我心懷不滿。我們後來多次進行了有趣，而且秘密的討論。1983年夏天我在慕尼黑時，他還來探望我，當時他正在那裏看病。他回到布達佩斯後，我特意到醫院裏探望了他。當我看到他勇敢地與絕症鬥爭，而臉上還仍然掛著那熟悉的、略帶諷刺意味的微笑時，不禁為之感慨。我們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策略，但這並沒有阻礙我們之間建立真誠的友誼，以及互相尊重。

弗倫茨·多納特並不是我的熟人裏唯一在卡達爾政權下，參與非法出版物，或者地下出版物發行工作的學者。他們出於對人性的理解，理智地接受了我的決定。我感覺到他們非常尊重我為自己選擇的道路，而且非常欣賞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

我在第五章和第七章裏，描述了在1955年至1956年間我作出的決定：不以非法途徑出版的作品影響局勢發展。1957年，我進一步堅定了這個信念。我已經確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即立志成為專業的經濟學家，並融入西方學術界，透過合法出版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作出這個決定，意味著我要作出某些讓步。我為此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只要它們與我的道德觀不發生衝突，我會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

我努力在堅守自己的生活原則，寫作《短缺經濟學》，並不違反這些原則，而為比博的紀念文集投稿，則與此背道而馳。

自我審查要求我作出某些痛苦的犧牲。也許有些社會科學家，特別是作家或詩人，認為把自己的真實意圖隱藏在字裏行間，或者巧妙地躲過政治審查者的監視，便能給他們自己帶來特別的學術樂趣，但我卻無法從這種行為中，享受到任何快樂。我幾乎總是在強迫自己，把大腦中的所有想法，都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時至今日，仍然沒有改變這種習慣。當我不得不讓讀者透過自己的努力，發掘那些我無法表達的內容時，這無異於自殘。自我審查，是一種有損人格的過程。我把制度變遷，視為解放運動的原因之一，就是

它把我從反復進行自我審查的痛苦中，解脫出來。

致力於發行非法出版物的人，不會受到這些約束。他們可以把所有自己認為是真理的觀點，寫下來與讀者分享。我非常羨慕他們能夠擁有這樣的機會。*

對我來說，拒絕那些與自己擁有共同政治目標的朋友，是一種非常痛苦不安的經歷。這種感覺，就像你讓自己同生共死的戰友失望一樣。朋友曾經多次希望我，為地下出版物寫些文章，或者在抗議信上簽字，但是我總是固執地拒絕了他們。

我並不想在兩種情況之間，搖擺不定。我不想像那些抗議當局的人那樣，被迫噤聲或者被剝奪出版作品的權力。此外，我還希望保留自己經常出國的特權，但這決不是為了遊山玩水。每次到國外訪學的經歷，都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如果我能定期與西方同行見面，或者在西方最優秀的學府停留較長時間，與時俱進地獲得最新知識，那麼我必然能全心投入自己的專業研究中，並且終有所成。生活在以近親繁殖為特點的東歐學術世界裏，使人們思想狹隘的風險性，大大提高。當我的同齡人，在制度變化後，再踏入國際學術界時，他們很快便發現，自己處於相當不利的位置。

有些人在回顧歷史時，希望努力證明自己的生活，才是無可指責的。他們稱自己作出了唯一可以接受，並且合乎道德的決定，既不會過於激進，也不會作出太多讓步。他們認為激進的人太過魯莽，所以造成的傷害，遠遠超出他們所帶來的益處，而作出過多讓步的人，在與權力機關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美德，出賣給了當權者。

我對別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時，通常會比評判自己時更加寬容，但是我不接受沒有原則的道德相對論。有些人作出太多讓步，這在我的眼裏，無異於背叛；而有些人沒有必要地虛張聲勢，結果

---

* 我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幾年後，逐漸對它建立起自己成熟的觀點。我原本可以就這個主題寫一篇議論文，但是由於我永遠不可能正式發表它，所以始終沒有將我的結論落在紙面上。

無謂地挑起爭端，反而阻礙了他們的事業發展。我鄙視政治上的變色龍，他們像換內衣一樣，不斷改變自己的立場，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原則，以換取政治權力，或者豐厚的商業收益。

但是我必須堅定地承認，生活中存在各種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情況，而且其中許多都值得人們尊重。我深深地敬佩那些為了參與爭取民主和人權而作出的非法鬥爭，而甘願冒著失去生計和自由的危險，並且在必要的情況下願意犧牲生命的人。

不過，讓我們不要偏離關於選擇的問題。如果我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的理由，是地下出版物只會有幾百位讀者，而且這些讀者，通常局限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裏，而《短缺經濟學》這類通過自我審查的合法出版物，卻能影響到匈牙利國內外的成千上萬人，這種論調的確非常自私。雖然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人們可以馬上找到駁斥它的觀點：地下出版物的作者，可以更加激進地表達自己的主張，而我在某些情況下，卻只能透過暗示傳遞信息。我認為在專政統治下，這是兩種相輔相成的出版形式，而不是互相對立。我非常欣喜和安慰地看到人們有足夠的勇氣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來編輯和發行非法出版物。作為匈牙利民主的忠實信徒，我為自己和他們生活在同樣的時代，感到驕傲。我堅信他們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之間，相互支持，而且相互補充。

14 取得突破：1979年後

《軟預算約束》

我開始動筆寫這一章的前幾天，在經濟學界擁有最廣泛讀者群的學術期刊《經濟文獻》，刊登了一篇埃里克·馬斯金、熱若爾·羅蘭和我聯名發表的評論「軟預算約束」相關文獻資料的文章。[1]1979年，我首先在發表的文章中，使用了「軟預算約束」這個術語。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它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眾所周知的概念。

這個概念的意義和重要性

我從家庭的微觀經濟理論中，借用了「預算約束」這個詞語。讓我們來假想一個家庭，正在草擬預算。它必須計算自己的收入，是否足以應付支出（儲蓄金額也可以算進總收入）。這個家庭的所有可用金融資源，就是它的預算約束，它的支出，絕不能超出預算約束的範圍。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有企業如何營運。如果企業的運行一切正常，那麼它的收入，便足以應付支出，而且會出現盈利。但是假如它入不敷支，而且用光了自己的金融資源，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能性：一是企業完全依賴自身的資源，那麼它的預算約束便很**硬**。如果它處於持續虧損的狀態，這意味著不久後它便會倒閉。二是某些上級機關，也許會馬上

為它提供經濟援助，以幫助它擺脫困境。在這種情況下，預算約束便很**軟**，即這家企業的支出，沒有受到真正意義上的約束。即使它的支出長期超過收入和創辦資本，它仍然能夠維持下去。

對於所有了解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人來說，這個故事聽起來，都似曾相識。對在匈牙利等嘗試進行改革的國家來說（例如為企業負責人提供以利潤為基礎的激勵機制），這種問題表現得尤為尖銳。人們經常侃侃而談企業創造利潤的必要性，但在現實生產中，利潤背後真正的激勵機制，卻受到嚴重破壞。如果企業出現盈利，那麼這自然很好；但是如果它最終虧損，也沒關係——反正總會有人對它施以援手。這直截了當地反映出，偽市場經濟與真正的市場經濟之間的差別。後者既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

軟預算約束的確可以造成嚴重的破壞，即使產品的價格非常合理，企業也不會對價格、成本和利潤等發出的信號，產生非常敏感的反應。硬預算約束可以自動懲罰缺乏競爭力，而且不斷虧損的企業，而軟預算約束則保護企業免受懲罰，而且容忍它們效率低下的狀況。在這種局面下，生產者很容易不負責任地亂下訂單（例如導致需求失控），因為即使它們沒錢支付賬單，上級機關也會為它們掏錢，以解除它們的困境。這是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投資計劃，規模過大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投資計劃的最初支出，目標通常較低，而它們的結果，往往是超支情況達到令人非常擔憂的水平。

無論軟預算約束，還是硬預算約束，它們最終都讓企業負責人認識到值得自己關注的問題。*如果企業面臨的是硬預算，那麼他們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生產效率和收益率的事情上；如果企業面臨的是軟預算，那麼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與「上邊」搞好關係，這樣在困難的時候，便可以得到他們的經濟支持和緊急援

* 當然，極端軟預算和極端硬預算之間，存在許多中間級別的預算約束。我在自己的專著裏，詳細分析了這個問題和軟預算約束的其它方面。我希望在這本自傳裏，大致勾勒出各個學術觀點的核心特徵，這樣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便也能抓住其精髓。因此我用非常簡化的形式描述了「軟預算約束」理論。

助。與其勞心費力地監督工廠的生產營運狀況，倒不如在當權者的辦公室走廊上，踱來踱去，或者遊說上級，更加實用。

為什麼軟預算的概念引起這麼多關注，而且被廣為傳播？首先，因為它鑒別出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而且顯而易見的現象—這種綜合症的病因和規律，易於理解，而且可以加以解釋。毫無疑問，它的後果也極其嚴重。我從一開始便強調，儘管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加普遍，但是它在其它制度中，也不鮮見，其中包括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我雖然在專著中，首先集中精力，區分了公司行為中的軟預算約束，但是在醫療、教育、其它非營利性機構，以及地方政府等其它機構中，也察覺到此類現象。此外，如果國際金融機構，或者全球金融社，在幫助整個國家擺脫金融危機時，慣於使用軟預算約束，那麼所有經濟實體中，都會表現出這種綜合病的症狀。

不過人們廣泛接受軟預算概念的原因，不僅在於它與現實產生了密切聯繫，這個理論的結構，還幸運地符合了主流經濟學思想的要求。所有研究微觀經濟學的人，都對預算約束的概念，瞭如指掌，而人們很容易透過擴充，或者提煉某個常見概念的涵義，來發展新的思考方法。我在前幾章裏曾經闡析我們提出的「自主控制」概念沒有得到廣泛傳播，正是因為他們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與主流經濟學的常規思想，格格不入。現在幸運的是，我提出「軟預算約束」概念的情況，與當時恰恰相反。由於它建立在廣為人知的「預算約束」的基礎上，所以人們對它感到非常親切，而且饒有興趣地關注了它的內容，這有力地推動了人們對它的接受及傳播。

提出「軟預算約束」的時代背景

我提出軟預算約束的學術歷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在第七章講述了匈牙利政府把利潤激勵機制引進國有企業後，它們紛紛請求政府在企業虧損時給予補償。1958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是否應該調整分成？」的問題。從那以後，這個問題便時刻困擾著

我—我感覺到現實的表相之下，隱藏著某些重要的東西。

1972年，後來成為希臘總理的安德雷斯·帕潘德里歐，寄給我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父愛資本主義》。當時，他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學擔任經濟學老師。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馬上吸引了我注意的社會現象—許多社會中都存在的父愛主義現象。當然，我最感興趣的，還是這些特徵如何反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

即使在匈牙利最殘暴的壓迫統治時期，共產主義的獨裁者，也喜歡扮演「為人民獻身的父親」的角色。匈牙利的專政統治有所緩和後，這種嚴父的形象，逐漸讓步給笑容可掬的領袖形象。就政治結構而言，父愛主義意味著權力機構，把其它社會中，由個人、家庭、相關團體，或者機構最低層(如企業)作出決定的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過去父親往往被賦予作出家庭決策的權力，他們有義務照顧整個家庭。而父愛型社會，通常把社會成員，視為未成年人，幾乎和嬰兒一樣沒有任何決策權。社會不指望他們自己照顧自己，而且認為他們面對任何災難時，都應該理所當然地等待上級的救助措施。

社會主義社會裏的父愛主義，和政府挽救虧損企業的做法，在我的大腦裏連接起來。我在奧斯陸大學發表演講時，首次提出這個觀點。我運用了家庭撫養孩子的過程，來比喻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我把父愛主義劃分為從四到零的五個等級。在第四級中，**政府向社會成員贈予實物，社會成員消極接受**。他們就像新生兒一樣，接受父母給予的一切，而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在第三級中，**社會成員積極地表達出自己的需求，政府根據他們的需求贈予實物**。孩子在逐漸長大的過程中，仍然享受父母提供的所有物質條件，但是他已經學會說話，可以向成年人表達自己的願望。這兩個等級的父愛主義，與嚴格執行國家計劃的經濟體系中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非常相似。國家為企業提供生產計劃和完成計劃所需的資源。如果該國的獨裁統治非常嚴酷，那麼國家甚至不會徵詢企業的意見(即第四級)。當獨裁統治略微有些放寬時，企業和權力機關才有機會就計劃的指標，討價還價(即第三級)。

第二級的特徵是**金融補助**。孩子已經離開家庭，但尚未獨立（最典型的範例，是美國的大學生）。父母仍會給孩子零用錢，而且支付他/她的生活費用和學費。只要孩子手頭的錢花光了，便會伸手再向父母要錢，而且通常屢試不爽。如果我們把這個類比引入經濟環境，那麼可以看到，企業從政府的投資項目中得到財政撥款後，可以對其自行運用—不過即使企業花光這些財政資源，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仍然會為它們支付額外的支出。

我把第一級稱作**已經自立，但是仍然受到資助**的等級，把第零級稱作**完全自給自足**的等級。孩子長大後，他/她的收入，足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但是遇到經濟困難時怎麼辦？他/她的父母會馬上伸出援手（第一級），或者認為孩子現在應該對自己的命運負責而袖手旁觀（第零級）。讓我們回到企業的實際營運情況，第一級反映了以市場為導向，並且處於改革進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所有企業實行自我管理，但是一旦陷入長期虧損的狀態中，政府便會馬上站出來提供援助。第零級描述了沒有父愛主義，而且存在激烈市場競爭的環境。企業經營不善是自己的問題，它不能指望任何人為它償還債務。

後來我在《短缺經濟學》中，沿用了這種用家庭和社會的關係，形象地描述父愛主義等級的方法。我在奧斯陸大學發表演講時，還沒有使用軟預算約束和硬預算約束這樣的術語。父愛主義的第二級和第一級（第一級尤為重要），構成了被我稱作「軟預算約束」的經濟現象的主要內容，而第零級則是「硬預算約束」。

我在思考預算約束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嘗試定義這個概念時，並沒有馬上想到這個術語。我進行研究的出發點，是**真實的經濟現象**和觀察到的實踐情況。我幾乎是在無意中靈光一閃，想到了這個術語。我在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準備系列演講時，寫下了很多數理方程式，並為國有企業的營運情況，建立了模型，其中包括它的產出約束下限，和可使用資源的上限。為了使模型更加完整，我必須加入財政約束的元素。儘管在描述利潤最大化企業的標準微觀經濟模型時，很少出現「預算約束」，但是我還是把它寫入了模型。但是我

馬上想到這不是一個有效的約束！一間公司無法克服資源的約束（例如原材料限額），但是它的預算約束是「軟」的，它知道當自己陷入困境時，上級絕不會袖手旁觀。

因此我在演講中，使用了「軟預算約束」的術語。我還記得聽眾中的兩位教授（瑞典教授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爾和美國教授哈維·拉帕姆）和一名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拉爾斯·斯文松），在演講結束後，直接找到我，說他們非常欣賞「軟預算約束」的觀點。寥寥數語鼓勵的話語，促使我更加審慎地考慮這個術語，並且對其它相關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自那以後，我發表演講，或者著文探討短缺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概況時，都把軟預算約束作為社會主義體系中存在機能障礙的典型特徵，並且著重對其進行描述和分析。

在人類知識的發展史中，一定存在這樣的範例，即人們的腦袋中，直接產生了完整、成熟的理論體系，但這種事情，從來沒有在我的身上發生。從1958年，在匈牙利發表第一篇關於短缺經濟的文章，以至2003年在《經濟文獻》雜誌上發表文章，評論它的相關文獻，雖然我的根本觀點沒有改變，但是這中間的四十五年，卻改變了許多我描述研究方法、解釋因果及展示其後果的方式。目前我對「軟預算約束」問題的立場，主要體現在2003年發表的文章，和1992年的總結性作品《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現在請允許我來談談，自己過去和現在在立場上的兩點差異，因為這已經超越了狹窄的學術討論範疇。

我在早期發表的作品中，解釋軟預算約束的成因時，主要強調了國家在父愛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社會主義國家如同責任心極強的父母一樣，一旦「生」出自己的「孩子」（即國有企業），便無法放棄它們。此外，國家必須保障企業員工的生活水平。許多人讀到這裏時，都會認為這是對「軟預算約束」進行因果分析的最終結果，但事實上，這遠非分析過程的終點。即使在當時，我也不斷強烈地反問自己：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會扮演這種角色？當它接受這種「充滿愛心」的角色時，它如何把其與獨攬國家大權的要求，結合在一起？這

種角色，如何融入它的政治結構和官方意識形態裏？《短缺經濟學》的最後一章，即第二十二章，探討了父愛主義的問題，我本來應該在它後面再加一章，討論這些深層關係，但是終究沒有動筆。我在前幾章敘述了自我審查的問題，正是由於這方面的憂慮，阻止我撰寫第二十三章。

幸運的是，多數讀者都可以想像出《短缺經濟學》的觀點，會朝向哪個方向發展下去。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採用我描述的思考方法，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他們只是簡單地認為，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所以才會這樣終結《短缺經濟學》。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一直在猜測這些同事，會如何看待我。難道他們真的以為，我在布達佩斯生活了大半輩子，卻沒有意識到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本質——雖然我沒有明確地說出自己的觀點？*當然，當時我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政治結構在國家與公司的關係上，留下了印記。我努力在字裏行間，留下各種暗示，但結果發現，只是徒勞而已。這本書的最後幾頁，非常籠統地總結了「體制系統」扮演的角色，但是這似乎無法滿足某些讀者的需要。

我在前幾章講述了我為了保證《短缺經濟學》和其它作品能合法出版，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且我最終讓分析短缺經濟的因果鏈，在父愛主義問題上中斷的做法，也引發了許多誤解。我認為這個結果，是為了守法，而不得不付出的一個代價。1992年，我出版《社會主義體制》時，自我審查的高牆，已經開始倒塌，我終於可以在這本書裏暢所欲言，表達自己對軟預算約束的所有看法。

讓我們來探討我在「軟預算約束」問題上的第二次思想飛躍，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認為軟預算約束和短缺之間，存在一條因果鏈，但是現在我**特別強調**了這種關係的強度。

一個國家在建立全面、長期及嚴重的短缺經濟時，需要滿足的

---

*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不斷發現有些西方同行，並不了解我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受到審查制度或自我審查的限制。他們在這方面的無知，總是讓我感到驚詫。

必要條件，是影響企業絕大部分生產活動的預算約束，必須是軟約束，但這不是**充分條件**。其它因素必須同時產生作用，例如禁止建立自由企業、政府採取行政措施，限制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競爭、價格系統遭到扭曲等等。《短缺經濟學》過分強調了軟預算約束，我無法用自我審查，或者自己必須刪減某些內容才能合法出版等藉口，來解釋這個缺陷。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當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還沒有完全成熟。

我在描述軟預算約束造成的後果時，出現了另外一個偏見。短缺是這本書的主題，因此它的分析重點，是探索這個綜合病，如何對「失去控制的」需求產生影響。這種影響非常重要，但是較它更重要的是，所有學者在研究這個課題時所關心的另外一個問題：軟預算約束對生產率、競爭及激勵機制等產生的負面影響。《短缺經濟學》也指出了這些問題，但是現在，我會更加突出地強調它們的重要性，而且把它們列為軟預算約束造成的最惡劣影響。

實踐證實

我認為用實踐證實理論的診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983年，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青年講師阿格尼絲·毛蒂奇，和我開始整理過去幾年裏所有匈牙利國有企業的主要財政數據，並且把它們彙編成數據庫。我們在電腦裏，輸入了約130萬個數據，當然，當時的電腦運行效率，遠遠低於現在的電腦。阿格尼絲和她的同事，把這些數據轉化成更加容易處理的形式後，我們便開展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經濟計量分析，展現了企業利潤被重複再分配的複雜渠道。企業利潤經過非常曲折的官僚再分配過程後，人們已經無法辨別最終出現在企業帳目上的「最終利潤」，因為這些面目全非的數據，嚴重偏離了企業的原始利潤，或者虧損情況。我們的計算結果，顯然證實了官僚再分配體系，從原始利潤最高的企業裏，虹吸出相當多的利潤補貼給那些原本虧損的企業。利潤大戶受到懲罰，而虧損者則不公平地受到獎勵。這種結果，為我們

提供了軟預算約束存在的確鑿證據。1987年，阿格尼絲·毛蒂奇和我，聯合發表了《企業利潤的官僚再分配機制》，並把這些計算結果，寫入書中。

在蘇聯帝國分裂之前，其他作者也開展了實證性研究，以驗證與軟預算約束有關的理論，但這類研究，只是零星出現。如果我們把時間「快進」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便會發現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在那個時候才開始真正地實現飛速發展。這是人們的思想取得突破的時期。到後社會主義國家訪問的西方學者突然開始意識到，軟預算約束是這些國家從先前的經濟體系中「繼承」下來的一個經濟災難。人們根據精心收集的統計數據，進行經濟計量分析，並寫下一系列闡述詳盡的文章。此外，在世界銀行或歐洲重建與開發銀行，分析社會主義或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報告中，幾乎沒有一部不會提到軟預算約束阻礙企業發展的問題。

為這一現象建立數理模型

和進行實證檢驗的工作一樣，在為軟預算約束綜合症建立數理模型的過程中，我感到必須進行正式的理論研究。我找到一名優秀的合作者——約根·韋布爾。*約根不喜歡「軟預算約束」這個術語，但是他對父愛主義的概念，卻非常感興趣。我們成功地建立一個數理模型，並證明政府以父愛主義的方式支援虧損企業時，企業下訂單的謹慎程度便會降低，需求相應上升，而且它們的需求，顯著高

* 我在瑞典認識約根時，他還是一名學生，但是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他後來不僅與我合著學術作品，而且更成為我的女婿和瑞典外孫、外孫女的父親。

我們在八十年代早期共同發表了關於父愛主義的文章。有一次約根訪問布達佩斯時，我們開始了這項研究，並通過斯德哥爾摩和布達佩斯之間的信件往來，最終完成了它。如今在互聯網統治一切的世界裏，這種通過遠距離合作開展研究的方式，也許並不鮮見。即使學者們遠隔千山萬水，也可以通過網絡開展合作，並且迅速得出研究結果。

於所有企業必須在競爭的環境裏自負盈虧時的需求水平。[2]

普林斯頓大學的匡特也建立了一個有趣的模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學時，理查德·匡特曾熱心地為我提供了各種幫助。現在他也開始研究軟預算約束理論。他和同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來論證相關課題，譬如「科爾奈效應」(即證明軟預算約束的「軟度」和企業投入品需求上升之間的理論聯繫)。[3]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埃里克·馬斯金，和當時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馬塞厄斯·德沃特里龐[4]創建的模型，為這項研究帶來理論上的轉折點。九十年代初，我在哈佛大學任教時，經常和埃里克討論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有關的問題，其中也包括軟預算約束。當時他和馬塞厄斯已經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研究著名博弈理論中的「承諾」問題。這個觀點認為「決策主體」(即在特定的情境下，參與合作或衝突的參與者)之間的聯繫，會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這取決於參與各方是否始終遵守了他們先前的承諾，還是後來改變立場，背棄承諾。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行為是否前後保持一致？這兩位理論經濟學家，認識到我提出的軟預算約束，是**特殊的前後不一致**的現象。

讓我們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家大型銀行透過提供貸款，來資助一家企業的投資項目。它承諾會嚴格遵守初始的貸款合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它都期望企業，能夠獨立自主地執行投資項目。但是當投資企業發現，自己遇到財政困難，而無法履行貸款合同中的條款時，儘管銀行先前已經承諾要遵守初始合同，但還是會為企業提供經濟援助，即銀行事後有意願改變合同條款，或者提供更多貸款。

這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銀行為了狹隘地滿足自己的經濟利益，因此願意提供緊急援助。一旦它為企業的項目投入資金，即使出現壞帳後，它還是會繼續投資，這完全符合人之常情。

德沃特里龐–馬斯金模型在兩個方面的吸引力非常重要：首先，它豐富了「軟預算約束」的因果分析內容。它不再局限於某個機構出於政治動機、微觀經濟動機或社會動機挽救虧損企業的範

疇。*即使從利己主義出發的簡單動機，也會促使追求利潤的銀行，挽救和幫助那些向本銀行貸款的虧損企業。我們可以從商業實踐中，真實地看到這些情況：大型銀行會做好充足的準備，援助經營不善的不可靠客戶。這種解決方式，也許比勾銷虧損項目，更加合理，而且能夠降低損失。

德沃特里龐–馬斯金模型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它利用了博弈論的工具解決問題。在九十年代，經濟學家的興趣，都轉向博弈理論——成百上千名研究者，歡天喜地地開始利用它的方法論，研究各種課題。博弈理論成為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是那些渴望充分運用這種魅力十足、精巧而且靈活的研究技巧，並且切實地理解它的研究者，現在可以用它來建立簡單易懂的模型，來描述軟預算約束。

第一個德沃特里龐–馬斯金模型推出後，出現了各種變體。它們從不同角度出發，闡明軟預算約束綜合症的各個方面、它的起源及產生的效果。

第一篇總結性文章背後發生的故事

讓我們按照時間順序，回到上一節沒有講完的故事。到了1984年，我已經在多篇文章和《短缺經濟學》裏，提到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為此專門寫篇文章，總結我對這個課題的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希望能夠廣泛地宣傳這篇文章，而不是僅僅引起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和東歐研究專家的關注。我深信如果其他經濟學家也接觸到這個當時還不為人知的觀點，他們一定會受到激勵，並將其應用於研究市場經濟的工作中。

我撰寫的總結性文章中，沒有使用任何數理模型，從頭到尾都

*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救助行動是合理的呢？對那些同樣渴望得到救助的人來說，救助行動會對他們會產生相對微弱，但是持續性的影響。難道這些影響，不如救助行動可能取得的微觀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重要嗎？不過我不會在自傳中探討這個重要，而且在學術上具有激勵作用的規範性問題。

是用文字表述了自己的想法。文章中使用了一些說明性的圖表，但只是把數據放在那裏而已，而沒有對它們進行任何數理–統計分析。此外，我也沒運有用經濟計量分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我把這篇文章，寄給這個領域裏最權威的期刊《美國經濟評論》，幾個月後收到了編輯的回信。他告訴我，雜誌社把這篇文章，交給三位審稿人，進行評定。有一位審稿人認為，對文章略作修改後便可以發表，而另外兩位卻強烈地批判了它。編輯特別強調說，這兩位審稿人的語氣非常苛刻，甚至有些過火。不過他認為，如果我能運用調查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把文章投給《經濟文獻》，也許效果會更好。他知道我已經答應了為該雜誌寫相關題材的文章。[5]

事實上，編輯了解到的情況並不準確，但是他為此禮貌地拒絕了我的文章。我確實答應了其它期刊的約稿，但研究的課題，全然不同——它的題目，是對匈牙利經濟改革的全面調查和評估。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幾乎沒有任何重疊部分。

簡而言之，《美國經濟評論》拒絕了我的文章，我把它投給另外一本雜誌 *Kyklos* 後，沒有經過任何改動便被發表了。[6]從那以後，這篇文章也成為我的作品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

我可以安慰自己說，其他更偉大的學者，也曾有作品被拒諸門外的經歷。多年後，兩位美國研究者約書亞·S·甘斯和喬治·B·謝潑德，對許多知名經濟學家進行了調查，看看他們是否曾經被拒稿。*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羅伊·哈羅德爵士，到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美國經濟學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保羅·A·薩繆爾森在內的許多人，都承認曾有類似經歷。許多核心期刊都曾經拒絕他們的投稿，其中包括不少後來成為經濟學經典理論的文章。既然我的

---

* 他們也問過我類似的問題，但是當時我沒有提起這段經歷。既然《經濟文獻》期刊上的文章，已經敘述了軟預算約束觀點的傳播過程，那麼我認為現在是講述這段經歷的時候了。這本自傳在描述這次事件的同時，還會談及它的背景情況，所以這種框架結構最適合講述這個故事。

經歷並非例外，那麼還是不再討論這個話題的好。

但是這件事件的後續，卻非常有趣。錢穎一同樣給《美國經濟評論》投了一篇稿件，其主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短缺如何與預算約束的「軟度」之間產生聯繫（當時他還是哈佛大學的研究生，現在則已經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教授）。他設計了一個精巧的數理模型，來研究這種關係（這個模型，是上文提到的德沃特里龐–馬斯金模型的變體）。他根據學術期刊習慣接受的研究方式，以精確的數理語言，表達了自己的理論命題，並且提供了嚴謹的證據。這篇文章，提到了它的學術來源：《短缺經濟學》、我在 *Kyklos* 上發表的文章，和德沃特里龐–馬斯金的文章。這篇文章，是錢穎一博士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埃里克·馬斯金和我不僅是他的老師，而且更被學校指派為他的論文導師。我們都讀了他的原稿，而且像所有導師那樣，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錢穎一在文章裏，明確對此表示了感謝。

錢穎一在自己的文章裏，提出意義重大的問題，而且在廣泛引用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原創思想，用非常值得推崇的嚴謹性和清晰性，闡明了這些思想。我認為編輯接受這篇文章，並且發表它的做法完全正確。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的心裏沒有產生一絲一毫嫉妒後輩的想法。在穎一的學生時代，我們的關係便非常融洽，而且自那以後，更不斷加深。我經常努力幫助他掃清前進路上的障礙，而他也為我提供了很多專業幫助。無論我們何時見面，他都會友善真誠地關心我。[*]當我最優秀的學生，在經濟學界最知名的論壇上發表作品時，我的心裏充滿了喜悅。

但是為什麼雜誌社對這類文章前倨後恭呢？儘管我是從被拒者的角度，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個人的經歷，反映了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負責審稿的人，到底採用什麼標準，來選擇可以被錄用的稿件？發表文章會對學術研究產生什麼影響？從更深的層次來

---

[*] 我和妻子第二次訪問中國時，錢穎一特意抽出時間，從美國飛回中國幫助我與中國同行交流。我們的口譯員出了很多問題，所以在很多場合下，都是由他擔任我的翻譯。他開玩笑地說自己精通三國語言：英語、漢語和科爾奈語。

說，如今在出版、任命和晉升等問題上通行的做法，鼓勵了哪些學術行為？

從這件事中汲取的幾點教訓

在開始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希望預先聲明，我提出的問題，都是非常重大，而且是具有的深遠影響。關於如何充分解決這些問題的討論，則超出了這本自傳的範圍。我會進行部分因果分析，而且只涉及與自己的經歷有關的問題。*我不會分析雜誌社的選稿標準中其它同樣重要的問題，或者全面剖析它們對學術活動所造成的良性或惡劣影響。例如，我不會探討這些雜誌社的編輯和審稿人，在選擇可發表文章時堅持高標準的做法，會帶來哪些益處，儘管我認為這對學術發展非常重要。

雜誌社的審稿過程中，包含著機遇的因素，而且毫無疑問，以下兩種錯誤，都可能發生：有發表價值的文章落選；而不符合發表標準的文章被選中。審稿的整個過程，是由人來作出決定，而世界上從來沒有不會犯錯的人。問題的關鍵在於其中是否存在**系統性**的錯誤。雜誌社在接受和拒絕來稿的工作中，是否採用了規律性，而且重複發生的扭曲做法？許多人認為這個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扭曲事實的傾向，在此我只想詳細討論其中的一種。

人們首次提出社會科學中具有重大意義和前瞻性的新觀點時，很難用準確無誤，而且無懈可擊的方式闡明它們。†這種觀點第一次出現時，通常是以模糊的推測形式與世人見面，由此開始一個漫長的思考和解讀過程。這類論斷，雖然有時包含不正確的內容，但是卻發人深省，可以引發一系列調查研究工作，並能取得累累碩果，

---

* 我只考慮了社會科學中存在的問題，因為我不了解自然科學的工作方法及取得科學發現的流程。

† 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如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就是其中的一個範例——阿羅首次提出不可能理論時，就用精確的數學形式闡明了這個傑出的原創發現。

因為當研究者開展實驗，以反駁其中的錯誤論斷時，往往就在它的引導下，一步步接近真理。

自從研究者把數學方法加入經濟學研究的「武器庫」後，它便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當我追溯許多學術理論的發展過程時，我發現人們提出令人激動的重大見解時，往往都是先用語言闡述其內容，而不是數理模型。亞當·斯密首先在文章中探討了「看不見的手」的協調作用，很久以後，才出現了里昂·瓦爾拉斯以數學形式表示的均衡理論，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的均衡理論，多少有些不準確。更久以後，阿羅和德布魯才提出精確且完美的均衡模型。學術界中首先出現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及其不太準確的利率和流動性偏好理論，後來才出現了約翰·希克斯的IS–LM理論（即投資–儲蓄、流動性–貨幣供應）。他以數學形式闡述，並進一步提煉了這些觀點。[7]最早提出正義論的是約翰·羅爾斯，然後阿羅才以數理形式，描述了其中的一個觀點。[8]約瑟夫·熊彼特首先著書探討了企業的角色，但沒有進行任何數理分析[9]，幾十年後，菲利普·阿吉翁和其他經濟學家，才以簡練嚴格的數理模型，為其建造起框架。[10]

儘管我已經把經濟學研究的過程——或者更精確地說，非常重要的新發現誕生並且發展的過程——簡化到了極致，但還是從中區分了三個連續的階段（雖然有些時候，它們會暫時重疊在一起）。在第一個階段，有些學者發現問題，並且進一步把問題指出，首先為這些「謎團」提出推測性的解決方法。在第二個階段，有些學者「理清」了論證的思路，提出準確的概念體系，並且闡明相關的假設和抽象概念，以提出可證明的結論，同時為這些命題，提供合乎邏輯的證據。第三個階段（即最終階段）主要是得出結論。人們可以在這個階段，進一步提出更加深刻的理論問題，同時為經濟政策，提供實用的經驗教訓。

在第一個階段，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有直覺、發現問題的能力、想像力及用新的方式，把觀察到的孤立現象和孤立的論斷聯繫在一起的能力。使用數理模型進行分析的方法，主要出現在第二個階段。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而且在某些課題的研究中，甚

至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第三個階段是得出理論結論的階段，其中使用的認知過程，與第一個階段非常相似。人們主要依靠對現實的合理認知，以及把理論命題與實際應用，進行比較的批判精神，得出實用的結論。

我並不是想說，這三個連貫的階段，構成了普遍適用於經濟學研究中，取得重大發現的有效模型。我知道有些研究者，在第一個階段，便開始創建數理公式和模型，或者用幾何圖形，來代表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我還知道有些研究者，對這些方法乾脆敬而遠之。研究工作中，經常會出現反復的過程，即在第二個階段獲得的初始經驗，推動研究者對第一個階段，進行反思——換言之，他們要澄清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且提出新的猜想。學術團體研究科研項目時，通常會安排不同的研究者，承擔不同階段的任務。我要強調的重點，不是評判研究工作的時間次序，而是區分認知過程中較鬆散和較嚴謹的組成元素。*

就我的經驗來看，數學經濟學的泰斗們，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認知過程的複雜性及研究的角色分工。我從來沒有聽說阿羅或庫普曼斯對那些表達不準確，或者不完全準確，但是包含真知灼見的觀點，不屑一顧，也沒有聽說他們會貶低這種觀點的創造者。†英國經濟學家懷爾登·卡爾曾經一語道破天機：「大致的正確，總比精確的錯誤來得強。」[11]

讓我們回到學術刊物的選稿標準問題上，那些具有很高的學術

---

* 我對於雜誌社選稿過程的批判，顯然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對於表述不完全的新觀點缺乏耐心；對沒有使用數理模型，而只是使用語言陳述觀點的文章，存在偏見。在實際選稿的過程中，這兩個問題往往糾纏在一起，難以分割，因此我們有理由將它們放在一起解決。

† 我清楚地記得有位中庸的數理經濟學家，曾經大肆貶低赫希曼的《退出、呼聲和忠誠》(1970)。我在前文某一章提及這本書。《退出、呼聲和忠誠》雖然不算一本洋洋大作，卻是從全新的角度，精湛且詳細地闡述了新的觀點。可是這位中庸的經濟學家全盤否定了它的價值，認為它冗長囉嗦，而且邏輯混亂。他完全沒有理解作者用這樣的篇幅探索這個簡單主題的目的。

價值，但是不完整的原創性理論，應該發表在哪裏？難道只有結構完整、表達精確的文章，才能出現在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嗎？難道這些期刊，應該在百分之百地確信投稿人不會出現錯誤的情況下，才選用他們的稿件嗎？*

假如某些學術期刊，譬如《美國經濟評論》，專門刊登那些被我稱作研究「第二階段」產生出來的文章，那麼只要其它權威性略差的期刊，願意為「第一階段」產生出來的文章，留出空間，那麼這也不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而且不完整的原創性作品，也應該有機會和成熟的作品，一同出現在學術刊物上。†

我剛才使用了「權威性略差」這樣的字眼，因為幸運的是，仍然有許多期刊，願意發表那些不完整，但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學術作品，不過它們通常都是二級刊物。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對面試和晉級等因素，不能發揮太大作用。我們站在兩個重要問題的結合點上：核心期刊如何選擇可以發表的文章，以及著名院校如何選擇教師。當我第一次聽到，一位瑞典學者半諷刺、半認真地說，在《計量經濟學》上發表兩篇文章，就可在瑞典獲得正教授職位時，感到非常震驚。即使他的話不完全正確，但內裏也包含著一些真實的情

---

* 假如學者在投稿中提出非常重要的理論，甚至已經建立起它的完整體系，那麼編輯或審稿人便不需要具備深刻的洞察力，就可以判斷出這些作者對已經經過實踐檢驗的模型進行小幅調整是否有意義。但是他們需要具備敏銳的眼光，才能從不完整的理論和命題中，甄別出有希望發展成為成熟理論的文章，將他們發表在雜誌上，同時摒棄沒有價值、無趣或思路混亂的文章。

† 我還可以以自己發表作品的親身經歷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1978年我參加計量經濟學會在芝加哥和日內瓦召開的會議時，提出了《短缺經濟學》中的部分主要觀點（當時這本書還沒有完成）。這篇文章從頭到尾都用文字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沒有使用任何數理模型，而且它的理論觀點並不十分成熟。然而《計量經濟學》當時的主編雨果·索南夏因還是決定發表這篇文章。我相信在《計量經濟學》的創刊史上，選登這樣一篇完全沒有使用數理方法的文章並不多見，而且這一切都歸功於索南夏因教授敢於創新的勇氣和接受非正統觀點的開明態度。

況。在西方國家，剛剛拿到博士學位進入研究領域，而且急於在工作中，得到迅速提拔的學者，通常不會嘗試提出革命性(但是沒有經過提煉)的新觀點。最穩妥的方法是，在研究中使用學術界裏廣泛認可的理論，以及經過實踐檢驗的數理模型。他們只要對這個理論和模型略作修正，便可以得到自己的學術成果，而且其中的所有定義，都會很準確，所有命題的證明過程，也會完美無暇。這種做法，使他們的文章，被頂級期刊接受的機率大大增加。*此外，為了讓自己的工作經歷看起來光彩奪目，學者們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根據以上標準選用稿件的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大量文章。

我認為上述的選稿標準，有百害而無一利。它使得學者們對反復試驗的研究精神，望而卻步。雜誌社的編輯們認為，一旦出現錯誤時，自己承擔的風險太大，但事實上，只有經過多次脫靶的訓練後，才能真正的百步穿楊。當時的選稿體系，迫使學者們在應該勇敢承擔風險的時候，變得謹小慎微。2003年，瑞士經濟學家布魯諾·弗萊所發表文章的標題，便足以充分指出這個問題的嚴峻性：「以賣淫的方式發表？在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學術失敗中，作出抉擇。」

如今的核心期刊，沒有真正地為年輕學者提供任何磨煉翅膀的機會或獎勵。這是一個自我強化和自我發展的過程。更多學術刊物，立志成為迷你版《美國經濟評論》，並且盲目模仿它的編輯原則。更多二流和三流大學，試圖仿效最優秀的五所或十所大學，要求自己的助教，把所有腦細胞動員起來，努力向雜誌社投稿，並且希望這些文章，能擠過審稿的「絞肉機」，最終出現在學術雜誌上。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他們沒有任何精力，提出危險的觀點(即無法被雜誌社接納的觀點)。核心期刊會從使用這種方式的年輕研究者裏，選拔未來的審稿人，而這類審稿人，又會傾向於選取與自己的研究風格相近的來稿，這樣，這種選稿方法，便一代代傳遞下去。各家

---

* 開創全新的研究課題對年輕學者來說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他們不可避免地要用很長的篇幅來討論它，而核心期刊在選稿時往往傾向於簡明扼要的來稿。

雜誌社在選用稿件的文風、內容、格式、討論結構和方法論上，日漸統一。

讓我們來拓寬這個話題：其他國家裏，越來越多的經濟部門和經濟學期刊，開始仿效美國採用文章發表的情況，以這種存在偏見的標準，作為僱傭、保留職位及升遷的依據。而且更危險的是其它社會科學，例如社會學和政治科學，也開始追隨美國經濟學研究的消極模式。有時，這些領域裏的研究者會受到這樣的威脅：你必須為研究對象建立數學模型，否則我們會認為你的文章，不具備科學性。數理方法是讓投稿「受到尊重」的重要籌碼，這種現象，起初在經濟學研究中非常盛行，但是現在，已經日益蔓延到其它社會科學領域中。儘管有些觀點，運用普遍的文字語言，便能簡單地表達清楚，但是更明智的做法，是用更加複雜的數學公式，來描述自己的觀點。儘管這種表達形式，增加了理解的難度，但是它卻顯得「科學味」十足。在很多情況下，這類數理公式或方程式，看起來就像論證過程中多餘的裝飾物一樣，不具備任何解釋性功能。作者們使用它們，只是為了讓自己的文章，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已。

我的目的，不是批判把理論形式化或使用數理技巧等研究方法。我自己一直都是這些方法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我反對的，是肆意誇大這些研究方法的作用，以及由此引發的偏見——即主觀地把一種研究方法或研究手段，置於壟斷地位。我希望更多研究者，支持和推崇嘗試、學術實驗、創新和原創等研究要素。

每當我想到，自己從前沒有機會生活在美國這樣靜謐的學術世界中，便不勝唏噓。我有充足的自信，認為自己如果一開始便在美國學術界工作，那麼一定可以順利地從講師晉升為正教授。我原本可以避免太多偏離目標，或者走入死胡同的經歷！我原本可以直接了當地取得很多成就，而不用走那麼多彎路！不過有時候，我又感到自己，走過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這也算是件幸事。我從開始從事研究工作的那天起，便從來沒有用外界強加的教條和紀律，給自己套上枷鎖。我寧願做一個局外人，也不願意成為機械的「模式複印機」。或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多次偏離了正確的軌道，但是我

卻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學術獨立性。

近來國際學術界，對核心期刊選稿的標準，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發展的影響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辯論。*我希望我的評論，能夠對這場論戰有所貢獻。我曾經詳細分析這個問題，因為我深信自己的經歷，絕不是孤立的個案。我不是在利用這個機會，從被拒絕的投稿人的角度，發泄怨氣，而是在談論一個重要，而且普遍的現象。

我曾經在前幾章裏，描述了我為布達佩斯經濟研究所起草改革建議的經歷。1971年，我認為研究所在僱傭教職工和升遷等問題上，應該對候選人發表文章的情況，作更大的關注。我極力主張，讓東歐國家的學者，在權威的國際性學術刊物上，與其他國家的學者，一較高下。我承認與現在相比，三十五年前，我還不太了解西方國家的學術刊物在選擇稿件時，使用了扭曲的標準，不過即使在我更加透徹地認識了這些標準的危害後，仍然不會收回自己當初的建議：東歐學者，應該竭盡全力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刊物上，發表文章。我曾經在第十一章，使用了一個對西方市場出口的比喻，在這裏，我希望延伸這個比喻的內容。為了提高匈牙利（或者更廣泛地來說，整個東歐國家）的產品質量，我們必須把它們推向西方市場，強迫它們滿足這些市場的苛刻要求。雖然我們知道西方市場，並不全都是完美的市場，但是仍然要堅持這種做法。在西方市場上，壟斷、大公司佔據絕對優勢和消費者對不熟悉的產品存在偏見等許多因素，扭曲了完美市場應該具備的理想的選擇標準。但我們不能像繭蛹中的蠶那樣，用邊境把自己封閉起來。我們絕不能狹隘地推行學術上的「閉關鎖國」，或者滿足於在熟悉的國內環境中取得的成功，因為這些做法，只會引發盲目自滿的情緒，而且降低學術作品的質量標準。

因此，儘管我對國際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持批判性意見，但是

---

* 這場論戰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是格倫·埃利森。他曾經是頂級理論數理經濟學期刊《計量經濟學》的總編，最近才離開這個職位。他猛烈抨擊了當下在學術期刊出版界流行的做法。

我仍然堅持，自己在發表文章方面的建議，特別是強調它在匈牙利選拔人才和學術任命等問題上發表的作用。

15 溫和冷靜的批判：1968–1989年

《匈牙利的改革過程：遠見、希望和現實》

1948年，南斯拉夫脫離蘇聯集團和蘇聯的政治霸權主義後，於1949年拒絕了斯大林經濟體系的控制，它更加傾向於本國土生土長的「自主管理」體系。匈牙利是蘇聯集團內部，第一個嘗試把共產主義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國家。它於1968年放棄了指令性經濟，政府不再對國有企業發布中央指令控制它們的生產，也不再對企業所需的材料、能源、勞動力或工資進行中央分配。「經典的」斯大林模式，被「新經濟機制」所取代。

我們認為匈牙利改革進程所產生的重大意義，早已跨越了它的國界，這絕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偏見。匈牙利的成就，為所有被呆板僵硬的指令性經濟壓制了積極性和進取精神的國家，燃起希望之火。當時許多國家，都把匈牙利視為學習的榜樣。它的經驗影響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和蘇聯及東歐國家經濟學者的思維。擅長研究共產主義經濟體制問題的西方學者，也仔細探討了匈牙利的改革之路。

喜憂參半的希望

在1968年的轉折點後，匈牙利經歷了狂熱的二十年。隨著政治力量的關係不斷改變，改革進程多次停滯後，又多次重新啟動。當

反對改革的勢力佔據上風時，改革進程有時甚至會發生逆轉。不過具有前瞻性的歷史趨勢，最終取得了勝利，到了八十年代末，匈牙利的經濟體系，顯著地表現出較1968年更加強烈的市場經濟特點。但是直到1989年至1990年間，政治體制完全顛覆之前，它仍然是個「混血兒」——官僚制度與市場不協調地結合在一起的產物。

在匈牙利的國有企業中，發展起來的是市場經濟的「贋品」，即虛假和人為的市場經濟。政府不再制訂詳細的計劃指令，而是把決策權交給企業的管理層。不過如果企業的管理人，是由黨委和政府部門挑選出來的，而後者掌握前者的任免大權時，那麼企業擁有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獨立自主？在真正的市場上，買方和賣方通過協商定價。而在匈牙利，大多數價格，不是直接由買方或賣方制訂，而是由中央的定價辦公室制訂。在比較理想的情況下，它嘗試「模擬」市場，根據現有的需求/供應比找到合適的價格；而在比較糟糕的情況下，它甚至不會嘗試模仿市場定價行為。匈牙利從一開始便使用這種定價方式，因此，某些產品甚至企業，永遠處於虧損狀態，而其它產品和企業的定價過高，則保證它們總是獲得高額利潤。由於利潤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所以企業管理層，比起過去，更加重視利潤率。但是由於以上描述的過程，導致產品定價被扭曲，而且官僚機制對利潤實行再分配政策，所以這樣便部分地導致利潤激勵，不能真正地發揮作用。如果某個企業，創造的利潤「過高」，那麼它的利潤，便會被上級抽走，從而透過再分配，流入虧損企業。這是一種可以產生勝利者，但沒有失敗者的競爭機制。換句話說，企業的預算約束，始終是「軟」的。

希望市場機制得以發展壯大的人們，對這個結果並不完全滿意，而希望把所有重要的決策權，都掌握在中央權力機關手中的人，面對這種情況，也是喜憂參半，雖然他們對部分地實行權力分散，沒有什麼意見。他們希望用間接調控，來取代先前的直接調控——計劃指令，即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税率政策和國家補助，把中央經濟主管的意圖，轉達給生產商和消費者。

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白日夢而已。*我在1982年寫道：「我的眼前展現出一幅畫面：我首先走進一家現代化工廠的調度室，那裏安裝著各種調控設備，上面有成百上千個按鈕和開關。各種設備在不停地運轉，信號燈不斷閃亮。調度員忙忙碌碌地穿梭在設備之間，一會兒忙著按鈕，一會兒忙著轉動操作杆。然後，我走進車間，看到工人推著裝滿生產材料的手推車，走來走去。工頭們用嘶啞的聲音，高聲發布命令。的確，這裏才是進行真正的生產活動的地方。調度員們何時按下調度室裏的按鈕，或者按下哪個按鈕，對生產沒有任何影響。毫無疑問，調度室和車間之間，沒有被有效地連接起來。」[1]

在這種情況下，缺少的是連接調度室和車間的電纜。如果企業對價格和成本，仍然不夠敏感，那麼利率或匯率，還有何重要性可言？由於中央官僚機構，對利潤實行再分配機制，而這意味著利潤率，仍然不是事關企業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企業對價格的反應，仍然很遲鈍。企業負責人的政治前途，更重要地取決於他們與上級的關係，而不是他們在市場上取得的成績。

官僚們繼續控制著企業負責人，但是他們嘗試採用了更加鬆散的方式。這種相對寬鬆的環境，也表現出一定優勢，因為它為企業層面的創新活動，留下了空間，同時允許市場的推動力，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業。儘管許多非常重要的領域，仍然存在短缺經濟，例如多數進口產品的往來貿易、房屋租賃業、電話服務業和醫療保健業，但許多產品和服務的短缺情況，已經完全終結。

雖然人們努力地把分權更加廣泛地引進匈牙利微觀經濟，但與它對應的，是鬆散的宏觀經濟紀律。當時，整個東歐地區，正處於制度變化的臨界點，所有推行分權改革的國家——匈牙利和後來的波蘭——的通貨膨脹率，急速攀升，而阻礙政府放開工資管制的機制，卻在不斷加強，國家的外債，表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趨勢。過去

* 拉斯洛·安托爾（1982年）非常形象地地將它稱作「調控幻想」。

的斯大林式行政紀律，不再遏制對國家不利的宏觀經濟發展態勢，但是真正的利潤激勵機制、真正的競爭機制和真正的市場力量，還無法充分地發揮懲戒力。那些引進局部改革計劃的國家，在經濟表現上，較受到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國家更糟糕，例如在胡薩克統治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齊奧塞斯庫統治之下的羅馬尼亞。這些獨裁國家經常帳戶上的餘額較多，工資和物價水平，也相對更穩定，但為了實現這些得益所付出的代價，卻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1968年的改革計劃，致力於向國有部門注入一種新經濟機制。這次改革的一個副產品，是非國有部門開始不斷拓寬它們的生產活動和服務範圍，而且揉雜了五花八門的所有制形式。當時出現了所謂的小型合作社，它們獨立於政府的行政管理之外，與被簡單地稱作「合作社」的經濟實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黨國」通常為後者安排管理者。此外，在匈牙利還出現了完全私有的小規模手工藝作坊、貿易公司和服務提供商。其中一種新奇的形式，被稱為VGMK (vállalati gazdasági munkaközösség)，即企業內部經濟勞動合作關係，它在眾多國有企業組成的茫茫大海中，建立起一個私有制的小島。最後，我要講述的是開始萌芽的「第二經濟」。在這種經濟形式裏，數萬甚至數十萬在「第一經濟」中有現成工作的人，對自己手頭的工作敷衍了事，但卻忙著私下裏為自己賺外快。匈牙利改革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雖然政府不鼓勵其它所有制，逐漸侵蝕經典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家所有制特有的壟斷地位和優勢，但是當這些現象出現時，政府卻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

從幼稚的改革者轉變成苛刻的分析家

上文對匈牙利改革的描述，過於簡單。我沒有詳細描述這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只是突出了一直被我視為「新經濟機制」典型特點的現象。這種簡明扼要的描述，無法追溯改革的動態發展過程，只能描述出八十年代匈牙利經濟體制的一幅靜態畫面。我希望在這本自

傳中，首先闡明我對社會主義制度再生等問題的立場、當時對它的看法，以及我在這個過程中所做的事情。

本章的標題，把1968年確定為開啟一個新階段的年份，因為匈牙利在那一年，廢除了指令性經濟，而且正式開始建立「新經濟機制」。不過事實上，整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卻遠遠早於1968年。雖然我在前幾章，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現在還是讓我們回過頭來，描述它的整個經過，以及我參與這個過程的情況，這多少要冒著重複某些內容的風險。

自1954年起，我開始對再生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觀點，產生強烈的興趣，並且傾注了無比的熱情。我堅信這種主張，一定能產生實際效果。我在討論經濟管理過度集中化的專著中，著重對舊制度進行實證分析，它的字裏行間，都滲透著再生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觀點。我在1956年夏天，開始與許多同事合作起草了一份改革建議。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初期，社會主義可以透過改革不斷完善的觀點，仍然深入我心，所以我為當時的總理伊姆雷·納吉，制訂了經濟計劃。

大革命失敗後，政府的瘋狂反撲，使得我對這個觀點的信念，也隨之煙消雲散。「幼稚改革者」*階段，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劃上了句號，而我先前所堅守的信念，再也沒有在我的心中復蘇。從那時起，我不再指望共產黨掌管下的經濟體制，能夠尊重個人自由和人權。無論出於**政治還是道德**方面的考慮，這種打著東歐國家烙印的「市場社會主義」，都讓我大失所望。它一方面暗示著，共產黨應該

* 1986年我在美國《經濟文獻》(1986c)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了這個術語(本章的副標題即為這篇文章的題目)。我在這篇文章中，將以下人士稱為「幼稚的改革者」：匈牙利的改革之父捷爾吉·彼得、波蘭改革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弗拉基米爾·布魯斯和「布拉格之春」中非常活躍的經濟學家奧塔·錫克。我認為戈爾巴喬夫也應該劃分在這個群體中。許多經濟學家都經歷過「幼稚的改革者」的階段，而這個階段的長短則因人而異(有些人從來都沒有放棄這種信念)。

繼續把持政權(或者至少暗示著，應該順應共產黨的這種期望)，另一方面，為了提高效率，而力圖把共產黨執政，與資本主義國家裏非常成功的市場協調機制，結合起來。

1957年，黨中央要求我參加一個新的改革委員會，但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我完全不希望和委員會的人，虛與委蛇。他們當中有些人，尾隨蘇聯坦克悄悄地捲土重來，有些人把自己的朋友投進監獄，有些人滿腦子都是報復的念頭。

正是由於這種深刻的厭惡感，六十年代我再次拒絕加入黨中央成立的改革委員會。我一想到自己必須按照當權者的暗示行事，就膽戰心驚。我不想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一起拙劣地拼湊出一份折衷的委員會建議。這些建議，最終將提交黨中央的會議進行討論。最理想的情況是，它們得到中央的認可，並得以推行。

在卡達爾執政時期，許多頗有影響力的匈牙利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在私下裏接觸了捷爾吉·阿克塞爾。阿克塞爾是當時文化領域裏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當然本章的目的，不是要評估阿克塞爾的工作成果，或者精確地衡量他的行為，對匈牙利產生了消極影響，還是積極影響。我並不想對那些與阿克塞爾定期或偶爾共進晚餐的人、對他阿諛奉承討好他的人，或者希望阿克塞爾幫助他們身陷囹圄的朋友，並為此作出犧牲的人，妄加評論。我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領袖」中，從來沒有向阿克塞爾大獻殷勤的少數人之一。我認為這種舉動，具備了一種象徵意義。*

我意識到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行為前後並不一致。我對阿克塞爾的態度，就像躲避瘟疫一樣，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樣，當我請求雷熱·涅爾什利用關係，幫我安裝一部家

* 1980年冬天，阿克塞爾通過計劃辦公室主任拉喬斯·法盧韋紀向我傳達了他的意見，他對我討論社會主義道德規範和效率之間存在衝突的文章，非常不滿(讀者可以在後文看到，他並不是唯一對這篇文章吹毛求疵的人)。我聽了法盧韋紀的話後，只說了一句話：「道不同不相為謀。」後來，法盧韋紀發表文章，猛烈地抨擊了我的文章。

用電話時，卻絲毫沒有感到尷尬（涅爾什在黨的核心領導層中失勢後，被「發配」到我們研究所擔任所長，不過他仍然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我從來不曾參加黨中央的委員會或工作組，但是我與工作單位裏的一位黨組織領導的關係，卻非常密切，我甚至一度擔任了他的秘書。我不會根據人們是否入黨，來對他們劃分等級。我始終消極地置身於改革的準備工作之外，因為這種工作，必然使我在組織上，與黨中央的領導層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從而把我拉進圍繞在黨中央周圍，而且贊同共產黨綱領的非共產黨人士陣營。*

對我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產生影響的第二個因素，是1956年後，我為自己制定的行為規範和任務的性質。儘管這個因素，與首要的政治因素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我嚴格地對這兩種角色進行了區分——影響到政治決策的專家顧問和科學研究者（我承認自己的區分標準，過於苛刻）。†我在這裏討論的，不是在民主政治中，這兩種角色之間的聯繫。我只是關注我的同事，和我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當極權政府向專家顧問求助，希望獲得他的專業意見時，我們應該怎麼辦。這兩種角色需要接受不同的培訓，而且當人們全心投入到其中某一個角色時，他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與另外一個角色的行為規範，相去甚遠。出色的顧問，必須是精明圓滑的戰術家，而且擅長運用策略。他們必須靈活多變，善於作出妥協。這些在政治領域裏，都是不可或缺的優點，但是在科學研究中，卻可能帶來可怕的風險。在政治生活中，那些對自己曾說的話深信不疑的人，會把自己堅定的政治信念，傳揚到四面八方，但是科研者必須保持客觀的態度，用理性而不是信念，來評判各種觀

* 匈牙利科學院的院長雅諾什·賽特高塞，曾經諷刺意味十足地問我說：「你怎麼會這麼挑剔？你為什麼總害怕泥點濺到你那純潔無瑕的外衣上？」（一定是某位院士慫恿他提出這種問題）

† 根據這種思路，這裏提到的所謂「顧問」，不是黨組織或黨的運動的負責人、立法機構的成員或政府高官等職業政治家。這些顧問和普通百姓一樣，依靠黨外職務養家糊口，但是他/她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影響政治事件。

點，及其思辯的正確性。即使對自己已經接受的信念，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質疑。那些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的人，會發現自己很難具備學者的特質。

我不喜歡對任何事都敷衍了事，我不可能抽出自己的一半精力和腦力，來擔任政府的顧問——更何況這個政府，是我希望它能夠從政治領域中消失的政府形式——同時把另外一半精力和腦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也許其他人可以做到這一點，但對於我來說，卻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擔心即使自己嘗試兼顧這兩種角色，也會吃力不討好，在兩方面都一敗塗地。

我必須向讀者道歉，因為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了參與政治活動，和全心投入學術工作之間的艱難抉擇。我甚至不能保證其後的章節，也不會再出現類似情況，因為這種抉擇，貫穿了我的一生。即使在完全迥然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我也始終認為，它是所有選擇問題中，最難作出決定的一個，因此它成為這本自傳中的核心主題，我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反復探討這個問題。

跨越了生命中的「幼稚改革者」階段後，我成為批判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改革的分析家。我不可能對這個問題，置之不理。雖然在過去的一段時期裏，我從未在文章中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它仍然在我的心底，揮之不去。無論我讀到什麼書或文章，總會反復思考文中的觀點，是否能應用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且這種興趣，不僅局限於學習的過程，我還密切地觀察著，經濟管理實踐過程中發生的變化。

幾年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弊病，成為我的主要研究課題。《反均衡論》用多種方式，觸及了這些問題。我在寫作《短缺經濟學》時，也力圖讓人們認識到，如何以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特有的機能紊亂現象。體系內部的局部改革，最多能減輕這些症狀，而不能徹底根治它們。此外，我還研究了推行局部改革，而且看起來彷彿以利潤為先導的匈牙利經濟體系。顯然，這些研究結果，引起了人們對軟預算約束的關注。

後來，我和同事寫了很多描述和分析改革進程的文章。我們的

文章，都發表在相同的匈牙利雜誌上，有時我們甚至在同一個匈牙利論壇，或者國際論壇上發言。

我的文章，通常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同情改革的立場。我不是在為改革的反對派搖旗吶喊。如果改革取得成功，我會為此欣喜若狂，但是當我尖銳地批評改革所處的狀態時，這種做法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含意，因為「改革派經濟學家」也會這麼做，而且批判的力度，一點也不遜於我。不過他們使用的方法，與我的方法之間，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差別。自信滿滿的改革者，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還不夠」或「還沒有」。價格體系「還不夠」完善；國家官僚機構對企業內部事務的干涉，仍然太多；金融市場「還沒有」開始運作等等。但是他們認為這些「還不夠」或「還沒有」，必然是臨時性的，所有不足之處，最終一定會有所改善。

我的態度與這些「改革派經濟學家」恰恰相反，我並不相信這種樂觀的設想。我對於改革持懷疑的態度。朋友米哈伊·洛基開玩笑地把我倆稱作「挑三揀四的改革派」。我們和許多觀點相近的同事，都反對當時的改革狀態（本書在前一兩頁已經談及），認為這種改革的某些內容，非常虛偽，而且帶有明顯的人為和模仿的痕跡。這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且依照它的發展方向來看，它也不可能發展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

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政治風暴和道德衝擊，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那場風暴，給我留下了沉重的精神創傷，粉碎了我對完善社會主義的信心。自那以後，我開始研習與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關的西方經濟學文獻，而且掌握了許多西方發達經濟體系的第一手資料。我從批判和理性的角度出發，深入地思索了私有制、公有制、官僚機構和市場之間的聯繫。當我以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身份，進行理性探索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在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系中，市場不可能在協調經濟流程方面，發揮主要作用，因為這兩種制度是互不相容的。問題的關鍵，不是市場經濟的某些特點「還沒有」佔據上風。真實的情況是，只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才可以讓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非假冒或模仿的

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轉。*

這種觀點，甚至讓我對最熱情的改革者所持的主張，也搖擺不定。他們的建議，如何能使匈牙利的經濟體系，接近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難道他們不是在編織幻想嗎？難道不是他們在眾多幼稚善良的半社會主義者心中，點燃起渺茫的希望，讓他們相信馬列主義原則與市場、國家所有制的主導地位、公開宣稱「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結構，能夠相互調和嗎？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透過某些更加堅定的改革措施，走上「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沒有改變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在不建立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不摒棄它的所有醜陋特質的情況下，推行市場經濟體系。一條寬闊的理論鴻溝，根本性地把我和改革派經濟學家，劃分為兩個陣營。後者仍然執著地相信，存在建立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

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辯論，有些是與對方面對面的唇槍舌劍，但是有些時候，對方會間接地與我展開爭論，或者抨擊我的觀點和立場。漫天的利箭，從各個方向向我射來。請允許我在下一節，講述幾個典型的事件，來充分展現我當時的處境。

「不要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蒂博爾·利斯卡是在匈牙利改革時期，湧現出來的一個傳奇人物。我們在很多個場合，都曾經發生激烈的爭辯，但是每當我回憶起他時，總想到他那些富有感召力，而且激情四射的演講，而且我也非常尊重他的智慧、坦率以及忠於自己的原則和拒絕使用卑鄙手段的立場。他主張建立一種奇怪的社會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他的夢想，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合理地得到

*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暗示出他對市場體系心存疑慮。正統的馬列主義者，經常指責支持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從這點上來說，他們是完全正確的。我沒有在自己的書裏明確表明這些觀點，因為我不想讓那些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稱作「馬克思主義者」的改革派因此感到內疚。

一部分社會集體財產，作為啟動資金，然後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運行的經濟體系中，利用這些資金創建企業。[*]利斯卡全面仔細地勾勒出這個藍圖中的某些要點，而在描述其它同樣重要的問題時，卻比較含糊。在這個觀念中，融入了蒂博爾對機遇平等這種道德預設的純潔信仰、對資本主義特有的企業精神的尊敬，以及他的堅定信念：只要人們的意願充分而強烈，烏托邦式的理想境界，終究會變成現實。[†]

利斯卡就像一個精神導師一樣，被眾多信徒簇擁在中間。他經常組織一些聚會，並且邀請知名的經濟學家，心平氣和地就某些問題展開爭論。利斯卡經常用寥寥幾個有力的論據，就使對方敗下陣來，而且往往一招制勝，使對方無力再反擊。他也曾經邀請我參加這種學術「拳擊賽」，我也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風格，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且客觀評價了匈牙利經濟體系推行局部改革的狀況、利斯卡的觀點的優劣，以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可能性及局限性，[2]利斯卡因此勃然大怒。如果能在這裏寫下他的原話，一定非常有趣，只可惜當時的過程，並沒有被記錄下來。所以我會嘗試根據自己的記憶，再次重述他當時的評論：「[科爾奈演講]中提出的理論，是那種用來研究糞便的價值、深度，還有它的種類的理論，而不是告訴我們怎樣從糞堆裏爬出來，這就是最根本的區別。如果有人希望把糞便作為分析對象，而且整天研究這些糞便會淹到我的脖子、漫進我的嘴裏，還是刺激我的眼睛，

---

[*] 匈牙利的政治體制發生變化後，利斯卡的部分追隨者還在為「憑證式」私有化努力鬥爭，希望將國家財產自由地分配給公民。他們的這種行為，完全可以理解。

[†] 1966年，利斯卡寫出了被廣泛引用的著作 *Econostat*，但是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他的著作只能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學術界中傳播。1988年，這本書第一次正式出版，當時正值卡達爾政權即將分崩離析的前夕。但是利斯卡從來沒有系統化地整理他的改革思路，或者用簡潔的形式總結這些觀點。如今他的兒子蒂博爾·F·利斯卡在自己的文章中，全面總結了父親的改革觀點以饗讀者。

那麼比起那些呼籲人們，壓根兒不要理會糞便價值的人，他的學術見解，還相差著十萬八千里，因為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從糞堆裏爬出來。」[3]

如果當時我能夠尖銳，或者機敏地反駁他的評論，那麼局面一定會大有改觀，但是我在這兩方面，向來都不拿手。我能夠做的，只是冷靜地舉出一些乾巴巴的論據反駁他，例如科學的任務，就是觀察現實、了解現實，但是受到利斯卡的情緒感染而群情激昂的聽眾，對此根本聽不進去。我在辯論中，聲稱我們不需要匈牙利經濟學家混亂的夢魘。他們必須全面了解匈牙利的現實情況，和真正的市場經濟，才能為改善現狀，揀選出一條現實的道路。

匈牙利改革派經濟學家中的領軍人物之一，是金融研究學院的高級研究員拉斯洛·安托爾。他不像利斯卡那樣是革命的倡導者，而是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者，他是對匈牙利經濟條件，研究最透徹的優秀專家之一，也是一位具備理性的頭腦和良好判斷力的分析家。和我不一樣，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改革派積極分子，而且他對參與政治決策，充滿了激情，這是他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我想他現在依然如此）。對他來說，在幕後為掌握實際權力的領導層提供有用的建議，遠比發表文章以引起國內學術界關注，重要得多。他根本不在意外國同行是否了解自己的觀點。1983年文學周刊《Élet és Irodalom》（《生活與文學》）對他進行了專訪。記者山多爾·塞納希問他說：「你喜歡把自己稱作改革派經濟學家，這是否暗示著，這種學者較『普通』學者的地位更特殊呢？」安托爾回答說：「如果我必須對這兩種學者作出區分，那麼我認為有些經濟學家，只扮演了觀察者和描述者的角色，他們從職業道德的角度出發（偶爾從規避風險的角度出發），對經濟體系中存在的痼疾，進行了診斷，但是不會提出任何建議。儘管我認識到他們有權力這麼做，但是這種基本立場，讓我感到煩躁。我非常坦白地承認，我在努力影響政府的決策。」[4]

只要鞋是合適自己的腳，那就穿吧。即使在當時，我也認為安托爾的評論是在影射我，我感到其他許多改革派經濟學家和安托爾

一樣，對我在改革問題上的態度，頗有微詞。

在這個問題上，請允許我先略為重複，我在前幾章中，談到地下出版物的作者時所持的觀點。我並不認為只有一**種**行為——即我自己的行為——是合乎道德的，也不會因為其他人的行為與我相異而感到「煩躁」。我雖然會排斥某些行為，並且從倫理的角度出發，譴責這些行為，但是我認為在道德層面上，有多種正當合理的態度，而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種。人們可以在流亡的過程中，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國內的公民，冒著政治迫害的風險，透過非法途徑與政府進行抗爭，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改革者」努力勸說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領袖，接受更好的經濟政策，因為這樣會帶來不少益處。不過讓客觀的分析家，根據科學調查探索經濟體系的真實本質，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從根本上來說，最理想的模式，是在各種行為和生活方式中，建立起理智的勞動分工。

當然，有時候我對改革派經濟學家，以及他們向當權者妥協的做法，非常反感，但是我最終都成功地克制了這種情緒，而且從來沒有在公眾場合，表達這種觀點，這是因為我認為改革派經濟學家的活動所帶來的益處，大於他們向執政者讓步所帶來的危害。這種情緒，也許不會得到某些改革派經濟學家友善的回應。我只能透過他們的語言和文章，進行判斷，而無法真正了解他們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

關於行為問題，我希望再補充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曾經極力為科學分析社會主義體制的**效用**，進行辯護——這就是我的行為。就像在前幾章一樣，我希望強調的是，在逐漸削弱共產主義秩序，最終摧毀它，並且取代它的過程中，理論評判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儘管這種功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這個偉大的事業中，我不希望把社會科學的角色，局限在政治工具這個狹窄的範疇內。思想具有內在的固有價值，對於某些人來說，思想和理解本身，就蘊含著無窮的樂趣。只要有人把科學視為自己生命中的任務，那麼他們的過去是這樣，今後依然如此。

效率和社會主義道德

1979年，我應邀前往愛爾蘭發表「吉爾里演講」(這個演講，以著名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R·C·吉爾里的名字命名)。我用更加完善的形式，表述了首次在印度提出的論證思路。*

我把兩種價值體系，進行了對比。一種價值體系提出的問題是，人們需要滿足市場經濟體制的哪些需求，才能推動經濟活動，實現最高效率；另一種價值體系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道德規範，提出了哪些需求。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人們根本無法同時滿足兩種價值體系的需求。我無法用嚴格的數理模型，證明這個「不可能定理」——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解決這個問題。我只是想支持這種假設，並且透過匈牙利改革缺乏連貫性的事實，來說明這個觀點。例如，人們在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時，表現出來的團結和義務，可能與經濟競爭的原則，相互衝突。

我的演講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與支持市場改革的需求，過於輕鬆地結合在一起的人，彷彿這種奇怪的組合，不存在任何衝突似的。

我的演講結束後，R·C·吉爾里提出了一個問題：他非常高興地看到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失業的現象，相反，那裏出現了勞動力短缺。而西方國家的優勢，是所有產品都供應充足，根本不存在短缺問題。難道我們不能把這兩種體系的優勢，結合在一起，而摒棄它們的缺陷嗎？

我在後來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最後一節裏，回答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於1980年發表在《現實》(*Valóság*)和《劍橋經濟學》雜誌上，內容如下：

---

* 我發表演講時，從來不會照本宣科地把事先寫好的演講稿讀一遍。我的方法是，首先在口頭上闡明自己的觀點(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多次重複自己的觀點)，然後通過演講不斷提煉修正這些觀點，同時從觀眾的反應中獲得靈感。只有當我認為演講中的觀點足夠成熟時，才會將它們寫成文章。

> 現在出現了必須設計出「最優化經濟體系」的主張……這完全在情理之中。……那些把建立這種經濟體系確定為目標的人，認為這種工作，就像到超市一樣簡單。他們可以在貨架上，找到這個經濟體制需要的所有組成部分，這樣便可以把所有體制的優點，集於一身。一個貨架上，是東歐國家實現的完全就業；另一個貨架上，放著在西德和瑞士工廠裏可以找到的高度車間組織模式和高度紀律性；第三個貨架上，是欣欣向榮的經濟增長，沒有受到任何經濟衰退的困擾；第四個貨架上，放著穩定的價格；第五個貨架上，放著能夠迅速適應外國市場需求的生產模式。這些制度設計者，只需推著他們的手推車，收集這些「最優化的組成部分」，然後把它們拿回家組合成「最理想的經濟體系」，便算大功告成。但這卻是一個幼稚，而且充滿痴心妄想的白日夢。歷史不會為我們提供這種超市，讓我們隨心所欲地挑選體系的組成部分。……人們只能在各種「一籃子交易」中，選擇適用於本國的經濟體系。[5]

這篇文章後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而且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它公開駁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可以和諧運轉的幻想。

在這裏，我忍不住要暫時離開這個主題，略略回憶與這篇文章有關的一段小插曲。當時，匈牙利有一位活躍的公眾人物，名叫拉斯洛·蘭捷爾。他首先與反駁自己觀點的著名經濟歷史學家伊萬·T·貝倫德和捷爾吉·蘭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隨後，他和米克洛什·波爾格，參加了學術界對我那篇關於效率與道德的文章展開的論戰，並且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所有道德觀念，背後都隱藏著特定集團的利益。第二，我的文章中描述的，造成某些改革弊病的矛盾，根本不存在。

第一個觀點，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陳腔濫調，因此沒有必要作出回應，但是對於第二個駁論，我卻不想置若罔聞。我尖銳地作出了反擊，而且呼籲這些學術文章的作者，秉承誠實的態度參加學術辯論。我在這篇文章的序言裏，已經明確聲明，我不是在進行因果

分析。我從來沒有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匈牙利經濟體系的災難，或者改革面臨的困難，歸咎於前文描述的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此外，他們的評論，還扭曲了這篇文章希望傳達的其它信息。

曾經有無數篇文章批評我的理論，但是我並不習慣對它們作出回應。如果我不贊同他們的觀點，那麼我只會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理睬這些反對觀點。如果我認為對方的批判觀點，確鑿可信，那麼它們便會對我以後的文章，產生顯著的影響。讓我感到不可接受的，是蘭捷爾–波爾格的文章，公然違反了學術辯論中不成文的道德規範。*

拉斯洛·蘭捷爾在埃萊梅爾·漢吉斯對他的自傳式訪問中，回憶了這件事件：「我們的辯論風格，有的來自於馬克思的辯論方式，即對辯論對手毫不留情、嘲笑對方，並且蔑視對方，還有的來自於糟糕的科研方式。……我曾經在七十年代攻擊科爾奈、貝倫德和萊基，並且對他們冷嘲熱諷。儘管我在辯論的論據、方法和初衷等方面，都沒有錯誤，但是我現在認識到，自己當時把他們單獨揪出來進行批判的方法，很不可取」。[6]這種真誠地進行自我批評的態度，值得稱讚。我重新提及這件事的原因，是由於我認為蘭捷爾只譴責了自己早前盲目自大的態度。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他進行學術批判的風格，而是他使用了在道德層面上，無法令人接受的方法。當蘭捷爾評論說「儘管我在辯論的論據、方法和初衷等方面，都沒有錯誤」時，他的觀點大錯特錯。現在回頭重新閱讀當時雙方在論戰中所寫的文章，我再次意識到，他們的批判觀點，即使從本質上來說，也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扭曲了我的觀點後，製造了一些莫須有的觀點，強加在我的頭上，然後就這些觀點與我展開爭辯。我在這裏提起過去那場不愉快的論戰，是因為如今這種辯論方式，仍然泛濫成

* 在這場論戰之前的卡達爾專政統治時期，許多學者對我的污蔑，讓我受到嚴重的傷害。之後經歷的政治和學術批判，也讓我感到難以接受，但是我從來沒有受到道德上的侮辱。批評我的學者和我站在學術鴻溝的兩邊，但是他們沒有歪曲我的觀點，而是針對我實際表述的觀點和真實想法，提出批判意見。

災。事實上，它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匈牙利的公共生活、媒體和學術文章中，人們經常扭曲辯論對手希望傳達的信息，然後開始反駁或批判這些被篡改了的觀點。這種現象，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產權的重要性

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安德烈婭·塞格，是1983年在《現實》雜誌上參加改革論戰的學者之一。[7]她強調自己不希望斯大林主義復辟，同時強烈支持運用更先進的方法，加強中央控制。她從左派的觀點出發攻擊改革過程時，從《短缺經濟學》中，引用了許多可以支持她的觀點的內容。她對這本書的理解，是公有制催生了短缺經濟，即限制生產的不是需求，而是集中在中央手裏的資源。只要公有制在經濟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改革便無法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相對而言，公有制更加符合中央集權控制的需要，而不是市場機制。*

不久以後，改革派經濟學家對安德烈婭·塞格的觀點，提出異議。陶馬什·巴奇考伊和埃萊梅爾·捷爾吉·泰爾塔克的文章，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們反駁了「左派分子」對我的觀點的解讀，並且強調我的作品，完全支持改革。†

當我讀到這些文章時，感到很尷尬。當然我真心地希望，改革能夠大獲成功，而且我認為任何形式的「左派」復辟，都會造成巨大破壞。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和改革派站在一起。但是在另一方面，

---

* 1991年，安德烈婭·塞格根據卡萊茨基派的觀點，批判了《短缺經濟學》，並且就此與我的理論劃清界限。

† 無論這篇文章的合著者，還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讀者，當時都沒有意識到積極活躍的改革派陶馬什·巴奇考伊，多年以來一直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我曾經在第九章談及過這個情況）。正是現在這個為我「辯護」的陶馬什·巴奇考伊，在1960年獲悉我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後，認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於是馬上將它彙報給了政治警察。

真正理解我的基本理論觀點的學者，是安德烈婭·塞格，而不是那些試圖保護我，避免被她牽連進去的學者。如果你希望建立市場經濟體系，那麼必須相應地建立私有制。如果你堅持要求公有制佔據主導地位，那麼官僚掌控捲土重來時，千萬不要感到出乎意料。改革者力圖把公有制和市場的協調作用，結合在一起，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狡猾」，都不會讓這種經濟體系，不受任何干擾地順利地運行下去。我在後來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更加詳細地闡述了這個觀點：一方面，私有制和市場協調之間，存在天然的密切關係；而另一方面，公有制和官僚協調之間，與生俱來便有著血緣關係。[8]當人們試圖把公有制和市場搭配在一起時，他們必然要人為地建立監管機制，來彌補這種「血緣關係」的缺失。

我在1981年和1986至1987年間，發表的評估匈牙利改革進程的文章中，明確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匈牙利經濟體系中出現的生機勃勃，而且取得了長足發展的各種非國有部門，對它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種部門裏，而且只有在這種部門裏，才存在真正的市場。

支持改革者的激進分子，把「所有制改革」寫進八十年代的工作日程。[9]改革派經濟學家中的領軍人物馬頓·陶爾多什，建議仿效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持股公司，建立相似的機構。這種「持股公司」，取代政府各部委來掌管國有企業，而且透過它們的管理，行使「所有制權」。

這份建議書，把共產主義「黨國」把持下的經濟體系中，亦步亦趨地模仿真正資本主義的趨勢，推到了一個怪誕的極致。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官僚機構的頭頭腦腦，任命其他官僚擔任這類「持股公司」的負責人，然後告訴他們：「放手去幹吧，就像這是你的公司一樣……」。我在一篇文章中，把社會主義改革的幻想與現實情況進行了比照，然後提出自己的疑問：「我們真的能夠人為地創造一個受命（受誰的委托？官僚機構嗎），代表整個社會來扮演「所有者」角色的機構，並把它作為所有者權益的替代品嗎？」[10]

後來匈牙利經歷了制度變化，我仍然繼續反駁「市場社會主義」

的觀點。這個主題，一直保留在改革計劃的日程上，因為至少中國、越南和古巴，還在努力探索如何改革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而且建立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幻想，仍然具備一定的吸引力。

蘭格模式和匈牙利改革的現實情況

匈牙利的改革活動，在匈牙利和西方國家，都引起廣泛討論。在匈牙利國內，所有就這個問題參與討論的人，都比較了解當時的局勢。人們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改革的**目標**和前景上。但是在國外，我經常看到一些教科書，膚淺地記述匈牙利的改革。當時人們經常使用的比較經濟體系理論教材，是1980年保羅·R·格雷戈里和羅伯特·C·斯圖爾特發表的著作。這本書這樣評價了匈牙利的經濟管理改革：「總體來說，NEM（新經濟機制）與蘭格模式非常相似。」[11]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論斷！請讀者回到本書的第七章，我在那一章討論了奧斯卡·蘭格的社會主義理論，他構想了一個所有企業都屬於全民所有的經濟體系。中央只是根據供給過剩，或者需求過剩，來相應地下調或上調價格，從而控制所有企業。

匈牙利改革的實際情況，與此截然不同。只有在一個相對狹窄的範疇內，只有它的經濟協調過程，與蘭格式控制方式比較接近，即這個領域裏的物價，由中央制訂，而且定價機制並不呆板僵硬，不過政府會經常對其進行調整。除此以外，大多數價格，都是透過其它方式制訂。同時，國家官僚機構還使用了其它無數種工具，干預經濟運行過程。國有企業之間，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因為軟預算約束，早已扭曲了它們的競爭。匈牙利改革模式與蘭格模式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區別，是公有制不再在匈牙利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幸運的是，匈牙利已經出現了私有部門，而且隨之還產生了真正的（並非模仿的）市場經濟。

不幸的是，這種混淆概念的情況仍然存在，而且人們幾乎不可能澄清它們。如果我們用「市場社會主義」這個術語，來描述奧斯

卡·蘭格的原創觀點，那麼把公有制和市場協調結合起來的經濟體系（即1968年至1989年間的匈牙利經濟體系），根本**不是**市場經濟體系。但是這個術語不是註冊商標，沒有人規定，它只能用來描述蘭格模型。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社會主義體系為自己命名的過程。首先是存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體系，它的官方宣傳，把自己描述為社會主義國家。這個體系裏出現了部分市場協調的元素，但僅僅局限於一個有限的範圍內，而且在各種官僚政治的影響下，扭曲變形。誰能阻止這個雜交體系，被學者將其稱為「市場社會主義」——如果這個術語，不討人喜歡，他們還可以顛倒詞語的次序，把其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不能剝奪任何一個政體，為自己命名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力圖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教師們給學生講解經濟思想史時，不能把理論模型，和它在歷史進程中，向現實轉化的實際情況，混淆在一起，這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題外話：匈牙利的另外一個現實情況

上一節的標題中，出現了「現實」這個詞語。如果我們現在在討論現實，那麼便不應該停留在光明，而且崇高的理論論證層面上，誇誇其談。如果向下伸延，深入到黑暗中的某個角落裏，我們便會發現其它事情，正在靜悄悄地發生。當我在美匈研討會，或者在紐約的學術會議上，侃侃而談自己對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匈牙利改革歷程的見解時，有些人正忙著把這些內容，全部記錄下來。

我為寫作這本自傳搜集材料時，查閱了前情報機關的檔案，而且發現許多有趣的文件，它們清楚地證明，不少秘密警察，曾向上司彙報我在國外發表演講的情況。

其中有一份報告，收錄在1981年12月10日的「每日情報匯總」中。[12]這種報告，從上萬名情報人員組成的龐大情報網，以及政治警察機器提供的大量情報中，篩選出當天最重要的情報，然後把它們匯總起來。「每日情報匯總」首先呈送給政治警察體系的最高長官，即內務部部長。它的副本則送到內務部秘密警察機構的負責人

那裏，同時還要把它的摘要，呈交給黨和政府領導人審閱。12月10日報告中的第六點，描述了最近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匈美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向美國人泄露了關於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內部形勢、蘇聯經濟所處的困境，以及匈牙利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問題等詳細、而且絕密的情報。科爾奈詳細分析了匈牙利經濟遇到的困難和存在的弊病。美國經濟學家到達布達佩斯前，曾經訪問波蘭。他們希望在科爾奈的幫助下，確認他們收集到的經濟政策，是否真實可信——據我們了解，他們已經成功了。」[13]

情報機關馬上就此展開了調查，而我當時卻一無所知。調查的最後結果，是他們一致認為我沒有泄露國家秘密，因此不會對我提出公訴（我需要強調的是，我始終嚴格遵守自己的原則，從來不會在演講和任何形式的討論中，引用機密的數據，雖然政府把它們劃分為機密數據的標準，看起來有些可笑）。我在情報機關的檔案裏發現，1985年4月26日的「每日情報匯總」中，也有與此相似的內容。[14]它的第七點，提到我於3月7日，在紐約的一個機構發表了演講，而且報告聲稱這個機構「受到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在警察總長Y.Y.的指示下，秘密警察展開了新一輪的調查。當然，和歷次調查一樣，我絲毫沒有察覺到警方的舉動。警察總長下令說：「讓III / II -1部調查科爾奈。」「調查」意味著重新翻出我以前的記錄，*第一份文件牽扯出第二份文件，然後第二份又牽出第三份，依次類推——這些文件中的資料，都表明我有罪。我不清楚他們審查這些文件的次序，但確定的一點是，他們重新瀏覽了1981年，他們對我進行調查時匯總的情況。我在情報機關檔案室裏，找到了關於我的案件的手寫索引卡，它為我提供了不少詳細資料：「雅諾什·科爾奈，匈牙利經濟學家，匈牙利社會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

* 「他們可以竊聽我的所有電話/（什麼時候，為什麼，給誰打電話）/他們的文件裏記錄了我的夢想和計劃/還有那些可以閱讀我的夢想和計劃的人們啊/誰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找到/充足的理由來披露這些文件/將我的隱私一一強暴」（選自阿蒂拉·尤若夫（1997）寫於1934年的詩集《呼吸空氣》，pp. 96–97）

榮譽教授(未能被招募)。」其後列出了與我有關的文件的參考編號。這張卡片[15]上的最後一個手寫記錄是「III / II -20：85 美國客座教授，受CIA邀請發表ea.」*

當我嘗試向讀者再次展現潛藏在改革過程之後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時，上文描述的這些事件，能夠非常有力地揭露它們的本質。人們可以看到的是，匈牙利和西方知識分子們相互交好，他們嚴肅認真地討論了奧斯卡·蘭格理論和價格問題。而在人們看不到的幕後，情報收集、窺探隱私和背叛等工作，仍然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用現在的眼光回顧過去

現在讓我們回到經濟改革的世界。我重新閱讀了自己當年研究匈牙利改革時發表的文章，發現自己仍然認同當時的觀點，這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如果出版社需要再版這些作品，那麼我要做的，最多是找出那些當時迫於自我審查的壓力，而沒有完全反映自己觀點的地方，然後補充一些注解便可以了。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文章指出了改革過程中，一些含糊不清的問題，並且嘗試撲滅由此在人們心中點燃的、但不可能實現的希望。

如今回顧過去，我完全認同，自己當時對改革進程的實證性描述和分析，但是對改革進程的評估，則大相徑庭。如今我對改革的成就，打出了更高的分數，俗語說：「事後諸葛亮好當」。我唯一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人們只有了解了後來發生的事情，才能對過去，作出公允的評價。

讓我們暫時假設蘇聯帝國沒有崩潰，東歐國家仍然處於「黨國」的統治下。不徹底的改革、虛幻，並且具有誤導性的意識形態，以及改革取得的局部成果，也許會幫助卡達爾專政苟延殘喘。改革派

* 我猜ea代表「演講」(eloadas)。毫無疑問，他們援引了1985年的報告內容，而且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的演講。」

贏得的妥協，推遲了真正、而且徹底的制度變化。*

幸運的是，這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現在看來，當社會制度變遷成為現實時，這種雜交的准市場經濟改革，被證明是非常出色的預備學校。改革派社會主義者的經濟領導小組（或者是他們當中，最有才能和最專業的學者），多多少少已經適應了下列這些問題：例如市場如何運作？為什麼人們必須關注成本、價格和利潤？私人契約具有什麼意義等等？許多人已經了解，如何在改革階段擔任私營企業家，而且這種改革的「學前教育」，讓匈牙利與其它後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佔據了一定優勢。

然而，就像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在個人的職業生涯中，由始至終發揮強大的作用一樣。十五年後，這種「學前教育」，對匈牙利的積極影響，便令人遺憾地幾乎消失殆盡。曾經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很容易在事業起步的初級階段，便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那些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只要付出努力，並且抓住機遇，也許馬上便會迎頭趕上，甚至超越先前的領先者。這就是中央集權制的東歐國家，在經濟轉軌期所經歷的過程。過去捷克斯洛伐克強悍的專政統治和集中的經濟體系，可以算是東歐之最，它幾乎完全扼殺了在1968年進行的改革嘗試。除此之外，這個國家在制度變遷後，又分裂成兩個國家。然而它卻成功地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並且使它順利地運作，絲毫沒有落後於社會主義改革的領導者——匈牙利。

這裏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到底在評判什麼？我們在評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時，是否應該以二十年後，它們對本國產生的影響作為依據？也許我們應該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出發，對大型集體性實體，作出評判。但是人們只有一次生命，當我們用現在的眼光和感情，來看匈牙利和捷克在1968至1989年的發展經歷時，我認為匈牙利人民，享受到更加寬鬆的環境；它的空氣更加自由；人們旅行受到的限制也更少；更多產品和現代文

* 這與當前中國改革取得的模棱兩可的效果頗為相似。中國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穩定了共產黨的政權，並且使其具有合法性。

化從西方流入；它的國內環境，也更加適合生活。*儘管這聽起來，非常「老套」，但是正如當時匈牙利人對本國的評價一樣：匈牙利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興高采烈的「軍營」，遠遠勝過捷克斯洛伐克、東德或羅馬尼亞。與它的經濟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的，是它的時代背景—斯大林時代僵化刻板的政治社會環境，有所緩和。雖然當時我不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偉大、寶貴的成就，但是如今再回顧那段歷史，我的看法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

* 對於那些反對國家政治體制的人來說，如果在最黑暗的專政統治時期他們已經為人父母，而且孩子正處於青春期或比較年幼，那麼他們必然會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假如他們在家裏公開談論政治問題，那麼還沒有完全成熟或不夠謹慎的孩子，就可能在不適宜的場所談論父母的政治觀點。然而，如果父母過於謹慎，而且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不在家裏坦誠地發表自己的議論，那麼他們就剝奪了孩子，接受必要的政治啟蒙的權力，而且孩子們會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全盤接受媒體、宣傳機器，甚至學校對自己的誤導。

幸運的是，我家不存在這種問題。我們可以和孩子們坦誠地談論敏感的政治問題，而且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們之間，從來沒有出現父母和子女因為代溝，而在基本的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上存在分歧的情況。促使我們相互理解的原因之一，是孩子們開始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萌發興趣時，恰好是社會環境相對比較寬鬆的時期，因此人們可以更加公開地在家裏或其它地方，發表自己的言論。我認為匈牙利之所以能夠成為適合生活的國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這種相對開通的社會環境。

16 哈佛：1984–2002年

1983年秋天，當我漫步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公園時，看到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穿著短袖衣服，光著腳，穿著涼鞋向我走來。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這個人，與愛因斯坦的形象，完全吻合——從面龐、飄動的白髮，以至言談衣著，幾乎一模一樣。到底發生著什麼一回事？難道我看到了幽靈？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有個劇組，在普林斯頓大學拍攝關於愛因斯坦的電影。這裏是愛因斯坦到美國後，從事科研工作的學術基地。他經常一面心情愉悅地在公園裏散步，一面沉浸在思考中。

當時我們已經到了美國幾個星期，住在愛因斯坦路45號的一所小房子裏。我們所在的住宅區，是由我的同鄉馬塞爾·布魯爾親自設計的。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

對愛因斯坦的崇拜，在普林斯頓依然非常風行。他的聰明才智，激勵著所有來到這裏的學者。在我描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之前，請允許我首先介紹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因為在美國，很少機會能找到像這樣一所完全不隸屬於任何大學的研究所。在美國，幾乎所有學者和科學家，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教學工作上。許多美國

同行，都非常羨慕在蘇聯或東歐國家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員，擺脫了從事教學的煩惱(這些國家，甚至禁止他們從事教學工作)。愛因斯坦到美國工作後，接納他的大學，認為絕不應該按照慣例，強迫他整天給學生上課，而是應該建立一個，允許他全心投入科研工作的研究所。雖然人們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或第三個愛因斯坦，但是至少應該招募部分科學家中的精英人物，作為該研究所的固定成員。自此，這所研究所及其成員的學術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傑出的研究者，到這裏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學。這些訪問學者，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時，不必忙於教學或行政工作，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自己選擇的科研項目中。

一些富有而慷慨的美國人，捐贈大筆資金成立了基金會，令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馬上開始正式啟動。起初，它只為理論物理學和數學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場所。匈牙利的天才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在美國工作時，一直供職於高等學術研究所(它在我們居住的小區裏，另外一條路用他的姓名命名，即諾伊曼路)。數學邏輯學的巨匠克爾特·哥德爾，也在這裏工作。在1947至1966年間，偉大的物理學家J·羅伯特·奧本海默，擔任高等學術研究所的所長。1973年，研究所成立了社會科學學院，每個研究課題，都由一名教授牽頭負責。1983至1984的學年，我在那裏工作時，阿爾伯特·赫希曼負責管理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邁克爾·沃爾澤負責政治學，克利福德·格爾茨則負責人類學。這三位學者，都是各自的領域中，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這間研究所，在成立後的幾十年裏，不斷發展壯大，但是仍然保持著成立初期的結構：以少數終身研究員為核心，周圍圍繞著人數大約為核心成員六七倍的訪問學者。這些訪問學者，都是按照終身研究員的意願挑選出來的，而且他們的人員組成，每年都要調整。這個研究所，從由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彙聚了來自於各個學科的研究員。它的其中一個吸引力，也恰恰表現在其研究工作的跨學科性質上。

收到高等學術研究所的邀請函，讓我感到萬分榮幸，我在那裏

度過了一生中最有趣、最激動人心的時光。任何希望為學者和科學研究，打造出一個與眾不同的學術天堂的人，都應該參考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模式。它的所有建築，都隱藏在巨大的公園中，公園中心有一個小湖。離那裏不遠，是一個私人擁有的小樹林。林間溪水潺潺，茂密的樹林裏，小路蜿蜒曲折——對於像我這樣喜歡一面在大自然中漫步，一面思考問題的人來說，這簡直是最理想的避世之所。與此同時，經常和同事們共享豐盛的午餐，以及熱烈的交談，又使我與現實的社會交往，保持密切的聯繫。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主要依據兩個方面的考量標準，選擇訪問學者：申請者提交的材料和研究所裏終身研究員對他/她的評價。阿爾伯特·赫希曼曾經召集不少在某些方面非常突出，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背離新古典主義思想的經濟學家。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團體。我在那裏遇到了瑞典籍美國教授阿克塞爾·萊榮霍夫德，他因為重新解讀了凱恩斯理論而聲名大噪。經常與我交談的學者中，有喬治·阿克洛夫和唐·麥克洛斯基。阿克洛夫發表了關於「檸檬市場」(例如質量低劣的二手汽車市場)的文章，因而躋身於不對稱信息經濟理論創始人的行列，而且憑藉這本著作，獲得了諾貝爾經濟獎。麥克洛斯基有些口吃，但卻經常能提出非常有趣，而且有創意的觀點。他對經濟學「措辭」問題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果用最簡練的語言總結他的觀點，那麼就是：社會科學的真理，是由人們使用當前流行的、並且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令同事相信的東西所組成，而且除此之外，別無它物)。*

事實上，當時我正受到所謂「創作阻塞」的困擾。隨著《短缺經濟學》的出版，我已經把所有希望寫下的內容，都變成了鉛字。我不知道下一個重大的科研任務應該是什麼，我在艱辛地摸索一條前進

* 沒有人能想像到幾年後，體格健壯的唐做了變性手術，以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的身份，繼續從事其輝煌的研究事業。基於對自我的深刻認識，他聽從了自己內心的呼喚，做出極其艱難的抉擇。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來的非凡勇氣，非常值得尊重。

的道路。

我平日閱讀的書籍，通常都與正在研究的課題，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訪學期間，我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我開始利用這種優越的條件，廣泛涉獵各種書籍。我閱讀了羅伯特·達爾和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探討民主和「多頭政治」的文章；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托馬斯·謝林關於策略的積極觀點；許多同齡人士的著作（其中自然包括萊榮霍夫德、阿克洛夫和麥克洛斯基的作品）；以及阿瑪蒂亞·森和奧利弗·威廉姆森的著作（他們曾到高等學術研究所參加研討會，並發表演講）。以上列出的書目，僅僅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一年裏，給我帶來非凡學術體驗的部分著作。*

與此同時，有一個念頭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成形——撰寫一部書籍，總結過去幾十年裏我認識到的、並且學到的，與社會主義制度有關的東西。我在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期間，寫下了這本專著的第一個提綱：《社會主義體制》，十年後，我才完成了全書的內容。

這正是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及類似研究機構，憑藉其慷慨的制度框架和財政框架，對科學作出的傑出貢獻。我剛到普林斯頓大學時，沒有任何明確的研究目標，但是在那裏工作的一年裏，我的長遠目標，日漸清晰起來，因此才寫下了《社會主義體制》的第一個提綱。後來，我又花了八至十年的時間，逐漸完善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時形成的不成熟想法，直到最終，把這本書的完整手稿，交給出版社。研究者申請公共或私人贊助時，必須在申請書附上詳細的項目說明。人們急切需要獲得另外一種形式的資助——即不會對研究者提出苛刻條件的資助形式。†當然那些應邀前往高等學術研究

---

* 促使我廣泛閱讀各種書籍的一個原因，是我希望超越《短缺經濟學》的主題，在分析中加入更多政治結構、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因素。

† 我認為自己非常幸運，能在眾多西方研究所裏，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進度，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例如，我在講述《短缺經濟學》寫作過程的章節中，曾經提及，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國際經濟研究所裏工作時，就沒有承擔任何形式的義務，而只需潛心從事科研工作。

所訪學的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申請裏，說明自己希望研究的領域，但是研究所不會用任何法律約束，或者官僚合同，來規定他們必須在什麼時候完成研究。我本人的經歷，便充分表明了在普林斯頓工作的學者，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研究所需要承擔的風險，是它慷慨大方地支持了學者，但是卻可能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研究成果。它擁有的唯一保證是，不管採用何種方式，對科研工作充滿熱情的科學家，都會盡量利用研究所提供的自由和時間（前提是研究所精心挑選了受邀訪學的學者）。*

我還在普林斯頓訪學期間，有一天家裏的電話突然響起，對方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邁克爾·斯賓塞，他邀請我到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我向阿爾伯特·赫希曼提起這件事時，在他的臉上的一抹微笑轉瞬即逝，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赫希曼來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前，在哈佛大學擔任教授，並且在那裏工作了很長時

---

* 我詳細地介紹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運營方式（如邀請的條件和受邀學者需要滿足的要求等等），因為它已經成為其它高等研究院爭相仿效的對象，如中歐第一個與它相似的研究所——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從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擔任了它的終身研究員。

† 和其它美國大學一樣，哈佛大學使用的組織結構模式，與歐洲大陸的大學（其中包括匈牙利各大院校），相去甚遠。它們對於學校內各個單位的稱呼，不盡相同。在哈佛大學，校長直接管理的「學院」或「部」管轄的範圍，遠遠大於匈牙利大學裏與之對應的單位。經濟學隸屬於藝術和科學學院，這個學院包含了所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哈佛大學裏各個學院的組成單位，通常是系，但是這些實體的管轄範圍，也比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大學的「系」或「研究所」更加寬泛。美國的系主任，主要負責協調本系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就他/她與系裏其他成員的關係而言，系主任不過是「平等中的首席」。即使副教授和助教也不算系主任的下屬。他們通常獨立地完成自己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這與德國或匈牙利的Lehrstuhl形成鮮明的對比。Lehrstuhl使用縱向的等級關係，系主任與系裏各成員之間的關係，屬於上下級關係。

大學的最高領導在美國被稱作president，而在匈牙利和其它許多國家被稱作rector。

間)。不管怎樣，我高興地接受了斯賓塞的邀請，並於幾周後，在哈佛大學發表了演講。

哈佛大學如何聘任教授

在我講述自己被哈佛大學聘任的故事前，請允許我先談談自己在那裏工作後，獲聘任為教授的整個親身經歷。

美國大學和教授簽訂的工作合同，出現非常奇怪的不對稱性。根據這個合同的內容，正教授享有終身職位。*如果終身教授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或者接受了條件更優厚的邀請到其他地方工作，這時，他可以隨時辭職。但是對於學校而言，即使學校對正教授的工作表現，非常不滿，也不能主動開除他。†

顯然這種法律條款，傾向於保護教授的權益。儘管它們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但是卻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因為人們認為，教授們從中獲得了充足的安全感，從而為學術自由，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證。他們可以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政治和科學觀點，而不會危及自己的生計。為終身教職制辯護的人，經常引用的例子是，在「麥卡錫主義」時代，許多美國大學的教授，都在這種制度的保護下，免受政治迫害。

由於校方很難辭退獲得終身職位的教授，所以它在挑選終身教授時，必須慎之又慎。如今尚未有適用於所有美國大學的聘任規定，我只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亨利·羅索夫斯基的《大學：經營者手冊》，來詳細描述哈佛大學選擇終身教授的程序。羅索夫斯基長期在哈佛大學中最大的學院——文理學院——擔任院長，所以對於這個

---

* 在哈佛大學和其他部分大學裏，只有正教授才能擁有終身職位(這是教員所能獲得的最高職位)。然而，有些大學將享受終身職位的教師範，擴展到副教授等中級職位。

† 當然根據常理判斷，這個規定也有例外，譬如教授犯罪時，學校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開除他。

問題，最有資格發言。

讓我們來作一個假設：經濟系需要一名教授，來教公司財務這門課。整個遴選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完全由一個正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控制，級別較低的教授以及學生，都不能參與這個過程。教授們在定期舉行的月會上，首先對聘任教授的提議，展開討論，即系裏是否真的需要加強這個領域的師資力量？如果這個問題得到一致認可，那麼委員會將任命「遴選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 的成員，然後這個小團隊便會花耗幾個月的時間，來尋找候選人。委員會的成員，需要閱讀與公司財務相關的最新文獻，展開調查，並且進行多次內部討論後，才會提出一名候選人，他們將盡可能提高選拔的標準。請允許我引用羅索夫斯基評論遴選標準的一段文字：「誰是最聰明、最有趣、最有發展前景的學者？……誰是『世界上』最適合這個工作描述的學者？……誰是全球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中的權威人物？」[1]我在哈佛大學的一位同事，這樣描述了遴選委員會對候選人的期望：「他的貢獻，改變了他所從事的學術領域，換句話說，他的學術作品問世後，他所在的學術領域，因此而有別於過去的狀態。」

遴選委員會需要做的，不僅是提出一個姓名，並簡單地寫下幾行推薦說明。委員會主席需要認真地發表演講，評論候選人的學術工作，讓系裏的其他教授相信，候選人確實達到非常高的標準。此外，遴選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要發表個人意見，然後教授委員會就此展開辯論。那些認識候選人本人或讀過他的文章的人，便會提出自己的意見。他的研究成果是否真的像遴選委員會評價的那樣出色，具有卓越的開創性？他/她是否具備未來的研究潛力？人們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反對候選人提名的教師，則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此外，候選人的性格特點，也是人們討論的內容。如果有人了解候選人，那麼候選人的教學能力，和學生對他的看法，也要被考慮在內。但是我發現，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這些因素，從來都不是決定性因素。真正重要的，是候選人的學術成就，和人們對他未來研究潛力的預計。

然後，教授委員會將對候選人，進行長時間的辯論，不過即使這個階段結束了，也不會作出最終決定。首先，系主任會給該學科分支的許多著名學者寫信(在本書的例子裏，是公司財務方面的專家)，向他們了解幾位學者的情況，其中包括候選人的名字，但不會說明誰是這個職位的候選人。系主任請求收信人，按照這幾位學者的學術成就，對他們進行次序排列。由於收信人，不知道到底哪位學者，是哈佛大學正在考慮的人選，因此他們的反饋被稱作「盲信」(blind letter)。這相當於在該領域裏最博學的學者中，進行了一次封閉的「民意調查」。

遴選委員會將為委員們，提供候選人的生平介紹、出版作品的書目，和他/她的兩三篇論文，供他們研究，此外，他們可以隨時查閱候選人的其它作品。委員們的任務，是熟悉候選人的文章，以獲得第一手材料，幾個月後，他們將再次在學院的例會上，提交建議書，教授們重新開始對這個問題交換意見。有時，所有教授在第二次會議上，就達成一致意見。如果沒有，那麼候選人的問題，將第三次列上議事日程，所有人的投票結果，都會被記錄下來。如果候選人獲得多數選票，那麼這將終結遴選過程的第一個階段——不過這只是整齣「大戲」的開場而已。

只有在這個時候，系主任才會正式地接觸候選人，了解他/她是否願意到哈佛大學工作。候選人不用申請這份工作，*哈佛大學會主動向那些被他們未來的同事認定為合格的學者，發出教授職位的邀請。在大多數情況下，收到邀請的人，都會欣然接受，不過有時，候選人也會因為某些原因，婉言謝絕邀請，例如他/她對現狀非常滿意，而不願作出改變，或者因為家庭原因，不願調動工作等。當

---

* 哈佛大學聘任的正教授，多半都不是本校的教師。本校教師評職稱時使用的程序，與此略有不同。本校的副教授參評時，必須決定自己是否服從「終身聘任制」的評審程序。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因為他們通常都無法通過評審程序，而這對他們將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所以許多人寧願提前找好退路，到另外一個願意提升他的職稱，並提供終身職位的大學任教。

然，他們也會對哈佛大學的邀請，表示感謝。在這種情況下，遴選委員會將再次啟動遴選流程，來推薦新的候選人。

假如候選人同意接受哈佛大學的提名，那麼在這個階段，他/她只需要在原則上表達自己接受的意願便行了，因為校方會告訴他/她，隨後還有聘任過程的第二個和第三個階段。下一步是與學院的院長討論薪酬條款，學系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發言權。薪酬問題完全屬於個人私隱，系內的教師，對於其他同事的薪酬，一無所知，即使系主任也不例外。哈佛大學招募經濟學家的成本相對較低，因為學校只需要為他們提供薪金和租賃房屋的經濟補助（如果他們需要搬家）*便可以了。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收購過程」，相對來說比較昂貴，因為他們可能要求學校提供助手和價值幾百萬美元的實驗室。新聘任的教授，沒有固定的薪酬範圍，只有他自己和院長，才知道薪酬和其它福利條件。

一旦院長和候選人達成協議，學院的院長便會向大學校長提出聘任新教授的建議。系內的所有成員，會向院長寫信解釋自己投票贊成或反對候選人的原因，校長將全面考慮他們的意見和「盲信」的內容。

雖然候選人必須在遴選過程中，獲得系內的多數選票和院長的同意，但是這不足以保證他/她必定能夠得到學校的聘任。學校需要確定這個學系沒有被科學觀、政治觀和世界觀相近的人所結成的朋黨把持，以免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吸納與自己意氣相投的人，所以學校必須進一步開展公正的核查工作。校長將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中一個成員，是精通這個學科，但是在其它學系工作的哈佛教授（例如在商學院工作的經濟學家）。校長還會從其它美國大學，甚至國外，邀請兩位專家，參加這個委員會。哈佛大學將向這個特別委員會的成員，分發候選人的文章。只要委員們承擔了這項工

* 可以確定的是，經濟學家的薪水相對較高，因為除了研究機構以外，勞動市場對他們的需求也非常大。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可能會被招募到政府部門或企業中，所以這種競爭推動了他們的工資不斷上漲。

作，便要認真仔細地精讀候選人的文章。

然後校長、學院院長和特別委員會的成員，將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在校長辦公室裏召開會議(我曾經被任命為特別委員會的成員，討論另外一個學系的教授的聘任問題，所以我有機會全程參與這個流程)。會議開始時，所有人要先聽取「證人」的意見，系主任只能以「第一證人」的身份出席這個會議。他要彙報系裏大部分人的意見，並回答委員會成員提出的問題，然後便可以離開會場。接下來「出庭作證」的人員，通常是候選人所在領域的專家。此外，這次會議，還要聽取反對候選人的代表的意見，這是委員會成員非常渴望了解的東西。在聽取了所有代表的意見後，特別委員會的主席將會要求所有成員表明自己的態度，並且說明支持或反對候選人的原因。由於哈佛沒有授權這個委員會作出最終決定，所以委員會成員，不會通過投票表決。最後，校長以邀請所有人吃午飯，來結束整個會議。

聘任教授的最後一個階段，是校長作出決定的階段。*在大多數情況下，系內和院長的建議，都會被接受，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會遭到拒絕。當校長拒絕學院對候選人的提名時，往往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從確定存在職位空缺，到正式聘任結束為止，這個遴選過程，常常會持續一兩年。

當我更加深刻地了解這個流程時，不禁為之瞠目結舌。我已經適應了匈牙利國內處理「人事」問題時，存在偏見，而且通常憤世嫉俗的方式。當然，對候選人專業成就的考慮，在匈牙利也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候選人的人脈。到底是什麼力量，推動候選人得到聘任，或者導致他被拒絕？他們作出這種決定，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是為了換取他人對自己的忠誠，為了實現利益交換，還是只是出於任人唯親的目的？哈佛大學遴選教授

*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哈佛大學的教授聘任問題，應該由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根據校長的舉薦作出最終決定。但這只是表面形式而已，真正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校長手裏。

的標準，無疑是這個領域中的一項卓越典範，它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佛大學的教授們，非常認同哈佛大學為了維護其權威性，而制定的近乎苛刻的選拔標準：他們希望通過聘任評審制，來把哈佛大學的地位推向頂峰。[*]許多工作繁忙的哈佛教授，抽出大量時間，參加與教授聘任有關的會議，就是為了確保學校招募的學者，能夠出色地勝任他/她的工作。所有教員都相信，這是需要由他們作出決定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們遴選出來的教授，的確名副其實，那麼一切都好說，但是如果事實證明，招募的學者不過是虛有其名，那麼學院必將淪為一所平庸的學校。

沒有人保證，這種沿襲已久的傳統遴選流程，完美無瑕。某些參加遴選過程的人，或許會心存偏見，而且除了純粹的學術標準以外，事實上他們還受到個人感情，或者外界壓力的影響。但這種現象非常隱蔽，我很難發現它們。此外，即使所有人都以學術成就為唯一的考量標準，遴選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偏差。某些被聘任的教授，辜負了學系的期望，而與此相對的是，傑出的學者沒有得到重視。哈佛大學一直流傳著關於保羅·薩繆爾森的故事。他曾經在哈佛大學跟從熊彼特，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經濟分析基礎》，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經典之作。[2]在數學方法還不是經濟學研究常用工具的年代裏，薩繆爾森確實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數學家。不過哈佛大學並沒有為他提供職位，[†]他加入了同在坎布里奇市的麻省理

---

[*] 大部分民眾都將哈佛看作最有威望的美國大學。最近，許多機構根據不同的評估方法，發布了各種大學排名。我在這裏只援引其中的一個來源：《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它將許多標準組合起來（如對學者的意見調查、教師發表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教師與學生的比率等），定期對全球大學進行排名。2004年的調查將哈佛大學排在首位，得分為100分，第二名的分數是88分，第三名的分數是79分。

[†] 為什麼哈佛大學沒有給薩繆爾森提供一個職位？有些人簡單地用反猶主義解釋了哈佛冷落薩繆爾森的原因。有些人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薩繆爾森敏銳的頭腦和批判性的評論，讓那些老式學校培養出來的、尚未認識到數學潛力的教授感到畏懼。

工學院，並在那裏對經濟系進行了改組。在他的學術影響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系，逐漸發展成為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薩繆爾森更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

哈佛遴選過程中，超乎尋常的高標準，造成了被外界稱為「哈佛式傲慢」的現象。就像其它研究單位的成員一樣，哈佛大學的教授，也會為本校的傳統和成就感到驕傲。他們並沒有感到自己，表現出特殊的高人一等的姿態，但是其他人，卻會經常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一種屈尊俯就的高傲態度，因此產生強烈的反感情緒。

雖然哈佛大學聘任教授的流程，不盡完善，但是每次我親身經歷這種流程時，總會滿懷敬畏之情地作出觀察，並努力為它貢獻自己的力量。

遷往波士頓坎布里奇市

現在讓我們回到哈佛大學向我伸出橄欖枝的問題。我在撰寫這本自傳時，非常希望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後，我是否能拿到當年遴選過程中的論文、會議記錄和「盲信」。我向經驗豐富的哈佛同事，徵求了意見，但他們堅決地阻止我向學院提出此類請求，他們提醒我注意許多我早已了解的情況。這個聘任過程的一個基礎原則，是保密性。人們所以在候選人的問題上，暢所欲言，正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評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傳到相關候選人的耳朵裏。在這個原則的鼓勵下，即使他們觀察到有對候選人不利的情況，也可以無所顧忌地描述出來。如果以後他們恰好與候選人共事，或者共同參加學術會議，保密原則保證了他們對候選人的負面評論，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不過，同事給我提出的另外一個建議，是假如我僅僅向一兩位評審成員，了解一些他們能夠回憶起來的事情，那麼這便不算違返它的保密原則。

我後來了解到，整個遴選流程中各個階段的一些情況，這個故事的主線，由此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大概在1983年至1984年間，哈佛大學經濟系感到，自己需要招募研究共產主義經濟體系的專家。

由於艾布拉姆·伯格森行將退休，所以物色人選的工作，迫在眉睫。伯格森是蘇聯問題研究方面最負盛名的美國學者，除此之外，他還對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作出重大貢獻，並且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會福利函數。在物色人選的過程中，我的名字進入了遴選委員會的考慮範圍。許多美國大學的同行，與我都有私人來往，有些還可以算是好朋友，但是除了與其他學者見面時，順道見了一兩位哈佛大學的教授以外，我幾乎不認識任何哈佛大學的學者，所以他們非常希望深入地了解我。

哈佛大學首先邀請我到其校發表演講，然後在共進午餐的時候，與我展開了學術討論。隨後，他們邀請我擔任1984–1985學年的客座教授。學系為我和妻子在坎布里奇市，安排住所。我在哈佛大學只開設一門課程，其它時間都可以用於研究工作。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並從普林斯頓搬遷至坎布里奇，開始新的生活。

我在哈佛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並在其中提出許多首次公開的觀點。在其後的幾年裏，我不斷自我磨煉，並擴充這些演講的內容，直至最終完成我的專著《社會主義體制》。其間，我逐漸開始了解哈佛。與此同時，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們，顯然也在試圖不斷接近我。他們邀請我擔任客座教授時，曾要求我提供生平介紹，和許多已經出版的作品。我猜想它們，一定成為當時遴選過程中，眾人傳閱的材料。

經過被哈佛大學充分的考察後，我在上文談及的遴選過程第一階段，終於結束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傑里·格林教授告訴我，學系決定聘任我為正教授，而且院長已經準備和我討論薪酬條件。

（如今已經過去了漫長的二十年，我寫信向傑里·格林詢問了當時的情況。請允許我引用他的部分回信內容：「我們委托一個小組委員會，專門研讀了你的部分作品，並且向委員會彙報評估結果。報告的結果顯而易見。……系內投票時，所有教授一致同意聘請你當教授。……我想這麼多年後，應該沒有人介意，我告訴你當年的這些情況。」[3]）

哈佛大學的遴選過程，進展到第一個階段的尾聲時，我收到了另外三份工作的邀請：一個是我在西方停靠的第一個「港口」——倫敦經濟學院；另外一個是洛杉磯加州大學。但是與哈佛大學相比，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是斯坦福大學。我已經通過了斯坦福大學的教員投票階段，而且它盛情邀請我到那裏工作。我在哈佛大學與藝術和科學學院院長交談後，和妻子一起前往斯坦福大學，考察那裏的發展前景。我把自己的選擇範圍，縮窄至兩所學校：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

斯坦福大學在很多方面都強烈地吸引著我。我在哈佛大學幾乎不認識任何人，而在斯坦福大學，卻有許多交情不錯的朋友，例如1968年，我第一次訪問斯坦福大學時便認識的肯尼思·阿羅、蒂博爾·西多夫斯基、艾倫·曼恩和青木昌彥。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團隊，它經常對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構成強大的競爭威脅。除此以外，加利福尼亞美麗的自然景色、海洋和森林，以及舊金山的精彩生活，都讓我神往不已。徘徊在兩所充滿魅力的大學之間，我的確很難作出最終決定。

由於難以抉擇，於是在心理上造成緊張情緒，我和妻子甚至為此大病一場。斯坦福大學的系主任，把他在海邊的房子，借給我倆作周末度假之用。在那如畫的自然美景裏，許多好消息接踵而至，生活的美好前景，令人怦然心動，但是我的腰病卻在此時發作，使我苦不堪言，我幾乎無法走路。這種痙攣，一定是由於緊張造成的。與此同時，我的妻子也高燒不退。最後只能由西多夫斯基駕車，把我們接回斯坦福大學。

最後，我們出於學術上的考慮，艱難地選擇了哈佛大學。那裏彙聚的學術力量，看起來超越了其它所有大學，如果把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地區的其它大學算在內，那麼它的學術優勢，更加明顯。此外，對於我擅長的研究領域來說，哈佛大學也表現出強大的學術影響力。在哈佛大學及其附近的研究中心裏，研究蘇聯、東歐和中國形勢，以及從事比較經濟體系研究的學者，人數顯然比斯坦福大學，更勝一籌。

加利福尼亞的美景，讓我們陶醉，但是我們也逐漸了解了波士頓，並且愛上了它。它似乎是所有美國城市中，最英國化和最歐洲化的一個城市。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了我的最終決定。無論我在哪個大學裏任職，都希望在合約中附加一項條件：我只能把一半時間，用於在美國的工作，而在剩下的一半時間裏，我將以無薪假期的形式，返回匈牙利工作。雖然這兩所學校都不太情願，但是最終還是接受了這項條件。他們當然希望，我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本校的工作中。一旦我決定了採取這種往返與匈牙利與美國之間的工作方式，那麼波士頓的優勢，也便更加明顯了。從波士頓到布達佩斯，要比舊金山到布達佩斯，少跨越一個大洲的距離。

我與文理學院的院長，達成了協議。他向我承諾，學院將幫助我尋找一個長久住所，並且提供所有傢具，同時，學院會為我支付每年往返布達佩斯和波士頓之間的所有飛機票費用。但是他也預先告訴我，這不過是一份建議書，我必須等候學校的最終決定，因為學校有可能否決學院的提議。

院長的警告，使得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裏，一直處於緊張的等待狀態(後來我才知道，學院需要在這段時間裏，召開特別委員會會議)。最終我收到了學校的通知，正式成為哈佛大學的正教授。

我和妻子開始四處尋找住所，並且在一個即將完工的住宅單元裏，找到一間理想的公寓。按照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習俗，人們通常要為建築物命名，我們所住的公寓，被稱作格林大學，位於毗鄰大學校園和哈佛廣場的奧本山街上。這裏是坎布里奇市著名的生活中心，它的一側覆蓋了哈佛大學的核心區域，當中包括哈佛園、建有古老演講堂的綠茵草地、主辦公樓和住宅等。廣場的另外一側，有許多辦公樓、飯店、銀行和商店。當中最重要的公共設施，是一直到深夜才打烊的大型書店。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哈佛廣場上，到處都是街頭音樂家、藝術表演者和小商販，有時甚至會臨時組成規模龐大的商街嘉年華。哈佛廣場就像整個城市不斷跳動的心臟，因此奧本山街的那間公寓，對我們來說，極具吸引力。

在1985–1986的學年，我和妻子回到匈牙利，1986年秋天，我們則返回坎布里奇，開始新的生活。在剛到哈佛大學的頭幾天裏，我們一直在哈佛教工俱樂部裏借宿，因為我們必須耐心地等待新公寓完工，才能搬遷進去。公寓的建築工程剛剛完工時，房間裏空空如也，我們只好向朋友借了幾張床墊。在我們添置傢具之前，它們便充當了我們的床。

教學的樂趣和煩惱

這也許就是我的命運：當我的同齡人士，已經擁有幾十年的教學經驗，甚至可以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走上講臺侃侃而談時，我才開始正式從事教學工作。

請允許我把自己當時的處境，與普通哈佛老師的典型經歷，進行對比(我們可以以微觀經濟學的教授為例)。當哈佛的教師還是學生時，便已經全面學習了那些教材，而且由於他就讀於著名學府，所以能夠有機會觀察各種老師採用的教學方法。一般來說，他會在三十歲前評為助教授。到了五、六十歲時，同樣內容的課程，他可能已經教授了二、三十年，所以他需要做的，只是在準備教案的時候，加入各種文獻中有價值的新觀點，和更新自己使用的統計數據。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自己的研究，融入授課過程當中。此外，他可以找來一本經過實踐證明反響良好的教材，以它的結構為線索，準備教案，也可以把許多學術著作中的內容，綜合起來，再加入自己的研究發現和見解。這些都是可以被接受，而且在實踐中，廣泛使用的教學方法。

而我當時已經五十六歲，缺少足夠的教學經驗，只能從頭做起。我開設的課程，名叫「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授課的對象，主要是準備攻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的畢業生。某些西方教科書也涉及這個範疇，我選取了它們的某些章節，作為閱讀材料，推薦給學生。不過我希望採用自己的方式，讓他們了解這個課題。我從來沒有聽到其他老師講解類似課程，所以根本不知道，其他人

開設這門課時，會做些什麼。當然我在準備教案的工作中，借鑒了許多已經出版的資料文獻，但是這些教案，從頭到尾都是我字斟句琢地親手寫出來的。我認為這樣，才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突出那些我認為重要的材料。

此外，我所研究的課題，不像標準的微觀經濟學，或者宏觀經濟學等學科分支那樣，比較穩定或發展地比較成熟。這些理論解釋的現象，相對比較固定，而且每年發生的變化，十分細微，幾乎察覺不到。與此相反，討論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就像射擊移動中的目標。八十年代中期，我開始從事教學工作時，共產主義陣營正處於動亂不安的狀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層出不窮。當時，蘇聯正在推行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公開化（glasnost）」，以及政策和經濟上的「新思維（perestroika）」。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有幾百萬人在舉行遊行——隨之而來的，是政府的血腥鎮壓。*到了1989年，柏林牆終於被推倒。這些事件都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準備「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後社會主義轉軌」這門課的教案。儘管我在政治體制發生變化前，對共產主義經濟體系和體系內部改革的看法，仍然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學生對它也充滿興趣，但是我必須精簡教案中第一部分的內容，以留出充足的時間，講解轉軌期出現的問題。我接收到大量新信息，但是我不能把學校的講壇，變成一個發布新聞的新聞台。我必須對它們進行更加深刻，而且系統化的分析。

我想我的同事，並不能完全理解當時我面對著的巨大挑戰。我必須努力學習其他同事透過西方大學教育和學術體驗掌握到的東西，以彌補自己在這些方面的缺憾。同時，我需要大花力氣，解決自己的研究領域裏出現的難題。我必須要克服懷疑、猶豫甚至專業自卑等情緒，才能站在哈佛大學的學生面前。這些青年人，都是從

---

* 當北京發生這些戲劇性的事件時，我和妻子寸步不離地守在電視旁，觀看了電視臺直播的中國學生運動從爆發到被鎮壓的全部過程。任何經歷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人，都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非常同情我的中國學生，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我們能夠切身感受到他們的恐懼和憂慮。

最優秀的申請者中，精挑細選出來的，而且他們向來以挑剔的耳朵，評判每一堂課。

我一定在課堂上，出過很多毛病。我那不可救藥的帶有濃厚匈牙利口音的英語，讓學生感到頭疼。但是讓我得意的是，我成功地抓住了他們的注意力，並且贏得了他們的尊重。對於為畢業生開設選修課的老師來說，我吸引到的聽眾，可以算是超乎尋常地多，而且來聽課的人數，始終有增無減，*這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把共產主義體系的問題，推到了公眾面前。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對我的課程的評價，不脛而走。

在哈佛大學，教授不是唯一有權力打分數的人。每年年終時，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都會拿到一份問卷調查，他們以匿名的形式，在調查表上寫下對老師的評價，然後把它交到系裏。一直到今天，我還非常驕傲地保存著學生們對我寫下的評論。有些學生對我提出了批評意見，例如有些學生，對我挑選的必讀書籍和推薦書目很不滿。由於我很少在黑板上寫方程式，或者使用數學模型，所以我猜測也有不少學生，反對這種教學方法。還有些學生認為，我的授課方式缺乏「技巧」。不過總的來說，我的教學特點，引發的負面評論相對較少，學生的調查問卷上，出現得更多的，是對我的讚揚。事實證明，這正是很多學生，樂意來聽我的課的其中一個原因：他們認為我這種「散文式」的教學風格，非常新鮮。我經常在課堂上，引用個人經歷和第一手的觀察資料。有時我會提到一些相關的電影或小說，因為它們生動地描繪了共產主義體制的特點。學生們非常欣賞這種教學方法，它們為我描述的那個遙遠的世界，平添了許多真實感。此外，讓我的課程充滿吸引力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會毫無保留地解答學生提出的任何問題，即使其中包括一些針對我個人的

* 每年新學年剛剛開始時，我都會和妻子打賭今年會有多少人選修我的課程。我們每人寫一個數字，然後將它裝入信封裏。預測數字與實際結果最接近的人，即為勝出者。我的預測情況總是比較悲觀，而她幾乎每次都贏。這意味著她可以隨便挑選飯店，而且興高采烈地享受一頓大餐。

問題，甚至是比較「八卦」的問題，也不會太介意。我授課時使用的基本原則、教學方法及教學材料，在很多方面，都與其他老師大不相同。事實證明，這種差異，不僅沒有嚇走學生，反而成為我的課程的一個亮點。一些接受問卷調查的學生，稱讚我沒有以狹隘的方式講解經濟學，而是在授課中，加入了對政治結構、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等的分析。綜合性社會科學領域裏，最傑出的人物熊彼特，曾經擔任這個系的老師，但是五十年後，學生們已經很少再見到跨學科式的教學方法。

我不想誇大問卷調查在提供學生反饋方面所具有的價值。這個調查，沒有包羅哈佛的所有博士生。參加調查的學生，是被民意調查專家稱為「自願者」的調查樣本。我開設的課程，不是必修課。學生可以根據興趣，自願報名，但是他們一旦選修了這門課，便有義務到堂上上課，並且參加考試。選修這門課的學生，首先是對它探討的主題感興趣，並且從去年聽了課的學長那裏，知道了這門課的授課方式。我不想宣稱自己使用的教學方法，對哈佛大學的學生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我希望得出一個更加謙虛，而且更加有限的結論。儘管在授課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令人興奮的事情，也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但是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年都有很多學生，從我的課程和文章中，享受到學術的快樂，而且當我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時，也促使他們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多元化與寬容

儘管我的授課方式，在本質上與其他哈佛教授，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但卻絕不算最特立獨行的一種。哈佛大學（以及其它許多美國高等教育的研究所）明確聲明學校努力追求學術的多樣化，學生可以從眾多的思潮、哲學體系和科學思想流派中，自由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阿瑪蒂亞·森分別在經濟系和哲學系中擔任教授，而且多年以來，一直堅持和羅伯特·諾齊克舉辦哲學研討會。諾齊克發表了《無

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後，被視為自由至上論的研究領域裏冉冉升起的新星。* 森的政治觀點與諾齊克針鋒相對，他研究了貧窮和饑荒等問題，並且無條件地要求國家扮演重新分配的角色。他們雖然觀點相左，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真誠的友誼，而且反而為他們共同舉辦的研討會，增添了許多令人激動的閃光點。

在我工作的經濟系裏，也有各種各樣的經濟思想流派，許多人的政治觀點，不僅是相左，而且可以稱得上是針鋒相對。我的同事中，有激進的左派經濟學家斯蒂夫·馬格林和幾位老派的凱恩斯主義者，還有在進行理論研究之餘，定期向保守的《華爾街日報》投稿，分析政治問題的羅伯特·巴羅。有些教授回到學校教學前，或多或少都曾在政府裏為總統服務。我到哈佛大學工作時，八十歲高齡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已經退休，但是他仍然不時出現在系內（我們在游泳池裏，定期看到他那瘦削挺拔的身影）。他不僅因為自己的學術著作而聲名顯赫，而且還成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智囊團的核心成員，也曾一度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馬丁·費爾德斯坦負責協調大規模的機構任務和教育工作，他屬於另外一個政治團體，曾在里根時代長期擔任總統的高級顧問。另外一位同事拉里·薩莫斯，後來離開了講壇，轉而從事公共服務——擔任世界銀行的副總裁。在克林頓執政時期，他出任財政部的副部長，後來升為部長。薩莫斯卸任後，返回了哈佛大學教學。儘管在名義上，他只是經濟系的教員，但是在2001年，他卻出任了哈佛大學的校長。2006年年底薩莫斯退休後，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回到系裏。經濟系和哲學系有一雙教授組合——羅伯特·巴羅和格利高里·曼昆——他們經常聯手舉辦研討會，並在聽眾面前唇槍舌劍，展示他們相互對立的觀點。

所有人都可能在教學、演講或其它公眾場合，與他人展開激烈

---

* 後來，諾齊克逐漸改變了自己早年間在很多問題上激進的自由至上觀點。作為一個勇敢無畏的思想家、才華橫溢的作家、充滿溫暖的幽默感，而且非常和善的人，2002年諾齊克在處於權力的巔峰期時，與世長辭。

的辯論，而且人們非常了解其他人所同情的政治思潮，與自己不同，但是他們從來不會在系內的會議上，就政治主張或世界觀，進行爭論。這些爭辯和不同的立場，不會妨礙他們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也許我是唯一對此感到驚訝的人，而其他人對此，則早已習以為常。

我的摯友中有一對夫婦，丈夫是共和黨人，而妻子則是民主黨人。每當伶牙俐齒的妻子，在朋友面前揶揄丈夫的保守觀點時，我們常常忍俊不禁，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和平共處」，他們已經幸福地生活了幾十年。這讓我們想起一位匈牙利朋友：政治制度變化後，他曾經沮喪地告訴我們，由於夫婦無法容忍彼此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很難安安靜靜地與已經成年的孩子們坐下來，吃一頓家庭晚餐。

苛刻的道德要求

哈佛大學的教授，非常看重對自我的道德要求，他們認為自己的品行，一定要與自己的地位相符。如果把美國大學所採取的嚴格措施，例如禁止對學生進行性騷擾，或者禁止教師與學生談戀愛等等，在校園裏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很有教育意義。*我本人沒有經歷這種事情，也沒有聽到類似的流言蜚語。在那個狂熱的年代裏，「政治正確」的行為，意味著男性教授，即使和女同事在一起時，也要保持一定距離，而且對待她們的態度，就像根本沒有注意到對方的性別一樣。我在哈佛大學的行為舉止，就和在布達佩斯一樣。我經常會稱讚女同事的衣著或髮型，有時還和她開幾句玩笑。我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行為，是否得體。我認為女同事更喜歡人性化的舉動，而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形式主義。

---

* 在一份學生辦的報紙裏，加爾布雷思承認了自己擔任助教時犯下的罪孽。不久以後，他娶了自己的學生，自此生活在一起。

然而，這不是我希望在這裏詳細探討的問題。與此相反，請允許我談談與教學和研究有關的道德問題。

現今的基礎理論研究、實踐應用研究和商業應用研究，已經密不可分。人們什麼時候，結束了不摻雜任何私心的單純的科研事業？人們又是怎樣開始在金錢的驅動下，從事學術工作？哈佛大學不願偽善地對這個問題，支吾其詞。* 商業贈款是研究工作的主要資金來源，學校試圖區分商業捐贈**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它採用明確的標準，來界定哪些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捐款，而哪些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捐款。

學校明確劃分了兩種衝突：利益衝突與承諾衝突。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說，教授或學校裏的其他工作成員，有義務尊重學校的物質利益：例如，假如教師從事科研工作時，從商業公司那裏得到了酬勞，那麼他便不應該在不向學校支付費用的情況下，隨意使用學校的實驗室設備。如果教師同時接受了兩種工作，即學校裏的工作和公司裏的有償工作，那麼後者絕對不能對前者造成負面影響。

大學教師有時還需要承擔美國情報機關，和特務機關委托的任務。不過這絕不是電影裏描述的那種潛入辦公室，竊取軍事數據的間諜。還是讓我們以經濟學家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眾所周知，美國中央情報局定期召集美國經濟專家，來評估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因為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蘇聯的官方統計數據，並不可靠。這是一個嚴肅的科學任務，而且任何在政治上忠於祖國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對此提出異議。這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學校的教職工為情報機關工作時，大學的獨立性和政治操守卻從何談起？大學的教授，是否可以因為從事軍用研究，或者與情報有關的研究，私下裏接受經濟報酬？大學的這種安排，是否會為其招致國內外的政治批評？

---

* 哈佛大學成立了一個教授委員會，並由一位學校的高層官員擔任主席。這個委員會專門就這個問題寫出詳細的報告，為監管大學與商業世界之間的接觸與合作，提出具體建議，並且為解決其中潛在的衝突，制訂相關原則。

大學分析了這些情況後，制訂出一條規則：校園內不得進行任何「機密」研究。學校的教職工，以個人名義，為情報機關或軍方的研究工作擔任顧問時，憑著自己的良心，決定是否接受它們的經濟報酬。不過研究者必須向學校彙報這些工作，假如他們的研究成果正式發表，那麼他們必須自己公開宣布，這些研究受到五角大樓，或者中央情報局的資助。

不過，無論學校制訂的規定和制度，如何深思熟慮或周到詳盡，仍然會出現許多介乎允許和不允許之間的臨界行為。鑒於這種情況，哈佛大學成立了各種道德委員會。本校的教授或者其他成員，可以請求它們提供建議。另外一種更簡單的方法，是直截了當地諮詢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假如委員會察覺到，有些行為存在道德問題，那麼便會展開相應的調查。

我不希望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哈佛大學和其它美國頂級大學的道德情況，非常完美。事實上，那裏不僅會發生許多可疑的事情——只要是人類工作的地方，這種情況便不可避免–而且不幸的是，這些問題還可能出現在大學的領導層裏。學校沒有合理地解決這些問題，例如阻止它們發生，或者向公眾表明自己的立場。

無論何時，我與學校裏的朋友，談到類似事件時，我發現他們都希望推行更高的道德標準，並且力求鞏固哈佛大學和整個美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的聲譽。如果他們能公開地表達這些觀點，那麼效果一定會更加顯著。

---

* 我曾經就是否接受學生禮物的事情，諮詢了這個委員會。由於這份禮物只是為了表示感謝，不值多少錢，而且考試亦已經結束了，所以委員會建議我接受這份禮物，而不是拒絕它，以免傷害學生。

17 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年後

哈佛大學向我提供教授職務時，希望我能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學校的工作。他們明確地表明，學校可以利用它的影響力，幫助我申請美國公民的身份。如果我不願加入美國國籍，那麼至少可以在學校的幫助下，申請到「綠卡」(即永久居留證)。然而，我卻拒絕了他們的所有建議。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樣，我與學校協商時，堅持要求留下一半的時間在匈牙利工作，我為什麼要這麼堅持己見呢？

什麼將我與匈牙利牢牢地聯繫在一起？

在本節中，我將兑現前文對讀者許下的諾言，重新回到移民的問題上。1956年，匈牙利大革命失敗後，移民潮席捲了整個匈牙利，許多人逃往西方，但是我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我拒絕了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向我發出的工作邀請，這些工作，顯然意味著需要離開匈牙利而到國外生活。到了1985年，我在考慮是否到哈佛大學工作時(其它美國大學，同時也向我發出邀請)，再次拒絕了移民的可能性(我把本章內容開始的年份，確定為1985年，因為當時這個問題，再次迫在眉睫)。在這件事上，我不能用家庭作為搪塞的理由。我的三個孩子中，有一個住在匈牙利，一個住

在瑞典，還有一個住在美國。*我們的七個孫子和孫女也住在這三個國家裏。如果我們靠近某一個孩子和他們的家人，那麼相應地便會遠離其他子女和他們的家庭，所以這也是影響我們作出決定的一個因素。我一遍又一遍地和妻子討論了這個抉擇，我們不僅對最終的決定，達成一致意見，而且還認同了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不過由於在這本自傳裏，我是在講述自己的想法和感覺，所以我還是選擇用第一人稱單數，來敘述整個故事。

我對匈牙利有著深厚的、真摯的感情。每次當我從國外返回匈牙利，經過鏈橋或伊麗莎白橋，看到布達佩斯的美景，在我眼前逐漸展現出來時，總會不由得心潮澎湃，心中充滿喜悅。阿蘭尼、埃迪、阿蒂拉·尤若瑟夫和其他匈牙利詩人的作品集，以及考林蒂的文集，我都各有兩套——一套放在布達佩斯的家裏，另一套放在美國的家裏。在哈佛大學的住所裏，我還把巴托克的肖像畫，掛在牆上。

我習慣用匈牙利語思考。我在發表演講時，從來不會乾巴巴地照讀演講稿，即使用英語演講時，我也習慣了即興發揮。我可以輕鬆地，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在寫作時，更傾向使用匈牙利語，因為它使我更加得心應手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在出版專著前，會聘請專職的翻譯，把匈牙利語寫成的手

---

* 我們的兒子加博爾也研究經濟學，但是他不是在大學裏學到如何成功地創辦和經營公司，而是通過工作實踐積累了相關經驗。此外，教學也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因此在經營一家成功的IT公司之餘，他經常抽出時間到佩斯大學執教。我的女兒朱迪特，畢業於布達佩斯經濟大學。她現在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主任，主要負責為全球商界的領軍人物組織進修課程。我們的小兒子安德拉什，是唯一與經濟學絕緣的人。他獲得了數學博士和語言學博士的學位。如今他在美國定居，主要工作是在最激動人心的領域中，從事應用研究——互聯網發展。安德拉什經常回到布達佩斯。他在技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專門輔導博士生。作為他們的父母，我由衷地為我們的子女感到驕傲。最讓我們自豪的是，我們的三個孩子工作都很勤奮，而且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取得現在的成就。

稿，譯成英語。此外，當我計算時，也使用匈牙利語，偶爾做夢時也會冒出幾句匈牙利語來，如果我還能夠回憶起當天晚上夢境的話。

我不可能熱愛所有匈牙利人，無論從道德觀，還是感情的角度出發，我向來不主張對一個群體，一概而論。我欣賞某些匈牙利人，對某些匈牙利人毫不關心，拒絕接受某些匈牙利人；而某些匈牙利人，則讓我動怒，因為他們的罪行，在我看來不可饒恕。但是我與美國人、德國人或以色列人相處時，也是如此。我在匈牙利和國外，都有許多肝膽相照的摯友，但是那些「一切盡在不言中」，並且因為過去的經歷，被牢牢地綁在一起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匈牙利的朋友。

匈牙利的命運，時刻牽動著我的心。我對匈牙利歷史的了解，多於其它任何一個國家。而且我從懂事起，便非常關心匈牙利的一切。即使在美國生活時，我也始終以旁觀者的身份，密切關注著它的發展（儘管其中摻雜著許多個人情感）。我堅持訂閱匈牙利報紙，而開始使用互聯網後，更是時刻同步追蹤匈牙利的新聞。在內心深處，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仍然是在匈牙利發生的事情。

民族優越感與我的人生原則，格格不入，但是當伊斯特萬·薩博的作品《梅菲斯托》，榮獲奧斯卡獎時；當匈牙利運動員，獲得奧林匹克金牌時；當我向美國朋友，推介拉斯洛·內梅特的戲劇《伽利略》時；當人們談論的話題，轉而為培養出約翰（雅諾什）·馮·諾伊曼、尤金（耶諾）·威格納和威廉姆（維爾莫茨）·費爾納的學校時；當《紐約時報》盛讚耶迪可·埃涅迪的電影《二十世紀》，或者安德拉什·希夫的鋼琴獨奏會時，我總會滿心歡喜。無論在美國、中國，還是蘇聯，只要我聽到人們稱讚匈牙利經濟學家，在關於社會主義的國際論壇上，扮演了開創性的角色，都會為之感到欣喜和安慰。我因為找不到更準確的詞語來描述這種感情，所以把它稱作民族自豪感。

我不喜歡悲天憫人，也不想引用匈牙利第二首國歌中的歌詞：

「你必將在這裏生活，然後死去」*，與此相反，我更喜歡用經濟學家相對乾癟的語言風格，來談論自己對保持觀點延續性的看法。我在前文提及，雖然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我有不少出國機會，但都因為遭到阻撓而不得不放棄，即使政府允許我出國，我也必須艱難地申請出國許可證，但是我仍堅持使用匈牙利護照。既然現在出國旅行，已經不是一件難事，那麼我是否應該考慮轉換一個護照？在受到專政壓迫，人身自由嚴重受限制的年代裏，我順從自己的意願，留在了匈牙利，而且忍受了匈牙利政治制度，在公民權利和公民地位等方面的各種缺陷。當舊制度開始解體，並且最終分崩離析時，難道我應該違背自己的諾言嗎？

我沒有選擇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對匈牙利有著強烈的感情依戀，但是我必須補充的一點，是促使我作出這個決定的，還有專業研究方面的考慮。我的專長，是研究社會主義制度和後社會主義轉軌，而西方國家裏，也有許多學者，致力於這兩個課題。我的研究成果所以具有獨特的真實性，是因為從我的第一本書，以至最後一篇文章，我記錄下的，都是我親眼看到，以及親身體驗到的在匈牙利發生的情況。我曾經研究了許多具有普遍性的主題，都以選擇匈牙利作為研究的**範例**，並且以它作為基礎展開研究。我的許多文章，在開篇處便點明自己使用的研究方法，那即是用文章的主標題，來限定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課題，同時用副標題說明本文「以匈牙利的經驗為依據」。我從來不擔心，讀者會懷疑我有狹隘的地方主義傾向。我認為在利用比較方法，完成實地調查和信息收集工作後，真正的學術挑戰，正是體現在如何從具體的觀察結果中，得出普遍性的結論。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居住在哪里的崇高權利。在我的價值觀

---

* 這些匈牙利人經常引用的話，選自偉大的匈牙利詩人米哈伊·弗羅什馬蒂（1800-1855）的詩歌《Appeal》。這首詩第一節的最後四行，向匈牙利人大聲疾呼：「除了這裏/世界上沒有你的容身之處/無論命運之手眷顧你，還是折磨你/你必將在這裏生活，然後死去」。

裏，允許我接受匈牙利人移居其它國家的做法。也許有很多原因，促使他們作出了這個決定，譬如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對社會狀況十分所望，或者僅僅因為自己覺得，在其它國家生活更快樂。

任何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都可以用移民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異見，例如拉約什·科蘇特、米哈伊·卡羅伊、奧斯卡·亞西、貝洛·巴托克，和許多在1945年後離開匈牙利的民主派政治家。這是一種非常英勇的姿態，而且他們要為此作出巨大的犧牲。當然，我認為從道德層面上來說，移民的人，不會較留在匈牙利的人低一等——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他們更加高尚。人們是否只能用離開本國，來表達自己對專政政權的反抗呢？留在匈牙利，是向統治集團屈服的表現嗎？我無法接受這種刻板地對人們劃分等級的方法。流亡的人們，可能會在異國它鄉低調行事，而很少公開露面，而留在國內的人，也可以抬頭挺胸地走在本國的土地上。對於他人生活的道德評判，應該基於他們的行為，而不是僅僅取決於他們選擇在哪個國家定居。

坎布里奇與布達佩斯的生活比較

到哈佛大學工作後，我每年有六個月在美國生活，剩下的六個月則在布達佩斯生活。毫無疑問，這種奔波於兩地的生活狀況，使得我們有機會對兩種生活方式，進行比較。在這兩個城市生活的優勢和劣勢，分別表現在哪裏？它們之間的差別，體現在何處？我不是在比較「美國」與「匈牙利」或「布達佩斯」，只是從兩個半球紛繁的生活現象中，抽出一小部分，進行對比。此外，我也沒有在比較兩種社會制度或兩種文化，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或專著，已經汗牛充棟，我自己也曾經寫作類似的文章。在這裏，我只是希望描述一些個人的回憶和印象。我曾經接受一項問卷調查，要求我寫下自己在美國最喜歡和最討厭的三樣事物。看起來，我可以利用它們作為一個不錯的框架，來對比在這兩個城市生活的感觸。

美國人臉上帶著的微笑，讓我陶醉。我的意思不是說，美國規

定人們有義務「保持微笑」，而是指較諸匈牙利人，美國教授和學生、售貨員和服務生、早餐時間電視節目裏的記者和被採訪者，更加普遍地表現出善意的幽默感。美國人一定也有自己的煩惱和悲傷，但是他們從來不在其他人面前流露這種情緒。我的第一位美國秘書馬德琳·勒瓦塞爾，首先是忙於照顧生命垂危的母親，後來又要照顧慢慢走向生命盡頭的丈夫。她為家庭作出了很多犧牲，而且日子過得很艱難，但是每次當我走進辦公室時，她的臉上總會綻放出微笑，而且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個不停。另外一個協助我在系裏工作的秘書，名叫蘇珊，她年青和有魅力，但是剛剛做了癌症手術，手術前的化療，使她的頭髮全部掉光。她經常一面笑著，一面戲謔地向我們展示她新買的假髮和帽子，落落大方地問我們，這些適不適合她的膚色。

無論何時，當我們從美國返回匈牙利時，迎接我們的總是一片抱怨聲——雖然所有抱怨，都有適當的理由，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們遇到的麻煩有多嚴重，而是他們以什麼樣的態度，迎接困難。我們剛剛開始這種往返於兩地的生活時，每次回到布達佩斯，如果別人詢問我們在美國的近況，我們總會說：「哦，很好」。然後人們便會說：「你們真的過得很好嗎？哦，在美國的生活，當然很愜意了。」後來，我開始留意自己的言詞。我會預先準備一些抱怨的說話，因為只要我這麼做，便可以馬上和他們找到共同語言。

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們所接觸的美國人，都非常誠實，而且值得尊敬。我不想在這裏，證明哪種社會體制或哪個國家，會滋生更多濫用職權、腐敗或政治虛偽等陋習，我只是想談談生活中的許多瑣事。我在商店買了東西後，售貨員給我找得零錢算沒算錯？如果技術工人，說他周三上午九時到我家來，他是不是會準時出現在門口？你從電話中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準確？如果我給某人的答錄機上，留了口信，對方會不會給我回電話？雖然我在坎布里奇，也遇到一些讓我對人們的可靠性和誠信失望的事情，但它們的數量，較諸布達佩斯少得多。

美國也有「灰色」經濟，只不過它所覆蓋的範圍，較東歐國家小

得多。但是就我們的經歷而言，美國「灰色」經濟的道德原則，較諸匈牙利，似乎更值得讚許。我們剛剛搬家時，需要聘請一位能夠幫助我們完成打孔、移電源插座和組裝書架等各種雜活的零工。後來我們找到了斯蒂夫，他通常下班後便來我家工作，而且除了為我們裝窗簾外，還把其它所有雜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條。斯蒂夫白天在一家窗簾公司上班，他認為從事第二職業時，與自己的老闆競爭，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美國人的專業精神和工作紀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我們接觸到哪個領域，或者哪個層次的工作人員，都會感到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而且盡職盡責地完成了本職工作。表現出這種特點的，不僅是高水平的業務人員，譬如我們的保健醫生，雖然只是初級水平，但是卻密切關注最新的醫學發展情況，一旦學術界關於某些治療方法，或者藥物的觀點，有所改變，他便會馬上作出反應。電視錄影技術員、修車的技工和家庭粉刷匠等，也是如此。他們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較諸匈牙利同行，美國人受到了更加全面的業務培訓，而且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們很少會對工作敷衍了事，或者把工作時間，浪費在閑聊上。這使得我們的腦海中，逐漸形成了工作勤奮的美國人的形象。當然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屬於這種類型，而且匈牙利，也不乏經驗豐富，而且勤奮努力的人——而且這類人才的數量，現在還在不斷增長。不過我認為美國完全可以宣稱這類人士，在其本土更加普遍，他們是美國取得高速發展和提高生產力的主要動力來源。

現在讓我們談談在美國生活時，三種讓我不快的經歷。我首先要提及的是語言，它給我帶來了不少麻煩。當然豐富的表達方式，絕不是英語的過錯，但是在其他國家長大的人，卻很難掌握它那種難以模仿的發音，和龐大得令人驚訝的詞彙量。我的英語語言能力，顯然在這兩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我記得自己剛到美國時，還因為語言水平鬧了不少笑話。我在波士頓考駕駛執照時，警察給我展示了一些交通標誌，讓我說出它們代表什麼意思。我看到其中的一個標誌時，毫不猶豫地告訴警察，它代表「禁止綁架(No

Hijacking)」，事實上我想說的是「禁止搭乘(No Hitchhiking)」，在場的人哄堂大笑，不過幸運的是，我還是拿到了駕駛執照。還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講解關於存貨的問題時，三次把「倉庫(warehouse)」，說成「妓院(whorehouse)」，結果所有學生都忍俊不禁。雖然後來我的英語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很難理解，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古怪的英語發音，或者別人在電話裏，連珠炮似的講話。

第二個讓我不快的問題，要比語言障礙嚴重得多。美國公眾的想法中，存在著奇怪的地方主義，這讓我大感不快。儘管美國在政治、經濟和科學世界中，都處於核心地位，但它卻是一個非常內傾性的民族。如果想了解美國民族的這種特質，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三大主要電視網裏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節目。它們報導的內容，很少與美國無關，而且即使它們報道了國外發生的事件，你也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它們是從美國的視角，討論這些問題。相對來說，歐洲(特別是它的成員國)，對世界的態度則更加開放。

最後，我在美國人身上，看到一種讓我難以貶抑的精神：永恒的樂觀主義和對行動的信念。假如美國的某個地區，遭受了自然災害，記者對當地人進行採訪時，他們從來不會表現出被災難壓垮的樣子，也不會要求聯邦政府，為他們提供救援。與此相反，他們通常會說「我們會處理好這些事情」，或者「是的，我們會從頭再來」之類的話，然後馬上開始講述自己的賑災計劃。這種面對困境，積極進行自救的態度，確實值得讚揚和推崇。

但是與這種隨時準備採取行動的態度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幼稚和低估局勢複雜性的傾向。美國人遇到棘手的問題時，總是確信自己一定可以克服它們，他們無法想像，世界上存在著沒有解決方法的問題。美國人經常會不加思索地提出自認為能夠妥善安排所有事情的建議，但不幸的是，這種方法，通常建立在對局勢過於簡單的描述上，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總是非常粗糙。

面對困境時，迅速採取行動，經常會創造奇跡。當歐洲的哈姆雷特們和奧勃洛莫夫們，還在猶豫不決或無所事事時，美國人也許

已經動員所有力量，蓄勢待發。但在其它時候，倉促採取行動，則可能引導人們走上錯誤的道路。(請允許我預先講述一些後文發生的事情)別忘了共產主義體系崩潰後，美國政府的顧問，很快便制訂了行動方案，並且開始建議，所有發生制度變遷的國家，採取統一的措施。這些建議，有時成效顯著，有時卻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世界文化的中心

當某些自命不凡的匈牙利學者，用盛氣淩人的語氣，談論美國文化多麼原始和落後時，我認為他們不真實地誇張了許多情況。當然，美國的確有許多粗俗，而且缺乏教養的人，但是匈牙利和歐洲其它各國中，也不乏這樣的人。不過幸運的是，我居住在世界的科學文化中心之一。在波士頓及其郊區，共座落著七所大學，其中兩所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都在同一條街道上——麻省大道，而且相距只有十分鐘的路程。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許多知識淵博的學者，但我可以放心大膽地宣稱：像波士頓這樣彙聚了大量敏銳的頭腦、天才和教育機構的地方，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布達佩斯的藝術博物館，也許會為擁有凡高、高更、馬科斯·貝克曼和克里姆的畫作，甚至有拉斯洛·莫霍利–納吉的油畫，這些都讓人們感到興奮。而這些在哈佛博物館的藏品中，也是應有盡有，更不要提波士頓最偉大的畫廊中——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所收藏的無窮珍寶。

我們只要乘坐幾分鐘地鐵，便可以到達波士頓交響音樂廳，這裏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交響樂團之一——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大本營。我們在那裏聽到的音樂會，真是天籟之音！任何訪問美國的著名音樂家，都把波士頓的邀請，視為無上的榮耀。除此之外，波士頓還有兩個非常精緻的音樂廳：牆上鋪著木鑲板，而且還有音色令人感到溫暖的約旦音樂廳，和作為哈佛大學演講廳的桑德斯劇院。我們在那裏聽了幾年音樂會後，在觀眾中看到的熟悉面孔，較諸在

匈牙利音樂學院的多得多。

除了聽音樂會以外，我們還經常看電影。雖然錄像帶租貸店裏，有大量錄像帶供我們選擇，但是它們卻無法提供在電影院裏，看電影時享受到的愉悅感(當時我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有新電影上映，便興沖沖地去看。現在在布達佩斯，也可以看到最新的美國電影)。有些我們在美國看了的電影，從來沒有在布達佩斯上映，例如改編自契呵夫戲劇《萬尼亞舅舅》的精彩電影《萬尼亞在42街口》，和描述古爾德這位鋼琴怪傑生平的《古爾德的32短篇》。

談到書籍，哈佛廣場上有三家大型書店，內裏擺滿了不計其數的書，而且距離我們的住所，只有幾分鐘路程。書店裏永遠擠滿了學生和書蟲，而且它們直到深夜，才停止營業。我居住在瑞典的孫子和孫女，到美國來看我時，第一件事情，就是衝進廣場上的書店。我們能在書店裏，找到最新出版的書籍(我們經常翻閱《紐約時報》或《紐約書評》的周日增刊，就是希望它能夠推介我們，在潮水般湧出的新書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書籍)。

假如說波士頓的文化資源，還不夠豐富，那麼與我們近在咫尺的紐約和華盛頓，也有大量文化資源，供我們使用。我們幾乎每年都要到其中的一座城市玩幾天。如果把這兩個偉大城市的音樂廳、歌劇院和畫廊，與波士頓的累加在一起，那麼，我們可以選擇的文化場所，幾乎數不勝數。我們經常因為沒有時間，或者因為其它約會，錯過了某些視聽盛會而追悔莫及。

朋友

友誼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各種友情在感情的深度、真誠程度和接觸的次數方面，卻有所區別，但是熟人和朋友之間的界限，依然清晰可辨。無論圍繞在我身邊的人，和我是什麼樣的關係，能夠與他們和睦相處，總會讓我感到心情舒暢。

正如我在上文提及的那樣，只要我在工作中，與直接接觸的同事們融洽相處，那麼便能令我帶著愉快的心情，投入到工作中。我

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哈佛大學為我提供的秘書，都是富有人格魅力，而且和氣友愛的人。我已經在前文介紹了馬德琳。此外，每天早上，我都是從自己和凱特·皮爾森的討論，開始新一天的工作，我們不僅討論當天的工作，還會交流彼此對政治事件、電影和讀書的感受。勞倫·拉羅薩把她自己所寫的詩集送給我，這無疑象徵著她對我的信任。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和他們三人中的任何一個見面，但是我與他們始終保持著通信，偶爾還會互相通電話。

我從來沒有擔任領導工作，但是我總有一個或多個研究助理，協助我工作。在1985年至1997年間，瑪莉亞·科瓦奇一直在擔任我的研究助理（朋友們通常叫她Marcsi）。這讓我感到自己，享受極大的特權。從聲望頗高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的勞伊克學院畢業後，瑪莉亞便開始做我的全職助理。她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譬如收集數據、校訂我的手稿、起草信件、聯繫相關人員和管理我的文件。她對我的工作瞭如指掌，所以每次我還沒有說出口，她便已經了解我的心意。我開始到哈佛大學工作後，她也同意，每年陪伴我到美國工作。

繼瑪莉亞後，擔任我的助理的有阿格尼絲·貝內迪克特和雅諾什·沃爾高。他們像瑪莉亞·科瓦奇那樣，陪伴我奔波於坎布里奇和布達佩斯之間。他們都是幫助我工作兩年後，自願再續約一年。

這三位年輕人，不僅是我的助理，而且也是我親愛的朋友。我和妻子把他們看作我們的孩子或孫子和孫女（他們在年齡上，分別屬於兩代人）。他們遇到麻煩時，我們總是樂於伸出援手，而且我們也經常在學校外的私人場合見面，他們對我的妻子蘇莎的廚藝，讚不絕口。

我擔任博士生導師期間，與許多學生建立了溫暖的友情，他們協助我完成了不少研究和寫作工作。對我來說，安娜·塞萊妮、錢穎一、許成鋼、卡拉·克魯格、簡·普羅科普、亞歷山大·瓦克魯、翁笙和和約翰·麥克黑爾，不僅是致謝名單和合著者名單上列出的名字，和他們聯繫在一起的，還有無數美好的回憶。我們不只在學校裏見面，而且經常和彼此的家人，一起舉行家庭聚會。自從離開

哈佛大學後，我們始終保持著聯繫，只不過和有些人交往比較頻繁，而和其他人交往較少而已。

我們在哈佛生活時，需要聘請一位家政工人，於是便從貼在樹上的小廣告裏，找到一位符合我們要求的求職者。我們撥通廣告上的電話號碼後，一位充滿魅力的女孩，很快便出現在我們面前——蘇珊·瑞安-沃爾瑪。當時她剛剛大學畢業，偶爾寫些短篇小說和詩歌。她雖然仍然懷揣著文學夢想，但是希望做些家政工作，暫時維持生計。我們協議了報酬後，蘇珊便開始定期幫我們家打掃清潔。我們逐漸成為了好朋友，我和妻子勸說蘇珊不要放棄學業，她聽從了我們的建議，並且報讀了一個高級新聞寫作進修班。蘇珊首先是在一家小報社謀得一份差事，後來進入一家知名的波士頓報紙工作，現在她已經是那裏的副主編。

蘇珊為我們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詢問我們，是否介意帶同一個朋友來幫助她，我們同意了。從那以後，當時已經成為記者的蘇珊和她的夥伴——初中老師琳達·克羅圖——便開始輪流幫我們做家務。她們對我們始終忠心耿耿，無論蘇珊的事業，發展得多麼一帆風順，無論琳達背負的教學工作，有多麼沉重，他們仍然出於關心地照顧我們，堅持幫助我們打理家務。這種人與人的偶遇，充滿了樂趣。她們的工作非常努力，可以稱得上是細心、徹底，而且是無與倫比的優秀清潔工。*在休息的間隙，我們一起談論政治時事和彼此正在閱讀的書籍。我找不到合適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時，便會向琳達或蘇珊求助。蘇珊懷孕後，把這件喜事告訴我們時，我們感覺就像自己的親人懷孕般激動。我們離開美國後，蘇珊生下第二個

* 我從哈佛大學退休時，蘇珊和琳達也應邀出席了學校為我舉辦的答謝晚宴。人們圍繞著一張很大的圓桌紛紛落座後，開始與旁邊的賓客相互進行自我介紹。坐在蘇珊和琳達周圍的都是大學教授。人們問到她們的職業時，她們總是先說「我是雅諾什·科爾奈的清潔女工」。對方通常都會大吃一驚。即使在開放的哈佛大學，清潔女工出席教授們的晚宴，也不是一件尋常事。然後蘇珊和琳達才介紹自己的正式工作——記者和老師。

孩子時，也給我們通了電話，和我們一起分享她的快樂。

蘇莎曾經在游泳池結識了一位端莊美麗，而且體格健美的白髮女子。她們從聊天開始，逐漸建立了真誠的友誼。這位女子是在哈佛大學進修學院，教授俄羅斯歷史的米咪·伯林。她和丈夫——傑出的律師兼業餘黑管手格里·伯林——後來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格里過去曾從事人權運動）。我們從歐洲回到坎布里奇後的第一個晚上，總要到伯林家裏，享用一頓豐厚的晚餐，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慣例。我們離開美國時，必定也要先品嘗米咪精心準備的飯菜，然後才與坎布里奇說「再見」。我們回到匈牙利工作後，也經常有機會在布達佩斯招待他們。

我們經常與羅伯特·索洛和博比·索洛一同聽音樂會，度過了很多有趣的晚上。所有經濟學家，都非常清楚索洛的研究，對於經濟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他的演講，著實令人著迷。*我不知道除了他以外，還有誰能夠把如此艱深複雜的觀點，用水晶般清晰透明的方式，解釋清楚，而且不會讓讀者認為，演講者在刻意保持謙卑的姿態。他的演講中，不斷閃現出智慧和幽默的光輝。即使在餐桌上，我們也可以享受到這種偉大的學術體驗，以及他對朋友表現出來的關懷、興趣和樂於助人的態度。

我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學校裏的同事。茲維·格里利謝斯和他的妻子戴安娜、戴爾·喬根森和琳達·喬根森、我們的同鄉弗朗西斯·巴托爾（即費里·巴托爾）和傑·羅斯福、阿瑪蒂亞·森和埃瑪·羅思柴爾德、羅伯特·多爾夫曼和南希·多爾夫曼、弗蘭克·霍爾茲曼和瑪蒂爾達·霍爾茲曼、羅伯特·舒爾曼和他的妻子、朱迪特·費耶…我不知道應該在哪裏中止這份長長的名單。有些親愛的朋友，

---

* 1972年，我的女兒朱迪特第一次陪我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時，正在考慮申請哪所大學。那次會議的演講者之一，是羅伯特·索洛。聽過索洛的演講後，朱迪特馬上作出了決定：既然經濟學是如此精彩的一門學科，那麼申請經濟類大學，一定不是錯誤的決定。後來她有些失望——不是所有演講者，都像索洛那麼出色。

如今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例如茲維·格里利謝斯、羅伯特·多爾夫曼和霍爾茲曼夫婦，我們非常懷念他們。

家庭聚會是美國最常見的社會交際方式。在典型的美國式家庭聚會上，人們在坐下來享受美味的正餐前，通常會聚在一起，手裏拿著飲料走來走去，不時停下來和這個或那個朋友聊幾句。正餐開始後，按照美國的社交習慣，人們應該輪流和坐在自己身旁的人交談一至兩小時。即使坐在旁邊的人，和自己並不相識，也必須遵守這種禮儀。如果你非常不走運地，和一個沒有什麼共同話題的人坐在一起，那麼可以預見的，是你們的寒暄結束後，談話便會變得索然無味。

在美國生活的日子裏，我們從來沒有舉辦類似的宴會。即使我們受到這種宴會的邀請，我們也會在禮儀許可的範圍內，嘗試婉言謝絕對方的邀請。我們熱衷的聚會，是邀請兩至四名客人，到家裏聊天，所有人都可以參與某一個話題的討論。只要我們找到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我們便會充滿激情，競相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不是每隔五分鐘便轉換一個話題。

沒有意義的閑談，讓我煩躁不已。有些人向我們解釋，在美國的學術界人士聚會時，很少談論自己專業方面的範疇，因為這對不熟悉這個領域的人來說，很不禮貌。我們曾經邀請三對夫婦，到家裏作客。其中有兩位的丈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另外一位的丈夫，是同樣蜚聲國內外的政治學家。他們的妻子，分別是研究者和藝術家。由於他們都曾經邀請我們到他家裏作客，所以我們那次主要是為了回請他們。在宴會開始前，我們一想到從事不同專業的客人在一起討論，會撞擊出怎樣的火花時，便興奮無比。但事實上，那天晚上討論的，都是平常的，而且比較保守的話題，因為客人們，都謹慎地避免涉及到任何專業的問題。我們從這次聚會中，學到不少教訓。後來我們再次舉辦這種聚會時，便會嘗試不時提出一些問題，或者插入幾句話，來引導談話的方向，激發客人們展開妙趣橫生，並且具有啟蒙意義的談話。我們的朋友，發現我們熱衷於這種社會交往形式後，非常尊重我們的意願。邀請我們參加普通聚

會的請帖，越來越少。與此相反，我們經常應邀參加，這種我們鍾愛的小範圍交談式聚會。如果我必須列出在坎布里奇生活時最喜愛的事物，那麼毫無疑問，我會提到這種閃爍著智慧的火花，而且非常有意義的社交生活，它充滿了學術的樂趣。

許多朋友熱衷到我家作客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總能品嘗到非常特別的食物。蘇莎做的一款蛋糕，在坎布里奇頗有名氣。據說有一個與我們沒有什麼交情的人，到處打聽怎樣能受邀參加我家的聚會，僅僅是為了親口品嘗到蘇莎著名的杏仁蛋糕。

我非常喜歡參加在哈佛大學教工俱樂部舉辦的活動，那裏讓我感覺非常自在。我們幾乎每周都要和同事，或者朋友，在那裏享用一兩頓午餐。也許俱樂部對我的吸引力，在那些一輩子都生活在西方大學的人看來，非常輕鬆平常。但是在坎布里奇生活時，我卻逐漸喜歡這種聚會方式：一面享受美味的食物，一面暢所欲言。在這種聚會上，我們主要是圍繞研究課題，展開談論，不過也常常涉及政治、藝術和私人問題。

然而，無論我們與新結交的美國朋友多麼親密無間，我們之間始終缺少一樣東西：共同擁有的過去。幾十載悠悠歲月，漸成往事。我們在匈牙利的朋友，也隨之急劇減少。有些人逐漸遠離我們，而我們也因為不同的成長道路和理念，或者所參加的不同政治活動，與某些人漸行漸遠。我們的友誼，正在經歷嚴峻的考驗。歷史就像一名苛刻的考官，檢驗著人們彼此間的忠誠和他們的性格。不過經過了這些嚴峻考驗後的友誼，卻會因此而歷久彌堅。與後來培養起來根基較淺的友誼相比，它們顯得更加濃厚醇香。

每當我與美國朋友談話，提及共產主義國家對人民的壓迫和鎮壓時，他們總會立刻聯想到「麥卡錫主義」時代。我們不明白，他們怎麼能把這種政府對人民「輕微的壓迫」，與拉科西時代冷酷無情的壓迫，以及1957年至1958年間，政府對革命的瘋狂反撲，相提並論。舉例來說，在麥卡錫時代，只有幾百人丟失了工作，或者受到其它形式的迫害。而在匈牙利這個面積不大的國家裏，為了懲戒參與了為期十天的匈牙利大革命的群眾，政府把229人判處死刑，並

且把幾千人投進監獄，使他們在那裏度過了漫長的牢獄歲月。[1]美國人怎麼能夠理解極權體制的意義呢？與此相對的是，他們也感到我們，無法理解在一個習慣自由的國度裏，當人們的權利受到威脅和限制時，意味著什麼？雖然我們雙方花費了很大氣力，試圖透過理性辯論和對歷史的探討，來理解對方的感受，但是事實證明，這些努力不過是徒勞而已。當人們親身經歷壓迫，並且感受壓迫時，他們對它的理解，自然會與那些透過書本了解歷史的人，有所不同。

我們在談論二戰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時，也遇到這種問題。無論猶太朋友，還是非猶太朋友，都強烈地譴責了這種令人髮指的罪行，但是他們自己卻沒有曾經佩戴代表恥辱的黃星標誌。大多數美國朋友，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更勝於我，但是對於經歷了這些巨大創傷的人來說，我們對於這些事情的感受、對於團結和道德責任感的理解，仍然與他們存在著很大差異。

共同抵受腥風血雨的經歷，把我們與匈牙利的朋友，更加牢牢地綁在一起。我們在國外居住很長時間後，回國時，總會迫不及待地希望聽到朋友向我們講述匈牙利發生的事情。當社會變革加快步伐，卡達爾體系呈現逐漸被削弱的跡象，或者蘇聯帝國分裂的趨勢，日益明顯時，我們便會一同分享心中難以遏制的興奮之情。無論在布達佩斯，還是坎布里奇，我們始終對新潮的時尚派對、大型聚會和學術沙龍，敬而遠之，而把自己的社交活動，局限在小型聚會中，和客人們理性地談論一些話題。例如，我們經常和歷史學家彼得·豪納克和他的妻子考蒂、帕爾·勒切伊和伊娃·肯德、安德拉什·納吉和阿格尼絲·洛松茨基促膝長談。*我們不僅會在利特萬的家裏，和他們共進午餐，而且還和他們相約一起攀爬布達山。此外，我們還喜歡與同事，和以前教導的學生，聚在一起，享受快樂的時光，例如米哈伊·洛基、考蒂·法卡斯、陶馬什·鮑爾、雅諾

* 我與彼得·肯德和他的妻子漢娜·B·肯德的見面方式，有些特殊。由於政治體制變化之前，彼得無法回到布達佩斯，所以只要我出國，就會抓住一切機會與對方見面。

什·加奇、瑪莉亞·拉茨科、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和蘇莎·卡皮塔尼。我把哈佛教工俱樂部裏令人愜意的習慣，帶到了布達佩斯。我曾經興致勃勃地在飯店裏與伊娃·喬托(我們曾在《自由的人民》共事)、伊羅斯·盧卡奇(《短缺經濟學》的譯者)和阿格尼絲·毛蒂奇(我在研究軟預算約束時，曾經和他一同完成大量實證調查)，共進晚餐。我們都是在工作中，不斷加深彼此的了解，從而建立了長久的友誼。

美國朋友與我們之間的友情，永遠無法企及我們在匈牙利朋友身上找到的東西。

與歐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經濟學家在一起

自從1983年，我開始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後，我每年都有一半的時間，居住在美國。不過這沒有把我改變成半個美國人，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和其它國家及人民，保持著密切的往來聯繫，而不僅局限於匈牙利和美國。

很早以前，我便開始在跨國的學術機構裏，承擔一些工作。1971年，在丁伯根的舉薦下，我被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委員會的副會長，直至1977年才正式卸任。在那裏工作時，我與來自印度、墨西哥、法國、蘇聯、荷蘭和波蘭的經濟學家，共同為發展中國家，起草經濟政策建議，以協助其它聯合國機構開展工作。

其後，我積極參加了數理經濟學家的國際協會——計量經濟學會。我首先被選入執行委員會，後來於1978年當選會長。*在擔任會長期間，我的一個工作重點，是鼓勵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參與學會的各種會議，從而幫助他們融入西方經濟學家的學術圈子。

---

* 計量經濟學會採用兩階段選舉制度。人們首先從幾名候選人中選出一位當選會長。他要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積極參與學會的工作，以此熟悉會長的職責。然後在第二年裏，他將成為參加會長競選的唯一候選人。

我竭盡所能，利用各種方式實現這個目標。只要有機會，我便會努力幫助蘇聯或東歐的同行，以客座研究員或訪問教授的身份，參加國際性學術活動。

我到哈佛工作時，剛剛開始參與歐洲經濟學會（EEA）的工作。這個學會，主要是在比利時教授雅克·德雷澤的倡導和大力推動下成立的。我對德雷澤的尊敬，不僅源於他出類拔萃的科研成就，而且也源於他對公共服務的承諾。作為該學會的創始人之一，我大力支持了他的工作。我不是在2004年匈牙利加入歐盟後，才對「歐洲」這個詞語的內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1986年，歐洲經濟學會正式成立，在德雷澤擔任會長時，匈牙利仍然籠罩在鐵幕之下。第二年競爭會長職位的，有兩位候選人——弗蘭克·哈恩和我。1963年，我第一次前往英國參加在劍橋大學舉行的學術會議時，便結識了哈恩。我在第十章提到，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強烈抨擊《反均衡論》——《我們不滿的冬天》，不過我們的關係，卻一直很融洽。陶馬什·利普塔克移民後，我曾經要求哈恩幫助他找份工作，他為此花了不少力氣。讓我們回到競選歐洲經濟學會會長的問題上，按照慣例，學會將詢問兩位候選人，是否接受提名。我們都同意參加競選，而我最終在選舉中，獲得了多數選票。

和在計量經濟學會工作時一樣，我再次努力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帶入這個學術團體裏。在維也納舉行的第一屆歐洲經濟學會大會上，我成功地邀請了許多很有發展前途，但是西方學術界不了解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學家參加這次會議，例如後來在波蘭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扮演了領導角色的萊塞克·巴爾采羅維奇、憑藉著對蘇聯體制的研究，而蜚聲國際的社會學家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婭，和當時還很年輕，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制度變遷後，擔任捷克政黨領袖，以及政府部長的弗拉基米爾·德勞希。

我曾經在1987年的年會上，發表會長報告時說：「我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特別關注東歐國家的經濟學者參加我們學會的問題，我認為這完全是人之常情。」我列出了東歐學者面臨的許多特殊困難，並且請求西方同行，對他們伸出援助之手：「（西方經濟學家

的）運氣已經相當好了，他們不必像他們的東歐同行那樣，面對這些困境。我們許多東歐國家的人民，痛苦地發現學者們，通常把歐洲等同於西歐。請允許我強調這一點：歐洲的邊界，並不是易北河。我們也希望被看作成歐洲人。」[2]

會長的其中一個特權和責任，是為經濟學會的年會，選擇主題，而它將成為主席致辭和兩位主題演講者的主要演講內容。我認為對社會主義世界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因此，我把自己的演講題目，定為「個人自由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改革」。[3]我邀請了阿瑪蒂亞·森發表主題演講，他選擇的題目是「選擇的自由：自由的概念及內容」。[4]另外一個主題演講者，是阿薩爾·林德貝克。他演講的題目是「個人自由與福利國家的政策」。[5]

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以匈牙利為例，證明分權、私有制發展、短缺情況的緩和，以及官僚體制放鬆對勞動市場的約束等因素，不僅大幅提升了經濟效率，而且也改善了個人自由和選擇自由的狀況。我強調了社會主義世界，從「最大化國家」步向逐漸減少國家干涉，並增加個人自由的目標轉變時，這個過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中國之行

1985年夏天，我和妻子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的邀請，在中國度過了四周的時間。我們首先在北京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討論國有企業存在的弊病。這個會議令人耳目一新。實際的經驗才只是剛剛開始。我曾經參加許多類似的學術會議，但是它們產生的影響，都不同於中國舉辦的這次會議。

中國的主辦方，請求七位外國經濟學家，評論中國的現狀和發展前景。除了我以外，其他六位外國經濟學家，分別是耶魯大學的教授詹姆斯·托賓（他是著名的美國宏觀經濟學家，並於幾年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西德聯邦銀行的前行長奧特馬爾·埃明格爾、法國中央計劃委員會的前會長米歇爾·阿爾伯特、牛津大學教授亞歷

山大·凱恩克勞斯爵士（他曾在六十年代，擔任英國政府和工黨的主要經濟顧問）、南斯拉夫經濟學家兼著名的「自主管理」專家亞歷山大·巴伊特，和曾著書探討韓國計劃體系的美國教授勒羅伊·瓊斯。*

這七位外國經濟學家和陪同他們的中國學者，受到了總理趙紫陽的親切接見，並且暢談了兩個小時。†趙總理告訴我們，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有哪些，以及他們希望西方學者對哪些問題發表見解。

第二天，我們與一群中國經濟學家，飛抵重慶，我們在那裏坐上一艘輪船後，開始沿著長江順流直下。主辦方對我們的招待非常奢侈，我們不僅享受到美味可口的中國美食，而且甲板上還有一個游泳池，只可惜我們沒有太多輕鬆活動和娛樂的時間。

主辦方為我們安排的工作日程，非常緊湊。每位外國經濟學家，每天都要抽出半天時間，參加討論。他們首先發表演講，然後解答中方高級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中方的核心經濟學家，不願就最敏感的改革問題，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年輕經濟學家，似乎也不適合在這種場合下，提出問題。顯然，中國經濟學家，決定等待外國客人回家後，再在內部討論這些問題，並得出自己的結論。

---

* 籌辦此次會議，使中西方經濟學家齊聚一堂的核心人物，是時任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的首席代表林重庚。我們可以以他的工作為典範，來說明西方顧問如何能夠最有效地幫助社會主義國家完成經濟轉型。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遇到的困境，林先生並不是在不考慮實際效果的情況下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法，和堅持要求當地政府採納他的意見。與此相反，他會準備多種解決方案供中國政府選擇。我們從上文列出的經濟學家名單中，就可以看見中國希望進一步了解美國、西歐和東亞在這些問題上的經驗，以及東歐國家在改革方面的觀點——林重庚的確滿足了他們的願望。

† 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的先驅者之一。中國改革的最高領導是鄧小平，但是趙紫陽被視為是最早開展基礎性改革的建築師和主要發起人。在1989年學生遊行期間，他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走進天安門廣場與學生領袖對話。政府瘋狂鎮壓了示威遊行後，趙紫陽被解除總理職務，並且一直被軟禁在家裏，直至2005年1月去世。

當時中國正在經歷改革的第一階段，儘管中方向我們講述這個過程時，一再強調它符合共產黨的路線，但是事實上，農民運動風捲殘雲地使得包括中國的偉大創舉「人民公社」在內的社會主義農業改革計劃，已經被個體農業所取代。這是何等的制度復興！嚴重的糧食短缺，被豐富的物資供應所取代。中國在農業改革上的進展，遠遠領先於匈牙利。充滿活力的中國農村和疲憊不堪、效率低下的蘇聯集體農莊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而且蘇聯的集體農莊，根本無法取得進一步的發展。中國在農業改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後，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改革其它經濟部門。

我在美國為自己在中國發表的演講準備材料時，盡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經濟形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理清中國與匈牙利在改革方面的相似之處與相異之處，而沒有過多考慮，這兩個國家在其它方面顯著的差異，例如中國和匈牙利的人口，分別是十三億和一千萬、亞洲和歐洲的文化差異、以及中國與匈牙利(或者說東歐)的歷史差異等。主辦方最希望從我這裏了解到的，是中國可以從匈牙利的改革過程中，學到什麼——哪些經驗值得學習，哪些教訓應該避免。為演講準備材料的過程，也就意味著分析兩種改革，在現狀和改革範圍方面的異同點。

無論是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會議，還是後來與中國經濟學家和商業領袖交談時，我都感到，雖然中國與匈牙利遠隔千山萬水，而且存在巨大的歷史文化差異，但是我對這個國家，卻是一見如故。這裏出現的許多現象，以及它的煩惱和災難，對我來說都非常熟悉。中國努力希望克服的困難，與我們在匈牙利致力解決的問題，沒有什麼差別。當然他們從美國宏觀經濟學家，或者西德中央銀行的銀行家那裏，學到了很多有趣的東西，但是我們東歐人，卻最能理解他們對於改革的心理和看法。

追溯到1968年，當時匈牙利已經廢除了建立在中央計劃基礎之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事實證明，雖然公有制，仍然在它的經濟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共產黨也控制著整個經濟體系，但是它仍然在運轉著。雖然官僚體制和市場體制之間，經常產生巨大的

摩擦，但是它們仍然可以同時存在。我還在布達佩斯工作時，曾極力批判改革的不完整性和不連貫性。然而，我認為如果中國廢除指令經濟體系，將會把它的改革進程，向前推進一大步。這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經驗教訓，也是我希望向中國的領導層強調的教訓。此外，我還希望引導他們，關注這個過程裏可能存在的麻煩和危險，即匈牙利改革的不連貫性、軟預算約束及扭曲的價格體制。中國在八十年代中期，制訂了非常有野心的發展計劃。我特別指出，過快的經濟發展，將為國家招致不少風險，即通貨膨脹和對某些部門的忽略。我提醒中國經濟學家們，注意中國思想和文化中和諧思想的重要性，同時建議實現和諧發展，而不是急進增長和強制增長。

當時，在匈牙利和中國國內，仍然陰魂不散的政治壓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權利的社會狀況，讓人們感到壓抑。我們可以從某些跡象，間接地察覺到這些情況。我們在歐洲，或者美國參加經濟學會議時，往往可以輕易地從報告廳裏的氣氛、聽眾的表情及聽眾對於演講的反應，判斷出他們是否歡迎這場演講，而這次在船上和中國經濟學家一起參加會議時，根本無法得到這種信息。無論在主席，還是聽眾的臉上，我都不能發現任何情緒。我必須依靠其它跡象，來判斷自己的演講是否成功。在會議的休息時間，許多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家把我包圍起來，興奮地用結結巴巴，但是勉強可以表情達意的英語，向我提出問題。他們開始與我討論如何把我的書引進中國，我將會在後文繼續敘述這方面的情況，不過，還是讓我們先回到在船上舉行的學術會議上。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每天都可以休息半天，所以我們乘坐的輪船，經常乘這段時間停靠在岸邊。有一天，我們到岸上的一個農村市集閑逛時，親眼看到了農村改革的成果：市集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精美的水果、蔬菜、魚類、貝類和甲魚，而且各種肉類也應有盡有。還有一天，我們到中國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三峽遊覽。我們乘坐划艇，興致勃勃地欣賞了那裏的自然美景。當時已經有傳言說將會放水淹沒這個地區，然後建立一座大壩。這很可能導致三峽，永遠

沉沒在水下。幾年後，這種傳言成為了事實，那些美麗的景觀，也隨之無從尋覓。我們最終在武漢結束了這次旅程，我還在武漢的大學發表了演講。

後來，人們才意識到，這次在「巴山輪」上舉行的「輪船會議」，對中國的經濟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這艘船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廣為人知）。它的會議記錄被集結成冊，正式出版。學術期刊上，也發表了文章，專門報道這次會議。[6]中國經濟學家，經常引用與會者在這次「巴山輪會議」中提出的建議，而且時至今日，仍然把它形容為影響深遠的學術事件。

一年後，也就是1986年，中文版《短缺經濟學》面世，它的銷量達到十萬冊，而且於1998年再版。這本書成為中國廢除指令性計劃經濟時的理論背景，而且所有開設經濟學課程的學校，都把它當作教材。包括《短缺經濟學》在內，我一共在中國出版了八本著作。幾年後，我再次訪問中國時，一位市長和許多大學教師及企業管理者，不斷告訴我：「我是您的小學生」，這讓我非常感動。

感覺就像回到了家裏

儘管多年以來，我們主要的家依然在匈牙利，但是我們在坎布里奇生活時，也不打算湊合了事。我們像在布達佩斯一樣，精心裝修了在坎布里奇的住所。我們在家裏擺放了圖片和具有紀念意義的個人物品。我們不僅結交了許多意氣相投的朋友，而且還認識了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打交道的人，比如看門人、理髮師、醫生和游泳池的管理員等等。無論在哈佛大學、坎布里奇市、波士頓地區，還是整個美國，我們都感覺像在家裏一樣，自在舒適。

我在敘述這種感覺時，使用了複數形式「我們」，因為蘇莎和我，都不是天生就能適應各種長途或短途旅行的人，這種旅行，甚至可能是包括在幾個月內，奔波幾個地方的辛苦旅行。後來，我們開始刻意地改變這種情況。無論我們到了哪裏，都會盡量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適。在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會努力

把自己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裝扮得更有生活氣息。當然由於我們始終是在學術界裏「轉戰南北」，所以要實現這個目標並不難。雖然各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和歷史差異，但是我們經常能在印度、日本或墨西哥，遇到同行或學生，不久後，我們還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點，並且與他們分享彼此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我很快便得心應手地適應了這個全球化的學術世界。

每當我想到自己，不僅在美國和匈牙利擁有很多朋友，而且還有不少遍及五湖四海的朋友時，心情總會格外舒暢。我們非常關心彼此的工作進展情況，而且從來沒有中斷通信聯絡。只要有機會，我們便會相約見面。在這裏我希望提到一些朋友的名字，他們對我的興趣，不僅停留在閱讀我的作品、寫作書評或對我的作品進行系統注釋上。他們早已超越了這些層面，開始主動幫助我聯繫本國的出版商，出版我的作品，有時甚至主動承擔翻譯和編輯的工作。這樣的朋友在法國有瑪麗·拉維尼、伯納德·沙旺斯和邁赫達德·瓦阿比；在中國有肖夢；在越南有阿源；在日本有森田恒雄；在捷克共和國有卡雷爾·庫巴；在波蘭有塔德烏什·科瓦利克和格熱格什·科沃德科。他們都曾無私地幫助我，而且為了讓本國的讀者讀到我的作品，他們犧牲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在「全球化」的學術世界裏，這些朋友的行動，讓我感到無論在哪裏，都像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自在舒適。不過，我不想片面地誇大這種感覺。我每年都要奔波於匈牙利和美國之間，在此期間，還會經常去其它國家旅行，這意味著雖然我在哪裏都感覺很自在，但是我對它們，又多少有些疏離感。當我還沒有完全熟悉那個地方時，便已經起程奔赴下一個目的地。我們回到布達佩斯時，會因為離開美國的朋友和學生，而且無法在那幾個月裏，欣賞自己喜歡的音樂會，而感到黯然。我們離開其中任何一個地方時，都會錯過許多後來讓我們追悔莫及的事情，我們永遠生活在離別的狀態裏。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布達佩斯流傳著這樣的一個笑話：老科恩移民到了美國。他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後，覺得自己並不快活，於是打道回府。他第二次申請移民護照時，簽證官問他：「科恩

先生，你到底想去什麼地方？」。他回答說：「在路上。」*

只要我們在旅途中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便會想起這個笑話。有時和別人聊到這種不斷往返於兩地的生活狀態時，有些人也會略帶惡意地評論說：「你們好像也喜歡總是『在路上』的狀態。」事實上，我們的基本精神狀態，並不適合頻繁地四處旅行。旅行是件勞心乏力的事，我們寧願安安定定地呆在家裏。

讓我們感到疲倦的，不僅是與旅行有關的許多瑣事，譬如在起程前，把旅行中必須攜帶的行李、筆記和書等打包裝好，到了目的地再把它們拿出來。我們每次出發前，還要花很多精力，重新申請簽證，或者處理其它行政性事務，而且時差也讓我們精疲力竭。†

我不喜歡旅行，並不是因為上了年紀以後，舟車勞頓會帶來身體上的疲倦。對我們來說，旅行不僅意味著，從一個地方奔向另外一個地方，它還給我們帶來最沉重的負擔，是使我們的生活變成了雙份。我們在布達佩斯熱衷的活動，在美國同樣不可缺少。我們在深深地熱愛匈牙利的同時，對美國也產生了難以割捨的感情。我們在這裏有個家，在那裏也有個家。這裏有輛車，在那裏也有輛車。‡無論在匈牙利還是美國，我們都要交納機動車稅和機動車保險、提交所

---

* 這個笑話或多或少誇大了移民政策的寬鬆程度。不過，當時只要人們不在政府限制旅行的名單上，而且沒有明確說明自己以後不想再回國，他們通常都可以輕易地拿到護照。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移居國外的匈牙利人，很難在美國自動獲得永久居留許可證。

† 只要我們的時間充足，我們從坎布里奇返回歐洲時，總要在斯德哥爾摩停留幾天，探望朱迪特、若非和安娜。朱迪特會為我們精心準備豐盛的菜肴，而且無微不至地照料我們，幫助我們適應歐洲的生活。她經常巧妙地假裝沒有注意到我因為時差問題，總是在餐桌上昏昏欲睡的情況。每次只要在斯德哥爾摩得到充分休息，而且和他們親密無間地聊幾個小時，我們就可以精神煥發地繼續踏上返回布達佩斯的行程。

‡ 我們所鍾愛的一輛1980年生產的二手大眾高爾夫車，一直忠心耿耿地為我們服務，雖然它的外表並不亮麗，但是發動機卻是強勁有力。2002年我們結束在美國的工作時，才真正地與它告別。

得稅申報表、在銀行開戶和對我的文件編號並編制目錄等等。我在美國工作時，從哈佛大學領取半年的薪水，*在無薪假期裏返回匈牙利時，從其它單位那裏領取其它工作的報酬，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在哪裏工作時，只要處理好手頭的工作便可以了。我經常要把一個地方的問題和責任，帶到另外一個地方，然後通過郵件、信件、傳真或電話，來處理它們。所以計算我的工作負荷時，並不是把兩份工作各算50%，然後加起來那麼簡單，它們疊加在一起，對我造成的負擔，顯然超過了100%。

儘管我們沒有長期在一個城市裏定居，但是蘇莎仍然在頑強地堅持她自己的研究工作——考察匈牙利的住房分配情況和住房政策。我們在坎布里奇居住時，她會利用這段時間了解西方國家在這些問題上的經驗，從而開展國際比較研究。儘管美國與匈牙利之間遙遠的距離，給她帶來很多困難，但是她仍然決定，堅持研究從前的研究課題。

這種奇怪的雙重生活，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努力：不斷往返於兩地，而且經常在世界其它各地東奔西走。†但是這些付出，完全是值得的。我由此掌握了西方最新發展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成功地把自己融入在經濟學研究中，處於最前沿的學術團體，同時保留了我在匈牙利的學術基地。

---

* 我們周圍的許多人，一定認為我在兩地都領取全額薪金。

† 無論我本人是否在匈牙利，國內都有很多人幫助我處理各種事務，在美國也是如此。這為我們減輕了不少負擔。我在前文已經提及那幾位關心體貼的美國秘書和研究助理。同樣，我在匈牙利的所有工作，也在伊卡·法澤卡斯和考蒂·薩博的協助下，輕鬆了不少。朱莉安娜·帕蒂專門負責編輯出版我的作品，而且盡職盡責地處理了各種相關行政事務。她的丈夫布萊恩·麥克萊恩，將我的所有匈牙利語手稿，翻譯成英語。他們對我關心的問題，瞭如指掌，而且一直在努力減輕我的負擔。我不在匈牙利時，他們依然勤勤勉勉地完成自己負責的工作，幾乎可以自動滿足我的所有要求。就這方面來說，我在工作中得到的幫助和真誠的同事友誼，的確令人羨慕——甚至許多西方同行在這方面的待遇，也無法與我媲美。

匈牙利和很多國家，都對人才流失問題，曾經展開大規模的討論。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成功把其它各國的人才，吸引到本國，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學術實力，相應被削弱。我在哈佛大學工作期間選擇的生活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種有效抵制人才流失的方法。我完全可以做到在美國紮根的同時，對生我養我的祖國不離不棄。*

我們經常聽到美國朋友，如此評論我們的生活方式：這種奇怪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我們「享受到兩個世界的精髓。」我知道哈佛大學、坎布里奇和波士頓，並不代表「美國」，但是它們是美國，為渴望投入學術研究和了解美國文化的學者們，提供的最完美的環境（為了避免被別人扣上「哈佛式傲慢」的帽子，也許我應該說，它們是提供最完美學術環境的地區之一）。與此同時，匈牙利是另外一個陣營中「最興高采烈的軍營」。當然，較諸其他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匈牙利為我提供了更加精彩，而且更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材料。我感謝命運，讓我美夢成真。

---

* 我們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作不同的選擇時，會帶來不同的物質生活。讓我們來看看在美國大學任職的匈牙利學者和研究者的生活。比起留在匈牙利的同行，那些選擇在美國從事全職工作，並且移民到美國的學者，在退休前後，都可以享受到極其豐厚的物質待遇（不少匈牙利研究者都會作出這種決定）。我自己選擇的解決方法（這也是我希望其他人注意到的一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使我享受到的物質待遇，減少至原來的一半。選擇這種方法的研究者，會因為有一半的時間留在國內，而犧牲一半的國外收入，但是這仍然使他們比留在國內的研究者，擁有更加穩固的經濟保障。

18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綜合性研究：1988–1993年

《社會主義體制》

1983年，我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時，決定撰寫一本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制度的專著。我在那裏閱讀了大量學術著作，為它做好了充分的學術準備，而且我已經大致上寫出了這本書的提綱。

我開始在哈佛大學教學後，為寫作這本書找到了新的動力。我首先於1984年，開設了全面講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這本書的前身，是1986年我發給學生的複印版筆記。

我在哈佛開設的課程，吸引了來自各個國家的聽眾。他們當中有曾在毛澤東時代，被下放到農村的中國學生，和掌握計劃經濟第一手資料的年輕波蘭經濟學家，而其他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行情況，則一無所知。有些人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而有些人則屬於德國和美國的新左派，幼稚地堅持著自己的信仰，而無視極權主義的真實本質。我多次開設這門課程，而且每年都對其內容進行修改和補充。形形色色的學生(以及後來的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以及與我的爭論，促使我努力闡明自己的觀點。當我在著手準備一本學術專著，而且它注定要成為相關學科的教科書時，或許向興趣濃厚的學生，反複講解書中的內容，是最紮實有效的準備方法。

我如何寫出《社會主義體制》

1986年春天，我寫下了《社會主義體制》的第一稿，並且把收集

到的材料，大致安排到相應的章節中。不久後，我得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我可以在赫爾辛基不受干擾地繼續寫作這本書，WIDER（聯合國大學下屬的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的院長拉爾·賈亞瓦德納博士，為了促成這件事，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1988年5月，我和妻子前往赫爾辛基，並在那裏住了半年多。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對我的照顧十分周到，為我提供了各種支持，其中包括一套舒適精緻的公寓和完美的工作條件。

那裏寧靜平和的環境，可以算得上是完美無缺。赫爾辛基的夏天，通常比較涼快，但是我們在那裏居住時，恰逢氣候溫暖宜人的好時節，我們經常在波羅的海和奧林匹克游泳池裏暢泳。對於生活在內陸國家的人來說，在海邊生活幾個月，欣賞日落時天地間無與倫比的美麗色彩，實在是一種妙不可言的享受。那裏到了深夜十時，光線還很充足。我常常在結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後，便到美麗的海灘上，或者附近一個長久以來受到良好保護的小島上散步。我和妻子一面散步，一面討論當天寫作的情況，或者第二天清晨計劃寫下的內容。儘管那時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們卻找到了很多可以幫助消除疲勞的活動，比如到停泊在市場旁邊的漁船上，購買剛剛打上來的新鮮魚兒；到芬蘭歌劇院，或者岩石教堂聽音樂會；或者到芬蘭神秘的湖泊遠足等等。

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對於全世界所有經濟學家來說，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我的許多經濟學家朋友，都訪問過那裏。雅克·德雷澤為了拜訪這間研究院，特意中斷了一個漫長的帆船航海旅行。我在哈佛大學認識的朋友斯蒂夫·馬格林和阿瑪蒂亞·森，也曾來到這裏。此外，我們還曾經在這裏，設宴招待埃德蒙·馬林沃——他是我早期從事研究工作時的精神導師。我們在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裏，遇到了傑出的印度經濟學家蘇哈穆瓦·查克拉瓦蒂，以及頗具人格魅力的瑞典朋友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爾*，我還與研究院

* 這是我與這兩位朋友最後一次見面。他們兩位都是在處於事業的巔峰時英年早逝。

的院長、工作人員及芬蘭經濟學家，開展了許多有趣，而且發人深省的討論。

在寧靜清幽，而又賦予人靈感的自然和學術環境裏，我的創作進展一日千里，它的推進速度，與我在瑞典撰寫《短缺經濟學》時的情況，不相上下，每周我都會完成一個新的章節。*除了理想的創作環境以外，另外一個加快我的寫作速度的原因是《社會主義體制》，它總結了迄今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在真正動筆前，我已經為此工作了三十二年（我直接準備它的時間便有五年）。只要我在赫爾辛基辦公室的電腦前坐下來，便開始不停敲擊鍵盤，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因為我希望寫下來的內容，早已經在我的腦海裏完全成形。

這本書的觀點，不僅已經經過多年的斟酌和提煉，它還收集了大量圖表、統計數據、參考資料、引文和參考書目來支持它的觀點。幸運的是，我在匈牙利和美國的學生，組成了一個研究團隊，並且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實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們不全是我的學生。他們有些的確是我曾教導的學生，而有些卻只是贊同我的觀點的人，還有一部分，是與我有學術聯繫，或者個人友誼的人。這種親密的學術關係，意味著無論我在赫爾辛基、布達佩斯，還是坎布里奇工作，他們都可以迅速靈活地滿足我的學術要求。

與此同時，從匈牙利傳來的消息，是國內政治制度開始分裂，學術和政治上反對政府的呼聲，日益強烈。但是只要我還在赫爾辛基，匈牙利發生的一切，對我來說，不過是遠處隆隆的炮聲而已。每次我和布達佩斯的朋友通了電話後，都會陷入驚愕的狀態，需要一段時間後才能復原。他們在電話裏告訴我的事情，讓我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岌岌可危。東歐政權正在垂死掙扎，人民在痛苦的狀態中煎熬，同時日常的政治鬥爭，逐漸達到了白熱化階段。但是我

* 當然，這只是非常粗糙的初稿。這本書像《短缺經濟學》一樣，經歷了多次修改——譬如我會邀請同事閱讀初稿，並提出寶貴的意見，然後根據他們的建議，反復對文章進行修改。

盡量不讓這些消息，左右我的情緒，以免影響我的觀點。在那幾個月裏，我全心投入到寫作中，它幾乎吞噬了我的全部精力。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要我感到這本書具有重大意義，而且進展非常順利時，我的鬥志便會被進一步激發。無論當時，還是十五年後的現在，我都認為在赫爾辛基度過的幾個月，是一生中其中一段最快樂的時光——或許較其它所有時刻都快樂。無論木匠、雕塑家，還是修路工人，所有熱愛本職工作的人士，都會從創造新事物的過程中，享受到無窮的樂趣。在這方面，我的確很幸運，因為我經常能夠體驗到這種快樂。1988年在赫爾辛基的工作，讓我感受到最強烈的創作快感。

1988年秋天，我們回到布達佩斯。當時大炮的隆隆聲，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半，但剩下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不過從那時候起，我無法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這本書上。我首先是在布達佩斯，繼續寫作了一段時間，然後於1989年上半年，回到坎布里奇。1989年下半年，我把這本書暫時擱置在一旁，因為我認為自己，必須就制度變化發表看法，並且及時提出相應的經濟政策建議。我把自己對制度變遷的觀點，全部寫進了《充滿激情的小冊子》。這本書是下一章的主題，但是我在這裏提到它，是因為我在創作它的同時，也在著手準備《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充滿激情的小冊子》的英文版)，和其它語言的版本。與此同時，我一面抽出時間寫文章和演講稿等探討制度變遷的工作，一面在寫《社會主義體制》的後幾章。如果要準確地描述當時的情況，那麼可以說我激動，而且煩躁不安地在這兩個主題間，跳來跳去。它們和我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一起競相爭奪我的時間和精力。每當我攻克眼前的一個研究課題時，便會為忽略了那部偉大的總結性作品而感到惋惜；而一旦我回到這本書的寫作工作中，我又會因為沒有抽出更多精力，研究日常的經濟政策而心懷內疚。儘管這兩個工作佔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是無論在布達佩斯，還是坎布里奇，我還是會努力擠出幾天，或者幾周的時間，來專心寫作《社會主義體制》。1991年夏天，我甚至擠出了整整兩個月。無論什麼時候，當我完成

手頭的臨時性工作，重新回到這本書的寫作工作時，我始終堅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具有「強大的生命力」。1989年至1991年間，東歐國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紛紛崩潰。包括學者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他們應該修正自己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已經完成的前半部書裏，我幾乎不需要因為制度變遷，而進行任何修改。我的描述和分析，經歷了第一場歷史風暴的洗禮。而主要討論改革活動的後半部分，則必須進行多處改動，而且需要相應地擴充內容。雖然這本書的初稿，已經預視局部改革終將失敗的命運，但是我必須在修訂稿裏，分析這一切成為現實的原因。

經過了三年的努力，我終於在1991年完成了《社會主義體制》。

雖然這本書是用匈牙利語寫成的，但是把它翻譯成英語的工作，很快也完成了，而且英語版《社會主義體制》的出版時間，更早於它的匈牙利版本，這在我的作品中，並不多見。

總結我的用意

寫作《社會主義體制》的首要目標，是歸納總結迄今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曾經研究許多課題，並且嘗試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儘管這些作品探討的主題，不盡相同，但是它們卻互為補充，涵蓋了一個整體中的各個部分。我不斷回到同樣的研究課題上（如非均衡現象）——在我看來，我的確總是在研究相同的問題，但是研究的複雜性和深入性，卻不斷提高。我甚至可以認為這些作品，是連接在一起，組成了一段圓弧。現在我希望設計一個分析框架，按照邏輯次序，把過去分散的研究工作中得出的結論，組合在一起。*

* 除了過去的學術作品以外，我還希望對我的親身經驗進行總結。如果讀者從頭開始讀這本自傳，那麼現在他已經非常了解在研究權力集中和極權的本質、短缺現象、我的社會主義信念的破滅，以及其它現象的過程中，我的靈感不僅來源於書本知識，而且還來源於我個人的親身體驗。

與此同時，我不希望把這本書，局限在回顧個人研究成果的狹隘範疇裏。我希望把我認為重要的其他人的結論和觀點，也融入它的概念結構中。我曾經從匈牙利同行和外國研究者的著作中，學到很多東西，而且我特別強調了匈牙利真實經濟環境，對我的影響。除此之外，對我的觀點產生影響的，不僅包括印在紙上的著作，還有在我身旁展開的對話，即匈牙利人對社會主義弊病和改革可能性的熱烈討論。這本書的引文，和長長的參考書目，可以引導讀者，進一步了解我在書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觀點。然而我必須補充的一點是：我並不打算寫作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經濟思想史，也不打算在書中，冷靜地報告所有引起廣泛爭議、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在匈牙利語版《短缺經濟學》的前言裏，強調這本書沒有涵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是討論了它的一部分，同時我還提醒讀者注意的一點是：如果把全面描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專著的全部內容，設定為100%，那麼《短缺經濟學》，只研究了其中的30%。而現在是以全面為目標，寫一部涵蓋全部內容的專著的時候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書中將會講述所有與之有關的細枝末節。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而且也不是一部，旨在提煉精髓，並進行總結的學術專著的目標。*就這本書而言，「全面」和「完整」，意味著書中的分析過程，將鑒別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所有本質特徵，並且討論了被我們稱作「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社會–經濟機制出現以及運轉時，具備的必要屬性和充分屬性。

《短缺經濟學》，沒有討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

* 我還在這段前言裏，做過這樣的計算：如果一本600頁厚的《短缺經濟學》，只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全部內容的30%，那麼要全面分析整個體系，就要寫出2000頁的巨著。但是在最終完成《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旨在面面俱到地分析社會主義體制的專著後，我進一步對其內容進行了壓縮。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一本應該有2000頁厚的全面專著，精簡到「只有」600頁厚。在共有二十四章的《社會主義體制》中，它與《短缺經濟學》重合的部分，沒有超過全書內容的30%，我將後者的內容壓縮在兩三章裏。

態，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中，除了前面介紹性的幾章外，它正是從這兩個問題開始，正式分析社會主義制度。這與其它眾多比較經濟學的總結性作品，形成了反差，它把社會主義制度最典型的政治特點——共產黨的獨裁統治——當作了分析的切入點，而不是其它作品慣用的中央計劃經濟，或者公有制。在《社會主義體制》講述《短缺經濟學》的章節裏，我解釋了鑒於早年的政治氣候，和由此所採取的自我審查行為，我在《短缺經濟學》中，刪除了很多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相關的分析和觀點。1983年，我開始寫作《社會主義體制》的初稿時，下決心要跨越這些障礙。1984年，我在哈佛大學，開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課程後，開始無拘無束地分析共產黨、政治結構和官方意識形態，在這些問題中扮演的角色。1986年，我在給學生派發的筆記中，把共產黨扮演的角色，作為第一個分析目標，這與後來《社會主義體制》的分析次序，完全一樣。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終於能夠寫下一部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專著。

我並不想把這本書的主題，限制在大家經常討論，而且可能重合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主題內。我努力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心理學等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融入這本書內。這樣，《社會主義體制》在人們眼中，就不僅是經濟學著作，而是涵蓋了所有這些學科的社會科學專著。

大多數討論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著作，都只進行了局部分析。它們主要考察了某些界限明確的領域，或者某些體制特點。我感興趣的，是向人們展示體制的各個部分，如何組合成一個整體。政治、經濟、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之間，形成強烈的互動，共同決定了各個團體和各個社會角色的行為規律。我希望把這種方法，稱作「制度範式」。*這種方法有著悠久的歷史，而擅長使用「範式」的其中

* 由於人們使用「範式」這個詞語的方式，五花八門或者模棱兩可，所以它在日常語言中的定義並不清楚。我在使用這個術語時，借鑒了托馬斯·庫恩於1962年出版的著作對它的定義：一群研究者共享或者經常使用的典型方法、觀點、方法論、工具和論證風格等。

一位偉大人物，就是卡爾·馬克思。他也曾經寫作文章，討論局部問題，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中，他努力把資本主義，描述為一個制度。他最感興起的問題，是在他生活的時代裏，社會中特有的關係，如何相互產生關聯，以及他們如何相互決定對方的存在。我在《社會主義體制》的前言裏，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對我的思想的重大影響。我是在1991年寫下這段前言——這時引用馬克思的話，顯然已經非常落伍，即使那些過去經常引用他的話的人，如今也不再做這種不合時宜的事情了。馬克思對我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如何使用制度範式上。

除了馬克思以外，這本書的前言，還提到了約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制度範式的代表性著作。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對我的思想，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在寫作這本綜合性專著時，沒有簡單地把它「融入」某個社會理論的學派。任何嘗試把《社會主義體制》放進某個熟悉的「箱子」的人，都會遇到不少麻煩。人們無法簡單地把它歸類為馬克思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或者哈耶克主義的作品。

我不僅希望透過這本書，總結自己對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主題的看法，而且還希望透過對這個特定制度的分析，闡明「制度範式」的研究方法和科學的方法論，因為這正是我希望推動學術界接受的方法。

實證分析及價值觀

我希望避免在這本書中，使用規範性研究方法。我甚至沒有提

---

*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是對我的學術觀點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者。雖然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他對我寶貴的幫助，主要體現在與宏觀經濟學和非均衡有關的研究上。他沒有在著作裏大量使用被我稱作「制度範式」的學術方法，所以我沒有在這裏提到他。

出什麼是「良好社會」，或者馬克思、列寧，及他們的後繼者對於社會主義的幻想是否適用於建造「良好社會」等規範性問題。我對這類問題，敬而遠之，反而是瞄準了實證性研究方法。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國家裏，共產黨長期掌握了國家的絕對統治權。這些國家組成了「社會主義大家庭」。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個「大家庭」包括二十六個國家，擁有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希望在這本書中展示的，是它們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上，實際表現出來的顯著特點，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追隨者，期望它能夠實現的運行狀態。

《社會主義體制》並不打算對社會主義制度評頭論足。自從柏林牆倒塌後，這種做法，顯得非常廉價，而且過於簡單。正如我在前言中寫的那樣：「在今天談起研究社會主義體制時，至少要有這樣的勇氣：應該抱著科學客觀的態度，避免一味的攻擊謾罵；要告訴人們，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在這麼長的時期內，相對平衡運轉，並且不斷複製自身。」。[1]

但是當我決心進行客觀的實證分析時，這並不意味著，我在描述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特點時，不會受到自己價值觀所影響，因為它們為我的世界觀，奠定了基礎。我特別強調了自由、人權、人類尊嚴和個人主權的價值。儘管我努力客觀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我堅持認為，自己有恰當的理由，強烈譴責違反這些價值觀的行為。

在我的價值觀體系中，社會制度的經濟表現，雖然不在這個體系的最高等級上，但是仍然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我根據常用的經濟標準，對它進行了評估：人民的福利體系取得了哪些發展？它的經濟增長率是多少？技術發展的速度有多快？經濟體系在進行創新和使用創新方面，具備多大能力？我最終借鑒了列寧在社會主義轉變初期使用的標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較量中，生產力較高的制度終將勝出。《社會主義體制》採用列寧的標準，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

我一直猶豫不決採用哪個名字，來做這本書的書名：社會主義體制，還是共產主義體制。西方國家的政論文和日常用語中，更傾向使用「共產主義」，而沿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並且執掌政權的共產

黨，則用「共產主義」，特指一個事實上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狀態。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每個人都按需求分配社會產品。因此他們更傾向使用「社會主義」，因為這個術語，對人民承諾的內容，相對較少。我在兩個術語間，左右為難，但是如果企業、協會、政黨和國家，都可以為自己選擇名字，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剝奪較它們更加龐大的實體——社會主義制度——為自己命名的權利呢？假如這個制度（或者說統治這個體制的領導集團），願意把自己稱作「社會主義」，那麼我們不妨還是尊重他們的意見。我沒有理由用「社會主義體制」，來專門描述「真實」社會主義的理想化規範概念，而拒絕讓現實世界裏的二十六個國家使用這個術語。那二十六個國家組成了「現行社會主義」，因此我決定把它們稱作「社會主義國家」。

一般性模型

比較經濟學通常把關注的焦點，放在蘇聯。它詳細描述了1917年大革命爆發之前蘇聯的情況，以及蘇聯體系產生、穩定、發展和分裂的整個過程，同時補充了其衛星國的歷史發展情況。「蘇聯式經濟體系」，是當時常用的經濟術語，而中國則被看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例。

我們完全有理由使用這種研究方法，來鑒別各個國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不同特點，以及它們與其它國家的差異，確實有助於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我希望在自己的綜合性專著中，使用另外一種方法。我的目標是進行歸納總結——即暫時把那二十六個國家的差異性，擱置一旁，並提取它們表現出來的共性。假如我們找到特定的國家團體共有的基本特點，那麼我們便可以把其視作為一個特殊的獨立體系，來描述它們這個整體。接下來這個工作，便變成是如何精確地確定這些基本特性（它也是最本質的特性）。

建立一般模型的目標，不是為了盡可能詳細地描述社會主義制度。為了避免脫離本書的主題，我不想按照時間次序，濃墨重彩地描繪蘇聯、東歐以及中國和越南等國家的眾多歷史特徵及其它特

徵。與此相反，我希望展現蘇聯、阿爾巴尼亞和中國政權體制及經濟體系運行時表現出來的共同點。創建一般性模型的藝術，正是體現在如何挑剔，而且簡約(parsimonious)*地選擇研究對象的主要特點。人們應該找到盡可能少的主要特點——它們必須能夠充分地描述研究對象的特性，但是卻不能超過實際需要。

為了進行一般性討論，我把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成熟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過渡體制。在蘇聯，第一個階段結束的標誌性事件，是農業集體化和1936年至1938年間的第一次大肅反運動，後者給黨內的反對意見，作了最後沉重的一擊。所以就蘇聯這個個案而言，它的第一個階段，延續了二十年——這個過程，較它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的過程，漫長得多。而就東歐國家而言，蘇聯對它們的軍事佔領，導致它們的第一個階段，較蘇聯短得多(蘇聯是第一個踏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

《社會主義體制》把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稱為「經典社會主義體制」。在這個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的所有主要特點，以統一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大行其道。部分讀者並不喜歡「經典」這個詞語，因為有些人認為它隱含著褒獎之意，但是其實它並沒有進行任何價值評判，而只是表明早期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已經發展成熟，而且具備了所有主要的特點。與此同時，其他擁有社會主義情意結的人，認為不適宜用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死刑、大規模流放和牢獄生活，來劃定經典階段的開始時間。

社會主義國家從經典狀態進入第三階段後，選擇了不同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方法。有些國家，試圖用重組和現代計算機技術，來「完善」中央計劃。南斯拉夫嘗試推行了自我管理。南斯拉夫、匈牙利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先後提出的改革觀點，都是把市場機制引進經

* 簡約(parsimonious)是十四世紀英國奧卡姆的哲學家威廉，在奧卡姆剃刀定律中為建立理論的工作設定的原則。他建議在盡可能少的前提上建立理論，即人們應該簡約地使用自己的假定。

濟體系，同時保留共產主義對權力的壟斷以及公有制的優勢地位。這些國家每次引進市場體制時，都會使政治上的壓迫，有所緩和。改革使得社會主義制度，隨之逐漸瓦解。

這種三階段的劃分方法，雖然考慮到了歷史範疇，但是請讓我重申，它們只是模型。我們描述的，是**制度**的發展進程，而不是各個國家的發展歷史。

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其他人思想的影響。例如，某些人希望為馬克思開脫，認為從學術的角度來說，馬克思不應該為社會主義制度缺乏效率的缺陷，承擔責任。《社會主義體制》堅持反對了這種論調。馬克思的支持者聲稱，目前的狀況，並不是馬克思的本意——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人們沒有正確地把他的觀點，付諸實施。事實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轉型計劃的核心元素，正是消除私有財產和市場，並且用公有財產和官僚協調，取而代之。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是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了馬克思的計劃，因此那些懷著救世主般的熱情、盛讚這個計劃的人，必須為它造成的歷史後果，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

不過，我也不同意另外一個群體的觀點：他們認為目前社會主義的發展情況，完全是在學術觀點的鼓動下實現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預言，和社會主義領袖們的計劃，精確地變成了現實。制度的自發式發展和進化式發展，都為社會主義的狀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在《社會主義體制》裏，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共產黨執政後，便致力於推行旨在消除私有制和市場的計劃。這就像基因密碼似的代代傳遞下去，不斷激發，並且引導這個過程。然後這些體制，開始受到自然選擇的影響。人們嘗試採用各種方式，建立國家，並且對經濟進行管理。在當時的條件下，被證明不可行的計劃，過了一段時間後，便會自動消失；而確實有助於體制運轉的計劃，則會融入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為社會主義發展，提供詳細的藍圖，也沒有針對發展計劃必須實現的目標，提出建議或指示，所有機構的人事部門與政治警察，都建立聯繫。所有這些逐漸發展起來

的事物，都符合現實條件的正常邏輯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經典社會主義制度中，各種元素之間的親和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制度間的自然選擇過程，以及隨之出現的進化過程。它們就像齒輪一樣，完美地嵌入暴政機器內。經典社會主義奉行極權主義，而且瘋狂地壓迫人民，但是它卻構建出一個**協調**的整體。

改革進程破壞了它的協調性。政府的鎮壓和中央集權，有所緩和，人民的生活，不再那麼難以忍受，但是與此同時，這些變化，也在漸漸地侵蝕著整個制度。「布拉格的春天」，痴心妄想地提出了「人性化的社會主義」這個口號，但是這個制度愈人性化，它的運轉能力便愈差。

一旦那些自稱為「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的人們，不再盲目地信奉社會主義，這個制度便會陷入孤立無助的境地。隨著「政治改革」的逐漸推進，當人們可以在意識形態、信仰和政治代表中，作出真正的選擇時，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現在的執政體制。

《社會主義體制》的後半部分，詳盡地展示了這種論證思路——描述改革的各種發展趨勢，然後逐一說明，它們如何走進了死胡同。

太早還是太晚？

匈牙利語版《社會主義體制》問世後，加博爾·卡薩依對我進行了採訪。他曾經在商業周刊《觀察者》(Figyelö) 上，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具有專家水平，而且滿是溢美之詞的書評。在交談的過程中，他問我是否覺得這本書出版得太晚，我必須承認儘管他沒有惡意，但是這個問題對我的打擊仍然很大。他在文章裏這樣寫道：「如果科爾奈能在四五年前完成這本書，並出版它的匈牙利語版本，……那麼它一定和《短缺經濟學》一樣，成為最暢銷的經濟學術著作。它將成為那些自認為曾受良好教育的人貪婪閱讀的對象，成為當時開始逐漸覺醒，並且力求改變體制的陣營奉為經典的科學參考依據。」隔了幾行他又寫道：「如今誰還有時間，閱讀一本接近長達七百頁，而且

專門研究過去的書？」[2]

我在《社會主義體制》的前言裏，引用了西蒙·謝瑪在其講述法國大革命歷史的新作中寫下的一段話：「當問及中國總理周恩來，對法國革命的積極性有何評價時，據說這位總理曾這樣回答：『現在就下結論，為時尚早』。也許再過200年，依然是『為時尚早』，或者是『為時已晚』。」[3]我繼續補充說：「我也想借用西蒙·謝瑪這段耐人尋味的評論：對於一個社會研究者而言，即使再過200年，要對（社會主義運動）這一宏大事件作出評價，同樣是為時尚早，或者為時已晚。但本書的作者，卻不想再等待下去。至於能否接近歷史真實，作者願意承擔所有的風險和不足。」[4]

我**沒有**在幾年前完成這本書，現在我也不**希望**再推遲它問世的時間。

我需要很長的時間，為這本宏篇巨著做好紮實的準備。我必須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如何歸納總結這個主題。在九十年代初，學術界出現了許多很不嚴謹的作品，它們的作者草率地把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真實，或者部分真實的觀點，拙劣地拼湊在一起便算了事。而我希望推出一本，更加精緻的專著，書中的所有觀點，都經過再三斟酌，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而且所有參考目錄，都準確翔實。同時，我希望在書中使用大量有說服力的數據，來證明所有觀點。

我認為自己必須加快進度。我記得有一次在哈佛教工俱樂部，宴請一位來訪的布達佩斯社會主義學家吃飯，他也是民主反對派中的知名人物。他詢問我的研究課題時，我告訴他，自己正在全面詳盡地寫作社會主義制度。我永遠無法忘記他那震驚的表情：「你瘋了嗎？」他的表情似乎在說：「把你的時間浪費在這個課題上？你現在還在做這種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對此震驚的反應。我在前面已經說，在1989年至1990年之後，我就不得不分散一部分精力，去應付許多臨時出現的事情，而無法把所有精力，投進這本書上。假如當時我沒有強迫自己繼續寫作，那麼不管其他人的臉上，帶著什麼表情，這本書都只是保存在我的腦海裏的一堆觀點，而不會變成

紙面上的文字。我需要具備相當自律的精神和使命感，才能堅持寫完這本書，直至完成最後一個圖表和參考目錄，然後把它交給出版社。

假如我當初放任自己，白白浪費這個課題，那麼對我來說，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恥辱。當然，其他學者會過了一段時間後，再研究這個課題。也許有些學者，會像周總理建議的那樣，在幾個世紀後，再回過頭來研究它，從而提出更加客觀的觀點。但是他們仍然需要依賴我的文章，把它們作為研究的來源。我們親眼見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興衰成敗，這種身份，使得我們這一代人（至少是在東歐國家生活的人）提供的證據，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自始至終，我們都在那裏觀察，並且參與了整個過程。

來自東西方的認同

《社會主義體制》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四十多篇評論，相繼出現在媒體上（至少我自己看到的評論，便已有四十多篇）。它先被翻譯成德語和法語，後來被譯成許多當時（或者現在）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語言，例如保加利亞語、俄語和越南語。僅僅是它在越南發行這個事實，便非常有意思。讓我們設想一下：在一個仍然是共產黨獨攬大權的國家裏，居然出現了一本專著，認為該國經濟體系和其它社會領域的政治結構，會造成社會體制運行不暢順的嚴重後果；在一個執政黨，把「改革社會主義」確定為官方政黨路線的國家，居然出現了一本專著，強調了這個改革過程，具有「雜交」性和不完整性。*

大多數評論，對這本書都是讚賞有加。請允許我引用其中的兩

---

* 中國學者也在努力使這本書在中國發行。它的翻譯工作已經全部完成，但是現在仍不清楚出版社是否能夠得到政府的審批。（《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文版，2007年5月由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並且重印再版，被若干中國媒體評為當年最重要暢銷的學術著作。——譯者注）

篇評論：當時英國最著名的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已故的亞曆克·諾夫，把它稱作「一個卓爾不凡的成就。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人民；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無論是研究共產主義國家的專家，還是剛剛起步的學生，都會從科爾奈的著作中，獲益匪淺。它的結構非常精巧，表明作者嫻熟地掌握了所有材料。同時《社會主義體制》，可以被視為清晰有力地進行論證的經典之作。它的作者，不僅對『東方』體制運行的詳細情況，瞭如指掌，而且令人艷羨地精通所有相關經濟理論。他把這兩方面的知識，完美地結合在一起。」[5]諾夫在文章結尾處，宣稱這本書「用嫻熟的技藝，真實地描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以及改革嘗試必將慘遭失敗的原因。為此，我們應該真誠地感謝他。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擁有龐大的讀者群。」[6]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德·埃里克森教授，這樣評論《社會主義體制》：「這是一本真正不朽的著作。它總結了作者畢生的思想……這是一本大師級的作品，處處閃現著睿智和真知灼見的光芒。」[7]

右派和左派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拒絕

當然在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片讚譽之聲中，也夾雜著對其經濟觀點的批判。有些批評意見，甚至超越這個範疇，而全盤否定了整本書的內容。和介紹讚揚性的評論一樣，我在這裏，也列舉出兩個批判《社會主義體制》的例子：

瓦茨拉夫·克勞斯和杜尚·特日什卡，特意對《社會主義體制》發表了一篇長評。當時瓦茨拉夫·克勞斯，擔任捷克的財政部長和所在政黨的領袖，後來他步步高升，首先是出任了捷克首相，現在已經是捷克共和國的總統。特日什卡寫作這篇評論時，正擔任私有化部的部長。

他們把我的書，批判得體無完膚。他們反對這本書的主要理由，是我不必要地偏離了已經得到實踐檢驗的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和

概念框架(事實上，他們不僅反對這本書，而且也反對我的所有作品)。他們認為這種背離主流的做法，完全是不必要的。共產主義體制的所有特徵，都可以用通行的最優化模型，和常規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考察。

我在這本書裏，對共產黨的分析，尤其讓批判這本書的人惱火。他們認為，運用公共選擇理論，便可以充分闡明公共領域的角色。這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論認為，政治家的行為傾向於最大化他/她的權力，以及可得到的物質利益。在解釋共產黨的行為時，你只要把著名的經濟壟斷理論，補充進這個模型即可。共產黨和其他壟斷者一樣，阻礙其它力量自由進入政治市場。

如果所有大學的政治科學系，都認真研究了這篇評論，並且遵循它的原則，那麼它們便應該馬上解散，然後把他們的成員「回爐」，培養成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

我不習慣與評論我的文章的人，發生爭執，而且這本自傳，是最後一個為自己進行學術辯護的地方，不過我不想糾纏於學術之爭。請允許我提出一個問題——一個與經濟學沒有半點關係的心理學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兩名整天忙於黨內事務和國家事務，而分身乏術的資深政治家，親自操刀上陣，寫下一篇長篇大論，對一本學術著作及其作者，進行人身攻擊？

另外一個尖銳地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來自政治譜系的另外一端，他就是匈牙利歷史學家陶馬什·克勞斯。*他對這本書提出許多不滿的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我的作品，沒有使用歷史方法。他反對使用「被剝奪了特定的歷史基礎，而注定不可能產生結果的模型」。他還在其它地方，總結了自己對《社會主義體制》看法：「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從本質上來說，科爾奈作品在方法論方面最根本的缺陷，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他沒有把世界經濟，看成一個

* 陶馬什·克勞斯的作品，在激進社會主義的學術群體中，處於怎樣的地位，不屬於本書的討論範圍。我想說的，是他對於《社會主義體制》的評論，使得西方學者將他歸入新左派的陣營中。

組織化的統一整體，而且這個整體，受到發達的歷史結構特性的控制（例如把核心國家、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連接起來的體系，勞動分工的結構，閉關鎖國和剝削的關係，不平等交換和政治及權力的關係等等）。」我忍不住要在這裏，補充他的另外一段引文[8]：「這本書中出現的『好』與『不好』的領域，就像世界上兩種基本原則之間的鬥爭一樣：一方面是經濟的理性和純粹的市場邏輯，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的國家剝削。」*

對於瓦茨拉夫·克勞斯和特日什卡來說，《社會主義體制》的不足之處，在於它沒有忠誠地遵循主流經濟學派——新古典主義——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而在陶馬什·克勞斯眼裏，我是「匈牙利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領軍人」（我援引了他的原話）。[9]

你無法同時討得所有人的歡心，如果你已經明確顯示了自己的學術姿態，而且闡明了自己的立場，那麼可以預料到的是，你不可能期望所有人，都一致認同或讚揚你的作品。事實上，《社會主義體制》不合瓦茨拉夫·克勞斯和陶馬什·克勞斯的心意，也在情理之中——對我來說，這反而令我更加安心，而不是讓我悲傷難過。

一段古怪的小插曲

1988年底，我聽說政府即將給我頒發「匈牙利社會主義貢獻獎」的功績勛章。當時我正在忙於寫作反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學術作品，所以這件事看起來，的確有些古怪。

我給匈牙利科學院的一位高層官員通了電話，告訴他我不會接受這個勛章。他最好能夠中止這件事情，以免它變成現實。我們開始發生爭執，他問我為什麼前幾年我會接受國家獎，我回答說，這是因為我將其視為學術界對我的認同，而政府今次給我頒發勛章，卻是出於露骨的政治意圖。接下來，我迅速給學院的其他領導寫

---

* 我多次從頭到尾仔細檢查了我的作品，希望從中找出對於國家的非理性或剝削本質的討論，但是卻連一個相關詞語都沒有找到。

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的行動，沒有取得任何結果。科學院不能，而且也不願中止這個頒獎程序。我很快收到與我同為科學院院士，並且當時擔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總統的布魯諾·F·施特勞布，正式發給我的通知，要求我前來領取政府頒發的勛章。這個消息，已經刊登在政府的公報上，所以我給總統寫了封信：「我謙恭地向您彙報，我不會接受這個獎項……這塊勛章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和政治特色，但是我並不贊同政府的計劃，和它的普遍政策及經濟政策。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一直克制著自己，沒有用反政府的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如今，我希望從相反的角度，來克制自己的情緒：我不會接受政府頒發的勛章，因為這將表明我對政府的政策，持有默許的態度。」[10]

當我拒絕接受「匈牙利社會主義貢獻獎」，並且完成了對所有研究成果進行總結的專著時，我告別了對我的生活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

19 轉折點：1989–1992年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

1989年11月10日，柏林牆被轟然推倒。

有人曾經問我，是否會預料到柏林牆的命運。或者換句話來說，我是否猜到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終將瓦解？

1989年11月，我的新作《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正式在書店上架（這本書最早的匈牙利語書名是《經濟轉型中充滿激情的小冊子》）。對上文這個問題，最有力的回答是，我不可能用一天時間，便完成這本恢弘巨著，它證明了我早在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分崩離析前，便已經預料到它的命運。

不過，圍繞這個問題發生的真實故事，卻要複雜的多。我會努力按照其真實的面貌，再次呈現當時的情景。

預言的界限

我是否真得預見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的歷史事實？答案既可以是肯定，也可以是否定。

是：《社會主義體制》用幾百頁的篇幅，支持了一個假設：社會主義制度內部的改革，無法挽救制度。與此相反，它們反而會逐漸侵蝕制度的基石。當極權統治對人民的壓迫愈加緩和，而且官僚紀律日益放寬它的控制時，它也便越來越無法維繫過去的權力關係。

否：無論在《社會主義體制》，還是其它用科學的方法分析社會主義制度的作品中，我都沒有明確地宣稱，**什麼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將走向滅亡。

我們遇到了一個重大的科學哲學問題——在這裏，我只能用一兩句話，來解釋這個問題。檢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種方法，是首先根據這個理論，推導出一個預言，即從其他星球射來的光線，經過太陽附近時，便會發生彎曲。在1919年5月29日發生的日食中，天文學家檢驗、並證明了這個理論假設的真實性。[1]這個假設非常精確，愛因斯坦也因此受到全世界的肯定。但是較諸上百萬人組成的社會的運行法則，關於天體運行軌道的自然法則，則要簡單得多。很少社會科學家，可以傲慢地聲稱，他可以根據**科學理論**，預見什麼時候，在哪裏會爆發革命或戰爭。

是：在1986年至1987年間，那些了解社會主義制度內幕的人，察覺到越來越多政治制度，有即將瓦解的跡象。這場迫在眉睫的危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在政界、商界和軍界等精英人士的覺醒上，而不僅表現在其糟糕的經濟狀況上（例如，早在希特勒的軍隊佔領蘇聯西部之前，蘇聯經濟便已經江河日下，風光不再）。*

如今回顧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柏林牆倒塌，標誌著一個歷史新紀元的開端。而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還沒有發生時，表明舊制度行將結束的進程便已經開始啟動，例如在波蘭議會選舉中，政府當局和反對派之間的對話，和匈牙利的圓桌談判。

無論如何，導致社會主義制度轟然倒塌的關鍵因素，不是匈牙利，或者波蘭內部發生的變化，儘管毫無疑問，它們加快了對制度的侵蝕。對這個歷史進程起決定性因素的，是蘇聯的局勢。儘管蘇聯，在八十年代後半期推行的改革措施，並沒有實現改革發起者及領

---

* 有些人回憶起列寧的評論：「如果要發動一場革命，只有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群體意識到自己無法再按照過去的方式生存下去，並且要求變革，是遠遠不夠的。當剝削者也感到他們無法再以過去的方式生活或者被統治時，革命才有可能爆發。」

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期望達到的目標，即是說這些改革，沒有使社會主義制度再生，或者增強蘇聯的實力，但是事實證明，這些改革舉措，對整個世界的發展史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蘇聯國內的氣氛更加寬鬆，整個制度開始「軟化」，而且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亦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過去蘇聯坦克的履帶，曾經碾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阿富汗的土地。而在帝國崩潰前的幾年裏，無論在蘇聯的國境內外，它似乎都已經無力再進行這種軍事干預。這是一種預兆，而不是任何準確的科學預言。這倒不是說，人們不需要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也不需要全面了解制度，並對各種觀察到的結果，進行評估，便可以擁有這種先見之明，但是直覺在這個過程中，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我認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已經猜到了我們正在向危機邁進，甚至可以說是在全速衝刺。

否：儘管人們切身感受到事情發展的速度，但是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它們會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不斷加快發展的步伐。做事後諸葛亮，並不是一件難事，甚至在一切發生後，建立一個數學模型，也並非難事。所謂的「混沌理論」，引進了許多參數，並且認為複雜的體系，多多少少會沿著有規律的軌跡前進，但是即使少數幾個參數發生輕微調整時，它也可能突然全盤崩潰。這與現實情況，完全吻合。

所有人都在猜測歷史會朝向哪個方向發展。也許某些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可以憑藉自己的文章，或者言論，聲稱自己曾在制度崩潰前五個月，便精確地預見了一切。但即使這些聲明，也無法證明，人們能夠精確地預測，這種世界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何時會發生，或者怎樣發生。歸根結底，這就像買彩票一樣。買彩票的人裏，總有中獎者，雖然這種機率，通常是幾百萬比一。

我必須承認，當時局勢的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範圍。

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公園和布達佩斯蓋勒特丘陵上作出的決定

我努力為即將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做好學術準備。我閱讀了關

於拉丁美洲軍事獨裁統治的書籍，並且研究了它們被民主政治取代初期取得的經驗。我重新開始研讀宏觀經濟學的教材，並複習相關內容。我向歷史學家，請教了如何理解，許多龐大的帝國，從開始分裂到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哈佛大學工作時，我多次與同鄉杰弗里·薩克斯教授，探討這場根本性變化的發展前景。薩克斯和他的妻子索尼婭（索尼婭出生於捷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剛剛搬遷到坎布里奇時，他們非常熱心地幫助我在那裏安頓下來，還帶領我遊覽了波士頓。玻利維亞政府曾經根據薩克斯提出的建議，成功地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他也因此而聲名大噪。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列赫·瓦文薩（時任波蘭總統）及其經濟顧問，曾在共產主義體制瓦解前夕聯繫了薩克斯，希望他擔任波蘭團結工會的經濟顧問。因此從那時起，薩克斯開始對東歐產生濃厚的興趣，而我同樣非常關注宏觀經濟穩定，所以我們在一起時，總有無窮無盡的話題，供我們討論。

除了做好學術準備以外，對我來說，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應付迫在眉睫的政治轉折點。我在第七章的末尾，講述了1956年革命失敗後，我為自己制訂的人生策略。可以說，除了極少數不太重要的事件以外，在1989年的重大歷史轉折事件發生前，我始終嚴格地遵守了這些策略。但是，現在我的生命，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在這場社會變革前，我始終生活在自己從理性、道德和感情上，都深惡痛絕的政治體制中，而現在卻出現了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我認為可以接受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系，終於有望變成現實。因此，現在是考慮未來生活策略的時候了。換句話說，我是否應該對自己的職業規劃，進行根本性調整呢？

我從不喜歡打無準備之仗，因為我在強大的壓力下所作出的決定，或者因為一時衝動作出的決定，往往都是錯誤的。但是我可以

---

* 我記得在1987年前後，我與朋友們聊天時，曾經當著兩位著名匈牙利歷史學家面前提出這個問題。他們驚訝地瞪大眼睛看著我。儘管他們在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但是卻從來沒有考慮過我提出的這個類比。

預測，將來可能出現什麼樣的局勢，這樣我便可以根據經驗法則——即作出具體決策時遵循的一般性標準——提前做好準備。

我在坎布里奇生活時，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公園，它就在查爾斯河岸邊。1989年早春時分，我經常和妻子一面在公園裏散步，一面反復討論我們面臨的抉擇。從布達佩斯傳來的消息，一直牽動著我們的心。3月22日，匈牙利的反對派，召開了圓桌會議，其後於6月10日，召開了由執政黨、反對政黨和「第三方」(即非政府機構的代表)參與的「三方」圓桌會議。隨後，我無意中從美國電視臺上，瞥到了最令人激動的一幕：6月16日，伊姆雷·納吉及與他並肩戰鬥，並為革命殉難的同伴們，被重新安葬，其中包括米克洛什·吉邁什。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的記憶裏。

那個學年結束後，我們返回匈牙利，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爆炸性的新聞。僅以一件事情為例：匈牙利政府於8月1日，開放了對西方國家的邊界。許多先前無法在本國直接穿越東西德邊界的東德人，開始潮水般地湧進匈牙利，希望借道匈牙利，輾轉進入西德。這些人常常在匈牙利停留幾周，以等待匈牙利的邊界對他們放行，而且這個人群的數量，還不斷攀升(他們主要集中在布達佩斯)。這個重大決定，表明匈牙利政府，決心撕碎鐵幕，允許這些東德人，更加自由地穿越邊界。

我們在布達佩斯生活時，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是蓋勒特丘陵。面對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我們必須解決許多嚴峻的感情問題和道德問題(我會在後文多次談到這些問題)。在一次散步中，我們成功地就許多最重要的問題，作出了決定。雖然妻子和我一起討論了這些問題，但是由於我更加積極地參與了公共生活，所以我們討論的主要方向，是確定我在新形勢下所採取的對策。

我們作出的一個重大決定，是我不會對職業的發展方向，進行根本性調整。當時我需要在從政和從事學術研究之間，作出抉擇。在過去的三十二年裏，我一直堅定不移地忠於研究工作，所以，現在我決定繼續在這個領域中奮鬥。

1956年，我脱離共產黨後，再也沒有參加其它政治運動。我將堅持這個原則，不參加任何剛剛成立的政黨，也不參與任何政治運動。

我堅定了自己過去的經濟政策觀、政治理念、價值體系和世界觀。我沒有理由對它們進行調整。我希望在這些問題上，保持前後一致的延續性，並且堅持自己過去的立場。

我所以決定沿著已經確立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主要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而不是因為固執己見，或者沒有能力作出改變。我在談論自己在那個歷史時期裏作出的決定時，再次強調了自己在生活中堅持的主導思想：我非常看重自己和其他人保持觀點延續性的能力。我已經在前文講述了這個問題。也許，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已經通過最苛刻道德考驗的人，出於某些理由，認為他/她必須改變與基本生活原則息息相關的觀點和價值觀體系。我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非常憎惡那些經不起金錢和權力的誘惑，而隨便改變世界觀的人。

由於一黨制已經讓位給自由選舉和多黨制，所以，我必須為此對我的生活，作出重大調整。我必須透過我的建議，來幫助祖國在經濟上站穩陣腳，並且順利地過渡到市場經濟。過去，我一直關注實證性研究工作。從現在起，我必須給予規範性研究方法充分的重視，同時開始投入經濟政策的研究工作中。

我如何完成《通向自由經濟之路》

1989年8月，我收到一份會議邀請。主辦方希望我就匈牙利面對的經濟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次會議的會場，設在經濟和市場研究所（KOPINT，即Konjunkútra és Piackutat Intézet）寬敞的報告廳裏，當時整個會場，擠得水泄不通。參加這次會議的許多聽眾，是正在建立和已經成立的政黨和政治運動的領導人和經濟顧問（這些政黨都反對執政黨），以及眾多科學研究者。他們中的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上的風雲人物。

我已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思考這些問題。我設身處地地考慮了新興政黨中的專家和黨員的想法，以及他們在改革計劃中提出的建議，並且按照這些思路，深入地思考了匈牙利面對的經濟問題。

我對這次演講，進行了精心，而且充分的準備，然而在發表演講時，仍然感到非常緊張和激動，雖然我的言談舉止中，沒有表現出這些情緒。在那幾周裏，台下的許多聽眾，都忙於從一個會場，匆匆忙忙地趕往另一個會場，所以我想對於他們來說，我的演講，不過是眾多演講中的其中一場而已，但是對我來說，這卻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事件和轉折點。在三十三年前的1956年夏天，我還是一個年青，而且幼稚的改革者。我在經濟研究所全體成員面前，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議書。幾周後，伊姆雷·納吉最親密的戰友，指示我草擬一份經濟計劃。遺憾的是，改革政府沒有像先前計劃的那樣，編寫出最終的經濟計劃，並且將其提交議會討論。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提出任何全面的建議書。這次演講，使我的個人職業生涯，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此時此刻，我的心中百感交集，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我的演講持續了一個小時，然後支持或反對我的演講內容的聽眾，在現場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且向我提出不少問題。

兩天後，我的腰部感到劇烈的疼痛——我的腰病再次發作了，德語形象地把其稱為「女巫的射擊」(Hexenschuβ)。我感覺自己的身體，根本無法挪動。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拖到床上，然後在那裏一動不動地平躺了十周的時間。醫生診斷的結果，是由於兩根椎骨之間的神經出了問題，所以造成這種令人痛不欲生的病症。我必須打針，服用強效藥，然後積極地鍛煉身體和游泳，以舒緩肌肉疼痛。

請允許我提前講述一些後來發生的事情：1990年我到紐約的薩諾教授那裏就診，他是一位背離風濕病主流治療方法的專家——風濕病治療這個領域裏，也有「一統天下」的主流學說。薩諾教授的理論認為，運動器官的疼痛和其它與之相關的健康問題，都源於緊張的情緒和壓力。他教了我許多有用的方法，來對抗這類問題。我用自己並不高明的醫術，對自己診斷後，認為1989年夏天，導致我的

腰病發作的原因，正是緊張和壓力。我感到自己承擔著重大的責任，因此在內心強烈感情的驅使下，認為自己**能夠**，而且應當為制訂國家復興計劃的工作，作出自己的貢獻。正是這種情緒，使我舊病復發。且不說從政時必須滿足的其它要求，單這一個問題，便足以說明我不適合從事政治工作。假如政治家，每次出席重大公共場合時，都會因為緊張而身體不適，那麼可想而知會發生什麼情況。

腰痛的症狀有所緩和後，我準備繼續投入為匈牙利的經濟復興提出建議的工作。起初，我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演講內容，整理成一篇文章，但是一旦開始動筆後，我馬上意識到，顯然這項工作的結果，會是一本專著，而不是一篇文章。我通常都是獨立完成自己的文章和專著，但這次卻需要我長時間坐在打字機前（近年來，先進的電腦，已經取代了打字機）。這次我別無選擇，只能破例用口述的方式，來寫作這本書。當我躺在病床上，口述這本書的內容時，把它們記錄下來，並且整理成可以出版的文本的艱巨工作，便落在我最親密的同事們身上。這項工作，斷斷續續地拖延了幾周。

每當我回想起生病期間，同事和朋友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時，心裏總是暖融融的。我的好朋友、風濕病專家蓋佐·巴林特，經常到我的病榻前看望我，並且親自照顧我。我的身體開始逐漸康復後，另外一位朋友物理療師埃斯特·德勞什科奇，便開始指導我進行恢復性鍛煉。如果我的妻子必須外出，而我的身旁又必須有人照顧我時（我患病初期，就是這種情況），我的弟媳瑪麗安娜·迪克爾，或者其他朋友，便會馬上趕來守護在我的身旁。在我生病期間，不斷有朋友前來探望我。隨著寫作工作不斷取得進展，我邀請了許多朋友閱讀手稿，並發表他們的看法。此外，許多政治組織的經濟學家，也來向我請教問題，記者也出現在我的病床前。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與卡塔琳·博索尼見面時，令我難忘的情景：她無拘無束地坐在我的病床旁邊，把麥克風舉到我的面前，對我進行了長時間的採訪。

在我臥床休息的第六個星期結束時，《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寫作大功告成。我從來沒有遇到像阿格尼絲·埃雷尼這樣精力充沛，

或者友善熱情的編輯。她迅速看完了全部手稿，而且奇跡般地讓這本書在十一月中旬便擺進書店的貨架上。這本書的出版過程，真是快得驚人。

發行初期的反響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面世幾天後，關於它的書評，便開始出現在匈牙利的各種媒體上（日報、周刊和月刊）。加斯帕·米克洛什·陶馬什發表了名為《科爾奈投下的炸彈》的短評。儘管在此之前，人們便已經透過演講和學術文章等形式，持續而且廣泛地討論了匈牙利如何應付眼前的危機和社會轉型等問題，但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出現，卻有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般，驟然間把這場論戰，推向高潮。

給我治療腰病的一位醫生，一面輕輕敲打我的後背，給我打針，一面評論說：「現在連水龍頭裏的水，都在和科爾奈一起流動。」在短短幾個星期裏，便出現了至少五十篇與《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有關的文章。人們對它發表了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些人熱烈歡迎這本書，有些人採取了中立的態度：他們贊同書中的某些觀點，但是對其它觀點，卻不以為然。還有許多評論家，強烈批判了我提出的改革建議。大多數人，都會以至誠說理的態度，非常文明地提出自己的反對理由，但是媒體上，也出現了一些粗野的人身攻擊。我再次遭遇到前幾章提到的辯論方式的攻擊：把對方論證過程中的主要觀點，抽取出來，將其扭曲後，並使其脫離上下文，然後開始對這個經過處理的論點，橫加指責。

這本書迅速榮登暢銷榜榜首，並且多次再版。三個月後，由這本書引發的爭論，達到了高潮，然後才逐漸平息下來。媒體和公共意見，開始轉而關注其它事件。

1989年9月，哈佛大學的新學期開始時，我原本應該返回美國，但是由於我的病情比較嚴重，所以我們只能直至當年年底，才再返回坎布里奇。我們在匈牙利，親眼目睹了整個論戰漸漸平靜下來的過

程。與此同時，這本書的英語版本，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當中。

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時，使用了另外一個題目：《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以匈牙利為例，探討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軌》。它的主要標題，與哈耶克的經典著作《通向奴役之路》，遙相呼應。這本書的標題和前言，都明確說明這本書，是針對匈牙利的現實情況，而提出具體的建議，但是作者闡述這些建議的方式，使得它們與其它國家的經濟轉型，也產生了一定聯繫。這本書的其它語言版本，也相繼出現。如果按照出版的先後次序來排列，那麼它們分別是：俄語版（三家出版社，分別發行了不同版本）、捷克語版、斯洛伐克語版、法語版、意大利語版、西班牙語版、波蘭語版、烏克蘭語版、愛沙尼亞語版、日語版、塞爾維亞語版、泰米爾語版和僧伽羅語版（這兩種語言，都是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中文版（它首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後來臺灣的一家出版社，也發行了它），最後是越語版。*

無論《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以哪種語言發行，都迅速引起強烈的反響。從《紐約時報》、《世界報》、《新蘇黎世日報》到《金融時報》，許多權威報章都刊登了它的書評。[2]和在匈牙利一樣，人們對它的反應，不盡相同，有些人對它不吝溢美之詞，有些人在讚揚它的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批評意見，而有些人則憤怒地否定了它。那些極希望用某種非共產主義，但是仍然屬於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來代替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對它尤為不滿。

我在出版英語版《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時，對原來的匈牙利語手稿，進行了修改。我更正了其中出現的錯誤，並補充了一些內容。同時，我根據人們對匈牙利版的反應，相應地修正了某些觀點。我把改動的部分，整理成一篇文章，發表在匈牙利的經濟期刊《經濟評論》上（Közgazdasági Szemle）。[3]其它語言的版本，都是以修改了的英語版本為基礎。

---

* 這本書一共被翻譯成十七種文字。就我所知，這是匈牙利作家研究社會科學的著作中，被翻譯成文字種類最多的專著。

我針對《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發表了許多演講，並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相關文章，進一步擴大書中，某些觀點的適用範圍，並且更加詳盡地探討了其它觀點。

1990年，我受邀前往荷蘭，參加為簡·丁伯根舉行的慶祝活動，並發表年度演講。我剛剛踏入研究領域時，丁伯根教授曾經是我的精神導師，現在我有幸再次見到他——雖然他的身體非常虛弱，但是思維仍然和過去一樣，清晰敏捷。我利用這次演講，詳細闡述了自己對私有化原則的看法。[4]

1992年，美國經濟協會給予了我極高的榮譽，邀請我在它的年會上，發表Ely Lecture。我在這次演講中，談論了國家在後社會主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5]其中的一句話：社會主義制度將催生「不成熟的福利社會」，後來為我招致許多批評意見。雖然如此，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1992年，我還在斯德哥爾摩時，發表了「繆爾達爾演講」，來紀念偉大的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爾·繆爾達爾。我的演講主題，是加強金融紀律，並且強化預算約束。[6]

我在後文提到《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時，也包括上文這些演講的稿件，這也是我為何在本章的標題中，把1992年作為這個時期結束的標誌。現在請允許我首先總結《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和相關演講中提出的主要建議，然後講述一些讀者當時對它們的反應。此外，我還會用現在的眼光，來重新評估這本書。

模仿時代的終結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尖銳地批評了社會主義改革在最後階段未能在改變所有制關係的問題上提出前後一致的觀點。它的解決方法，可謂五花八門，例如建立缺少真正私有資本的資本市場、國有企業實行相互持股、國家官僚像企業所有者那樣管理「控股公司」、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企業自我管理等。我在書中寫道：

我非常厭倦這種模仿的行為，我們已經嘗試模仿了許多事情：

國有企業模仿利潤最大化的公司；官僚工業政策模仿競爭發揮的作用，來調節各個生產分支的擴張和收縮；價格控制辦公室模仿市場的定價機制。我們還可以在這個清單上，補充一些最新出爐的東西：模擬的合資公司、模擬的資本市場，模擬的證交所等等。這些新生事物，共同造就了匈牙利的「華爾街」——但是全都是用塑料做成的！……這些銀行、合資公司和證交所，都是冒牌貨。這裏正在進行的，是一場特殊的「大富翁」遊戲，但參加遊戲的不是孩子，而是成年的政府官員。他們使用的不是虛擬貨幣，而是拿著龐大的國家資金在冒險。[7]

有些匈牙利經濟學家，希望與接受改革觀點的開明的經濟精英和政黨精英合作，努力推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但是面對強大的批評意見時卻退縮了。他們曾經是這個過程的參與者和發起者，甚至是主要的觀念論者。我在前文的其中一章裏，詳細評估了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這個團隊與我的作品的關係。如今，當我在十五年後重新閱讀他們評論《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文章時，我發現主要的「改革派經濟學家」，都是那些強烈反對我的建議的人，有時甚至使用了與學術辯論不相符的粗魯語氣，侮辱了我。

經濟學家伊萬·塞加夫里，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迄今為止，科爾奈的文章，已經使匈牙利經濟學家，陷入非常糟糕的狀態：麻木、強烈的牴觸情緒和學術『消化不良』。……造成這種混亂的首要原因，是科爾奈質疑了匈牙利改革的許多經濟學依據。無論在評判過去，還是展望未來時，他的文章，都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們回顧過去時，可以看到人們往往過於輕鬆地從學術的角度出發，自稱為改革者，但是他的文章，迫使人們不得不面對這個論斷：真理（即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的內容）已經為人們所了解，只是政治、國家管理，或者改革面臨的內外壓力，共同阻礙了改革進程。」[8]安德拉什·謝姆延認為，這種怒氣衝衝的駁論後面，隱藏著一種社會心理效應。他認為這本書「描述了皇帝的新裝，即給國家財產罩上一層想像的外套，根本無補於事，因為這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像私有財產那樣，在經濟體系中發揮作用。僅僅忘記我們的『社政經』，是遠遠

不夠的[*]。現在事實證明，當我們提出許多經濟改革觀點，並且期望它們能夠舒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棘手問題時，它們取得的許多表面成就，只是限制我們自由的沙包而已！」[9]

如果我們按照重要性，對書裏的所有觀點進行排列，那麼在我看來，最重要的觀點，毫無疑問是：零敲碎打地修補社會主義的工作，必須就此終止，我們找不到第三條道路。我在匈牙利語版本和英語版本中，都旗幟鮮明地表達了這個立場。我希望透過對書名的解釋，進一步強化這個觀點，我在書名(*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中，在「道路」(road)前面，使用了定冠詞「the」，而不是不定冠詞「a」，以此特別強調我的觀點：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第三條道路可選。後社會主義國家脫離社會主義制度後，必須走上通向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

在一段時期內，人們從改革的日程表上，刪除了這個主題，但是關於「第三條道路」(許多學者把它稱作「第三種途徑」)的幻想，仍然陰魂不散，而且正在開始復蘇。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可避免地充斥著缺乏公正和侵犯人權的現象。只要經濟體系運行不順暢，那麼與制度變遷前相比，現在人們更容易對當前的經濟條件作出抱怨。很少人希望舊政權復辟，但是許多人卻開始懷著同情之心，聽取那些反對新政體的呼聲。潮水般湧現的觀點中，也夾雜著陳舊的「第三條道路」觀，例如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屬於人民的」反資本主義論、對銀行家的納粹式仇恨、反富豪統治和強盜資本主義的運動，以及

---

[*] 在改革前夕，政府大肆宣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概念，將其灌輸進人們的頭腦中。

[†] 1991年，我榮幸地受邀到斯坦福大學發表泰納演講(Tanner Lecture)(早前發表泰納演講的學者有雷蒙德·阿隆、肯尼思·J·阿羅、索爾·貝婁、約瑟夫·布羅茨基、米歇爾·福柯、於爾根·哈貝馬斯、瓦茨拉夫·哈維爾、羅伯特·諾齊克、卡爾·波普爾、約翰·羅爾斯、理查德·羅蒂和赫爾穆特·施密特)。我的演講題目是「再談市場社會主義」(1993b)。比起《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和過去發表的相關文章，我在這次演講中，更加詳盡地闡述了阻礙奧斯卡·蘭格理論得到推行的社會和政治因素。

妖魔化跨國公司和全球化的新左派。在這些紛雜的觀點中，許多觀點的經濟內容，並沒有問題，但是它們模糊不清的分析過程，以及混淆的概念，卻大錯特錯，譬如溫和的社會民主建議，究其本質，不過是平靜地對國家與經濟的關係進行改革的主張。但是如果把它們冠以「第三條道路」的銜頭，那麼聽起來，便更加堂而皇之了。

如今回顧過去，我認為《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優點是：在東歐國家的經濟思想界，充斥著胡說八道的概念和觀點的背景下，它努力說出了平實而且簡單的真理。它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時至今日，這仍然是對學術研究提出的非常中肯的要求。

為了私有部門的健康發展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認為，轉變所有制關係，是制度改變的首要經濟任務。我遵循自己在《社會主義體制》中使用的論證方法，證明了較諸協調形式（例如市場力量，或者官僚監管的相對比重），所有制關係處於經濟關係的更深層次，而且更加具有決定性。對於轉變所有制關係的改革來說，它的目標不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甚至不是市場經濟（這個詞語，在當時盛行一時），而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只有在這個經濟體系中，私有制才扮演了統治性的角色。

我希望在這裏，把《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觀點，提升到國際水平。當時的經濟學家，總共推薦了兩種行動步驟。《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中，首先提出的第一個策略，是支持**私有部門的有機發展**。它認為首要任務是，摧毀阻礙私有企業發展的障礙，並且放寬它們進入生產領域的限制。政府應該允許，甚至鼓勵人們建立新的私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應被浪費，而是以合理的價格出售。國家不應當無償分配國有資產，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必須被清算。此外，政府在推行以上所有政策的同時，必須不斷硬化預算約束。

人們只能循序漸進地調整所有制關係，而不能一蹴而就，所以西方學者在辯論中，經常將其稱為**漸進戰略**。

與此相對的改革建議，主張盡快處理掉國有資產。它所使用的策略，是「加速私有化進程」。支持這個觀點的學者認為，既然不能在一夜間售罄所有國有企業，那麼國家便不應該坐等合適的買家出現，而是應該給所有公民分發代表國有資產的憑證。所有公民都有權獲得一定份額的國有資產，而且他們可以把這些憑證，作為投資資金，從而獲得先前國有企業的股份。提出這種建議的人，並不反對建立新的私有企業，而是希望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國家管理者，把主要精力放在認股權證式私有化上（voucher privatization）。《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強烈反對了這種觀點。它認為無償分配國有資產的計劃，將會把改革引入歧途：「這個建議，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父愛式的國家突然與世長辭，任由我們這些孤兒，平均分配他的遺產。……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把國有資產，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的手裏，而是應該把它交給真正有能力的所有者手中。」[10]

當時我有幸了解到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保羅·薩繆爾森，對推進私有化速度的看法。他們可以稱得上是聲名最為顯赫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談到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同了《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價值，而且非常贊同書中提出的許多建議，然而，他並不主張推行漸進式的私有化進程。†

我在回信中，不僅為自己在私有化而且在其它相關問題上的看法，據理力爭。同時我補充說：「我感到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

---

*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翻譯工作還未最終完成時，肯尼思·阿羅、馬丁·費爾德斯坦、理查德·馬斯格雷夫和杰弗里·薩克斯就已經評論了這本書。但是由於篇幅有限，所以請恕我不能在此一一贅述他們的評論。

† 弗里德曼在另外一個問題上的看法，與我的分歧也很大。他強烈地反對了書中提出的這個建議：國家應該在轉軌期使用固定匯率。他認為這與市場經濟自由的要求格格不入。但是我不能認同他的觀點。我和其他人一樣，深信在動蕩不安的轉軌期間，政府必須在頭幾年使用固定匯率制。這就像「鐵錨」一樣幫助政府建立相對價格，並保證價格穩定。

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原因——我們自身所處的位置，與被討論地區之間的距離，有所差別。我在這些地區——布達佩斯、華沙或布拉格——的內部，審視著它所經歷的變化。我認為我們應該把彼此特定的出發點，切實地加以考慮。同時，我承認「旁觀者」從更加遙遠的地方研究這些國家時，也許會發現一些重要問題，而這些都是被那些過於沉迷於內部事務的「當局者」所忽略的。因此我非常歡迎你的批評意見，而且我一定會再仔細地考慮它們。」[11]

薩繆爾森第一次談起他對《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看法，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教工俱樂部的餐桌上。幾個星期後，他在一份美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討論了中國改革的進展，然後筆鋒一轉，談到我的新作：「我剛剛看到它（即《充滿激情的小冊子》）的英語譯稿，我想極力向讀者推薦這本書。」他詳細闡述了這本書中提出的許多建議，其中包括努力推動私有部門發展的主張：「科爾奈堅持認為，全體國民應該培養起對私有部門的『社會尊重』。嫉妒盈利者或者把他們等同於騙子的做法，都會阻礙生產。匈牙利極度需要**新興的中產階級**（他特別強調了這一點）。拿破侖曾經輕蔑地把英格蘭稱作『店小二之國』，而科爾奈不是拿破侖。」[12]

讓我們回到發展私有部門的兩種不同戰略上，在這兩種戰略中作出選擇的同時，意味著選擇不同的價值觀。支持整體發展的人，強調了社會重新分層和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過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樣才能製造出，由業主和企業家組成的新興中產階級，而推崇無償分配的人，則對發展速度頂禮膜拜。瓦茨拉夫·克勞斯和杜尚·特日什卡，在評論《社會主義體制》的文章中寫道：「速度被認為是絕對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能夠迅速產生效果的戰略，才被視為可行的戰略。」[13]

在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機構的西方經濟學家、政治家和著名學府的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展開的論戰中，「加快私有化進程」的觀

---

* 就連這篇文章的題目都讓我感到非常榮幸：「想了解社會主義的改革計劃嗎？——請聽聽雅諾什·科爾奈怎麼說」（薩繆爾森，1990）。

點，佔據了上風。有些人和我一樣，支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在西方學術界，只屬於少數派。大多數參加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工作，並且能夠對政府產生影響的西方顧問，都更加傾向於加快私有化進程的戰略。

各個國家在這方面的發展過程，不盡相同。有些國家對大部分國家財產，進行了自由分配，而有些國家，只拿出少量國家財產，用於分配，或者根本沒有動用國家財產。俄羅斯是最早嘗試強行加快私有化進程的國家，它有力地推動了一個具有災難性、無法逆轉，而且對整個世界的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同時導致大部分國家財產，迅速聚集在少數「寡頭」手中。

匈牙利也有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強烈支持分配國有資產的計劃，而且在議會上，提出相關的議案。不過，加速私有化的戰略，最終遭到政府的拒絕，而《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中推薦的發展過程，卻得到重視。儘管沒有人能確認這本書，是否直接影響了政府決策。

十至十五年後，大多數專家再回顧這段歷史時，一致認同漸進主義，是正確的發展道路。*

我還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在探討所有制的問題時，出現了一些錯誤。我的建議，並沒有排除外國資本進入國內的可能性，而且還指明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優勢。但是，我對這些內容的強調，不夠充分。我沒有預見這種投資，後來成為推動匈牙利經濟和新興私有部門發展的最強勁的發動機，並且在出口和技術等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人們對公共基金應盡的責任

假如政府希望私有部門逐步、而不是跨越式地發展起來，那麼

* 杰弗里·薩克斯起初贊同我的觀點，但是後來卻轉而支持加速私有化進程的主張。我還記得我們多次在談話中試圖說服對方，卻總是無功而返。很久以後，當他看到俄羅斯的發展後果時，才承認我的主張是正確的。

國有企業，自然不會在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國家財產和私有財產，將繼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明確地表達了我對公有制的不信任。有些人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看作成企業家，而且認為享有商業自由和獨立管理權的經理，對真正的企業所有者，承擔著監管企業運營的責任，我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使用國有資產做生意的人，絕不能被稱作企業家，而且讓我憂心忡忡的是，有些計劃雖然試圖把企業交給企業員工，但事實上，卻導致企業落入經理等內部人手中。

我警告人們，必須提防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向國有資產伸出魔爪，而且後來的發展情況，證明我的擔憂是完全正確的。我笨拙地嘗試把這個合理的觀點，轉化成法律語言，但是卻沒有成功，這讓我感到羞愧難當（例如，我曾建議議會通過對國有部門實行配給制的議案）。那些在市場社會主義改革中，堅持要求提高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權限，並且為之堅持不懈地鬥爭的人，辛辣地諷刺我試圖復辟斯大林計劃體系。*

不幸的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提出的真正的警告，被人們忽視了。雖然國有企業，不再像過去那樣，佔據牢不可破的統治地位，但它們的數量，仍然不可小覷。伴隨著它們的運營和私有化進程出現的，是權力濫用和腐敗。政府沒有對它們進行充分的行政控制和政治控制，私有化進程缺少透明度，所以媒體和公眾，無法了解它們真實的進展。當然，這些並不是匈牙利特有的問題，這個地區的所有國家，推行私有化進程時，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事實上，我的文章，力圖探索一個更加普遍的問題：如何通過民主程序，公開地控制公共支出？對於國有企業的監管，只是這種控制中的其中的一個方面，儘管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我用當時的一個時事問題，解釋了這個觀點：

---

* 有關國有企業的建議書，只在匈牙利引起了異議，因為它們可能剝奪匈牙利國企管理者，通過改革艱難地獲得的特權。這個現象非常有趣，因為所有國外評論家都沒有批評或指責這些建議書。

人們對匈牙利是否應該承辦1995年世界博覽會，展開了辯論。現在這個問題，將提交議會討論……我僅就這個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對這個動議負有責任的政府官員、委員會成員和部委官員，應該把自己的個人財產，拿出來作為抵押，例如他們的共管式公寓、私人住宅、第二套住房、私用車和藝術品等等……當然，這些財產的價值，與預計投資成本相比，只是後者的一個零頭，但是這些抵押，應該在這些人畢生積聚的個人物質財富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關於世博會的議案，應該說明這項動議的起草者，可以獲得數目可觀的紅利，但附加條件是，這項活動將必須一如他們承諾的那樣，獲得重大的成功。同樣，它還應該規定，一旦世博會失敗，那麼將取消這些人對個人抵押品的贖回權。

我認為這些條件，可以讓動議的起草者，清楚地明白到，他們可能因此承擔自掏腰包的風險。[14]

議會多次引用了這篇諷刺性的寓言。政府最終決定不承辦世博會，雖然我不認為，匈牙利認識到了這份建議書希望人們注意的條件，並且在逐漸向它靠攏：花費公共基金的人，應該自始至終對公共基金，承擔個人責任。

為了實現穩定而實施的外科手術

如今回顧過去，我發現在《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談論宏觀經濟的章節裏，既有許多中肯的觀點，也有許多錯誤的觀點。

我認為當時非常有必要強調遏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這個地區，面臨著通貨膨脹速度加快的真實危險。許多後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度變遷後，都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在制度變化前的幾年裏，匈牙利的通貨膨脹水平，逐年上升，[15]在《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出版的那一年，達到17%。*此外，對重建預算均衡的關

* 我在《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裏，用強烈的語氣提出了這個建議，但是被政府拒絕

注，在當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問世時，人們還沒有就這些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高通貨膨脹率和高預算赤字，是經濟轉軌時，自然而然出現的事物，因此沒有必要與它們進行鬥爭，甚至認為不可能解決它們。不是所有人都能清醒地意識到金融紀律和貨幣紀律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這本書對宏觀經濟提出建議時所使用的一個核心假設，是錯誤的，即國內的生產，不會大幅下降。有些專家發現國內結構被徹底顛覆、東歐市場萎縮及逐步放寬進口，導致國外產品湧入國內造成的競爭等因素，降低了人們對國產商品的需求，從而引發了它們的供求關係，出現螺旋式下降的連鎖反應，最終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要求迅速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並且隨之放開價格，這與它主張漸進式調整所有制關係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並且引起相當大的轟動。我建議為積弱難返的匈牙利經濟體系，實行外科手術。首先請讓我對涉及的術語，作出解釋。當時「休克療法」這個術語，在國際學術界的辯論中已經非常流行，但是我出於兩方面的考慮，盡量避免在自己的方案中使用這個詞語。那些支持休克療法的人，急切要求政府，在推行私有化進程和重建宏觀經濟均衡方面，都迅速採取行動。雖然我在調整所有制關係的問題上，推崇漸進主義，但是卻支持政府，迅速並且徹底地建立宏觀穩定，所以我極希望把「穩定」這個詞語，引進我的改革方案。此外，我不同意使用「休克療法」這個術語，還因為它牽扯到其它可怕的事情上。當時，匈牙利人早已對肯·克西的小說《飛越布穀鳥巢》，相當熟悉。它後來被美國拍成精彩的電影《飛越瘋人院》，片中粗魯、而且極為叛逆的主角，被迫接受了電休克療法(ECT)，結果導致大腦受損(杰克·尼克爾遜在電影中扮演這個角色)。人們對於是否可以在精神病治療中，使用電休克療法的問題，還存在很大爭

了。匈牙利的通貨膨脹水平持續攀升。到了1991年，它的生活成本比原來增加了35%.

議，所以，如果用這個類比，來比喻經濟改革中的「休克」療法，那麼這將暗示著，它可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會使改革誤入歧途。在穩定經濟體系的過程，人們沒有把「休克」視為治療工具，反而視為一種副作用。只有當它有望帶來正面的結果時，人們才願意忍受它。

讓我們回到1989年至1990年間的論戰。我因為建議國家通過外科手術來穩定經濟，而遭到孤立——其他經濟學家，或者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都不接受我的觀點。但是有些國家，把這種迅速徹底的解決方案，付諸實踐，其中最突出的是波蘭、捷克共和國和俄羅斯。這種外科手術，在前兩個國家裏，都大獲成功，從而有力地反駁了某些批評《充滿激情的小冊子》的人的預言，即透過外科手術實現穩定的做法，從一開始便注定失敗。*就俄羅斯來說，時至今日，國內外的專家仍然在辯論，當初是否有必要以如此戲劇化的速度，並且以犧牲這麼多人為代價，來努力實現穩定？當初政府是否應該規避這些風險？它最終帶來了益處，還是損害了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

讀者可以看發現，我已經在用自我批評的眼光，評判1989年發表的作品。我並不害怕批評自己早期的觀點，但是我必須承認，自己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得出確定的結論。1989年後，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土豆燒牛肉式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在匈牙利盛行了很多年。儘管匈牙利政府多次更迭，但是每屆政府，都盡量把重建宏觀經濟均衡的工作，一退再退，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採取痛苦，而且不為大眾所接受的措施。到了1995年，這些具有民粹主義特點

* 批評家評論我的作品時，首先創造出「穩定手術」這個充滿黑色幽默色彩的詞語。他們嘲諷地說「手術非常成功，但是病人死了」，或者說「醫生，我們應該做手術還是驗屍？」如果撇開其中的玩笑成份不提，這個詞語說明在許多國家裏加快穩定過程的做法，既表現出一定優勢，也存在缺陷，所以它造成的最終結果，可能是皆大歡喜，也可能不盡如人意。不過，如果將這個過程看作極其可怕的威脅，那麼這種態度，似乎有些過分誇張了。

的政策，把國家推到了危機的邊緣（我將會在下一章，詳細講述這場危機）。在這個重要關頭，有些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終於承認政府應該在1990年時，便接受《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提出的建議，實行一籃子計劃，努力重建宏觀經濟均衡。雖然在1990年或1991年時推行這些措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那個時候，公眾承受的負擔，卻會較五年後大為減輕。此外，如果政府選擇在舊制度被推翻之際推行這些政策，那麼人們在群情激昂的歷史時刻，便更容易接受重建宏觀均衡時所必須作出的犧牲，而五年後，許多人對新制度的夢想已經破滅，因此也就更難接受這些代價。

「如果當初……」這類問題通常是歷史分析研究最感興趣的問題，但是它們永遠沒有最終答案。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的匈牙利政府，缺乏實施「穩定手術」的政治意願，而且國家的經濟形勢，還沒有糟糕到必須推行這些措施的境地。

關於平衡

如今回頭看自己在那個至關重要的年代裏出版的作品時，我不禁思忖自己，是否恰當地安排它們出版的時機，或者是否恰當地分配自己的精力。難道當初我不能提前出版《社會主義體制》嗎？難道當初我不應該堅持出版《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並且一再提升它的觀點嗎？*

---

* 1999年，世界銀行邀請我到華盛頓發表演講。這次演講的題目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出版十年後：作者的自我評價」(2001)。我從書中選出幾條建議，評估了與它們對應的現實情況，並且探討了現在我對它們的看法。在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支持其中的一部分觀點，但是我對其它觀點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我再次犯了幼稚的錯誤。我認為在新舊體制更迭十周年之際，富有責任感的決策者和有影響力的顧問，應該受到觸動，重新以自我批評的眼光，審視他們先前的觀點。但事實並非如此。我擔心自己是唯一一個像唐吉訶德那樣開展自我檢討的人。

我已經在上一章回答了第一個問題，而且它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打算在《社會主義體制》中，探討時事問題。我並非自誇，但是我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和那些希望盡可能全面了解這個時代的人，能夠從這本書中，得悉社會主義制度的親歷者，對它詳盡可信的描述，所以書中的證據，必須準確無誤。我仔細斟酌了書中的每一句話，對每個現象的描述，都堅持不會草率行事。

另一方面，《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旨在解決未來的時代性問題——即近在咫尺的未來和社會主義步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我感到如果我在這個領域裏的想法，相對比較超前，那麼便有責任盡早把它們昭示天下。正如我在自己寫的後記中指出的那樣：「我在努力加快這部書的寫作速度，雖然我不能以它作藉口，來開脫書中出現的各種錯誤。無論如何，我都希望這部書，不要像其它比較散漫的作品那樣，被迫反復修改。」[16]我知道這種方法非常危險，一心求快，很容易忽略許多錯誤。後來發表作品探討這些問題的學者，可以從最早的作品引發的辯論中，學習到很多東西。一兩年後，許多作者提出了更加深思熟慮和全面的建議，雖然它們都沒有進一步接近核心的問題。

把錯誤和誇張等不足之處，減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就是進行團隊工作。早在圓桌談判時，人們便提出了經濟政策的問題，儘管當時制度變化的政治問題和憲法問題，是人們關注的重中之重。[17]當我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創作《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時，許多政黨和政治機構，也在加緊制訂經濟政策計劃，或者甚至已經完成了這些工作。[18]布達佩斯有兩個著名的委員會，堅持按照正常的委員會工作方式[19]，準備材料、定期召開會議、開展辯論、達成一致意見，直至最終提出建議。他們的結論，在很多方面與我的想法都如出一轍，但是語氣和煽動性，卻較我的建議溫和很多，而且沒有引發廣泛的辯論。

我認識到謹慎周到地為立法和政府管理做準備，或者制訂偉大的行動計劃時，需要集體思維和團隊工作，並且掌握大多數人的意見。我欽佩那些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委員會工作中的同

事們，但是坦白地說，我一直在避免承擔這種工作。我喜歡明確無誤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而不願為了讓大多數人達成一致意見，而作出讓步。我知道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寧願讓那些更加靈活、圓滑，而且被迫作出讓步時，不會被激怒的人來承擔這種工作。民主的決策過程，往往需要包括預備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人們在消除分歧前，先粗略地表達出對草案的不同觀點。在第二個階段，各方在權衡利弊後相互妥協，制訂出**可以接受**的建議書。和對待其它問題一樣，我相信勞動分工，會帶來巨大的益處，而且可能的話，我也會在第一個階段，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不希望這種行為，需要得到別人的許可，我希望能夠自發自願地承擔起強烈表達自己觀點的風險。

人們對此的反應，仍然不盡相同。有位評論家把我制訂的國家經濟計劃，稱作「獨一無二的學術成就」，而其他人卻不喜歡我這種「孤軍奮戰」的行為。當我重新開始翻閱《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和當時論戰中出現的各色文章時，我的心裏百感交集。我閱讀國外學者對這本書的評論時，都是從學術的角度出發，饒有興趣地研究它們，沒有攙雜其它特別的感情因素，但是匈牙利學者的辯論，卻很容易讓我的情緒，產生強烈的波動。雖然我不會再像十八年或二十年前那樣，激動地不能自己，但是那個歷史時刻的情緒，再次深深地觸動了我。無論對於整個國家，還是個人而言，真正意義上的轉折點，都非常罕見。

每當我想到寫作《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使我融入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時，便感到非常欣慰。無論我的建議是對是錯，被接受還是被拒絕，我都可以宣稱自己，對公眾的思想，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我在書中探討的所有問題，當時在匈牙利都沒有定論，許多政治團體，在反復對其進行討論，而且政黨制訂的計劃中，也蜻蜓點水般地提到了它們，但是它們的表現形式，仍然極不穩定，而且從學術規範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雜亂無章。我認為《通向自由經濟之路》的意義，在於它為這些鬆散的辯論，**建立起一個結構**，明確地說明了其中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並且擬定了議事

日程。*從這本書闖進匈牙利公共論壇的第一天起，人們對於應該就哪些問題展開辯論的爭議，便大大減少。甚至那些憤怒地反對這本書的人，也受到它的影響。他們在攻擊我的同時，全然沒有注意到，他們討論的問題，正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促使公眾思考的問題。

重新翻閱《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和那場論戰中的文章，讓我的心情非常愉悅，但同時，它們也讓我回憶起許多痛苦和不快。當時有些評論，使用的不友善、甚至敵對的語氣，讓我感到震驚。我非常敏感，所以不知道該怎樣忍受這些謾罵，特別是那些過去與我非常親近的人，對我的肆意侮辱，這讓我感到尤其難以接受。但這只能說明我不適合做一名政客，與匈牙利公共生活中慣常使用的腔調相比，辯論中偶爾使用的粗魯語氣，又算得了什麼呢？當不公正的文章曲解我的觀點，讓我感到煩躁不安時，我怎能一面咽下他們對我的肆意侮辱，一面繼續泰然自若地發表公共演講（當時人們使用的攻擊方式，較現在的溫和得多）？

過了一段時間，我逐漸克服了這種痛苦的情緒，而且在此之後的許多年裏，都不再去觸動這些回憶。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壓抑表現。這些回憶，藏在我的潛意識深處，一旦觸動它們，引發的不僅是理性的再評價，而是過去痛苦的情緒反應，會悉數再次浮現在眼前。

商業周刊《世界經濟學周刊》的編輯帕爾·雷蒂採訪我前，《通向自由經濟之路》還沒有擺進書店。他當時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你不認為如果你的計劃，以某個政黨，而不是「無黨派」人士的名義提出時，將會更加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同嗎？」

在匈牙利第一次自由普選前夕，我最終完成並出版了這本書。它的首先要目標讀者群，是未來透過民主程序產生的議會和政府，

---

* 如果用2004年匈牙利政治分析家和記者最熱衷的話來說，它主題化了經濟辯論。「主題化」是當時最時髦的詞語。但是這種潮流來得快去得也快。後來的讀者，很可能不理解這個詞語的意思。

當時我還不可能知道他們的政治組成，所以我這樣回答記者說：「我不敢想像某個無黨派顧問團體，聽取我的建議後，會馬上把它們付諸實施。只有當某一個，或某幾個得到議會多數支持的政黨採納它們，而且議會外沒有反對力量阻礙它們的執行時，這一切才可能變成現實。」然後記者向我拋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你是否準備將來擔任政府的顧問，甚至投身政壇？」我回答道：「我希望仍然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紮在科學研究領域，我不想擔任部長、議員，或者政府委任的顧問。」[20]我補充說，如果新政府的成員，對我的觀點感興趣，那麼我非常樂意傾囊相授。

不過，這卻是下一章的主題。

20 遊走在科學與政治的邊緣：1990年後

《主路與輔路》
《掙扎與希望》
《轉軌中的福利、選擇和一致性》

讓我們回到1990年3月，當時杰弗里·薩克斯和我組織了一次學術會議，並邀請眾多正在經歷制度變化的國家的經濟學家，參加這次會議——所有與會者，都在大學或研究所工作，而且都因為對現實政治生活的關注而聞名。這次會議在赫爾辛基的聯合國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召開。幾年前，我正是在那裏開始創作《社會主義體制》。我們就穩定、私有化和轉軌中的政治選擇問題，展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辯論。第二場會議接近尾聲時，一位捷克經濟學家宣布，自己必須馬上趕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擱。他半戲謔半認真地補充說：「所有現在不在瓦茨拉夫廣場的人，以後都沒有機會當部長了。」

他匆匆忙忙趕回國家的努力，果然得到了回報，他很快被捷克政府任命為部長。如今再次審視這份與會者名單時，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大部分與會者，都在九十年代，或長或短地擔任了部長、中央銀行行長、立法者，或者其它高層政治職位。*

而對我來說，我並沒有急著趕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廣場」。從匈牙利發生制度變遷開始，各種政治派別，都試探了我的意願，看看我是否願意進入政界，一顯身手。他們向我提供各種職位，例如

---

* 匈牙利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所有政治派別的領袖，都來自學術界和大學。

部長、政黨首席顧問和議員等。有一次報章打探到的小道消息，說政府甚至有意讓我出任央行行長。事實上，早在它們與我接洽的初步階段，我便禮貌地婉言謝絕了所有邀請。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任何政治權力，對我都沒有誘惑力。

我沒有出任任何高級職位，所以不存在被解僱的可能性。我沒有沿著權力的階級，匆匆忙忙地向上爬，所以也不會像很多人那樣，從自己爬到的高處，重重地摔下來。然而，我不再認為匈牙利受到獨裁統治的擺布，而且執政的政治力量，與我的原則背道而馳。民主國家的所有國民，都要為國家的發展狀況，承擔責任。我必須承認，作為研究者和教師，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政治形勢。從那以後，我的工作便遊走在科學和政治的邊緣處。

對於匈牙利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

婉言謝絕接受位高權重的政治職位，並不意味著我對匈牙利政權的風雲變幻，漠不關心。與此相反，無論我身在布達佩斯，還是坎布里奇，都在嘗試觀察，並且了解後社會主義轉軌期發生的各種事情。我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時事的文章，幾乎所有文章，都超越了簡單分析的階段，而且還對經濟政策提出了建議。我在這裏僅列出這些文章涉及的一小部分主題：私有化的原則、如何加強金融紀律、改變國家角色的必要性，以及改革養老金體系，或醫療體系時使用的價值觀。

這些文章，都是我抓緊每一分一秒，辛勤地研究了這些新課題後得到的勞動成果。我花了很大力氣，複習了從前學到的所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知識，並且把這些領域裏的最新發現，補充進自己的知識體系內。我年輕時，身旁沒有人指導我如何進行學術研究，但是，現在我非常幸運地生活在世界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無論我希望了解什麼問題，都可以找到世界上相關領域的頂尖學者，並且向他們請教。

我的文章，都發表在專業期刊上。如果用我自己的價值觀體

系，來對這些文章分類，那麼我認為這個時期，針對博學廣識的學術性讀者所寫的文章，和前幾章提到的專著一樣，都是我的重要成就，因為它們不僅體現了我的研究成果，而且還代表我對經濟政策制訂作出的貢獻。但是，我也會用批判的眼光，來評估當時的局勢，因為正是它推動著我，努力地向公眾傳揚自己的觀點。

許多學者都樂於利用報紙專欄，來更加快捷、更加頻繁，以及更加廣泛地傳播自己的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他們還會抓住機會，在電視上向成千上萬名聽眾發表演講。我認為如果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正當的目的，而且這種方法又的確具有說服力的話，那麼這種做法，顯然有利於公眾利益。有些人把電視宣傳，看作「精英」或「貴族」式的傳播方式，認為只能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偶爾為之，但我並不贊同這種看法。和對待其它問題一樣，我對這種宣傳方式，持有自由主義的觀點。我尊重那些有勇氣，經常出現在大眾媒體面前的人(假如他們表現得非常完美)，但是我也尊重那些避免這樣公開露面的人。對我來說，這種方式，讓我感到非常緊張和吃力，因此，我很少接受在公眾面前講話的方式。我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但是，我通常拒絕參加那種直接回答聽眾提問的活動。*聰明的政治家，有能力用中肯，而且簡短精悍的話語，乾淨利落地總結他們的立場，但我認為這種演講的方式，非常讓我為難。如果我沒有充足的時間闡明自己的觀點，那麼我寧願保持沉默。

由於我的面孔，很少出現在電視上而不為人所知，所以沒有人會在大街上，突然攔截我，向我提些問題。偶爾我的心裏，也會閃過一絲念頭，羨慕那些經常在電視和新聞媒體上公開露面，從而在國內獲得很高聲譽的學者，但是，隨後我便把這種虛榮的念頭，趕出腦海。我為自己堅守了原則，而感到欣慰。

---

* 美國的電視臺和記者也曾多次接觸我。他們極希望我能在節目中，對許多時事發表簡短，而且尖銳的評論。但是除了個別情況以外，我多半都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我曾經在前面提及，我在堅定不移地遵守原則的時候，也會出現例外情況，有時我會受到一些事物（主要是匈牙利經濟體系中出現的問題）的觸動，寫些篇幅較長的文章，討論當前宏觀經濟體系中的不足之處。*1992年，我在《匈牙利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談論當時在匈牙利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1]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讓我心急如焚，因此我敦促政府，謹慎地進行調整。「半轉」（half-turn）會為實體經濟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壓力。這篇文章，使得「半轉」這個概念，成為匈牙利的遊行口號。後來，人們對它的使用，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觀點，即放寬對一個觀點，或者含意清晰明確的術語的概念限制，任由它流入政治領域隨意使用的做法，會給這個觀點或術語，帶來一定危險。這篇文章，使用了精確的推理，而且警告人們，必須慎重周到地應用這個概念，但是事實證明，一切努力都是徒勞。誰能阻擋各個政治力量，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政治鬥爭中使用這個概念呢？

1994年，匈牙利令人日益擔憂的宏觀經濟形勢，再次激發我發表文章。當時有兩種思想，在我的內心深處，進行激烈的交戰，一方面不斷惡化的經常帳戶收支情況，引發我對經濟均衡的擔憂；另一方面，我相信約束力過強的干涉活動，會抑制經濟增長。其他經濟學家，早已經對此敲響了警鐘，但是我又花了很長時間，仔細斟酌這個問題，最終才下定決心，提出這些觀點。我飛快地完成了一篇文章，題目為「經濟發展的優先重點，是維持持續增長：宏觀經濟的緊張局勢和匈牙利政府的經濟政策」（這是它的英語版本使用的題目）。它的長度與學術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相約。在朋友卡塔琳·博索尼的敦促下，《自由的人民》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博索尼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向我伸出援手）。[2]對於一份報紙來說，連載一篇整整佔滿五版的文章，可不是一件尋常事。這樣的篇幅，允許我充分闡明

* 有時，我也會出於個人原因，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如我出版新作或度過生日時，通常會同意媒體提出的請求，並且接受他們的採訪。這讓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

觀點的精妙之處，並且列舉出詳盡的理由，來證明它的正確性。

這篇於1994年8月末發表的系列文章，為後來政府推行經濟調整和經濟穩定計劃，扮演了先驅者的角色，並且為它作好了學術準備。政府為了推動消費，而扭曲了消費與投資的比率，這讓我感到憂心忡忡。工資和公共支出開始失控，因而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削弱經濟體系的均衡狀態，特別是經常帳戶的收支平衡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的文章，不僅描繪了政府推行這些不為群眾歡迎，而且痛苦的經濟政策可能實現的經濟發展前景，而且還認為這些政策，勢在必行。與此同時，我指出政府推行經濟穩定和調整改革措施時，與之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嚴重的經濟衰退，因此，政府必須在堅持改革的同時，努力避免經濟衰退的出現。

和以前一樣，人們對我的呼籲的反應，不盡相同，有時甚至針鋒相對。有些人贊成我的觀點；有些人認為我的建議，還不夠徹底；而有些人卻扭曲，或者曲解了我的本意。後來，遠離匈牙利政治鬥爭的學術觀察者，高度評價了這篇文章。在為了慶祝我的七十歲生日而出版的紀念文集中，編輯收錄了羅伯特·索洛對這篇文章的詳細點評。索洛是目前仍在世的最偉大的宏觀經濟學權威學者，他頗為讚許地強調了我的觀點：「首先，發展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結果反而被置於相對不太重要的位置上。其次，國內生產總值不斷萎縮時，便更難實現其它經濟穩定的目標。第三，如果經濟徘徊不前，甚至下滑的趨勢再持續幾年，那麼即使存在發展的機遇，也很難再次走上高速發展的道路。」[3]索洛認為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不僅可以幫助匈牙利克服當前面對的困難，而且還關係到它以後的發展，甚至對其它國家，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1995年3月，財政部長拉約什·博克羅斯，提出了政府的經濟調整和穩定計劃（即「博克羅斯一籃子計劃」）時，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工作。我接受了一個電視採訪，並且在採訪中，努力用平實的語言，向觀眾解釋，為什麼匈牙利必須經歷痛苦的調整過程，為什麼人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這篇演講稿，後來發表在紙媒體上，題目為《陡峭的道路》。[4]

我還主動請求與伊萬·薩博會面，他是極其受人尊重的反對派人士，並且在1990年至1994年間，在匈牙利民主論壇組建的政府中，擔任了最後一任的財政部長。我努力說服他認同我的觀點，那即是當前必須採取極端的一籃子經濟計劃。我建議他遊說那些議會中的反對黨成員，不要反對調整計劃。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贊同我的觀點，或者至少說他不反對它們，但是我的舉動，沒有收到任何效果。當時的反對黨，仍然集中所有力量，攻擊了這份經濟調整計劃。

「博克羅斯一籃子計劃」中的某些條款，受到了憲法法院的質疑。為此，我在法院作出裁決前，約見了法院院長拉斯洛·紹約姆，但我不是秘密地從事遊說活動，而是根據法律規定，以法官顧問的身份，合法地與他見面。我從一名沒有摻雜任何個人私心雜念的匈牙利公民的立場出發，向法官闡述了自己對這個案件的看法。* 我向他詳細解釋了當前為什麼必須推行迅速，而且徹底的經濟措施。可怕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它變成現實。不久前發生的墨西哥危機，便給整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因此在這種危機關頭，在沒有預先警告人民的情況下，馬上採取果斷措施拯救國家的做法，完全符合憲法的精神。但是，法院最終作出裁決，仍然撤銷了「博克羅斯一籃子計劃」中的重要條款，這說明我的遊說，對法院並沒有產生任何正面的效果。

後來到了1996年，隨著時間的流逝，統計數字清楚明白地顯示了政府決策造成的後果，我在匈牙利發表了一篇文章《不會引發經濟衰退的經濟調整：對匈牙利經濟穩定政策的個案研究》，並且在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於巴黎舉辦的會議時，用它作為了發言稿。它使用國際數據，衡量了拉丁美洲等國家取得的經濟成就——它們進行了這種痛苦的外科手術，但是卻沒有出現生產迅速下降，和人民失業率激增的惡果。人們在每次金融危機後推行的調整計劃，總會引發生產下降和失業率增加等副作用。

---

* 2005年拉斯洛·紹約姆當選匈牙利共和國總統。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我的評估結果，但是也有部分學者，持不同觀點。捷爾吉·毛托爾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甚至刻意使用了與我的演講題目針鋒相對的標題：「必將引發經濟衰退的經濟調整」。我在所有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文章中，都慎之又慎地推薦了以下措施：必須以實現持續增長為目標調整經濟措施，使經濟走上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並且維持這種走勢。而毛托爾奇很早便表現出推動國家走上「強制增長」道路的傾向，後來，他擔任經濟部長時，最終把這種主張付諸實施，即用超出正常範圍的刺激手段，把經濟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但其措施最終卻使其滑入非均衡的泥潭中，難以自拔。

1996年，我在政府提出穩定計劃前後接受的採訪，和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被整理成文集《掙扎與希望：一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穩定化文選》，並正式出版。這個題目，反映我對匈牙利的時事發展，及整個國家心理狀態的基本看法。

在圍繞「博克羅斯一籃子計劃」展開的鬥爭中，我在感到自己擁有強大力量的同時，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我在演講和書面文章中闡述的微觀經濟分析結果，毫無疑問幫助人們澄清了今後將要面對的任務，而且讓許多人更容易接受調整過程中必須作出的犧牲。但是，如果是凱恩斯這樣的人物，處在我的位置上，那麼顯然他會取得更多實際成果(我只是隨機選擇了凱恩斯，來說明這種情況)。他會更加游刃有餘地，說服那些搖擺不定的人和反對者，而且更加執著地跟盡量多的人交談，並且使用對方習慣的語言。我承認自己過於痴迷於文字的力量，幼稚地相信專著或文章，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所以不會努力遊說別人接受我的觀點。在這項計劃提出前，匈牙利岌岌可危的發展狀況，為我敲響了警鐘，所以我才被迫扮演了自己並不熟悉的角色。

「博克羅斯一籃子計劃」對匈牙利進行了徹底的經濟調整，並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它在幾年後，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各項均衡指標大幅提升，而且經濟增長不斷加快速度。但不幸的是，它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的所有難題。僅僅在幾年

後，匈牙利的經濟發展，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重蹈覆轍。刻意討好民眾、不加節制地提高工資，和根據「土豆加牛肉式共產主義」的原則分配國家財產的精神，並沒有隨著卡達爾政權的滅亡而消失，它繼續陰魂不散地困擾著我們所有人。無論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無論執掌政權的，是保守派國家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它們都在不時努力追求民粹主義經濟政策。舊時代具有破壞性的經濟發展趨勢，不斷死灰復燃。

2003年，匈牙利的金融論壇上，風波再起。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接二連三地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敦促政府馬上採取行動，並且批判了匈牙利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種局勢，促使我接受了《人民自由報》一個很長時間的採訪。我在採訪中，強調自從1994年，在報紙上發表了那一系列文章後，便再也沒有改變自己在這些宏觀經濟學問題上的觀點。在我的強烈要求下，這篇採訪的標題，被再次確定為「持續經濟增長是優先考慮的主要問題」。[5]

不幸的是，儘管我在這次採訪中提出的警告，與其他許多經濟學家的觀點，完全一致，但是人們在一年多後，才注意到它。我們要求「控制」國家支出，限制發展過於迅速的房屋信貸計劃，並且抑制工資增長，因為它們的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生產力的增長速度。讓人遺憾的是，重新引導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工作，被延誤了太久，而且政府始終對此遲疑不決。

醫療體系改革

1992年，我應美國經濟協會邀請發表演講時，便曾經談到後社會主義國家，在轉軌期對福利社會進行改革時出現的問題。我在這次演講中，把卡達爾政權下成長起來的福利結構，稱為「不成熟的福利社會」，因為它對人民承諾的義務，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即履行這些義務所需的資源，與國家的現有條件，不成比例。我確定自此以後，一定會有許多同行，因為這個觀點而用憤怒、輕蔑的眼光來看待我，因為他們認為，必須阻止我「惡意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取得的社會成就。他們根本不考慮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而且不可避免的非均衡狀況。我寫下這些文字後，一位老朋友便再也沒有和我說話。此外，我相信研究福利社會的學術圈子，也會瘋狂地反對我的所有觀點，而不會仔細思考我的論證過程。他們會從我的文章中，抽出一些觀點，然後在脫離上下文背景的情況下，扭曲它們的本意。

但是，我在1992年指出的許多問題，始終在不斷惡化，而不是自行消失。後來我認識到，它們不是東歐國家特有的問題。不僅東歐的福利經濟制度，岌岌可危（東歐國家建立這些福利經濟制度時，條件尚未成熟），北歐和西歐的福利經濟制度，也面臨著同樣重大的挑戰——北歐和西歐是福利經濟制度的發源地。這是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裏，最嚴峻的不協調問題。社會主義的福利體系，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使數百萬人的生活，更加安全穩定，因此一旦這個體系遭到攻擊，所有擔心改革計劃逐漸侵犯自身安全的人，都會發出一片噓聲，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這種現象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當時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以及昂貴的醫療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步伐，使得福利國家，不可能用現有的方法，以現有的福利形式，在現有的福利範圍內，滿足人們的福利需求。這種衝突的嚴峻性，不僅體現在匈牙利或波蘭人民對改革的強硬抵制中，而且表現在法國（阿蘭·朱佩領導的右翼政府）和德國（格哈德·施羅德領導的左翼政府）比較溫和，而且不連貫的改革活動所引發的政治風暴、遊行和示威中。然而無論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所有真正感到應該對本國負責的統治勢力，都必須採取行動，來控制福利經濟制度的支出。

我第一次接觸到福利經濟制度的問題時，便被它迷住了。我嘗試從各個角度出發，解決這個問題。其中的一個方法是，與我以前的學生約翰·麥克黑爾，一起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國際比較。麥克黑爾是愛爾蘭人，如今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6]後來英年早逝的拉斯洛·桑托斯和TÁRKI（即社會研究所）的伊斯特萬·捷爾吉·托特，也參與了我的工作。他們負責了解匈牙利民眾，對於各

種備選改革方案的接受程度。[7]而我和另外一個研究團隊，則採訪了許多病人和曾經拿了「紅包」的醫生，並且開展了坦誠的討論，從中收集大量數據，以估算醫生透過這種方式得到的利益。[8]

1998年，我用匈牙利語，出版了一本探討醫療改革的短篇專題。[9]人們對它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有些人認為，我的建議非常及時，而且切實可行。其他人則大為光火，譴責我成了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或者在為貪婪、渴求利潤的資本家搖旗造勢。這些資本家，絕不會對病人有半點憐憫之心。許多被觸怒的批評家，並沒有聽到我的心聲：我沒有建議政府推行激進草率、而且可能對人民造成傷害的變革，而是建議它採取平衡謹慎的改革計劃，從而使兩種無法兼容的需求，相互妥協。*

這本書並沒有提倡建立不受約束的市場競爭機制，儘管它認為不引進競爭機制，最終會給醫療體系，帶來極大損害。我們不能因為國家和公共財政，完全壟斷這個行業，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允許父愛式政治家和官僚體制，獨斷專行地在養老金、醫療及其它福利服務問題上，作出所有決定。

大多數關注醫療衛生問題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考察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首先從這個行業的具體情況、承擔的工作和財政問題等入手。其次，他們才會關注與這些問題有關的道德問題，有時甚至會完全忽略它們。即使有些人關注了醫療改革的道德意義，他們通常也是以特定的改革主張為背景，努力找出這些改革計劃背後隱藏的道德原則。我的專著，則反其道而行之。它從一組眾所周知的價值觀及道德原則入手，以它們為基礎，推導出實用的改革途徑。

我在這本書裏，提出了兩個基本假設。一個是個人主權原則。

---

* 帕爾·科瓦奇是位非常關注醫療問題的政治家，而且曾經擔任衛生部部長。他決定用詼諧的方式，來談論我提出的這些建議，而不是義正辭嚴地反駁它們。有一次電視臺的記者問他會怎樣利用這本書時，他回答說，這本書的厚度，正好可以用來給桌子墊桌腳。

最理想的改革方式，應該是拓寬個人在福利服務中的決策範圍，並相應地縮小國家的決策範圍。這種原則不僅適用於決策過程，而且還適用於個人生活。我們必須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必須放棄那種任由保姆國家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的狀態。

另一個假設，是團結原則。我們必須盡力幫助在痛苦中掙扎，或者遇到困難的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與力求最小化國家角色的自由主義不同的是，我認為只要國家能夠提供實際幫助，解救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群，那麼，便應該允許國家扮演再分配的角色，而且這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對醫療改革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讓我感興趣的新領域，也滲透進我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中。我與約翰·麥克黑爾，共同組織了一個研討會，希望從國際視野，來考察福利經濟制度的改革情況。參加這次會議的客座演講者中，有些是該領域中公認的權威專家，有些則是普通學生。研討會上討論的主題，有美國養老金體系的改革情況（它的演講者是馬丁·費爾德斯坦和彼得·戴蒙德）、世界銀行對東歐養老金體系改革提出的建議、中國的醫療改革、減少失業的方法（它的演講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埃德蒙·菲爾普斯教授）和世界各個地區財富分配的變化情況等等。聽眾們都全神貫注地聽取了這些演講，所有全程聆聽演講的學生和老師（其中也包括我在內），都從中學習到大量知識，並且從寬闊的國際視野出發，得出發人深省的結論。

讓我們回到1998年我那本關於醫療改革的專著上，它掀起的激烈論戰，讓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沒有令人信服地闡明自己的觀點（這場論戰中發表的書評，較我與其他學者在私底下冷靜的交談還要少）。我開始與以前在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翁笙和合作，修訂這篇文章，翁笙和是研究醫療經濟學的專家。2001年，這本修訂和擴充後的專題的英語版，正式出版，其標題為《轉軌中的福利、選擇和一致性——東歐國家醫療部門改革》。[10]這個新版本，支持了原來的原則和改革的主線，但是卻建立在更加廣泛的國際材料基礎上。它批判地分析了其它國家醫療體系的積極經驗和消極經驗，以及這些領域

內發生的變化。與早期的匈牙利語版本相比，新版本提供了更加詳盡精確的改革計劃，同時更加謹慎地權衡了醫療行業的特點。它解釋了在純粹的商業基礎上組建這個行業的風險，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嚇退人們，使人們對私營企業參與醫療體系的觀點，敬而遠之。與之相反，它詳細闡述了干涉和監管醫療體系的具體方法，以及用來控制風險的平衡機制和再分配機制。它力求客觀地評判各種激勵機制的優劣。

這個英語版本剛剛發行時，引來一片讚譽之聲，而且讓我們這兩位作者高興的是，它的波蘭語版、中文版和越南語版，也相繼問世。在撰寫這本自傳的過程中，這本書的匈牙利語版，也正式出版。這本書問世時，正值人們唇槍舌劍地就醫療體系改革展開辯論的時候。學者們的學術觀點交流，被充滿硝煙味的政治鬥爭，取而代之。那些在表面上倡導全體公民福利體系的公眾人物，事實上只代表著小團體的利益。他們在電視上，為了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激烈地展開了舌戰。誰知道會不會有人重視我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冷靜客觀的意見呢？

鑒於人們對我的宏觀經濟學專著，和第一本醫療體系專著的看法，褒貶不一，因此，我極希望知道政府在制訂經濟政策的最終決策階段，是否曾經留意我的觀點。

他們徵求過你的意見嗎？他們注意到你的意見了嗎？

國內外的朋友，有時會問我，政府是否曾徵詢我對經濟政策問題的意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政府，是否在制訂經濟政策時，聽從了我的建議？我非常希望，能夠簡單明瞭地回答他們的問題，但是我做不到。

這個問題，可能有多種答案。讓我們先從它的字面意義上，來回答這個問題。匈牙利的經濟政策制訂者，是否在面對面的會談中，曾經請求我對經濟政策，表達自己的觀點？

匈牙利的政治體制變遷後，第一任財政部長是費倫茨·勞巴

爾。我在六十年代研究「雙層計劃」時，便已經非常熟悉他，當時，我曾邀請他加入這個龐大的研究團隊。後來，他在位於盧森堡的IIASA（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和國家計劃辦公室工作時，我們還多次見面（IIASA距離維也納並不遠）。1990年暑假我回到匈牙利時，勞巴爾給我通電話，說希望和我見面。我到了財政部後，正打算坐在會議桌旁，勞巴爾卻微笑著把他的椅子讓出來，說我應該坐在那裏。他充滿熱情地告訴我，他非常贊同我在《充滿激情的小冊子》中提出的觀點。我們還在其它場合多次見面，每次他對我的建議，都是洗耳恭聽。

後來，勞巴爾供職的那一屆政府，安排米哈伊·庫珀接任了勞巴爾的工作。庫珀成立了一個覆蓋各個領域，而且成員組成複雜的非正式顧問團，其中包括博學多才、經驗豐富，而且精明能幹的經濟學家伊斯特萬·海泰尼。他曾擔任計劃辦公室的副主任，並在1986年前擔任財政部長。顧問團的另外一位成員，是首相尤若夫·安托爾的個人經濟顧問捷爾吉·歐什瓦特。此外，許多顧問在政治上都傾向自由民主聯盟（SZDSZ, 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或者民主青年協會（FIDESZ, Fiatal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這兩個政治團隊，都不屬於聯合政府中的政黨聯盟。庫珀邀請我加入顧問團時，我雖然有所猶豫，但最終還是答應了。他經常會聽取顧問的意見，而我曾多次與他本人見面。儘管我和庫珀之間的關係，很容易讓人們誤以為我贊同政府的政策（事實上，我強烈反對政府的許多政策，或者對它們持有保留的態度），但是讓我高興的是，庫珀總能心平氣和，而且開明地接受我的觀點。庫珀被免職後，這種模棱兩可的關係，也隨之終結。政治分析家認為，正是由於他在經濟轉軌，和推行宏觀經濟紀律方面的舉措，過於偏離政府的傾向，所以才被免職。

我從擔任庫珀顧問的經歷中，得到的結論是，我必須堅守自己最初的原則。如果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中的官員，以個人名義徵詢我的意見，我會非常樂意地傾囊相授。但是無論哪種政治勢力執政，我都不會再接受「政府顧問」之類的正式職位，或者加入任何

官方組建的顧問團體。我希望避免讓人們產生這樣的誤解，即是我願意針對政府的政策而獻計獻策，暗示著我認同執政黨的政治觀點。任何被正式任命為政府顧問的人，都應該對它表現出忠誠，他不能公開地尖銳批評政府，或者提出與政府主張背道而馳的意見。與此相反，我希望保留一切可以公開表達自己觀點和批評意見的機會。

到2004年年底，匈牙利已經實行了十五年議會民主制，在此期間，先後共有十位財政部長，宣誓就職。有時我會主動要求與他們見面，有時部長會急切地希望與我交談。他們中，也有些人並不關心我對於經濟形勢，或者今後國家經濟前景的看法。*

除此以外，我還經常與其他政治舞臺上，或公眾生活中的領袖人物見面，並交換意見。我也會以文字，來闡述自己的想法。

1991年，屬於自由主義黨派的自由民主聯盟(SZDSZ)主席雅諾什·基什，邀請我擔任該黨的客座顧問。請允許我在這裏引用1991年4月14日，我在回信中寫下的部分內容：

我非常樂於與您討論匈牙利面臨的問題。……然而，恕我不能接受您的盛情邀請，定期參加貴黨的顧問團會議。請允許我解釋這麼做的原因：每當我在政治和專業生活中，遇到具體問題時，影響我作出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保留自己的政治自主權和學術自主權的強烈願望。正是這個願望，促使我自1956年與共產黨決裂後，便決定再也不加入任何政黨，或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而且，我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我很清楚定期參加貴黨的顧問團會議，並不意味著加入貴黨，但是這必然把我與貴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而且這種固定的合作關係，與我剛才描述的人生原則，格格不入。……我可以接受的做法是，向重視我的意見的政黨領袖和經濟顧問，提供個人意見。我將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同意與他們見面，例

* 有些部長就職前與我的關係就非常親密。他們被免職後，我也經常去探望他們，因為，我希望他們明白，無論他們坐在部長的長毛絨高級椅子上，還是已經離開了那裏，我們之間的同志關係，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如該政黨推行什麼政策？向我徵求意見的政治人物是誰？以及涉及什麼主題等等……我相信我在上文簡單描述的這個原則，從政治道德的層面來說，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我絕不認為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則。政黨極度需要的是積極的政治家，而我與那些為了政黨鬥爭，而反對議會民主制的人，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我本人也非常尊重，那些把自己全部奉獻給黨內工作的人，有些人本來可以在其它行業，大有作為，但是為了本黨的事業，寧願犧牲一切。[11]

在這裏，我還節選了1992年10月24日，我從美國寫給民主青年協會的會長維克托·奧爾班的一封信中的部分內容。奧爾班曾邀請我，對該黨的經濟計劃草案，發表評論：

我認為這個草案，對基本原則的表述比較鬆散。

儘管「自由主義」這個詞語，應該得到認可，但是它的內容卻含糊不清。經濟計劃中，應該強調它主要指「自由」，即允許人們自由享受他們的權力，允許企業家不受約束地自主經營，阻止國家干涉所有事務等等。

大多數人仍不清楚「實用主義」這個詞語的含意，你必須更加明確地說明，你希望把強而有力的原則，與靈活性結合起來，說明你反對僵化的教條主義者，並且說明你準備作出實際有效的妥協……

這個清單裏，缺少三個我認為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觀點。我僅在這裏列出它們的關鍵詞，你需要補充它們的內容：

(1) **現代化**。尖端科學技術、現代生活方式、最新的道德觀和社會契約——不要讓那些「陳舊的」東西死灰復燃。

(2) 商界和政壇的**誠信和合法性**。採取措施抵制欺詐、弄虛作假、腐敗、欺騙、任人唯親、利益的道德衝突和違法行為。

(3) **安全感和可預見性**。政府必須履行其諾言，它所說的話，必須具有可信性。

我還對這份民主青年協會的經濟建議書，提出了以下意見：

(這份計劃的)關鍵問題是沒有清楚地指出如何實現它的目標——讓匈牙利實現經濟自立，引導其走上新的發展道路，並且創造就業機會，但卻不會加劇通貨膨脹。……它應該進一步強調，對外

國資本開放的必要性，並且補充說明「懼外症」和國家主義的危害性。……這份草案提到的（國家再分配）「偉大體系」偏離了主題。你希望如何對醫療和福利計劃，推行分權和私有化的改革計劃？……從總體上來看，我不支持這份福利計劃中的民粹主義承諾，但是它使未來的發展路線，具有了可預言性，我非常欣賞這種做法。[12]

如今我仍然堅持十二年前我在這封信中表達的這些原則。

一次會談或書信來往，本身並不能說明政治人物，對我表現出真正的興趣，事實上，我們之間的交流的質量，完全取決於他們的態度。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有些與我對話的政界人物，非常專注地傾聽了我的意見，認真思考我的論證過程，並且把它與其它觀點，進行比較，從而得出最終結論。而有些政界人物，似乎只是裝出一副對我很關心的樣子。他們只想聽到與他們的想法相同的聲音。他們往往在政治觀點得到統一後，才展開討論，或者希望透過交流意見和徵求建議等形式，進一步鞏固他們對自己所作出的選擇的信心。如果我確實贊同他們的看法，那麼他們便會在其它談話中，引用我的觀點；而如果我恰好與他們意見相左，那麼他們便會繼續向其他人尋求建議，直至找到觀點相同的人為止。我必須承認，我在本能地逃避這種交流，但是毫無疑問，絕大部分交談，都淪為這種表面工作。任何透過非正式的途徑，為政治家提供意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這種風險——對方虛情假意地請求自己提供意見，而自己不得不同意他們的要求。

我在會議或慶典上，遇到政壇，或者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哦，原來你回國了。我還以為你在美國呢。我非常想和你談談。有空的時候聯絡你吧。」我們的對話就此結束，但是幾周過去了，我也沒有收到他們承諾的邀請函。我與一兩位政壇的故交之間，曾經進行了五至十次諸如此類的對話。也許說這番話的人，確實發自內心地認為我的意見，會對他的工作，有所裨益，但是每日繁瑣的事務，卻阻礙了他把這種想法付諸實施。事實證明，聽取學者建議，和與學者進行冷靜的對話，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我認為從政者，僅僅出於公關宣傳的目的，與像我這樣的學者交談，並徵詢我們的意見，是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行為。他們似乎在向民眾炫耀：學識淵博的科學實踐者和經濟專家，為我提供了專業意見。我在這方面還缺乏經驗時，曾經被這種拙劣的宣傳伎倆蒙蔽了一兩次。後來，我逐漸對此產生了本能的防禦心理，而且越來越謹慎。每次我都會盡量要求對方，預先說明與我對話的從政者，希望聽取我對哪個主題的見解。如果會談時有媒體和電視臺進行報道，那麼我會加倍謹慎。這並不是說，我希望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與政治人物會面。收到他們的邀請，讓我感到萬分榮幸，而且我沒有任何理由，在遮遮掩掩的情況下，進行這類會談：我時刻準備著，為那些真正感興趣的從政者，闡明我的所有觀點。我非常樂意承擔這種任務，而且我不介意在公眾面前，進行這種交談——但是我不希望，在沒有意義的政治宣傳遊戲中，為他人作嫁衣。

當我深入地思索了這些問題後，一切便豁然開朗。在政客和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的學者之間，存在一條分界線。我無法接受自己扮演前者的角色，但是願意承擔後者的責任。有時，我感到自己跨越了自己設定的這條界線；有時，我認為自己與那條界線，還有很長的距離。那麼這條分界線，到底在哪里？

上面這些事件，約略地描繪了我在心理和行動上受到的牽制。它們導致我無法經常對許多公眾性問題，作出自己的貢獻，因為這些問題，會不可避免地把我捲入政治風暴。我寧願退回自己的學術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我在那裏，感到非常輕鬆自在。如果借用一個經濟術語，來形容這種狀態，那麼可以說，我更加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

實際效果

到目前為止，我只回答了上一節標題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即「他們是否徵詢了你的意見？」現在讓我來回答第二個問題：「對方是否會聽取你的意見？」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希望不要把它的範圍，局限在面對面的秘密談話，或者私人信件中涉及到的聲明、批判或建議。我喜歡在自己的專著、文章和其它公開發表的出版物中，闡述自己認為真正重要的想法——除非這樣做，會與重大國家安全問題，或者經濟利益發生衝突，那麼，這些主張，是否影響了局勢的發展？

讓我們從某些引人注目的數據入手，來討論這個問題。在1990年至2003年間，匈牙利議會46次提到我的名字，或者我的文章。[13] 如今用計量方法，統計學術文章被引用次數的工作，本身也成為了一種科學。研究者們努力讓自己的文章，引用情況和引用次數（通常是指被學術期刊引用的次數），遙遙領先於其他人。我對這種競賽，當然也很感興趣，但是這裏提及的是另外一條賽道！當我看到國會議員，在論戰中引用我的文章時，便感到非常滿足，特別在我刻意避免參與他們日常政治鬥爭的情況下。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積極地引用我的文章，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在引用我的文章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是執政黨的黨員（即匈牙利社會主義黨和自由民主聯盟的黨員），另外三分之一，來自反對黨（即民主青年聯盟、匈牙利民主論壇、基督民主黨和獨立小農黨）。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不過也有些人會提到《短缺經濟學》、《掙扎與希望》，或者那本探索醫療改革的專題。1995年，我的專著被引用的次數，達到了最高峰。當時正是政府推行經濟穩定政策，和調整政策的關鍵時期。當我讀到議會的會議紀要裏，記載著兩位議員，曾經因為誰更深刻地理解我的專著，而爭執不下時，我作為一名學者，感到萬分榮幸。

但是無論議員，在多麼關鍵的時刻和問題上，引用了我的文章，這個事實，也不能說明我的作品切實地影響了匈牙利的經濟轉軌，我無法對此提供完全可靠的答案。我一向支持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多原因分析法。當人們為一個複雜的現象，尋找成因時，用一個原因，便可以把它解釋清楚的情況，實屬例外。如果這個現象，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那麼確定它們的相對權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

匈牙利和其它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發展過程，與我在文章中建議的方向，完全吻合，但這並不意味著，是我的文章促成了這種結果。這可能只是一種巧合，而真正推動它們的力量，來自其它方面。[*]另外一種可能性，是我的文章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其它因素的影響更強大。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我的觀點的確透過間接作用，對決策者的想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匈牙利是最早推出廣泛、而且強有力的措施，來「硬化」預算約束的國家。小J·巴克利·羅瑟和瑪麗娜·V·羅瑟，在最著名的比較經濟學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進行評估時指出，我的文章對這個結果，產生了強大的學術影響，而且它們的評估結果，看起來非常令人信服。[†]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個後社會主義地區，我是支持預算約束硬化的最著名的學者，而且我的文章，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對於其它更加全面的問題，我只能說當許多人，共同提出改革建議時，我只是其中的一位成員，至多可以說，是眾多領袖人物中的其中一個。例如，我和其他人，共同支持政府推行漸進式私有化，並且拒絕了第三條道路——這些問題，仍然是辯論中的核心問題。此外，我還與其他觀點相近的學者們，強烈支持了一個主張，即宏觀經濟均衡，應該符合經濟增長的需要。我認為人們可以假設我對這些問題產生了影響，但是卻無法證明這個假設的確實性。

除了對從政者和經濟決策產生影響以外，還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否影響了**公眾的思想**，即在權力集團以外的人

---

[*] 卡林地·傅里杰斯講過一個善良的精神病患者的故事。他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像管弦樂團的指揮家那樣指揮交通。周圍發生的事情，與他沒有半點關係，但是他感覺彷彿一切盡在他的指揮之下：「現在有兩輛車在拐彎……很好……對面應該有一輛公車。稍等，這是什麼？當兵的應該就要來了……啊哈，他們來了。他們從那邊過來了……」(1975[1914]，p. 329)。無論如何，我不希望自己像傅里杰斯筆下的這個人物一樣，到處揮舞著手中的指揮棒。

[†] 「迄今為止，匈牙利擁有了所有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最硬的預算約束……這反映出雅諾什·科爾奈對他的祖國，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政策影響。」(羅瑟夫婦 2004，pp. 377–378)

們的思想(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我沒有進行相關的調查，所以也無法提供確切的答案。我在介紹《短缺經濟學》時，曾經提及我零星地得到一些讀者的回應。他們有些是給我看病的醫生，有些是鄰居，有些是偶遇的歷史學家。他們告訴我，他們曾經閱讀我的文章，而且認為它非常有說服力。我聽到的最多的讚揚，是他們認為較諸官方的聲明，我的文章，讓那些有切身感受的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許多社會弊病和社會的任務。對於任何學者來說，如果他/她的文章，幫助讀者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麼，這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成就。無論我聽到這類評論時，多麼歡欣鼓舞，但我都無法證明，持這種觀點的讀者，到底有多少。

制訂貨幣政策

1995年，匈牙利國家銀行行長捷爾吉·舒拉尼，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中央銀行理事會——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制訂機構。我請他給我一些時間考慮這件事情，因為我希望了解這個理事會的憲法立場和政治立場。*誘使我最終接受他的邀請的決定性因素，是憲法保證中央銀行，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匈牙利的法律規定，中央銀行理事會獨立於政府和政黨之外。政府任命理事會的成員時，首相需要先徵求匈牙利國家銀行行長的意見，然後提出理事會成員的人選名單，而且這些人選，必須得到議會的批准，不過最終的任命權，卻掌握在共和國總統的手中。

第一次推薦我擔任為期三年的中央銀行理事的人，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聯合政府的首相久洛·霍恩，第二次推薦我擔任理事的人，則是保守派聯合政府的首相維克托·奧爾班。在這兩次提名過程中，相關議會委員會(即與經濟和預算有關的委員會)的所有政府成員，和反對黨成員，都沒有任何異議。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

* 2001年，匈牙利制訂了關於貨幣政策方向的新法律。我在這裏描述的，只是我擔任理事會成員時的法律框架。

們向我提出了許多沒有摻雜任何政治因素的技術性問題，我盡我所能客觀地回答了這些問題。人們對我的提名，達成了廣泛的共識，這讓我感到欣慰，而且安心。我希望政壇認識到，我是一個擁有獨立見解的人。敦促我努力完成這項工作的，不是對某個政黨的忠誠，而是我的學術良心和道德良心。雖然繼任的各屆政府之間，展開了尖銳的政治鬥爭，但是它們都希望委托我，完成這項工作，這充分證明我的努力，獲得了成功。

我在理事會工作了接近六年，我嚴謹認真地為每次會議做好充分準備，而且經常任勞任怨地主動完成一些職責範圍以外的工作，例如預先提出一些書面意見。我努力熟悉與議題有關的所有最新數據和其它信息，並且全面研究了相關理論文獻，以及對過去類似情況的分析。這一切，都是我靜悄悄地關起門來，獨自完成的工作。央行理事會需要對貨幣政策——特別是利率政策——制訂中短期決策。在與政府合作的過程中，理事會必須為匯率的調整空間，確定憲法約束。*當時匈牙利的貨幣政策，贏得了全世界的認同，國際金融活動的領袖，經常把匈牙利在貨幣政策上的表現，作為轉軌國家的典範。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的工作，也為此作出了貢獻。

與此同時，我也學到了許多東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最高機構制訂經濟政策的整個過程。每次為重大決策作準備時，都相當於一次學術挑戰，但讓我感到安心的是，理事會裏的辯論，非常冷靜理智，特別是在政治風暴席捲國家銀行之前。人們用有理有據的論證過程，來回應對方的觀點，而不是只是感情用事。在這個和諧的氣氛裏，同事們相互尊重，齊心協力為國家的經濟政策制訂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2001年8月，我的任期還有幾個星期便屆滿時，我給匈牙利共

* 用經濟術語來說，它被稱作匯率制度。例如政府必須在固定匯率制和自由浮動匯率制之間，作出選擇。換句話說，政府是否應該給市場力量，留出自由發揮的空間，但是預先使用固定匯率限制它的活動範圍？在後一種情況下，匯率浮動的範圍應該有多大？

和國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請求辭職。原因是我感到政府剛剛通過的法律，已經改變了理事會的法律結構。這項法律規定，新成立的貨幣理事會的所有成員，都必須是匈牙利國家銀行的僱員（因此也成為行長的下屬）——而這種地位，必將逐漸損害他們的獨立性。*顯然，這種新形勢，與我為自己制訂的原則，背道而馳。

當時，人們無法預見政策制訂者後來犯下的錯誤，但是許多問題的苗頭，已經初露端倪。過去理事會，經常閉門召開會議，公眾因而並不了解理事們各自所持的觀點。雖然我並沒有感到這有什麼不妥，但是現在我開始擔心，自己可能會永遠成為少數派，而且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支持，或協助那些我不認同的貨幣政策。我也許再也沒有機會，向匈牙利的學術界和公民，表達自己的個人觀點。

也許精明能幹的政治戰術家，或者外交家，處在我的位置上時，會更加妥善地處理這種情況，例如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阻止其他成員的錯誤觀點被付諸實施。但是我認為，自己既沒有這種意願，也沒有這種能力，來完成這個任務。

在擔任貨幣理事會成員的六年裏，我協助政府制訂了成功的貨幣政策。2002年卸下了理事身份的約束後，我可以自由地在媒體和專業討論中，批判貨幣政策中出現的各種錯誤。如今我回顧這段經歷，問心無愧，無怨無悔。

對其它國家經濟轉軌的評論

1989年至1990年間發生的政治事件，使得所有後社會主義國家，突然間感到迫切需要外國顧問的幫助。我不會在這裏，就這個

---

* 過去與中央銀行有關的法律，規定央行理事會的部分成員，必須是銀行的高管人員（即「內部成員」），而其他成員則必須是來自學術界（即「外部成員」）。後者在所任職的大學或研究所裏擔任全職工作，參與制訂國家貨幣政策，只是他們的額外工作。這種「局外人」的身份，保證他們具有完全的個人獨立性。

問題作出總結性的評論。我知道有些顧問，力求全面了解他們即將援助的國家，並為此精心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此外，他們提出自己的建議時，往往也是慎之又慎。不過不幸的是，當時還出現了另外一類顧問：他們對當地並不了解，但是固執己見，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自己服務的國家。

有些後社會主義國家，透過多種途徑聯繫了我，希望我參加該國經濟轉軌的計劃工作。這些國家裏，許多認識我的同事和朋友，也紛紛邀請我訪問該國，並進行學術交流（我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學術反抗時，便認識了他們）。

根據我在前文一再講述的從政原則，我必須謝絕大多數邀請——請注意是大多數，而不是全部。我顯然不會帶著自己的觀點，周遊列國，然後說服他們，接受我的觀點，而不是其他人的主張。但是我感到，不應該把所有邀請，一律拒諸門外。我的學識，也許會幫助處於轉軌期的國家，更加輕易地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相應地，我也可以在這樣的旅行中，學到很多東西。我訪問了俄羅斯和其它幾個東歐國家，並在那裏發表演講，與那裏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訂者，促膝長談。我還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邀請，多次訪問華盛頓。在那裏，我同樣透過演講，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與他們開展非正式的討論。我還在歐洲重建與發展銀行（EBRD）的科學理事會，工作了很多年。歐洲重建與發展銀行，致力於為歐洲的後社會主義國家，提供投資貸款和政策建議，以幫助它們順利度過經濟轉軌期。

我力求準確地進行自我評價，而且我認為自己沒有沾染「學術傲慢」的惡習。我曾經親耳聽到，某些自以為是的同事，宣稱某些國家，只有一條發展道路，而且恰好是他/她建議的那條道路。我絕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我經常一再強調，我們這些外國人，不應該大言不慚地大放厥詞。真正作出決策的，應該是了解國家形勢的本國人民，他們有責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所做的，只能是讓他們了解我們從其他國家所獲得的經驗，以及從理論著作中，總結出來的結論。當外國顧問更加謹慎，而且更加謙虛地對待自己的工作

時，他們的觀點，得到重視的機率便更大。

1999年與2005年兩次訪問中國，和2001年第一次訪問越南的經歷，深深地觸動了我。如果為這兩個處於轉軌期的國家開出的「處方」，是僵硬教條地照搬後社會主義東歐國家的經驗，那麼可以想像，這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果說這兩個國家，讓我聯想到什麼，那麼我想到的，絕不是九十年代的東歐國家，而是八十年代，處於卡達爾政權後期的匈牙利。它們都已經在經濟改革，以及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發展的道路上，走了很遠——在某些方面，甚至較八十年代的匈牙利，走得更遠。但是在這兩個國家身上，卻仍然找不到即將開展政治改革的跡象。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和政治壓迫，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嚴令禁止人民公開質疑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言論。如果政治異見者，試圖組建獨立的政治運動，那麼他們的下場，必然是遭到政府的瘋狂報復。訪問中國和越南的外國學者，必須謹記他們的處境。他們提出自己的建議時，不僅要討好徹頭徹尾地反對現狀的激進派，而且還要不能嚇跑那些對是否開展政治改革猶豫不決的人，或者部分地接受這種觀點的人。

對中國和越南的訪問，給我帶來了非常特別的學術體驗，因為我身處這兩個國家時，感覺都非常自在。我不會說中文或越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可以用他們的經歷作為語言，與他們交談，因為我的經歷，使我敏銳地洞察到，他們從社會主義幻想中覺醒，希望找到發展道路，或者仍然對改革持觀望態度的種種心態。有些人在氣氛友好的談話中，坦誠地告訴我較諸美國、法國和德國經濟學家，他們更加容易接受我與他們交談時提出的觀點，因為他們可以感覺到，我也曾親身經歷了與他們現在的發展階段非常相似的階段，因此我的意見，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讓我高興的是，這兩個國家，相繼出版了一系列我的專著和文章。它們或許也能發揮學術啟蒙的作用，為它們未來的改革歷程，做好準備。我非常欣喜地看到，這兩個雖然遙遠，但是感覺上近若比鄰的國家，也出現了民主政治。未來我是否能看到更加可喜的成

果？這取決於兩個條件：我活著的時間是否夠長，或者他們加速了改革的進程。*

* 2004年，我應佛羅里達大學研究所的要求，撰文分析古巴可以從東歐國家轉軌過程中學到的教訓，並且探索了它是否應該在恰當的時機，轉而為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體系的問題。這個課題為我提出了一個學術挑戰，而且我感到它與我在中國和越南發現的問題，非常相似。

21 繼續我的學術之旅：1990年後

《從社會主義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意味什麼和不意味什麼》

《誠實與信任》

現在，請允許我回過頭來，講述生活中的另外一個範疇，即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以及我真正的職業——研究和教學。

解讀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為我的生活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1990年時，我再次感到自己有責任使用規範方法研究，為匈牙利和其它掙扎在轉軌陣痛中的國家，提出實用的經濟政策建議。與此同時，我同樣重視使用實證方法，客觀地把握當前局勢，描述並分析其深層原因，並且開展相關的理論工作。

真正理解制度的概念，是貫穿我整個學術生涯的核心研究課題。我已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對同時期的不同制度，進行了比較研究。現在我擁有了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來觀察、並且解讀在一個國家先後出現的不同制度所具有的意義。儘管所有人，都在使用「制度變遷」這個詞語，但是人們仍然沒有對其概念，達成一致意見。事實上，目前人們描述「制度變遷」時，使用的一些通用解釋，受到了猛烈的抨擊，而人們對此的不同觀點，也在政治話語中，造成概念混淆的情況。

我在撰寫《社會主義體制》時，便澄清了這個問題。這本書的題

目，清楚地強調了「制度」是它的核心概念。儘管我已經在前文講解了相關內容，但是我仍然希望在這裏，再總結對「偉大」的制度進行分類的三個特點：(1) 政治結構和與之對應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意識形態；(2) 財產關係；(3) 協調機制（市場協調、官僚協調，或者其它協調機制的相對權重）。它們的排列次序不是隨機的，而是表明了這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的排名先後情況。這三個特點，進而決定了制度的其它重要特徵，例如行為規律和持久的市場力量等等。

經典社會主義制度的典型特徵，是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的共產黨壟斷權力，而且公有制和官僚協調，佔據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制度的典型特徵，是支持私有制和市場，而且私有制和市場協調，佔據統治地位。當社會主義制度，讓步予表現出資本主義特徵的新制度時，制度變遷便隨之發生了。

我已經努力在這本書裏，盡可能簡潔地用最少量的準則，來描述兩種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特點。因此我希望提醒讀者，注意那些不屬於我所解讀的制度變遷範疇內的情況。

我並不想對它進行價值判斷，這並不是說，我在克制自己完成這項工作（我會馬上解釋其中的原因），而是因為這個概念，本身便具有實證性、描述性和價值中立性。也許當我為這種制度變遷歡欣雀躍時，你卻會為此萬分悲痛，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就這個術語的含意，達成一致的意見。把自己對「完美」社會的期望，與新制度的實證定義，混淆在一起，必然會引導人們誤入歧途。社會主義制度不是邪惡帝國，而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正義和自由的社會化身。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現實中兩種真實歷史結構的一般性模型。

「制度變遷」表明結構、制度、社會關係和典型互動的徹底轉變，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守護者發生變化。當然，結構和制度的變化過程，與個人角色和地位的變化過程之間，存在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前者包含著後者，而且出現的時間會晚一些。此外，前者毫無疑問扮演了決定力量的角色，而後者更多的只是副作用。

關於政治結構的最後一個附帶條件是，即使新的統治方式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像軍事獨裁那樣的暴政，或者獨裁統治，制度變遷

仍然會發生。我對制度的定義是，只要新制度支持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特徵，即私有制和市場，沒有阻礙這些特徵的擴張，而是切實地幫助它，那麼便可以認為發生了制度變遷。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結構，也許會讓位給皮諾切特式軍人集團的恐怖統治、從過去的統治階層（nomenklatura）手中，奪取政權的家族集團（不少中亞國家曾經發生這種政變）、或者仍然自稱為馬列主義政黨的長期霸權統治（例如中國和越南）。萬幸的是，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結構，從獨裁統治轉變為民主政治。

許多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可以在缺少民主的情況下存在，但是反之則不能。任何民主政治，都不能在非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這也得到了邏輯論證和歷史經驗的證實。

我在美國擁有最大讀者群的其中一本雜誌《經濟展望》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從社會主義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意味什麼和不意味什麼》的文章，並在內裏詳細闡述了上述觀點。†儘管這篇文章，從社會經濟變遷的理論層面，探索了這個主題，但是它仍然同時傳達了政治信息。有些人經常發表煽動性的民粹主義言論，探討制度變遷為何還不發生。恐怕那些在文章中鼓吹這種觀點的人，根本不理解「制度」或「制度變遷」的真實涵意。

當然，社會主義確實已經過渡到資本主義，而且資本主義也確實戰勝了社會主義。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使得許多問題，始終懸而未決。世界上存在多種資本主義制度，有些資本主義制度，為國家賦予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有些資本主義制度，卻盡量削弱國家發揮的作用；有些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權力、權利、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極其嚴重；而有些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些方面的差距

---

* 這個論斷應該加一個限制條件：我談論的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的民主政治。顯然歷史的先驅者——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涉及另外一種經濟秩序。

† 在此之前，我在英國發表了這篇文章較長的一個版本（1998a）。《經濟展望雜誌》的主編給我通電話，希望我將其精簡後，發表於2000年的雜誌上，以慶祝千禧年。這篇文章還被譯成匈牙利語和其它多種語言。

卻並不明顯；有些資本主義制度，為技術發展提供強大的激勵機制；而有些資本主義制度，卻沒有任何建樹。我們需要深入辯論的真正主題，不是制度變遷是否已經發生，而是這些變化的具體發展方向是什麼。與此相關的規範問題，是我們希望向哪個方向發展？這將把我們引向了價值評判的問題。

期望與失望，樂觀與悲觀

許多匈牙利人民和東歐地區的人民，都大失所望。他們期望制度變遷，給他們帶來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更加偉大，或者更加美好的東西。我在這裏描述的，不僅是那些過去生活非常不如意的人——譬如失業、收入不斷減少，或者被剝奪特權。許多知識分子也經歷了夢想幻滅的過程，但他們卻沒有遭受任何經濟損失，甚至享受到較以前更多的福利；他們沒有受到任何個人傷害，甚至較以往得到更多肯定和承認。讓他們感到痛苦的是，他們親眼看到欺詐和謊言，四處泛濫，而且國家財富被肆意揮霍。政壇上沒有意義的「口水戰」、被掩蓋起來的腐敗現象、被揭發的罪行沒有得到合理的後續調查、許多沒有被舉報的罪行，以及商業和政治的相互滲透等可怕的現實，讓知識分子們戰栗不安。當他們看到招搖地炫耀財富的階級，與赤貧中掙扎的階級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時，便強烈地傷害了他們的正義感。

我與他們同樣為此感到痛苦和憤怒，但是我不會承認我的夢想也幻滅了。失望源於超出實際情況的期望，而我的期望值，一定大大低於那些對制度變遷感到失望的朋友和熟人。

我在前幾章提及一篇發表於1980年的文章，我在文中，嘲諷了那些把歷史看成為方便快捷的超市的人。他們認為，各種制度中富有吸引力的特點，都可以放進購物籃，然後拿回家，組合成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歷史提供的是「打包出售的商品」，其中也包括存在許多制度特有的內在痼疾的「現存」資本主義制度。

1983年，我寫了《國家的健康》，並在文中，簡要地評論了七種

嚴重痼疾的「病理現象」。它們分別是通貨膨脹、失業、短缺、外債增長過快、擾亂經濟增長、極其惡劣的不平等和官僚化。[1]（當然，我們可以在這些詞語上，加入更多問題。）然後，我冒險作出了這樣的論斷：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任何痼疾的社會經濟制度，但是我們卻可以選擇自己的痼疾。如果我們的社會制度中，只存在上述的兩三種痼疾，那便已經非常值得慶幸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社會制度可能遭受到四五種痼疾的困擾。

社會主義制度步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過程中，出現大規模失業的情況，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們所能採取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努力降低失業率，但是其實我們卻根本不能徹底根除這個問題。收入差距驟然拉大的現象，也沒有讓我感到意外。雖然我們不可能實現極端的平等化，但是仍然有必要努力幫助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並且為他們提供維持人性尊嚴的基本條件。

很多因素使得我對資本主義的期望，較同齡人更加現實。我是一個專門研究比較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這正是我的所長。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並且把它們進行對比。我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印象，並不是來源於書本，或者短期旅遊，而是在那裏生活日積月累得到的日常生活體驗。我在資本主義國家停留的時間，累積起來有很多年。我利用這些時間，把書本中對資本主義的描述，與我親眼觀察到的事物，進行了對比，而且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沒有對資本主義制度，抱有錯誤的幻想。*儘管它的許多特徵都具有破壞性，

---

* 我發現這兩種幻想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新左派將自己的夢想，建立在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基礎上，因此，非常排斥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主義體制。與此同時，許多知識分子在體制變遷前，對「西方」及其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形成的印象，扭曲了它們的本來面目，所以一旦真實的資本主義體制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反而被嚇呆了。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將真實的資本主義，與具有現實意義的期望，進行比較，而只是與自己想像中的烏托邦，進行了比較。

或者在道德層面上難以接受，但是我仍然得出一個結論：我寧願生活在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願生活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快樂的軍營裏。

我必須補充另外一個原因，來解釋制度變遷為何沒有讓我感到失望。我的思想中，存在著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分析某一個現象時，必須嚴格地把實證方法和規範方法，分割開來。我們都有權力擁有自己的夢想——如果詩人失去了夢想，那麼世界會變得十分悲慘。但是讓我生氣的是，有些自稱為社會主義科學家的人，把烏托邦與現實情況，混為一談。他們在心智惑亂的情況下，把夢想與現實的可能性，進行對比，並且對現實情況置之不理的做法，讓我感到尤為憤怒。

當我認為我們經歷的制度變遷，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時，這種觀點，有時卻使得我多多少少在學術界中，處於比較孤立的處境。我感到自己非常幸運，參與了這個歷史的轉捩點。這種欣喜若狂的感情，並沒有因為1989年和1990年的結束而煙消雲散，它一直延續到十五年後的今天。

過去，我出訪西方國家時，總要努力地在旅行箱裏，塞滿國內短缺的許多東西。現在，我在布達佩斯購買東西時，可選擇的種類，較波士頓更豐富。過去，我要利用私人關係「走後門」，才能給自己家中安裝一部電話。現在，各家電話公司，爭相邀請我使用它們的服務。難道作為《短缺經濟學》的作者，我是唯一認為消除長期短缺具有重大意義的人？難道其他人(甚至包括上了年紀的人)，都已經忘記了因為短缺而滿腹牢騷的歲月？

過去，我申請護照，並到允許出境的「窗口」之前，必須先得到工作單位黨委書記和人事官員的批准。現在，我可以隨時隨心所欲地搭乘任何一列火車或一架飛機。過去，當有人希望用印刷品偷偷表達自己對當局的不滿時，我們已經習慣了心照不宣地相互使個眼色。現在，唯一不願在報紙和電視上攻擊政壇領袖的人，都是那些沒有這種意願的人。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但這對我來說，並非**理所當然**，或者想當然的事情。我對朋友提起這

些時，他們也會同意我的看法：「哦，是的，你是對的，但是……」然後他們會繼續怨天尤人，列出一長串讓他們不愉快、或者反感的事情。

我並不是說，我對任何事情都沒有曾經失望。有些問題的出現，讓我措手不及，即使有些我預料到的問題，事實上也較我的想像更嚴重。我秉著自我批判的精神，如實描述了這種情況。我在這裏討論的，不是那些根本無法預料的破壞性事件，和令人嘔吐的事件，而是在討論那些，如果我當時能夠更加深刻，和全面地思索可能發生的變化，便完全可以預料到的問題。

譬如，我對於議會的工作方式，提出了許多幼稚的假設。《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和其它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這些觀點。我對於權力分立（即用立法權監督行政權）抱有太多期望。也許促使我產生這種想法的，是在美國民主政治的重大歷史時刻中，總統和議會之間的關係。水門事件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其中包括尼克松總統時期的民主黨黨員），協調連貫地對水門事件展開了調查，最終導致總統自動辭職。我透過電視轉播，觀看了許多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會議。它的立法者努力監督行政者的工作，並且經常超越了政黨利益的範圍。「經常」在這裏，是一個重要的詞語，因為他們不會總是忽略政黨利益。*即使在發達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希望立法機構的成員，僅僅因為當選而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只考慮選民和國家的利益，而忽略對本黨和政府的忠誠，這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想法。我原本可以更加慎重地衡量政府和議會多數黨在正常條件下的工作方式，但是卻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必須從匈牙利和其它東歐國家新民主政治的表現中，汲取教訓。

前社會主義世界中，民族主義情緒的迅速高漲，讓我始料不及。我曾經預料到這個問題可能出現的發展，但卻沒有料到，它們

* 美國國內外追捧美國民主政治體系的人，擔心旨在先發制人阻止恐怖襲擊的監管措施，可能同時會限制人權。我希望美國民主政治的力量，能夠像過去多次經歷的考驗一樣，成功地保護他們取得的成就。

對政治和學術生活，以及人際關係，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影響。

分屬不同民族聯邦的蘇聯和南斯拉夫，徹底分裂。前南斯拉夫國內的戰爭，此起彼伏，而在蘇聯的領土上，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也爆發了戰爭，同時車臣內部的衝突，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即使在沒有爆發武裝衝突的地方，過去一直被壓抑的民族獨立情緒，也驟然爆發出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兩個國家。東歐國家屢次因為少數民族的處境，與鄰國發生磨擦，只是磨擦的強度，存在差異而已。少數民族要求獲得更多權利，而在此之前，一直處於優勢地位的民族（例如俄羅斯），卻突然發現自己淪為少數民族，甚至在許多新成立的國家中，成了被壓迫的民族。

伴隨著這些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是國際衝突，各個國家內部，也經歷了與之相關的民主主義事件，而且後者更表現出相似的破壞性和可憎性，例如我在這裏列出的懼外情結、蔑視鄰國人民的情緒，以及反吉卜賽人和反猶太人的心態。反吉卜賽人和反猶太人的心態，最早只是零星出現在東歐各國，但後來卻逐漸發展成強大的勢力，甚至差點獲得了社會認同。

我在回憶錄的前兩章，描述了我的孩童時期和成年後的猶太背景對我的意義。當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但是它對我並沒有任何意義。馬克思是猶太人，而斯大林不是猶太人，這樣的事實，對我來說，無關重要。過去，我曾堅定地追隨他們兩個人，但後來卻摒棄了他們的學說。拉科西是猶太人，而卡達爾不是猶太人，這樣的事實，對我來說，也無關重要，過去我非常信奉他們，但後來卻與他們劃清界限，並且反對他們。在那些對我產生影響、曾經攻擊我、懲罰我、把我從學校的教學工作中排擠出去，或者邀請我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中，哪些人是猶太人，對我來說也不重要，因為我不是種族主義者。當匈牙利政府，根據紐倫堡法案和本國法律設定的標準，視我為猶太人，並且要求我在胸前佩戴黃星標記時，這對我來說，也無關重要。但是當我讀到匈牙利詩人山多爾·柯素里，在他的文章中，宣稱自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人們便已經對生活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不抱任何希望，認

為他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匈牙利人，此時猶太人的意識，重新跳進我的腦海裏。*難道我在他們眼裏，還不算真正的匈牙利人嗎？

我不接受反猶太分子或其他種族主義者，根據種族或宗教劃分等級的做法。我會出於自衛，宣稱自己是猶太人，以保衛我的尊嚴，並且表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如果你是反猶太分子，那麼我會高高地昂起頭來，宣布自己是猶太人。除此以外，我通常不關心這種不道德，而且讓人反感的歧視行為。

我必須承認，我沒有預料到有一天，某些人會再次把「猶太問題」，提上議事日程。這是制度變遷後，讓我大失所望的一個問題——在這裏我不得不承認，我所以這麼失望，是因為我缺乏先見之明。

我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令人痛苦的局勢，和許多讓我措手不及的問題，正是希望讀者們相信，我不是一個不加批判地對制度變化照單全收的觀察者。我們生活的社會，仍然動蕩不安，好與壞交織在一起，美麗與庸俗，相互糾纏，不可分割。我們無法用客觀的規則，來計算它們的具體比例。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這個善惡混雜的古怪時代。

我發現自己周圍，有許多對社會持悲觀論調的人。「現在你怎麼看這件事？」朋友經常會用這句話，作為開場白，然後便開始給我講述最近發生的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能說些什麼？如果我開始為他們勾勒制度變化的實證特點，以及未來可能取得的成就，這聽起來，非常像粉飾太平的官方論調，或者像共產主義人民的指導者和農村裏的鼓動者，經常用來討好群眾的空話。而在這本自傳中，我只要把話題局限在自己經歷的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上，便足夠了。

在制度變遷前，我傾向於各種形式的悲觀主義。我在1983年寫的文章《國家的健康》中，宣稱悲觀主義，並不排斥行動（我在前文

---

* 「在霍爾蒂時代的攝政共和國裏，特別是在猶太人遭受的大屠殺中，學術融合和精神融合的機會，徹底消失。現在自由開明的猶太民族，希望在生活方式和心智方面同化匈牙利人，為此，它前所未有地為自己建立起一個議會平臺。」（柯素裏，1990，第5頁）

提及這篇文章)。我引用了加繆的小說《鼠疫》中的一個片斷：里厄醫生正在和幫助他抗擊鼠疫的朋友塔魯交談，塔魯說道：「是的，但是你的勝利，不會持續太久，就是這樣的。」里厄的臉色陰沉下來：「沒錯，我知道這個情況，但是我沒有理由放棄鬥爭。」[2]

1986年，我在美國出版了《矛盾和抉擇》，並在前言中寫道：「我必須提醒讀者：這不是一本樂觀的書，但它也不是悲觀的。在匈牙利，有一個沿襲幾百年的傳統：你可以聽天由命，或者絕望，或者憤怒，未來的美好前景，並不確定，或者根本不可能發生——然而，你必須誠實勤勉地工作，以改善現狀。那些讀了匈牙利經典戲劇和詩歌(有些著作已經被譯成英語)，或者聽過巴托克音樂的人，都會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相互衝突的情緒。也許，像經濟學家從事的灰色職業，或者說非哲學性職業，也遵循著同樣的傳統。」[3]

在我的內心深處，這種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交織在一起的情緒，自制度變遷後，逐漸向樂觀主義傾斜。匈牙利以至整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中，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認為用短短幾行文字，來勾勒它們的平衡對比情況，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即使再寫一本宏篇巨著，也無法透徹地研究這個主題。我會在下文，只提及幾個現象，來說明它們對我的生活態度的影響。我從不否認問題，而是坦誠地直接面對它們，但是自制度變遷，為後社會主義地區的數億人民開啟自由之門後，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前景。隨著自由之門的開啟，新的民主潮流，進一步推動之前的另外一股民主潮流。用歷史術語來說，受到專政統治的地區，在逐漸縮小，而被民主制度覆蓋的地域，則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迅速擴張(無論其民主政治強大與否)。儘管這個過程，可能在某些國家突然中斷，甚至發生糟糕的逆轉，但是我堅信這種歷史退步，不會持續太久。我也會因為聽到某些極端分子的醜惡行徑而顫抖，而且我相信，如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後果必然不堪設想。然而，我相信民主擴散，會遵循過去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發展趨勢，繼續擴張。

世界各國的生產水平，都在提高，儘管發展水平並不平衡。技

術發展日新月異，可供人們消費的資源的質量，也在不斷攀升。我充分意識到，不斷有新困難湧現出來，等待人們克服。和過去一樣，我不會為消費社會、老齡化社會，或者計算機普及等帶來的災難，而悲天憫人。對我來說，如果鄉村中亮起點點燈光，污水可以通過管道排除乾淨，如果流行病被成功地阻止，人類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如果現代信息技術和電信技術，幫助人們實現更快捷流暢的溝通，那麼它們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我已經轉變成一個發現問題後，便著手舒緩它的樂觀主義者。

匈牙利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

制度變遷後，我在布達佩斯的工作條件，有了很大改觀。如果不算我，被迫調動到其它研究所工作的九年時間，自1955年後，我便一直在匈牙利科學院的經濟研究所工作。

1992年，新成立的布達佩斯高等研究所，邀請我到那裏工作，我欣然接受了，並且成為該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我在布達佩斯的主要活動範圍，也隨之轉移到我的新辦公地點。當我離開經濟研究所時，心中百感交集。許多感情、友情和記憶，把我與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我與那裏的許多同事，仍然保持著親密的朋友關係。*

布達佩斯高等研究所，是由柏林高等學術研究所(WIKO，即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院長沃爾夫·萊佩尼斯教授發起成立的。柏林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仿效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而建成的，我曾在前文提及，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為所有訪問學者，提供了

---

* 我在第十一章，描述自己在經濟研究所的工作情況時，提及我們這個工作團隊有一個傳統，即每天中午十一時半，一起去吃午餐。由於長期在那裏工作，所以我的習慣，在經濟研究所也留下了痕跡。曾經參加過科爾奈團隊，而且仍然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仍然保持著十一時半吃午餐的習慣，而不是僅僅在我探訪他們時才裝裝樣子。

絕佳的學術機遇。他們有一年的時間在那裏思考、寫作、研究或學習，而不用承擔任何教學，或者行政義務。萊佩尼斯教授和他親密的同事、柏林高等學術研究所秘書約阿希姆·內特爾貝克認為，當時在東歐建立高等學術研究所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們考察了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情況，猶豫了一段時間後，最終選擇在匈牙利建立姐妹機構。他們召集了一群贊助人，其中包括許多西歐政府和基金會。

萊佩尼斯教授邀請我，與他們合作建立這家研究所。我沒有接受他提議的所長職位，因為我每年需要一半的時間，留在哈佛大學，但是我同意以終身成員的身份，參加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的領導小組。

我非常高興地抽出一部分精力，來推動新研究所的創建工作——例如，我每年參加研究所的會議，來遴選擬定邀請的學者。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在匈牙利發揮著國際研究所的作用，因此它希望盡可能平衡匈牙利人(匈牙利本國和其它國家的匈牙利人)，和東西方外國學者的組成比例。此外，它是一所跨學科研究所，而這正是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音樂學者和遺傳學者，或者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等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在午餐的餐桌上熱烈交談，不斷撞擊出靈感的火花。研究所要求所有成員，在研討會中，向其他學者彙報自己的工作，而且透過深入淺出的講解，盡量讓其它學科的實踐者，也可以理解他們彙報的內容。研究所選擇被邀請的學者時，往往慎之又慎。它希望所有學科，都能在研究所裏，找到代表人物，而且人員的組成平衡合理。

有些研究者，習慣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裏，獨立開展工作，而有些人，則喜歡組建研究團隊。人們經常建立焦點小組，來研究具體課題，而我本人，便曾經三次發起，並組建了這樣的團隊。最近，我與耶魯大學的蘇珊·羅斯–阿克曼，共同指導一個團隊，來研究「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誠實和信任」，其中包括來自十四個國家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和法學家。這個小組，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而且從發表文章中，彙編出兩本論文集，這些書已於2004年出版發行。[4]

我參與這個項目時，發現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彼此間都被高牆分隔開來。焦點小組的成員，把自己的工作介紹給其他人時，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各個學科的研究者，只能理解本學科的術語、概念框架和常用研究方法。所有人都對本專業內的經典文獻，以及最新的學術進展，瞭如指掌，但是他們對於其它領域使用的語言、文獻和方法論，則知之甚少。每次我們這個小組中代表某個專業的學者，都必須花很大力氣，努力闡明自己的學術觀點，才能勉強讓其它學科的學者，了解他/她的想法。我們已經屢次發現，對經濟學家不言自明的觀點，但對於社會學者或律師來說，卻難以明白，因為後者使用不同的研究原則和方法，反之亦然。焦點小組的成員，不僅從這種互動中，學到具體的知識和研究成果，而且還發現跨學科合作，是一種可以帶來深遠影響的學術形式。

在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時，還要作出許多困難，或者棘手的決定。有很多次，我們都不得不用鬥爭的方式，來保護匈牙利國內，這個獨一無二的研究所的正直性、學術獨立性和政治獨立性。如何有技巧，並且果斷地抵禦研究所受到的各種干擾和政治壓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公眾沒有看到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它也沒有獲得公眾認同，但是我認為，它是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

現在我是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裏，唯一一名從建院初期便在這裏工作的元老級學者。雖然自從被授予榮譽終身成員的銜頭後，我便卸下了所有行政事務，但卻仍然繼續在研究所中，從事研究工作。從我走進高等學術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現在，那裏的和諧的學術氛圍，和優美的環境，始終讓我感到心情愉悅。每當薄暮時分，我走出研究所的大門，準備回家，抬頭看到被泛光燈照亮的聖瑪麗亞教堂尖塔時，總會為布達城堡區美侖美奐的街道和廣場而陶醉。能在這樣寧靜美麗、令人銷魂的環境裏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榮幸。

一段美好的小插曲：我的七十歲生日

上一節和下一節，都是講述我的工作，不過，我在這兩節中，

都會插入一段發生在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並且與我的個人生活有關的小插曲。

我的妻子蘇莎，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為我準備了七十歲生日慶祝活動。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的所長加博爾·克洛尼曹伊，無微不至地為她提供了各種幫助，並且準備了舉辦慶祝活動的場所。

到生日那天晚上，蘇莎告訴我，要和我出外吃飯，所以讓我盛裝打扮，我甚至為此打了領結。我們坐進汽車，直奔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這時秘密揭曉了：一個生日宴會！蘇莎邀請了五十二位賓客，其中包括國內外的所有家庭成員，還有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所有受邀賓客，都出席了宴會，並且在宴會開始前，守口如瓶，所以我在到達會場之前，對此毫不知情。

所有人齊集後，我們便進入報告廳就坐。蘇莎首先講話，她感謝所有幫助她籌辦這次宴會的人。她提到我們親愛的朋友、歷史學家彼得·豪納克。他參與了所有早期的準備工作，但是在宴會即將開始時，卻離開了我們。蘇莎本來有很多東西想說，但是沒幾句話後，便開始哽咽，並且淚眼婆娑，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她在如雷的掌聲中，離開了演講台。

在這感人的一幕後安排的節目，是我最喜歡的作曲家莫扎特的弦樂四重奏曲。我的好朋友拉約什·韋卡什，不僅是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究所的第一任所長，而且也是一個狂熱的音樂愛好者。那天晚上，他為我們演奏了奧爾四重奏。

隨後，許多朋友先後興高采烈地講話，回憶過去的歲月裏發生的許多有趣事件。彼得·肯德想起我們初中一年級時的情景：他在家裏召開生日宴會時，他的父母曾經建議他邀請我參加，他說道：「哦，不，不要邀請昂西（我的暱稱），他太好鬥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好鬥？

在彼得之後講話的是捷爾吉·利特萬和安德拉什·納吉，他們談及我們在經濟研究所裏共同度過的日子。那些和我比較熟悉的人，發現幾乎每次吃飯時，我都會把飯菜掉在襯衫或外套上。我剛剛到經濟研究所工作時，便這樣把一套全新的套裝弄髒了。朋友建議

我，把衣服馬上送到清潔工那裏，請他們幫忙清除掉油漬。我穿著內褲被反鎖在辦公室時，電話響起，不幸的是，清潔工告訴我，他們要到第二天才能處理這件衣服，所以問我是否能夠耐心地等到那個時候。還好這不過是他們的玩笑，沒過多久後，我的褲子就在笑聲中被送回來了。

米哈伊·洛基也講述了他與我交往時的有趣經歷。有一次他在馬特勞哈扎度假時，恰好遇到我，當時我正在那裏緊張地忙於工作。他們約我一起前往散步，我欣然同意了，就在出門前，我一面看著手錶，一面說：「我有一個小時可以用來散步」。這個故事非常可信。即使現在，我每次散步前，都會看著手錶說，現在是「洛基時間」的幾點。

隨後，我們和所有來賓共進晚餐。我的兒子安德拉什在餐桌上，代表所有子女幽默風趣地講了話，然後我的瑞典籍外孫女若非，也用純正的匈牙利語，代表所有孫子孫女說了幾句。最後朱迪特·里姆勒作為所有朋友的發言人，隆重地送給我一塊特別的匾額，上面寫著「學術楷模」四個大字。這的確是莫大的榮耀。「The order of the top dog」，這的確是一項殊榮，因為狗是朱迪特評價最高的動物。

當我環顧四周時，心中感到無比的快樂和感動。我們的三個孩子、所有孫子孫女和布達佩斯所有最親近的親戚，都齊聚一堂，實屬難得。此外到場的還有許多朋友。他們不屬於平時經常見面的朋友圈子。有些朋友相互認識，但有些朋友則是初次見面。那天晚上，讓他們走到一起的，是真心為我祝福的誠摯友誼。

過去，我也曾經參加這樣盛大的宴會。我們家一直有舉行一系列活動，來慶祝生日的家庭傳統，而不會僅僅舉行簡單的慶祝儀式和贈送生日禮物。此外，我也有幸參加其它更加正式隆重的慶祝活動。許多大學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時、法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邀請我的朋友，一起慶祝我榮獲榮譽軍團勛章時，以及同事和朋友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慶祝我的七十歲和七十五歲生日時，都舉行了此類重大的慶典。在我的七十歲生日宴會上，讓我感到格外

榮耀的是，編輯雅諾什·加奇和雅諾什·克勒以及埃里克·馬斯金和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分別向我贈送了兩套紀念文集。[5]這種聚會，每次都會給我帶來莫大的快樂，但是這次蘇莎變魔法似地給我變出來的七十歲生日宴會，尤其讓我快樂，它讓我深切地感受到，有多少關愛和溫暖圍繞在我的身邊。這是我的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刻之一。

哈佛大學：與教學工作說再見

即使在制度變化後，我們仍然繼續每年兩次往返於布達佩斯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同時1989年至1990年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給我在哈佛大學的工作，也帶來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望。

由於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哈佛大學歷來是彙聚眾多蘇聯及共產主義體制研究專家的學術中心。古典經濟學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離開蘇聯後，便一直在哈佛大學工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華西里·里昂惕夫和西蒙·庫茲涅茨，也在那裏工作。這三位學者，都對東半球發生的事情，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所有致力於研究蘇聯、共產主義體制及東歐國家的學者，最終都會聚集在哈佛大學的俄羅斯研究中心。哈佛大學還有一個著名的遠東研究中心，它的工作人員中，有不少是非常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我在哈佛大學工作期間，始終與這些研究中心及那裏的研究者，保持了積極的互動關係，並且經常在那裏，發表演講。

柏林牆的倒塌，在哈佛大學引發了巨大騷動。有那段時間裏，幾乎所有教授的學術興趣，都轉向剛剛誕生的後蘇聯國家和東歐國家。在興趣的驅使下，部分教授還抽出時間和精力，閃電式地訪問了這些國家，或者參加相關的學術會議。此外，包括許多出類拔萃的天才在內的學者，花了幾年的時間，全心地投入對後社會主義轉軌的研究。

當時我的電話經常響起。有些同事即將前往布達佩斯或其它後社會主義國家訪問時，便會給我通電話，以了解那邊的局勢。此

外，我曾受邀在一系列哈佛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我為上千名大學生開設的龐大的經濟入門課程中，用一堂課講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轉方式，以及制度轉變帶來的變化。在牆上鋪著木鑲板的精緻的桑德斯劇院裏給他們授課，真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當我和妻子在坎布里奇生活時，我們定期到桑德斯劇院聽音樂會。

在制度變化後的幾年裏，我經常在教工俱樂部裏，組織「午餐研討會」，邀請所有與後社會主義轉軌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關，並且提出相應建議的教授，參加這種活動。我們定期開展這項活動，所有與會者，都會在餐桌上報告他/她的研究結果，隨後人們便會就此展開妙趣橫生的討論，而且經常會發生激烈的爭論。

新的歷史形勢在學生中激發的興趣，絲毫不亞於教授們。我開設的社會主義制度課程，一向都吸引很多聽眾，聽課的人數，通常都多於其它博士生選修課的學生人數。那時聽課的人數，更是翻了幾倍。到了九十年代後，來自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逐年增加，其中包括許多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烏茲別克的學生，而且和以前一樣，許多中國學生也來哈佛求學。讓我特別感到高興的是，許多匈牙利學生，也出現在課堂上。

我上課前，通常要進行充分的準備工作，但是現在，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政治交替和制度變遷，對比較經濟學、蘇聯問題研究，和所有研究東歐國家的專家，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有些人輕易地放棄了這個研究領域，認為今後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再用到這些領域的知識。而其他像我這樣的學者，則挽起袖子，準備大幹一場。

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已經非常熟悉，而且背後還有幾十年的研究和文獻資料支持著它們。而另一方面，後社會主義地區的制度、政治和經濟結構，以及法律體系，都在繼續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不斷發生變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正如我坦白地告訴學生的那樣，我只能向他們傳授一些**尚不成熟**的初步觀點和材料。但是我認為，即使這樣，也勝於對這個研究課題，保持沉默。

就像「轉軌問題專家」這個名稱暗示的那樣，這種專家，就像曇

花一現一樣，不會長期存在：當轉型期結束時，這種特別的任務和職業，也會隨之消失。但是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種不可能再出現的機遇，那麼人們便會從這個研究課題中，獲得無法估量的寶貴經驗，並且將其應用於多種情況。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驗室，我們可以在那裏，看到偉大的制度轉軌，如何不可思議地在彈指一揮間（用歷史學的術語來說），迅速完成。如今回顧過去，我不會為自己與其他幾位學者，致力於轉型研究而感到遺憾，但是讓我難過的是，經濟學研究（或者進一步說，社會科學研究）並沒有充分利用當時激動人心的研究機遇，來獲得大量有用的信息，並開拓視野。

我剛剛開設關於社會轉軌的課程時，我感到自己，無法獨立充分全面地描述它的整個過程，因此我舉辦了一系列演講，並且邀請了在這個領域裏，頗具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大量學生湧進課堂，並且提出了有趣的問題。然而，我與學生在課下交談時，越來越多人反映課程的內容，過於艱深，他們無法系統地理解這些內容。所有發表演講的學者，都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見解、研究方法及預想。這原本無可非議，但是學生們卻無法把他們聽到的內容組織起來。當社會轉型的輪廓逐漸成形後，我開始嘗試運用統一的結構和思考主線為依托，安排了一系列課程，學生們欣然接受了這種授課形式。但是我不打算用十年前開設社會主義制度課程時使用的方法來授課，也不打算把課堂上傳授給學生的信息，整理成書。儘管現在，的確需要一本專著，來總結社會主義轉軌的種種問題，但是這個工作，還是留給下一代去完成吧。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我來說，似乎已經到了開始考慮退休後的時刻。作為這部分的開場白，請允許我先簡單介紹在美國退休的條件。美國法律嚴令，禁止對僱員作出年齡歧視。只要僱主不再需要僱員，無論後者是三十歲，還是七十歲，前者都可以解僱他，但是法律不允許僱主強迫員工，到達某個特定的年齡時，離開工作單位，譬如說，六十歲或六十五歲。法律規定「年齡」不是僱主解僱員工的理由。而對於大學的終身教授來說，他們不僅可以享受到這種保障，而且同時可以享受到其它特權。我在介紹哈佛大學的體制

時，便提及除非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否則學校無權解僱教授。歸根結底，這意味著與歐洲大學不同的是，美國大學裏享受特權的教授們(其中也包括我在內)，不會因為到了某個年齡，便被強制退休，他們自己決定何時退休。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繼續積極參與學校的工作。

和所有交納社會保險的公民一樣，美國大學的教授享受到的國家養老金，相對較少，通常只能維持基本生活水平。除此以外，大學為所有實際參與學校工作的教職工，設立了非盈利性的私人養老金基金，並且為他們交納保險金。教授們退休後，可以拿到累積的養老金，和相關的基金投資回報，但是其數額卻無法得到保障。這種養老金的數額，首先取決於教授的工作年期和收入水平。其它決定性的因素，還包括學校為基金選擇的投資組合及投資收益。

退休對於美國大學的教授來說，意味著什麼？在收入方面，他們面臨著多種選擇：他們可以一次性拿到所有養老金，也可以每年領取年金，或者以其它形式支取養老金。他還可以要求自己去世後，把養老金留給自己的妻子。如果教授已經在學校裏執教了四十至四十五年，而且在職業階梯上，爬到較高的位置，那麼退休不會導致他的收入銳減。與此同時，退休還為他免除了所有教學和行政工作。如果已經退休的教師，希望從事科研工作，那麼學校通常都會支持他們對科研資金的申請，而且他們有權使用學校裏的房間，或者其它設施。他們可以繼續活躍在大學校園裏，到圖書館看書，經常享用學校的游泳池，參加教工俱樂部的活動，和參加由學校補助的醫療服務計劃等等。總而言之，無論在經濟，還是學術方面，退休都不會給美國的大學教授帶來太多損失，反而讓他們卸除了許多過去承擔的義務。難怪大多數人，最終都會選擇退休。

但是我的情況有所不同，雖然沒有任何法律，或者合同，要求我必須退休，但是我和妻子需要認真地考慮，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是否能夠承擔兩份工作帶來的雙重負擔。這種一年兩次打包–旅行–拆包的生活方式，我們還能承受多久？我們在布達佩斯和坎布里奇分別承擔了許多相似的行政工作，更不要說在兩地工作時，需

要額外付出的努力，這種忙碌的生活，我們還能承受多久？我們不希望等到有一天，突然出現一場大病時，我們才被迫倉促地作出決定。與此相反，我們決定在還有能力高效地完成任務時，結束在美國的工作。

與美國同事不同的是，退休對我們來說，不僅意味著放棄教學工作，減輕工作負擔，而且意味著重大損失。回到匈牙利生活，將使我們遠離哈佛大學、坎布里奇和波士頓令人激動，而且無與倫比的學術和文化環境。此外，在哈佛大學擁有一間辦公室、使用世界上最大的學術圖書館，以及在教工俱樂部裏，與過去的同事共進午餐，對我來說，都變成了空中樓閣般的特權——我無法再實在地享用它們了。

我們再三斟酌後，決定等待2001至2002學年結束後，便終止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然後，我們將永久性地搬回匈牙利，在那裏頤養天年。

我告訴學生，他們將是我教導的最後一屆學生。如今回憶起最後一堂課結束後，他們為我舉辦的溫馨的告別儀式，以及所有人匿名參加系裏的教授測評，為我寫下的溫暖的評價時，我的心裏仍然暖烘烘的。

許多布達佩斯的老年人告訴我，他們的同事和領導退休時，通常是在沒有意義的正式告別儀式中，與他們道別。我可以愉快地告訴所有人，我的退休宴會，充滿了真誠和友善，而且內容豐富。戴爾·喬根森在簡短的講話中，盛讚了我的學術工作和社會工作，不僅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對我的尊敬，而且還體現出他特有的全面性。第二位發言的，是埃里克·馬斯金。他當時已經不在哈佛大學工作，而是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專程趕赴坎布里奇，參加這次宴會。他在講話中，穿插了許多風趣幽默的軼事。他回憶了我們如何合作研究軟預算約束理論，以及如何「對付」同時指導的學生——一群才華橫溢的中國學生。杰弗里·薩克斯說，每次他把自己的文章交給我看時，心裏總是忐忑不安，因為他知道我對任何落在我手裏的文章，都會毫不留情地作出公正的評

判。他認為我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觀點是，我曾經說在獨裁和謬論主宰一切的世界裏，真理只能聽天由命。為此出於對真理的尊重，他把我比作亞當·米奇尼克和瓦茨拉夫·哈維爾。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對我的最高讚美。

這三位經濟學家同事發言後，我的兒子安德拉什走上講臺，用他一慣擅長的善意幽默，根據對家庭生活的體驗，講述了學術和哈佛對我的意義。

我也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講了話。我不能、也不希望表達自己激動的心情。這就像人們，很難用文字，來描述舒伯特的音樂表達的內容一樣：人們在快樂的同時，感到悲傷。我的心中，充滿了對這個工作了十八年的學術環境依依不捨的心情，我曾在這裏學習、授課，並且結交摯友。但是當我想到自己需要拋開這一切時，又感到離別的苦痛。

告別宴會結束後，便是永無休止的告別：我們與朋友依依惜別，漫步在波士頓熟悉的街道和廣場上，在離別前的最後一個晚上，看看我們深愛的哈佛廣場，甚至在深夜還未打烊的書店裏，停留了片刻。

我們還與安德拉什、他的妻子阿吉和孩子們，一一告別。現在我們，只有在他們偶爾回匈牙利時，才能相見。遙遠的地域距離，使得我們很難完全了解米什卡、丹尼和諾里的成長過程。米什卡已經是長大的小夥子，而丹尼和諾里則剛剛上學，正值最可愛有趣的年紀。

我們開始清理奧本山街公寓裏的東西，那裏的每一個物件，都是我們的精心選購，我們小心地把它們擺在家裏。我們把一部分傢具和擺設，送給朋友，還有一部分托運回布達佩斯。搬運工人把裝滿東西的紙箱和板條箱，裝進集裝箱，然後透過海運，送達布達佩斯。

我們彷彿在看一部電影，記錄了我們剛搬到奧本山街公寓時的情景。在離開坎布里奇前的最後幾天，我們又睡在了充氣的橡膠床墊上。我在書房裏，給自己搭起一個臨時書桌和書架，然後在上面

擺上電腦和文件，繼續工作。即使在離開美國前的最後一刻，我仍然還有些工作需要做，或者有些文章需要寫。每次遇到這種情況，蘇莎便會把我稱作「堅定的小錫兵」。我知道她把我比喻為漢斯·安徒生所寫的故事中的小錫兵。我們還用攝像機，攝錄下離開美國前，這些有趣，但是讓人心碎的最後時刻。

告別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們離開美國，踏上了前往歐洲的旅程。我們和以前一樣，先在斯德哥爾摩停留了幾天，探望女兒朱迪特和外孫若非，及外孫女安娜。然後，我們飛回布達佩斯。兒子加博爾和家人婷德、尤爾奇和托米，到機場迎接了我們。我們希望，今後可以經常返回坎布里奇看看，但這和以前到美國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那時我們在布達佩斯生活幾個月後，會回到美國的家裏，享受美國的生活和工作。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無可挽回地結束了。

回家

我們回到布達佩斯後，搬家這個工作，本身就讓我們忙了好一陣子。我們過去居住了二十八年的公寓，位於Dobsinai街上，而且是在三樓。如今，我們每天上落三層樓梯，已經感到力不從心，所以開始尋找有電梯的公寓，最終在Óbuda，找到了理想的公寓。我們用能夠讓我們勾起過去美好生活的東西，裝飾了這所公寓，內裏既有從坎布里奇帶回來的傢具、照片和書籍，也有布達佩斯的老房子裏曾用的傢具、裝飾品和成堆的書籍。

任何曾經搬家的人，都知道這項工作，有多勞神費力。對我們來說，這個工程尤為複雜，因為我們必須把兩個家(即在布達佩斯和坎布里奇的家)，組合在一起。較體力勞頓更辛苦的，是難於抉擇時帶來的情感負擔。我們應該保留哪些東西？把哪些東西送給人？應該丟棄哪些東西？我們曾經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美國朋友，從位於郊區的寬敞住宅，搬到市區裏相對局促的公寓時，也遇到這種取捨的問題。現在輪到我們，看著堆積成山的舊傢具、書籍和過去的論

文而發呆。然而不管怎麼樣，搬家這個工作，卻出現得非常及時。我們與裝修工人見面，與他們討價還價，購買建材，整理書本、唱片和錄像帶，搬家過程中，諸如此類的上千項工作，佔據了我們的所有精力，因此沒有時間來懷舊，或者為離開坎布里奇市而感到傷感。*

「你瘋了嗎？你在美國擁有了一切——工作、家庭、優越的環境——現在還希望回到**這裏**？」我們不止一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

此外，自那以後，我們被很多排擠我們，甚至侮辱我們的人，包圍起來。有時我剛剛開啟電視或收音機，準備收看/聽新聞，便會馬上關掉它們。我不希望聽到那些謾罵、或真或假的對我的「揭發」、刺耳的聒噪之聲，或者泛濫的空洞承諾和膚淺的信息。

除了政治領域以外，我在生活中的其它領域，也曾遇到很多無禮，和缺乏得體的人際交往的行為。當司機在紅燈前，不耐煩地猛按喇叭時；當商店或飯店裏的工作人員，服務不周到時，都會讓我非常惱火。

然而，在這個世界裏，我仍然感到非常舒適自在。即使那些醜陋的行為，對我來說，是非常熟悉。我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我非常清楚，或者基本能夠猜出，司機為什麼為了紅燈，而如此憤怒；或者商店裏的售貨員，為什麼沒有認真工作，而在分心想著其它事情。

曾經有過一個開於匈牙利代表團訪問中國的笑話。毛澤東問代表團的成員，匈牙利有多少人口。聽到回答後，毛說：「你們真不錯！像你們人這麼少，一定所有人彼此都認識。」

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執教，為我打開了很多道扇門，但是在那個

---

* 我建造Dobsinait街公寓的經歷，為我創作《短缺經濟學》提供了靈感。我可以根據1974年和2002年的建房經驗和裝修經驗，寫一篇不錯的個案對比研究，來詳細描述賣方市場如何轉變成成買方市場，以及經濟體系的供應約束如何轉變成需求約束。我們第一次建房時，需要走後門才能買到一個製造方面有些問題的浴缸和二等硬磚。而第二次裝修時，我們可以在塞滿商品的商店裏，從供應齊全的商品中，選擇理想的表面裝飾材料和各種家用設備。

遼闊的國家裏，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而且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在匈牙利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我在這裏生活了七十七年，而且認識許多朋友(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話)。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認識我，但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了解我和我的學術作品。只要我希望部長聽取我的意見，他一定會安排與我見面。而我給報紙的總編通電話時，也不需要花很長時間進行自我介紹。

儘管離開美國後，我與兒子安德拉什及其家人的距離拉遠了，但是現在，我們與住在布達佩斯的加博爾一家，更加親近，而且從布達佩斯到瑞典看望女兒朱迪特一家，也較從坎布里奇飛往那裏，方便得多，更不用說現在我國已經是歐盟成員國。讓我們感到特別興奮的是，現在我們可以和長大成人的孫子尤爾奇(他已經成為高中老師)，和讀大學的若非、安娜，以及托米，談論一些嚴肅的話題。我的電腦出問題時，也完全可以依賴托米的專業幫助(當然我們不能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來考慮這種問題。雖然我們和身邊的孩子、或者孫子、孫女在一起時，盡享天倫之樂，但是這並不能補償我們，對遠在異國他鄉的孩子及孫子、孫女的思念之情)。

我們已經再次適應了在匈牙利定居的生活，不過偶爾也會到其他地方作短期訪問。當然，我們也非常懷念過去的那種感覺。當我們厭倦了國內的混亂狀態時，便可以馬上搭乘飛機，把匈牙利的緊張局勢和各種問題，拋諸腦後，飛向坎布里奇給我們提供的平靜、靜謐、美好的生活。*每當我們為此懊惱不已時，便會用另外一種想法，安慰自己：我們終於不必在夏末，便開始手忙腳亂地打包，準備踏上歸程，或者忙著開始修改教案。在過去的十八年裏，我們始終以六個月，或者一整年為周期，調整我們的生活節奏，而且那種往返於兩地的生活，把每一年都分割得支離破碎。現在，我們可以平靜地度過每一天。

---

* 但是，美國只為每年在那裏旅居幾個月的匈牙利人，提供了這種寧靜安定的生活。我們終究是局外人，沒有像美國朋友那樣經歷美國的政治風暴或緊張的公共局勢。

我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家裏了。

「您現在在研究什麼？」

這是每次我與朋友或熟人見面時，他們經常問到的問題。我幾乎無法想像，當我告訴他們「什麼都沒有研究」時，他們會出現怎樣的表情。我已經獲得兩個榮譽退休教授的稱號——哈佛大學和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都授予了我這個稱號。我有權利停止工作，而且我們即使不再繼續工作，也可以衣食無憂地安享晚年。

我必須停止工作的那一天，終將到來，但是現在我仍然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由於現在我仍然擔任國際經濟學會（IEA）的會長，所以承擔著各種相關職責。我的會長職務，將於2005年國際經濟學會世界大會後結束。此次會議，計劃於摩洛哥召開。它邀請了幾百名學者，並且將會發表很多論文。當然，許多人在協助我完成這項工作，但是作為會長，我終究要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我已經開始著手準備自己的主席發言，而且作為第一任來自東歐國家的會長，我將像人們期望的那樣，著重討論後社會主義轉型期出現的問題——或者探討更具有普遍性的偉大歷史轉型期的特點。我準備在會長任期屆滿後，繼續把它們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領域。

與此同時，我把許多任務，暫時放在一旁，專心寫作這本自傳。對於一個在過去幾十年裏，專心寫作專著和學術文章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個從未嘗試的體裁。現在到了停筆的時候了，還有很多工作在等待著我。

注釋

以下是匈牙利檔案中常用的縮寫。本文在注釋中，將會經引常用它們：

ÁBTL　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a（匈牙利國家安全局歷史檔案館）

IH　Információs Hivatal Levltára（匈牙利共和國信息辦公室檔案館）

MOL　Magyar Országos Levéltár（匈牙利國家檔案館）

MTALt　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 Levéltára（匈牙利科學院檔案館）

OHA　Oral History Archívum（口述歷史檔案）

PIL　Politikatörténeti és Szakszervezeti Levéltár（政治歷史和工會制度檔案館）

1. 我的家庭和青年時代：1928–1944年

1. 關於關押在Rökk Szilárd街希伯來語神學院的猶太人質的具體情況，請參考布雷厄姆和Brámer的著作（Braham, 1981, 1:482–483 ; Brámer, 1997[1972]）。
2. Fóthy（1945）。儘管Fóthy的著作，並沒有直接提到我父親的名字，但是它證實了被關押在Rökk Szilárd街的律師，被轉移到Horthy-liget後，很快便被送往死亡集中營。
3. 布雷厄姆，1981, 2:325; Thassy, 1996, 第372–376，394–396，418–419頁。

2. 我如何成為共產主義者：1945–1947年

1. 斯大林（1953[1940]）, 6:47。
2. 奧迪，2004，第724頁。
3. 盧卡奇（1973[1945], 1978[1950]）。
4. 請參考雷茲的著作（Réz, 1961），以了解托馬斯·曼在二十年代早期對此發表的評論。

3. 在共產主義報社工作：1947–1955年

1. ÁBTL V-145-288-a, 第514–515頁。日期：1950年6月14日。
2. 科爾奈（1951d），第5頁。
3. 科爾奈（1951c）。
4. 科爾奈（1951b），第1頁。
5. 科爾奈（1951a），第1頁。

4. 覺醒：1953–1955年

1. 我無法準確地回憶1953年後，我閱讀了卡德爾的哪些著作。我以卡德爾的論文集，作為參考的依據：編輯把一些相對來說比較重要的卡德爾著作，附在附錄中，其中包括1945年至1955年間，他就自我管理問題發表的演講和文章中提到的相關著作（卡德爾，1982）。我猜自己當時應該閱讀了這些文章。
2. 蘭格（1968 [1936–1937]）。
3. 科爾奈（1954b）。
4. 科爾奈（1954c）。
5. 伊姆雷·納吉（1954），第169頁。
6. 伊姆雷·納吉（1954），第132頁。
7. 科爾奈（1954a）。
8. 我回憶這次「叛逆派」會議時，參考了阿克塞爾和梅勞伊（1960）；肯德（1966）；勒切伊（1995）；C·納吉（1994）和紹洛伊（1994）等人的著作。匈牙利國家檔案館關於這次會議的記錄，保存在MOL M-KS 276.f.89/206 ö.e.裏，其中包括與《人民自由報》有關的勞動人民黨KV宣傳部文件，例如1954年10月22日、23日和24日的會議紀要，以及這次會議作出的決議和宣傳部彙報這次會議情況的報告。
9. 阿克塞爾和梅勞伊（1960）。
10. MOL M-KS 276. f. 89/206 ö.e. pp. 161–219。
11. MOL M-KS 276. f. 53/205 ö.e.pp. 1–3, 7–76。
12. MOL M-KS 276. f. 53/206 ö.e. pp. 31–51, 73–79。
13. MOL M-KS 276. f. 53/206 ö.e. p. 34。
14. MOL M-KS 276. f. 53/206 ö.e. pp. 73, 74, 76。
15. MOL M-KS 276. f. 53/208 ö.e.和276. f. 53/206. ö.e.。
16.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özponti Vezetösége（1955）。
17. MOL M-KS 276. f. 53/228 ö.e.。

5. 開始從事研究工作：1955–1956年10月23日

1. 利斯卡和馬里亞什（1954）。
2. 赫格居斯（1990）。
3. 黑勒（1988）。
4. 彼得（1954，1956）。
5. 肯德（1955）.這份手稿，現在保存在作者手中。
6. ÁBTL V-145-288/文件2，第325–326頁。山多爾·費克特的供詞。第2點和

第5點。日期：1958年12月18日。

7. 彼得里(2001)，第51頁。如果想了解更廣泛的調查結果，請參閱彼得里(1997)的著作。
8. 科爾奈(1994b [1959])，第viii–ix頁。
9. 科爾奈(1994b [1959])，第27頁。
10. 科爾奈(1994b [1959])，第112頁。
11. 科爾奈(1994b [1959])，第114頁。
12. 科爾奈(1994b [1959])，第146頁。
13. 科爾奈(1994b [1959])，第215頁。
14. 科爾奈(1994b [1959])，第236頁。
15. MTALt, TMB 891/368. 雅諾什·科爾奈論文答辯紀要。日期：1956年9月24日。請參閱埃塞(1956)的著作。
16. MTALt, TMB 891/368. 第41頁。我直接引用了檔案中捷爾吉·彼得的原話，只是在語言表達上，略微進行修改。
17. 當時瑪利亞·奧古斯丁諾維奇的夫姓，是格羅·Tamásné(即陶馬什·格羅夫人)。我的論文答辯紀要中，記錄了她在答辯時，使用了她的娘家姓。
18. MTALt, TMB 891/368. 第2–11頁。
19. 我個人收集的文件中，包括這份改革提案的複件。
20. 科爾奈(1956)。

6. 匈牙利革命及其結果：1956年10月23日–1959年

1. ÁBTL V-150-352/文件1，第442頁。日期：1957年4月16日。MOL XX-5-h. 1.d.3.k. 第92–97頁。日期：1957年7月13日。我參與政府計劃制訂工作的經歷，也被記錄在我的犯罪記錄中(我的犯罪記錄的文件序號為ÁBTL C-R-N 0082-479-2。我看到它的複件上的日期，是1966年12月21日，那麼在此之前，一定有類似的文件。)。
2. 維達(1992)，第34頁。
3. 吉邁什(1956)。
4. 哈爾達(2002)，第167頁。
5. 科爾奈(1990a [1957])，第6頁。
6. 埃塞(1956)。
7. 彼得(1957)。
8. 蓋佐·里普(1957)，第3頁。
9. 莫爾納(1957)，第45頁。

10. 古亞什(1957–1958),第31頁。
11. 科爾奈(1994b [1959])。
12.《無所事事的官僚主義者》(1960);R.N.W.O.(1959);德文斯(1959)。
13. 史普博(1960),第763頁。
14. 諾夫(1960),第389頁。
15. MOL M-KS XX-5-h. 50.d. 1.k. 第48–54頁。日期:1957年3月20日;MOL M-KS XX-5-h. 52.d. 1.k. 第10-13頁。日期:1958年5月8日。
16. MOL M-KS XX-5-h. 1.d. 4.k. 第57–59頁。日期:1957年4月16日。
17. MOL M-KS XX-5-h. 86.d. 第5卷,第49–67頁。P. P. 的審訊報告。審訊官提到的這份報告,可以在第51頁找到。第51至54頁,討論了吉邁什準備發行一份新報紙的計劃,以及記述了報紙的實際發行情況。日期:1957年4月10日。
18. MOL M-KS XX-5-h. 1.d. 4.k,第57–59頁。
19. MOL M-KS XX-5-h. 86.d. 4和5.k。
20. 以「匈牙利人」為筆名發表的這篇文章,完成後很快便遭到封殺。只有少數幾篇油印的複件,在很小的朋友圈子裏傳閱。直到1989年,它的匈牙利語版,才得以透過正規途徑印刷後正式出版。
21. 1957年費伊特撰文評論了「匈牙利人」的文章。布魯塞爾的伊姆雷·納吉研究所於1959年,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沒有進行任何刪減。
22. ÁBTL V-145-288/文件3,第482–492頁。約爾斯·瓦西利烏的審訊報告。日期:1959年6月11日。請參閱瓦西利烏的著作(1999)。
23. ÁBTL V-145-288/文件2,第327頁。山多爾·費克特親手所寫的供詞,第11點。ÁBTL V-145-288/文件3,第482–492頁。約爾斯·瓦西利烏的審訊報告。日期:1959年6月11日。請參閱瓦西利烏的著作(1999)。ÁBTL V-145-288/文件9,第156–160,233頁。
24. 諾沃馬茨基(1956),第1頁。
25. ÁBTL V-145-288/文件3,第482–492頁。約爾斯·瓦西利烏的審訊報告。日期:1959年6月11日。請參閱瓦西利烏的著作(1999)。ÁBTL V-145-288/文件2,第326頁,山多爾·費克特親手寫的供詞,第7點。
26. ÁBTL V-145-288/文件2,第327頁。山多爾·費克特親手所寫的供詞,第8點。

7. 我的大學:1957–1959年

1. 薩繆爾森(1980)。
2. 阿羅(1951)。

3. 哈耶克(1975，[1935])。
4. 希克斯(2001，[1939])。
5. 薩繆爾森(1983)。
6. 丁伯根(2004)[1954]。
7. 哈耶克(1975)[1935]。
8. 蘭格(1968，[1936–1937])，第70頁。
9. 肯德(1959)。
10. 科爾奈(1959)。
11. 肯德(1964)。
12. 科爾奈(1958)。

8. 數理模型的經濟學應用：1957–1968年

1. 科爾奈和利普塔克(1959)。
2. 科爾奈和利普塔克(1962b)。
3. 布羅迪(1970)。
4. 薩繆爾森(1983)。
5. 科爾奈和利普塔克(1962a)。
6. 科爾奈和利普塔克(1971，[1965])。
7. 阿羅(1971)。
8. 馬林沃(1967)。
9. 阿羅(1973b，[1963])。

9. 西方之行：1963年後

1. 科爾奈(1967b)。
2. 馬林沃和巴卡拉克(1967)。
3. 尤哈斯(1934)。
4. ÁBTL M 13417/1。關於我的報告和相關評價，寫在這個文件的第35頁。這份報告，表明情報人員，曾於1960年6月10日與我交談。這本厚厚的卷冊內，不僅包含其它內容，而且收錄了關於我的報告。它的建檔時間，可以追溯到1957年6月25日。
5. 秘密警察要求R.R對我進行調查，並寫下調查報告的命令，在檔案室裏的參考編號是IH IV/1-A，它的建檔日期，顯示為1964年4月15日。R·R彙報我的情況時，所寫報告的參考編號是35-634/65和2/B-530，建檔日期顯示為1965年5月4日。

我應該在這裏強調的是，我在附注裏引用的這些參考編號，都來源於匈牙利共和國信息辦公室(IH)為我提供的文件複件中。我猜測它們的原件，是從政治制度解體前，與信息辦公室對應的法律機構的記錄中，抽取出來的，而原件的參考編號，僅供內部使用。我無從查到這些編號、信息辦公室為我提供的所有文章，以及其後的注釋中引用的此類文件，都屬於這種情況。

6. IH 134-216/64。X·X彙報我的情況時所寫的報告。日期：1964年3月2日。
7. IH Ⅵ/4-A. 日期：1964年3月26日。
8. 凱奈迪(1996)，第438頁。凱奈迪在腳注中，說明他的術語表建基於機密文件《國家安全術語詞典》(Állambiztonsági Értelmezö Szótár)上。內務部於1980年出版了這本詞典，凱奈迪在自己的術語表中，補充了從其它來源中搜集到的詞彙。
9. 1966年，在申請護照時，他們寫了第一份專業評估。後來其它文件，也提及這篇評價，我從這些文件中，引用了上述段落。後面一份文件是IH 40-27-245/64，213-3019，上面顯示的日期，是1964年7月12日。
10. 這份複印件上，勉強可以辨認出來的參考編號是IH Ⅲ/Ⅰ-1-A.8153。
11. 庫普曼斯和蒙蒂亞斯(1971)。
12. 蒙蒂亞斯申請表上的IH參考編號，已經找不到了。信息辦公室提供的蒙蒂亞斯案相關文件複印件的第18–22頁上，載有這份申請表。
13. IH 34-4-797/1965。日期：1965年4月23日.
14. 大隊長Z·Z的報告。IH 34-A-1027/1965。日期：1965年5月26日。
15. IH 34-4-797/1965。日期：1965年4月23日。第一頁上有手寫的序號。
16. IH 59/2581-4/1965。日期：1965年11月22日。
17. IH 189-193/66。日期：1966年5月18日。IH 189-191/66。日期：1966年5月19日。IH 189-220/66。日期：1966年6月6日。
18. Bolygó (1966)。
19. 蒙蒂亞斯(1976)和科爾奈(1978)。
20. ÁBTL 0004-470-5-MRG. 第24頁。日期：1971年4月1日。
21. ÁBTL 0004-470-5-MRG. 第47頁。日期：1989年1月29日。
22. 蒙蒂亞斯(1982, 1989, 2002)。

10. 與主流經濟學思想唱反調：1967–1970年

1. 科爾奈(1967a)。
2. 科爾奈(1968)。
3. 諾伊曼(1963[1955])，第100–101頁。

4. 科爾奈(1991)，第367頁。請參閱海森堡(1967[1958])的著作第231–232頁，以了解「數理晶體」這個概念的內容。
5. 阿羅(1974)第254頁；西蒙(1979)，第508頁。
6. 我在一份周報上，讀到海頓的這句話，但是無法查到它的準確來源。不過，我還是引用了它，因為我相信海頓曾說這樣的話，而且它清楚地闡明了我的觀點。
7. 哈恩(1973)，第330頁。

11. 研究所、大學和科學院：1967年後

1. 選自阿蒂拉·尤若夫的詩歌《安慰》(Vigasz)(1933)；尤若夫(2003)，第390頁。
2. 科爾奈、科瓦奇和施密特(1969)。
3. 這封信的複件，一直保存在我的文件檔案中。
4. 正是蒂博爾·胡薩爾提醒我，注意從哪些資料入手，可以了解我當選為院士的整個過程：MOL M-KS 288. f. 36/1. ö.e. 第9頁。
5. MOL M-KS 288. f. 5/675. ö.e. 第10頁。
6. MOL M-KS 288. f. 5/675. ö.e. 第10頁。
7. MOL M-KS 288. f. 5/682. ö.e. 第3頁。
8. MOL M-KS 288. f. 5/682. ö.e. 第7頁。

12. 尋路之旅和準備工作：1971–1976年

1. 科爾奈(1972)。
2. 科爾奈(1972)，第5頁。
3. 赫希曼(1988 [1958])；斯特里恩(1959)。
4. 這份邀請信保存在我自己建立的檔案中。
5. 科爾奈和馬爾托什(1973)。
6. 科爾奈和馬爾托什(1981)。
7. 科爾奈和馬爾托什(1981)。
8. 科爾奈(1974)。

13. 終於完成了短缺經濟的研究「拼圖」：1971–1980年

1. 科爾奈(1980)，第569頁。
2. 安德拉什·布羅迪讀者報告的複件，保存在我自己建立的文件檔案中。
3. 拉喬斯·法盧韋紀讀者報告的複件，保存在我自己建立的文件檔案中。

4. 1980年10月4日，這篇短文發表在周報《生活與文學》(Élet és Irodalom)上，上面標注著bes。
5. 科爾奈(1979)。
6. 卡拉喬多夫(1982)。
7. 巴羅和格羅斯曼(1971)。
8. 反映巴羅、格羅斯曼和波特斯學術思想的經典著作，是波特斯和溫特於1980年出版的專著。
9. 耶金和斯坦尼斯勞(1998)，第277頁。
10. 霍夫曼(2002)，第89–90頁。

14. 取得突破：1979年後

1. 科爾奈、馬斯金和羅蘭(2003)。
2. 科爾奈和韋布爾(1983)。
3. 戈德費爾德和匡特(1988，1990，1993)。
4. 德沃特里龐和馬斯金(1995)。
5. 我與雜誌社編輯的通信及讀者報告，都保存在我自己收集的文件中。
6. 科爾奈(1986b [1980])。
7. 希克斯(1937)。
8. 阿羅(1973a)。
9. 熊彼特(1983 [1934])。
10. 阿吉翁和豪伊特(1998)。
11.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這種說法，它的作者誤以為這句話，來源於凱恩斯，但事實上，這是維爾頓·卡爾的名言。請參閱肖夫(1942)的著作第323頁。

15. 溫和冷靜的批判：1968–1989年

1. 科爾奈(1983a)，第229頁。
2. 科爾奈(1982)。
3. 我從口述歷史檔案(第39號採訪，第346頁)對蒂博爾·利斯卡的採訪中，引用了這段話。我只對這次採訪的書面記錄，作了少許語言上的修改。
4. 塞納希(1983)。
5. 科爾奈(1986b [1980])，第137頁。
6. 蘭捷爾(2002)，pp. 157–158。
7. 塞格(1983)。
8. 科爾奈(1984)。

9. 陶爾多什(1982, 1988a, 1988b)。
10. 科爾奈(1986c)，第1733–1734頁。
11. 這段文字，節選自這本教材的第一版(格雷戈里和斯圖爾特(1980)，第299頁)。兩位作者，在它其後的幾個版本中，更加準確地敘述了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如果想了解最近的版本，請參閱格雷戈里和斯圖爾特(2004)的著作)。
12. 米勒(1999)詳細地描述了彙報「每日情報匯總」的目的，以及收集信息和系統化地整理信息時使用的方法和組織。
13. ÁBTL NOIJ III/1-218-265/6，第3頁。日期：1981年12月10日。
14. ÁBTL NOIJ III/II-80，第5頁。日期：1985年4月26日。
15. ÁBTL 手寫的註解，附加在文件ÁBTL NOIJ III/II-80A後面。

16. 哈佛：1984–2002年

1. 羅索夫斯基(1990)，第194–195頁。
2. 薩繆爾森(1983)。
3. 這封信保存在我自己收集的文件中。

17. 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年後

1. 紹科爾曹伊(2001)，第92頁。
2. 科爾奈(1988b)，第737，739頁。
3. 科爾奈(1988a)。
4. 森(1988)。
5. 林德貝克(1988)。
6. 1985年，中國《經濟日報》的出版社，出版了這次會議的論文精選集。它的題目譯成中文是《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國際經濟管理會議論文精選集》。由於我不確定這本書的編輯是誰，所以沒有把這本書，加入本自傳的參考書目中。

   此次大會上提交的部分論文，仍然保留在我收集的文件檔案中。

18.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綜合性研究：1988–1993年

1. 科爾奈(1992c)，第xxi頁。
2. 考爾紹伊(1993)，第19頁。
3. 沙瑪(1989)，第xiii頁。
4. 科爾奈(1992c)，第xix頁。
5. 諾夫(1992)，第23頁。

6. 諾夫(1992)，第23頁。
7. 埃里克森(1994)，第495，497頁。
8. 克勞斯(1994)，第158頁。
9. 克勞斯(1994)，第157頁。
10. 這封信的複件，保存在我收集的文件中。

19. 轉捩點：1989–1992年

1. 科爾斯(1999)。
2. 帕斯爾(1990)；博斯沃思Bosworth(1990)；紹爾戈(1990)；Gy(1991)；登頓(1990)。
3. 科爾奈(1990b)。
4. 科爾奈(1992b)。
5. 科爾奈(1992a)。
6. 科爾奈(1993a)。
7. 科爾奈(1990c)，第72–73頁。
8. 塞加夫里(1990)，第5頁。
9. 謝姆延(1990)，第7頁。
10. 科爾奈(1990c)，第82頁。
11. 這些往來信件的複件，都保存在我收集的文件中。
12. 薩繆爾森(1990)，第7頁。
13. 克勞斯和特日什卡(1997 [1994])，第167頁。
14. 科爾奈(1990c)，第78–79頁。
15. 1996年匈牙利中央統計局報告，第314頁。
16. 科爾奈(1990c)，第211頁。
17. 這次圓桌會議的文件，被整理成八卷論文集，並正式出版。第五卷裏收錄了關於經濟政策的重要文件：Z·里普(2000)，第15–79，571–633頁。
18. 請參閱洛基(1989，1990)對各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制訂的經濟政策計劃的調查報告。
19. 「藍綬帶委員會」的成員，是匈牙利和外國的專家，而「橋樑組織」的成員，則全都是匈牙利經濟學家。這兩個委員會，都於1990年，發布了自己的經濟建議書。請參閱Kék Szalag Bizottság(1990)和Híd-csoport(1990)
20. 雷蒂(1989)，第5頁 。

20. 遊走在科學與政治的邊緣：1990年後

1. 科爾奈(1992d)。
2. 科爾奈(1995b)。
3. 索洛(2000)，第408頁。
4. 科爾奈(1997b)，第100–120頁。Duna電視臺於1995年4月9日，報道了拉斯洛·若爾特·薩博對我的採訪。
5. 布洛霍(2003)。
6. 科爾奈(1992d)。
7. 瓊托什，科爾奈和托特(1996，1998)。
8. 科爾奈(2000a)。
9. 科爾奈(1998a)。
10. 科爾奈和翁笙和(2001)(它的匈牙利語版，發表於2004年，科爾奈和翁笙和(2004a))。
11. 這些往來信件的複件，都保存在我收集的文件中。
12. 這封信的複件，保存在我收集的文件中。
13. Arcanum出版社出版的1990–2002年CD Országgyü lési Napló(即1990–2002年議會期刊)，和在互聯網上，都可以找到這些議員，在議會上發表演講的稿件。我們根據不同的標準，統計了它們的參考書目，並且總結了我的文章，被議會引用的次數。相關圖表保存在我收集的文件中。

21. 繼續我的學術之旅：1990年後

1. 科爾奈(1983b)。
2. 加謬(1991 [1948])，第128頁。
3. 科爾奈(1986b [1980])，第ix頁。
4. 科爾奈和羅斯–阿克曼(2004)；科爾奈，羅特施泰因和羅斯–阿克曼(2004)。
5. 加奇和克勒(1998)；馬斯金和西蒙諾維茨(2000)。

年代表

本年代表的選取，並非以事件的歷史意義為標準，選擇收入本年代表的事件——許多非常重要的事件，並沒有包括在內——而是使用了相對比較狹窄的標準，幫助讀者了解自傳中描述的事件的歷史背景。某些條目中提及的歷史事件，顯然沒有在匈牙利發生，而有些事件，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但是確曾在匈牙利發生。

1921年4月14日	隨著1919年短暫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形成的白色恐怖氣氛，逐漸消散。伊斯特萬·拜特倫伯爵組建了新政府，和建立了統一的半獨裁半議會制政體。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擔任德國總理。
1938年3月12–13日	奧地利被德國吞併。
1938年5月29日	第一部所謂的猶太人法案，為某些行業中的猶太人比例，以及猶太人在公共服務部門的任職級別，設定了上限。
1939年3月15日	德國軍隊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
1939年5月5日	議會通過了第二部所謂的猶太人法案，進一步削減僱用猶太人的比例，並且為猶太人增加了更多限制。
1939年9月1日	德國攻擊波蘭，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1年4月6日	德國軍隊襲擊南斯拉夫。
1941年4月11日	匈牙利與德國，共同對南斯拉夫宣戰。
1941年4月16日	匈牙利發布政府令，要求所有男性猶太人服勞役。
1941年6月22日	德國進攻蘇聯。
1941年6月26日	匈牙利與德國結成聯盟，並參與對蘇作戰。

1941年8月8日	第三部猶太法案頒佈，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
1941年12月12日	匈牙利對美國宣戰。
1943年1月12–2月3日	匈牙利軍隊在頓河灣附近的蘇聯前線，遭受毀滅性打擊。
1944年3月19日	德國軍隊佔領匈牙利
1944年5月15日	政府開始把匈牙利各省內的猶太人，集中一起，並驅逐出境。
1944年6月6日	盟軍在諾曼底登陸。
1944年8月27日	第一支蘇聯軍隊穿越匈牙利邊境。
1944年10月15日	匈牙利的國家領導人米克洛什·霍爾蒂，在電臺中宣布匈牙利的停戰聲明。匈牙利的納粹分子箭十字黨，乘機奪取政權。第二天霍爾蒂，任命箭十字黨的領導者弗倫茨·薩拉希為總理，然後辭職。
1944年12月21日	臨時議會在脫離德國/箭十字黨控制的匈牙利東部德布勒森市，召開會議，並於第二天成立臨時性全國政府。
1944年12月26日	蘇聯軍隊合攏對布達佩斯的包圍，並且開始攻城。
1945年1月18日	蘇軍攻克了位於多瑙河東岸的佩斯。
1945年2月4–11日	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召開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13日	蘇聯軍隊對布達佩斯，圍攻了一個半月後，把布達佩斯從德軍及其匈牙利納粹聯盟手中，解救出來。
1945年4月12日	匈牙利領土上的所有戰爭結束。
1945年8月6日	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
1945年9月2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11月4日	右翼小農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57%的選票。
1946年3月5日	丘吉爾訪美時，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

	講話，稱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
1946年8月1日	匈牙利政府發行了新的貨幣單位福林後，成功地終止了金融史上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
1946年11月28日	匈牙利在大規模經濟國有化的第一個階段，把所有國家級的大型企業，收歸國有。
1948年6月12日	匈牙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後，實現了一黨制。
1948年6月28日	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機構COMINFORM（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公開譴責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
1949年1月25日	在莫斯科成立了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經濟合作的機構——COMECON（經濟互助委員會）。
1949年9月16–24日	匈牙利仿效蘇聯的大規模肅反運動，對叛國者進行了公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拉斯洛·勞伊克，成為這次清洗運動的主要目標。
1949年10月15日	拉斯洛·勞伊克和其他被政府起訴的同伴，被處以死刑。
1949年12月10日	匈牙利議會頒布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1949年12月28日	匈牙利對員工超過十人的公司，一律實行國有化。
1951年6月17日	匈牙利國內的主要日報《自由的人民》，發布了政府的命令，　要求把「過去的剝削者」，趕出布達佩斯。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逝世。
1953年6月17日	柏林爆發起義，反對共產主義體制和蘇聯佔領東德。

1953年6月27–28日	匈牙利共產黨——勞動人民黨(MDP)的黨中央，通過「六月決議」，糾正匈牙利在政策上出現的失誤，並作出補救措施。
1953年7月4日	伊姆雷·納吉出任匈牙利總理。
1953年7月26日	匈牙利取消了拘留制度(即把沒有接受審判的犯人，扣留在集中營裏)和流放政治犯的制度。在此前的一天，政府宣布赦免部分犯人。
1955年3月9日	《自由的人民》發表了共產黨黨中央的決議，宣布放棄後斯大林時代的黨政方針。
1955年4月14–18日	伊姆雷·納吉被解除了總理職務和所有黨內職務。
1956年2月14–25日	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發表講話，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1956年6月28日	波蘭的波茲南爆發工人起義。
1956年10月19–21日	波蘭政治局勢的轉捩點，哥穆爾卡當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後，宣布大赦政治犯，並且開始進行改革。
1956年10月23日	布達佩斯爆發大革命。
1956年10月24日	伊姆雷·納吉被任命為總理。遊行示威者和蘇聯及匈牙利的武裝部隊，在布達佩斯城內多處地點交火。騷亂迅速向其它城市蔓延。
1956年10月29日	蘇聯軍隊開始從布達佩斯撤出。第二天伊姆雷·納吉宣布，一黨制結束，並組建了新的多黨聯合政府。組成聯合政府的黨派，都是在共產黨實行一黨制前，活躍在匈牙利政壇上，並且借助布達佩斯大革命復蘇的黨派。

1956年10月29日	第二次阿拉伯–以色列戰爭爆發。
1956年11月1日	匈牙利從《華沙條約》中退出。
1956年11月4日	蘇聯軍隊進攻布達佩斯，並且幫助雅諾什·卡達爾，強行建立了忠於蘇聯的新政權。
1956年11月11日	布達佩斯的武裝抵抗，全部終止。
1956年11月22日	伊姆雷·納吉與他的同夥遭綁架，囚於羅馬尼亞。
1957年9月10日	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匈牙利問題」。
1957年10月4日	蘇聯成功把世界上第一顆圍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送入太空軌道。
1958年6月16日	革命政府的總理伊姆雷·納吉、國防部長帕爾·毛萊泰爾和記者米克洛什·吉邁什，被處以死刑。
1959年3月19日	匈牙利政府頒布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命令，由此預示匈牙利將掀起集體化的新浪潮。
1961年8月13日	東德開始建造「柏林牆」。
1961年8月26日	政府對參加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一批叛亂者，執行死刑，標誌著因是次革命引起的一系列政治死刑，最終結束。
1963年3月22日	政府宣布赦免所有因為參與1956年革命，而遭到迫害的人員。
1964年8月7日	美國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批准在越南直接實行軍事干預。
1966年5月16日	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
1968年1月1日	匈牙利開始推行「新經濟機制」。
1968年1月3–5日	改革派共產主義者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968年5月2日	毗鄰巴黎的法國南特大學校長，因為學校內的騷亂，關閉學校。接下來幾天裏，爆發學生的示威遊行。

1968年8月20–21日	蘇聯、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聯合軍隊，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罷黜杜布切克政府，並且終結了「布拉格之春」。
1969年7月21日	美國宇宙飛船登月成功。
1970年12月14–18日	波蘭工人因為物價上漲而舉行遊行，政府當局在多個地點，向遊行群眾開槍射擊。
1972年5月22–30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莫斯科，並簽定了《第一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SALT-1)。
1972年11月14–15日	匈牙利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MSZMP)——的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宣布將會限制經濟改革。
1975年8月1日	歐安會第三階段會議，簽署《赫爾辛基協議》，成為緩和政治緊張局勢的重大事件。
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逝世。
1978年1月6日	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布達佩斯，並歸還匈牙利的國家象徵——聖冠。
1979年12月26–27日	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
1981年12月初	匈牙利非法出版物《Beszélö》，發行創刊號。
1981年12月13日	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宣布，波蘭進入緊急狀態。政府取締了團結工會，並逮捕其領導人。
1982年5月6日	匈牙利獲准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982年7月7日	匈牙利獲准加入世界銀行。
1985年3月11日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當選蘇聯共產黨的新任總書記。
1985年6月14–16日	反對政府的知識分子，在布達佩斯附近的Monor，召開會議。
1985年11月19–20日	戈爾巴喬夫和里根首次進行首腦會晤，此後多次舉行會談。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接受了「glasost」(開

	放性)和「perestroika」(新思維)的改革計劃。
1986年10月	匈牙利改革派經濟學家，完成了旨在總結其觀點的文件《變化與改革》。
1987年8月23日	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爆發反蘇遊行。
1987年9月27日	在匈牙利東部村莊Lakitelek召開的著名會議，成立匈牙利民主論壇。它在1990年第一屆自由普選的第一輪中，贏得絕大多數選票，進而組建了聯合政府。
1988年5月20–22日	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雅諾什·卡達爾，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他在匈牙利的執政時間，長達三十二年。
1989年2月10–11日	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公開宣布實行多黨制。
1989年6月13日	匈牙利的執政黨與反對黨，召開「國家圓桌會議」，進行談判，以實現和平過渡。
1989年6月16日	伊姆雷·納吉及其他同時犧牲的烈士，被重新安葬在布達佩斯。
1989年11月9日	柏林牆開始被拆除。
1990年4月8日	匈牙利舉行自由選舉。
1990年5月29日	鮑里斯·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
1990年6月25日	斯洛文尼亞宣布獨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開始瓦解。
1990年10月3日	東德和西德實現統一。
1991年6月19日	蘇聯軍隊全部撤出匈牙利。
1991年7月1日	共產主義國家的軍事聯盟——華沙條約組織——宣布解散。
1991年12月26日	蘇維埃立法機關宣布，蘇聯解體。
1997年7月8–9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宣布，開始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進行入盟協議談判。

2001年9月11日	恐怖分子襲擊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特區附近的五角大樓。
2004年5月1日	匈牙利與其它九個國家加入歐盟。這十個新成員國中，有八個國家曾是社會主義國家。

術語表

本術語表中的材料，來源自作者自建的檔案。按漢語拼音排序，人名則按名字而非姓的字首。

ÁVH（即國家安全局，Államvédelmi Hatóság） 1945年2月，匈牙利模仿蘇聯肅反委員會，及後來成立的相似機關，而建立的政治警察組織。在1956年革命期間，它成為公眾憤怒聲討的首要目標，因此被政府解散。這個機構，從成立初期便開始從共產主義者中，招募成員。雖然從名義上來說，國家安全局向首相負責，但實際上，它的最高負責人，直接受共產黨領導人馬加什·拉科西控制（請參閱下文的相關條目）。ÁVH承擔了「黨國」在斯大林時期鎮壓叛亂的責任。它的成員將其稱作「黨的拳頭」。

艾爾諾·格羅（1898–1980） 匈牙利共產主義政治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格羅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西班牙內戰中擔任政委。1945年他出任匈牙利的交通部長，並且積極地投身提升共產黨威信的工作中。1953至1954年，格羅擔任內務部部長，並且在1956年7月，馬加什·拉科西被趕下臺時，出任黨中央第一書記。作為五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時代的匈牙利四大核心領袖（另外三位是拉科西、尤若夫·雷沃伊和米哈伊·法爾卡斯），格羅主要負責經濟事務。他是共產黨黨內，最出色的官僚和組織者。在1956年匈牙利大革命期間，格羅逃往蘇聯，但在1960年重返匈牙利。1962年他因為在拉科西時代，從事非法活動，而被開除黨籍，自此一直從事翻譯工作。

安托爾·塞爾布（1901–1045） 文學史學、小說家和散文家。塞爾布的兩篇主要著作《匈牙利文學史》（1934年）和《歷史文學史》（1941年），描述了文學領域裏最重大的歷史變化。他在寫作這些書的過程中，受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歷史哲學思想的影響。這些

著作，共同表現出來的特點，是卓越的分析能力、輕鬆的風格和隱晦的幽默。塞爾布雖然只是一位高中教師，但是在1937年，卻被授予大學教授的榮譽稱號，不過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大學任職。他的小說《月光之旅》）和懸疑犯罪小說《王候傳說》，把多種體裁揉合在一起—例如把犯罪小說和遊記與小說和散文結合在一起。《王候傳說》在匈牙利家喻戶曉，但最近才被引進西方國家。塞爾布擁有猶太血統，但是從出生起，便開始接受天主教教義的熏陶。1942年，他丟掉了工作，其著作被禁止發行，而且此後再無法再出版作品。1943年至1944年間，他被徵往服勞役。1945年，他在匈牙利西部的一個勞工營中，因為遭受非人的待遇而去世。

奧斯卡・亞西（1875–1957） 匈牙利社會科學家、政治家和政治評論員。1900年，他創辦了《二十世紀》（*Huszadik Század*），並擔任該雜誌的編輯。1914年，他組建了國家資產階級激進黨。作為米哈伊・卡羅伊（請參閱下文關於米哈伊・卡羅伊的條目）的摯友和顧問，1918年他在匈牙利的民主革命中，扮演了非常具影響力的政治角色，有一段時間，曾在卡羅伊政府裏，負責少數民族事務。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革命（請參閱上文的相關詞條）時期，他離開匈牙利，前往維也納，成為政治流亡者中的重要人物。亞西是匈牙利最主要的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理論家，他尖銳地批評了蘇聯體系。此外，他在中歐國家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方面，是最權威的學者。由於他仇視共產主義，所以1945年後，再無法再回到匈牙利。

柏林牆 在西柏林周圍建立起來的加固圍牆。它把西德和東德分隔，並且把柏林市一分為二。在1949年至1961年間，約有一百多萬東德人，因為無法忍受政治壓迫和低生活水平，而穿越東西柏林間的開放邊界，永久地逃離東德。1961年8月12至13日，東德當局在東柏林的西側，修建了柏林牆，以防止更多人逃往西德。這道圍牆成為冷戰分裂的標誌。由於人們對柏林牆開展了大規模破壞活動，並且不斷舉行示威遊行，所以身陷重重危機的共產黨領導層，不得不於1989年11月9日，開放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境。另外，許多逃亡的人，還在柏林牆上挖出不少洞。這道圍牆最終於

1990年2月被徹底拆除。

貝特朗・奧斯卡(1909–1969) 忠實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匈牙利記者。1931年，他因為參與共產主義活動，被判了九個月的有期徒刑，其後被流放到他的出生地坡佐尼(Pozsony，當時已經更名為布拉迪斯拉發，屬於斯洛伐克的國土)。他在那裏，成為斯洛伐克共產黨的行政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抓進德國集中營。1946年進入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日報《自由的人民》工作，並在1951年至1954年期間，擔任報社主編。他是匈牙利新聞界中，堅持使用斯大林式思考方式和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

彼得・艾什泰哈齊(1950年至今) 匈牙利作家。出版了多部小說、短篇故事集，並在報紙上，發表大量文章。艾什泰哈齊出身於匈牙利最著名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在2000年出版的小說《天空的和諧：一部小說》中，回憶了自己在共產主義體制下度過的童年生活，並且描述了自己的家族，跨越幾個世紀的悠久歷史。兩年後，他認為自己必須在小說《修訂版》中，說明一些他剛剛了解的事情，作為對先前家族史的補充：在共產黨執政期間，他的父親馬加什・艾什泰哈齊，曾被秘密警察招募為告密者。艾什泰哈齊的散文，通常表現出「後現代主義」的風格。他是公認的語言大師，他的文章，使匈牙利語得到重生。艾什泰格齊是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波蘭團結工會(波蘭語為Solidarnosc) 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爆發大範圍罷工後，根據格但斯克決議於9月成立的波蘭工會組織和政治運動。它是蘇聯集團國家中，第一個出現的獨立工會組織。鑒於團結工會的影響力不斷增長，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兼波蘭總理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將軍，於1981年12月頒布戒嚴令，宣布團結工會為非法組織，並且開始逮捕其領導人，但是團結工會繼續頑強地開展地下活動。1989年，共產黨的領導人，承認它的合法地位，並允許它參加波蘭圓桌會議(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

波蘭圓桌會議 1989年2月至4月在波蘭召開的一系列會談。它們啓動了波蘭步向民主政治轉變的過程。波蘭人民對經濟危機的不

滿，以及隨之爆發的罷工浪潮，迫使「黨國」的代表坐下來，與團結工會（請參閱下文相關條目）的領袖，進行會談。波蘭團結工會，起初被政府視為非法組織，後來於1989年2月，再次得到法律認可。「黨國」領導人，在公開舉行的圓桌會議中，同意舉行局部的自由選舉。根據這項協議，新成立的上院立法機構—參議院—的所有議員，將透過自由競選產生，不過發揮主要決策作用的國民議會中65%的席位，需要保留給執政黨。讓共產黨領導人大吃一驚的是，在自由選舉中，所有參議院席位，和35%的下院席位，全部由團結工會候選人取得。共產黨被迫接受團結工會候選人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並且與團結工會，組成聯合政府。1991年，波蘭舉行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選舉。

博萊斯瓦夫．貝魯特（1892–1956） 波蘭共產主義政治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地投身於共產主義活動。他在蘇聯的黨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並在那裏加入共產國際。1933年至1938年間，他因為參加共產主義活動而被捕入獄，1939年他獲釋後，前往蘇聯，並為當時臭名昭著的政治警察部門NKVD（Narodny ĭ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即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1943年他返回波蘭，並於1945年成為國家領袖。1948年他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1952年出任政府總理，後來於1954年辭去總理職務。貝魯特對波蘭的統治，是斯大林式獨裁統治的典型代表。

布拉格之春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共產主義改革嘗試。它的目的，在於建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這次事件的起因，是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核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層，決定採納一個政治和經濟改革計劃，但蘇聯領導層擔心，這次改革會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形式，向西方民主政治靠攏。蘇聯未能透過外交壓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改變立場後，8月20日華沙條約成員國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強行終止了這次改革嘗試。杜布切克很快被趕下臺，他的繼任者古斯塔夫．胡薩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東歐最具壓抑性的反改革社會主義體制。

COMECON（經濟互助委員會） 一個國際性經濟機構（1949–1991）。1949年1月，蘇聯和六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莫斯科成立了COMECON，它的官方目標，是幫助並協調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但實際上，是在蘇聯的指導下，强迫各成員國在特定領域裏推行「專業分工」，此舉導致它們的經濟結構，嚴重扭曲。經濟互助委員會另外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是把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國家隔離。東歐國家的政治體制崩潰後，經濟互助委員會隨之解體。

黨校 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建立的機構。這些學校，通常都屬於寄宿制學校，開設的課程，以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和黨史等為主。只有得到黨內推薦的人，才能進入黨校學習。在1945年春天，匈牙利共產黨，為培訓新黨員幹部，創辦了黨校，以培養他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匈牙利最優秀的黨校，當屬布達佩斯市Karolina街的黨校。黨員被推薦到黨校接受培訓時，通常代表黨充分信任該名黨員。

德國佔領匈牙利 1941年，匈牙利宣布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德國結成同盟。1944年初，德國感到匈牙利，似乎越來越不值得信賴，因為戰爭局勢的改變，使得攝政王米克洛什·霍爾蒂，開始猶豫不決，而且眾所周知，他的首相米克洛什·卡洛伊，自始至終非常同情英國。1944年3月19日，希特勒命令德軍襲擊匈牙利，德軍幾乎一槍未發，便順利佔領匈牙利。其後，大批匈牙利猶太人，馬上被送往死亡集中營。

獨立小農黨（Független Kisgazdapárt，即FKgp） 1930年，在基督教–民族主義霍爾蒂體制下建立的獨立小農民、農場工人和市民黨。它是在農民階級中誕生的反對黨，並於二戰後，迅速發展成匈牙利最大的政黨。它主要從反對左派觀點和信仰宗教的人群中，吸納黨員。儘管1945年11月，它以絕對優勢在首次自由選舉中勝出，但是迫於蘇聯的壓力，它不得不與左翼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獨立小農黨的候選人佐爾坦·蒂爾迪，擔任了共和國的首任總統。但是共產黨打著聯合政府的幌子，把政治陰謀、非法手段和蘇聯當局的積極干涉，結合起來，暗中進行破壞，到了1947年，全面摧毀了小

農黨。小農黨最重要的領導人物，或因此身陷囹圄，或遭到流放。然而，小農黨裏的部分政客，任由共產主義奪取政權，甚至幫助其建立斯大林體系，以此作為與共產黨討價還價的籌碼。到了第二年，小農黨在政府中的作用，已經無足輕重，到了匈牙利建立一黨制後，它幾乎完全消亡。1956年，匈牙利爆發十月革命時，小農黨復興了一段時間，蒂爾迪在伊姆雷．納吉政府裏，擔任一名部長。1989年，匈牙利的政體發生變化後，小農黨再度出現，而且在首屆自由選舉中，成為第三大黨。後來，它日益傾向民粹主義，並且由於內部紛爭，最終於千禧年之際，徹底分裂。

Eötvös學院　匈牙利最古老、最負盛名的學院。它位於布達佩斯市，並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為建校榜樣。Eötvös學院成立於1895年，致力培養最優秀的師資。它的教學特點，不僅體現在嚴格的專業標準上，而且還包括寬容和民主自由的精神，這在當時實屬罕見。1949年斯大林式統治體系，逐漸在匈牙利鞏固時，便關閉了這所學校，原校址被改建成學生宿舍。

弗倫茨．考林蒂（1921–1992）　匈牙利作家、翻譯家和記者，傅里傑什．考林蒂（請參閱下文關於傅里傑什．考林蒂的條目）的兒子。他的暱稱「奇尼」，在匈牙利家喻戶曉。弗倫茨最早專攻語言學，後來轉而投身寫作，並且在1951年至1953年間，擔任《自由的人民》和《匈牙利民族報》的自由撰稿人。除了小說和戲劇以外，他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他堅持寫下的幾十年的日記，在他去世後，經整理正式出版。他的幽默風趣、對生活的熱愛和對體育的濃厚興趣，使得奇尼成為匈牙利的學術精英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傅里傑什．考林蒂（1887–1938）　匈牙利作者、詩人和翻譯家。作為個性獨特的著名文學家，他是匈牙利文學史上，最複雜的人物之一。他創作了大量幽默，而且怪誕的作品，因此被視為天才的小丑。他的論文集《這就是你寫作的過程》，把各個流派的匈牙利作家和非匈牙利作家的風格，放在了一面哈哈鏡前。他對匈牙利的城市口頭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嘗試使用各種文學形式，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從新聞報道到戲劇，從小說和短篇小說到詩歌等，應

有盡有。1936年，他在瑞典接受了腦瘤手術，康復後，他創作了《環繞頭骨的旅行》，非常客觀地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和治療過程。

Glasnost（俄語，字面意義是「公開性」） 1986年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政治主張。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新思維（perestroika）」。在受到某些限制的情況下，「公開性」的主張，大幅提高了人民批判國家和社會體制的自由度。蘇聯報紙上開始湧現，大量本著「公開性」精神批判社會現狀的文章，因而為蘇聯學術界賦予了生氣和活力，並且刺激民眾，就蘇聯體制中數不勝數的缺點，開展辯論。更加開放的批判氣氛，促使民眾進一步要求國家，步向民主體制轉變，並且大力推動了當時的局勢發展，最終導致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

捷爾吉·阿克塞爾（1917–1991） 匈牙利共產主義政治家。1935年加入共產黨。1945年擔任共產黨的行政官員。1949年因受到捏造的指控而被捕入獄，1954年被釋放。1957年至1967年間，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其後擔任負責文化事務的黨委書記。1974年至1982年間，他擔任匈牙利副總理。從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成為政治領導層中，分管文化生活的主要負責人。較諸其它蘇聯集團國家的文化政策，他推行的政策，相對比較寬鬆。阿克塞爾把分管的工作，看作是發展個人關係網的工具。他努力做到恩威並施，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威脅懲罰，與許諾給予特權等利誘手段，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把持了匈牙利的文化生活。

Kulaks（即富農） 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對富裕農民的稱呼，政府宣布他們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1948年至1949年間，匈牙利模仿了這種模式，劃分出富農階級。那些被列入富農行列的人，不僅需要交納重稅，而且還需要承擔超出能力範圍的義務。許多富農，被强迫遷徙到偏遠地區，或者投進監獄。在第一屆伊姆雷·納吉政府執政期間，富農的處境，有所好轉。1954年，匈牙利徹底廢除了劃分富農的制度。

拉斯洛·勞伊克（1909–1949）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治家。在二戰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都被關押在匈牙利的監獄裏。他獲釋後沒

多久，便參加了反抗德國的武裝鬥爭。1945年，他成為最受人民歡迎的共產黨員，尤其受到青年學者的廣泛擁戴。1846年至1948年，他在擔任內務部長期間，策劃了多次肅反運動。他本人也於1949年被捕。政府按照蘇聯模式，公開對他進行審訊，並與其他人一同判處了死刑。1955年，政府對他平反昭雪，並於1956年10月6日，重新安葬他的遺骨。幾十萬人參加他的葬禮，並進而演化成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示威遊行。

拉約什·科蘇特（1802–1894） 匈牙利政治家。科蘇特是首屆匈牙利獨立議會政府（1948年）的財政部長、匈牙利獨立戰爭（1848–1849年）的主要政治領袖，和短暫的匈牙利獨立政府（1849）的國家領導人。在1848年前，他主要支持在國家內部，推行自由和激進的改革計劃，但是獨立戰爭失敗（1849）後，科蘇特認為使匈牙利重獲獨立，是他最重要的目標。自1849年起，他先後流亡至英格蘭和意大利，即使在1867年後，也沒有結束這種狀態，因為他强烈抗議了奧地利和匈牙利，正式簽訂的和解協議。1851年至1852年期間，他在英格蘭和美國，舉行了漫長的巡迴演講，不遺餘力地向兩國人民，宣傳匈牙利的獨立事業。從1861年到他去世前，他一直居住在意大利的都靈。科蘇特是匈牙利歷史上，最受民眾歡迎的重要人物，是政治文學的奠基人和演講家。他的文章和演講，被匈牙利人民廣為引用。

勞動競賽 堅持斯大林主義的國家，為了提高產量發起的生產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蘇聯於三十年代中期發起，以煤礦工人A·G·斯達漢諾夫命名的勞動競賽。斯達漢諾夫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都會超出定量幾倍。企業必須超額完成生產的計劃目標，而個人也必須超額完成計件工作的定額工作量。1949年春天，匈牙利第一次組織這種運動。表現突出的工人，被授予「斯達漢諾夫式工人」的稱號，並得到資金、住房，或者度假等獎勵。此外，政府還會對他們大加宣傳。由於人們在勞動競賽中完成的工作量，往往超出切實可行的工作定量，導致上級制定的產量標準，不斷上升，所以這些競賽，嚴重破壞了工人的健康，而且削弱了工人之間的團結合作精

神。1977年，安傑伊．瓦依達拍攝的電影《大理石人》(*Czlowiek z marmuru*)，生動地描述了這些「斯達漢諾夫式工人」的命運。

馬加什．拉科西(1892–1971)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治家。1919年，拉科西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中，擔任高層官員，後來移居海外，為共產國際工作。1925年，他秘密潛回匈牙利後，被政府逮捕，並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根據匈牙利政府與蘇聯政府商定的人員交換計劃，1940年匈牙利政府，允許拉科西移居蘇聯。1945年，他以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身份，返回匈牙利。1948年，他清除了其它所有政治勢力，並且親自監督和建立蘇聯式的一黨制。1952年，他出任匈牙利政府的總理。拉科西有極強的政治感，而且相對比較博學。他在匈牙利，引進了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他不僅完全抄襲了蘇聯體制，而且經常在努力揣測斯大林的願望，並且盡量超越這些願望。1953年6月，處於後斯大林主義時期的蘇聯領導人，強迫拉科西辭去總理職務，但是他仍然擔任共產黨的領袖，並且於1955年，再次掌管政府裏的最高職務。1956年7月，他被解除所有職務後，流放到蘇聯，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匈牙利。

米哈伊．鮑比契(1883–1941)　二十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鮑比契是一位抒情詩人，但除了詩歌以外，他的作品，給其它文學體裁，也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把古希臘悲劇詩人、但丁、莎士比亞和魏爾倫的作品，翻譯成匈牙利語。他是《西方》(*Nyugat*)雜誌的終身工作人員。從1929年到去世期間，他一直擔任該雜誌社的編輯。鮑比契博學廣識，他對文學的卓爾不群的形式感與強烈的道德敏感和哲學傾向，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他編撰的《歐洲文學史》(1935)，嚴格上並不算是文學史，而是交織在一起的散文組成的文集。這本著作的主角—努力創作的詩人—「遍讀」歐洲文學名著，從經典的希臘羅馬傳統文學，到二十世紀初的文學巨著，應有盡有。

米哈伊．法爾卡斯(1904–1965)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治家。二戰前法爾卡斯在國際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擔任領導工作，後來在許多西歐國家，從事黨務工作。1944年底，他回到蘇聯。1945年他擔

任匈牙利共產黨的副總書記，並在1948年至1953年間，擔任國防部長。法爾卡斯成功地在軍隊建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因為殘暴和强烈的復仇心理，而聲名狼籍。他和馬加什·拉科西（請參閱下文的條目），應當為政府在斯大林時期，瘋狂鎮壓人民的行為，負主要責任，但是拉科西成功地把所有責任，都推卸在法爾卡斯的身上，因此，在1956年革命前，政府便逮捕了法爾卡斯。1957年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不過在1960年的政府大赦中，他重獲自由。後來他一直擔任出版社的審稿人，直至1965年逝世。

米哈伊·卡羅伊（1875–1955） 匈牙利政治家。卡羅伊出身於一個守舊，而非常富有的貴族家庭。1910年他進入議會。1916年在一戰期間，他建立了一個反對黨，並且提出一個倡導普選權、秘密投票和與同盟國和睦共處的國家計劃。在1918年10月的民主革命中，他在政府的邀請下，出任總理，並且從1919年1月開始，擔任匈牙利共和國的臨時總統。但在3月份，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後，他隨之下臺。1919年7月他離開匈牙利，隨後在巴黎和倫敦生活了幾十年，並日益同情和支持共產黨。1923年，保守的民族主義政府執政時，在缺席審判的情況下，宣布卡羅伊犯有叛國罪，並沒收了他的全部財產。1946年他回到匈牙利，並於1947年，接受匈牙利駐巴黎大使的任命，但是1949年，他為了抗議政府對勞伊克的審判結果（請參閱下文相關條目），憤而辭職，並再次流亡國外。

Népszabadság（《人民自由報》） 匈牙利發行量最大的政治日報。它最早出現在1956年匈牙利的十月革命中。11月2日，新成立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即MSZMP），發行了《人民自由報》的創刊號。它的前身是執政黨的喉舌《自由的人民》（*Szabad Nép*）—本書作者，曾在這家報紙的報社裏工作—它在革命期間停止了發行。《人民自由報》甚至接替了《自由的人民》，成為卡達爾執政時期的中央黨報。1989年10月8日，《人民自由報》成為獨立的社會主義日報，1994年它刪去了報頭中的「社會主義」字樣。

納吉巴尼奧伊·米克洛什·霍爾蒂（1868–1957） （「納吉巴尼

奧伊」是加在貴族姓氏前面的附加詞）霍爾蒂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匈牙利國家領導人。他早前是一位海軍軍官，1918年晉升為海軍少將，並負責指揮奧匈帝國的艦隊。在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執政期間，他在塞格德（當時被協約國的軍事力量所控制）組建起「國民軍」，並於1919年11月進軍布達佩斯。他在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布達佩斯。1920年3月，他在已經取消君主制的匈牙利，出任攝政王（即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且他的名字，通常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匈牙利的守舊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1944年10月，他在德軍的壓力下，被迫辭職，並且被軟禁在巴伐利亞。他在葡萄牙流亡了十二年後，於1957年去世。

群眾組織　泛指各種隸屬於「黨國」的大規模社會組織，和協會的共產主義術語。在匈牙利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裏，所有群眾組織，都壟斷了本領域中的所有活動，例如工會運動、婦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作家協會等等。各個群眾組織的主管機構，只是在名義上行使權力而已，因為事實上，該組織的所有決定，都由黨國作出，而且執行決定的官員，也由黨國任免。群眾組織的功能，是把黨的觀點和希望，傳達給本組織面向的社會階層（例如工人、青年和婦女等）。

人民大學　匈牙利在1945年至1949年間建立的許多寄宿學校，來自貧窮的工人，和農民家庭的青年人，可以在這裏接受高等教育。這些人民大學的前身，是建立於三十年代末的博堯伊學院（後來它更名為哲爾非學院）。在哲爾菲學院校友的發起下，匈牙利建立了人民大學，並且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它的數量不斷增長。1946年，匈牙利成立了全國性的人民大學聯合會NÉKOSZ (Népi Kollégiumok Országos Szövetsége)。由於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主要受到共產黨的控制，所以人民大學的學生，在建立共產主義體制的過程中，發揮了突出作用。然而從1948年春天開始，這個過於獨立自主的機構，遭到了共產黨的指責。1949年7月，人民大學聯合會解散，各個大學也隨之關閉。

「人民作家」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發起的運動。匈牙利語

「népiírók」很難在英語中，找到與其意義對應的單字。「人民的」(people's)或者「受群眾歡迎的」(popular)等詞彙，都不能準確地反映「népi」的涵意。「人民作家」，指在政治運動中，關注普通百姓利益的作家。最積極的人民作家，通常是出身於農民家庭，或者願意為農民階級獻身的人。他們在自己的文學作品和社會學專著中，描述了匈牙利社會的落後之處，以及農民階級所面臨的困境。這類作家認為，當前社會中出身高貴的中產階級，以及「與農民階級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缺乏信用，而且他們相信，為了解決他們眼中的匈牙利國家危機，最有效的方法，是為農民階級提供教育，培養新興的中產階級，並且用它來取代上文提及的社會階級。這場運動的代表性觀點，是農民–民主激進主義和對理想化農民生活的尊重，而隱藏在這種政治觀點和政治思想後面的，則是完全相異的世界觀—支持這種運動的人，包括同情共產黨的人、追隨西歐式民主政治的左翼社會主義人士、右翼人士，以及匈牙利某些極右翼政黨的成員。部分「人民作家」，為了保護國家和匈牙利文化提出的設想中，夾雜著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仇外思想的元素。這種運動的黃金時代，一直延續到四十年代末，但是迄今為止，它仍然對匈牙利學術界，產生著強烈的影響。這個運動的代表作家，有拉斯洛·內梅特、久洛·伊耶什、尤若夫·埃爾代耶、彼得·維勒斯、蓋佐·費堯、雅諾什·科多拉尼和弗倫茨·艾爾代伊。

Samizdat(地下出版物，來源於俄語sam+izdatelstvo，其字面意義是「自己出版」)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未獲得官方批准，而非法印刷並發行的政論，或者政治文學作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匈牙利開始出現這種地下出版物。

山多爾·裴多菲(1823–1849)　匈牙利詩人。他驟然在匈牙利詩壇崛起時，還不滿二十歲。由於他的詩歌激情澎湃，而且具有預見性，所以短短幾年內，他便成為最受歡迎的詩人，以及時代的領軍人物。他在自己的政治詩篇中，堅決捍衛了人民的權力，並且支持國家獨立事業。1848年3月15日革命爆發前夕，人們在沒有得到奧地利審查機關通過的情況下，在報紙上發表了他尖銳地抨擊時事的

詩歌《民族之歌》。這個事件，代表著新聞界，開始為了自由而鬥爭。裴多菲在非常有影響力的組織「青年匈牙利」中，擔任重要領導工作，在革命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參加了立法機關的競選，但是由於他激進的共和主義觀點，而遭到其他政治力量孤立，最終未能當選。1848年底，他以軍官的身份，參與反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匈牙利獨立戰爭，並且在抵抗俄國哥薩克軍隊的舍格什堡戰鬥中失踪。在很長時間內，匈牙利人民，都無法接受他已經犧牲的說法。有人傳說他躲藏起來，也有人傳說他被囚禁在西伯利亞。裴多菲是匈牙利最著名的詩人。

天安門廣場（中文的字面意思是「像天國一樣安靜的廣場」） 位於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巨大廣場。1989年4月，天安門廣場是中國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推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場所。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出動軍隊，把示威者從廣場上清除出去，並且鎮壓了學生運動，約數百名甚至數千示威者在這起事件中被殺。

「土豆燒牛肉」式共產主義 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的一個術語。它借用匈牙利人，用牛肉燒制的一道菜，來代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得到鞏固的卡達爾體制。當時許多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已經有所提高：消費水平上升，政府的壓迫較過去有所緩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獲得的自由和權利，更加廣泛。

瓦茨拉夫廣場（Václavské námêstí） 位於布拉格舊城區中心的一個廣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度變遷（又被稱為「天鵝絨革命」）過程中，瓦次拉夫廣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柏林牆被推倒後，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那裏舉行了一系列示威遊行。11月17日，前往瓦次拉夫廣場參加示威遊行的群眾，受到鎮暴警察的襲擊，500多名群眾因此受傷。從那以後，布拉格經常爆發為數達幾十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在强大的公眾壓力下，共產黨領導層的全體成員被迫解散，古斯塔夫·胡薩克也辭去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務。民主派反對黨「公民論壇」，組建了聯合政府。十二月末，反對黨的著名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總統。1990年6月，反對黨

「公民論壇」，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

瓦爾特・烏布利希（1893–1973） 東德的共產主義政治家。1923年，烏布利希進入東德共產黨的領導層，並且於1928年成為國民議會的議員。1933年希特勒上臺執政後，他逃往國外為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共產國際—工作。1945年，烏布利希從蘇聯返回德國，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高領導。在他的推動下，東德建立了斯大林主義體系。1971年，烏布利希被迫辭去所有黨內職位，但是在去世前，始終擔任國家領袖。

圍攻電臺，1956年 1956年10月23日，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匈牙利廣播電臺外舉行的和平遊行，但後來演化成武裝衝突。23日下午，大批遊行者，聚集在保安警察守衛的廣播電臺外，希望電臺能夠廣播遊行者提出的「十六點要求」，而共產黨領導人，堅決不允許電臺同意遊行者的要求。共產黨領導人艾爾諾・格羅（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於當晚八時，在電臺發表講話，威脅將對遊行者採取報復性行為，當時仍手無寸鐵的人群，被進一步激怒。後來，保安警察多次開槍，以驅散人群，但是示威者已經獲得武器，並且於晚上十時圍攻電臺。武裝對抗一直持續到拂曉時分，起義的人群控制了整個局勢。這是標誌武裝起義和匈牙利革命（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開始的事件之一。

偉大的分配體系 匈牙利人普遍接受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從卡達爾時代，繼承下來的資助教育、醫療、養老和家庭保障等領域的政府體系。匈牙利政府，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起來的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取得了某些重大的成就，但是亦因此浪費了多得驚人的資源。漸漸地，政府發現自己資助這些再分配體系時，日益力不從心，甚至變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990年後，政府在某些領域（例如養老金體系）中，推行了根本性改革，但是對於其它領域的調整，則非常有限。

憲法法院 匈牙利在制度變遷時建立的由特別法官組成、並享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機構。它仿效歐洲民主國家的法院，並且以保護民主立憲政體為最終目標。憲法法院獨立於政黨、政府的行政

和立法機構，以及其它司法機構(其中也包括最高法院)。憲法法院於1990年1月1日，開始正式工作，它的任務包括考察立法或者國際條約，是否違反憲法、解讀憲法及鑒別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行為、並且根據憲法內容，審理人們提出的起訴。任何人或組織，都不能挑戰它對於合憲性的裁決。憲法法院由十一位法官組成，他們的任命，都必須得到議會中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通過。這些法官的任期為九年，而且可以被委任兩次。

新思維(Perestroika，俄語中的字面意義是「轉變」)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試驗。蘇聯於1986年制訂的「新思維」計劃，致力於改革國家和社會的結構，以提高蘇聯的實力。但是由於「新思維」的經濟改革遭遇失敗，而且社會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所以「新思維」計劃，於幾年後全面崩潰。雖然，這次改革，宣稱是為了加强本國實力，而進行轉變，但它實際上，卻啓動了一個導致蘇聯政體分崩離析的過程。

匈牙利「右派」，1953–1956年　主要由支持伊姆雷．納吉改革計劃的政治家和學者組成的一個共產黨派別。1955年4月，以馬加什．拉科西(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為代表的斯大林主義，逐步收復黨內的最高控制權後，指責這個派別的「右傾傾向危及黨和社會主義」。1955年改革的忠實追隨者，幾乎全部被排擠在權力之外，或者被撤職。1956年春天，右派學者們，開始組織反斯大林主義的運動。裴多非俱樂部展開的社會辯論，和重新安葬拉斯洛．勞伊克(請參閱相關條目)等公眾活動，為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革命失敗後，許多在政府的清洗活動中幸存下來的「右傾分子」，都成為卡達爾時期，民主反對派的核心人物。

匈牙利改革辯論中的「左翼」力量　反對1968年1月開始推行的匈牙利「新經濟機制」的巨大政治力量。它猛烈抨擊了匈牙利的改革嘗試。部分政治家和共產主義學者擔心，這次改革會拋棄過去社會主義制度所堅持的平等、個人主義和社會公平等價值觀。他們認為拒絕中央計劃和給予企業有限的獨立性等改革措施，是「小資產階級貪婪攫取性」和「個人主義」取得勝利的結果，而這與共產主義的世

界觀，背道而馳。匈牙利政黨的保守派中，逐漸發展起一個所謂的工人反對派，並且得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政府的支持(當時，新斯大林主義政治路線，在蘇聯不斷得到鞏固)。由於在1972年至1974年間，匈牙利政府不斷受到這個團體的壓力，所以新經濟機制計劃中的許多改革措施，都被迫推遲了很多年。匈牙利學者，依據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改革，支持蘇聯式經濟管理模式的呼聲，越來越高，直到制度變遷(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才完全終止。

匈牙利公社，即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1919年　1919年成立的蘇聯式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也被稱作「公社」或者「議會共和國」。從3月21日成立到8月1日結束，它在匈牙利共持續了133天。公社取代了先前通過，1918年10月31日爆發的所謂菊花革命上臺的民主政府。1919年3月，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後，貝洛·庫恩領導的共產主義者，接管國家政權。但是迫於羅馬尼亞軍隊入侵、民眾不滿、通貨膨脹和封鎖造成的供應短缺等壓力，共產黨的領導層辭去職務，並於8月1日逃往國外。

匈牙利國家圓桌會議　1989年，匈牙利就共產主義「黨國」權力轉移，以及向民主政治過渡等問題展開的討論。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即MSZMP)的領袖，成為蘇聯集團中，首先宣布願意實行多黨制的共產主義者，其後匈牙利國內，迅速成立了許多反對派團體和政黨。1989年3月22日，這些團體發起「反對派圓桌會議」，希望能就多黨制達成一致意見。1989年6月，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它的附屬社會組織，與「反對派圓桌會議」的代表坐下來，開始商討制度過渡的法律和政治條件。這一系列會議，被稱為「國家圓桌會議」。9月份各黨派就制度變遷(請參閱下文的條目)達成協議，但參加圓桌會議的某些反對派團體，最終並沒有在協議上簽字，他們對一些具體事件，持有不同意見。

雅諾什·卡達爾(1912–1989)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治家。在二戰爆發前，他加入了當時還屬於非法組織的共產黨，並且多次被捕入獄。在1948年至1950年擔任內務部部長期間，他和其他共產主義領導者，遵循斯大林體系的思想，殘酷地鎮壓了民眾。1951年，他

本人也因為誣告而被捕入獄，1954年獲釋。在1956年匈牙利的十月革命中，他被任命為伊姆雷．納吉政府中的一個部長，但是11月4日，他組建了效忠於蘇聯的反政府內閣。1956年11月，他出任新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並且成為匈牙利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直至1988年5月，才辭去這項職務。與卡達爾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是1956年大革命失敗後，政府對人民瘋狂的血腥鎮壓。1963年後，他推行「溫和」的獨裁統治，人民受到的壓迫，才有所緩和。

1956年匈牙利革命（10月23日至11月4日） 這次革命開始於布達佩斯，學生於10月23日舉行的示威遊行，並於當晚發展成武裝起義。10月24日，受到群眾歡迎的改革派共產主義者伊姆雷．納吉，組建了新政府。革命者成功地與匈牙利安全警察，和蘇聯軍隊，展開鬥爭，蘇軍被迫撤出布達佩斯。10月30日，一個多黨派聯合政府，在匈牙利宣告成立。由於在新政府成立初期，蘇聯便已經表現出武裝干預的傾向，所以納吉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並保持中立。蘇聯軍隊於11月4日，再次進攻布達佩斯，而且建立了以雅諾什．卡達爾（請參閱下文關於雅諾什．卡達爾的條目）為首的反政府內閣。戰鬥持續了一個星期。這是蘇聯集團成員國內，規模最大的反蘇起義。它失敗後，政府對民眾進行了長達幾年的鎮壓報復。被法律認可的總理伊姆雷．納吉也和其他人，一起被處以死刑。

伊斯特萬．奧克尼（1912–1979） 匈牙利作家。他起初致力於鑽研化學工程和藥學，但後來開始從事寫作。1941年他發表了第一部作品。1942年被征去服勞役。1943年他被蘇軍俘獲，並關押起來，直到1946年才獲釋。他剛剛回到匈牙利時，擔任出版社的審稿人，並且為報紙撰稿。但由於他參與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因此在很多年裏，他的作品始終被禁止出版。在此期間，他在一家制藥廠擔任工程師。1963年，奧克尼再次以依靠寫作為生。他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分鐘故事》，描述了日常生活中，各種怪誕和荒謬的現象，從而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創作的戲劇《托特一家》和《躲貓貓》，成為國內外最受歡迎的作品，並且先後被搬上銀幕。

伊斯特萬．比博（1911–1979） 匈牙利的法學家、散文家和政治

家。他曾於1946年至1950年間，在塞格德大學(University of Szeged)執教。共產黨還未實行一黨專政時，他是二戰後，匈牙利最重要的非共產主義左翼政治思想家之一。1948年至1949年間，匈牙利的主流意識形態，開始向斯大林主義傾斜，這促使比博退出公眾生活。1956年11月2日至4日，他出任伊姆雷．納吉政府的國務部長。1957年比博遭到逮捕後，於1958年被判處終生監禁，但1963年他獲得特赦出獄。其後他在匈牙利中央統計局，從事研究工作，直至退休。比博去世後，許多人參加他的葬禮，結果演變成反對卡達爾政權的示威遊行。事實上，這是反對派發動的最早的反政府公共運動之一。

伊斯特萬．塞切尼(1791–1860)　塞切尼出身於匈牙利最富有和最有聲望的一個貴族家庭。1825年，他把自己房產一年的收入，捐獻出來，創辦了匈牙利科學院的前身，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1983年，他出版其著作《信譽》，在書中概述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主張。這本書被視為匈牙利改革時代的開端，而且對公共思想，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塞切尼曾幫助政府組織多瑙河的監管工作，並且修建了鏈橋——第一座把布達和佩斯永久性地連接起來的橋樑。他在第一屆匈牙利獨立議會政府(1848)中，擔任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部長。與塞切尼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代子孫，都把他視為「最偉大的匈牙利人」—送給他這個尊稱的不是別人，正是拉約什．科蘇特(請參閱上文相關條目)。科勞特曾就匈牙利改革問題，在四十年代與塞切尼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公共辯論。1848年9月，塞切尼因為精神錯亂，被送往精神病院診治，直至去世。他在精神病院裏，創作了反對哈普斯堡皇室暴政的小冊子，並透過非法行徑，出版了它們，為此遭到警察的騷擾。最後，塞切尼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尤若夫．雷沃伊(1898–1959)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治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18年，雷沃伊和其他人，一同成立了匈牙利共產黨，1919年，開始流亡到維也納、布拉格和莫斯科等地，直至1944年10月，才返回匈牙利。在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時代，他是匈牙利的四大核心領導人之一(其他三位領導人，分別為馬加什．拉科西、

艾爾諾·格羅和米哈伊·法爾卡斯，請參閱相關適配卡），並於1945年至1950年間，擔任國內最重要的共產主義日報《自由的人民》的主編。1949年至1953年間，他擔任文化部部長。當時，他是匈牙利最權威的觀念學者和文化生活的最高領導，但是1953年伊姆雷·納吉發起的政治運動，剝奪了他的所有實權。

制度變遷 在匈牙利，這個術語，被廣泛用來代表1988年至1989年間蘇聯和中歐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體制，幾乎同時崩潰的現象：獨裁統治被民主政治所代替，一黨制被多黨制所代替，公有制佔有支配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被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代替。共產主義政黨內部的嚴峻危機，導致在匈牙利執政長達三十二年的雅諾什·卡達爾，於1988年5月提出辭職（請參閱下文的相關條目）。自匈牙利執政黨和反對黨開始召開國家圓桌會議後，人們就如何回到民主政治的路線圖上，逐漸達成一致意見。1989年10月初，前共產主義執政黨MSZMP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即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自行解散，10月23日新的匈牙利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1990年3月匈牙利舉行自由普選，並且就此建立非共產主義政府：這個事件，被視為制度變遷的起點。

人名彙總

說明：本書中的人名主要查閱了《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新華通訊社譯名室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1993年1版)。有一些著名學者和政界人士的名字參考了網絡搜索引擎。人名按漢語拼音排序，且採用以名字而非姓的字首。

A

阿巴·勒納	Abba Lerner
阿蒂拉·尤若夫	Attila József
阿爾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阿爾弗雷德·雷尼	Alfréd Rényi
阿爾弗雷德·扎烏伯曼	Alfred Zauberman
阿格尼絲·埃雷尼	Ágnes Erényi
阿格尼絲·貝內迪克特	Ágnes Benedict
阿格尼絲·洛松茨基	Ágnes Losonczy
阿格尼絲·毛蒂奇	Ágnes Matits
阿吉·洛松茨基	Ági Losonczy
阿克洛夫	Akerlof
阿克塞爾	Aczél
阿克塞爾·萊榮霍夫德	Axel Leijonhufvud
阿拉達·毛道拉斯	Aladár Madarász
阿拉達·希波什	Aladár Sipos
阿蘭·曼恩	Alan Manne
阿蘭·朱佩	Alain Juppé
阿蘭卡·雷代伊	Aranka Rédey
阿蘭卡·沙茨	Aranka Schatz
阿蘭尼	Arany
阿利斯·哈爾達	Alíz Halda
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
阿莫斯·特韋爾斯基	Amos Tversky

阿莫斯・特韋爾斯基	Amos Tversky
阿納托爾・法蘭西	Anatole France
阿納托利・丘拜斯	Anatoly Chubais
阿帕德・根齊	Árpád Göncz
阿帕德・托特	Árápd Tóth
阿薩爾・林德貝克	Assar Lindbeck
阿瑟・凱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阿瑟・皮古	Arthur Pigou
阿提拉・奇坎	Attila Chikán
阿源	A Nguyen
埃德・利姆	Ed Lim
埃德・泰斯	Ede Theiss
埃德蒙・菲爾普斯	Edmund Phelps
埃德蒙・馬林沃	Edmond Malinvaud
埃爾溫・霍沃什	Ervin Hollós
埃萊梅爾・漢吉斯	Elemér Hankiss
埃萊梅爾・捷爾吉・泰爾塔克	Elemér György Terták
埃勒迪・豪拉斯	Elöd Halász
埃里克・馬斯金	Eric Maskin
埃里奇・施奈德	Erich Schneider
埃利・德文斯	Ely Devons
埃麗卡・洛齊克	Erika Laczik
埃瑪・羅思柴爾德	Emma Rothschild
埃米・彼得	Emmi Péter
埃米爾・鮑拉日	Emil Balázs
埃米爾・古亞什	Emil Gulyás
埃塞	Esze
(M. C.)埃舍爾	M. C. Escher
埃斯特・德勞什科奇	Eszter Draskóczy
艾布拉姆・伯格森	Abram Bergson
艾爾諾・格羅	Ernö Gerö
艾爾諾・貢多針	Ernö Gondos
艾爾諾・加爾	Ernö Gáll
艾爾諾・瓦爾曼	Ernö Wahrmann

艾麗斯・福爾克	Alice Falk
愛德華・卡德爾	Edvard Kardelj
安德拉什・布羅迪	András Bródy
安德拉什・赫格居斯	András Hegedüs
安德拉什・科瓦奇	András Kovács
安德拉什・米哈伊	András Mihály
安德拉什・納吉	András Nagy
安德拉什・涅爾蓋什	András Nyerges
安德拉什・西蒙諾維茨	András Simonovits
安德拉什・希夫	András Schiff
安德拉什・謝姆延	András Semjén
安德雷斯・帕潘德里奧	Andreas Papandreou
安德烈・奧迪	Endre Ady
安德烈・克韋希	Endre Kövesi
安德烈・莫爾納	Endre Molnár
安德烈・薩哈羅夫	Andrei Sakharov
安德烈亞・戴阿克	Andrea Deák
安德烈婭塞格	Andrea Szegö
安東尼・德亞索伊	Anthony de Jasay
安傑伊・瓦伊達	Andrzej Wajda
安娜・塞萊妮	Anna Seleny
安娜・約納什	Anna Jónás
安托爾・馬里亞什	Antal Máriás
安托爾・塞爾布	Antal Szerb
安托爾・亞索伊	Antal Jászay
昂西	Hansi
奧勃洛莫夫	Oblomov
奧茨扎卡爾・貝特勒	Oszkár Betlen
奧爾特加・y・加塞特	Ortega y Gasset
奧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
奧利維爾・布蘭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奧洛夫・帕爾梅	Olof Palme
奧斯卡・蘭格	Oskar Lange
奧斯卡・亞西	Oszkár Jászi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奧塔・錫克	Ota Sik
奧特馬爾・埃明格爾	Otmar Emminger
奧威爾	Orwellian

B

巴爾扎克	Balzac
巴卡拉克	Bacharach
(J.) 巴克利・羅瑟	J. Barkley Rosser
巴林特・德默爾基	Bálint Dömölki
班迪	Bandi
保羅・R・格雷戈里	Paul R. Gregory
保羅・薩繆爾森	Paul Samuelson
保羅・斯特里恩	Paul Streeten
鮑拉特	Baráth
鮑里斯・葉利欽	Boris Yeltsin
鮑龍	Baron
貝洛・巴托克	Béla Bartók
貝洛・鮑洛紹	Béla Balassa
貝洛・庫恩	Béla Kun
貝洛・馬爾托什	Béla Martos
貝洛・奇科什–納吉	Béla Csikós-Nagy
貝洛・琴代什	Béla Csendes
貝特朗・奧斯卡	Betlen Oszkár
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爾	Bengt-Christia Ysander
(L.) 比安科	L. Bianco
比吉塔・伊萊亞森	Birgitta Eliason
彼得・埃爾德什	Péter Erdös
彼得・艾什泰哈齊	Péter Esterházy
彼得・鮑德	Péter Bod
彼得・戴蒙德	Peter Diamond
彼得・豪納克	Péter Hanák
彼得・肯德	Péter Kende
彼得・曼迪	Péter Mándi

彼得・米哈伊	Péter Mihályi
彼得・皮特	Péter Pete
彼得・韋利施	Péter Wellisch
彼得・維勒斯	Péter Veres
波・羅特施泰因	Bo Rothstein
波戈尼	Pogonyi
伯納德・沙旺斯	Bernard Chavance
博比・索洛	Bobby Solow
博萊斯瓦夫・貝魯特	Boleslaw Bierut
博斯沃思	Bosworth
博堯伊	Bólyai
布萊恩・麥克萊恩	Brian McLean
布雷厄姆	Braham
布魯諾・F・施特勞布	Brunó F. Straub
布魯諾・弗賴	Bruno Frey
布洛霍	Blahó

C

查爾斯・林德布洛姆	Charles Lindblom

D

大衛・E・霍夫曼	David E. Hoffman
大衛・格拉尼克	David Granick
大衛・萊布森	David Laibson
戴爾・喬根森	Dale Jorgenson
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丹尼爾・耶金	Daniel Yergin
德熱・科斯托拉尼	Dezsö Kosztolányi
蒂博爾・高萊	Tibor Gallé
蒂博爾・胡薩爾	Tibor Huszár
蒂博爾・凱賴斯泰尼	Tibor Keresztes
蒂博爾・利斯卡	Tibor Liska
蒂博爾・梅勞伊	Tibor Méray

蒂博爾·西多夫斯基	Tibor Scitovsky
杜奇·福尼	Duci Fónyi
杜尚·特日什卡	Dušán Tríska
杜威·德拉埃斯馬	Douwe Draaisma
多莫科什·科沙里	Domokos Kosáry

F

凡高	Van Gogh
菲利普·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
(A. W.) 菲利普斯	A. W. Phillips
費里·巴托爾	Feri Bátor
費倫茨·多納特	Ferenc Donáth
費倫茨·費伊特	Ferenc Fejtö
費倫茨·勞巴爾	Ferenc Rabár
費倫茨·明尼希	Ferenc Müunnich
費倫茨·瓦爾瑙伊	Ferenc Várnai
弗拉基米爾·布魯斯	Wlodzimierz Brus
弗拉基米爾·德勞希	Vladimir Dlouhý
弗蘭克·哈恩	Frank Hahn
弗蘭克·霍爾茲曼	Frank Holzman
弗朗索瓦·阿萊爾	Françoise Allaire
弗朗西斯·巴托爾	Francis Bator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弗里傑什·山多爾	Frigyes Sándor
弗倫茨·艾爾代伊	Ferenc Erdei
弗倫茨·考林蒂	Ferenc Karinthy
弗倫茨·莫爾納	Ferenc Molnár
弗倫茨·薩拉希	Ferenc Szálasi
弗倫茨·瓦吉	Ferenc Vági
弗洛伊德	Freud
福樓拜	Flaubert

G

蓋佐·巴林特	Géza Balint

蓋佐・費堯	Géza Féja
蓋佐・福尼・尼伊・奧古斯塔・毛伊拉特	Géza Fónyi née Auguszta Majláth
蓋佐・里普	Géza Ripp
蓋佐・洛松茨基	Géza Losonczy
岡納爾・繆爾達爾	Gunnar Myrdal
高更	Gauguin
戈德費爾德	Goldfeld
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	Gottfried von Haberler
哥穆爾卡	Gomulka
格哈德・施羅德	Gerhard Schröder
格里・伯林	Gerry Berlin
格利高里・曼昆	Gregory Mankiw
格倫・埃利森	Glenn Ellison
格熱格什・科沃德科	Grezegorz Kolodko
古爾・奧法	Gur Ofer
古斯蒂	Guszti
古斯塔夫・巴格	Gusztáv Báger
古斯塔夫・胡薩克	Gustáv Husák

H

哈姆雷特	Hamlet
(V. R.) 哈恰圖羅夫	V. R. Khachaturov
哈維・拉帕姆	Harvey Lapham
哈謝克	Hašek
(F. A.) 哈耶克	F. A. Hayek
海頓	Haydn
海倫・萊文	Helen Levine
漢娜・B・肯德	Hanna B. Kende
漢斯・克里斯琴・安德森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漢斯・勞伯赫	Hans Raupach
赫伯特・萊文	Herbert Levine
赫伯特・斯卡夫	Herbert Scarf
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赫爾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赫舍爾・I・格羅斯曼	Herschel I. Grossman
赫伊津哈	Huizinga
亨利・羅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
亨利希・馮・斯塔克爾貝格	Heinrich von Stackelberg
懷爾登・卡爾	Wildon Carr
霍莫克	Homok

J

吉齊・勒切伊	Gizi Löcsei
(R. C.) 吉爾里	R. C. Geary
加比・帕普	Gabi Papp
加博爾・彼得	Gábor Péter
加博爾・卡薩依	Gábor Karsai
加博爾・凱爾泰希	Gábor Kertesi
加博爾・克洛尼曹伊	Gábor Klaniczay
加博爾・萊納特	Gábor Lénárt
加博爾・莫恰爾	Gábor Mocsár
加博爾・陶爾多什	Tibor Tardos
加博爾・伊萬	Gábor Iván
加林・庫普曼斯	Tjalling Koopmans
加斯帕・米克洛什・陶馬什	Gáspár Miklós Tamás
簡・丁伯根	Jan Tinbergen
簡・普羅科普	Jane Prokop
捷爾吉・阿克塞爾	György Aczél
捷爾吉・本斯	György Bence
捷爾吉・彼得	György Péter
捷爾吉・彼得里	György Péteri
捷爾吉・蘭基	György Ránki
捷爾吉・利特萬	György Litvan
捷爾吉・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
捷爾吉・毛托爾奇	György Matolcsy
捷爾吉・內梅什	György Nemes
捷爾吉・歐什瓦特	György O'sváth
捷爾吉・薩奇	György Such

捷爾吉・沙爾科	György Sárközy
捷爾吉・舒拉尼	György Surányi
捷爾吉・西蒙	György Simon
捷爾吉・希克	György Sík
捷爾吉・席勒	György Schiller
傑・羅斯福	Jay Roosevelt
杰弗里・E・愛潑斯坦	Jeffrey E. Epstein
杰弗里・薩克斯	Jeffrey Sachs
傑姬・曼恩	Jackie Manne
杰克・尼克爾遜	Jack Nicholson
傑勒德・德布勒	Gérard Debreu
久里・利特萬	Gyuri Litván
久洛・霍恩	Gyula Horn
久洛・科扎克	Gyula Kozák
久洛・歐拜紹夫斯基	Gyula Obersovszky
久洛・伊耶什	Gyula Illyés

K

卡爾・波普爾	Karl Popper
卡爾林	Carlin
卡爾曼・曹科	Kálmán Czakó
卡爾曼・米克薩特	Kálmán mikszáth
卡爾曼・陶卡奇	Kálmán Takács
卡拉・克魯格	Carla Krüger
(R. G.) 卡拉喬多夫	R. G. Karagedov
卡萊茨基	Kaleckian
卡雷爾・庫巴	Karel Kouba
卡羅里・羅茲	Károly Lotz
卡羅伊・阿提拉・紹什	Károly Attila Soós
卡羅伊・科恩豪澤	Károly Kornhauser
卡羅伊・琴代什	Károly Csendes
卡邁勒・德爾維什	Kemal Dervis
卡繆	Camus
卡塔琳・博索尼	Katalin Bossányi

卡塔琳・薩博	Katalin Szabó
凱特・皮爾森	Kate Pilson
考蒂・法卡斯	Kati Farkas
考蒂・豪納克	Kati Hanák
考蒂・薩博	Kati Szabó
考爾紹伊	Karsai
考爾斯	Cowles
科恩	Kohn
科爾斯	Coles
克爾特・哥德爾	Kurt Gödel
克里姆特	Klimt
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克倫・庫克	Karen Cook
肯・克西	Ken Kesey
肯尼思・阿羅	Kenneth Arrow
肯尼思・博爾丁	Kenneth Boulding

L

拉爾・賈亞瓦德納	Lal Jayawardena
拉爾斯・斯文松	Lars Svenson
拉格納・弗里希	Ragnar Frisch
拉里・薩莫斯	Larry Summers
拉喬斯・法盧韋紀	Lajos Faluvégi
拉斯洛・安托爾	László Antal
拉斯洛・費博	László Fébó
拉斯洛・哈伊	László Háy
拉斯洛・霍瓦特	László Horváth
拉斯洛・蘭捷爾	László Lengyel
拉斯洛・勞伊克	László Rajk
拉斯洛・莫霍利-納吉	László Moholy-Nagy
拉斯洛・內梅特	László Németh
拉斯洛・皮羅什	László Piros
拉斯洛・若爾特・薩博	László Zsolt Szabó
拉斯洛・桑托斯	László Csontos

拉斯洛·紹約姆	László Sólyom
拉斯洛·托特	László Tóth
拉烏爾·瓦倫貝里	Raoul Wallenberg
拉約什·博克羅斯	Lajos Bokros
拉約什·費赫爾	Lajos Fehér
拉約什·豪特沃尼	Lajos Hatvany
拉約什·科蘇特	Lajos Kossuth
拉約什·韋卡什	Lajos Vékás
拉約什·西爾瓦希	Lajos Szilvási
萊昂內爾·麥肯齊	Lionel MacKenzie
萊榮霍夫德	Leijonhufvud
萊塞克·巴爾采羅維奇	Leszek Balcerowicz
賴納	Rainer
勞倫·拉羅薩	Lauren LaRosa
勞倫斯·克萊因	Lawrence Klein
勞伊克·拉斯洛	Rajk László
勒羅伊·瓊斯	Leroy Jones
雷蒙德·阿隆	Raymond Aron
雷若·涅爾什	Rezsö Nyers
莉斯爾	Liesl
里昂·瓦爾拉斯	Léon Walras
里厄	Rieux
理查德·波特斯	Richard Portes
理查德·馮·魏茨澤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理查德·匡特	Richard Quandt
理查德·羅蒂	Richard Rorty
理查德·馬斯格雷夫	Richard Musgrave
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
理查德·澤克豪澤	Richard Zeckhauser
麗莉	Lilly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列昂尼德·赫維茨	Leonid Hurwicz
列昂尼德·維塔利耶維奇·康托羅維奇	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
列赫·瓦文薩	Lech Walesa

琳達・克羅圖	Linda Croteau
琳達・喬根森	Linda Jorgenson
盧卡・卡采里	Louka Katseli
盧伊佐	Lujza
羅伯特・C・斯圖爾特	Robert C. Stuart
羅伯特・J・巴羅	Robert J. Barro
(J.) 羅伯特・奧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羅伯特・巴洛	Robert Barro
羅伯特・達爾	Robert Dahl
羅伯特・多爾夫曼	Robert Dorfman
羅伯特・霍赫	Róbert Hoch
羅伯特・諾齊克	Robert Nozick
羅伯特・舒爾曼	Robert Schulman
羅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羅德・菲利浦斯	Rod Phillips
羅絲-阿克曼	Rose-Ackerman
羅特施泰因	Rothstein
羅伊・德納	Roy Radner
羅伊・哈羅德	Roy Harrod

M

馬德琳・勒瓦塞爾	Madeline LeVasseur
馬丁・費爾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馬頓・霍瓦特	Márton Horváth
馬頓・陶爾多什	Márton Tardos
馬加什・艾什泰哈齊	Mátyás Esterhzáy
馬加什・拉科西	Mátyás Rákosi
馬科斯・貝克曼	Max Beckmann
馬瑞	Mari
馬塞厄斯・德沃特里龐	Mathias Dewatripont
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馬修・阿巴特	Matthew Abbate
瑪蒂爾達・霍爾茲曼	Mathild Holzman
瑪爾塔	Márta

瑪吉特・希克洛什	Margit Siklós
瑪莉亞・科瓦奇	Mária Kovács
瑪莉亞・克納普	Mária Knapp
瑪莉亞・拉茨科	Mária Lackó
瑪利亞・奧古斯丁諾維奇	Mária Augusztinovics
瑪麗・拉維尼	Marie Lavigne
瑪麗安娜・迪克爾	Mariann Dicker
瑪麗娜・V・羅瑟	Marina V. Rosser
瑪麗亞・帕斯托爾	Mária Pásztor
麥克洛斯基	McClokey
邁赫達德・瓦阿比	Mehrdad Vahabi
邁克爾・埃爾曼	Michael Ellman
邁克爾・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邁克爾・沃爾澤	Michael Waltzer
梅瑞	Mérei
米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米哈爾・卡萊斯基	Michal Kalecki
米哈伊・鮑比契	Mihály Babits
米哈伊・波拉克	Mihály Pollack
米哈伊・法爾卡斯	Mihály Farkas
米哈伊・弗羅什馬蒂	Mihály Vörösmarty
米哈伊・卡羅伊	Mihály Károlyi
米哈伊・科爾尼代斯	Mihály Kornidesz
米哈伊・庫珀	Mihály Kupa
米哈伊・洛基	Mihály Laki
米哈伊・沃伊道	Mihály Vajda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米克洛什・奧伊陶伊	Miklós Ajtai
米克洛什・波爾格	Miklós Polgár
米克洛什・霍爾蒂	Miklós Horthy
米克洛什・吉邁什	Miklós Gimes
米克洛什・卡爾多	Miklós Káldor
米克洛什・卡洛伊	Miklós Kállay
米克洛什・米斯托特福盧希・基什	Miklós Misztóthfalusi Kis

米克洛什·薩博	Miklós Szabó
米克洛什·瓦沙爾海伊	Miklós Vásárhelyi
米克洛什·希曼	Miklós Simán
米勒	Müller
米咪·伯林	Mimi Berlin
米什卡	Mishka
米歇爾·阿爾伯特	Michael Albert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莫里斯·阿萊	Maurice Allais
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默雷爾	Murrell
穆約	Munyó

N

納吉巴尼奧伊·米克洛什·霍爾蒂	Nagybányai Miklós Horthy
南希·多爾夫曼	Nancy Dorfman
尼古拉斯·卡爾多	Nicholas Káldor
尼古拉斯·施普爾伯	Nicolas Spulber
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諾埃米·彼得	Noémi Péter
諾里	Nóri

O

歐金·馮·伯姆-巴維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P

帕爾·拜奈代克	Pál Benedek
帕爾·科恩豪澤	Pál Kornhauser
帕爾·勒切伊	Pál Löcsei
帕爾·雷蒂	Pál Réti
帕爾·雷茲	Pál Réz
帕爾·毛萊泰爾	Pál Maléter
帕爾·哲爾非	Pál Györfi
帕里·勒切伊	Pali Löcsei

帕斯爾	Passel

Q

奇尼	Cini
齊奧塞斯庫	Ceausescu
契訶夫	Chekhov
喬鮑・恰基	Csaba Csáki
喬達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喬舒亞・S・甘斯	Joshua S. Gans
喬治・B・謝潑德	George B. Sheperd
喬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喬治・奧韋爾	George Orwell
喬治・旦茲格	George Dantzig
喬治斯・瓦西利烏	Georgios Vassiliou
青木昌彥	Masahiko Aoki
瓊・羅賓遜	Joan Robinson
瓊托什	Csontos

R

熱若爾・羅蘭	Gérard Roland
日格蒙德・莫里茲	Zsigmond Móricz
若爾特・喬洛格	Zsolt Csalog
若非	Zsófi

S

薩繆爾・卡林	Samuel Karlin
薩諾	Sarno
薩特	Sartre
塞爾瑪	Selma
塞加夫里	Szegávri
賽勒斯・萬斯	Cyrus Vance
沙瑪	Schama
山多爾・奧維舒茲	Sándor Ausch
山多爾・菲勒普	Sándor Fülöp

山多爾・費克特	Sándor Fekete
山多爾・豪勞斯特	Sándor Haraszti
山多爾・柯素里	Sándor Csoóri
山多爾・里夫斯	Sándor Révész
山多爾・納吉	Sándor Nagy
山多爾・尼里	Sándor Nyíri
山多爾・諾沃馬茨基	Sándor Novobáczky
山多爾・裴多菲	Sándor Petöfi
山多爾・塞納希	Sándor Szénási
紹爾戈	Salgó
紹科爾曹伊	Szakolczai
紹洛伊	Szalay
(A. G.) 斯達漢諾夫	A. G. Stakhanov
斯蒂夫・馬格林	Steve Marglin
(T. N.) 施尼瓦桑	T. N. Shrinivasan
蘇哈穆瓦・查克拉瓦蒂	Sukhamoy Chakravarty
蘇莎	Zsuzsa
蘇莎・埃塞	Zsuzsa Esze
蘇莎・達尼埃爾	Zsuzsa Dániel
蘇莎・卡皮塔尼	Zsuzsa Kapitány
蘇莎・科羅克瑙伊	Zsuzsa Koroknai
蘇莎・烏伊洛基	Zsuzsa Újlaki
蘇珊・瑞安-沃爾瑪	Susan Ryan-Vollmar
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索爾仁尼琴	Solzhenitsyn
索尼亞・埃利希	Sonia Erlich

T

塔德烏什・科瓦利克	Tadeusz Kowalik
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	Tadeusz Mazowiecki
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亞	Tatiana Zaslavskaya
塔魯	Tarrou
泰雷茲・洛基	Teréz Laky
陶馬什・巴奇考伊	Tamás Bácskai

陶馬什・鮑爾	Tamás Bauer
陶馬什・科爾奈	Tamás Kornai
陶馬什・克勞斯	Tamás Krause
陶馬什・利普塔克	Tamás Lipták
陶馬什・納吉	Tamás Nagy
特魯斯・庫普曼斯	Truus Koopmans
特倫斯・戈爾曼	Terence Gorman
婷德	Tünde
托爾斯泰	Tolstoy
托馬斯・鮑洛格	Thomas Balogh
托馬斯・庫恩	Thomas Kuhn
托馬斯・曼	Tomas Mann
托馬斯・維托里斯	Thomas Vietorisz
托馬斯・謝林	Thomas Schelling
托米	Tomi
托尼奧・克勒格爾	Tonio Kröger
托特	Tót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W

瓦茨拉夫・哈維爾	Václav Havel
瓦茨拉夫・克勞斯	Václav Klaus
瓦爾特・歐肯	Walter Eucken
瓦爾特・烏布利希	Walter Ulbricht
瓦西利・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威爾・杜蘭特	Will Durant
威廉姆・費爾納	William Fellner
維爾福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維爾納・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維克托・奧爾班	Victor Orbán
維克托・卡拉迪	Viktor Karády
溫特	Winter
翁多爾・加爾多尼	Andor Gárdonyi
翁笙和	Karen Eggleston

沃爾夫·萊佩尼斯	Wolf Lepenies
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X

西德尼·凱恩	Sidney Caine
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
肖夫	Shove
謝姆延	Semjén

Y

雅各布·賴勒	Jakab Raile
雅克·德雷澤	Jacques Drèze
雅諾什·奧洛尼	János Arany
雅諾什·豪爾紹尼	János Harsányi
雅諾什·基什	János Kis
雅諾什·加奇	János Gács
雅諾什·傑奈什	János Gyenes
雅諾什·卡達爾	János Kádár
雅諾什·卡斯	János Kass
雅諾什·凱奈迪	János Kenedi
雅諾什·科多拉尼	János Kodolányi
雅諾什·科爾奈	János Kornai
雅諾什·科瓦奇	János Kovács
雅諾什·克勒	János Köllö
雅諾什·莫爾納	János molnar
雅諾什·沃爾高	János Varga
雅諾什·贊特高塞	János Szentágothai
亞當·米赫尼克	Adam Michnik
亞當·施密特	Ádám Schmidt
亞歷克·諾夫	Alec Nove
亞歷山大·杜布切克	Alexander Dubcek
亞歷山大·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
亞歷山大·凱恩克羅斯	Alexander Cairncross
亞歷山大·馬伊特	Aleksander Bajt

亞歷山大・瓦克魯	Alexandra Vacroux
揚・胡斯	Jan Hus
耶迪可・埃涅迪	Ildikó Enyedi
耶諾・福克	Jenö Fock
耶諾・科爾塔伊	Jenö Koltay
耶諾・拉茨	Jenö Rácz
耶諾・賴特	Jenö Rejtö
耶諾・胥奇	Jenö Szücs
葉戈爾・蓋達爾	Yegor Gaidar
葉連娜・卡盧諾娃	Yalena Kaluzhnova
伊迪絲・比阿夫	Edith Piaf
伊卡・法澤卡斯	Ica Fazekas
伊莉莎白・默里	Elizebath Murry
伊麗茨・科瓦奇	Erzsi Kovács
伊麗莎白・科瓦奇	Erzsébet Kovács
伊麗莎白・西托夫斯基	Erzsébet Scitovsky
伊琳娜・格羅斯費爾德	Irina Grosfeld
伊羅斯・盧卡奇	Ilus Lukács
伊洛納・亞索伊	Ilona Jászai
伊姆雷・保特科	Imre Patkó
伊姆雷・考爾曹格	Imre Karczag
伊姆雷・科莫爾	Imre Komor
伊姆雷・科瓦奇	Imre Kovács
伊姆雷・孔多爾	Imre Kondor
伊姆雷・納吉	Imre Nagy
伊薩克・多伊徹	Isaac Deutscher
伊斯特萬・奧爾馬希	István Almási
伊斯特萬・奧克尼	István Örkény
伊斯特萬・比博	István Bibó
伊斯特萬・杜達斯	István Dudás
伊斯特萬・弗里斯	István Friss
伊斯特萬・海泰尼	István Hetényi
伊斯特萬・捷爾吉・托特	István Gyö rgy Tóth
伊斯特萬・薩博	István Szabó

伊斯特萬・塞切尼	István Széchenyi
伊斯特萬・沃爾高	István Varga
伊斯特萬・雅諾什・托特	István János Tóth
伊斯特萬・扎多爾	István Zádor
伊娃・基焦希–施密特	Éva Kigyóssy-Schmidt
伊娃・肯德	Éva Kende
伊娃・諾沃馬茨基	Éva Novobáczky
伊娃・喬托	Éva Csató
伊娃・塞凱伊	Éva Székely
伊娃・伊特萬	Éva Litvan
伊萬・T・貝倫德	Iván T. Berend
伊萬・道爾沃什	Iván Darvas
伊萬・馬約爾	Iván Major
伊萬・米克洛什	Iván Miklos
伊萬・塞加夫里	Iván Szegvári
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尤爾奇	Julcsi
尤哈斯	Juhász
尤金・威格納	Eugene Wigner
尤若夫・埃爾代耶	József Erdélyi
尤若夫・安托爾	József Antall
尤若夫・豪特沃尼	József Hatvany
尤若夫・雷沃伊	József Révai
尤若夫・盧卡奇	József Lukács
尤若夫・韋特	József Vetö
尤若夫・西瓦克	József Sivák
雨果・索南夏因	Hugo Sonnenschein
約阿希姆・內特爾貝克	Joachim Nettelbeck
約爾斯・瓦西利烏	Jorgos Vassiliou
約根・韋布爾	Jörgen Weibull
約翰・F・納什	John F Nash
約翰・馮・諾伊曼	John von Neumann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

約翰・麥克黑爾	John McHale
約翰・邁克爾・蒙蒂亞斯	John Michael Montias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約翰・希克斯	John Hicks
約瑟夫・伯林納	Joseph Berliner
約瑟夫・布羅茨基	Joseph Brodsky
約瑟夫・斯坦尼斯勞	Joseph Stanislaw
約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Z

扎多爾・托爾道伊	Zádor Tordai
詹科維	Djankov
詹姆斯・托賓	James Tobin
哲爾菲	Györffy
朱迪特・費耶	Judit Fejes
朱迪特・里姆勒	Judit Rimler
朱迪特・米勒	Judit Müller
朱迪特・薩博	Judit Szabó
朱莉安娜・帕蒂	Julianna Parti
茱莉亞・佐洛	Júlia Zala
茲維・格里利謝斯	Zwi Griliches
佐爾坦	Zoltán
佐爾坦・蒂爾迪	Zoltán Tildy
佐爾坦・薩博	Zoltán Szabó
佐爾坦・沃什	Zoltán Vas
佐蘭・斯泰娃諾維蒂	Zorán Sztevanovity

書目

雅諾什・科爾奈作品

個人著作

Kornai, János. 1948. Marx Tőké-je magyarul (Marx's *Capital* in Hungarian). *Társadalmi Szemle* 3 (8–9), pp. 615–619.

———. 1951a. A megnövekedett feladatok terve (Plan for increased tasks). *Szabad Nép,* January 9, p. 1.

———. 1951b. A munkaidő jobb kihasználásáért (For 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working hours). *Szabad Nép,* July 4, p. 1.

———. 1951c. A takarékosság—a munkaverseny egyik központi feladata (Economic efficiency—the key task in a work contest). *Szabad Nép,* March 18, p. 1.

———. 1951d. Kövessük a csepeli példát (Let us follow the example of Csepel). *Szabad Nép,* April 7, p. 5.

———. 1954a. A Központi Vezetőség iránymutatásával tovább a júniusi úton (Further along the June road with the Central Leadership pointing the way). *Szabad Nép,* October 11, p. 3.

———. 1954b. A villamosenergia kérdése (The question of the electric power). *Szabad Nép,* February 11, p. 1.

———. 1954c. "Egy évtized" Nagy Imre elvtárs válogatott beszédei és írásai ("One decade":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omrade Imre Nagy). *Szabad Nép,* October 6, pp. 2–3.

———. 1955. A "Tőkéről" és a szocializmus közgazdasági kérdéseiről (On "Das Kapital" and the economic questions of socialism). Manuscript.

———. 1956. Gyökerestül irtsuk ki a bürokráciát (Uproot bureaucracy once and for all). *Szabad Nép,* October 14, pp. 3–4.

———. 1958. Kell-e korrigálni a nyereségrészesedést? (Should the profit-sharing [system] be corrected?). *Közgazdasági Szemle* 5 (7), pp. 720–734.

———. 1959. "Mennyiségi szemlélet" és "gazdaságossági szemlélet" (The

"quantitative outlook" and the "economic outlook"). *Közgazdasági Szemle* 6 (10), pp. 1083–1091.

———. 1967a. Anti-Equilibrium. Esszé a gázdasagi mechanizmus elméleteiről és a kutatás feladatairól (Anti-Equilibrium: Essay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mechanism and on the tasks of research).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 1967b.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of Long-Term Plans in Hungary.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Edmond Malinvaud and M. O. L. Bacharach, pp. 211–231.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68. Anti-Equilibrium. Mimeographed.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 1972.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Meditation on the Theory and on the Policies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74. Az adaptáció csikorgó gépezete (The creaking mechanism of adaptation).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 1975. *Mathematical Planning of Structural Decisions.* With contributions by Tamás Lipták and Péter Wellisch. 2nd enl.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65.)

———. 1978. John Michael Montias: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 (2), pp. 277–292.

———. 1979.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47* (4), pp. 801–819.

———.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2. Comments on Tibor Liska's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Acta Oeconomica* 28 (3–4), pp. 455–460.

———. 1983a.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pp. 225–252.

———. 1983b. The Health of N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Medical Sciences and Economics. *Kyklos* 36 (2), pp. 191–212.

———. 1984. 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Osteuropa Wirtschaft* 29 (4), pp. 306–319.

———. 1986a.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6b [1980]. Efficien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Ethics. In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pp. 124–13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6c.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pp. 1687–1737.

———. 1986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1), pp. 3–30.

———. 1988a.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33–267.

———. 1988b. Report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737–739.

———. 1989. *Indulatos röpirat a gazdasági átmenet ügyében* (Passionate pamphlet in the caus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dapest: HVG Kiadó.

———. 1990a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a*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0b. Kiegészítesék a "Röpirathoz" (Complements to the "Pamphlet"). *Közgazdasági Szemle* 37 (7–8), pp. 769–793.

———. 1990c.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89.)

———. 1991. *Anti-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3rd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 1992a. Th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Reflections in the Light of Hungarian Fiscal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2), pp. 1–20.

———. 1992b. The Principles of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e Economist* 140 (2), pp. 153–176.

———. 1992c.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d. Visszaesés, veszteglés vagy fellendülés (Recession, idling, or prosperity). *Magyar Hírlap,* December 24, pp. 12–13.

———. 1993a.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under the Postsocialist System. *Kyklos* 46 (3), pp. 315–336.

———. 1993b.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edited by Grethe B. Peterson, pp. 3–41.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1994a. A legfontosabb: A tartós növekedés (Lasting growth as the top priority). Parts 1–5. *Népszabadság,* August 29, p. 11; August 30, p. 11; August 31, p. 11; September 1, p. 11; September 2, p. 11.

———. 1994b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Translated by John Kna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57.)

———. 1994c. Péter György, a reformközgazdász (György Péter, the reform economist). In *Egy reformkozgazdász emlékére: Péter György, 1903–1969,* edited by János Árvay and András B. Hegedűs, pp. 75–89. Budapest: Cserépfalvi Könyvkiadó-T–Twins Kiadó.

———. 1995a. *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Socialist Reform and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5b. Lasting Growth as the Top Priority: Macroeconomic Tensions and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y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47 (1–2), pp. 1–38.

———. 1997a. Adjustment without Recession: A Case Study of Hungarian Stabilization. In *Lessons from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edited by Salvatore Zecchini, pp. 123–152.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OECD.

———. 1997b. *Struggle and Hope: Essays on Stabilization and Reform in a Post-Socialist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1998a. *Az egészségügy reformjáról* (On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syste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8b.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hat Is Meant by the "Change of System"?* London: Centre for Post-Collectivist Studies.

———. 2000a. Hidden in an Envelope: Gratuity Payments to Medical Doctors in Hungary. In *The Paradoxe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dited by Lord Dahrendorf and Yehuda Elkana, pp. 195–214. Budapest: CEU Press.

———. 2000b. What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1), pp. 27–42.

———. 2001. Ten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s Self Evaluation.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h and Nicholas Stem, pp. 49–6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 *What Can Countries Embarking on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So Far?* Cuba Transition Project. Miami: Institute for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ami.

合著

Bognár, Géza, Róbert Gál, and János Kornai. 2000. Hálapénz a magyar egészségügyben (Gratuity payment in the Hungarian health care system). *Közgazdasági Szemle* 47 (4), pp. 293–320.

Csontos, László, János Kornai, and István György Tóth. 1998. Tax Awareness and Reform of the Welfare State: Hungarian Survey Result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6 (2), pp. 287–312.

Kornai, János, Zsuzsa Dániel, Anna Jónás, and Béla Martos. 1971. Plan Sounding. *Economics of Planning* 11 (1–2), pp. 31–58.

Kornai, János, and Karen Eggleston. 2001.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Egyéni választás és szolidaritás. Az egészségügy intézményi mechanizmusának reformja Kelet-Európában*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Nemzeti Tankönyvkiadó.

Kornai, János, János Kovács, and Ádám Schmidt. 1969. Észrevételek Intézetünk munkájához: Munkastílus, irányítás, nevelés, szervezet (Comments on the work of our institute: Working style,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and organization).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 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Kornai, János, and Tamás Lipták. 1959. A nyereségérdekeltség matematikai vizsgálata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profit incentives). Mimeographed.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 1962a. Kétszintű tervezés: Játékelméleti modell és iteratív számítási eljárás népgazdasági távlati tervezési feladatok megoldására (Two-level planning: A game-theoretical model and iterative computing procedure for solving long-term planning problem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TA Matematikai Kutató Intézetének Közleményei* 7/B (4), pp. 577–621.

———. 1962b. A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 of Some Economic Effects of Profit Sharing in Socialist Firms. *Econometrica* 30 (1), pp. 140–161.

———. 1971 [1965]. Two-Level Planning. In *Selected Readings in Economic Theory from Econometrica,* edited by Kenneth J. Arrow, pp. 412–44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Kornai, János, and Béla Martos. 1973. Autonomous Control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conometrica* 41 (3), pp. 509–528.

——— (eds.). 1981. *Non-Price Control.*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ános, Eric S. Maskin, and Gérard Rolan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 (4), pp. 1095–1136.

Kornai, János, and Ágnes Matits. 1987. *A vállalatok nyereségének bürokratikus újraelosztása*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a firm's profi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Kornai, János, and John McHale. 2000. Is Post-Communist Health Spending Unusual? A Comparison with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8 (2), pp. 369–399.

Kornai, János, and Susan Rose-Ackerman (eds.). 2004. *Building a Trustworthy State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ornai, János, Bo Rothstein, and Susan Rose-Ackerman (eds.). 2004.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ornai, János, and Jörgen W. Weibull. 1983. Paternalism, Buyers' and Sellers' Market.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6 (2), pp. 153–169.

其他作者著作

Aczél, Tamás, and Tibor Méray. 1960. *The Revolt of the Mind: A Cas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Praeger.

Ady, Endre. 2004. *Ady Endre összes versei* (The complete poems of Endre Ady). Budapest: Osiris.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eds.).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kerlof,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pp. 488–500.

Antal, László. 1982. Fejlődés kitérővel—A magyar gazdasági mechanizmus a 70-es években (Development with a detou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1970s). *Gazdaság* 14 (2), pp. 28–56.

Arrow, Kenneth J. 195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Choice in Risk-Taking Situations. *Econometrica* 19 (4), pp. 404–437.

——— (ed.). 1971. *Selected Readings in Economic Theory from Economet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73a. Rawls's Principle of Just Sav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5 (4), pp. 323–335.

———. 1973b [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51.)

———. 1974.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Purpose, Analytic Techniques, Collective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3), pp. 253–272.

Arrow, Kenneth J., Samuel Karlin, and Herbert E. Scarf. 1958. *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bits, Mihály. 1998 [1936]. *Az európai irodalom története*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Budapest: Merényi.

Bacskai, Tamás, and Elemér György Terták. 1983. Mesterséges érdek—növekedési kényszer (Artificial interest—Compulsion to growth). *Valóság* 26 (10), pp. 91–94.

Baráth, Magdolna. 1999. Az MDP vezetése és a rehabilitáció (The leadership of the MDP and the rehabilitation). *Múltunk* 44 (4), pp. 40–97.

Barro, Robert J., and Herschel I.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 pp. 82–93.

Bauer, Tamás. 1981. *Tervgazdaság, beruházás, ciklusok* (Planned economy, investment, cycl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ergson, Abram. 1948.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ited by Howard S. Ellis, pp. 412–448. Philadelphia: Blakiston.

Blahó, Miklós. 2003. A fő cél a tartós növekedés. Interjú Kornai Jánossal (The main aim is lasting growth: Interview with János Kornai). *Népszabadság,* January 25, pp. 23, 27.

Blanchard, Olivier. 1999. An Interview with János Kornai. *Macroeconomic Dynamics* 3 (3), pp. 427–450.

Böhm-Bawerk, Eugen von. 1975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Clifton, N.J.: A. M. Kel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96.)

Bolygó, János. 1966. Mit kutatott professzor Montias Magyarországon? (What did Professor Montias research in Hungary?). *Magyar Nemzet,* July 3, p. 7.

Bosworth, Barry P. 1990. Which Way to the Marke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7, p. 17.

Boulding, Kenneth E. 1966. *Economic Analysis.* 4th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1.)

Braham, Randolph L. 1981.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ámer, Frigyes. 1997 [1972]. Koncentrációs tábor a Rabbiképző épületében (Concentration camp in the Rabbinical Seminary building). In *Évkönyv,* edited by Sándor Scheiber, pp. 219–228. Budapest: Magyar Izraeliták Országos Képviselete.

Bródy, András. 1956. A hóvégi hajrá és gazdasági mechanizmusunk (End-of-month rush and our economic mechan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7–8), pp. 870–883.

———. 1970. *Proportions, Prices, and Planning: A Mathematical Restatement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69.).

"Bureaucrats at Large." 1960.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15, p. 244.

Camus, Albert. 1991 [1948]. *The Plague.*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42.)

Carlin, Wendy, Steven Fries, Mark E. Schaffer, and Paul Seabright. 2001.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a Cross-Country Survey.* EBRD Working Paper 62. London: EBRD.

Chikán, Attila (ed.). 1989. *Készletek, ciklusok, gazdaságirányítás. A magyar gazdaság készletalakulása és befolyásoló tényezői, 1960–1986* (Stocks, cycles,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s stock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 1960–1986).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2004. A hiány szerepe az átmenet szellemi előkészítésében (The role of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in the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change of system). *Magyar Tudomány* 49 (7), pp. 698–707.

Coles, Peter. 1999. *Einstein and the Total Eclipse.* Cambridge: Icon Books.

Csoóri, Sándor. 1990. Nappali hold. II. rész (Daytime moon: Part 2). *Hitel* 3 (18), September 5, p. 5.

Dahl, Robert A. 1979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breu, Gérard. 1965 [1959]. *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New York: Wiley.

Denton, Nicholas. 1990. On the Brink of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7, p. 2.

Deutscher, Isaac. 1968 [1949].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vons, Ely. 1959. A Study in Central Planning: Evidence from Inside. *The Guardian,* October 22, pp. 10–11.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Eric S. Maskin. 1995.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udies* 62 (4), pp. 541–555.

Djankov, Simeon D., and Peter Murrell. 2002.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3), pp. 739–792.

Donáth, Ferenc (head of the editorial board). 1981. Bibó-emlékkönyv (In memory of Bibó). 2 vols. Samizdat.

Dorfman, Robert, Paul A. Samuelson, and Robert M. Solow. 1987 [1958].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Draaisma, Douwe. 2004. *Why Life Speeds Up When You Get Older: How Memory Shapes Our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ant, Will. 1991 [1926].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Ericson, Richard E. 1994. Book Review.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3), pp. 495–497.

Esterházy, Péter. 2003. Mik vogymuk. 1. könyv. (What are we: Book 1). *Élet és Irodalom,* May 9, p. 3.

Esze, Zsuzsa. 1956. Egy kandidátusi értekezés vitája (Discussion of a candidate's dissert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11–12), pp. 1483–1495.

Eucken, Walter. 1951 [1940].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jtő, Ferenc. 1957. La première autocntlque des "Communistes Nationaux" hongrois. *France Observateur* 8 (January 31), p. 6.

Fóthy, János. 1945. *Horthyliget—A magyar ördögsziget* (Horthy-liget—The Hungarian Devil's Island). Budapest: Müller Károly Könyvkiadóvállalat.

Frey, Bruno S. 2003. Publishing as Prostitution? Choosing between One's Own Ideas and Academic Failure. *Public Choice* 116 (1–2), pp. 205–223.

Frisch, Ragnar. 1961. A Survey of Types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and Programming, an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hannel Model. Mimeographed.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Friss, István. 1957. Nepgazdaságunk vezetésének néhány gyakorlati és elméleti kérdéséről (Som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managing the economy). *Népszabadság,* October 2, pp. 3–4.

Gábor, R. István, and Péter Galasi. 1981. *A "második gazdaság": Tenyek és hipotézisek* (The "second economy": Facts and hypothes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Gács, János, and János Köllő (eds.). 1998. *A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tól" az átmenet stratégiájaig: Tanulmányok Kornai Jánosnak* (From "overcentralization" to the strategy of transition: Studies for János Kornai).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Gáll, Ernő. 2003. *Napló* (Diary). Vol. 1. Budapest: Polis Könyvkiadó.

Gans, Joshua S., and George B. Shepherd. 1994. How Are the Mighty Fallen: Rejected Articles by Leading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1), pp. 165–179.

Gimes, Miklós. 1956. Magyar Szabadság (Hungarian freedom). *Magyar Szabadság,* October 29, p. 1.

Goldfeld, Stephen M., and Richard E. Quandt. 1988. Budget Constraints, Bailouts and the Firm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 (4), pp. 502–520.

———. 1990. Output Target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Firm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4 (2), pp. 205–222.

———. 1993. Uncertainty, Bailouts, and the Kornai Effect. *Economics Letters* 41 (2), pp. 113–119.

Gregory, Paul R., and Robert C. Stuart. 1980.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2004.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7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rossfeld, Irena. 1989. Disequilibrium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pp. 361–374.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Gulyás, Emil. 1957–1958. Az árutermelés, értéktörvény és pénz a szocializmusban (Production, the law of value, and money in socialism). Manuscript.

Gy [pseud.]. 1991. Skizze eines Reformprogramms am Beispiel Ungarns. *Neue Zürcher Zeitung* Fernausgabe, June 30–July 1, p. 7.

Haberler, Gottfried von. 1964.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yclical Movements.* 5th 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37.)

Hahn, Frank. 1973.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Economica* 40 (159), pp. 322–330.

Halda, Alíz. 2002. *Maganiigy. Dokumentum/regény* (Private affair: Documentary/novel). Budapest: Noran.

Hašek, Jaroslav. 2000 [1973].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and His Fortunes in the World War.* Translated by Cecil Parrott. London: Pengui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zech in 1920–1923.)

Hayek, Friedrich A. von (ed.). 1975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Clifton, N.J.: A. M. Kelly.

———. 2001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Hegedűs, András. 1990. A bolsevik grand-seigneur tragédiája (The tragedy of the Bolshevik *grand seigneur). Pesti Hírlap,* November 3, p. 8.

Heisenberg, Werner. 1967 [1958]. Az elemi részek (Elementary particles) (Lecture presented in Budapest).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Selected papers), pp. 219–237. Budapest: Gondolat.

Heller, Farkas. 1988. *Közgazdaságtan* (Economics). 2 vols. 5th ed.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12–1920.)

Hicks, John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 (2), pp. 147–159.

———. 2001 [1939].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d-csoport. 1990. Híd a közeli jovőbe (Bridge to the near future). *Közgazdasági Szemle 37* (4), pp. 442–458.

Hirschman, Albert O. 1988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 David E. 2002.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Huizinga, Johan. 1996.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in 1919.)

Hungaricus [Sándor Fekete]. 1959 [1956–1957]. *Quelques enseignements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et démocratique hongroise.* Brussels: Imre Nagy Institute.

———. 1989 [1956–1957]. *Az 1956–os felkelés okairól és tanulságairól* (On the causes and lessons of the 1956 uprising).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József, Attila. 1997. *Winter Night: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John Batki. Oberlin, Ohio: Oberlin College Press.

———. 2003. *József Attila összes versei* (Complete poems of Attila József). Budapest: Osiris.

Juhász, Andor. 1934. *Halló, itt London!* (Hallo, it's London!). Budapest: Révai.

Kalecki, Michal. 1965.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An Essay on Cyclical and Long-Run Changes in Capitalist Economy.* 2nd 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54.)

Karagedov, Rajmond G. 1982. Mechanizm funkcionirovaniya socialisticheskoy ekonomiki (Mechanism of the function of a socialist economy). *Isvestija Sibirskava Otdeleniya Akademij Nauk SSSR* 3 (11), pp. 115–128.

Kardelj, Edvard. 1982. *Reminiscences: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New Yugoslavia,* 1944–1957. London: Blond and Briggs—Summerfield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erbo-Croatian in 1980.)

Karinthy, Ferenc. 1994. *Napló* (Diary). Budapest: Littoria.

Karinthy, Frigyes. 2001 [1914]. A felelős ember (The man in charge). In *Humoreszkek*, 2:155–157. Budapest: Akkord.

Karsai, Gábor. 1993. A szocializmus genetikai programja (The genetic program of socialism). *Figyelő 37,* November 11, pp. 17–19.

Kék Szalag Bizottság 1990. *[A Bizottság] Gazdasági Programjavaslata* (Recommendation for an economic program). Budapest: Kék Szalag Bizottság.

Kende, Péter. 1955. Kritikai jegyzetek a marxizmus gazdasági tanaihoz (Critical remarks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Marxism). Manuscript.

———. 1959. L'intérêt personnel dans Ie système d'économie socialiste. *Revue Economique* 10 (3), pp. 340–364.

———. 1964. *Logique de l'économie centralisée. Un exemple: la Hongrie.* Paris: Société d'Éduca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e.

———. 1966. *A Szabad Nép szerkesztőségében. Tanulmányok a magyar forradalomról* (In the editorial offices of Szabad Nép: Studies o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Munich: Aurora.

Kenedi, János. 1981. *"Tiéd az ország, magadnak építed"* (The country is yours, you build it for yourself). Paris: Magyar Füzetek Könyvei.

———. 1996. *Kis állambiztonsági olvasókönyv. Október 23.—március 15.—június 16* (Small state security reader: October 23–March 15–June 16). 2 vols. Budapest: Magvető.

Keynes, John M. 1997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Klaniczay, Gábor. 2003. *Ellenkultúra a hetvenes-nyolcvanas években* (Counterculture in the '70s and '80s). Budapest: Noran.

Klaus, Václav, and Dušan Tříska. 1997 [1994]. Review of János Kornai'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In *Renaissance: The Rebirth of Liberty in the Heart of Europe,* by Václav Klaus, pp. 163–169.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Koestler, Arthur. 1993 [1941]. *Darkness at Noon.* Translated by Daphne Hardy. New York: Bantam Books.

Koopmans, Tjalling C. 1957.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Koopmans, Tjalling C., and John M. Montias.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edited by Alexander Eckstein, pp. 27–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vács, András. 1968. Falak (Walls). *Új Írás* 8 (3), pp. 28–48.

Kovács, Imre. 1989 [1937]. *A néma forradalom* (The silent revolution). Budapest: Cserépfalvi–Gondolat–Tevan.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96. *Magyar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95 (Hungary'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5).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Krausz, Tamás. 1994. A történetietlen politikai gazdaságtan (A non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Eszmélet* 6 (24), pp. 157–178.

Kuhn, Thomas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62.)

Laczik, Erika. 2005. Egy besúgó tisztikereszttel (An informer with an Officer's Cross). *Magyar Nernzet,* January 29, pp. 1, 5.

Laibson, David, and Richard Zeckhauser. 1998. Amos Tversky and the Ascent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6 (1), pp. 7–47.

Laki, Mihály. 1989. Az új politikai szervezetek a gazdaságpolitikáról és a gazdaságirányitásról (The new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bout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Tervgazdasági Fórum* 5 (4), pp. 1–16.

———. 1990. Rendszerváltás küszöbén. Az ellenzéki pártok gazdaságpolitikai programjai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The economic policy programs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Mimeographed. Közgazdasági Információs Szolgálat, Budapest.

Lange, Oskar. 1968 [1936–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enjamin E. Lippincott, pp. 57–143. New York: McGraw Hill.

Leijonhufvud, Axel.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gyel, László. 2002. *A távol közelében. Kérdez: Hankiss Elemér* (Near too far away. The interviewer: Elemér Hankiss). Budapest: Helikon Kiadó.

Lengyel, László, and Miklós Polgár. 1980. Gazdasági elvek, etikai elvek—és a valóság (Economic principles, ethical principles, and reality). *Valóság* 23 (9), pp. 101–107.

Lenin, Vladimir I. 1964 [1920].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In *Collected Works,* 31: 17–11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rner, Abba P. 1975 [1944].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s.* New York: A. M. Kelley.

Lindbeck, Assar. 197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 An Outsider's View.* 2n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 1988. Individual Freedom and Welfare State Polic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95–318.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ska, Tibor. 1988 [1966]. *Ökonosztát: Felkáséülés a mechanizmusreformra* (Econostat: Preparation for reforming the mechanis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Liska, Tibor, and Antal Marias. 1954. A gazdaságosság és a nemzetközi munkamegosztás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1), pp. 75–94.

Liska, Tibor F. 1998. A Liska-modell (The Liska Model). *Közgazdasagi Szemle* 45 (10), pp. 940–953.

Lőcsei, Pál. 1995. "Politikai és lelkiismereti lázadás volt … " (It was a political and moral rebellion). *Respublika* 2 (13), pp. 36–40.

Lukács, György. 1973 [1945].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Lukács, *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Revolution,* edited by E. San Juan Jr., pp. 267–276. New York: Delta.

———. 1978 [1950].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Balzac, Stendhal, Zola, Tolstoy, Gorki, and Others.* Translated by Edith Bone. London: Merlin Press.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özponti Vezetőség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1955. A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özponti Vezetőségének határozata a politikai helyzetről es a párt feladatairól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party's tasks). *Szabad Nép,* March 9, pp. 1–2.

Malinvaud, Edmond. 1967. Decentralized Procedures for Planning.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Edmond Malinvaud and M. O. L. Bacharach, pp. 170–208.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linvaud, Edmond, and M. O. L. Bacharach (eds.). 1967.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rx, Karl. 1992.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vol. 1) and David Fernbach (vols. 2 and 3). London: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67, 1885, and 189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2002 [18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London: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48.)

Maskin, Eric S., and András Simonovits (eds.). 2000.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ános Korna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atolcsy, György. 1997. Kiigazítás recesszióval. Kemény költsegvetesi és puha piaci korlát (Adjustment with recession: Hard budget constraint and soft market constraint). *Közgazdasági Szemle* 44 (9), pp. 782–798.

McCloskey, Deirdre N. 1998.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2n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85.)

McKenzie, Lionel W. 1959. On the Existenc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etrica* 27 (1), pp. 54–71.

Molnár, Endre. 1957. Revizionista nézetek a szocialista állam gazdasági szerepéről (Revisionist view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ocialist state). *Társadalmi Szemle* 12 (2), pp; 44–59.

Montias, John M. 1976.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Arts and Artisans in Delft: A Socio-Economic Stud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Vermeer and His Milieu: A Web of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2. *Art at Auction in 17th Century Amsterda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Muller, Rolf. 1999. Napi operatív információs jelentések, 1979–1989 (The daily operative information reports, 1979–1989). In *A Történeti Hivatal Évkönyve* 1999, edited by György Gyarmati, pp. 251–284. Budapest: Történeti Hivatal.

Nagy, Csaba. 1994. Lázadás a Szabad Népnél 40 évvel ezelőtt. Beszélgetés Lőcsei Pállal és Méray Tiborral (Rebellion at *Szabad Nép* 40 years ago: A conversation with Pal Lőcsei and Tibor Meray). *Kritika* 23 (10), pp. 10–11.

Nagy, ImIe. 1954. *Egy évtized. Válogatott beszédek és írások* (1948–1954) (One decade: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48–1954). Budapest: Szikra.

Neumann, John Yon. 1963 [1955]. The Impac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on the Economy and on Economics. In *Collected Works,* 6:100–101. New York: Macmillan.

Nove, Alec. 1960.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Economica* 27 (108), pp. 389–391.

———. 1992. No Third Way?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June 19, p. 23.

Novobáczky, Sandor. 1956. Különös emberek (Strange people). *Irodalmi Újság,* October 6, p. 1.

Nozick, Robert. 1998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Nyíri, Sándor. 1994. A Péter György elleni büntetőeljárás (The criminal case against György Péter). In *Egy reformközgazdász emlékére: Péter György, 1903–1969* (In memory of a reform economist: György Péter, 1903–1969), edited by János Árvay and András B. Hegedűs, pp. 45–47. Budapest: Cserépfalvi Könyvkiadó–T-Twins Kiadó.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93 [1932].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in 1929.)

Orwell, George. 1966 [1949]. *Nineteen Eighty-four.*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pandreou, Andreas G. 1972. *Paternalistic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ssel, Peter. 1990. Socialist Eggs, Market Omelet.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p. 2.

Péter, György. 1954. A gazdaságosság jelentőségéről és szerepéről a népgazdaság tervszerű irányításában (On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plan-based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3), pp. 300–324.

———.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a jövedelmezőség jelentősége a tervgazdaságban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planned economy). *Közgazdasagi Szemle* 3 (6), pp. 695–711; (7–8), pp. 851–869.

———.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a. Kornai János tanulmányarál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n János Kornai's study). *Magyarország* 1 (1), p. 2.

Péteri, György. 1997. New Course Economics: The Field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Hungary after Stalin, 1953–56.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6 (3), pp. 295–327.

———. 1998. *Academia and State Soci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cademic Life in Post-1945 Hungary and Eastern Europe.* Highland Lakes, N.J.: 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 (ed.). 2001. *Intellectual Life and the First Cri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53–1956. Trondheim Studies on East Europea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no. 6. Trondheim: Program on East Europea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Phillips, Albin W. 1958.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2), pp. 283–299.

Pigou, Arthur C. 2002 [1952].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20.)

Pogonyi, Lajos. 2003. A munkásosztály megsemmisítése. Interjú Vajda Mihállyal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workers' class: Interview with Mihály Vajda). *Népszabadság,* October 15, p. 14.

Portes, Richard, and David Winter. 1980.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7 (1), pp. 137–159.

Qian, Yingyi. 1994. 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 pp. 145–156.

Rainer, M. János. 1999. *Nagy Imre-Politikai életrajz* (Imre Nagy: A political biography, vol. 2, 1953–1958). Budapest: 1956–os Intezet.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Réti, Pál. 1989. Mienk az ország (The country is ours).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pp. 3–5.

Révész, Sándor. 1999. *Egyetlen élet. Gimes Miklós története* (One single life: The story of Miklós Gimes). Budapest: 1956–os Magyar Forradalom Történetének

Dokumentációs es Kutatóintézete-Sík Kiadó.

Réz, Pál. 1961. Thomas Mann and Hungary—His Correspondence with Hungarian Friends. *New Hungarian Quarterly* 2 (3), pp. 84–99.

———. (ed.). 1991. *Bibó–emtékkönyv* (In memory of Bibó), by Ferenc Donáth. Budapest: Szádvég; Bern: European Protestant Hungarian Free University. (First available in a samizdat edition, 1981.)

Ripp, Géza. 1957. Revizionizmus "az új gazdasági mechanizmus" leple alatt (Revisionism under the veil of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Népszabadság,* July 23, p. 3.

Ripp, Zoltán (ed.). 2000.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1989-ben* (The script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The roundtable negotiations in 1989). Vol. 5. Budapest: Új Mandátum.

R.N.W.O. 1959. Iron Curtain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8, p. 12.

Roland, Gérard. 1987. Investment Growth Fluctu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2), pp. 192–206.

———. 1990. On the Meaning of Aggregate Excess Supply and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1), pp. 49–62.

Rosovsky, Henr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Rosser, J. Barkley, Jr., and Marina V. Rosser. 2004.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Economy.* 2nd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96.)

Salgó, István. 1990. Les propositions de l'économiste János Kornai provoquent un vif débat. *Le Monde*, April 20, p. 3.

Samuelson, Paul A. 1980. *Economics.* 11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8.)

———. 1983.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7.)

———. 1990. For Plan to Reform Socialism, Listen to János Kornai.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4, p. 7.

Sartre, Jean-Paul. 1990 [1957].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Carol Publication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46.)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chelling, Thomas C. 1980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neider, Erich. 1962. *Money, Income, and Employment*. Translated by Kurt Klappholz.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49.)

Schumpeter, Joseph. 1983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Translated by Redvers Opi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11.)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6th ed. London: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2.)

Scitovsky, Tibor. 1992. *The Joyless Econom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Dissatisfaction*.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6.)

Semjén, András. 1990. A műtétet az orvosnak is túl kell élnie (The operation must be survived by the surgeon, too). *Figyelő*, February 22, p. 7.

Sen, Amartya K.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 (2), pp. 317–344.

———. 1988. Freedom of Choi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69–294.

———. 1997 [1982].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ove, Gerald F. 1942. The Place of Marshall's *Princip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52 (208), pp. 294–329.

Simon, Herbert A. 1979.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 (4), pp. 493–513.

Simonovits, András. 2003. A magyar szabályozáselméleti iskola (The Hungarian school of control theo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50 (5), pp. 465–470.

Solow, Robert. 2000. Stability and Growth: Commentary on a Commentary. In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ános Kornai*, edited by Eric S. Maskin and András Simonovits, pp. 407–41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pengler, Oswald. 1991 [1965].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bridged by Helmut Werner; English abridged ed. prepar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18–1922.)

Spulber, Nicolas. 1960.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4), pp. 763–764.

Stackelberg, Heinrich von. 1952 [1943]. *The Theory of the Market Economy.* London: William Hodge.

Stalin, Joseph V. 1949 [1940].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1938.)

———. 1953 [1940]. On the Death of Lenin—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Second All-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 January 26, 1924. In *J. V. Stalin, Works,* 6:47–5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Streeten, Paul. 1959.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s. (11), pp. 167–190.

Such, György, and István János Tóth. 1989. A magyar közgazdaságtudomány a Közgazdasági Szemle tudománymetriai vizsgálatának tükreben (Hungarian economic science in the mirror of the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Közgazdasagi Szemle). Közgazdasági Szemle* 36 (10), pp. 1163–1241.

Szabó, Zoltán. 1986 [1936]. *A tardi helyzet* (The Tard sto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Kossuth Könyvkiadó–Magvető.

Szakolczai, Attila. 2001. *Az 1956-os forradalom és szabadságharc* (The 1956 Revolution and War of Independence). Budapest: 1956–os Intézet.

Szalay, László. 1994. Előhang 1954-ből: a Szabad Nép taggyűlése (Overture from 1954: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meeting at *Szabad Nép). Világosság* 35 (10), pp. 48–56.

Szegő, Andrea. 1983. Érdek és gazdasági intézményrendszer (Interest and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ystem). *Valóság* 26 (6), pp. 22–36.

———. 1991. The Logic of a Shortage Economy: A Critique of Kornai from a Kaleckian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3 (3), pp. 328–336.

Szegvári, Ivan. 1990. Az egységesség mítosza. Vita az "Indulatos röpirat"-ról (The myth of unity: Debate on the "Passionate pamphlet"). *Figyelő,* February 11, p. 5.

Szénási, Sándor. 1983. Pató Pál elvtárs. Interjú Antal Lászlóval (Comrade Pál Pató: An interview with László Antal). *Élet és [rodalom,* November 11, p. 7.

Szerb, Antal. 2003a [1941]. *A világirodalom történet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Budapest: Magvető.

———. 2003b [1934]. *Magyar irodalomtörténet*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Budapest: Magvető.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1989. A Kornai-bomba (The Kornai bomb).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p. 66.

Tardos, Márton. 1982. Program a gazdaságirányítási és szervezeti rendszer fejlesztésére (A program to develop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system of organiz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19 (6), pp. 715–729.

———. 1988a. A gazdasági szervezetek és a tulajdo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ownership). *Gazdaság* 22 (3), pp. 7–21.

———. 1988b. A tulajdon (Property). *Közgazdasági Szemle* 35 (12), pp. 1405–1423.

Thassy, Jenő. 1996. *Veszélyes vidék* (Dangerous territory). Budapest: Pesti Szalon.

Tinbergen, Jan. 2004 [1951]. *Econometrics.*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in 1941.)

———. 1981 [1969]. The Use of Models: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6), pp. 17–22.

Vasziliu, Georgiosz. 1999. *"Nagy on jó egyetemre jártam, a magyar forradalom egyetemére" Georgiosz Vasziliu elmond; a életét Hegedűs B. Andrásnak* (I studied at a very good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Vassiliou Georgios speaks about his life to András B. Hegedűs). Budapest: 1956-os Intézet.

Veres, Péter. 1997 [1939]. *Gyepsor. Elbeszélések, versek* (Gyepsor: Stories and poems). Budapest: Szabad Fold.

Vida, István. 1992. Sajtófogadás 1956. november 3-án. A Nagy Imre-per irataiból (Pres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3, 1956: From the documents of the Imre Nagy case). *Rubicon* 3 (7), pp. 31–34.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雅諾什·科爾奈是傑出的匈牙利經濟學家，青年時曾狂熱地信奉社會主義，之後轉而批判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系。他的家人大部分在二戰猶太大屠殺中喪生。他先後做過報社記者、研究員（因為政府禁止他在本國從事教學工作），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爆發，他已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理論家。科爾奈是東西學術界交流的使者，並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職位上榮休。《思想的力量》是以第一身角度追溯了科爾奈一生的學術探索之旅。

這部自傳描述了科爾奈長達半個世紀的研究經歷及其成果，並介紹了進行這些研究工作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許多秘密警察文件及告密者對科爾奈活動的報告，塵封已久，最近才得到披露，在如此重大困難的環境下，清楚地展示了作者在探索學術追求真理中所擁有的勇氣和思想力。科爾奈發表的《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1956），是第一部鐵幕生活下的人公開批判蘇式經濟的著作，在匈牙利國內受到猛烈抨擊，但卻受西方經濟學家青睞。科爾奈－利普塔克的雙層計劃理論引起數理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後來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備受爭議的《反均衡論》（1971），批評當時用來分析市場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短缺經濟學》（1980）；《通向自由經濟之路》（1990）以及總結其畢生研究成果的著作《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92）。

對於主修經濟學思想、社會主義制度和後社會主義轉軌等專業的學生，以及對東歐學界如何經歷共產體制興衰感興趣的讀者，《思想的力量》是一本必備的重要學術參考書。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J · 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就已經是剛剛步入改革之門的中國經濟學家案頭必備的參考書。閱讀《思想的力量》這本將作者的學術著作與生活經歷緊密契合在一起的「另類自傳」，將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源流和豐富內涵。

吳敬璉（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作為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創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先驅，在經濟思想史中獨樹一幟的理論家，雅諾什 · 科爾奈的回憶錄《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師的高度、學者的深度揭示了經濟改革、體制轉軌、制度變遷的過程及規律。科爾奈是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計劃、改革、轉軌等方面同時做出過開創性貢獻的唯一的經濟學家。此書是集制度變遷及經濟學思想史於一身的經典。

許成鋼（香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書以敏銳的洞察力描述了匈牙利動盪不安的制度變遷過程和當代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史——作者本人積極地參與了這兩個歷史進程。人們還可以將這本自傳看作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探討科學創造的道德標準和心理過程的專著。

青木昌彥（斯坦福大學榮譽教授、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80年人生冷暖，60載探索思考，凝聚成了科爾奈這部非傳統形式的自傳。他經歷了納粹鐵蹄，東西方冷戰，匈牙利事件，蘇東鐵幕倒塌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他的一生就是對真理的不倦追求，對學術研究的不斷探索。是他第一次向人們闡述了「短缺經濟」、「軟預算約束」等概念，令人們深刻瞭解計劃經濟的實質與運行機制；是他在研究方法上頗多創新，能够從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組織與制度的角度，做出制度範式的系統分析。我們從該書中不但看到科爾奈一生無可比擬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看到一位學者最崇高的胸懷。

王一江（長江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雅諾什 · 科爾奈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瞭解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方式。他的《短缺經濟學》對我和我的俄羅斯同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專著。《思想的力量》幫助我們更加詳細地瞭解了科爾奈的生活和思想的發展過程。

葉戈爾 · 蓋達爾（俄羅斯前總理、莫斯科轉型經濟研究所所長）

ISBN 978-962-996-395-8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